

社会主义向何处去

——今我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扫描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
献给关心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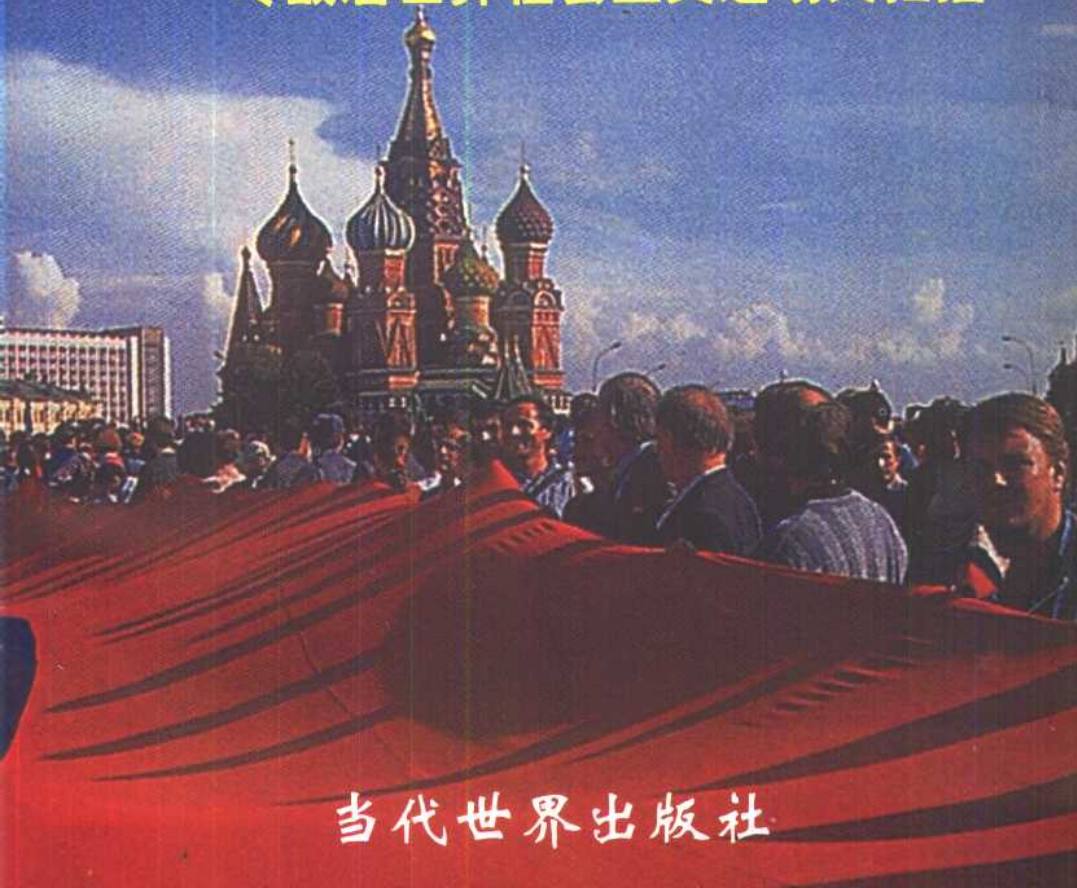
肖枫 主编



当代世界出版社

社会主义 向何处去

—— 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扫描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扫描/肖枫主编.-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1
ISBN 7-80115-159-3

I.社… II.肖… III.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1991~
IV.D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4115 号

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路 4 号 邮编:100860)

河北省徐水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36.75 彩插:36 字数:90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300 册 定价:74.00 元(精)

ISBN 7-80115-159-3/D·42

谨此献给

《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



顾 问：李淑铮 龚育之
高 放 赵 曜

主 编：肖 枫

主编简介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际问题学科组成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
中国科社学会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顾问

本书编委会

主 编：肖 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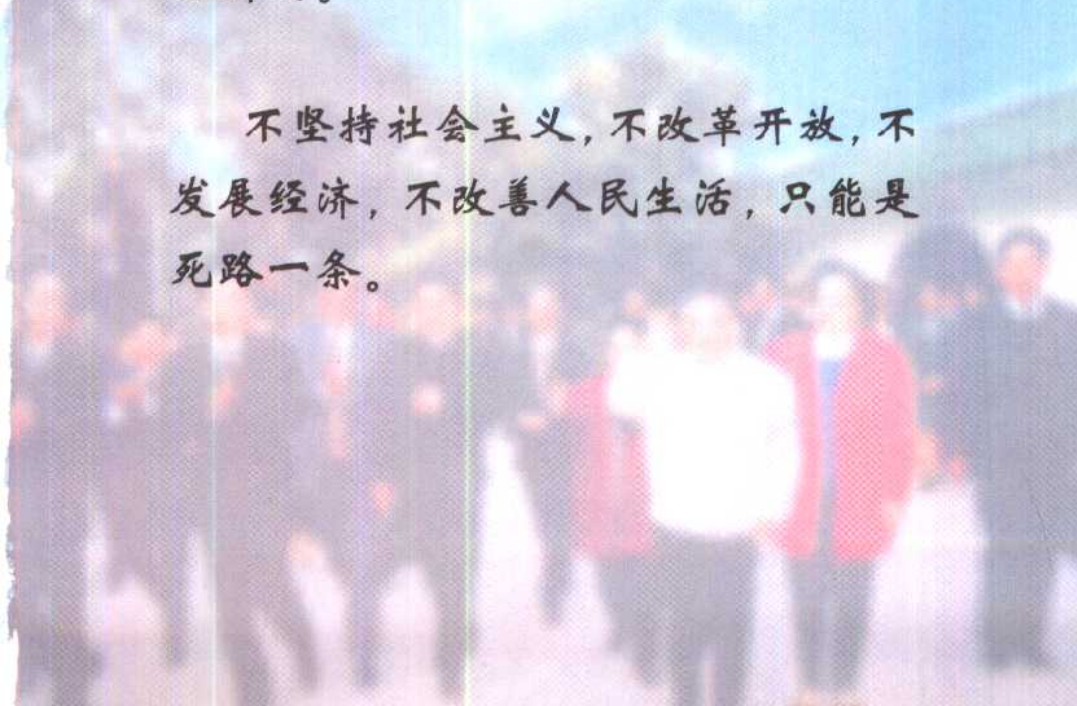
成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金圣	王雨滨	田永祥	刘洪才
邝生炎	朱俊发	汪锡奎	周永铭
姜述贤	施辉业	郭元增	谭中华
潘宗白			



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

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 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新生的国家没有被国内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扼杀在摇篮里，后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成为主力军，并跻身于世界强国的行列。



◀ 1945年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图为红军战士将苏联国旗插上德国议会大厦。

▼ 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与英国首相邱吉尔（左），美国总统罗斯福（中）坐在一起。



1989年……

东欧国家发生剧变



苏联的“改革”变成“改向”



◀ 1990年莫斯科街头游行口号：“现在是回到资本主义的时候了！”



▶ 情绪激昂的群众，有的欢笑鼓掌，有的愤怒呐喊。

动荡激化，1991年发生“8·19”事件



◀ 街头坦克与群众



▶ 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争论。

苏联解体

1991年12月21日独联体成立，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被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



миллиард рублей
«беловежских»
Станислава Шуш-
кет назва он в
резиденции — в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
ветской ССР.

Стихи, посвящен-
ные лет назад, про-
двинули в депутаты
партии на Мемори-
ле ИВАНОВИЧ.
Губинский
вечер.

▲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右一）、白俄罗斯总统舒斯科维奇（右四）、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左一）签署了别洛韦日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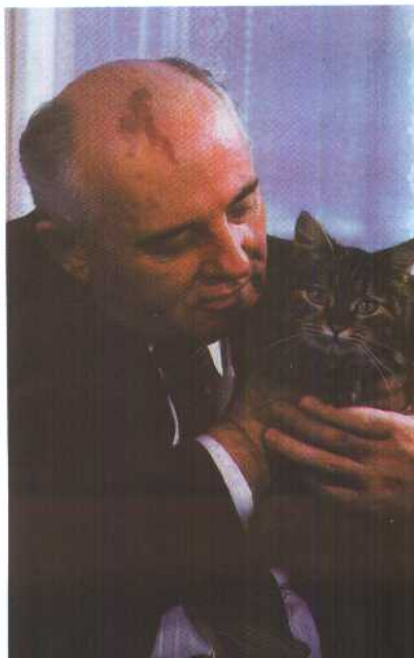


▲ 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黯然降落。



▲ 俄罗斯三色旗在克里姆林宫徐徐升起。

▼ 今日戈尔巴乔夫



解体后的动荡和流血

1993年
10月“白宫事件”

◀ 图为炮轰
议会大厦，解
决议会与总统
的权力之争。



车臣战争

▶ 图为莫斯科群众游行，要求政府让他们在车臣作战的子弟回家。



实际体验使人们的政治情绪出现反弹



◀ 失业的工人：
“人民不能再这样
生活下去了！”

1994年莫斯科
街头游行的标
语牌上写着：“资
本主义是臭狗
屎！”

1995年莫斯科
左翼组织和群众举行
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大
游行。队前横幅写
着：“伟大的十月思
想是不可战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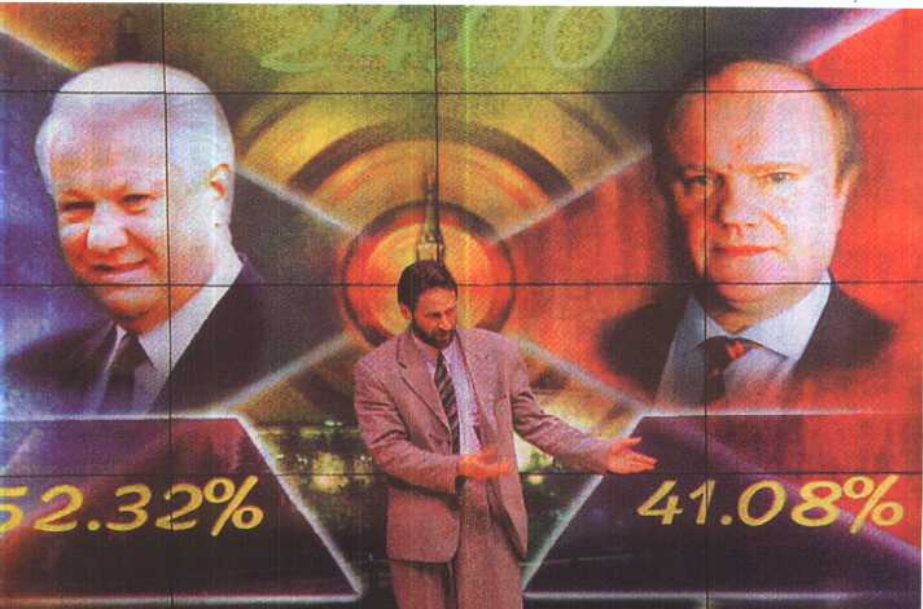
◀ 1996年俄罗斯人民爱国联盟成立大会主席台

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

◀ ▼ 支持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的群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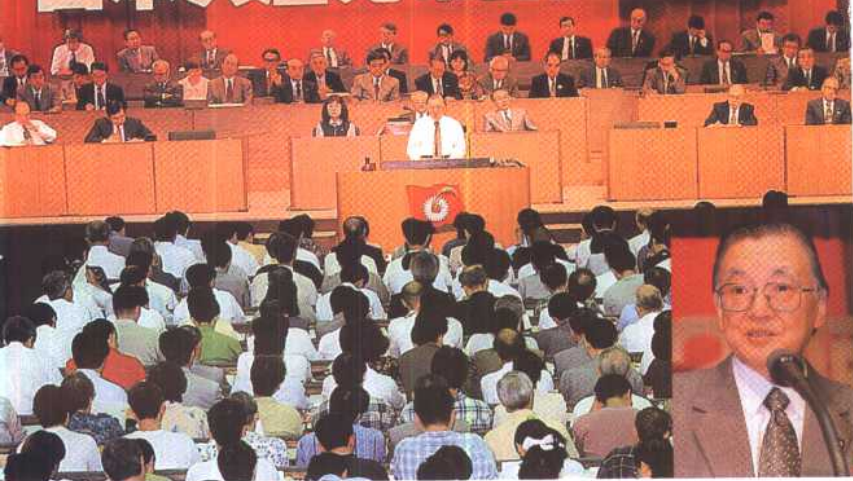


支持叶利钦的群众



◀ 在第二轮选举中叶利钦与久加诺夫角逐，叶利钦获胜。

日本共产党第21回大会



◀ 日本共产党二十一大会一九九七年六月在东京举行。
◀ 日共委员长不破哲三作工作报告。



◀ 不破哲三等会见选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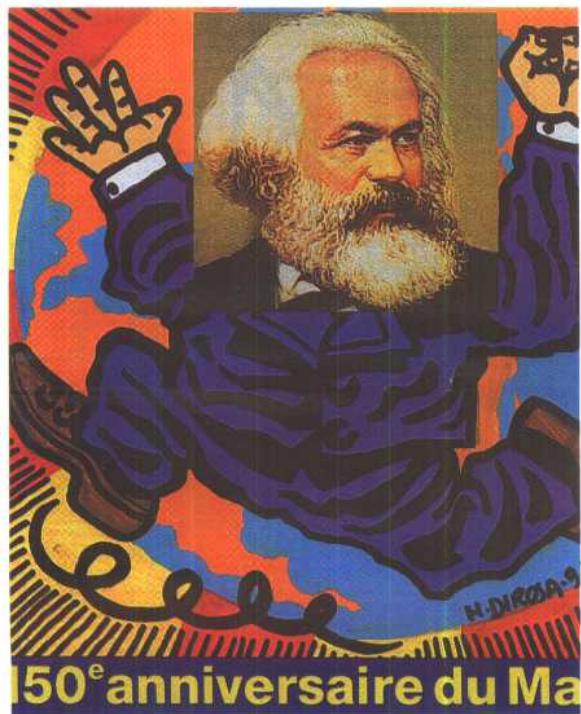
▼ 在1998年参议院选举后，日共参议员人数由36名增至49名，成为日本第三大政党。这是日共众议员在国会大厅外合影。





▲ 法国共产党二十九大（1996年12月于巴黎）会场

▼ 法共全国书记罗贝尔·于



◀ 法共《瞭望》月刊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所出版的纪念专刊的封面



▲ 法共理论研究机构“马克思园地”协会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于1998年5月在巴黎发起举办“巴黎国际会晤”，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人参加。图为闭幕式一角，与会者高唱国际歌。



▲ 葡萄牙共产党1997年党报节的一次集会，总书记卡洛斯·卡瓦略斯讲话。



▲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二大（1994年1月20日）会场



▲ 党的总书记法·贝尔蒂诺讲话



◀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举行的一次群众活动

▶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三大（1996年12月12-15日）会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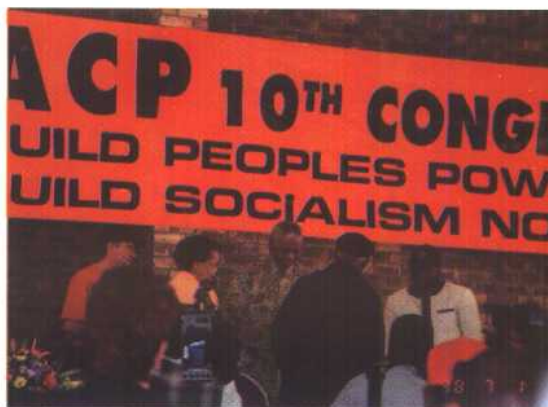


▲ 党的主席若昂·阿马佐纳斯讲话

▲ 巴西共产党1998年3月25日在圣保罗集会，庆祝建党75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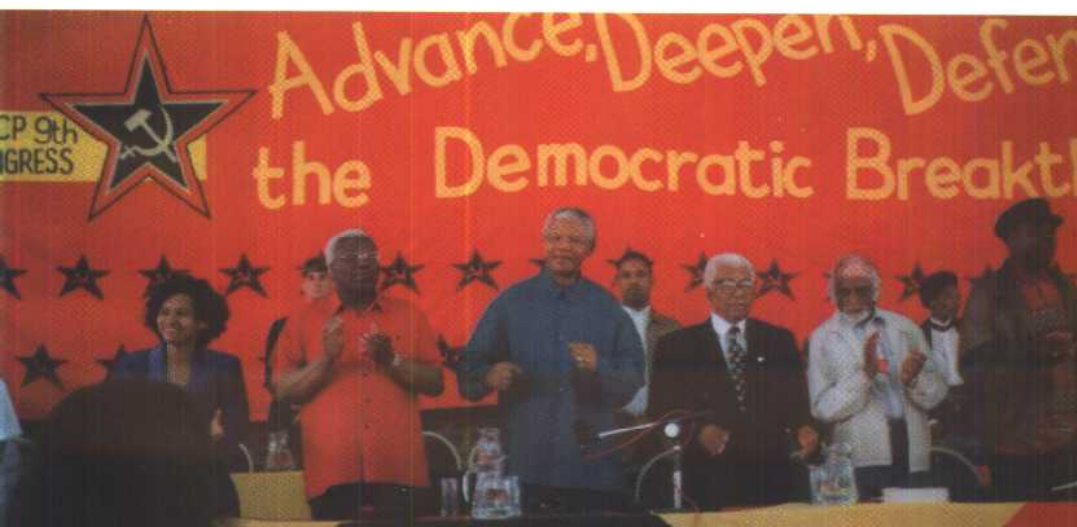


雷德·恩齐曼迪
▲ 南非共总书记布



▲ 南非共十大（1998年7月）

▼ 南非共产党九大（1995年4月），南非总统曼德拉到会祝贺。





◀ 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六大主席台，自右至左：党的主席阿里卡里、总书记尼帕尔、政治局常委奥里。

▶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举行的一次集会，党的总书记苏吉特在会上讲话。



◀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治局在党的总部开会。

“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苏东剧变前10年,柬埔寨共产党实行“不要城市、不要商品、不要货币、不要学校……”的极左“社会主义”以及其他极左政策,招致“亡党亡国”。

1997年6月9日波尔布特怀疑主管军事的宋成“通敌”,派人杀了他全家11口人,波尔布特的部属因此对其进行审判。波尔布特被判处“终身监禁”,他于1998年4月病故。



上图是波尔布特受审情况



▲ 以色列“共产主义村社”基布兹，被誉为“成功的乌托邦”。这是一个地方的基布兹鸟瞰。

◀ 早期的基布兹

◀ 现代基布兹的集体食堂

▼ 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若斯潘在选举中获胜。

英国工党领导人布萊尔在选举中获胜。





▲ 朝鲜千里马铜像



▲ 首都平壤一条大街



▲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于1994年7月逝世。

▶ 现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日同志领导朝鲜人民建设朝鲜式社会主义。图为他视察一水电站。





▲ 朝鲜顺川维纶联合企业



▲ 朝鲜的妇女和儿童



▲ 越南共产党八大（1996年6月28日—7月1日）会场



▲ 杜梅再次当选党中央总书记。



▲ 1997年12月22—29日越共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接受杜梅、黎德英、武文杰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并委任他们为中央顾问，选举黎可漂接替杜梅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左起第五人为黎可漂。



◀ 越共实行“革新”路线，在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粮食连年丰收，每年有大量出口，越南现为世界第四大米出口国。



▶ 越南对外实行开放，图为河内郊区柴同工业区一角。





▲ 老挝人民革命党六大(1996年3月18-20日)会场



▲ 坎代当选党中央主席



◀ 首都万象湄公河大桥(1994年建成)夜景



左边是老挝革命胜利后的国徽。右边是1993年新修改过的国徽。五角星与镰刀斧子已换成老挝民族的象征——塔銮佛塔。老挝人民革命党认为现在的任务是建设、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制度。前进的方向是社会主义。





▲ 老挝新的开发区



▲ 老挝的一处农贸市场



◀ 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古巴人民实行稳步的改革开放，建设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

▶ 苏东剧变后，古巴缺乏燃料和食品。牛车代替人们的主要交通工具。



◀ 领袖与群众同甘共苦。图为卡斯特罗看望突击队，并与他们一同用午饭。



▲ 人民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图为199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首都哈瓦那百万人大游行。

改革开放的中国





经济高速增长
综合国力提高





市场繁荣，票证已成历史

上图是过去的粮票，此外还有布票、工业券、外汇券和副食购货本。



社会全面进步



国际地位提高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

D136/04

序

《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扫描》一书问世了。我作为本书的最早读者之一，对这本书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我相信，中国和世界上一切关心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人们也都欢迎它的出版。

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整整过去 150 年了。其间，既取得了辉煌成就，也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挫折。共产主义从在欧洲大陆游荡的“幽灵”，变成了世界上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本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由一国实践发展到多国实践，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然而到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又遭受了空前严重的挫折。一时间，西方媒体宣传社会主义失败了，共产主义将彻底崩溃和消亡；而在信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们当中，也不免有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产生种种困惑或忧虑。社会主义的前途到底怎样？它将向何处

去？这成了人们关心的历史性重大问题。

应该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出现的严重曲折和社会主义的前途，邓小平同志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苏联东欧剧变后深刻地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大趋势“不可逆转”，“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他还说，“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就是一部力求以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回答人们关心的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等问题的最新著作。它是肖枫同志和几十位饱含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并且长期从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研究的专家学者们辛勤奋斗多年的结晶。几年前，肖枫同志负责的课题组把这个课题作为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的重点项目承

担了下来，课题组是由肖枫同志负责独立运作开展研究的，其成果是他们的学术观点。只要你读一读此书，你会觉得该书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见解和看法，而且据以论证其观点和看法的材料也比较新、比较全，作者力求从理论与大量新鲜材料的结合上来回答人们关心的问题，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诚然，该书并非十全十美，例如，其中的一些观点、看法就带有探讨性质，是完全可以讨论的，而且随着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某些观点也必然要完善、修正和发展；书中介绍外国政党的一些情况是尽可能客观的，但也难免不带上作者个人色彩，其叙述和评论恐难完全避免偏颇之处；由于资料汇集较多，致使篇幅显得冗长。尽管如此，我以为，这部著作仍然是这一领域的一部力作，它对深化我们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研究，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深刻地理解邓小平理论之伟大和正确，坚定我们对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自觉贯彻执行党的对内对外方针政策，都有一定帮助和参考价值，是很值得各类读者一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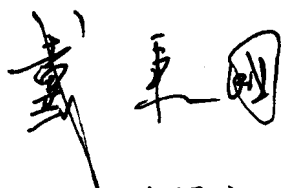
我想要补充的是，李淑铮同志是本书的顾问之一，又由我来写序，希望不要因此而产生

一种误解，似乎中联部还像过去一样是专门研究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并且只同外国共产党打交道的机构。其实早已完全不是这种情况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实现了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新时期党的任务的需要，党的对外工作早已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党的对外工作的目标，转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促进我国同各国国家关系的发展，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贡献；党的对外交往不以意识形态的异同为前提，在党际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而遵循求同存异的原则；党的交往对象，从只同共产党联系转向同世界各国各类政党普遍交往；与外国政党发展关系，均以“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为基础；党际交往与合作注入了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的内容。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也坚定不移地遵循上述原则和方针，致力于长期、稳定、深入地发展同世界各国各类政党的新型党际关

系，谋求各国的共同繁荣和发展。

特别令人高兴的是，《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能在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光辉文献《共产党宣言》发表 150 周年和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时与读者见面，借以表达我们对《共产党宣言》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隆重纪念之情。让我们在《共产党宣言》的不朽光辉的照耀下，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定不移地执行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将中国的事情办得更好，从而为人类的和平、发展和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wo characters '戴秉国' written in a stylized, cursive script.

一九九八年国庆

注：戴秉国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现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外交学院兼职教授。

目 录

序

戴秉国

总论：回顾与前瞻

高 放 肖 枫

-
- | | |
|--------------------|-----|
| 一、从《共产党宣言》到十月革命的胜利 | 3 |
| 二、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 | 22 |
| 三、社会主义的“大挫折”与“新局面” | 65 |
| 四、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走势 | 87 |
| 五、社会主义道路曲折但前途光明 | 107 |
-

第一编 经历“政治地震”的各国

第 1 章

史无前例的“政治地震”

——苏东剧变的过程及其原因

117

一、戈氏“新思维”	118
二、东欧剧变	127
三、苏联解体	156
四、剧变的原因及教训	171

第 2 章

废墟上的艰难与希望

——剧变后苏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	189
一、震后的辛酸与苦难	190
二、政治体制：在总体学西方中又有变异和特色	199
三、经济体制：私有化与市场机制双重转轨	206
四、右翼与左翼：风水轮流转	212
五、希望在何方	218

第 3 章

消沉后的崛起

——俄罗斯的各类左翼力量	221
一、名目繁多的共产党	222
二、重新崛起、主张坚持和革新社会主义的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225
三、主张恢复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 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	246
四、主张恢复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但	

方式不尽相同的几个共产党	250
五、自称“新型共产党”的俄罗斯劳动人民社会党	259
六、为重建苏共的跨国联合组织“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	262
七、与俄共合作的左翼政党——俄罗斯农业党	264

第4章

低谷中的奋斗

——原苏联其他国家的各类左翼力量	267
一、独联体欧洲三国的左翼力量	268
二、独联体中亚五国的左翼力量	276
三、独联体外高加索三国的左翼力量	292
四、波罗的海三国的左翼力量	295

第5章

动荡后的重组

——东欧国家的各类左翼力量	298
一、概述	299
二、由原执政的共产党改建成的社会党	301
三、原执政的共产党的后继组织	327
四、重建、改建的老社会党	333
五、剧变中新形成的社会党	338

第 6 章

蒙古的剧变

- 与苏东剧变的异同 344
 - 一、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变化 345
 - 二、多党制与政党格局的变化 348
 - 三、主要政党思想理论和政策的变化 351
 - 四、经济转轨与经济形势 355
 - 五、“多支点”的外交走向 359

附：

一场离奇的“社会主义”试验

- 柬共式“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 362
 - 一、柬埔寨近半个世纪的内忧外患 363
 - 二、柬共的成立和初期的活动 365
 - 三、在抗美救国斗争中取得全国政权 368
 - 四、胜利后迅速推行极“左”的“社会主义” 369
 - 五、失败后继续坚持极“左”路线，导致彻底溃灭 375
 - 六、失败的根本原因 378

第二编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国

第 7 章

坚持“主体的社会主义”的朝鲜	381
一、朝鲜式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主体思想”	383
二、“主体的社会主义”的战略性思路	391
三、“主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398
四、苏东剧变后的朝鲜	409

第 8 章

推进社会主义“革新”的越南	416
一、重新认识国情，调整过急过“左”的政策	418
二、顶住苏东剧变的冲击，坚持既定方向	420
三、越南革新的主要思路、理论和政策	424
四、越南革新开放的进程及其成就	430
五、冷战后的越南共产党	453

第 9 章

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老挝	457
-----------------------	-----

一、概述	458
二、对苏东剧变和社会主义前途的看法	460
三、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462
四、革新开放事业的进展及成就	470
五、加强政治建设，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476
六、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	479
七、冷战后的老挝人民革命党	481

第 10 章

实行“稳步的改革开放”的古巴	485
一、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如何建立的	486
二、古巴是如何挺过最困难时期的	490
三、90年代前古巴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历程	500
四、90年代古巴改革开放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506
五、“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困难中探索前进	513

第三编 发达国家的科学社会主义 与“民主社会主义”

第 11 章

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	517
--------------------	------------

一、苏东剧变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冲击和影响	519
二、冷战后欧洲共产党组织上的变化	523
三、冷战后欧洲共产党理论政策上的新探索	526
四、冷战后欧洲各社会主义流派的新动向	531

第 12 章

欧洲的共产党及其新探索	538
一、法国共产党及其“新共产主义”	538
二、葡萄牙共产党的调整	560
三、西班牙共产党的新探索	570
四、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反思	581
五、希腊共产党的新思考	591
六、北欧和英国的一些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	606

第 13 章

欧洲社会党及其理论政策调整	613
一、冷战后欧洲社会党的新动向	613
二、法国社会党的理论和政策调整	617
三、意大利左翼民主党及其“新社会主义”	633
四、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政策调整	651
五、英国工党与“布莱尔革命”	663
六、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及其他左翼政党	670
七、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建立及其调整	681

第 14 章

其他地区发达国家的左翼力量	692
一、北美、大洋洲社会主义运动概述	693
二、美国共产党的分裂	696
三、加拿大社会主义运动的削弱	700
四、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运动的重组	705
五、新西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变化	714
六、日本共产党的探索与发展	720
七、日本社会党的更名与调整	748

第四编 发展中国家的科学社会主义 与“民族社会主义”

第 15 章

东南亚各类社会主义的低落	759
上：非执政的共产党的削弱或溃灭	759
一、泰共武装力量已溃灭	760
二、缅共根据地丧失，党中央已解散	761
三、马共与政府已达成和平协议	763
四、菲共正与政府进行谈判	765
下：“缅甸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放弃	769
一、产生的历史背景	770

二、主要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773
三、主要实践及其影响	776
四、八十年代末“缅甸社会主义”的摈弃	786

第 16 章

南亚各类社会主义的发展与调整	790
上：共产主义政党的发展	791
一、历史回顾	792
二、对苏东剧变的反应及各党现状	796
三、冷战后的思考与探索	801
中：印度国大党“社会主义”的调整	811
一、尼赫鲁的“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形成	812
二、基本的理论与主张	815
三、实践的三个阶段与近年来的变化和调整	817
下：斯里兰卡别具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	826
一、自由党的民主社会主义	827
二、统一国民党的民主社会主义	832

第 17 章

西亚北非各类社会主义的调整	837
上：共产主义政党的反思与“解放”	837
一、冷战结束前的重要情况	838
二、苏东剧变的冲击与冷战后的新情况	843
三、理论上的反思和政策上的调整	847
中：“阿拉伯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	852

一、历史和概述	854
二、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社会主义”	858
三、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社会主义”	865
四、埃及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及其发展	874
五、利比亚卡扎菲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及其特点	890
下：“成功的乌托邦”——以色列的“基布兹”	908
一、“共产主义村社”基布兹的创立和发展	908
二、基布兹的主要特点	911
三、基布兹的经济生活	914
四、基布兹面临的困难与前景	916

第 18 章

多党制冲击后的黑非洲社会主义	919
上：共产主义政党的新情况	920
一、南非共产党的发展	921
二、留尼汪共产党的新情况	930
下：“非洲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	936
一、历史概述	937
二、“乌贾马社会主义”的新变化	942
三、“非洲科学社会主义”的衰落	953
四、“非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	965

第 19 章

多元化格局中的拉美社会主义	977
一、拉美多元化的思潮与政治格局	978

二、拉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概述	985
三、苏东剧变对拉美共产党的冲击和影响	988
四、拉美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看法	990
五、拉美共产党理论上的反思与政策上的调整	996

第五编 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

第 20 章

冷战后的社会党国际	1005
一、社会党国际发展概述	1006
二、对苏东剧变的方针及其对自身的影响	1016
三、近年来的理论和政策调整	1026
四、组织状况与发展趋势	1035

第 21 章

新形势下的交流与协调	1041
——冷战后左翼力量的国际会议和多边活动	
一、朝鲜劳动党召开的“主体思想”研讨会与 〈平壤宣言〉	1042
二、印共(马)召开的“马克思主义有效性” 国际研讨会	1047
三、在塞浦路斯举行的二十八党圆桌会议	1062
四、拉美共产党的地区性会议与“圣保罗论坛”	

的多次年会	1066
五、西欧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力量的地区性国际会议和多边活动	1077
六、欧亚地区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的国际会议	1081

第六编 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中国

第 22 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意义	1084
一、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历史难题”的破解	1085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1089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和科学体系	1097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性新贡献	1101

第 23 章

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及其成就	1112
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特点	1113
二、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1122

第 24 章

外国人眼里的今日中国	1134
——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评论	

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评论	1135
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评论	1140
三、对中国建设成就的评论	1144
后记	1151
作者索引	1153

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既经历了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由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的凯旋式进军，又遭遇过大大小小的挫折。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150年的历史，以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界，形成了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的70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后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终于在俄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后70多年，社会主义由俄国一国发展到世界多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但到这一阶段的后期，由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这一地区的9个加上蒙古共10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改变了政治方向，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空前严重的挫折。于是，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怎么样，社会主义将向何处去，迅速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本来是不足为奇的。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一项伟大的社会试验工程。它同任何科学试验一样不可能一次成功，必然要经历无数次失败和挫折，才能一步一步接近并抵达成功的彼岸。列宁曾把社会主义实践比作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探、人迹罕至的高山，而不是宽广、笔直、平坦的涅瓦大街。既然搞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探索、反复试验的过程，就存在着发展和成功、失误和失败两种可能性，而且这两方面往往是相互伴随和相互交织的。然而在苏东剧变后，西方媒体和舆论仅凭苏东这个“试验室”的大挫折，而不顾社会主义在中国等“试验室”欣欣向荣的新局面，掀起反共高潮，宣传“社会主义崩溃了”、“共产主义消亡了”，“21世纪不会有社会主义的一席之地，而必将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当然只是狂人梦语。但是苏东剧变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的确暴露出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存在严重问题，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对此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科学地总结，实事求是地作出回答。

本书就是为回答这一问题所作的一种尝试。在谈正题之前，有必要先对书中所使用的概念和有关问题略作说明。首先，书的正题《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其所说的“社会主义”包括了社会主义的3种存在形态，因此其意思就是：社会主义理论向何处去，社会主义运动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向何处去。其次，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指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党人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从这一意义上讲，这里说的“社会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是一致的。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凝固的思想理论体系，它同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样，要吸取和借鉴人类一切先进的思想和文明成果，而且必然随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

丰富和发展。为便于全方位、多视角地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凡属自称“社会主义”的各种理论流派和政治组织，本书都用了一定篇幅加以叙述和介绍。因此，本书又不仅仅限于共产主义运动，它比通常论述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在内容和范围上要广泛得多。为与通常的共产主义运动概念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本书叠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这个提法。最后，本书在结构上截取了冷战后这一时段，以“横切”的布局，按地区、按问题、按组织和力量设章节，从横向的方面对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和走势进行分析。但在每个章节之内又并不全是横断面，它虽以冷战后为重点，但仍有纵向的背景交代，便于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而《总论》则采取“纵向”结构，以回顾与前瞻为主线，阐述世界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简要回答社会主义向何处去这个主题。

一、从《共产党宣言》到十月革命的胜利

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大约70年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问题是革命，是在同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在工人运动实践中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组织和壮大力量、抓住机会夺取政权的问题。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起义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但它只存在了72天。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使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到了高峰。

十月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一阶段最伟大的成果，它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按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先进国家胜利，而且是多个国家同时革命才能胜利，但实际结果是革命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发展顺序上的这一颠倒，给后来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难题。这一阶段的实践既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课题。

空想社会主义从 1503 年英国莫尔的《乌托邦》算起，经历了 3 个多世纪的发展。到 19 世纪 40 年代，工人运动和知识分子的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运动都已达到一个新水平。这时两个德国知识青年的先锋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积极投身工人运动、阶级斗争和科学研究，于 1842—1846 年间实现了阶级立场、世界观和政治观的转变，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1847 年他们参与了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改组和创建工作，从此开创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自那时以来的 150 年间，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波浪式地曲折发展。150 年前共产主义还只是在欧洲大陆游荡的“幽灵”，150 年后社会主义已在世界一部分地区变成了现实的社会制度。在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十月革命胜利的 70 年里，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仅限于欧美范围，并经历了 3 次大发展和大挫折。

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英] 托马斯·莫尔 (1478—1535)



[法] 傅立叶 (1772—1837)



[法] 里昂·圣西门 (1760—1825)



[英] 罗伯特·欧文 (1771—1858)

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描绘的理想社会乌托邦岛图



（一）第一次大发展和大挫折：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及其纲领《共产党宣言》的发表，1848年革命失败后社会主义遭受第一次挫折。

1847年6月2日在伦敦召开了德国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改组代表大会，亦即共产主义者同盟（以下简称共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的诞生，这标志着世界共运的开端。第一个共产党约有400个党员，主要是德国人，还有英、法、比、荷、瑞典、瑞士、美国7国人士参加，曾在欧美8国建立了地方组织。1847年6月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章程，确立民主制的组织原则，规定党代表大会为党的立法机关、权力机关，每年8月要举行党代表大会，即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中央委员会只是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党的各级领导人都要选举产生，并且可以罢免，党的各级执行机关至少每两周开会一次。党员要保守党的机密，服从党的决议。同年底在伦敦召开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主要讨论了党纲问题，决定委托党的思想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正式的党纲公诸于世。1848年2月24日成批发行的《共产党宣言》这一划时代的光辉文献，既是世界共运的纲领，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袖珍百科全书。这本约2.5万字的小册子具有无限、永恒的魅力，它博大精深，流光溢彩。它不仅揭示了当时欧美新兴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和种种弊端，而且蕴含着丰富、深刻的科学真理和美妙、光辉的社会理想。



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德文
第一版封面（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中
文第一版封面（1920年9月）

第一个共产党的创建及其纲领的公布，正好迎来了1848年欧洲革命。这一场革命波及法、德、奥、意、波、捷、匈、罗8国，从性质上看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但是这时无产阶级已经开始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并且刚刚建立了第一个共产党。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2月24日以巴黎工人为主的起义群众推翻了七月王朝金融贵族的统治，成立了各派联合的临时政府，在11名成员中有2名工人代表，宣告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国二月革命胜利后，3月11日在巴黎重新组建了共盟中央委员会，推选马克思为主席，恩格斯等为中央委员。新中委立即准备回德国推进革命。3月18日柏林爆发有工人参与的群众起义，29日成立自由派内阁。3月下旬至4月初，共盟组织近400名德国工人（大部分是盟员）返回国内投身革命，分别参加民主运动和民主团体，成为运动和团体的左翼。他们把秘密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尽量争取并提高群众觉悟，为把民主革命逐步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6月1日马克思创办并担任总编辑的《新莱茵报》在科伦问世，它作为民主派的机关报，坚持要建立统一不可分割的民主共和国，尽力发挥了宣传、鼓动和战斗的作用。共盟中委威·沃尔弗自1849年5月起还当上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人议员，在议会中充当人民喉舌。5—7月间德国南部几个城市纷纷爆发起义，许多盟员英勇战斗，壮烈牺牲。恩格斯还参与了起义的领导。德国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又先后汇集伦敦。法国在1848年2月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步激化。资产阶级政府在解除工人武装之后，又于6月21日解散国家工场，使10万工人失去工作。这样激起巴黎4万工人于22日举行武装起义，提

出建立“民主的社会共和国”的口号。街垒战进行了4天，终于被装备精良的20万政府军镇压下去。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第一次大搏斗。



1948年欧洲革命。
图为1948年3月
18日柏林起义。

当欧洲革命浪潮低落之后，共盟于1849年8月在伦敦重建中央委员会，重新在英、法、德、美等国建立地方基层组织，1850年3月创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月刊，作为共盟的机关刊物，既总结革命经验，提高认识，又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导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论著中，对无产阶级革命、工农联盟、无产阶级专政、不断革命等一系列问题都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在中央内部有维利希、沙佩尔等少数人犯急性病，主张“必须马上夺取政权”，多数人不同意这样盲动，终于导致中央分裂，

于是党中央于1850年11月不得不把他们开除出党。党内危机刚克服，又遭到德国反动政府加紧迫害，党的机关刊物于年底被迫停刊，各地地下组织也遭破坏，很多领导人被捕。1852年10—11月在科伦对共产党人进行审判。这样共盟只好于11月17日宣告解散，“它的各个单独的成员仍然继续不声不响地”^①埋头苦干，准备迎接共运新高潮的到来。

总之，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只存在5年5个多月，但是它发表的党纲——《共产党宣言》具有不朽的划时代意义，它在党章中确立的民主制原则以及在建党、创办报刊、建立群众组织、开展群众工作、进行武装斗争、议会斗争、法庭斗争等方面都积累了初步的经验。当时法、德等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都还微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然而工人阶级终究在革命斗争中显示了独立作用，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证明了蒲鲁东、路易·勃朗、哥特沙克、维利希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和右倾、“左”倾的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错误的。恩格斯晚年回顾历史时指出：“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②

（二）第二次大发展和大挫折：第一国际成立和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兴亡。

欧洲1848年革命打击了封建主义，为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整个50年代的特点是政治反动、工运低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迅速，无产阶级队伍普遍壮大。60年代初，工运重新高涨。这样在1864—1872年间出现了世界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40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9页。

会主义运动的第二次大发展、第二个大浪潮，主要成就是建立了第一个带有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国际组织——国际工人协会和第一个工人阶级国家政权——巴黎公社。

60年代初欧洲很多国家罢工斗争迭起，各国工人支持1863年波兰人民反对沙俄压迫的民族起义。这促成了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到90年代人们才把它称为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明确提出：“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为此他们“都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①实际上在第一国际时期只建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69年8月），该党当即宣布自己为第一国际德国分支，积极参与第一国际的活动。第一国际在欧美16个国家建立有联合会组织，包括成员约40万人。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确立了民主制的组织原则，规定每年召开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亦即实行最高权力机关年会制，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总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再从总委员会中选出总书记和各国通讯书记等，总委员会要发表定期报告，各国的联合会组织拥有自主权。可是在工人阶级未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实行年会制是有很大困难的。第一国际在它存在的12年间只召开过5次代表大会，即日内瓦大会（1866年）、洛桑大会（1867年）、布鲁塞尔大会（1868年）、巴塞尔大会（1869年）和海牙大会（1872年）。1865年和1871年在伦敦召开过代表会议。1870年和1871年因发生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而未能召开代表大会。1872年海牙大会之后因总委员会迁往美国，远离欧洲，第一国际实际上已很少活动，到1876年7月15日在费城召开代表会议，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是在国际范围内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6页。

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国际主义原则的最初组织形式。由于法国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英国工联主义的改良主义、德国拉萨尔的投降主义、俄国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等在工人中还有较大的影响，而第一国际是包容各派工人的联合组织，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在国际内部（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总委员会上）制定对合作社、对工会、对妇女儿童、对限制劳动日、对所有制、对政治斗争、对民族解放运动、对普选权、对继承权、对国家政权等等问题的方针政策时，不能不对各派社会主义者展开原则性的斗争。在1868年之前以反蒲鲁东主义为主，之后以反巴枯宁主义为主。第一国际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而且支援了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波兰、爱尔兰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亚非拉的殖民地解放斗争，尤其是为支持巴黎公社革命作了大量工作。

第一国际虽然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使命，但是仅有巴黎工人于1871年3月18日夺取政权，维持72天，于5月29日被扑灭。法兰西第二帝国于1870年9月因在普法战争中失败而被人民推翻，新建立的资产阶级政府继续推行卖国投降政策，并且对无产阶级实行暴力进攻，下令解除工人武装。法国3个工人组织本来正在积极筹建社会主义革命党。然而党尚未成立，就被迫仓促自发夺取政权，建立了巴黎公社。领导巴黎公社的是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他们犯了没有坚决镇压反革命、没有及时向凡尔赛的反动军队进攻、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没有取得外省市响应等错误，因而招致失败。但是巴黎工人以冲天的革命精神终于首创了新世界，首创了工人民主共和国的雏形。由巴黎工人和人民群众直接普遍选举产生由64人组成的巴黎公社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实行议行合一，自己立法、自己执行、自己司法、自己监督，不

称职者人民随时可以罢免；所有公职人员都不享有任何特权，其工资最高不得超过熟练工人。最高工资为每年 6000 法郎，最低工资为 1200 法郎，相差只有 5 倍。选举罢免和取消高薪，这是铲除有史以来官僚特权阶层的两个有效办法。恩格斯晚年还指出：巴黎公社“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而采取了上述“两个可靠的办法”，这使得它能够成为“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① 巴黎公社仅凭这两项措施就使后人望尘莫及。巴黎公社奇迹般地改造了城市，社会秩序井然，禁止赌博，取缔卖淫，偷盗几乎绝迹。公社还把逃亡业主的工厂交给工人管理，在卢浮军械修配厂首次试行工人管理制度，由公社代表、厂长、工长和工人选出的代表组成工厂管理委员会，工人有效行使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在巴黎公社委员中第一国际会员有 37 名，超过一半。巴黎公社期间，第一国际多方号召各国工人尽力声援，多次提出决策建议。5 月 30 日总委员会发表了马克思执笔的题为《法兰西内战》的宣言，对公社的经验作了深刻的总结，指明：“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② 巴黎公社是第一国际历史中最光辉的一页，是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早的雏形，是 19 世纪世界共运的最高成就。公社失败后，欧洲工人运动又陷入低潮，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较为和平发展的时期。资产阶级政府鉴于 1848 年和 1871 年巴黎工人两次进行街垒战的经验，决定拓展巴黎街道，促使工人的城市武装起义再也难以举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12—1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58—59、81 页。



1871年3月18日
巴黎公社起义，起
义者夺回大炮。

3月26日巴黎公
社宣告成立。



5月27日公社战
士在拉雪兹墓地坚
持战斗，147名战
士壮烈牺牲。29
日公社最后失败，
历时72天。



(三) 第三次大发展和大挫折的交错：社会主义运动向横广发展，第二国际的建立和破产，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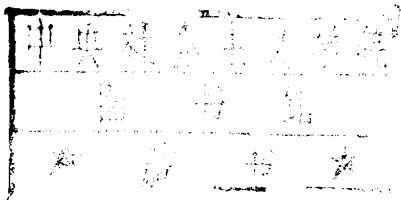
巴黎公社失败后欧美工人运动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期。从 80 年代中后期起逐渐恢复，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初。其主要成就就是建立了第二国际，1905 年俄国爆发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

随着 19 世纪末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现代第二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展，自由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欧美工人运动经过 10 多年沉寂之后，到 80 年代中后期又活跃起来，而且扩展到俄国和东亚的日本等更广大的地区。欧美许多国家自 70 年代中期起纷纷建立了工人政党。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向横广发展的时期。

这时建立的工人政党都不再称为共产党，而是称为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或工人党。恩格斯说在 1847 年社会主义是“有教养的”、“有身份的”人的运动，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是工人的运动，因此他们当时毫不怀疑地选择“共产主义”的名称。但是“在 1887 年，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布的那个理论了”^①，因此“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虽然在科学上很不确切，但“可以过得去”，“只要党在发展，只要党意识到它的名称在科学上不确切，不让这一点妨碍它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行。”^② 因为当时有不少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56、263—264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1 卷，第 77 页。



家还面临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1869年建立的第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工人政党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随后建立的有1874年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1875年的葡萄牙社会党，1876年的丹麦社会民主党和美国劳动人民党，1878年的捷克—斯拉夫社会民主工党和墨西哥社会党，1879年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法国工人党，1881年的荷兰社会民主同盟，1882年的意大利工人党，1884年的英国社会民主同盟，1885年的比利时工人党，1887年的挪威工人党，1888年的瑞士社会党，1889年的瑞典社会民主工党。

第一批工人政党在各国参加合法斗争（办报刊、联系工会、利用议会讲坛等）中发挥了作用，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它们深感有必要加强国际联系，建立国际组织。经过德、法两党筹备，于18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100周年之际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宣告建立新的国际。颇为有趣的是，新的工人国际始终未有过正式名称，偶尔称为“社会民主国际”，或者笼统地称作“国际社会民主党”。到1907年才自称为第二国际，以区别于第一国际。

第二国际是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参加第二国际的约有30个社会主义政党，党员数量约300多万人。第二国际是较为松散的国际组织，它不曾发表过成立宣言或共同纲领，主要是通过几年一次的国际代表大会就某些重大问题作出决议，作为各国党行动的依据。直到1900年才成立国际的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和书记处（设在布鲁塞尔），它也只是联络机构，而不是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核心，集中的程度很低。1907年才正式通过章程，组织原则还是民主制，规定每个国家或民族的工人政党组成一个支部，在每次国际代表大会召开之前4个月向国际局提交提案，在代表大会上各个支部依

据其党员数量和工会、合作社的力量等因素拥有 2 票至 20 票的不等的表决权，在代表大会闭会之后由国际局继续履行代表大会的职责。章程并未规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一般是每隔几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第二国际存在的 34 年间，共举行过 10 次代表大会：1889 年巴黎大会，1891 年布鲁塞尔大会，1893 年苏黎世大会，1896 年伦敦大会，1900 年巴黎大会，1904 年阿姆斯特丹大会，1907 年斯图加特大会，1910 年哥本哈根大会，1912 年巴塞尔大会，1920 年日内瓦大会。在前 9 次大会上曾经就工资、工时、劳动保护、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废除常备军和实行全民武装、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实行民族自决、党的统一、夺取政权和参加政府、工会合作社和妇女等问题作出过正确或基本上正确的决议，推动了欧美工人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在推动合法斗争方面起过重大作用。在 1889 年巴黎大会上决定每年 5 月 1 日“作为永久规定的日子”，“组织大规模的国际性游行示威，以便在一切国家和一切城市，劳动者都在同一天里要求执政当局从法律上把工作日限制在 8 小时以内”^①，并实现其他的工人权益。从此五一节成为全世界劳动者共同的节日，成为全世界无产者在实际行动上联合起来的新形式。这是第二国际不朽的历史功绩。在第二国际成立之前已建有 16 个工人政党，在它成立之后又建有 17 个工人政党，它们大多加入国际活动。由于当时一些国家建立过不止一个工人政党，1904 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为此作出决定：“每个国家必须有一个像统一的无产阶级那样

①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 1964 年版，第 9 页。

的独一无二的社会党，以便与资产阶级党派相对抗。”^① 1905年法国社会党据此实现了统一。但是后来长期的实践证明，由于各部分工人利益不同、观点不同，一个国家很难硬性规定只许存在一个工人政党。

这里还要顺便谈一下第二国际与中国的关系。1905年5月孙中山访问布鲁塞尔时曾会见第二国际书记胡斯曼，胡斯曼要求他领导的兴中会加入第二国际，并派代表出席预定于1907年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实际上接下来孙中山忙于国事，未能派代表出席。直到1914年5月孙中山还写信向社会党国际局求援，希望第二国际派遣“优秀人材到中国各部门服务，助我一臂之力”，“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② 可是信发出后3个月，即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第二国际就停止了活动。另外，1911年江亢虎成立中国社会党，1912年沙淦等人从中退出，另组纯粹社会党。这两党都曾申请加入第二国际。国际局按照1904年阿姆斯特丹大会的决定，要求它们先要联合起来再履行一定的手续。由于它们于1912、1913年先后被袁世凯政府查禁，也就无缘加入第二国际。

在第二国际中实际上居领导地位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党建立最早，在合法斗争中取得成就最大，拥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这样有威望的领袖。因此在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上举足轻重，影响巨大。但是德国党的大党主义也很突出，不

①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30页。

② 见奥普特和雷贝利乌编《第二国际和东方》，1967年巴黎法文版，转引自殷叙彝等著《第二国际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5页。

时干涉俄国党等其他党的内政。而且德国党受修正主义侵蚀严重，对第二国际的破产要负主要责任。

在第二国际中后起的俄国党独树一帜。1898年俄国党建立后，中央领导人当即被沙皇政府逮捕，各地方组织陷于分散瘫痪状态。列宁于1900年从流放所出来后着手重新建党。他反对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强调要向工人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1903年召开党的二大时出现布尔什维克（俄文音译，意为多数派）和孟什维克（俄文音译，意为少数派）两派。孟什维克认为俄国党应与西欧社会民主党一致，党组织采取松散性，党员可以不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未必要服从党的纪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由资产阶级领导，或者无产阶级与之平行领导，等待将来无产阶级力量壮大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则主张俄国党要在沙皇君主专制统治下从事秘密斗争，应按集中制原则建党，党要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党中央和各级党委要有高度权威，党内设垂直系统，集中领导。虽然从1906年起改用“民主集中制”的提法，但是重点还是强调集中制，因为党处于地下斗争环境，公开性与民主选举都无法实现。列宁还主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依靠工农联盟，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由工农民主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1905年1月俄国爆发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工人的请愿游行遭到沙皇政府镇压后，革命斗争烈火燎原。工人的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不断，农民起义接踵而起，“波将金”号装甲舰的水兵也举行起义。到10月发展为全俄总政治罢工，产生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俄文音译，意为代表会议）这种新型的群众性政治组织；12月莫斯科等地爆发工人武装起义，农民和各被压迫民族也参加进来。结果被

沙皇政府残酷镇压下去。1905年俄国革命是20世纪人民革命的第一声春雷，是第二国际时期的唯一一次大革命。它对欧洲工人运动和亚洲的觉醒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第二国际内部的分化。

第二国际内部一直存在着思想斗争。它前期主要是继续反对无政府主义，后期主要是反对修正主义。19世纪末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德国党内出现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派，要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鼓吹通过点滴逐步改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时第二国际各党大多出现左、中、右3派：右派即修正主义派，左派坚持革命原则，中派居中调和。结果右派在党内逐渐得势。第二国际在1905—1917年间，面临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战争、和平与革命的问题。在战争逼近的年代里，第二国际及各国社会主义政党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当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大多数党却公开或暗中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政策。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德国党带头，大多数党纷纷转向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导致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残杀。这样就由修正主义发展到社会沙文主义，导致第二国际在政治上思想上破产。只有俄国布尔什维克和保加利亚党紧密派以及塞尔维亚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第二国际大多数政党的叛变，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史以来第一次最大的挫折。1848年欧洲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和1905年俄国革命的失败，都是外部敌人的镇压使然，而这一次的大挫折却是由于内部领导和群众深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思想影响所造成的。

在这一时期，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作为

一支新的革命力量，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崛起。列宁在第二国际背叛后，曾热烈号召各国党的左派要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与右派、中派划清界限，要重新建党，要脱掉社会民主党这个“肮脏的衬衣”，改称共产党。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以重新振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列宁还论证了自由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几国胜利。列宁还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区别开来，把社会主义界定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 20 世纪初国际工人运动和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列宁主义。

在列宁领导下，俄国革命党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继 1917 年 2 月革命推翻了延续 370 多年的沙皇专制制度，取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又领导并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推翻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在第一个 70 年内的的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二、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

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新的起点上面临两大历史课题：

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因为十月革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发生并取得胜利的，至于在西方发达国家怎么搞法还需继续探

索。自那时以来的几十年的实践说明：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人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但至今没有取得任何重大成果和进展。看来这个课题要留给下世纪的后人去继续探索了。

二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除俄国这类国家外，还有更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后一类国家的无产阶级怎样领导广大群众夺取政权，不能照搬俄国的经验，还需继续探索，这是其一；其次是无论是在俄国还是中国等其他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取得了政权之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由于中国等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胜利，极大地丰富了俄国革命的经验，落后国家革命的问题算是有了比较好的成功经验。但是，落后国家革命胜利后，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过去长期没能解决好。原因固然很多，看来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长期受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想影响，以“一条道路、一种模式、一个中心、一个阶段”的僵化思想为指导，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

（一）概述：胜利与挫折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至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崩溃的 70 多年时

间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取得了三大胜利，也遭受了三大挫折。

三大胜利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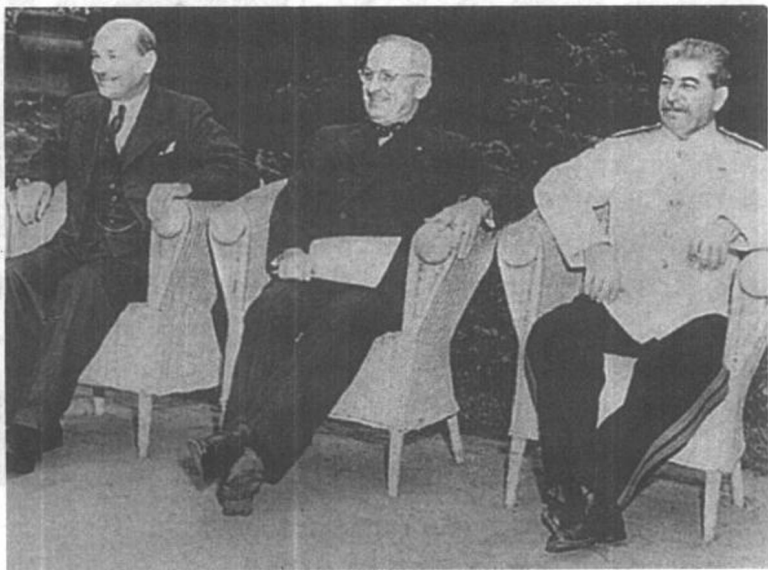
1.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站住了脚，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苏维埃政权粉碎了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国外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不仅在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站住了脚，而且迅速由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工业国，在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成为主力。在二战中，苏联歼灭德军总兵力3/4以上，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令西方大国刮目相看，终于跻身于世界大国之列。在十月革命鼓舞下、在列宁创立的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后来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世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



苏维埃俄国没有被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国外帝国主义干涉扼杀在摇篮里。

图为1920年5月5日列宁对开往西线作战的红军将士发表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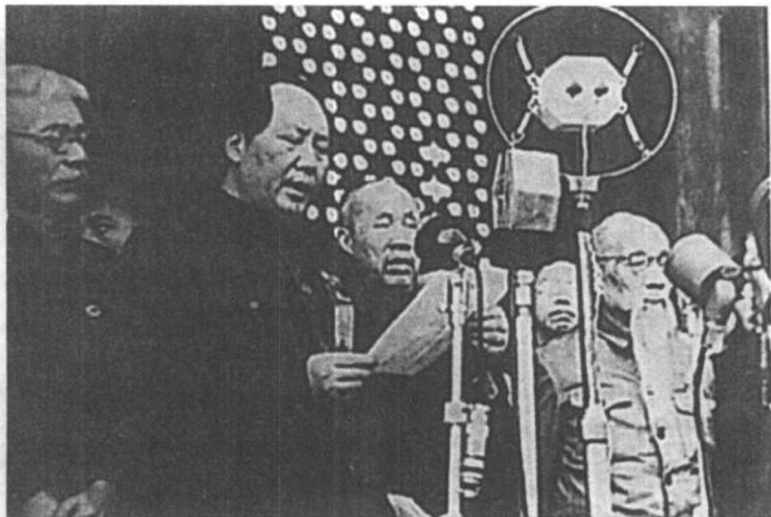
2. 二战后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一大批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和面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



在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8月2日）上，
自左至右：艾德礼（英）、杜鲁门（美）、斯大林（苏）。

得反法西斯战争历史性胜利的基础上，经过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斗争，终于产生了由十几个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使社会主义由一国的现实变成了多国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 1/4 以上，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 1/3，工业产值约占世界的 2/5，国民收入约占世界的 1/3。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使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历史性的新飞跃，并开创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从 70 年代末开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正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
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一次历史性大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使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了“柳暗花明”的新局面。国外媒体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挽救了“不可避免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造就了20世纪最壮观的经济奇迹之一”。

三大挫折是：

1. 在关系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重大问题上，斯大林本人的错误和后人错误地反斯大林，从两个方面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挫折。30年代斯大林搞“大清洗”，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既败坏了社会主义形象，又大伤了苏共的元气；在个人专断、个人迷信、思想僵化、教条主义

基础上形成的建设模式，更是长期阻碍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斯大林的错误和影响是必须纠正和肃清的，但鉴于他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必须慎重对待。可是，赫鲁晓夫1956年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给苏共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思想混乱。西方借机掀起反共高潮，许多共产党发生党员退党、党内思想混乱、领导陷于被动的局面，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战后第一次严重挫折。可以说，战后世界共运的低潮就是由此开始的。当时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但并不是站在总结列宁逝世后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不是在全面评价斯大林功过是非的基础上，去批判和纠正斯大林的错误，结果为后来全盘否定斯大林、全盘否定苏联的历史、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成就开了恶劣的先例。后来，苏共又长期不对斯大林的功过是非认真进行讨论，形成历史决议，以便统一党内认识，造成重大原则问题上一直是非不清，思想混乱。结果是斯大林的真正错误没有得到纠正，又在其他领导人身上复活和继续；而斯大林正确的东西却被当成错误予以批判和否定，其后患和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是长期阻碍世界共运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 在世界共运的党际和国家关系上，一系列严重问题导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裂，造成了越来越大的挫折。自有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存在如何处理各党独立自主与国际联合、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马、恩强调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国际联合，是以独立的民族组织为基础的。他们说：“国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①，“自主和独立也就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428页。

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①。共运历史表明，共产主义运动需要国际联合，但不能以此为名行控制干涉别党之实，损害各党的独立自主，否则就会带来严重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成立的共产国际，与第一、二国际不同，它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一个“世界共产党”。这种性质的国际组织，在初期对推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后来越来越不适应形势，于1943年解散了。后来于1947年建立的9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出现了苏共整南共等问题，也于1956年解散了。随后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不定期地举行国际会议，苏共又借国际会议整别的党，先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后是中国共产党。苏联还将东欧各国当成其附属国，粗暴干涉他们的内政，直至武装出兵。苏联又对中国以武力相威胁，竟然靠战争争夺有争议的领土。这一切使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越来越严重。几十年来，无论是在有无国际组织、有无国际会议的情况下，苏共总以老子党自居，搞大党大国沙文主义，损害各党独立自主，因而造成了一系列矛盾，使共运一再分裂和削弱。当然，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在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时，总的来说是清醒的。但是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②这一切不仅影响了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并多次酿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的危机。

3.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上，长期的“左”和最后一些共产党的右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空前严重的挫折。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受教条主义和急于求成等“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9卷，第8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9页。

的思想束缚，长期来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一系列严重失误，包括中国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全局性错误，严重影响和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发展。80年代下半期，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推行的“改革”变成了“改向”，不是去完善社会主义，而是“回归”资本主义，加上其他党的效仿和发展，最后导致了10个社会主义政权垮台的大挫折。

总之，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的成就是辉煌的，但失败和挫折也是惨痛的。然而这些失败和挫折，固然有一定外部原因，但其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敌对势力的破坏、封锁和武装进攻，而主要来自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来自于有关国家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这是很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

（二）社会主义在苏联的一国实践

从十月革命胜利到20世纪中期，是社会主义在苏联一国实践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站住了脚，并迅速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把革命前的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二等强国，为在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胜法西斯势力的主力军奠定了基础。如果说十月革命的实践证明了一国革命论的可行性，那么这一时期的实践既证明了实现社会主义“一国建设论”的现实可能性，又表明了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列宁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历史条件下，虽然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原来对无产阶级革命顺序的设想，提出了一国可以首先胜利的理论，但是他仍然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

在一国最终取得胜利，于是寄希望于爆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后来客观现实的发展是世界革命没有也不可能迅速到来。在这种形势下，已经胜利了社会主义国家既要避免被国际上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所消灭的悲剧，又要学会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共处、长期周旋的本事，还要在没有任何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性，其艰巨性是不言自明的。因此社会主义在一国实践时期，其内政外交充满了矛盾性、复杂性和探索性。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不乏深刻的教训。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苏维埃政权开始把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寄托在推动世界革命上，后来才逐步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胜利之初，列宁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是相当乐观的。基于一国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最终胜利的理论，对外实行推动和支援世界革命的路线。1918年初列宁多次说过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每时每刻地成熟起来，“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①。他甚至乐观地预言这一代人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这种思想曾经极大地影响了苏维埃政权的对外政策。

在这一思想影响下，俄共（布）迅速成立“共产国际”这个世界共产党。1919年3月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成立。4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告全世界劳动人民书》中说：“伟大的共产国际在1919年成立了。让伟大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在1920年诞生吧！”^②这时列宁也认为“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是国际苏维埃共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79页。

^② 《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7年版，第66页。



1919年3月4日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成立，图为列宁在主席台上。

和国即将诞生的前兆，是共产主义即将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前兆。”^① 共产国际建立后初期对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在其帮助下，世界五大洲先后建立了70多个共产主义政党，党员总人数约达400多万。共产国际在支援国际工人运动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侵略，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等方面都有过重大的功绩。但是共产国际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世界共产党”。共产国际在1919年一大上来不及制定章程，1920年二大才通过基本仿效苏联共产党的章程，规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国际。章程赋予代表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会以超越各国党之上的权力，它有权开除属于它的某个党或党的领导人，也有权任命某个党的领导人，修改某个党的决议，执委会的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503、506页。

国党必须立即贯彻执行。执委会选出主席团、组织局和书记处负责日常领导工作。虽然章程中规定执委会的所在地由每次世界代表大会决定（在二大上荷兰人怀恩科普曾建议把执委会迁到挪威），实际上执委会始终设在莫斯科。执委会实际上并不遵守章程，从四大以后既未按期召开代表大会，又从不按期召开执委会。虽然国际设有监察委员会，但实际上无权监督执委会。共产国际的大事完全由苏共掌权的执委会主席团起决定作用，30年代以后主要由斯大林独揽大权。1935年以后虽然由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但是斯大林仍是国际共运的领袖和最高权威。共产国际这种性质无法适应世界各国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情况和形势，后来严重阻碍了各党独立自主的发展。国际领导人指导思想、路线方针和组织措施上长期犯过“左”的错误，过多干预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对内斗争和对外斗争时常过火，有时也犯右的错误；苏共还把国际当成他推行大党主义的工具。这一切给世界共运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不少损害。因此它存在了24年，到1943年5月解散了。

俄共（布）的世界革命思想还表现在他们把俄国工人创造的“苏维埃”这种形式和名称推广到世界各国的作法上。“苏维埃”是俄文音译，意为“代表会议”。1922年12月，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去掉了国名中的“俄罗斯”，改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这样一个既没有冠以民族名称也没有表明地理方位的史无前例的奇特的国名，表明它还是把苏联看作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形式，指望将来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之后，都会加入苏联。当时在十月革命鼓舞下，欧洲一些国家的革命运动高涨，共产党人也竞相采用“苏维埃”的名称，

但大都没有存在多久就消亡了。1918年1月芬兰爆发革命，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工人赤卫队夺取了赫尔辛基市政权，组成了人民代表苏维埃，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但是仅存在100天就被颠覆了。11月德国革命胜利，工人组织了柏林工会代表苏维埃，随即召开全德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到1919年1月举行第一次国民会议后，苏维埃的权力就被取消。2月成立资产阶级的魏玛共和国，广大工人奋起斗争。1月10日至2月3日在不莱梅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坚持25天；4月13日至5月1日在巴伐利亚也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只维持19天。1919年3月匈牙利革命胜利，宣布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保持133天。同年6月16日斯洛伐克也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存在一个半月。总之，1918—1919年间“苏维埃共和国”的浪潮在欧洲此伏彼起。

但是，随着欧洲革命运动的低落，列宁也迅速调整对外政策，改变了战略和策略。一是强调同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发展经济贸易往来，尽力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列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①他在给一些边疆共和国党员同志的信中说：“俄罗斯在经济上过去是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隔绝的，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这样；高加索却可以较快、较容易地同资本主义的西方搞好‘共居关系’和进行商品交换。”^②二是调整对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政策，讲究斗争策略。他认为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看客观条件、需要和可能，否则会帮助反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67页。

②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486页。

动势力，损害革命运动的整体利益。1918年在俄共党内有人主张“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即使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也要援助国际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将其斥之为“奇谈怪论”。列宁说：这些人以为“国际革命的利益要求强行推动国际革命，……这种‘理论’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来都否认‘强行推动’革命，因为革命是随着产生革命的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而发展起来的”^①。“我们‘做好可能丧失苏维埃政权的准备’，显然也不能帮助德国革命的成熟，反而会妨碍它。我们这样做只会帮助德国反动势力，为他们效劳，给德国社会主义运动造成困难。”^②列宁还主张“我们在国际政策上要尽可能地机动灵活”^③，他还“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④，并认为对外援助应“量力而定”^⑤。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内外环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列宁提出了带方针性的思想：“既然没有力量，就得屈从”，但要“在任何条件下都养精蓄锐，无论如何要一次再次地重新奋起”^⑥。

其次，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上，在没有任何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按照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大致设想，并结合俄国的情况，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方式。其中有成功的，也必然会有许多不成功和失败的教训。

在经济体制上，苏维埃政权曾一度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423页。

②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424页。

③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119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354页。

⑤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423页。

⑥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426页。

设想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国有化（不仅大企业，还包括几乎所有中小企业）为基础，以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和分配体制为特征的经济体制。苏维埃政权颁布的第一个法令是和平法令，准备退出帝国主义战争；还颁布土地法令，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消灭封建等级制和民族压迫，实现男女平等和民族平等。在完成民主革命任务之时就把全部大工业和银行、铁路、商船和对外贸易等收归国有，开始采取社会主义措施。1918年初，列宁鉴于俄国经济落后的情况，主张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从1918年春开始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与国内反革命叛乱，迫使苏维埃国家转而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1918—1920年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的经济体制更向高度集中发展：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方面，一切权力集中在中央，国家无偿征集农民粮食，取缔了市场，禁止商品交换和贸易活动，试图废止货币，取消银行，职工实行供给制，等等。这个体制尽管对取得内战胜利立下功劳，但却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破坏了工农联盟，危及苏维埃国家的生存。

1921年俄国转入和平建设、欧洲革命开始转入低潮之时，列宁清醒地估计形势的变化，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案。俄共（布）适时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改用迂回的办法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基于俄国经济落后的现状，列宁主张允许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经济，引进外资，实行租让制和租借制，让社会主义通过商品市场竞争学会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当时一些淳朴的农民对此不理解，他们说：“怎么回事！说俄国话的资本家被赶走了，而外国资本家却到这里来了？”列宁说，在租让制情况下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是受国家监督和控制的，“因为政权掌握在工农手中，地主和资本家的所有制

不会恢复”^①。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同外国公司签订的租让合同 1921 年 5 个，1926 年达 144 个（采矿 24 个、加工业 41 个、商业 36 个、其他 43 个）。1927 年建立的租让企业达 73 个，1928 年外国投资增至 5770 万卢布。苏联从租让企业中得到的收入，1924—1925 年度为 680 万卢布，1927 年为 1611 万卢布，1928 年为 1010 万卢布。苏联还同外国搞合营公司，1922 年春兴办了 7 个，1923 年发展到 24 个。苏联还利用外国贷款、引进设备、技术和人才。这对苏联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重要之点是工人国家要尽快追赶电气化的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他于 1920 年讲的名言是：“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② 他还形象地指出：“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电的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③

斯大林在 1929 年实际上提前结束了新经济政策，从 1930 年起全面向资本主义进攻，加速农业的全盘集体化。1936 年他宣布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1939 年又宣布要从社会主义向高级的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这种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和他搞的高度集权的体制，几十年没有多大变化，后来越来越僵化，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④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360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0 卷，第 30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8 卷，第 117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39 页。

苏维埃俄国第一届政府 (1917年)



在政治体制上，列宁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思想，坚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力图把苏维埃建成“议行合一”的政权机构。十月革命5年后，列宁还感受到苏俄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务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①。过份的集权，官僚主义的滋生，使列宁感到也必须学习资产阶级管理的有效方式。于是逐步在国家机关内，在处理党和国家机关的关系中提出了分权制衡、发扬民主等一系列措施。这表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力图结合本国实践来运用马克思主义，使新生苏维埃国家政权不断巩固和完善。

列宁还非常重视如何健全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问题。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列宁就把民主集中制的重点从以往强调中央集中转向重视党内民主。从1905年党的三大起，党章就规定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但是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党处于地下状态，无法坚持。然而从1917年起，尽管内战外战交加，列宁坚持每年召开党代表大会，在会上就党的路线方针问题展开自由讨论和争论，并没有对持不同观点者扣帽子，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进行表决。为加强中央领导，1919年党章规定：中央全会至少每月召开两次，每月要向各省委分发一次关于自己活动的书面报告，中委会设政治局和组织局、书记处，分工负责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在中央领导机构中也是实行每人一票的平等表决制。从1921年起设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归代表大会领导，其职责是专门监督中央委员会。同年党的十大鉴于以往“极端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3页。

集中化”造成了臃肿的官僚主义和特殊化倾向，迫切要求实行“党内的工人民主制”，“工人民主制的形式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它的表现就是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① 鉴于斯大林在担任总书记的8个月中“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太粗暴”，列宁在同年12月写给党代表大会的信中曾建议任命另一个“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的同志担任这个职务。^② 在国家领导体制方面，由于1918—1920年间内战外战的特殊情况，实际上形成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体制。列宁于1922年3月在养病中还向党提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象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③ 可惜列宁没来得及具体解决这些问题就于1924年1月年方54岁就溘然长逝！

后来斯大林留任总书记，但并未接受列宁的批评，依然粗暴，而且更加独揽大权，党中央再无机构能够对之进行监督。后来连中委会和政治局会议都很少召开，完全实行个人专断。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变成了个人集中制和官僚集中制。他带头实行的实际上的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明显违背民主共和国的权力制衡制、领导人限任制和选举制，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他30年代搞“大清洗”，把党内领导层中不同意他观点的人都打成“反党分子”、“机会主义分子”，甚至妄加上“间谍”、“特务”等罪名，乱关乱杀无辜。邓小平同志说：“斯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4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39—340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64页。

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①

斯大林搞的政治体制虽然有严重弊病，但是在20、30年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便于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斯大林坚持列宁的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1924年到1941年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通过3个五年计划，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电气化，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国民经济公有化和计划化，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使苏联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使苏联在世界经济中由革命前的第五位（居美、英、法、德之后）而跃居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苏联在国内消灭了私有经济和旧的剥削阶级（包括地主贵族阶级、富农阶级和工商金融资产阶级），改造了个体经济和小资产阶级，使个体农民变为集体农民，使旧知识分子变为工人阶级新型的知识分子，还培养了大批工农出身的新知识分子，工人阶级成为国家和社会的领导阶级，实现了各民族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消灭了失业和贫困，各民族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苏联终究第一次把科学社会主义初步变成现实，第一次在世界上显示了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反之，资本主义世界却在1929—1933年爆发了史无前例的严重的危机，稍有复苏后又在1937年陷于新的经济危机，而且导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剧，终于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此相反，苏联由于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大为增强，胜利地充当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军，为社会主义在世界上赢得了声望。社会主义在一国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的实践时期，已初步显示了它比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引来了社会主义在多国的发展。

（三）社会主义在多国的实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德战场是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在苏德战场上，苏联军民牵制了德军近70%的总兵力。在整个战争中，苏军歼灭了德军总兵力3/4以上，包括歼灭德军75%以上的坦克和飞机，为最后击败德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苏联军民为战胜法西斯付出了巨大代价。据俄罗斯《消息报》1998年6月25日公布的最新精确材料，4年战争中苏军牺牲916.48万人，和平居民死亡1740万人，总共丧失2656万多人。苏联人民的英勇牺牲精神，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正是苏军直捣法西斯老巢柏林，解放了东南欧一系列国家和我国东北地区以及朝鲜半岛北部。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和苏共的国际声誉，又一次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巩固了世界社会主义阵地，而且为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1. 社会主义向多国的发展。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国共产党英勇机智地站在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列，并在战争中团结和组织民众，力量获得了很大发展。欧亚有2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开展反法西斯的地下秘密斗争和公开武装斗争，结成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甚至建立民主政权和革命根据地；有不少国家的共产党和人民大众还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加强了国际联系。此外，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还新成立了一些共产党，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1941年）、泰国共产党（1942年）、锡兰共产党（1943

年)，它们都领导人民投入了反法西斯战争。虽然共产党员牺牲了很多，但是在斗争中党的队伍愈益壮大。战前约有 400 万党员，到战争结束时增加到近 2000 万党员。

从 1944 至 1949 年这 5 年多时间中，欧亚有 11 个国家在共产主义政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乘胜继续前进，大体上通过 3 种方式建立了人民民主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种方式，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民主政权，进而解放了城市，开创了红色江山。如 1944 年成立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45 年成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1946 年成立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过近 1 年谈判破裂后又进行了 3 年解放战争，于 1949 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种方式，主要依靠苏联红军的解放，同时有本国人民武装配合。如 1945 年成立的波兰人民共和国，1946 年成立的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1947 年成立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和 1948 年成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还有 1946 年成立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新政府，也是属于这种方式，但是在政府内部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斗争，把资产阶级反动政党驱赶出去后才成为共产党独占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匈在 1947 年 8 月，捷在 1948 年 2 月）。此外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主要靠苏联帮助，也有自己的武装斗争。



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



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驱出了资产阶级政党取得了政权。图为工人民兵游行。

第三种方式，由苏联红军解放，在苏联帮助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德国东部是苏军解放的，西部由美、英、法军队占领。西部于1949年9月12日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东部则于同年10月7日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从上可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一国扩展到欧亚13国，东起长白山脉，西至易北河畔，北起北地群岛，南至湄公河流域，在地理上连成一片。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上，都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在政治上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军事上通过双边条约和华沙条约组成共同防御同盟（1954年华约缔结时有苏、波、捷、德、罗、匈、保、阿8国参加，1962年以前我国曾派观察员出席其会议），在经济上通过双边条约和经互会组织加强互助合作，建立社会主义世界市场（1949年苏、保、匈、波、罗、捷6国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后来还有阿、德、蒙、古、越5国加入，我国和南、老、朝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其一些例会）。

远在拉丁美洲的古巴共和国在1959年民主革命胜利后，1961年由卡斯特罗领导的“7·26运动”转向社会主义，并与人民社会党（原古巴共产党）、“3·13革命指导委员会”合并，组成古巴革命统一组织，1965年改名古巴共产党。这样古巴共和国从1961年起也成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各国也加强了联系。社会主义从东半球又扩展到了西半球。1975年印度支那人民在抗美战争取得全胜后乘胜前进，越南实现了南北方统一，老挝人民革命党（共产主义政党）领导人民废除君主制，宣布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与此同时，柬埔寨共产党利用抗美救国的大好形势取得了全国政权，使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增加到16国。但是由于柬埔寨共产党实行极“左”路线，只有几年功夫就造成了“亡党亡国”

的悲剧，结果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后来是 15 国。



1959 年 1 月 1 日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进入首都哈瓦那，古巴革命取得最后胜利。

社会主义国家由一国扩大到多国，尤其是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加入世界社会主义行列，空前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实力。80 年代社会主义各国最繁荣时，其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 1/4 以上，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1/3，工业产值约占世界的 2/5，国民收入约占世界的 1/3。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国名上可以看出，都已不再沿用“苏维埃”的名称，而改用人民共和国或民主共和国等，这未尝不是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较之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更成熟的表现。

2. 社会主义各国的外部环境。

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上，获

得了空前大发展，同时又面临外部资本主义世界和内部社会主义世界复杂关系的双重大挑战。对这两大挑战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成败。

首先是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挑战。这表现在，苏联与美、英等国在战争中结成的反法西斯同盟在战后已破裂。从1946年起，美、英等国即开始对苏发动“冷战”，进而双方形成“北大西洋公约”与“华沙条约”两大军事集团。双方剑拔弩张，长期冷战对峙，关系时紧时缓，几度达到接近热战的地步。冷战促使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军备竞赛不断升级。苏联把国民收入的1/5乃至1/4用于扩军备战，苏联工业的70%与军事工业有关，这使得苏联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背上沉重负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冷战对峙态势下也为加强国防实力付出很大代价。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3次用武装进攻，企图消灭社会主义国家。一次是美国纠合15个国家的军队于1950—1953年进行朝鲜战争，中朝人民并肩战斗了3年才在北纬38度线停战。另一次是法国在美国支援下于1946年入侵越南民主共和国，经过艰苦抗击，才迫使法国于1954年在日内瓦和平协议上签字，维护了越南北方的独立和社会主义建设。再一次是1961年美国对越南发动“特种战争”，企图消灭越南南方的人民游击队，越南人民奋起进行“支援南方，保卫北方，统一祖国”的战斗。在中国等国家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经过12年斗争，终于1973年迫使美国签订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西方国家在冷战、热战中均未能得手之时，加紧采取“和平演变”的新战略和新策略。曾任美国国务卿顾问和国务卿的杜勒斯早在1953年就主张用“和平的方法”，即通过“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来解决社会主义国家“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问题”。从60年代起，美国总统肯尼迪、尼克松、里根等都着

力用“和平演变”方法来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代、第四代倒向西方。他们力图通过“心理战”、文化渗透、价值观的转变等途径使社会主义国家自行瓦解，发生质变。为此，如何有效地防止“和平演变”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比对付武装入侵更加艰巨的任务。

社会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的颠覆、封锁和武装侵略面前，必须从自卫立场进行坚决的斗争，战后初期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的一系列斗争都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苏联后来发展到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军备竞赛日益升级，超出了自卫的范围，既加剧了世界紧张局势，又使自己背上了沉重军费开支的包袱，拖了经济建设的后腿。同时，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许多共产党，忽视了战后资本主义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发生的新变化，长期坚持资本主义陷入了“总危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传统观念，对世界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的现实迟迟不认识，仍然认为世界形势“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致使工作重点长期停留在准备打仗上，转不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严重影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此外，经互会国家受“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的影响，长期局限于与世界经济大潮隔绝的分工合作；不少党从“左”的思想观念出发，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是坚持既斗争又合作、既有矛盾又要相互学习和借鉴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上时而右时而“左”，这一切都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迅速发展。中国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明确了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改变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估计，改变了备战挖洞的方针，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实行改革开放，从而使中国的面貌迅速发生了巨大变化。

其次，社会主义由一国发展成多国后，国际环境本来比一国时期是更为有利了，但同时也因此带来了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彼此关系的新课题。战后的实践表明，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处理不当及发生的严重错误，使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挫折，甚至酿成危机，其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共产国际在1943年解散后，1947年9月苏、南、保、罗、匈、波、捷、法、意9国共产党又建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情报局成立时宣称已不再是共产国际那样的高度集权的各国共产党的上级组织，而只是旨在交流经验，交换情报和配合行动。但是因苏共大党主义严重，它依然把情报局作为贯彻苏共旨意、干涉别国党内部事务的工具。南斯拉夫共产党本来试图摆脱苏联模式、独立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如强调人民阵线的作用），苏共当即于1948年和1949年两次通过情报局会议作出决议，谴责南共犯了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错误，甚至诬陷南共是在“凶手”和“间谍”掌握之中。这样就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第一次分裂。情报局进而通过它的机关报指挥东欧各国执政的共产主义政党开展反“铁托分子”的斗争，实际上是旨在加强苏共对东欧各国党的控制。情报局没有做过多少好事，于1956年解散了。

斯大林搞个人迷信、独断专横等错误是应当批判和纠正的，但是对这样重大的问题，苏共中央缺少充分讨论，也未与各兄弟党磋商，1956年赫鲁晓夫就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给国际共运造成极大的混乱和冲击。美国公布了这个秘密报告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有许多人感到过去受骗了，苏共原来是这么血腥统治人民，于是纷纷退党，引来了战后共运的第一次大挫折。

苏共二十大后各国共产党加强了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的

倾向，苏共又一再进行干预。1956年10月波兰和匈牙利爆发摆脱苏联控制、争取独立自主的群众性运动，改组了党的领导，开始进行改革。苏联当即出面干预，甚至出兵，力求继续控制东欧各国。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带头与南共逐渐恢复关系，但由于南共支持匈牙利的改革，并且鼓励其走南共的工人自治道路，从1958年起又遭到苏共的批判。苏共带头掀起大规模的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的浪潮，又使得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国共产党与南共决裂。1957年和1958年虽然在莫斯科召开过两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通过了协商一致的《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表面上显示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一致，实际上仍蕴含着深刻的矛盾。由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反对苏共给南共平反，反对苏共对和平共处作了过高估价，反对苏共干涉阿内政（苏曾袒护希腊，要求阿改善其南部3.5万名希腊少数民族的处境），在中苏分歧中阿站在中国一边，更使苏联领导人恼羞成怒。苏于1961年全部撤回在阿的技术人员和驻军，停止对阿的经济援助，甚至中断外交关系。这样就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第二次分裂。

苏中两党自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在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以及在评价和批判斯大林等问题上，分歧愈来愈多、愈深。到1963—1964年中苏两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分歧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都站在苏联一边，又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生第三次分裂。1968年苏联出兵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1969年中苏之间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珍宝岛之战”。中苏大论战不仅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大分裂，而且造成国际共运的大分裂。当时全世界89个共产党，有78个党

支持苏共，同中共中断了交往。70年代中后期，中国与美国改善了关系，尤其是中共端正路线、转向实行改革开放方针之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仍然坚持极“左”路线，还拉了一批“左派”党，谴责中国也转向了“现代修正主义”，并与中国断绝关系。这样就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第四次分裂。此后越柬、中越间也发生了战争，于是社会主义国家又出现第五次分裂。



1968年8月20日苏军坦克开进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

事实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共产党之间也是有矛盾的，如果处理不当矛盾就会激化。因此社会主义由一国发展到多国之后，如何处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与存在国际组织的时代不同，各国和各党既然是独立平等的，就不能允许老子党的存在。苏共沿袭了共产国际时期的思想习惯和作法，对别的国家和别的党横加指责、粗暴干涉，因而多次造成世界共运内部的危机。中

国党坚决反对苏共企图控制别国别党、干涉别国别党的内部事务的大党大国主义是非常必要的、完全正确的。邓小平同志谈到中苏关系的历史时说：“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①至于意识形态争论，他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②邓小平还深刻指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③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强调：中国要不称霸、不当头、不争论，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情。因此，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党提出了处理党与党关系的四项原则，这就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这四项原则得到了世界各类政党的广泛赞同。

3. 社会主义国家对国内建设道路的探索。

苏联自30年代建立的政治经济体制，曾经对苏联在二战前迅速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和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起了积极作用。当时连资本主义国家也向社会主义这种新体制学习，从中获取了延缓衰老之术。苏联1928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年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新古典经济学派理论家弗·曼·泰勒就发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指南》一文，提出了“指导性计划”的新概念，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如果采用“指导性计划”来对市场经济加以宏观调控会大有好处。1929年美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页。

国经济危机深重时刻，民主党领袖罗斯福就任总统后实行“新政”，采纳了由国家用计划来进行调控的建议，果然出现了经济迅速复苏的奇迹。战后“计划调控”的作法普遍为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使资本主义除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外，又多了国家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这样，资本主义就能在保持市场竞争促进科技发展的传统优势的同时，又能减少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投机性，使资本主义告别了完全没有计划的时期。同时当代资本主义还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吸收工人参与管理、提高工人福利以激发工人的积极性等经验，此外还采取资本股份分散化、吸收广大群众入股等措施。由此可见，苏联模式不是一无是处，不是从一开始就完全不好，主要是“后来僵化了”，没有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及时地进行改革。战后新建立的人民民主国家在走向社会主义时，由于当时苏联体制仍显示着生命力，而自己又缺乏实践经验，向苏联学习是必然的。他们带普遍性的问题是初期没重视从本国实际出发，急于照搬苏联经验，加上学过来的苏联模式本身存在的问题后来日益显露，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使改革的必要性显得越来越迫切。

回头看，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问题上最大、最主要、带全局性和共同性的失误，不在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上，而是在总的指导思想上。这就是在长期“左”的教条主义、急于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思想影响下，超越了发展阶段，脱离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其他问题和失误，如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所有制问题、分配问题以及其他涉及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问题上的错误和失误，都是由这一“左”的指导思想派生出来的。之所以产生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最主要的

原因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①

超越发展阶段、脱离实际的“左”的教条主义由来已久。首先是苏共对本国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的认识和估计长期脱离实际，总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欲速则不达。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39年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一过程中断了。战后的1952年苏共十九大又恢复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口号。赫鲁晓夫时期（1953—1964年），继续坚持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口号。1959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新时期。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提出要用20年时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到1970年实现在按人均计算的产量方面将超过美国，到1980年结束时将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接近于实现按需分配的原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年），修改了赫鲁晓夫的苏联“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估计，采用了“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认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是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合乎规律的阶段”。在安德罗波夫时期仍肯定苏联处在“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但在成熟程度的估计上较之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接近实际一些，认为苏联正处在发达社会主义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而且这个阶段有自己发展的各个时期和阶段。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在1986年使用了“发展中社会主义”的提法，但这一估计并没有成为苏共制定纲领路线的依据。东欧社会主义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国家模仿苏联，不少国家也提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口号，于是在政治经济体制上照搬苏联或被苏联所加强。

到80年代后期，苏东国家的情况是，政治上缺乏民主，经济上缺乏活力，领导人思想既有僵化又有混乱。就经济体制而言，一是所有制方面纯而又纯，普遍实行高度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缺乏活力。据苏联东欧经互会1986年的资料显示，公有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苏几乎是100%，保加利亚99.9%，捷克斯洛伐克99.5%，民德96.5%，罗马尼亚95.8%，匈牙利94.5%，波兰81.8%。二是实行高度集权中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由国家计划定价，严重背离价值，影响生产的发展。各国长期实行物价补贴政策，又使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重。苏联东欧国家用于居民生活资料的财政补贴长期超过国家预算支出的30%。其中，波兰70年代用于食品的补贴在财政补贴总额中占60%，80年代波兰财政补贴占国家年度财政预算的40%；保加利亚1989年物价补贴占国家年度预算的33%。前民德财政补贴长期超过生产投资额。这种与日俱增的财政补贴，对苏联东欧各国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严重影响这些国家的技术进步、设备更新和基础设施建设。三是片面强调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轻视农业和轻工业，造成产业结构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足，市场供应紧张。波兰50年代至80年代搞过两次“工业化”，重工业年均增长10.5%，而农业年均增长只有1.8%。匈牙利工业投资一度占40%，而农业投资仅占13%。四是对外经济关系上局限于经互会封闭式的合作机制，脱离世界经济和科技大潮，而向西方举债又超过了国力。到80年代末，波兰、民德、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国人均外债在1000美元以上，匈牙利人均外债达2000美元，大大超过

国家偿还能力。

苏联东欧地区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来也存在超越阶段、急于求成的“左”的指导思想。中国在50年代搞“大跃进”，刮“共产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搞“全面专政”、“割资本主义尾巴”、批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为“资产阶级法权”，这都是“左”的指导思想的典型表现。

越南1976年实现全国统一后，宣布已“进入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采取了“加速社会主义改造”、迅速“从小生产走上社会主义大生产”的方针。同年越共四大提出要尽快取消多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马上把资本主义经济变为国营经济，决定要在5年内基本完成南方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决定要争取在约20年内（即到1996年）基本完成越南从小生产走上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过程。后来越共认为由于对这一过渡时期的长期性、复杂曲折性认识不足，党的路线和政策发生了“脱离本国实际，违反客观规律，超越发展阶段”的错误，致使越南经济、社会陷入了深重危机。自1979年底起，特别是1982年3月越共五大之后，越南在政策上开始进行调整，1986年开始全面“革新”。

老挝于1975年底取得革命胜利后，开始了“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从1976年开始，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严格限制私商的经营活动和经营范围，禁止私商收购稻谷和牲畜，禁止从事进出口贸易，甚至以“征用”或“代管”名义无偿占用私商的汽车和货物，严重损伤了私商的积极性。随后在全国对农民的余粮实行国家收购政策。规定农民的余粮不得在市场上出售，必须如数卖给国营收购站，否则将被没收。1978年决定在全国开展农业合

作化运动，到1980年底要在全中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为此农村基层干部采取了强迫或变相强迫农民入社的作法，造成了农民杀牛破坏生产等现象。由于政策过激，脱离了老挝实际，造成经济停滞生产下降。1979年11月老挝人民革命党二届七中全会对经济工作失误进行反思，认为犯了“超越阶段、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的错误。随后才开始调整和放宽政策。1986年老挝党四大，认为老挝的目标是要实现社会主义，但目前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当前要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制度。

古巴于1961年宣布搞社会主义，紧接着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1963年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外国企业国有化，实现了“土地的、反帝的、人民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目标，并迅速建立起以“国有”为主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体系：工业企业全部国有，农业中国营农场占土地总面积70%，合作社占18%，个体农民只占12%。1968年又发动了一场“革命攻势”，将除部分小农之外的残余的私人经济、零售商业、小服务业通通取消，实现了彻底的生产资料公有化、国有化。在此基础上，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后来古巴领导人认为60年代从“理想”出发、凭“激情”办事，犯了违背客观规律的“唯心主义”错误（卡斯特罗语）。70年代，开始纠正前一时期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思想和做法，决定建立“经济领导与计划体制”。80年代上半期进行了一些利用市场的局部性小改革，因出现了一些“偏差”，怕助长了“资本主义”，下半期开展“纠偏运动”又关闭了所有农贸市场。90年代为度过“和平时期的最困难时期”，重新开放农贸市场，缓解了供应紧张。1993年古巴宣布改革，第二年经济开始回升。

社会主义的改革开始于东欧苏联，但时断时续，小打小

闹，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最后由于走偏了方向，又失败于苏联东欧地区。社会主义改革真正取得明显成效的是在中国，以及随后开始改革的越南、老挝和古巴。这些国家能顶住苏联东欧剧变的冲击，除了执政党在政治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领导毫不动摇外，主要是因为正确地实行了改革开放，并取得了成效，经济得到了发展，人民得到了实惠。

（四）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时期资本主义（体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国家，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类是受其剥削和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即现在的发展中国家。这两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1.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欧洲国家的工人行动起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革命运动。他们学习俄国工人攻打冬宫的方式，迅速以暴力夺取政权，但不久都失败了。

芬兰无产阶级 1917 年 11 月 13 日在赫尔辛基、维堡等大城市发动了革命。工人赤卫队占领了火车站、电话局、电报局，1918 年 1 月 27 日，占领了首都赫尔辛基，资产阶级斯文胡伍德政府倒台。第二天，芬兰人民代表苏维埃成立。这是继俄国之后的又一个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新政府宣布实行监督私人银行，没收逃亡业主的企业等革命措施。但芬兰北部仍被资产阶级控制，他们在德国和瑞典军队支持下，从 1918 年 2 月开始向芬兰无产阶级反扑。尽管赤卫队英勇战斗，但只坚持

了3个多月。4月29日维堡陷落，革命最终失败。

德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迅速掀起的斗争日益高涨。1918年11月4日，以基尔港水兵起义为导火线，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柏林、汉堡、不莱梅、莱比锡和慕尼黑等地的工人和士兵奋起响应，相继推翻当地的反动政府，成立工兵代表苏维埃。11月9日，柏林数十万工人和士兵进行武装起义，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德皇威廉二世出逃荷兰。斯巴达克同盟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在王宫阳台上向群众宣布德国为“自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达到高潮。但革命的成果却被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右翼艾伯特一派篡夺。他们上台后不仅镇压了柏林工人起义，还扼杀了新生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1921年3月德国柏林工人发动武装起义，政府在工人密集的市区竟出动飞机和大炮轰击，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起义失败了。结果有1200名工人殉难，4000名战士被判刑，35万名共产党员在几个星期内数量减少一半。

在匈牙利，经1918年“秋玫瑰革命”推翻了哈布斯堡封建王朝而成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于1919年春陷入了内忧外困的境地，无力解决日益尖锐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问题。在亲身经历过十月革命的共产党人库恩·贝拉等人领导下，由匈牙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的匈牙利社会党在3月21日发动起义，夺取政权，成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6月召开全匈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宪法，确认“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政权、自由和权力属于无产阶级，目的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用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制度代替之”。列宁曾发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的著名文章，为匈牙利工人阶级取得的胜利表示衷心祝愿和欣喜。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存在了133天后，到8月1日即被资产阶级武装颠覆。



德国 1919 年 1 月 5 日爆发革命，起义者占领柏林报业区，与政府军展开巷战。

装备精良的德国政府军镇压起义，13 日政府军控制了局势。



1923年，德国、保加利亚、波兰等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相继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工农政权，但在资产阶级残酷镇压下均遭失败。十月革命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就此结束。欧洲革命风暴停息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段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但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又发生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内外矛盾尖锐化，随后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始终站在反法西斯斗争的前列，不少党还组织领导了游击队，既壮大了力量，又扩大了群众影响。因此战后初期发达国家共产党的力量出现了空前大发展的局面。但是这一势头只持续了两三年时间，1947年美国发动冷战，在国际上掀起反共浪潮，各国共产党的发展即迅速受挫。

法国共产党在1942年成立游击队，其力量发展到55万人，成为法国主要的抗德力量。1944年法共武装并入法国军队后，法共在1945年还有81万党员，比1937年的32万党员增长1倍多。在1944年9月至1947年5月，法共先后参加了5届政府，有8位领导人先后和分别担任副总理和部长。1947年社会党拉马迪埃政府在实行马歇尔计划的背景下将法共排挤出政府。但1948年法共在议会仍拥有152个议席。

意大利共产党在战前还是一个地下小党，在二战中组织了16.9万人的游击队，占全意大利游击队人数的60%。战后意共游击队放下武器，宣布在合法的民主斗争基础上活动。意共公开活动后党员迅速增长，1946年有党员200万，超过了法共。在1946年的选举中，意共获得428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8.89%，共获得104个议席，居第三位，仅次于天民党和社会党。意共领导人当选立法议会主席，并加入政府。1947年

天民党在美国支持下挑起政府危机，将意共和社会党排挤出政府。

战前除法共外，德、意等许多较大的共产党都处于非法地位，而处于合法状态的英、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共产党力量都很小。战后除少数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共产党到 70 年代才合法）外，其他所有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几乎都已获得合法地位。西欧各国的共产党，包括一些小国的共产党，如荷共、希共、芬共、瑞共等都比战前有很大发展。日本共产党战前是被禁止的，1945 年还只有 0.2 万党员，1949 年已发展到 10 万以上，在国际反共浪潮冲击下，1955 年还有 3 万党员。

五六十年代发达国家的共产党经历战后初期短暂的大发展之后，迅速下降，各党力量下降程度不同，但总体上的下降趋势十分明显。意共下降较少，比高峰时期下降 25%，保持在 150 万党员的水平。法共停滞在 30 万党员的水平，比高峰期下降了 60%。荷共下降至 1 万人，只有高峰期的 1/5。本来力量不大的美、加、澳、新等国的共产党在这一时期都进一步缩小。只有日共超过了 1949 年的高峰，60 年代维持在 30 万人的水平。

进入 70 年代，特别是西共、葡共、希共获得合法地位，法共、意共、西共等党提出“欧洲共产主义”之后，欧洲共运又出现了一次小的回升。法共由 60 年代低谷时的 30 万人，到 70 年代末增至 70 万人。西共 1975 年转入合法前只有 1.5 万人，1977 年已猛增至 20 万人。葡共 1974 年地下时期只有几千人，1975 年增至 10 万人。希腊共长期处于地下，1982 年发展到 7.3 万人。日共在 70 年代发展到 40 万人。芬共、荷共 etc 小党略有恢复，但幅度不大。

进入 80 年代后，发达国家共产党的力量进一步下降，但速度不太猛烈。到苏东剧变时，突然来了个大挫折，许多党发生党员退党、共产党改变名称和性质的严重情况。

总之，自《共产党宣言》发表 150 年来，发达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一直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历史性课题。十月革命胜利后，发达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民又进行了几十年的探索。初期试验过仿效俄国城市起义、暴力革命的办法，都没有成功。战后和平发展时期，又试验过议会道路，特别是“欧洲共产主义”的提出将这条路线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了，但是至今也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苏东剧变后，法共又提出了“新共产主义”，其他共产党也在反思的基础上进行新思考，究竟怎么样搞，看来还需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社会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近几十年来已有很大发展。战前属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政党数量少、党员少，只有英国工党、瑞典社会民主党等极少数党上台短期执政，成绩也不明显。战后各国社会党十分活跃。1951 年建立了社会党国际，它自称其历史起源于 1864 年的第一国际，是第二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延续。社会党国际反对共产主义和各国共产党，它在 1951 年成立大会上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的纲领，提出了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等一套主张，其主旨依旧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推行改良主义，争取通过议会多数上台执政，在经济上发展国有经济、合作经济、吸取工人参与管理，逐步扩大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在国际上反对战争和侵略，裁减军备，维护和平等。起初参加社会党国际的只有 38 个政党，

约 978 万党员，拥有 4350 多万选民。社会党国际一般每隔一段时间（有时一年，有时两三年）就召开一次国际代表大会，针对形势变化讨论通过一批新的决议。至今已召开过 20 次代表大会。现在其成员党已扩展到 142 个，党员总数近 3000 万人，拥有 2 亿多选民。社会党的分布已不限于西欧北美，而是遍布世界五大洲。受其影响的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 5200 万会员，约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会会员总数的 70%。社会党国际已有大约 30 多个成员党领导执政或参与执政，其中有的累计执政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以上，如瑞典社会民主党。当然总的态势是时上时下，不过它们每次上台执政都并非资产阶级政党主动退让，而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竞选中取胜。它们执政之后并没有能够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却都或多或少采取某些改良主义措施。此外，60—7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又有绿党兴起，它们主张生态社会主义，要通过社会主义来维护生态平衡，视生态为高于一切的命题，把维护或破坏生态作为划分敌我阵线的标准，反对阶级斗争与议会制度，追求实现基层直接民主和社区自治，注重改善人民生产和生活环境。当今绿党已发展到约 50 个，拥有上百万党员，加上绿色群众组织的成员，已达几千万人，大多在议会中占有一定的席位。这些现象都很值得研究。

2. 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没有民族独立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因此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民族解放运动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又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军及其组成部分。

十月革命推动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极大地

动摇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继续高涨，导致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彻底瓦解。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两类不同情况，一类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一类是由民族主义政党领导的。

共产党在运动中占据领导地位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斗争取得胜利后，国家迅速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直接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如战后亚洲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这样诞生的。西半球的古巴在反帝反独裁斗争中领导人还没有宣布拥护马克思主义，胜利后在反帝斗争深入发展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现在是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

另一类是由民族主义政党或领袖人物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斗争胜利后有相当多的国家宣称走一条既非资本主义也非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其中有的还将自己的理论冠以各种社会主义的名称，如阿拉伯社会主义、乌贾马社会主义、合作社会主义等等。在世界社会主义威望空前高涨的情况下，世界上有 100 多个民族主义政党提出各种名目的社会主义纲领，其成员曾多达近 2000 多万人，在近 40 多个国家执政。这些名目繁多的社会主义可总称为“民族社会主义”，其具体观点虽然各不相同，但其共同点都是奉行民族主义，要求巩固民族独立，维护民族权益，发展民族经济与民族文化，同时又采取一些自称为社会主义的措施，如发展国有经济与合作经济，实行五年计划或三年计划，采取社会福利政策，如公费医疗、义务教育、改善人民居住条件、提高工资等。不管这些国家举什么旗帜，这 100 多个新独立的国家，形成了第三世界，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是战后世界舞台上的一件大事。

就亚非拉的共产主义运动而言，各地区、各个国家的发展

是极不平衡的，大都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传入较早，共运发展也较早。其次是亚洲、西亚北非，黑非洲最薄弱。在亚洲的共产党中，中国、越南、朝鲜、老挝等国的党在领导本国民族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引导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共产党人，尤其是亚非拉的共产党人。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不少共产党仿效中国革命的道路，力图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大多没有成功。现在不少党或是削弱消失了，或是下山转入合法斗争。尽管中国等国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了革命胜利，然而其他国家革命怎么搞，仍然需要继续探索。

三、社会主义的“大挫折”与“新局面”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是世界社会主义遭受的空前严重的大挫折；而自70年代末开始以实行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开创了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一个“大挫折”，一个“新局面”，构成了世纪之交世界社会主义两幅完全不同的画面。

经过两年多的剧变，苏东地区9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分裂和重组，形成了27个政治取向已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

特别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和消亡，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巨大冲击。但是，在社会主义遭受大挫折的形势下，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仅没受大的冲击，反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与此同时，越南、老挝、古巴和朝鲜顶住压力，继续坚持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使“多米诺骨牌效应”在这些国家失灵，西方反共势力想一举搞垮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图谋未能得逞。

“大挫折”使人们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产生了某种忧虑，“新局面”却使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在“绝境”中出现了“柳暗花明”的新希望。正如外国媒体所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为挽救……社会主义大船而向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回答”，它“造就了20世纪最壮观的经济奇迹之一”，“给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本世纪即将结束、新世纪就要来临之际，世界社会主义一方面是“大挫折”，另一方面却是“新局面”，这就是客观现实。

（一）苏联东欧地区的“政治地震”

苏东剧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是20世纪历史上震撼人心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从1989年东欧国家剧变开始，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基本结束，大体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在“改革”的旗号下发生的这场“政治地震”，从本质上看既背离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否定和毁掉了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的成果，又未能实现什么“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它不是什么“改革”，而是“改向”，即实质上“回归”资本主义。这场政治动荡的结局是：执政的共产党下了台，或虽未下台但已改变了名称和性质。于是普遍兴起了更改党名、国名、国旗、国徽的浪潮，结果党变了质，国变了色。经过动乱、演变、分裂和重组，苏联东欧地区原来的9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27个至少在价值取向上已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从而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结束了二战后长期形成的雅尔塔格局。

1. 苏东剧变的过程。

苏东剧变是由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引爆的。戈尔巴乔夫对东欧国家“改革”的支持和赞许态度，与西方反共势力一起对东欧的剧变起了催化作用。而东欧国家的剧变又反转过来影响苏联政局的发展，最后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1989年被国际舆论称为“东欧年”。这一年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局相继发生了空前剧烈、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其程度之激烈、速度之快、波及面之广完全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东欧国家剧变的大致情况是：

波兰的剧变始于团结工会东山再起。在经济停滞国家处于困境的形势下，团结工会组织多次全国总罢工，逼迫执政党妥协让步。1989年春召开的波兰各党派参加的“圆桌会议”，决定于6月举行议会大选，结果团结工会在选举中获得大胜。9月新组建的波兰政府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由非共产党人领导、共产党人占少数的政府。随着波兰统一工人党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党内思想混乱加剧。1990年1月27日，该党在华沙召开十一大（即该党最后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停止活动的决定。多数代表决定把党改建成“社会民

主党”，少数人组建了“社会民主联盟”。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消失，标志波兰剧变的完成。

民德的剧变由大批居民出走，造成社会政治动荡开始。在这一局势面前，党内领导的大换班，严重削弱了党的战斗性，而决定推倒柏林墙和开放两德边界，则最终使民德局势失去控制。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德国统一社会党尽管改名改性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在选举中仅得票 16.33%，沦为在野党。“德国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加快了两德统一的进程。1990 年 9 月 19 日和 20 日，民德人民议院和联邦德国议院分别通过了《统一条约》。10 月 3 日，民主德国正式加入联邦德国。民德的演变最终以并入联邦德国而结束。

匈牙利的剧变始于党内。由于执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发生严重分歧，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激进改革派”占据了优势，决定实行多党制。1989 年初党内分歧公开化，在“激进改革派”的攻势下，党的总书记格罗斯公开表示：匈党“不仅支持、接受多党制，而且还全力以赴提倡多党制”，迈开了自毁长城的第一步。在这一决定后，其他各种组织迅速活跃壮大起来。在 1989 年 6—9 月各党派和组织参加的长达 3 个月的“圆桌会议”上，执政党被迫同意在宪法草案中不再写入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等内容。1989 年 10 月 7 日匈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十四大，决定将党改建为“社会党”，原来的党分裂成几个党。10 月 18 日匈牙利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修改了国名，并取消了原宪法中有关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政党领导作用的条文，标志着匈牙利党变质国变色。

捷克斯洛伐克的剧变始于为“布拉格之春”平反而由反对派掀起的政治风潮。政府对示威游行曾采取镇压和逮捕的办法，但没有奏效。持续的危机使党内分歧激化。党内“改革

派”造了“元老派”的反，迫使捷共领导班子全部辞职。新的领导与反对派进行对话，实行步步退让，同意取消有关党的领导作用和以马列主义原则为指导的条文。后执政党在选举中失利，丢失了政权，接着又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纲领，改变了党的性质。1990年宪法确定删除国名中“社会主义”字样，改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1993年1月1日又分裂成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两个独立的国家。

保加利亚的局势本来比较稳定，反对派的力量也不大。1989年5月突出的问题是境内土耳其族人外逃。大批土族人的出走，激化了保社会各种潜在的矛盾。民族危机演化成为政治危机，保局势陷入动荡之中。执政33年的日夫科夫被迫接受“政治多元化”并宣布辞职，使反对派得寸进尺。保共在1990年初召开的第十四次特别大会上，通过了《保加利亚民主社会主义宣言》和新党章，后又决定改党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保共性质彻底变化。保共在改名改性之后，在社会上的力量 and 影响仍占优势，但领导人在反对派的攻势面前进一步退让，把就要到手的政权又拱手让给了反对派，沦为在野党。

罗马尼亚的局势具有突发性。1989年12月16日发生蒂米什瓦拉事件，短短10天时间，齐奥塞斯库被处决。22日夜11时35分，扬·伊利埃斯库宣布由39人组成的临时政府“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成立，并接管政权。达25年之久的齐奥塞斯库时代遂告结束。

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国家，其剧变是由民族联邦共和国的分立主义的发展引发的，而国家的分裂又始于南共联盟的分裂。因此，南的剧变经历了南共联盟解体和南联邦国家分裂两个阶段。在民族分立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原来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已彻底解体，分裂成为5个独立国家，

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开始顶住压力，提出了“三不让步”和“四不原则”^①。但1990年7月大批公民外逃事件爆发后，内外压力加大，当局开始妥协退让，同意实行多党制。在1991年3月举行的首次多党议会选举中，劳动党虽然取得了优势，但在反对党——民主党的要求下，不久阿议会就通过决议，取消国名中的“社会主义”和“人民”两个定语。随后劳动党召开的十大又决定对党“进行彻底改造”，将党改建为“社会党”。这一切标志着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性质均已改变。在1992年3月提前举行的新一届人民议会选举中，民主党获胜成为执政党。阿劳动党虽然改名改性也未能保住政权。至此，阿剧变过程结束。

东欧多数国家剧变后，苏联于1991年底解体。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上台后推行加速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政治局势还是比较稳定的。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转向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确定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目标之后，苏联从政治、经济到社会，从执政党、联盟共和国到机关、企业和基层组织，全面陷入了混乱和危机。1991年的“8·19事件”后，苏联形势急转直下，开始了党和国家全面崩溃瓦解的急变过程。8月22日，叶利钦宣布“苏军中的共产党组织非法”，次日又签发命令“停止

① “三不让步”是：不应在任何领域向资产阶级思想让步，不应向宗教势力让步，不应向错误表现让步。“四不原则”是：永不允许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决不为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剥削开辟道路；永不允许削弱人民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决不同反人民势力分权；永不削弱、更不放弃党的领导，决不搞“多元化”；永不允许损害国家的自由、独立与主权。

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苏共中央“自行解散”。12月21日“独立国家联合体”宣布成立。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被迫辞去苏联总统的职务，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黯然降落。至此，苏联剧变和解体的过程最终完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后从地图上消失了。

2. 苏东剧变的原因及教训。

苏联作为有70多年历史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外国武装干涉、经济封锁、世界大战都未能把它摧垮。不仅如此，它还由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发展成经济、科技、军事强国，能与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相抗衡，并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联成一片，曾经红红火火地形成过强大的“阵营”。然而，为什么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说明了什么？几年来，不同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的人们，看法和态度是大相径庭的。西方反共势力兴高采烈，弹冠相庆，他们说苏东剧变说明，社会主义失败了，共产主义将彻底消亡。西方右翼学者说什么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非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取代倒是历史的必然。国际上为数不多的托派从其传统观点出发，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胜利，所以垮台是必然的。在社会主义者的队伍中有认识糊涂的人，从右的方面说什么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先天不足”，不改革是死，改革也是死，因而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当然也还有从相反的角度认识和提出问题的人，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被《九评》言中了，是修正主义把好端端的社会主义搞垮了，还是要大抓阶级斗争。因此，搞清楚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垮台的真正

原因，正确总结其经验教训，是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

我们认为，苏东剧变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合。西方“和平演变”得手和苏东国家的“改革”变成“改向”是两个主要的直接原因。国内经济没有搞好和执政党本身陷入了深刻危机是两个深层的根源。背离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根本的经验教训。在苏东剧变原因的研究上一要坚持“合力论”，二要坚持“重点论”。

唯物史观认为重大历史事变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①像苏东剧变这么复杂的事变，不可能由某一、两个因素造成，而只能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必须全方位、多视角地进行研究。近年来人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看法，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实际上并不互相排斥。比如有人强调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所起的作用；有人强调戈氏本人及其“新思维”所起的作用；有人强调苏东国家长期实行高度集中僵化的经济体制，造成经济长期落后，人民长期过紧日子所起的作用；有人强调它们党的建设没有搞好，严重脱离群众，丧失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和能力；有人强调它们民族问题没有处理好，造成民族分立主义的恶性发展；有人强调它们长期忽视农业和轻工业，造成产业结构严重失调，生活用品长期匮乏；有人强调苏联与美国搞军备竞赛，消耗了财力、物力，是被美国拖垮的；……只要坚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联系地而不是孤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7页。

地看问题，上述种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都是造成苏东剧变不同侧面的原因。

当然，强调全面不是没有重点，强调诸因素综合作用，不是不要区分主次。在诸多因素中，主要的直接原因有两个，即西方“和平演变”得手和国内的“改革”变成“改向”。前者是外因，后者是内因，当然内因是主要的、是变化的根据。西方和平演变的攻势再强，如果内部没有变化的根据，剧变也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可以说，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苏东国家是“自毁长城”，自己搞垮了自己。对此，许多当事人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实际上的第二把手）库·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中指出：“毫无疑问，正是戈尔巴乔夫政策的缺陷导致了国家走向悲剧。”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伊·雷日科夫在《改革：背叛的历史》一书中说：“我认为改革被出卖了。是我们出卖的。是设想改革的人、开始改革的人，实施和埋葬了改革的那些人出卖的。我不把自己排除于这个过程。不过，幸运的是，我没有得到机会参与下葬（注：他在苏联解体前因心脏病住院了）。”曾任戈尔巴乔夫助手的瓦列利·博尔金在其《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一书中说：“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东欧国家的剧变有西方和戈氏两重外因，但这些外因最终也是通过东欧国家的内因起作用的。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剧变的关键都是内因。古巴当时的处境比苏东国家要险恶得多，但由于古巴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动摇，迄今仍傲然屹立在西半球就是证明。这就是说，搞不搞“和平演变”在西方，但变不变在社会主义国家自己，

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重大历史事件中，个人特别是关键人物起着重要作用，他对事件在这时发生而不是在那时发生，以这种方式发生而不是以别的方式发生，有时甚至具有关键性作用。但是事件的深层根源还要从“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去寻找”。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曾经说到这么一件事：1848年法国革命失败之后，有人认为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对此，恩格斯强调说：革命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① 苏东剧变时，这些国家“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是什么样子呢？为什么一个由列宁缔造的、有90多年光荣历史、1500万党员的大党，可以任凭总书记个人一句话，说自动解散就解散了呢？博尔金说：“说句公道话，如果不是党遇到严重困难，不是党濒临危机状态，戈尔巴乔夫未必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瓦解这个有千百万人的组织。”他还说，“苏共的许多病症是不可避免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东欧国家的情况大体也是这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论是对苏联，还是对东欧国家，都需要研究其剧变的深层原因。

从“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来考察，苏东国家问题很多，但归根结底，最主要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党的本身存在严重问题，有的已病入膏肓，陷入了深刻危机。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和指挥中心，好比人的大脑，它本身害病，非同小可。另一个是经济没搞好。革命胜利几十年了，人民基本生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483页。

问题没有根本解决，长期过紧日子。他们将本国现状与商品琳琅满目的西方相比，产生羡慕西方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心理是并不奇怪的。否则无法解释千百万群众那么容易“上当受骗”，会跟着那股“改制”思潮走。

执政党陷入深刻危机后，不仅不能领导国家，而且连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也没有了。党的危机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思想和路线非常混乱，党已丧失了精神支柱和思想凝聚力，丧失了政治敏锐性和分辨是非的能力，已没有能力把握政治局势，已无法带领群众前进了。二是党内腐败特权习以为常，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党的领导人丧失了威信，逐渐成为民众攻击、嘲弄、唾弃的对象；对这样的党，在关键时刻，人民群众是不会为它分忧的。三是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受严重破坏，一方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在党内严重泛滥，纪律松弛，派系林立，正确思想集中不起来，更占据不了优势；另一方面是个人专断横行，个人说了算，缺乏党组织和集体的监督；这样的党不仅无法领导群众前进，甚至连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也没有了。因此，尽管政权、军权、财权、文权都还在这些党自己手里，却一步一步地败在主张回归资本主义的“民主派”和民族分立主义派手里。

另一个深层根源是经济没有搞好。邓小平同志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①有同志说这还是个“觉悟问题”、“教育问题”，是这些国家的党放松了对群众的思想教育。我们认为，思想教育当然重要，但也不是万能的。“不重视物质利益，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

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① 只要不陷入唯心论，就决不应忽视经济没搞好这个深层根源。据报道，齐奥塞斯库在逃跑的路上问一名工人为什么要推翻他们，那名工人回答说：“我们为啥不推翻你们，一是面包不够吃，二是隆冬腊月没有暖气取暖。”原波兰统一工人党最后一任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在谈到波党失败的教训时说：“波党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经济没有搞好，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经济建设搞好了，其他一切问题都好办。经济搞不好，群众不拥护，说话没人听，就有丧失政权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和人民生活水平比不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段时间可以，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原来的基础比它们差，但时间长了不行，没有说服力。特别是原来基础与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前差不多的国家，后来发展如果超过了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挑战就更严重、更尖锐了。经济问题就成了政治问题。

苏东国家经济没有搞好，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不好，而是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严重问题；他们的错误和失误又不在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上，而是在总的指导思想上。这就是在长期“左”的教条主义、急于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思想影响下，超越了发展阶段，脱离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其他问题和失误，如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所有制问题、分配问题以及其他涉及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问题上的错误和失误，都是由这一“左”的指导思想派生出来的。在这种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

“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长期来没有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问题。后来又从“左”跳到右，彻底背离、放弃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

苏东剧变的原因有千条万条，从本质上看就是背离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条根本教训。在历史上，斯大林搞“大清洗”，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这是必须纠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大大发扬、法制也必须完善。但问题在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尽管有各种严重问题和错误，包括对社会主义的严重扭曲，然而其基本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的，不能在改革和纠正其错误时，将“孩子”连同脏水一起倒掉，彻底学西方。在经济体制方面，苏联东欧国家断断续续搞过一些改革，但长期没能突破旧的框框，总的说来未能跳出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后来又突然转到全盘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由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跳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顶礼膜拜。如果说斯大林时期的主要问题是“左”，那么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既有右的东西，也有“左”的东西，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方面有不同的表现。当然长期来“左”的东西是主要的，只是戈尔巴乔夫的后期才跳到极右。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东西，本质上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东欧的情况虽有不同，但大的方面是一样的。它们的垮台，从根上讲也就垮在这里。

“老祖宗”不能丢，但时代在前进，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苏东剧变中应吸取的教训是，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苏东地区的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在西方“和平演变”攻势面前解除了思想武装，导致

了亡党亡国的悲剧，这个教训一定要记取，但我们不能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看到苏东的悲剧能够发生，经济没有搞好是深层根源，于是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因此，我们要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无论如何不能干扰和动摇这个中心。把经济建设搞好了，在实践中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这是从根上铲除“和平演变”的土壤的大工程。一定要坚持一个中心，不是两个中心；一定要坚持两个基本点，不是一个基本点。牢记邓小平同志的告诫：“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①这就是说，放弃社会主义是死路，不改革开放是死路，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胡改瞎改也是死路；只有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实行正确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柳暗花明”、繁荣昌盛的康庄大道。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在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遭受大挫折的形势下，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原因和奥秘就在于：近20年来，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中国进行了“第二次革命”，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第一次革命的基本成果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改变仍然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实现中国的社会主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义现代化。

1.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意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时代特征和本国实际，解决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尽人皆知，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原来的设想进行的，而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或前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发展顺序上的这一颠倒，使社会主义遇到了历史难题。过去几十年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表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当代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致使工作上频频失误。邓小平同志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核心问题，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解决了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面对的历史难题，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由于有了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出现了“柳暗花明”的新局面。因此可以说，是邓小平在当代中国的

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危难中挽救了社会主义。

2. 中国改革开放的特点。

苏联东欧的改革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而中国的改革却使社会主义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其原因就在于两种改革有根本性质的不同。苏东国家的改革后来变成了改向，它不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而是要回归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集中体现为“四项基本原则”）与其采取的“具体制度”和“运行机制”（通常称为“体制”）区别开来，对前者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后者全面彻底地进行改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引下，中国通过改革，对长期沿用的苏联模式进行了根本性变革。这一变革的最主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定，它表明中国正在完成从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以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和传统模式的突破，从而开拓了新的理论认识和新的社会主义模式，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确立了它的历史地位。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局面，来自于改革的实践，来自于邓小平理论，来自于这种社会主义新体制的形成、完善和发展。

中国改革的策略步骤与苏东国家也不同。中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不是局部改革。中国的改革又是有重点的，即在全面改革中始终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而经济体制的改革又采取了渐进改革的策略。从1978年末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改革开始起步。从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

多数这个客观事实出发，改革首先从农村着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连年增产，基本上解决了粮食问题，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吸纳了1.1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促进农村发展，促进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后，1984年发展到以城市为重点、以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大发展，市场繁荣，商品丰富，基本上满足了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从1992年十四大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又进入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广大群众从改革中得到实惠，从内心拥护改革，成为改革的积极支持者。这是中国改革不可逆转的根本原因。

中国改革的主要特点和基本经验就在于：（1）在全面改革中始终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2）经济体制的改革采取渐进改革的策略；（3）实行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4）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5）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这5条，就是中国改革的基本实践、主要特点和成功秘诀。如果对中国的改革进行哲学思考，成功的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条是中国的改革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而不去照搬其他国家的改革做法，不是今天听你的，明天学他的；中国的改革方案来自于集中了全党全国人民智慧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而不是来自于某个外国的某个研究所。这叫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另一条是坚持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多做实事，切忌空谈，在干中学，在干中积累经验，在干

中增长才干，到一定时候进行总结，对了的就坚持下去，错了的就改正过来。意大利《共和国报》指出，“迄今为止，谁都没有像中国那样能在如此短时间干出那么多的事。”这就是实践论。

3. 中国的成就和国外的评论。

通过近 2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面貌已发生了令世人震惊的变化。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提前实现了翻两番，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中国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前 6 位。对外贸易总额已由改革开放前（1978 年）的 206.4 亿美元，增长到 1997 年的 3251 亿美元，增长 15 倍多，在世界各国和地区进出口总额的排次，已由第 32 位，跃升到第 10 位。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中国的国际支付能力明显增强。1997 年国家外汇储备达 1399 亿美元，比 5 年前增长 7.2 倍，现居世界第 2 位。中国已成为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一块“投资绿地”，实际利用外资明显上升。1992—1997 年累计利用外资 2491 亿美元，在世界各国中居第 2 位。国内市场繁荣，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转折性变化。改革开放前，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受“短缺经济”困扰，居民购物凭票证、排长队，现在市场繁荣，商品供应充足，“卖方市场”已转变为“买方市场”。长期困扰我国的商品短缺现象已有明显改观。前几年中国经济的“高通胀”也已实现了“软着陆”，现在中国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与此同时，由于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电力、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长期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明显缓解。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向小康迈进。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存款余额在 1995 年达 29662.3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39.8 倍，

1997年又进一步增至46280亿元。居民收入的增长带来了消费水平的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城乡居民消费质量明显提高。居民的衣、食、住、行均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总体上看，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由温饱向小康跨越已迈过了3/4以上的路程。此外，2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法制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均全面取得了进步。

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举世瞩目，得到了世界舆论广泛赞誉。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不尽相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但是他们几乎一致地赞扬中国共产党人、赞扬邓小平及其理论的伟大功绩，惊叹中国人民的巨大创造力，惊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

法国《世界报》说“改革使中国经济实现了真正的起飞”。德国《经济周刊》赞扬中国“经济繁荣，巨人苏醒”，“正在朝着民主和法治国家的方向前进”。美联社说统计数字表明“中国正迅速向世界经济大国迈进”。美国《洛杉矶时报》说“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一个庞然大物”，“对世界各个角落产生着影响”。……世界各大报刊和通讯社几乎每天都有类似关于中国的报道和消息。

英国《中国季刊》1993年冬季号刊登卢西登·派依的文章，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从未有过这样一个社会，像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成为最高领导以来的中国那样，在没有战争、暴力革命或经济崩溃的条件下，进行如此重大而全面的改革。邓小平通过一种特殊的道路，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逐步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最终使中国稳固地走上进步之路。”

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说“15年来，中国大陆进步之神

速为历史上所少见”，“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增长超过当年日本的经济奇迹，人口却比日本多出 10 亿有余”。他说，从广州到深圳 160 公里的公路两旁，“尽是一座座施工中的中小型工厂、仓库或住宅”，这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建设计划”。

国外舆论，特别是一些左翼人士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造就了 20 世纪最壮观的经济奇迹之一”，它“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扭转了本世纪后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趋势”，“拯救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威望”，挽救了“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对 20 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大的贡献”。俄罗斯学者阿·雅科夫列夫说：“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在目前世界条件下体现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他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发展，不仅扭转了本世纪后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趋势，而且必将对下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哈萨克斯坦社会党主席叶尔蒂斯巴耶夫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解决了 12 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拯救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威望”。保加利亚社会党前主席亚·利洛夫强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说：“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实行社会主义的经验是很有意义的，应该加以深刻总结。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独特方式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兴趣，许多人都在研究中国的经验。中国建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和引进先进技术的作法，是各国应该效法的榜样。”日本前首相中曾根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显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感触颇深地说：“中国的惊人成就表明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已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变成了具体的、不断向前发

展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那种死抱教条、空喊口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分配贫困，而是分配财富。中国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伟大变化，毫无疑问地证明：中国政府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正在创造奇迹。”

（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变化

越南、古巴和老挝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古巴于 1993 年）也先后实行改革开放，并已取得显著成就。越南自 1986 年实行“革新”，10 多年来已取得很大成就。1996 年越南的通胀率仅 6%，为 10 年来最低水平（1987 年最高达 770%），国民经济增长率为 9.5%，粮食产量创历史最好水平，大米的出口量仅次于泰国、印度和美国居世界第四位。古巴于 1993 年宣布搞改革，第二年古巴的经济形势就逐步好转，经济开始复苏。1994、1995、1996 年古巴经济的增长率分别是 0.7%、2.5%、7.8%。老挝从 1986 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经济政治形势稳中见好。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看，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社会主义长期没有搞好，最根本的原因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往往以为共产主义的目标会很快实现，社会主义是短暂的过渡时期，因此犯了不少脱离实际、急于求成、事与愿违的错误。现在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已认识到，不仅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本身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党认为，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越南党认为，越南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老挝党认为老挝目前“尚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处在“继续建设和完善人民民主制度，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阶段”。古巴从 1993 年宣

布“改革”，总的趋势是逐步纠正过去追求“纯而又纯”过于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观念。

总的看来，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的认识，有了很大进步，发生了若干重大转变：一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实现的时间上“由近变远”，“由短变长”了；二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更符合实际，“由高变低”，“由虚变实”了；三是指导思想和发展模式上摆脱了“统一模式”，而强调从本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四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深化了，懂得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五是摆脱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的束缚，懂得了社会主义不能“关门”搞建设；懂得了在“一球两制”会长期存在的情况下，要科学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妥善处理同外部世界、特别是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既要对内改革，又要对外开放。如此等等。这就说明，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有很大进步。这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进步，是社会主义复兴的希望之所在。

四、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走势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标志冷战时期的结束。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何处去？西方媒体和学者曾宣传“社会主义崩溃了”、“共产主义消亡了”，21世纪不会有社会主义的一席之地，世界将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但几年后，当东欧左翼力量（前共产党人）重返政坛、俄罗斯共产党重新崛起时，他们又转换腔调说：苏东“政治时钟”向左摆，“共产党人又卷土重来了”。究竟应如何看待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的形势、特点和走向？客观事实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没有消亡也决不会消亡，但也不会很快全面地振兴。由苏东剧变所引发的世界社会主义的大动荡，其“震荡期”已基本结束。世界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继续向前发展，但会呈现出与过去年代完全不同的特点。

（一）剧变后的总体形势

苏东剧变给世界共运造成了巨大冲击：原执政的15个共产党，有10个丧失了政权，广大非执政的共产党力量锐减；世界上中国以外的各国共产党总人数由4400多万减到1000多万；世界共运陷入空前困境。西方资产阶级舆论一度宣传：马克思主义过时，社会主义失败，共产党将彻底崩溃。但是，经

过短短几年时间，世界共运形势出现了一些积极而重要的变化，西方的宣传破产。

第一，前苏东地区的共产党有的恢复活动，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俄共在1995年12月国家杜马选举中获22.3%的选票，居参选各党派之首，议席占全部议席的1/3以上；俄共成员谢列兹尼奥夫当选为国家杜马主席；乌克兰共产党在1994年新议会选举中获86席，名列第一；外高加索3国，近两年共产党的组织也陆续恢复活动，其中亚美尼亚共产党在1995年7月的大选中居第三位；中亚5国中的塔吉克斯坦共产党、吉尔吉斯共产主义者党都分别成为目前国内第一大党，主要领导在现政府和议会中任职；波罗的海3国和东欧地区一些国家，剧变中上台的右翼“民主派”因无法改变国家困难局面，不少已被迫下台，由共产党演变而来的各种左翼政党逐渐上台。但是左翼力量的上升势头是不平衡、不稳定的，常常出现左翼与右翼风水轮流转的情况。

第二，越南、老挝、古巴和朝鲜几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顶住压力，稳住阵脚，多数在革新开放中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越南“革新”事业成效明显，国内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提高，国际处境改善。老挝汲取过去超越阶段、“急躁冒进”的教训，面向实际，在革新中稳步前进。古巴顶住美国高压封锁和苏联解体后丧失生存依托的“双重打击”，在最困难最危险条件下稳住了局势，并从1993年起步搞“改革”，形势开始有所好转。朝鲜经受住金日成领袖去世的考验，仍坚守着“朝鲜式社会主义”的阵地。西方想在苏东剧变后“乘胜追击”搞垮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图谋未能得逞。特别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影响巨大，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

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①

第三，发展中国家非执政的共产党，经过动荡和分化，大多数党坚持下来了，有的还获得某种发展。印共（马）党员人数由剧变前 46.5 万发展到 63 万，在国内 3 个邦同左翼政党联合执政，在人民院中有 35 个议席。印共 1996 年 6 月参加中央联合阵线政府，获得两个部长职位。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近年曾两度组成政府，目前在议会 205 席中仍占有 90 席。西亚北非地区除个别党解散或改名之外，绝大多数党仍保持了党的统一。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成为议会第二大党，与第一大党仅差一席。摩洛哥进步与社会主义党在议会中力量也有增长。南非共也有较大发展，党员由 1990 年的 2 万发展到现在的 7.5 万，在新南非内阁中获 2 名部长和 3 名副部长职位，在全国议会 400 个议席中占有 53 席。拉美地区非执政的共产党基本保存了自己的队伍，其中巴西共产党由剧变前的 9 万人发展到 18 万人。

第四，发达国家的共产党所受冲击严重，目前仍较困难，但看来最困难、最动荡的时期也已基本过去。北美、大洋洲和北欧地区共产党的力量大为削弱，目前形势仍较严峻。西欧地区的法国、葡萄牙、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的 10 多个共产党仍有 70 多万党员，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有选民 800 多万，议员 20 多名。法共在议会拥有 36 席，成为参政党。日本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不但得到恢复，并有较大增长，现在众参两院的议席已由 26 席增至 49 席，在地方自治体中的议员由 3927 名增至 4913 名，超过了自民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有较大增长。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46 页。

此外，社会党和其他左翼力量在苏东剧变后也经历了由下降到重新回升的过程。剧变后初期，在反共浪潮中社会党也受牵连，出现社会党在选举中失利，西欧政治格局向右倾斜的倾向。但近两三年来，社会党等左翼力量下降局面开始扭转，在欧盟15个成员国中，有13国是由社会党类型的政党执政或参政。社会党国际继续保持着发展势头，向东欧和其他地区扩展。东欧地区已有10多个政党和组织成为社会党国际的正式或非正式成员，另有几十个党和组织与之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联系。社会党国际在亚非拉地区也有发展。

总之，当前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总体形势和态势是：剧变所引起的震荡、滑坡和混乱已基本结束，进入一个由紧急应付，转入在困难中探索前进谋求发展的阶段。与剧变时期比较，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全面低潮中有局部复兴，大挫折中有小的发展，外延缩小的同时有内涵的深化和质量上的提高。然而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是必然的，但它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

基于上述情况，可以说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已基本“走到”了谷底，但尚未“走出”谷底，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还将在低谷中波动。其长期走势呈“U”字形，而不可能是立即向上攀升的“V”字形。对共运形势我们过去习惯使用“低潮”、“高潮”的说法，严格说来，这一说法不大确切，带有浓厚的战争与革命年代的痕迹，与当前时代特点不大适应。在革命与战争的年代，“低潮”与“高潮”是频繁交替出现的。在当前和平与发展的条件下，因不具备革命形势，当前的这个“低潮”的态势，实际上是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历史时期。

“低潮”的提法应尽量少用，一般称“冷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或共产主义运动即可，这既包含了遭受过“挫折”的意思，又表示出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或时期。但是“低潮”的提法由于已用惯了，有时很难回避，因此也不是绝对不可以用，只是不要让人误解它是什么“即将来临的高潮的前奏”，助长人们革命与战争年代的思维定势，总去思考低潮与高潮的转换。这不利于理解我们党当前所实行的内外政策。

（二）理论上的反思和政策上的调整

苏东剧变后，各国共产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不同程度的反思，就一些理论政策问题广泛展开了讨论，并在实践中开始调整政策。

1. 执政的共产党，大多在总结国际国内正反经验的基础上，认真思考，积极探索，强调应独立自主地从本国实际出发，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上所述，越党认为越南还处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提出发展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由国家管理按市场机制运作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发挥“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老党认为老挝目前“尚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现在还处在“继续建设和完善人民民主制度”，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基本条件的阶段。古巴党强调在稳步的改革开放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朝鲜党在坚持“朝鲜式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内外政策上也有微小调整，如建立经济开发区，主张吸收外资等。

2. 原苏东地区仍坚持共产党名称的政党，在变化了的形势下，其理论、纲领和政策发生了变化。俄共党纲规定，党的阶级性是“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捍卫工人阶级、农民、知识

子以及所有劳动人民的利益”。党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是“以创造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公正、集体主义原则、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主张在多元化的政治制度下，循序渐进地和平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党在俄罗斯宪法、联邦《社会团体法》和其他法律范围内活动。在东欧地区，仍保留共产党、工人党名称的政党，有的虽宣称是原共产党或工人党的“继承者”，但一般已不再提“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专政”，有的党已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

3. 发达国家多数共产党的理论和路线以及组织原则等，早在苏东剧变前就发生了很大变化，苏东剧变加速了这种趋势的发展。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关于党的阶级性问题，除个别党继续保持传统提法外，其他党均宣布今天的共产党不再是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政党。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除少数党继续强调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外，普遍强调必须重视本国的一切进步思想和革命传统，应从实际出发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内生活原则，多数党均否定民主集中制是党内生活的根本组织原则，而强调党内民主、自由、多样性。关于党的作用，多数党认为不宜自称“领导党”。关于社会主义的道路，许多党表示，要摒弃苏联模式，强调社会主义要有民族特色，突出“民主”、“人权”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本因素。认为社会主义不应理解为一种“制度”，而应理解为向着更公正的社会迈进的一个“进程”，因此不再提社会主义“战胜”、“替代”资本主义，而提“超越”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

4. 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普遍认为过去犯了超越阶段的“革命急躁病”，主张从本国实际出发，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走

向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分阶段分步骤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阿拉伯国家共产党强调把“社会主义和实现阿拉伯统一”同时作为党的目标，纠正过去放弃民族旗帜谈社会主义的错误。关于斗争方式和革命道路问题，多数党认为，当前处于和平时期，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形式主要是和平方式。在拉美民主化进程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拉美地区正在领导武装斗争的党，也在通过与政府谈判，准备参加合法斗争。关于统一战线问题，普遍认为要“平等”联合而不强调“领导”；关于党的指导思想，强调要吸收本民族和世界各国的进步思想；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改提“劳动人民政权”或“人民民主政权”；关于国家政治体制问题，许多党不再提建立共产党的一党政权，而主张在多党制的框架内建立由共产党主导的政权。

此外，还有少数党思想僵化，或极“左”思想影响比较深。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只讲“坚持”，不讲“发展”，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一切改革看成是搞“修正主义”。这类政党和组织，大多是“共运大论战”以来成立的小组织。它们的共同点是“曲高和寡”，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很难发展，影响越来越小。

总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理论上的“革新”和政策上的“调整”已成为普遍潮流，但性质和方向不尽相同。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而是朝什么方向改，改什么和不改什么的问题。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看，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有效”，但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必须抛弃某些过时的观点和结论，实际上主张既坚持又发展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有介于上述两种倾向之间的，或这种倾向多一点，或那种倾向多一点的。我们认为，对在这种革新调整趋势中提出来的种种观点和主张，应认真研究，但仍应按照邓小平同志对待“欧洲共产主义”的态度那

样，允许探索，让实践去检验，不搞意识形态争论。

（三）发展的特点及其走势

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将继续向前发展，但由于整个世界形势和时代特征已发生了变化，其发展和复兴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而且会呈现出许多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新特点。

第一，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不会过去那种“一条道路、一种模式、一个中心、一个阶段”的发展，而将进一步走多样化、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化发展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必须同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会有生命力。过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说明，违背各党独立自主原则的统一的“领导中心”、“指挥中心”或“老子党”都是有害的，不利于这种“结合”。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经历的曲折又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既没有一个“统一模式”，也没有一个“固定模式”，社会主义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同本民族的特征相结合，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认为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其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①，他们在强调无产阶级事业的国际性时，并未排斥和否定各党的独立自主。列宁在强调工人运动的国际策略的统一性时，也没有否定各国各民族的多样性。上个世纪马恩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甚发展时期领导建立过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但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特别是世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之后，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8页。

格斯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世界太大、太广了”^①，统一的国际组织“难以应付越来越复杂的问题”，旧的组织形式“成为一种桎梏了”^②。因此他反对恢复旧国际，也不主张成立新国际。他说“这是愚蠢而徒劳的”^③，“在目前（1889年——引者注）搞这些组织，既没有可能也没有用处”^④，他们强调无产阶级事业的国际性、成立国际组织，都是以不损害、不束缚各党独立自主的发展为前提的。1920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曾指出：“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⑤

苏东剧变后的形势表明，各党独立自主的倾向进一步发展，更加强调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建设具有本国、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搞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越南搞的是“越南特色”，古巴搞的是“古巴特色”，还有“朝鲜式的社会主义”或“主体社会主义”等等。各国党在对本国发展阶段的估计上、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上，由于强调从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纠正了过去“左”的错误和估计，更是变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4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1卷，第26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41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7卷，第232页。

⑤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200页。

多种多样。事实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进入了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民族化发展的道路。

历史经验证明，各国的革命和建设主要靠本国的党和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等都是在没有国际组织、没有外来指挥和干预或是减少了这种指挥和干预的情况下，靠本国党和人民独立自主地取得胜利的。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早就尝到了苏联模式的苦果，多次酝酿改革，都被苏联给压下去了。非执政的一些共产党不是遭受苏共干预就是自己迷信苏共，影响了发展。苏东剧变，消除了这种外来干预因素，客观上又起到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有利于各党重新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有利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

第二，未来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出现过去那种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在过去战争与革命的年代，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常常是与战争相联系的。因为战争会激化国内各种矛盾，促使革命条件成熟，为革命党人变国际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创造条件。这已为世界近现代史所证明。1871年3月的巴黎公社起义，是在1870年7月爆发的普法战争使国内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发生的。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与这次世界大战密切相连的。毛泽东同志正是根据战争与革命之间的密切关系，加上他始终又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1968年曾作出这样的预计：“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

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① 后来的事态发展没有出现他预期的革命形势，主要是因为帝国主义打不起大仗。反之，如果帝国主义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由于人民对发动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的憎恨，由于各国国内阶级矛盾和斗争的激化，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种“社会制度大变动”的局面不是完全不可能出现的。因此，估量革命形势不能只考虑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形势，其实世界局势是战是和，对资本主义国内革命形势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总之，“战争”与“革命”有密切联系。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新条件下，爆发轰轰烈烈革命运动的可能性是大大减少了。

另一方面，就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条件看，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经济获得空前发展，生产关系进行了重大调整，虽然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但已不完全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等概念所反映的那种情况了。资本主义自30年代大危机后，以“罗斯福新政”为标志，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外，又增加了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国家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列宁当年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现在资本主义的国家，作为“总资本家”，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全面”地进行宏观计划、调控和干预。这样，在经济领域，就使资本主义变得不是完全无计划、无秩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在再分配

^① 转引自1968年3月4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文章：《无限忠于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一切阵地》。

领域，通过税收制度、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机制，调节了社会不公，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在政治领域，通过发展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制，使社会不满在平时有发泄之处，不致于积攒到矛盾总爆发的程度，实际上起到了“减压阀”的作用。这些变化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和寿命的延长。所以总的说来，当代资本主义还有一定发展余地。此外，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仍在两极分化，但由于生产的发展，工人生活状况有很大改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绝对贫困化”是相对的，而“相对贫困化”是绝对的。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差距在继续扩大，但就大多数人来说，现在不是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而是活得好一点或差一点的问题。这种情况就决定了当代资本主义难以出现列宁所说的“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的形势。在历史上，统治阶级总是害怕工人手里掌握武器。恩格斯说：在每次革命失败后，“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①。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没有这种革命的土壤，欧美国家老百姓手中的武器多得成灾，一些不法之徒用它搞绑架谋钱财而不反政府，统治阶级也不害怕被推翻。如果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像历史上那样艰难，革命要求如一堆干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民众手里的武器，组织几百万、几千万革命军都够了，根本用不着拿起菜刀闹革命。但问题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暴力革命的客观条件、群众基础和革命形势。

十月革命胜利后，欧洲国家的工人曾经仿效俄国工人攻打冬宫的方式举行起义，但没有成功。战后发达国家的一些共产党提出议会道路，70年代欧洲共产主义又将其全面系统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页。

但至今未取得重要进展和成果。资本主义国家究竟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看来还需要继续探索。但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由于时代历史条件不同，不可能照搬俄国或中国的道路，二是尽管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仍然有效的。这就是，要在其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及其规律，对传统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进行重新认识，更新旧观念，提出新思路。要认识和把握时代的潮流和主题，把争取社会主义理想的斗争扎根于各国的现实之中，扎根于各国人民争取民主、和平与幸福的现实斗争之中，并且要在现实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反复斗争，反复实践，不断经受实践的检验。

第三，未来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相当长时间内主要不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数量的增加，而主要表现在“点”的繁荣和“质”的提高，即中国等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用自己成功的实例来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以推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复兴。

从共运发展的历史长河看，从《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的150年间，以俄国十月革命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近70年，是从社会主义理论到实践，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70年；十月革命胜利后的70多年，是社会主义的实践从一国扩大到多国又遭到挫折的70多年。从现在至下世纪中叶即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这段时间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面”的扩大和“量”的增长可能性不大，主要靠社会主义搞成功的实例来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列宁说社会主义是榜样的力量，又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

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① 邓小平强调：“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② 剧变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不少，现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减少了，但如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实现了繁荣富强，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必将大大改善社会主义的形象，增加社会主义的吸引力，进一步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困。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③ 可以预期，到下世纪中叶，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发展起来了，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一定会是一番新的景象。

第四，共产党和社会党这两大类政党也许会结束过去的“长期对抗”的情况，从各自需要出发，求同存异谋求合作，实行“大左翼”不拘形式的联合。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而且不排除曲折和反复。

十月革命胜利后和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曾出现过社会党“共产党化”的倾向。80—90年代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形势却反转过来，出现了共产党“社会党化”的倾向。经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1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

过这场剧变，共产党力量下降了，而社会民主主义的势力却相对上升，除了老的社会党外，又涌现出一大批新社会党，社会党国际空前活跃。现在社会党国际有成员党和组织 142 个，党员近 3000 万（是除中国外现在世界所有共产党总人数的 3 倍多），在 30 多个国家执政和参政，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社会党国际曾长期对共产党采取敌对态度，70 年代提出“新东方政策”后，才开始松动。80 年代初又提出了“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谋求在和平与发展问题上与共产党对话和合作。在 1989 年开始的苏东剧变中，社会党国际由原来的“超越意识形态”与共产党谋求合作的方针，改为“突出意识形态”推行“改造共产党社会”的方针，这对苏东剧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9 年 6 月，社会党国际十八大通过的《原则声明》宣称：“共产主义已失去了十月革命后和反法西斯斗争中它一度对一部分劳工运动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吸引力。”“社会党国际支持旨在通过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造共产党社会的一切努力。”当苏东共产党政权被推翻之后，社会党国际主席莫鲁瓦兴奋地说：“共产主义的垮台使社会党人为其过去 70 年与之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所取得的胜利而骄傲。”

但是苏东剧变的直接结果并没有将苏东国家“改造”成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接替共产党执政的大多数都是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极右翼，不能算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胜利。另一方面，苏东剧变使西方各国舆论普遍向右倾斜，从而也使欧洲社会党处于不利地位。许多人将对共产主义的否定自然引伸为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贬责和摈弃。对此，不少社会党公开承认，苏东剧变既是机遇，也使“民主社会主义”面临“丧失信誉”的严峻“挑战”。因此，社会党国际十九大后，不少社会党已采用“社会民主主义”取代“民主社会主义”，有的

甚至考虑或已经更改了党名，以彻底甩掉“社会主义”的“包袱”。然而如果完全放弃其传统旗帜而与右翼政党完全趋同，也会脱离群众，丧失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发展的基础。总之，苏东剧变确实对社会党产生不小冲击，社会党的形象受到影响，各国社会党的影响及选票普遍下降。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党的政策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法国社会党在1993年3月立法选举中惨败而被赶下台，仅得到17.62%的选票和53个议席，比1988年立法选举减少15个百分点，丢失了近一半选票和200多个议席。长期参政的意大利社会党，主要领导人几乎都陷入丑闻，内部四分五裂，组织上处于瘫痪，在一次选举中只得了2%的票。长期执政的西班牙工社党因日益不得人心而不得不宣布提前于1993年6月举行大选。德国社民党主席易人。意社会党原总书记因丑闻被迫辞职后，上台仅几个月的总书记又因党内矛盾激化而辞职。凡此种种，集中地反映了西欧各国社会党的困难处境。

但是近两三年来，一些国家的社会党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态度，在各国的选举中又出现了社会党的力量开始回升的现象。法国社会党、德国社民党等一批国家的社会党又赢得了胜利。现在欧盟15国中，由社会党或社会党类型的政党执政或参政的占13国。

事实说明，社会党真把共产党都搞垮，就剩其与资产阶级右翼势力对峙，未必对其有利。这就是说，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虽有原则分歧，但实际上也有共同利益，应超越意识形态分歧，求同存异，谋求合作。

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与社会党的关系上，看来要把行

动上的“联合与合作”，与思想上的“趋同与融合”区别开来。在实际斗争中，共产党为求生存和发展，必须扩大联合与合作对象，必须与各种左翼力量（包括社会党、绿色组织和女权运动等）联合与合作，这是必然的趋势。为实现行动上的联合与合作，在思想、理论和政策上“求同存异”是必要的，有些问题上相互影响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在有些问题上相互借鉴也是有益的，问题在于如何避免在行动上联合与合作的同时，思想理论上也完全与社会党“趋同与融合”，以致共产党完全丧失自己的特性，而完全“社会党化”。看来，这是目前发达国家共产党普遍面临的一个共同性问题。

第五，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有可能由过去“不共戴天”进入一个既有矛盾和斗争，又可以相互借鉴和合作的新阶段。

(1) “全球两制”是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可能要经历若干世纪。资本主义虽不是人类“天堂”，但还有生命力，不会迅速全面崩溃；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但由于其优越性未充分发挥出来，还不可能速胜。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要在世界上共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曲折的历史过程。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艰苦奋斗。^① 总之，社会主义的“速胜论”与资本主义的全面“崩溃论”都是缺乏根据的。既然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看待和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就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性问题，其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生死存亡。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379—380页。

(2) 世界格局进一步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虽仍然是世界上一对基本矛盾，但它不是主要矛盾，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是由它来支配和左右的。

冷战结束后，长期存在的两极结构瓦解，军事对峙消失，经济因素增强，民族利益至上，集团意识淡化，意识形态因素下降，各大国优先考虑的是在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较量中本国如何占据有利地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和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虽仍是世界上一对重要矛盾，而且还将长期起作用，但这对矛盾对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已不能起主导和支配作用，因此不能看成是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如果仍按昔日的观念，主要从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形势并据此处理国内外事务，就会干扰和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处理对外关系中也会发生失误。苏东剧变后邓小平同志就及时地指出：“……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①这就使我们党避免重犯历史错误。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所说的：“在历史上，由于没有能够清醒对待国际国内某些事件，我们有过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严重教训。这十四年，尽管国际国内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重大事件，我们都没有动摇这个中心，今后还必须坚定不移地这样做。”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321页。

近年来的形势发展证明，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是正确的。国际局势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充满矛盾，天下并不太平，但世界加速向多极化发展，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国际和平环境可望继续保持，我国仍有可能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在苏联这个对手消失后，西方凝聚力下降，西西矛盾明显上升。与此同时，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的作用明显增强，本国本民族利益至上日显突出，集团意识、意识形态因素相对下降。世界各国看好中国市场和经济发展前景，这增加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回旋余地。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加快，香港回归、澳门即将回归，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稳定发展，这一切给我国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尽管我国仍面临发达国家经济科技优势的的压力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西方某些固守冷战思维的人不愿看到中国的强大，总是想方设法对我国进行牵制，但有远见卓识的人越来越多，中美关系又取得新发展，总体形势对我国有利，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有利。

(3)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虽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相互借鉴和合作的一面，二者不可偏废。要以对立统一观点处理好这种关系。

所谓矛盾的一面，集中在“演变”与反“演变”的问题上。西方“西化”、“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目标是不会改变、不会放弃的。对此不可麻痹大意、掉以轻心，但搞不搞“和平演变”在西方，变与不变在社会主义国家自己，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国内的工作做得好，西方“和平演变”攻势再强也奈何不了我们。因此这个问题的重点和关键还是在国内。在这个问题上有时与西方进行必要的斗争是不可少的，但不能因此影响对外工作的大局。国内反“演

变”的工作要求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加强思想教育；而在对外工作中却不能突出强调意识形态差异，不能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论亲疏，否则就正国际上坚持冷战思维的人的下怀。他们在国际事务中不顾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划线，实行双重标准，反对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国际交往中应主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应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一定要把反“演变”与国际交往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区别开来，分别对待。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除了矛盾的一面，也还有相互借鉴和合作的一面，冷战结束后这一方面的可能性增大了。西方国家从与中国打交道中已体会和认识到，今天的中国与当年想推行“世界革命”和后来又与美国“争霸”的苏联不同，不能对其实行“遏制战略”。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尊重别国人民的选择，不干涉别国内政，不搞输出革命，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对西方不构成威胁。这些国家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同一切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这一切是符合世界人民包括发达国家人民的利益的。美国朝野人士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对中国不能搞“遏制”，而应奉行“接触”政策，这符合美国的利益。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来说，由于摆脱了“左”的思想束缚，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国内的建设离不开世界，从而调整思路和政策。这两方面的因素，使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出现了相互借鉴和合作的势头日益增强的趋势。

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既有否定也有继承和发展，因此离不开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实践表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是存在相互借鉴的关系的。资本主义不仅在经济方面学了社会主义的计划方法，资本主义这样做，并未使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同样，社会主义在坚持社会主义前提下，借鉴和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也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而只会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列宁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并且说：“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强调要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总之，为了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全面地认识和处理好同资本主义既矛盾斗争，又彼此借鉴合作的关系，二者不可偏废。

五、社会主义道路曲折但前途光明

世界共运的历史，特别是近年发生的苏东剧变，说明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曲折的。这种曲折性比过去共产党人想象的要漫长复杂得多。但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性，绝对改变不了社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70—171、252页。

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总趋势。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1. 既不要忽视“两个决不会”又要坚信“两个必然”。

马恩在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即通常所说的“两个必然”），不言而喻是就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言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至于这种“取代”如何实现，他们的唯物史观则认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这就是体现唯物史观的“两个决不会”。“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都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我们既不要忽视“两个决不会”，又要坚信“两个必然”，做坚定而清醒的共产主义者。

在世界共运史上，伟人们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形势，对资本主义的灭亡有时估计得不符合实际，但他们后来迅速纠正了自己的看法，同时又始终坚信“两个必然”。恩格斯早在1895年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谈到1848年革命爆发前认为“很快就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观点时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页。

业，而在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张能力。”^①在这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还具有很大的扩张能力”，但决不意味着他对《宣言》提出的“两个必然”有任何修改。列宁也曾对世界革命形势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后来进行了调整，但这也不意味着他对“两个必然”有任何修改。邓小平认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但是他同时指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总趋势“不可逆转”，“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②他们是做坚定而清醒的共产党人的典范。

2. 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就永远有其存在的土壤。

资本主义并不是人间“天堂”，它不可能永世长存，从苏东剧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看，社会主义仍然活在人们的心里。

首先，共产党人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探求。他们在苏东剧变后，普遍开展了思想理论上的反思，在吸取苏东剧变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本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近年来世界一些共产党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总结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正在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如1993年印度共产党（马）在加尔各答召开了“当代世界形势和马克思主义有效性”国际研讨会，1994年3月美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51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383页。

大陆 16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墨西哥城召开了国际研讨会，1994 年 12 月中东、地中海以及前苏联地区的 28 个共产党和左翼政党的代表，在塞浦路斯的拉纳卡市举行了地区性国际会议。此外拉美地区共产党和左翼政党组成的“圣保罗论坛”，自 1990 年以来每年都举行一次年会，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就政策策略广泛交换意见。这些会议上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苏东剧变只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的失败，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世界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需要丰富和发展，但其基本原理仍然有效。

其次，世界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和人士仍在研究和预测社会主义的未来，这表明社会主义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现实问题。西欧一些社会党人在 1990 年创办了《未来的社会主义》国际论坛，讨论和预测社会主义未来的命运和面貌。美国纽约《每月评论》社 1990 年出版文集，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第一批斗争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获得成功，但历史不会倒退，它将宣告社会主义——不论以什么名义——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时候不会灭亡”。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 1993 年以“社会主义的新模式”为总题目，发表美、英、法等国学者论述社会主义问题的文章，探索既区别于“苏联共产主义模式”，也区别于“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社会主义新模式”。该杂志编辑部评论说：“如果因为苏联‘共产主义’体系的失败而将社会主义弃之如敝屣，那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目前社会主义还是一片小树林，但却充满生机。”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进步人士对资本主义进行尖锐批评。尼加拉瓜一位叫卡德纳尔的神父，1994 年在墨西哥《美洲纪事》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新闻界得意洋洋地在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的失败，但是他们不提资本主义的更大的失败。资



Congrès Marx International
Cent ans de marxisme - bilan critique et prospectives

这是1995年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一届“国际马克思大会”的张贴广告。1998年9月举行了第二届大会，2001年还要举行第三届。

本主义只在世界10%或20%的人口中取得了成功。对于第三世界，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来说，资本主义是灾难性的，而资本主义的失败先于社会主义的失败。我们可以作如下区

分：失败的是虚假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真实的社会主义；相反，失败的资本主义是真实的资本主义而不是虚假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失败是因为没有实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失败是因为实现了资本主义。”哥斯达黎加大学一位叫加利亚多的教授1991年发表题为《历史性社会主义的危机：意识形态与挑战》的著作，尖锐地批评美国人福山写的反共著作《历史的终结》。作者说：“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活在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中，活在他们的痛苦和意识中，哪怕有时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斗争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

第四，近年来西方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人们对西方社会的不满情绪在增长，由“福利国家危机”引发了“信仰危机”和“精神道德危机”，已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上层人士的忧虑。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其生前的最后著作《超越和平》中有一段惊人之语：“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首先要解决的国内问题不是就业，不是医疗保健，不是财政赤字，而是精神和文化的堕落。这是困扰美国的一切问题的根源。”美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则在新作《重振美国》中指出，美国面临两大威胁，其中一个就是文化上的，美国正在从内部腐烂，因为人们拒绝接受曾经使这个国家强大起来的价值观、传统和制度。德国《时代》周刊1996年10月25日刊登的文章，认为“法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虽然接受资本主义，但他们在内心深处不信任资本主义”。

第五，马克思主义仍活在人们的心里。1996年伦敦出版界传出爆炸性新闻，《共产党宣言》因销售量之大而进入英国畅销书行列。据说148年前的这本经典著作卖得如此红火，是因为不少英国人觉得资本主义并不如想象的好，因此想看看另一方面的理论。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资本主

义不少国家的左翼人士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美国费索出版公司重新出版《共产党宣言》，印了两万册，在纽约、伦敦同时发行。《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卡尔·马克思无形的手》的长篇文章，认为马克思不仅对当代社会主义，而且对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影响。法国“马克思园地”协会（前法共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发起的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国际会晤于5月在巴黎召开。它得到56个国家学者的赞助，有60多个国家的1500人参加。巴西在全国工会组织“工人统一中心”的支持下成立了纪念《宣言》发表150周年筹备委员会，在里约热内卢等地开展了一系列以《宣言》为主题的研讨会，并出版发行50万册《宣言》普及本。此外，美国、芬兰、匈牙利、黎巴嫩、以色列、埃及等国也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在苏东剧变刚刚发生不久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人们对《共产党宣言》的这种热情，说明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它仍然深深地活在人们的心里。总之，资本主义并不是人间“天堂”，人们总是希望有一个比资本主义更理想的社会。因此只要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思想就永远有其存在的土壤。正如《宣言》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3. “和平与发展”的当代世界主题没有改变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我们长期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人类社会开始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渡。战后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前时代的主题已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

展”。那么如何认识当前所处的时代？“和平与发展”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究竟是什么关系？

“时代”是一个内涵丰富适应领域很广的概念，人们往往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标准使用这个概念。人有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人类历史从科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划分有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等；从社会制度划分有奴隶时代、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等。在每个大的时代中，又包括若干小时代或小阶段。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指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从十月革命开始的这个大时代没有改变，即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没有改变。但是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为特征的那个小时代或小阶段已经结束了，已明显地让位于当前所处的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这个（小）阶段。当今“和平与发展”这个小阶段（或小时代）与过去“战争与革命”那个小阶段（或小时代）相比，虽然阶段性主题和特征已改变了，但仍然同属于世界历史进程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这个“大时代”中相互衔接的小阶段。这就是说，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这个大的历史时代，由于跨越的时间很长，并非总是表现为“战争与革命”。随着世界现实情况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呈现不同的阶段性，当前是“和平与发展”，至于今后，也许还会有别的什么主题和特征。

总之，大的历史趋势、大的历史时代，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内容没有变，我们仍要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不动摇；但时代的阶段性主题变了，已由“战争与革命”变为“和平与发展”，因此党的工作中心、重心和方式以及战略和策略也随之改变了。人们讲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时，不会忘记这只是人类从资本主

义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这个大时代中的阶段性主题和特征，因此仍要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继续坚持社会主义，不迷失大方向。在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共产主义理想时，又要摆脱战争与革命年代的某些旧观念的束缚，把握好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和特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因为这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在当前的必由之路。正确认识“历史大趋势”与当代“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更好地坚持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做到既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长期曲折性，决不会使坚定的共产党人和追求理想社会的人们丧失信心，而只会激发起他们为实现最高理想奋斗不息。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前的最后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讲过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他号召全党发扬愚公子孙孙挖山不止的精神，去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结果继续奋斗了几年，取得了全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现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这比中国革命要漫长、艰巨和复杂得多。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①有人说，这是不是估计得太长了？我们认为：不！小平同志就是怕后人“掉以轻心”，形势好了头脑又发热，忘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长期曲折性。信念坚定的人们一定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子子孙孙奋斗下去！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380页。

苏东剧变给社会主义造成大挫折，但这只是暂时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①与苏东剧变的大挫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进入了新阶段，开创了新局面，给社会主义又带来了新希望。

站在世纪之交来观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说苏东剧变造成的“大挫折”已永远地留在了20世纪，中国等国家开创的“新局面”将会在21世纪变成繁花似锦的春天。“大挫折”只意味着过去，“新局面”却代表着未来。死亡了的是僵化的一种社会主义的旧模式（体制），新生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片新绿洲。改革给社会主义的大船装上了新马力，开放将社会主义的大船引向了广袤无际的大洋。尽管航程上布满暗礁险滩，有马克思主义领航，社会主义的大船定能驶达人类美好明天的彼岸。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

第 1 章

史无前例的“政治地震” ——苏东剧变的过程及其原因

苏东剧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是 20 世纪震撼人心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从 1989 年东欧国家剧变开始，到 1991 年底苏联解体基本结束，大体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在“改革”的旗号下发生的这场“政治地震”，从本质上看既背离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否定和毁掉了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果，又未能实现什么“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它不是什么“改革”，而是“改向”，即实质上“回归”资本主义。

这场政治动荡的结局是：执政的共产党下了台，或虽未下台但已改变了名称和性质。于是普遍兴起了更改党名、国名、国旗、国徽的浪潮，结果党变了质，国变了色。经过动乱、

演变、分裂和重组，苏联东欧地区原来的9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27个至少在价值取向上已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从而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结束了二战后长期形成的雅尔塔格局。

苏联作为有70多年历史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外国武装干涉、经济封锁、世界大战都未能把它摧垮。不仅如此，它还由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发展成经济、科技、军事强国，能与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相抗衡，并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联成一片，曾经红红火火地形成过强大的“阵营”。然而，为什么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场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其历史教训究竟是什么？

一、戈氏“新思维”

苏东剧变是由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引爆的。戈尔巴乔夫对东欧国家“改革”的支持和赞许态度，与西方反共势力一起对东欧的剧变起了催化作用。而东欧国家的剧变又反过来影响苏联政局的发展，最后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因此，要探讨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就不能不从戈氏的“新思维”谈起。

（一）“新思维”出台的背景

戈尔巴乔夫1985年一上台就举起了“改革”和“新思维”两面旗帜。他的改革是在新思维的驱动下进行的，他的新思维

又是为改革而提出的，两者关系密切。因此，人们常将其统称为“改革新思维”。

“新思维”这一术语并非戈氏的创造、发明，它最初是由前外长之子、苏联科学院非洲所所长阿·安·葛罗米柯等人提出的。1979年初他与人合著了《核时代的新思维》一书。同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英国访问时接受了这一提法，称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和和平的性质，因此“核时代必然要求人们有新的政治思维”。1985年3月戈氏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在其讲话、文章和著作中频频使用“新思维”的概念，苏联其他领导人和学者也随即发表了大量文章和讲话，召开各种研讨会，由此“新思维”由最初的一般主要指对外关系演变成主要指政治思想方面的新思维，并不断泛化，出现了“政治新思维”、“经济新思维”、“军事新思维”和“外交新思维”等概念。“新思维”后来进一步演变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新思维”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对当时苏联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特别是苏联国内长期积累的问题和矛盾的反映。众所周知，苏联在其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捍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使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雄踞于世界。另一方面，作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十分落后的帝俄的废墟上建立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自身的发展也充满着曲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弊端和失误，需要进行改革。“新思维”是适应改革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在国际上，苏联因推行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而空前孤立，而且同美国的激烈军备竞赛，使得苏联元气大伤，国力已无法支撑。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被迫采取全球收缩的战略，“新思维”最初针

对对外关系提出也绝非偶然。

(二) “新思维”的发展及其核心和要害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随当时苏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呈现出两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5年3月戈氏上台到1988年5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前夕。这一阶段总的来说戈氏的“改革新思维”没有超出“完善社会主义”的范围，但已有明显的人道主义倾向。如他在苏共二十七次政治报告中称，“人的尊严、真正的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扩大公开性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党把进一步完善和发扬民主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人民自治体系看作是国内政治中的一项根本任务。”

第二阶段从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开始，戈氏的“改革新思维”演变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理论成为戈氏错误改革路线的理论依据，也是导致苏联改革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以至最终失败的思想根源。

综观“改革新思维”发展的全过程，其核心内容和要害是：

第一，鼓吹世界进入了“核太空时代”，“全人类共同利益高于阶级利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在西方“和平演变”面前麻木不仁，彻底解除了思想武装。

戈氏上台之后，对当今时代和世界形势提出了一些“新的”思维和观点。1986年2月他明确提出：“现时代的特点是核威胁在增强”，“核武器孕育着龙卷风，它将使人类从地球表面消失”。1987年11月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进一步

强调：由于人类已拥有核武器和太空武器，一旦爆发世界战争，人类将会毁灭。这一恐怖的现实使得整个人类不分阶级地同坐在一条船上，或是一同生存，或是同归于尽。因此，“人类的共同利益高于一切”，并称这是其“新政治思维的核心”。

对当今时代是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观察，并概括其特征的。比如说，从军事技术上看的的确是核时代，但从经济上看，也可以说是经济向全球化发展的时代；从政治上看是多极化在发展，但霸权主义未寿终正寝的时代；从人类社会的发展看，又可以说，虽然世界的主题已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但人类由十月革命开始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并没有改变。虽然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地球“缩小”了，人类像生活在一个村子里——“地球村”，彼此联系密切、相互依存，共同利益增大；但尽管如此，当前仍然是民族国家的时代，不仅南北间仍很不平等，而且不同阶级利益的斗争仍很尖锐。对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仅仅从军事技术的角度去观察，是片面的、脱离实际的。当今世界关系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很多，将其仅仅归结为一个“核毁灭”问题，至少是过于片面和简单化了。

在人类相互依存日益加强的今天，的确应重视人类的共同利益，加强国际协调和合作，但是绝不能抛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一味宣扬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因为世界的现实是，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之间的斗争仍非常尖锐；超级大国并没有、也不会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们首先考虑的还是本国、本民族、本阶级的利益；他们不愿意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利、不愿意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就是证明。这是其一。其次是，“人类共同利益”是一个多维的复合体，不能将其简单地归结为仅

仅是一个“核毁灭”问题。和平问题、核战争威胁问题，诚然是威胁人类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但它不是“唯一的问题”，除此还有发展问题、南北关系问题、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反对霸权主义的问题等；这些都是关系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而这类问题又都涉及一定国家、民族、阶级的具体利益，因此矛盾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再次是，即使就核战争威胁这个问题而言，也不是核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核大国的核威胁、核军备竞赛的政策在威胁着人类。这就是说核大国要把全人类共同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就必须改变其错误的政策。从本质上讲，“核毁灭”、“核威胁”问题，是反对霸权主义的问题。因此，尽管人类已进入核时代，只要全世界人民加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迫使核大国不使用核武器，并承诺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人类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说戈氏“新思维”强调“全人类共同利益”是为了放弃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同西方搞“缓和”，这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特别是阶级分析的观点，其危害是非常严重的。

总之，这种脱离现实的判断，一方面把存在核武器同核战争必然爆发联系在一起，否认世界进步人类、特别是掌握了核武器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信心、有能力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另一方面借口核战争威胁，渲染核战争恐怖，把抽象的人类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现实，抹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步人类和与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极其有害的。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苏共解除了思想武装，对西方的“和平演变”阴谋熟视无睹，不能不说是苏东社会主义政权迅速崩溃的重要原因。

第二，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否定斯大林体制、抹杀苏联

70年的社会主义历史，最后导致丑化和全面否定整个社会主义制度、鼓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全面摧毁社会主义成果提供了理论依据。

戈氏没有把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其采取的具体模式（即政治经济体制）区别开来，因此对苏联70多年具体制度、体制的批判变成了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彻底否定。的确，斯大林模式是存在严重问题的，是必须批判和纠正的，否则社会主义就没有前途。但是斯大林以来苏联的社会制度并非一无是处，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斯大林以来的基本制度笼统地称为“专制官僚制度”予以否定，势必得出苏联70年社会主义的历史一无是处，只能被彻底推翻的结论。在此基础之上，戈氏又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将其提升为党的纲领性目标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就为苏联东欧的“改革”变成“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鼓吹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将其作为“三大革命性倡议”推至极端，为反对派反共反社会主义大开了绿灯。

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发扬，法制必须健全。但是戈氏无视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界线，将“民主化”推向极端，导致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迅速向西方式多党制演变的结果。他把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并称为他的3大“革命性倡议”，强调在历史和现实问题上不存在任何“禁区”和“空白点”，主张实行“最大限度的公开性”。同时，又把“多元化”当作是实现民主化和公开性的重要内容，最后决定实行多党制。1990年1月他宣称：“我们不应像魔鬼害怕烧香一样害怕多党制……即使实行多党制，也不是什么悲剧……它是作为正常的历史进程的结果而出现的，是符合社会需要的。”在苏联当时特定的条件下，这就为反共、反社会主义

势力的发展开了绿灯。

（三）“新思维”的实质及其后果

“改革与新思维”实际上是一种庞杂的思想体系。它以对时代所作的错误判断和抹杀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历史为前提，以“全人类价值观优先”为核心，以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3项“革命性倡议”为先导，以否定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共产党的领导为主要内容，以“彻底改造”苏共为主要目标，以抽象的人道主义、全人类价值观为主要理论基础，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和重要思想来源，其实质是对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政党、人民民主专政等基本原理的修正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

“改革与新思维”作为苏共的指导思想，其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事实表明苏联的演变和解体是从苏共的演变开始的，而苏共的演变又是从党的指导思想的演变开始的。有人说苏联的演变和解体有过两次，一次是在思想上，即戈氏的新思维搞乱了苏联的意识形态，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另一次是在这一思想的误导下，苏联在现实中的解体。思想上的解体是苏联解体的前奏，这话不无道理。连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也公开承认，戈氏新思维的“严重危险在于瓦解了世界共产主义共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克里姆林宫出现一位修正主义的总书记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首先“丧失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使得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从而最终导致了共产主义的“大失败”。

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有许多错误和严重问题，但其基本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它的具体制度有

许多严重的缺陷、失误和不足，因此不仅不能将“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教条化、神圣化，而且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得以完善和发展。但是戈氏的思想和作法是“泼脏水时连孩子一起倒掉”。戈氏采取全盘否定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把苏联社会主义历史描绘得一团漆黑，说苏联的整个制度是“异化的社会主义”、“扭曲的社会主义”，甚至宣布它“不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它进行“彻底更新”，要“摧毁它”、“炸毁它”，从而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依据。国外一些评论说：“在5年的时间中，由于片面地、完全否定地把党和国家的百年历史说成集权政治，从而为反共提供了和继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为数不多的党和国家的历史才被这一种颜色涂染。……如果说以前对事实的歪曲来自国外的反共势力，那么现在则是由苏联的主要报刊杂志和往往是知名的党员通过苏联电视台提供的……所有极端分子——从民族主义分子到反共分子——都充分利用了公开性及其没有限度这一点。在美国，无论报刊还是电视都不是像苏联目前那样‘自由’（不负责任）。摆锤从以前对舆论工具的严格监督摆向另一个极端。目前许多主要的苏联报纸和杂志上的反共内容比美国报刊多，某些电视台也是如此。此外，这种反共要巧妙得多，因为它建立在对党和国家历史‘内容’了解的基础上。从这一点看，苏联目前是反社会主义、反苏、反共宣传的最‘权威的’发源地。”

戈氏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造成了无政府主义泛滥、社会动荡，是最终导致苏共瓦解、国家解体的直接原因之一。法国《费加罗报》说戈氏开辟的“通往民主的道路”是一条“通往动乱的道路”，“戈尔巴乔夫迫使他的党选择了自杀”。当时布热津斯基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发表文

章说：由于戈尔巴乔夫选择了“要民主化混乱而不要实行镇压的暴力”的道路，苏联境内各种各样的组织和民族沙文主义势力正在“纷纷应运而生”，苏共影响力进一步下降，5—10年内苏联将不复存在。结果事态的发展比布热津斯基的推测还要快，两年时间苏联就不复存在了。《巴黎日报》刊载的苏联问题专家弗朗索瓦兹·汤姆的文章认为，“苏联自我毁灭是直接由戈尔巴乔夫导演的”。所谓戈尔巴乔夫时代就是“打一场消耗战的时代”，它首先消耗苏联财力，然后消耗苏联制度本身。戈尔巴乔夫的助手瓦·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说：“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

对东欧，戈尔巴乔夫所采取的办法是：一方面在东欧各国积极兜售“新思维”，鼓励他们进行“改革”，搞“民主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为迎合西方的需要，在东欧局势最危机的时候，戈氏一再向布什保证：不向东欧动武，不干涉东欧各国的内政，使西方放心。1990年2月9日，匈牙利《人民之声报》一篇文章这样写道：“戈尔巴乔夫的政策是推动东欧积极变革的力量和重大的因素。”法国《快报》周刊的一篇题为《东欧剧变的引爆火星来自莫斯科》的文章也称：“有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使鞭打快牛不大可能出现的革命变成了可能。”

总的说来，苏东剧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复杂的问题不能作简单化的结论。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确起了引爆作用，其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二、东 欧 剧 变

1989年被国际舆论称为“东欧年”。这一年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局相继发生了空前剧烈并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其程度之激烈、速度之快、波及面之广完全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一) 波兰的剧变

波兰的剧变始于团结工会东山再起。在经济停滞、国家处于困境的形势下，团结工会组织多次全国总罢工，逼迫执政党妥协让步。在1989年春召开的波兰各党派参加的“圆桌会议”上，决定于6月举行议会大选，结果团结工会在选举中获得大胜。9月新组建的波兰政府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由非共产党人领导、共产党人占少数的政府。随着波兰统一工人党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党内思想混乱加剧。1990年1月27日，该党在华沙召开十一大（即该党最后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停止活动的决定。多数代表决定把党改建成“社会民主党”，少数人组建了“社会民主联盟”。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消失，标志波兰剧变的完成。

波兰由于经济形势恶化，1988年国民收入只为1978年的

99.3%；难以忍受的债务负担以及长期的商品匮乏、供应紧张，使波兰处于困境。1988年4—5月和8—9月爆发了两次工潮。在同年6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七中全会上，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代表政治局第一次提出了举行“圆桌会议”的主张。后来又表示不排除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参加“圆桌会议”的“可能性”。

波兰的演变与波兰团结工会的沉浮直接相关。1980年以波兰政府大幅度提高副食品价格为导火线，波兰爆发了全国性的大罢工，波兰团结工会应运而生。随着其组织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它的活动和要求也日益广泛，从开始时单纯组织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到提出一系列政治要求。1982年波兰团结工会被正式取缔，被迫转入地下。1983年波兰结束历时19个月的军事管制后团结工会又重新活跃起来。它利用波兰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群众的不满情绪，于1988年5月和8月组织了两次全国规模的大罢工，导致梅斯内尔政府引咎辞职。处于困境中的波兰当局被迫同意与团结工会举行“圆桌会议”。

“圆桌会议”1989年2月6日召开。由波兰统一工人党、民主党派、官方工会、团结工会以及教会、其他反对派组织代表共57人参加。经过两个多月的讨价还价，会议通过了《关于工会多元化的立场》、《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关于社会和经济政策及体制改革问题的立场》3个文件，会议还就宪法修正案、总统选举、议会和参议院选举法、席位分配等问题达成了协议。

波兰团结工会的东山再起成为波兰政局演变的关键一步。1989年4月17日，拥有200万会员的团结工会在华沙法院获准登记。瓦文萨在圆桌会议之后公开说这是团结工会“在政治上取得的一个胜利”。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波兰当

局在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情况下，放弃原则、步步退让的结果。波兰统一工人党对反对派的力量估计严重不足，以为用妥协、让步的办法就可以把反对派拉过来，这样既可使西方取消制裁，又可以缓解国内政治危机，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团结工会非但没有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设想中的“建设性的反对派”，反而得寸进尺，欲从执政党手中夺权。

根据“圆桌会议”精神，1989年6月4日和18日，分两轮进行了波兰议会和参议院选举。第一轮选举结果，以波兰统一工人党为首的执政联盟遭到重大失败，以团结工会为核心的反对派获得胜利。执政联盟在议会按比例分配的299个席位中，只赢得5席，在参议院100个席位中未获一席。与此相反，反对派却一举拿下议会中按比例分配给无党派独立人士自由选举的161个席位中的160席，并在参议院中赢得了100个席位中的92个。经过这两次投票，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在议会中的力量对比已基本旗鼓相当，而在参议院中波兰统一工人党无一席之地，形成了团结工会一家独霸的局面。

议会选举之后，总统、总理的人选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争执的焦点。接下来雅鲁泽尔斯基以如当选就辞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的承诺才于7月19日在议会中以仅比半数多一票的微弱多数当选总统。1989年7月29日雅辞去波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总理拉科夫斯基接位。波兰统一工人党随即推荐中央政治局委员、内务部长基什查克为政府总理候选人。1989年8月2日，波议会选举基什查克为总理。但由于团结工会的强烈反对，加之战后45年一直与波统一工人党联合执政的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倒向团结工会，使得组阁问题日趋复杂化，新政府迟迟组织不起来，8月17日基什查克被迫辞职。8月19日，雅鲁泽尔斯基推荐瓦文萨的顾问马佐维

耶茨基为总理候选人。9月12日议会正式批准了新政府的组阁名单。在新政府的23名州总理和部长中，团结工会方面有12人，工人党和统一农民党各4人，民主党3人。这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的第一个由非共产党人领导，共产党人在政府中居少数地位的政府。这标志着波兰政局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由非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它开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向反对派让权的先例。有人称这一事件为二战后东欧历史的分水岭，因为它将要改变战后欧洲的雅尔塔体制。



波兰团结工会马佐维耶茨基任总理的政府成立，
这是战后东欧第一个非共产党领导的政府。

团结工会上台执政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处于异常困难的境地。全党对政治环境、形势的发展如此迅速，变化如此巨大缺乏思想准备。加之1989年秋天东欧其他国家的剧变更加促使波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和纪律松弛，波党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1990年1月27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华沙召开十一大（即最后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停止活动的决

定。多数党员主张“维护左派队伍的团结”，决定成立“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费什巴赫等少数人组建了“社会民主联盟”。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消失，标志波兰剧变的最终完成。

（二）匈牙利的剧变

匈牙利的剧变始于党内。由于执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发生严重分歧，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激进改革派”占据了优势，决定实行多党制。1989年初党内分歧公开化，在“激进改革派”的攻势下，党的总书记格罗斯公开表示：匈党“不仅支持、接受多党制，而且还全力以赴提倡多党制”，迈开了自毁长城的第一步。在这一决定后，其他各种组织迅速活跃壮大起来。在1989年6—9月各党派和组织参加的长达3个月的“圆桌会议”上，执政党被迫同意在宪法草案中不再写入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等内容。1989年10月7日匈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十四大，决定将党改建为“社会党”，原来的党分裂成几个党。10月18日匈牙利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修改了国名，并取消了原宪法中有关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政党领导作用的条文，标志着匈牙利党变质国变色。

匈牙利是东欧各国最早实行改革的国家之一。从70年代中期起，受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匈改革停滞不前，危机加

剧。为摆脱困境，匈社会主义工人党于1988年5月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多元化、政治民主化的纲领，即在“一党制条件下实行多元化”，并对党的最高领导层进行了大换班。卡达尔时期的党政高级领导人几乎全部下马，卡达尔本人只担任荣誉性的党的主席一职。匈政府总理格罗斯当选为党的总书记，以波日高伊为首的一批“激进的改革派”进入了党的最高领导层。这两项重要变化不仅标志着匈党分裂的正式公开化，也拉开了匈党自毁长城的序幕。

1989年党内分歧进一步公开化。1月党内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政治局委员、政府国务部长波日高伊擅自发表广播讲话，宣称匈牙利要实行多党制、要为1956年匈牙利事件平反等，造成了党内的混乱和分歧的公开化和尖锐化。波日高伊在接受匈牙利电台记者采访时擅自称：简单地把1956年事件称为反革命事件是“站不住脚的”，它是“一切反对当时正在使国家蒙受耻辱的寡头政治的人民起义”。波氏的这一讲话立即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党内分成了意见相反的两派，气氛紧张。为统一思想、避免分裂，匈党中央在2月10—11日召开了全会，最后通过了妥协性的公报，称1956年事件是“人民起义”，但在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反革命分子利用这一事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这表明匈党的立场与以前相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党的总书记格罗斯等人迫于形势不断妥协退让，从而使波日高伊等人的主张在党内逐渐占居多数。5月全国党代会后，匈党内围绕多党制和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分歧进一步尖锐化、公开化。波日高伊等人认为应“尽快实行多党制”和“确立三权分立的西欧型议会”。格罗斯等人开始并不赞同波日高伊的

看法，但接下来被迫做了让步。他后来公开表示：匈党“不仅支持、接受多党制，而且还全力以赴提倡多党制”。6月23—24日，匈牙利社工党召开中央全会，决定于10月提前召开代表大会，并决定大会前由涅尔什（政治局委员、政府国务部长）代替已被免职的卡达尔担任党的主席，并由涅尔什、格罗斯、内梅特（总理）和波日高伊四人组成主席团，主持党的工作。这样，在党的领导层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也占据了优势。

与此同时，匈社会上各种政治组织、反对派利用各种手段加紧向匈社会主义工人党施压。在6—9月长达3个月的“圆桌会议”，有匈社工党、9个反对派组织和7个社会组织参加。在会上匈社工党代表几乎接受了反对派组织提出的一切条件，同意在宪法草案中不再写入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内容，并就一党制向多党制过渡和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大体达成协议。1989年10月6日，匈社会主义工人党十四大发生严重分歧。会议的第一天就分成7派，以后又分成了9派。其中最大的派别是波日高伊为代表的“改革纲领派”，有近600名代表。其次是“人民民主纲领派”，有近300名代表。这两派以“彻底改造党”为目的进行联合，完全控制了会议的主动权（会议代表共有1276名）。代表大会的第二天，即10月7日，“匈牙利社会党”宣告成立，并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9日，选举出社会党主席团，原匈社工党主席涅尔什·雷热当选为社会党主席。匈社会主义工人党正式分裂。12月中旬，原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部分党员重新召开代表大会，选举蒂尔迈尔·久洛为重新组建的匈社会主义工人党主席。10月18日，匈牙利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修改了国名，并取消了原宪法中有关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政党领导作用的条文，标志着匈牙利党变质国变色。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989年10月7日召开的代表大会，1202名代表中，有1005人举手赞成将党改为社会党。

(三) 捷克斯洛伐克的剧变

捷克斯洛伐克的剧变始于为“布拉格之春”平反而由反对派掀起的政治风潮。政府对示威游行曾采取镇压和逮捕的办法，但没有奏效。持续的危机使党内分歧激化。党内“改革派”造了“元老派”的反，迫使捷共领导班子全部辞职。新的领导与反对派进行对话，实行步步退让，同意取消《宪法》中有关党的领导

作用和以马列主义原则为指导的条文。后执政党在选举中失利，丢失了政权，接着又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纲领，改变了党的性质。1990年宪法确定删除国名中“社会主义”字样，改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1993年1月1日又分裂成“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两个独立的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的剧变是由要不要为“布拉格之春”平反所引发的。所谓“布拉格之春”是指1968年捷共当时的第一书记杜布切克等人掀起的一场改革运动。捷共当时制定的《行动纲领》包括改革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国家政治体制、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等内容。尽管计划不一定那么周全、细致，但这是试图突破“苏联模式”，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尝试。可是它后来被苏联当成“反社会主义”事件以军事入侵镇压了。随着苏共承认社会主义的多样性、表示不应干涉东欧内政以来，重新评价这一事件已提上了日程。首先是苏联方面已表示要“重新评价”。捷克国内舆论也强烈要求平反。可是捷共雅克什等领导人因为是苏军入侵后上台的，他们把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平反看成是自己政治生涯的完结，仍坚持原来的立场，拒不平反，于是使自己陷入了不能自拔的被动境地。而反对派则利用这个问题，把它与反对捷共和社会主义事业结合起来，获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结果“布拉格之春”彻底平反，而胡萨克、雅克什等捷共领导人则被迫全部辞职，退出了历史舞台。捷共因此丢失了政权，国家也改变了颜色和方向。其剧变的进程大致是这样的：

1989年初，以“七七宪章”为首的反对派组织抓住历史

事件频频发起反政府的游行示威。1月15—20日，数以万计的群众在布拉格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广场集会，纪念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院学生帕拉赫为抗议苏军入侵而自焚20周年。群众集会很快发展成反对捷共的政治示威，人们喊出“要人权”、“要自由”、“雅克什滚蛋”等口号。当局出动警察进行干预，有数百人被捕，其中包括“七七宪章”的领导人、剧作家哈维尔。但紧张局势并未因此而平息，相反，这时国际局势对捷当局也愈加不利，8月11日和16日，参与侵捷的波、匈两国政府和议会先后发表声明，称1968年出兵是侵略行为，遂使捷政府处于更加被动的境地。1989年8月21日是苏军侵捷21周年，反对派组织起上万人的示威游行，要求当局宣布1968年的入侵为非法，并为“布拉格之春”平反。这次示威活动又被捷当局镇压。

波、匈政局的演变，特别是民德政治局和政府的辞职，使持强硬态度的捷共领导人陷入孤立境地。捷共领导层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总书记雅克什等人主张用行政手段控制局面，总理阿达麦茨等人则主张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1989年11月19日由“七七宪章”等10余个反对派组织组成的“公民论坛”在布拉格成立并组织起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至23日，参加的群众已多达40万人。持续的危机终于撼动了捷共的力量基础，党内的意见分歧终于发展成了激进派对元老派的造反。在24日召开的捷共非常会议上，以雅克什为首的捷共领导班子被迫全体辞职，乌尔班内克当选为党的总书记。会议对1989年11月17日事件表示遗憾，承认“干预是政治错误”，并建议改组联邦政府和两个民族共和国政府。

雅克什的下台，并未使捷国内局势平静。相反，反对派进一步对捷共施加更大压力。11月25日和26日，抗议示威的

人数多达50多万，11月27日，全国举行了两个小时的警告性罢工。捷共被迫步步退让，最终丧失权力。11月29日，捷联邦议会批准了关于取消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宪法修正案。12月3日，阿达麦茨被迫改组政府，5名非共产党人士进入内阁。同日，捷政府发表声明，称1968年华约五国出兵捷克是破坏主权国家之间关系准则的行为。12月7日，捷共中央主席团举行会议，决定将雅克什和前布拉格市委第一书记什捷潘开除出党。

反对派对此并不满足，他们要求组成共产党在内阁中不占多数的“真正意义上”的联合政府。在这种形势下，阿达麦茨被迫辞去总理职务。12月10日，捷新的“民族谅解政府”组成，在21名成员中，捷共只占10名，成为政府中的少数派。属捷共的胡萨克总统在新政府就职后辞职。12月20日至21日，捷共非常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捷共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1989年12月28日和29日，捷联邦会议分别选举杜布切克和哈维尔为联邦议会主席和共和国总统。捷共成为在野党。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由此落下帷幕。1993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两个独立的国家。

(四) 民主德国的剧变

民德的剧变由大批居民出走，造成社会政治动荡开始。在这一局势面前，党内领导的大换班，严重削弱了党的战斗性，而决定推倒柏林墙和开放两德边界，则最终使民德局势失去

控制。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德国统一社会党尽管改名改性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在选举中仅得票 16.33%，沦为在野党。“德国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加快了两德统一的进程。1990 年 9 月 19 日和 20 日，民德人民议院和联邦德国议院分别通过了《统一条约》。10 月 3 日，民主德国正式加入联邦德国。民德的演变最终以并入联邦德国而结束。

民德的演变是从 1989 年下半年大批公民出走联邦德国开始的。1989 年 5 月已宣布实行多党制民主化的匈牙利宣布拆除与奥地利接壤的所有边界设施，大批民德公民利用赴匈牙利旅游度假之机，取道奥地利进入联邦德国。至 10 月初，逃往联邦德国的民德公民已达 3.7 万人。大批公民的出走，导致民德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同时，“新论坛”和“社会民主党”等反对派组织纷纷出现，它们组织各种抗议活动，向民德当局提出各种政治要求。10 月 7 日民德 40 周年国庆日前后，东柏林、莱比锡等许多城市爆发游行示威活动，要求当局放宽对出国旅行和新闻媒介的限制。面对严重的局势，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于 1989 年 10 月 10—11 日召开紧急扩大会议，表示愿在捍卫社会主义理想价值的前提下，就社会存在的所有问题进行讨论和对话。随后昂纳克会见了民德四个民主党派和全国阵线主席，向他们解释民德统一社会党的立场。上述努力不仅没有平息抗议活动，反对派反而加紧活动，全国各地爆发了更为激烈的示威游行。

严重的社会动荡导致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和矛盾激烈化。在 10 月 17 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民德 15 个

专区党的书记中有13个要求以埃里希·昂纳克为首的政治局全体成员辞职。在18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十一届九中全会上，自1971年以来一直担任民德最高领导人的昂纳克以健康为由辞去党和国家的一切领导职务，原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埃贡·克伦茨当选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24日他又接任民德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

克伦茨上台后，立即应戈尔巴乔夫的邀请，于1989年10月31日对苏联进行了工作访问。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克伦茨表示要“向苏联朋友学习，学习他们成功的经验”，通过激进的改革稳定局势。为此，他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方面大批更替党政领导班子，加紧制定苏式的全面改革计划，企图以此来改善党的形象；另一方面，开放柏林墙和两德边界，以缓和群众的不满。

1989年11月7日，以维利·斯多夫为首的部长会议44名成员集体辞职。8日，在德统一社会党十一届十中全会上18名政治局委员宣布集体辞职，选出了以克伦茨为首的新政治局。会议表示，将与前任领导人的错误划清界线，进行全面改革，实行党政分开，取消新闻检查等。同时，民主德国15个专区的党委第一书记也先后全部易人。13日，人民议院第11次会议选举原德累斯顿专区党委书记、新任政治局委员汉斯·莫德罗为部长会议主席，接替维利·斯多夫组成新政府。在这届政府的26名成员中，非德国统一社会党成员为11人。这是民德政局发生剧变以来由德统一社会党和各民主党派协商组成的首届“联合政府”。

如果说克氏的党内大换班政策严重削弱了党的战斗性，那么，其推倒柏林墙和开放两德边界的措施则最终使民德局势失

去控制。

1989年11月1日，民德政府在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之下被迫重新开放了自10月3日以来暂时关闭的通往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再次出现了东德人经捷克出走联邦德国的浪潮，一周之内人数多达50万。与此同时，国内要求旅行自由的呼声也日益高涨。11月19日晚，民德部长会议宣布，所有民德公民从即刻起均可以申请出境，政府将予以批准。当天夜里，民德同联邦德国的所有过境站陆续开放，人们潮水般地涌向西柏林。边境开放的第一天离境前往联邦德国的民德公民就达5万多人；到19日在拥有1670万人口的民德，警方共签发了1000多万份私人旅行签证，并批准了近2万个长期移居国外的申请。其中11月11日到西柏林的民主德国公民就超过了50万。



柏林墙上的人们

大规模的公民出走使得国内形势更加不稳定，各地的抗议活动规模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新论坛”等反对派组织

要求彻底清算德国统一社会党集团的罪行，修改宪法，取消德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地位，进行自由选举。

在这种形势下，德统一社会党被迫再次向反对派让步。1989年12月1日，人民议院九届十三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宪法第一条的提案，删去了民主德国“在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的提法。12月3日，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一届十二中全会宣布“接受绝大部分委员的批评”，承认“党的领导没有能够根据九中、十中全会的精神揭露并严肃对待一些前政治局委员所犯的全部严重错误”。会议决定将昂纳克、斯多夫、辛德曼等12名前领导人开除出党，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集体辞职，克伦茨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12月6日，克伦茨又辞去了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后来随着国内局势的日益恶化，党内危机不断加深，党的分裂已成定局。12月8日，在党的特别代表大会上，党的工作委员会委员、41岁的柏林律师格·居西当选为党的主席。他声称党将走“第三条道路”，即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12月16—17日，党的特别代表大会为避免分裂，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1990年2月4日该党又发表声明，宣布改称“民主社会主义党”。完成了向民主社会主义党转变的原德国统一社会党，组织涣散、斗志衰落，终于在随即到来的大选中丧失了政权。在3月18日提前举行的民德人民议院大选中，力主两德合并、1990年2月才由基督教民主联盟等3党组成的“德国联盟”得票48.15%，在人民议院400个席位中占192席；1989年10月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得票21.84%；而前身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党仅得票16.33%，沦为在野党。

德国联盟大选获胜后，组成了以民德基社盟主席德梅齐埃任总理的新政府，两德统一的进程明显加快。1990年9月19日和20日，民德人民议院和联邦德国议院分别通过了《统一条约》。10月3日，民主德国正式加入联邦德国。民德的演变最终以并入联邦德国而结束。

(五) 保加利亚的剧变

保加利亚的局势本来比较稳定，反对派的力量也不大。1989年5月突出的问题是境内土耳其族人外逃。大批土族人的出走，引发了保社会各种潜在的矛盾。民族危机演化成政治危机，保局势陷入动荡之中。执政33年的日夫科夫被迫接受“政治多元化”并宣布辞职，使反对派得寸进尺。保共在1990年初召开的第十四次特别大会上，通过了《保加利亚民主社会主义宣言》和新党章，后又决定改党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保共性质彻底变化。保共在改名改性之后，在社会上的力量和影响仍占优势，但领导人在反对派的攻势面前进一步退让，把就要到手的政权又拱手让给了反对派，沦为在野党。

保加利亚的剧变是从国内的土耳其族人外逃开始的。在东欧“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1989年5月9日，保国民议会通过了允许公民自由出入境的新护照法，使早已存在的保土族人外逃形成规模之势。1989年6月出逃人数为5万人，7月增

加到约10万人，到8月底已达31万人。大批土族人的出走，引发了保社会各种潜在的矛盾。民族危机演化成为政治危机，保局势陷入动荡之中。

保加利亚在1989年10月以前还没有公开的反对派组织，10月下旬欧洲环保会议在保加利亚召开，对保国内反对派组织的成长壮大起了直接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当时波、匈、捷、民德局势已发生了强烈震荡，西方国家把保列入了下一个重要目标，公开表示希望保加入“东欧改革俱乐部”，成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下一张牌”。因此，这次会议自然成了西方国家干涉保内政、支持反对派的天赐良机，保反对派更把它看作推行政治多元化的绝好的突破口。

在西方代表、记者的支持帮助下，保国内出现了“生态公开性”、“支持工会”、“争取人权独立协会”等组织，它们纷纷发表声明、讲话，组织请愿活动，打着“反对破坏生态环境”的旗号，要求的却是“多元化”、“公开性”和参政权，“实行波匈式改革”等政治主张。11月3日，即欧洲环保会议的最后一天，“生态公开性”组织举行了40年来第一次由官方批准的由4000人参加的反对派集会，它还向议会递交了请愿书并声称要在全国各地建立组织。

面对国内外各种势力的强大压力，日夫科夫被迫接受“政治多元化”的主张，承认了持不同政见者组织的合法性。在1989年10月29日召开的保共政治局会议上，日夫科夫在报告中称：要在保“搞多元化，让意识不同、立场不一的正式社团和非正式社团并存”，并称如没有“政治多元化支持”，对保社会的改造是“不可想象的”。

保共这种以退求存的做法，不仅未能使保局势稳定下来，反对派反而得寸进尺，国内的不满情绪进一步高涨。严峻的国

内形势再加上苏联对日夫科夫等“保守势力”的横加指责，使得保共领导层内部矛盾激化。在1989年11月10日保共召开的扩大中央全会上，日夫科夫被解除保共中央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等职务。积极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保外长姆拉德洛夫被选为保共总书记。一周之后，保国民议会决定解除日夫科夫兼任的保国务委员会主席一职，改由姆拉德诺夫兼任。

姆拉德诺夫当权后，首先改组领导班子，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政治局经过两次改组，原来的10名委员有8名被解职。同时，姆拉德诺夫开始全盘否定日夫科夫和保共35年的历史。1989年12月13日保共中央全会决定开除日夫科夫的党籍，并建议国民议会组成特别委员会，审查日夫科夫等人破坏法律的严重错误。

日夫科夫下台和姆拉德诺夫的执政是保政局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反对派利用有利时机，步步进逼，保共则不断地妥协退让。日夫科夫下台至1989年底的仅一个多月时间，保的非官方组织即增加到30多个。它们举行各种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扩大民主和自由，释放政治犯，承认非官方组织，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和自由竞选。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保国民议会11月17日根据姆拉德诺夫的建议废除了有关禁止批评、攻击政府的法令，宣布开放言论自由。后来反对派的攻势更加猛烈。12月7日，10个较大的反对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民主力量同盟”，公开向保共的领导地位挑战。保共迫于压力终于在12月11至13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同意取消宪法中关于保共领导地位的条款，并同意实行自由选举。

在1990年1月底至2月初召开的保共第十四次特别大会上，党的性质发生重要变化。会议通过了《保加利亚民主社会主义宣言》和新党章，称保共已放弃宪法中关于党在社会中的

领导作用的规定及对政权的垄断。新党章中取消了保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和保社会领导力量的条文。1990年4月3日，保共最高委员会进一步决定将保共易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保共性质彻底变化。

保共在改名改性之后，其力量和影响仍然占优势，但领导人在反对派的攻势面前进一步退让，把就要到手的政权又拱手让给了反对派。在1990年6月的选举中，经过两轮选举选出了由400人组成的大国民议会。保社会党获胜，共获211个议席，占议会议席的52.75%，而主要反对派组织民主力量联盟仅获144个议席，占36%。反对派在大选失利之后，以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并用，议会斗争和街头闹事相结合的办法向社会党施压，使得社会党在步步退让中最终丧权。自选举以来即为民盟操纵的学生罢课示威活动在大选之后呈不断升级扩大之势，致使首都及各大城市的许多大学的教学科研活动全部瘫痪。在这种形势下，保社会党再次让步，7月6日，才当选保总统3个月的姆拉德洛夫被迫辞职。反对派和社会党围绕新总统的选举展开了新一轮的较量。保社会党在前3轮国民议会总统选举中的得票，每次都超过半数。在形势对己有利的情况下，为求得“全国和解”，居然在第四轮选举中撤回自己的候选人，将总统一职拱手让给反对派，使得民盟候选人热列夫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当选为总统。后来社会党人谋求联合执政的计划因反对派的坚决抵制而落空，新组成的以卢卡诺夫为总理的社会党政府仅存在了70天，就在来自议会和街头两方面的夹击下垮了台。

(六) 罗马尼亚的剧变

罗马尼亚的局势具有突发性。1989年12月16日发生“蒂米什瓦拉事件”，短短10天时间，齐奥塞斯库被处决。22日夜11时35分，扬·伊利埃斯库宣布由39人组成的临时政府“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成立，并接管政权。达25年之久的齐奥塞斯库时代遂告结束。

1989年12月16日晚，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市的几百名市民、学生和工人（大部分为匈牙利族人和日耳曼人）聚集在匈族新教神父、持不同政见者拉斯洛·托克什所在的教堂，反对地方当局令其强行迁居。这一行动很快变成了政治行动。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数千人向市中心游行，高呼“打倒齐奥塞斯库”、“打倒暴力”、“给我们自由”等口号。17日凌晨，警察驱散了示威者。但17日中午，蒂米什瓦拉市1万人再次上街游行，部分示威群众还冲进地方政府大楼，局势进一步恶化。内务部队和军队进行干预，造成人员伤亡。内务部宣布在蒂米什瓦拉市实行紧急状态。

从蒂米什瓦拉市点起的火苗迅速向全国蔓延，罗其他城市接连发生示威游行。19日，首都布加勒斯特市发生两起爆炸事件，蒂米什瓦拉市再次爆发数万人的示威游行，随即又爆发了总罢工。在这种形势下，齐奥塞斯库于12月20日中止对伊朗的访问回国。当天晚上他发表了斥责动乱的讲话，并宣布蒂米什瓦拉市和该市所在的蒂米什县进入紧急状态。

21日中午，罗官方在首都共和国广场举行万人大会。齐奥塞斯库的讲话尚未结束，与会人群中便发生骚动，有人呼喊“打倒齐奥塞斯库”的口号，并开始焚烧手中齐的画像和国旗。齐的讲话一度被迫中断。集会结束后，发生了反政府和反齐奥塞斯库的示威游行，最多时人数达数万人。官方紧急出动警察、军队、装甲车和坦克，封锁了示威游行现场，施放催泪弹并鸣枪警告，游行队伍一度被驱散。22日清晨，首都10多万群众再次涌向市中心的共和国广场和主要街道，设置路障，与警察和军队形成对峙，并发生武装冲突，造成人员伤亡。

面对首都规模日益增大的示威游行队伍，罗国防部长米列亚将军拒绝执行齐的命令，军队倒戈站到了示威者一边。22日11时，在首都市中心执行任务的国防部部队接到“撤回营区”的命令。11时45分，群众冲进了罗共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大厦。齐夫妇乘直升飞机逃出布加勒斯特。下午1时，群众占领了电台和电视台。到晚上10点半，罗电台、电视台宣布，军队已控制了全国的局势。夜11时35分，扬·伊利埃斯库宣布由39人组成的临时政府“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成立并接管政权。执政达25年之久的齐奥塞斯库被推翻，齐时代遂告结束。1989年12月25日，齐奥塞斯库夫妇被罗特别军事法庭以屠杀人民、危害国家、破坏国民经济等5大罪状判处死刑。罗马尼亚的剧变就这样以齐奥塞斯库政权的突然崩溃而结束。

（七）南斯拉夫的剧变

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国家，其剧变是由民族联邦共和国的分立主义的发展引发

的，而国家的分裂又始于南共联盟的分裂。因此，南的剧变经历了南共联盟解体和南联邦国家分裂两个阶段。在民族分立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原来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已彻底解体，分裂成为5个独立国家，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

80年代末以来，随着南斯拉夫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加剧，有人提出了多党制的主张。1989年后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共和国出现了一些主张实行多党制的党派。南共联盟起初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明确的，即南共联盟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实行多党制有使南陷入民族国家分裂的危险。但是，在波、捷、匈等国剧变影响、西方施压和国内反对派公开挑战的形势下，南党和政府放弃了原来的立场。于是，形形色色的反对派纷纷出笼，截止到1990年12月底，南全国已登记的政党达到248个，在南联盟登记的全国性政党就有33个。在多党制浪潮的冲击下，南各共和国共盟也开始纷纷改名，向南共联盟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

首先发难的是斯洛文尼亚。斯共盟在1989年12月召开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主张将南共联盟变成各共和国独立党的联盟的决议。在1990年1月召开的南共盟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由于斯共盟的上述意见未被采纳，斯共盟全体代表退出会场，致使大会宣布不定期休会。在这次大会上，代表们就南共盟的性质、作用和南社会今后的发展道路等问题争论不休，多数代表均同意取消南宪法中关于南共盟起领导作用的

条款。这表明南共盟的分裂已不可避免。

5月26日，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共盟领导机构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南共盟十四大续会。这次会议标志着南共盟朝着分裂和民族主义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续会通过了如下决议：（1）解除南共联盟中央及主席团的职务；（2）成立南共联盟民主纲领复兴代表大会筹委会；（3）定于9月29日召开新的党代会（后成为南共联盟民主纲领复兴代表大会的成立大会）；（4）将把南共联盟改造成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

南共盟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之后，各共和国共盟纷纷改名。斯共盟于2月4日召开代表会议，决定将斯共盟改名为“斯洛文尼亚共盟——民主改革党”，并宣布脱离南共联盟的领导而成为独立自主的政治组织。克罗地亚共盟也于2月21日决定改名为“克罗地亚共盟——民主改革党”。1990年下半年后，塞尔维亚共盟与联合阵线组织塞尔维亚社盟合并成立了塞尔维亚社会党。波黑共盟和马其顿共盟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到1990年年底，除黑山共盟以外，其余所有共盟组织都改称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到1991年1月，南共盟民主纲领复兴代表大会宣布停止活动。至此，具有70多年光荣历史，执政达45年之久的南共联盟最终解体。南共联盟的解体使南斯拉夫丧失了民族团结的凝聚力。

南共联盟领导力量的被削弱直至丧失，使得各种民族主义势力急剧膨胀。在1990年各共和国举行的首次多党制大选中，只有塞尔维亚社会党和黑山共盟在大选中获胜，继续执政，其余4个共和国均被民族主义右翼政党夺权。1990年底，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共和国分别举行公民投票，宣布自己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有权决定在联邦中的去留问题。1991年6月，



1990年1月20—22日南共联盟十四大
宣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解体。

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共和国正式宣布脱离南联邦而独立，使得南联邦国家迅速解体并陷入内战的深渊。

斯、克宣布独立之后，南联邦军队曾对斯进行干预，人民军与地方武装发生了长达一周的流血冲突，最后联邦最高当局被迫宣布从斯洛文尼亚撤军。与些同时，因克罗地亚独立而引起的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冲突，特别是克境内克、塞两族的冲突迅速升级，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继斯、克之后，马其顿和波黑两个共和国也先后举行了全民公决，赞成独立并谋求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支持。这样，南斯拉夫联邦只剩下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1992年4月27日，南斯拉夫联邦议会通过了由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联合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宪法。这样，在民族分立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原来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已彻底解体，分裂成为5个独立国家，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

（八）阿尔巴尼亚的剧变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开始顶住压力，提出了“三不让步”和“四不原则”。但1990年7月大批公民外逃事件爆发后，内外压力加大，当局开始妥协退让，同意实行多党制。在1991年3月举行的首次多党议会选举中，劳动党虽然取得了优势，但在反对党民主党的要求下，不久阿议会就通过决议，取消国名中的“社会主义”和“人民”两个定语。随后劳动党召开

的十大又决定对党“进行彻底改造”，将党改建为“社会党”。这一切标志着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性质均已改变。在1992年3月提前举行的新一届人民议会选举中，民主党获胜成为执政党。阿劳动党虽然改名改性也未能保住政权。至此，阿剧变过程结束。

阿尔巴尼亚长期推行斯大林模式，自称“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欧洲最落后、最封闭的国家，是“搞贫穷社会主义”的典型。1985年霍查逝世，阿利雅接班，开始对既定方针政策进行某些调整。在1989年东欧政治风云突变的形势下，阿尔巴尼亚当局曾表示，要从东欧剧变中吸取教训，防患于未然，开始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实施一整套改革措施。但一年之后，尤其从1990年冬开始，阿利雅迫于内外压力，允许实行多党制，导致全国局势急转直下，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进一步恶化，未能避免剧变的命运。总的说来，阿尔巴尼亚的剧变大体分为如下三大阶段：

1. 顶住压力，采取防范措施（1989年9月—1990年7月）

1989年的东欧剧变，给阿尔巴尼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为避免东欧事件在阿重演，阿劳动党采取了一系列防变措施。1989年9月召开了以加强党的领导与建设为主旨的中央全会，阿利雅在会上提出了“三不让步”与“四不原则”。三不让步是：不应在任何领域向资产阶级思想让步，不应向宗教势力让步，不应向错误表现让步。四不原则是：永不允许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决不为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剥削开辟道路；永不允许削弱人民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决不同反人民势力分

权；永不削弱、更不放弃党的领导作用，决不搞“多元化”；永不允许损害国家的自由、独立与主权。

1990年1月和4月劳动党中央又先后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会，对阿国内外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强调阿党要自我完善，以适应时代要求。但这些努力并没有扭转阿局势日趋紧张的局面。

2. 事态扩大开始妥协让步（1990年7月—1991年2月）

1990年7月地拉那发生了建国45年来第一次大规模公民出逃事件，近5000人闯入外国大使馆，尔后逃往西方。为平息事态、安抚民心，阿党于1990年下半年又连续召开中央全会，对党政高层领导进行重大调整，并在承认阿党在历史上犯过超前、冒进错误的同时，首次改变初衷，提倡“思想多元化”，表示劳动党不再独揽大权，主张党政分离，建议修改宪法中关于“劳动党系国家唯一政治领导力量”的条款等。这也是阿劳动党为求得国内局势的稳定、缓解西方的压力，所做出的妥协和让步。

阿当局的妥协退让未能稳住阵脚。1990年12月地拉那大学爆发了大规模的要求“民主”的学潮，接着其他城市发生了动乱。面对恶化的形势，阿利雅紧急召开中央全会，首次允许“组织多元化”，即实行多党制。几天后，一个孕育已久的反对党——民主党宣告成立。不久，共和党、社会民主党、农民党、生态党等政治组织也应运而生。

3. 逐步蜕变与下台（1991年2月以后）

1991年2月，地拉那霍查大学的学生举行罢课和绝食，要求更改校名。随后首都及其他一些城市的霍查雕像被推倒；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开枪流血事件。

1991年3月，阿举行了第一次多党议会自由选举。经过3

轮角逐，结果劳动党获胜，在 250 个议席中得 168 席，占总数的 67.2%；民主党获 75 席，占总数的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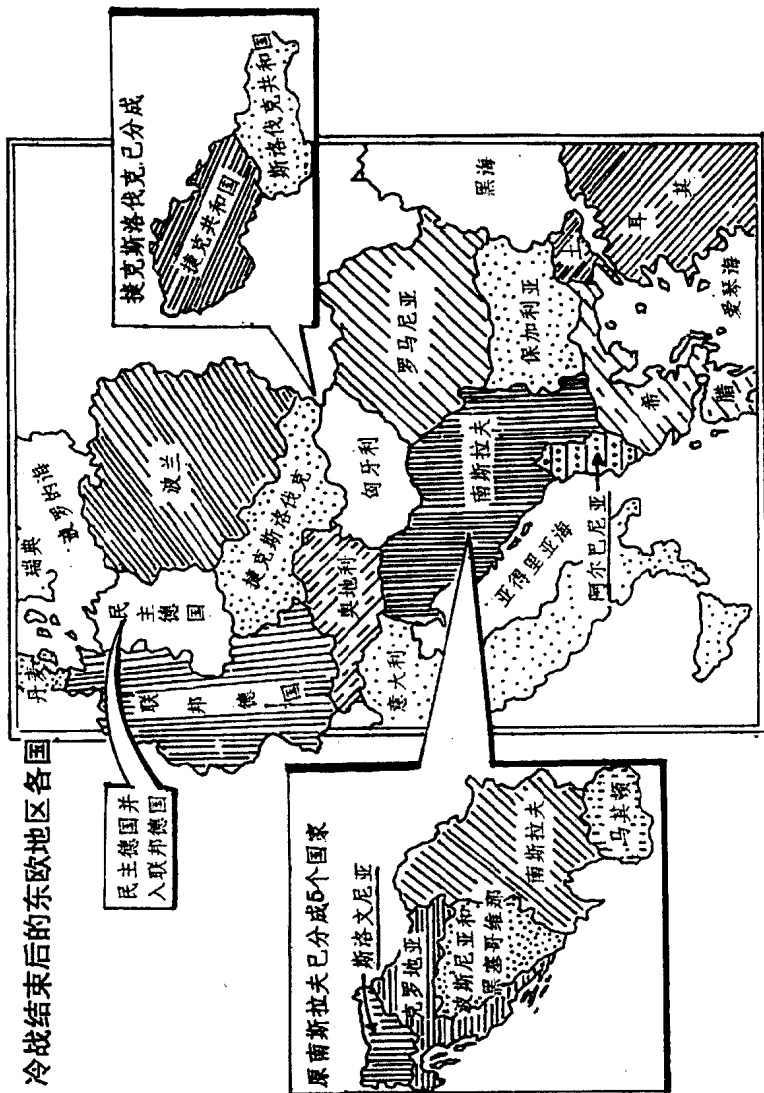
议会选举之后，反对党在议会内外向劳动党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选举结果公布的第二天，民主党及其支持者即在阿利雅的故乡斯库台举行非法集会，攻击劳动党操纵大选，有舞弊行为，并高呼“用暴力夺取政权”等口号进行打砸抢活动。治安部队动用武器平息动乱，冲突中致使 3 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酿成“4·2 斯库台流血事件”。事件发生后，民主党议员团以未公布事件调查结果为由拒绝出席议会第一次会议。4 月 26 日，在民主党人的坚持努力下，阿议会通过决议，取消国名中的“社会主义”和“人民”两个定语，改国名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阿国家性质发生变化。

4 月 30 日，阿利雅当选为阿首任总统以后，民主党又开始了对劳动党的大围攻，它拒绝接受劳动党关于组成多党联合政府的建议，对劳动党政府及其施政纲领投不信任票。劳动党单独组阁后的第三天，有反对派背景的独立工会便发起了全国性的大罢工，使阿全国经济、社会文化生活陷于瘫痪。

6 月 4 日，执政刚 22 天的社会党政府被迫辞职。6 月 11 日阿第一届多党联合政府成立，劳动党人于利·布菲任总理。在新政府的 24 名成员中，劳动党占 12 人，民主党 7 人，共和党 2 人，社会民主党 2 人，农民党 2 人。

已当选为共和国总统的阿利雅于 1991 年 5 月辞去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等党内一切职务。6 月 11 至 13 日，劳动党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对党进行彻底改造，决定将阿劳动党改名为“阿尔巴尼亚社会党”，并通过了新的党纲和党章。党的性质发生改变。39 岁的经济学家法托斯·纳诺当选为阿社会党主席。

冷战结束后的东欧地区各国



苏联 1991 年“8·19 事件”之后，阿政局形势更加严峻，反对派联合起来逼迫社会党早日交权让位。民主党、共和党和社会民主党结成 3 党联盟，协调行动。11 月 25 和 26 日，共和党和民主党分别向社会党提出提前大选、惩处“4·2 斯库台事件”中肇事者等要求，并扬言如不满足条件就退出联合政府。在商谈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共和党和民主党退出联合政府。12 月 16 日，联合政府总理布菲辞职。

1992 年 3 月 22 日，在阿提前举行的新一届人民议会选举中，民主党在议会 140 个席位中赢得 92 席，成为执政党。4 月 3 日，阿利雅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民主党主席贝里沙当选为阿总统，民主党另一领导人亚历山大·梅克西当选为总理。至此，阿剧变过程结束。

三、苏联解体

戈尔巴乔夫 1985 年 3 月上台后推行加速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政治局势还是比较稳定的。1988 年 6 月苏共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转向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确定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目标之后，苏联从政治、经济到社会，从执政党、联盟共和国到机关、企业和基层组织，全面陷入了混乱和危机。1991 年的“8·19 事件”后，苏联形势急转直下，开始了党和国家全国崩溃瓦解的急变过程。8 月 22 日，叶利钦宣布“苏军中的共产党组织非法”，次日又签发命令

“停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苏共中央“自行解散”。12月21日“独立国家联合体”宣布成立。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被迫辞去苏联总统的职务，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黯然降落。至此，苏联剧变和解体的过程最终完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后从地图上消失了。

苏联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以下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85年3月至1988年6月，是戈尔巴乔夫上台提出加速战略和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这一阶段改革基本上是在社会主义范围之内进行，改革的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从1988年6月至1989年年末，这一阶段改革的方向转到了政治体制方面，改革路线的偏误致使社会开始动荡。第三阶段，从1989年11月至1991年8月，苏大力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导致苏联出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危机。第四阶段，从1991年8月至1991年年底，是苏联政局急剧恶化、苏共被解散和联盟解体的阶段。

（一）戈氏执政初期的经济改革

1985年3月11日，契尔年科去世，54岁的戈尔巴乔夫被推举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由此开始了苏联历史上的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3—1991.12）。当时，苏联社会孕育着严重的危机，必须进行改革，兴利除弊，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获得生机和活力。改革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和呼声。戈氏上台之后，力图打破苏联社会死气沉沉的状况，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4月23

日，他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施政纲领，重点提出了“加速战略”，它包括两层含义：加速经济发展速度和加快经济体制改革。这次苏共中央全会标志着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改革的开始。

在1986年2月25日—3月5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戈氏又提出了较完整的改革构想。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的方针，包括的具体措施有：改进计划工作，改组管理结构，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制，运用经济杠杆加强经济刺激，改革农业体制等。1987年6月25—26日，苏共中央又召开了以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为主要目标的六月全会，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及《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草案，6月29—30日，苏最高苏维埃审议正式批准了这一法律。

在上述经济改革方针的指导下，苏这一时期在经济管理体制、掌握新的经营方法等方面迈出了最初的几步，取得了一些成绩。如1987年占全国工业产值20%的企业试行了完全的经济核算，所有制结构也由单一的国营经济向多种经济发展。但这一时期的改革从战略到具体策略措施都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经济改革总体上看虚多实少，改革的调子很高，但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措施不多。其次，加速战略强调经济发展的重点在重工业，应大力发展机器制造业、冶金和化工等行业，对造成苏联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重轻农结构没有改变，反而使之进一步强化。再次，从工业开始，而不是从农业开始，戈氏在改革的突破口选择上严重失误。农业一直是苏联经济的薄弱环节，拥有地球1/6土地的苏联始终没有解决好占世界人口6%的苏联人的吃饭问题。农业的严重落后和农业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必然会影响和制约苏联经济改革的进程。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戈氏改革的政治指导思想也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突出表现为：(1) 在许多场合谈论“人道主义”，强调要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1988年1月8日，戈氏在会见苏舆论工具、意识形态机关和创价协会的领导人时称：“民主化与公开性不仅仅是改革的手段，而且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我们主张毫无保留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2) 提出了“新政治思维”的主张。1987年戈氏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和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对“新政治思维”作了详细的解释，其核心是“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全人类的价值观高于一切”、“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上述经济改革和政治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加之传统体制下习惯势力和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重重阻力，使得戈氏的经济改革步履维艰、收效甚微、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他把改革的重点由经济领域转移到了政治领域。

(二) 政治体制改革的实施及其转向

从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到1989年末，改革的重点已由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改革的方向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完善社会主义”逐渐转变到从根本上否定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是苏联改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戈氏等苏共领导人把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归结为党的“官僚机构”的阻力，正式决定把改革重点转移到政治体制上来。会议作出了几项重要决定：首先，把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作为“首要任务”提了出来。认为十月革命以来形成的政治体制已发生了“严重的变形”，今天改革所遇到的障碍正是僵化的权力体制，“如果我们不对政治体制

进行改革，我们所有的创举，我们已开创的事业就会停滞。”因此，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次，把权力中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并把它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内容。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性方向是保证人民代表苏维埃的全权”、“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在政治体制各个基本环节之间，首先在党与国家之间，正确分配权力具有原则意义”。再次，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目标。宣布改革的目标是达到苏联社会的崭新状态，即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苏共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改革最高苏维埃体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新体制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其报告工作的常设最高权力机关，行使立法、管理和监督职能。（2）恢复和加强各级苏维埃的权力，确立苏维埃对其执行机关的实际领导地位。（3）实行党与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之间的权力分解。党中央和政治局以政治领导机关，不能取代最高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为此，1988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成立了6个委员会，取消了一系列职能部门，将其职能转交给政府或最高苏维埃及其委员会。（4）实行“民主化、多元化、公开性”的方针和原则。随着改革的重点转移到政治体制方面，民主化、多元化、公开性在苏联改革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为此，这一时期苏联建立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民主机制。全民讨论重大的全国性的法律或决定草案。实行公开性原则，公开报道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重大事件和活动的情况。

这一时期苏联政治体制改革已暴露出了一些错误和某些政策举措上的失误。主要表现在：（1）全面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引发了普遍的政治过热现象。全党和全社会把主要精力集中在

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上，各种主张、政见大量涌现，意见、观点争吵不休。过度的政治热情不仅没有推动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反而加剧了经济的危机和困难。人民群众没有从改革中获得经济实惠。(2) 民主化、公开性失度，导致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的混乱，为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土壤。这一时期舆论宣传工具越来越多地揭露社会阴暗面或报道一些耸人听闻的“轶事”，同时大量刊载否定党和苏联历史的文章，败坏了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形象。对此当局采取的是放任自流的态度和立场。(3) 忽视和削弱党的领导。在实行党权力分开和加强苏维埃权力的同时，忽视了苏联70年形成的历史实际，走向了削弱、降低党的领导作用的另一面。在政治上不敢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党的组织活动大大减少，有的机构甚至陷于瘫痪。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1991年透露说：“从1988年10月起，苏共中央书记处就停止了开会，实际上是长期停止工作。”(4) 党的机构和干部调整幅度过大，造成干部队伍素质下降和思想混乱。戈氏上台的四年时间里，中下层干部的2/3被更换。1989年4月，一次就有110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检查委员会成员集体退休或辞职。

戈氏改革中的上述偏差和失误使得改革的方向逐渐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直至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其主要表现在：

1. 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倾向迅速占了上风。1987年11月，戈氏在十月革命70周年庆祝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已提出要对苏联70年的历史和重要人物进行重新评价，以改变“被扭曲的”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倾向。苏共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进一步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笼统地称之为“严重变形的社会主义”。这以后，苏联理论界、学术界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倾向迅速占了上风。大批咒骂、批判斯大林的

文艺影视作品和文章纷纷出笼，借批“大清洗”运动、“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中斯大林的错误，全盘否定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称它们“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是“异化的社会主义”，“变形的社会主义”，甚至说“苏联历史上还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2. 非正式团体大量涌现，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第一个建立的较大的反对派组织是1988年4月开始活动的爱沙尼亚人民阵线，它正式成立时的成员已达10万人。戈氏对非正式团体实际上采取了默认的态度，1989年7月他甚至称：“它们的积极目的与改革的目的在客观上是一致的。”在这一方针的鼓励下，非正式团体以不可遏制的态势发展。1989年7月29—30日，苏联人民代表中的300名激进派人士正式成立了“跨地区代表团”，选举叶利钦、波波夫、萨哈罗夫等五人为主席。于是，在苏联议会中第一次出现了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

3. 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崛起，公开与中央分庭抗礼。苏共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后，在“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的浪潮中，民族分立主义势力迅速崛起。纳—卡冲突使得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个共和国的党组织和苏维埃相继卷入，中央失去了对那里局势的控制。继爱沙尼亚人民阵线成立之后，1988年10月拥有23万成员的拉脱维亚人民阵线成立，它宣布不受苏共领导，独立活动，在经济上完全独立。紧接着，白俄罗斯、乌克兰、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相继成立了民族分立主义组织。

4. 苏共党内外激进势力相互配合，不断削弱党的领导地位，推动苏联从一党制向多党制演化。在苏共党内进行机构大

改组，把权力中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的同时，一批“激进派”代表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进入了苏最高权力机关。他们积极活动，要求取消宪法中关于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内容。1989年11月底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率先通过了修改宪法中有关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内容；1989年12月这一提案虽然最终被苏人代会否决，但支持这一提案的票占到总票数的1/3，达839票。这表明，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已岌岌可危了。与此同时，在反对派的猛烈攻击下，苏共在多党制问题上的态度慢慢开始软化，逐渐停止了对多党制主张的指责，仅作一些温和的解释。如在1989年11月，只是强调“在当前复杂阶段”保留一党制的“适宜性”，称这是“团结社会和集中社会上的一切健康力量解决改革任务的利益和要求”。

总之，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戈氏实施的“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方针和“权力中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的政治体制改革使得苏联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和现实社会主义的力量已汇聚成一股潮流。非正式团体、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和激进派势力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压力集团”。多党制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客观现实，东欧剧变又从外部给苏联以巨大的影响。这一切从根本上动摇了苏共的领导地位，最终使苏联的改革偏离了方向，从“完善社会主义”，转变为“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彻底否认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向另外一种社会制度过渡。

（三）改革方向的转变和危机的加深

从1990年初到1991年“8·19事件”前，“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最终确立，苏共完全失去了对改革进程的控制力，苏联改革的性质和方向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随着

苏共战斗力和凝聚力的不断减弱乃至丧失，苏联社会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各加盟共和国同联盟中央的权力之争逐渐激化，经济形势日趋恶化，民族矛盾不断加深，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角逐也愈演愈烈，全面的社会政治、经济总危机终于爆发了。

1990年1月，戈氏在访问立陶宛期间首次表示“实行多党制也不一定是灾难”，改变了他过去一直反对实行多党制的立场。2月，苏共中央全会宣布放弃苏共对国家的领导权，随后，苏第三次人代会修改了苏联宪法第三条关于苏共在国家政治体制中处于领导地位的条款。1990年7月，苏共召开二十八大，正式通过了二月全会、三月全会的内容，至此苏共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最终确立。

与此同时，经过这一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苏联国家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权力先是由苏共中央向最高苏维埃转移，很快又向苏人代会转移，后来又向苏联总统转移。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上述权力结构在短期内的迅速变化和改组引发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由于削弱了苏共的权力，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人代会和总统的权力实际上被架空，结果全国陷入“权力真空”的局面。

各加盟共和国同联盟中央之间所掀起的“法律战”、“主权战”从根本上动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统一。波罗的海3国首开独立浪潮的先河。1989年12月，立陶宛共产党宣布脱离苏共而独立。1990年2月15日，拉脱维亚议会通过独立宣言。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独立。3月30日，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向独立过渡的宣言。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国家主权宣言。随后，各加盟共和国纷纷仿效。至1990年底，全苏15个加盟共和国中有5个发表了独立宣言，10个发表了主权宣言。面对联盟解体的

危险，为了挽救联盟的统一，戈氏一方面要求于1991年3月17日就联盟前途问题进行全苏联的人民公决，另一方面竭力争取同各加盟共和国签订新的联盟条约。

这一时期，苏联的经济形势越来越糟。社会生产全面衰退。1990年经济出现负增长，国民收入比上年下降4%。1990年下半年，苏最高苏维埃就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提出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的紧急措施》，以及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支持下制定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所谓“500天激进改革计划”，进行了激烈的争论。1991年春夏之交，围绕接替雷日科夫的帕夫洛夫总理的反危机纲领和亚夫林斯基等人制订的“哈佛计划”又进行了一场大争论。但在政治斗争空前激烈，国家局势已失控的情况下，上述经济改革“措施”和计划，只能停留在纸上和会议中，经济形势每况愈下。

这一时期，苏共党内和社会上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更加尖锐、激烈，斗争态势发生变化。到1990年夏秋之际，在不同政治倾向的斗争中，苏政坛演化出3个不同的派别：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主流派，以利加乔夫、雷日科夫为代表的传统派。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主流派采取种种办法来贯彻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1990年3月，戈氏成为苏第一任总统，并且在苏共二十大上继续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联合社会上的其他反对派，在1990年上半年的选举活动中在许多加盟共和国和地区夺取了政权。5月，叶利钦当选为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后改为圣彼得堡）等重要城市的苏维埃政权也先后落入激进派人物之手。下半年，叶利钦等人正式退出苏共，更加放手致力于夺取苏联中央政权的活动。

从1990年秋至1991年春，传统派和激进派围绕十月革命和恢复秩序等问题进行了几个回合的激烈斗争。戈氏也在一定程度上倚重传统派，颁布法令，采取了一系列制止动乱、恢复秩序的措施。如12月2日，他解除了原内务部长巴卡京的职务，任命主张强硬路线的普戈、格罗莫夫为部长、副部长。1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受总统委托发表电视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地保卫安全、法制。同时，1991年2、3月份，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还爆发了直接的个人冲突。但是，激进派毫不示弱，它们联合民族分离主义势力，鼓励矿工罢工，在一些城市组织游行集会，要求改革政府和最高苏维埃，实行“非党化”和没收苏共财产，并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等，进行全面的对抗。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到1991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前半期，戈尔巴乔夫转而倒向激进派，对叶利钦做出了一系列让步。其中包括不顾3月17日全民公决的结果对联盟条约草案进行重大修改，将以前文本中的“主权共和国”改成“主权国家”，除出现苏联国名外，不再提社会主义，并决定于8月20日签署新联盟条约后，修改宪法和改组联盟中央政权。这以后，局势对激进派更加有利，苏联出现了加速演变的趋势。6月12日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总统，7月20日他发布“非党化”命令，限期解散机关、企业和军队中的苏共组织，俄罗斯议会还迅速通过了一系列实行私有化的法律。与此同时，苏共党内的矛盾继续加深，分化进一步加剧。在苏共四月全会上许多人对戈氏的政策提出尖锐批评，并要求他辞职。但戈氏仍然一意孤行，在苏共中央七月全会上，他又提出了以苏共二十大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新的党纲草案。西方通讯社评论说，这一草案表明苏共正在变为社会民

主党型的党。随着党内思想的混乱，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鲁茨科伊等党政高级领导人纷纷脱离苏共，筹备成立新的政党。苏共面临的危机日益深重，已到了崩溃瓦解的边缘。

总之，到1991年8月中旬，苏联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民族危机和党的危机不仅没有缓和，反而空前的尖锐化，苏联的演变和解体进程在加快。各派政治势力都感到已到了“一决胜负的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关头”。在这样的背景形势下终于爆发了“8·19事件”。

（四）“8·19事件”后苏共的垮台和联盟的解体

1991年8月19日清晨，正当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黑海疗养地休假之际，苏联塔斯社播发了令世人震惊的消息：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由副总统亚纳耶夫代行总统职务。随即成立了以亚纳耶夫为首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其成员包括总理帕夫诺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和内务部长普戈等8人。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的《告苏联人民书》称，苏联正“面临致命的危险”，“由戈尔巴乔夫发动和开始的改革政策已走入死胡同”，“整个国家实际上已失去控制”，在这种形势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担负起了对祖国命运的责任并决心采取最重大的措施使国家和社会尽快走出危机”。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从上述言行看，这显然是一些苏共领导人企图阻止激进派势力上台和联盟解体的一种尝试。

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进行

了猛烈的反击。叶利钦发表讲话，称紧急状态是“右派反宪法的反动政变”，呼吁俄罗斯人民立即举行总罢工予以回击。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内部出现分化，一部分进驻莫斯科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转到叶利钦一边，形势发生重大变化。22日凌晨，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回到莫斯科，宣布重新履行苏联总统职能。至此，亚纳耶夫等人的这次行动不到72小时就失败了。

“8·19事件”之后，苏联形势急转直下，开始了党和国家全面崩溃瓦解的急变过程。

首先，具有93年光荣历史，执政70多年并有约15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在短短几天内即被摧毁。8月22日，叶利钦宣布苏军中的共产党组织非法。8月23日，他签发命令“停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声称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没有坚决反对“政变”，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国的共产党和党的地方组织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他还以苏联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停止苏共在武装力量、苏内务部、苏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护法机关、铁道兵、其他军事单位和国家机关中的活动。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正式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并责成苏联检察院对苏共机关进行审查。

反共浪潮迅速席卷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继俄罗斯中止共产党活动之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乌克兰禁止共产党活动，白俄罗斯、塔吉克中止共产党活动，阿塞拜疆共产党自行宣布解散，哈萨克、乌兹别克和亚美尼亚共产党皆宣布脱离苏共并改名。

在反苏共浪潮中，根据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各共和国领导人的命令，苏共各级党委的办公大楼被查封，苏共的财产被全部没收，档案被接管，党报被停刊。许多共产党人受到迫

害，大批党员干部成为失业者。

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在摧毁苏共的同时，开始迅速接管联盟中央的权力。首先是控制军权。8月23日，戈尔巴乔夫任命米·莫伊谢耶夫为苏临时代理国防部长，列·舍巴尔申为苏临时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瓦·特鲁申为苏临时代理内务部长。但第二天，根据“激进派”的要求，他们都被解职，戈氏重新任命在“8·19事件”中坚决支持激进派的叶·沙波什尼科夫、瓦·巴卡京、维·巴兰尼科为上述3个掌握军权部门的部长。其次是掌握财权。8月27日，激进派以一些部门原领导人“与叛乱分子实际上进行了合作”为由，在戈尔巴乔夫的同意下，接管了苏联国家银行、财政部、商业部、对外经济银行、经济和预测部、对外经济联络部。第二天，俄总统叶利钦又下令，苏联财政部、国家银行和对外经济银行从事的金融、外汇活动必须征得俄罗斯联邦有关部门的同意，上述财政金融机关的资产、设备以及归其管辖的位于俄联邦境内的组织和企业，均收归俄罗斯联邦管理。最后是控制中央舆论工具。“8·19事件”后，激进派立即接管了苏联电视台、广播电台，不久又接管了塔斯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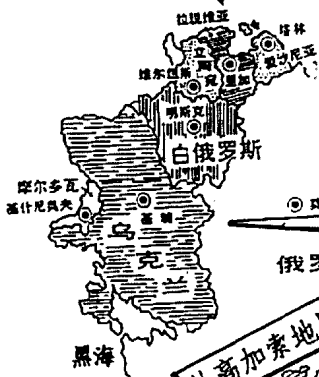
激进派势力在迅速摧毁苏共和控制、接管联盟中央的权力之后，便开始了第二个目标行动：“最后毁掉”中央。1991年10月28日，叶利钦在俄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宣称：“俄罗斯不允许恢复凌驾于它和主权国家之上的另外一种发号施令的中央”，“跨共和国机构应当只起磋商和协调作用”。在叶利钦的要求下，苏联经济共同体各成员国政府首脑委员会11月1日决定，将联盟的约80个部及其他机关撤消。11月15日，叶又颁布命令，宣布俄罗斯联邦政府接管被撤消的苏联各部和其他国家管理机关的财产。联盟中央的大权迅速旁落。在这种情

冷战结束后的欧亚地区各国

解体前的苏联
共有 15 个加盟共和国



波罗的海 3 国已于
1991 年 9 月独立



独立国家联合体 (简称独联体)
于 1991 年 12 月组成时为 11 国, 格
鲁吉亚于 1993 年 11 月加入, 现共
计 12 国。除俄罗斯外, 它们是:

欧洲地区的这 3 国

外高加索地区这 3 国

中亚地区这 5 国



况下，戈尔巴乔夫四处奔波，做最后的努力，企图签署新的联盟条约，以保留一个权力小的“中央”。

然而，由于苏共瓦解而迸发出来的汹涌的民族分立主义浪潮的冲击，戈氏“小中央”的计划也很快落空了。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举行全民公决，宣布独立，克拉夫丘克当选为乌克兰独立后的首位总统。在这种形势下，叶利钦开始采取他的第三个步骤：完全撇开戈尔巴乔夫和联盟中央政权，以独联体取而代之。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3国领导人在明斯克签署了成立独联体的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复存在”。戈尔巴乔夫开始对这一协议表示吃惊和愤怒，随后被迫承认客观现实。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塔吉克、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先后表示将以“创始国”的身份参加独联体。12月21日上述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举行会议，正式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并通知戈尔巴乔夫取消苏联总统的设置。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被迫辞去苏联总统的职务，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黯然降落。至此，苏联剧变和解体的过程最终完成，一个存在了69年的社会主义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后从地图上消失了。

四、剧变的原因及教训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在这么短时间内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说明了什么？几年来，不同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的人们，看法和态度是大相径庭的。西方反共势力兴高采烈，弹冠相庆，他们说苏东剧变说明，社会主义失败了，

共产主义将彻底消亡。西方右翼学者说什么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非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取代倒是历史的必然。国际上为数不多的托派从其传统观点出发，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胜利，所以垮台是必然的。在社会主义者的队伍中有认识糊涂的人，从右的方面说什么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先天不足”，不改革是死，改革也是死，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当然也还有从相反的角度认识和提出问题的人，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被《九评》言中了，是修正主义把好端端的社会主义搞垮了，还是要大抓阶级斗争。因此，搞清楚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垮台的真正原因，正确总结其经验教训，是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

（一）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唯物史观认为，重大历史事变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合力，即历史结果。”^①像苏东剧变这么复杂的事变，更不可能由某一二个因素造成，而只能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必须全方位、多视角地进行研究。近年来人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看法，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实际上并不互相排斥。比如有人强调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所起的作用；有人强调戈氏本人及其“新思维”所起的作用；有人强调苏东国家长期实行高度集中僵化的经济体制，造成经济长期落后，人民长期过紧日子所起的作用；有人强调它们党的建设没有搞好，严重脱离群众，丧失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和能力；有人强调它们民族问题没有处理好，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7页。

成民族分立主义的恶性发展；有人强调它们长期忽视农业和轻工业，造成产业结构严重失调，人民生活用品长期匮乏；有人强调苏联与美国搞军备竞赛，消耗了财力、物力，是被美国拖垮的；……只要坚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看问题，上述种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都是造成苏东剧变不同侧面的原因。当然，强调全面不是没有重点，强调诸因素综合作用，不是不要区分主次。在诸多因素中，主要的直接原因究竟是什么？

（二）两个直接原因：西方“和平演变”得手与国内“改革”变成“改向”

引发苏联东欧国家剧变主要的直接原因，有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而内部原因是主要的。

1. 外部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得手，它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起了催化和促进作用。

二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在苏东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设置了各种机构和设施，使用公开和秘密的、合法和非法的各种手段，处心积虑地促使苏东演变。80年代中期，随着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及一整套相应的方针政策，苏联社会固有的政治、经济和民族矛盾全面爆发，东欧局势也开始不稳，这一切给西方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1989年美国总统一布什提出了著名的“超越遏制战略”，称“我们将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西方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利用经济手段，诱压兼施，以改变苏东国家的政治方向。为了从经济上更有效地促使苏东国家实现“和平演变”，

从1989年起，西方国家组织了一个“以援促变”的国际组织。波匈局势刚发生变化，美国立即提出制订“小马歇尔计划”，其他西方国家也相继提出了紧急食品援助、稳定经济援助、减免债务、推迟还债、低息贷款等五花八门的许诺。民德、捷、保剧变后，欧共体马上提出筹集110亿美元建立援助东欧的“欧洲发展基金”，以及为东欧培训管理干部的“欧洲基金”。1991年7月，当局势已危在旦夕的苏联向西方7大国乞求援助时，7国领导人给戈尔巴乔夫的条件是：政治上他必须同意苏联盟中央对加盟共和国实行放权；不得以武力干预各加盟共和国实行分权；不得以武力干预各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在削减战略核武器方面继续让步，以满足美国的要求。英国《卫报》的一篇评论就此写道：伦敦西方7国首脑会议可以说给苏联唱了一支“埋葬”社会主义的“安魂曲”。事实充分表明，凭借经济优势，利用经济手段，促使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一直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

(2) 利用各种现代化的传播媒介，灌输西方价值观，左右苏东国家的舆论导向，煽动反社会主义情绪。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非常重视对苏东进行“和平演变”的舆论准备工作。除了“美国之音”外，还拨出巨款，成立专门针对苏东进行宣传的“自由欧洲”和“自由之声”广播电台，每周播音时间达1097小时。西方国家通过这些电台、电视以及书刊和人员交往等途径，对苏东国家进行长期的意识形态渗透。“美国之音”的一位副台长曾公开说：“我们应当破坏苏联及其卫星国家的稳定，促进它们的人民和政府之间发生摩擦……我们要尽量在共产主义集团各国领导人之间打进楔子，使他们相互不满和相互猜疑，我们应当煽起民族主义的火焰，鼓励宗教感情的滋长。”1989年以后，它们更是抓住苏东局势混乱，直接插

手这些国家的舆论阵地，扶植这些国家反对派组织的舆论工具（如波兰团结工会的《选举日报》、捷克哈维尔发起的《人民报》等），为动摇和颠覆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极尽推波助澜之能事。

（3）利用所谓“人权”、“人员自由往来”等问题干涉东欧国家内政，扶植“内应力量”。用人权来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历来是西方的一项基本策略。在东欧各国局势动荡时，西方各国更是公开地、直接地进行政治干预，不仅向各国反对派提供竞选经费和物资，而且派出顾问进行指导和咨询。一些西方政要人物甚至亲临反对派的竞选集会，帮助拉选票，扶持亲西方的反对派上台执政。“8·19事件”之后，美国更加赤裸裸地借人权对苏施压。1991年9月4日，美国务卿贝克在华盛顿宣布了指导今后美苏关系的原则，其中第4条这样写道：“苏联必须保护人权，尤其是要平等地对待少数民族。”同年9月14日，贝克在宣布美国向波罗的海3国提供1400万美元的援助时，提出了以下四项先决条件，即3国必须接受“自由、民主、人权与自由的市场关系”。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曾直言不讳地说道：“倡导尊重人权，可以加速共产主义衰亡的进程。”

2. 苏东国家的共产党在改革中偏离马克思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方向，削弱乃至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从而诱发了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和国家的全面危机，是导致剧变主要的直接原因。

西方“和平演变”的攻势再强，如果内部没有变化的根据，剧变也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可以说，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苏东国家是“自毁长城”，自己搞垮了自己。对此，许多当事人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实际上的第二把手）库·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中指出：“毫无疑问，正是戈尔巴乔夫政策的缺陷导致了国家走向悲剧。”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伊·雷日科夫在《改革：背叛的历史》一书中说：“我认为改革被出卖了。是我们出卖的。是设想改革的人、开始改革的人、实施和埋葬了改革的那些人出卖的。我不把自己排除于这个过程。不过，幸运的是，我没有得到机会参与下葬（注：他在苏联解体前因心脏病住院了）。”曾任戈尔巴乔夫助手的瓦列利·博尔金在其《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一书中说：“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东欧国家的剧变有西方和戈氏两重外因，但这些外因最终也是通过东欧国家的内因起作用的。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剧变的关键都是内因。古巴当时的处境比苏东国家要险恶得多，但由于古巴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动摇，迄今仍傲然屹立在美国的鼻子底下就是证明。这就是说，搞不搞“和平演变”在西方，但变不变在社会主义国家自己，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总的说来，苏东剧变的内部原因具体表现在：

（1）改变党的性质和作用，放弃和取消党的领导，是造成国家大乱、局势失控的关键。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也是维系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凝聚力量。苏东国家的演变首先是从共产党的演变开始的，党的性质和作用的改变最终导致了国家政权性质和国家发展方向的变化。东欧各国在社会主义事业出现暂时困难的情况下，一些思想不够坚定的人，错误地把民主社会主义当作摆脱危机的出路和良方，以致民主社会主义在

党内占了主导地位。东欧国家几乎都曾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先是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搞所谓的政治多元化、多党制、议会民主制，纵容或人为地扶植反对派，而后就一步步地后退和让步，最后纷纷宣布放弃马列主义指导原则，改名为社会党，导致党的分裂和瓦解。而反对派却羽翼日丰，最后取而代之，抢班夺权。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终于导致国家解体。戈氏上台后，当发现经济改革推不动，传统体制没有按他的意旨行事时，就开始了把矛头指向党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从十九次全国党代会开始削弱党的领导作用，以后经过苏共二十八大到1991年七月全会这一过程终于完成。党的社会领导地位被取消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被取消了，党的指导思想多元化，党的奋斗目标变为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经过这一番“改造”之后，就丧失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当党根本不起领导作用之时，苏联国家的瓦解也就不可避免了。

(2) 社会动乱是由思想混乱开始的，鼓吹极端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为反对派全盘否定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大造舆论开了绿灯。

如何看待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正确地评价其成就和失误，是事关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成败与否的大事。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反思，这是必要的。但他提出批评无禁区的主张，遂使民主化、公开性走上了极端，于是各种各样否定过去的历史虚无主义的东西开始蔓延，以致于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发展到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历史。波党内以费什巴赫为代表的一派把波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说成是一部“不光彩的历史”，一部“斯

大林主义在波兰实践的历史”，提出要同它“一刀两断”。匈党在批判过去的错误时，认为40年所走过的道路“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只是斯大林模式”的道路。这为反对派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提供了口实。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的泛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党既然解除了自己的思想武装，也就根本谈不上对这种思潮的泛滥进行任何有理有力的抵制和斗争。

(3) 迷恋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引发政治动荡。

在苏联这样原来民主传统很弱，人民群众和干部十分缺乏民主政治准备的国家里鼓吹超阶级的极端的民主化、公开性，照搬西方民主制，必然会引起极大的混乱。在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的口号下，出现了大批反共反社会主义政治组织，一些反对派夸大执政的共产党的阴暗面，以耸人听闻的手法给共产党抹黑，尤其是民主化、公开性的口号刺激了国内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和尖锐，一些民族主义组织煽动民族仇恨，把民族关系引向公开对抗。可以说，戈氏迷恋照搬西方民主原则，是造成苏联瓦解的重要原因。东欧一些国家党的领导人在国内外压力下，削弱和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同意实行所谓“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和西方议会民主制，企图迎合反对派的要求和主张以缓解政治经济危机，保住自己的执政地位，结果却使得反对派的力量一步步强大，导致了自己的下台。

(4) 无原则的退让，使反对派得寸进尺，造成政局失控。

东欧多数国家为求得国内政局的稳定，先是容忍反对派的存在，继而允许其合法化，让它们得以坐大，然后被迫同意和他们分权，直至最后丧失政权。波党丧失政权就是从承认团结工会合法化，后来又在它的逼迫下同意分权开始的。团结工会

利用波党的软弱和步步退让，得寸进尺，终于达到了“不通过暴力手段夺权的目的”。匈牙利的情况与波兰类似。匈本无反对派，直到1987年9月，在党的中央委员波日高伊支持下，才出现了反对派组织“民主论坛”。1989年8月，匈党轻信了反对派的诺言，同意分权。后来反对派背信弃义，对匈党步步紧逼，致使匈党步步退让，最后把政权拱手交给了反对派。民德和捷克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保加利亚社会党（由保共改名）1990年6月难得以相当优势赢得大选胜利，后来继续对反对派“民主力量联盟”一再退让，先是把总统位置让给了“民盟”主席热列夫，继而总统又被逼辞职，终于失去执政地位。东欧这些国家的党都想以步步退让求得反对派的合作，结果却鼓励和助长了反对派的夺权欲望，为自己构筑了垮台的条件。戈尔巴乔夫从他倡导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出发，一再作出无原则的妥协退让，致使各种蔑视反对国家权威和秩序的无政府主义和民族分立主义大肆泛滥，最后使政局失控，无法收拾。

（三）两个深层根源：党已陷入深刻危机与经济长期没搞好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重大历史事件中，个人特别是关键人物起着特殊的作用，他对事件在这时而不是在别的时候、以这种方式而不是别的方式发生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但事件深层的根源还要从“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去寻找”。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说到，1848年法国革命失败之后，有人认为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对此，恩格斯强调说：革命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

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① 苏东剧变时，这些国家“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是什么样子呢？为什么一个由列宁缔造的、有 90 多年光荣历史、近 1500 万党员的大党，可以任凭总书记个人一句话，说自动解散就解散了呢？按博尔金的说法是，“如果不是党遇到严重困难，不是党濒临危机状态，戈尔巴乔夫未必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瓦解这个有千百万人的组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东欧国家的剧变，同样有其深层的原因。

从“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来考察，苏东国家问题很多，但归根结底，最根本、最主要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党的本身存在严重问题，有的已病入膏肓，陷入了危机。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和指挥中心，好比人的大脑，它本身害了病，是致命性的。另一个是经济没搞好。革命胜利几十年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问题没有根本解决，长期过紧日子。他们将本国现状与商品琳琅满目的西方相比，产生羡慕西方、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心理是并不奇怪的。

1. 当时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已陷入深刻危机，不仅不能领导国家，而且连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也没有了。

执政党的深刻危机，主要表现在 3 个方面：一是思想和路线非常混乱，党已丧失了精神支柱和思想凝聚力，丧失了政治敏锐性和分辨是非的能力，已没有能力把握政治局势，已无法带领群众前进了。二是党内搞腐败特权习以为常，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党的领导人丧失了威信，逐渐成为民众攻击、嘲弄、唾弃的对象；对这样的党，在关键时刻，人民群众是不会为它分忧的。三是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受严重破坏，一方面是资产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501 页。

级自由化思想在党内严重泛滥，纪律松弛，派系林立，正确思想集中不起来，更占据不了优势；另一方面是个人专断横行，个人说了算，缺乏党组织和集体的监督；这样的党不仅无法领导群众前进，甚至连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也没有了。因此，尽管政权、军权、财权、文权都还在这些党自己手里，却一步一步地败在主张回归资本主义的“民主派”和民族分立主义派手里。

党的思想混乱又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党不重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要么固守马克思主义词句，无法根据新的情况发展和创新，在经济体制上长期跳不出老的框框；要么就走向另一个极端，全盘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潮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彻底背离马克思主义。二是对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没有作出公道的、实事求是的评价，造成党内思想长期混乱和政治上的迟钝。比如在苏共党内，如何正确评价斯大林的问题，就是涉及苏联历史和发展方向的大问题，可是长期来就没有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过。更没有就此作出历史决议，以统一党内的思想。由于没有弄清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对斯大林的批判和否定，发展成否定整个国家和党的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后走上了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在捷克，对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本来早该平反，可是直到80年代末连苏联方面也表示要“重新评价”时，捷共领导仍坚持原来的立场，迟迟不予平反。结果被反对派所利用，把为这一历史事件平反与反对整个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结合起来，获得了广泛支持。三是对国内外重大问题、对涉及党的纲领路线的重大问题，如关系苏共、苏联前途命运的改革，在党内就没能形成清醒的、正确的认识，而是糊里糊

涂地跟着戈尔巴乔夫走。苏联过去的体制究竟哪些需要改？先改什么？后改什么？改成什么样子？都没有弄明白。不同意他那种改法的称之为“保守派”，但也不研究究竟保的是什么？守的是什么？该不该保？该不该守？总之，党内思想是一团混乱。因此，戈尔巴乔夫的那一套东西就能够在党的会议上——通过。

党的干部腐败和特殊化，严重脱离群众，使党的威信大大下降。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 80 年代将夫人埃列娜提为第一副总理，其实际权力比总理还要大得多。1989 年 1 月又为夫人祝寿，将她与齐并列称之为“领袖”，他垮得那么惨，与其搞裙带风、个人专断严重脱离群众不无关系。东欧其他国家的领导干部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败和特殊化问题。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说，戈尔巴乔夫在国外得到过许多奖金、奖品、稿费。当时个人账户上已有 100 万美元。有一次访问南朝鲜回来，从皮包内拿出一个信封，内装 10 万美元，是卢泰愚送的。苏东地区的共产党，不少已在公众中失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形象，在关键时刻，人民群众也就不会为这个党分忧。叶利钦在群众中威望的上升是从他坚决反对特殊化开始的。许多国家的造反派都抓住了执政党的这一弱点，迎合了群众的“逆反”心理。

党内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不仅使党丧失了战斗指挥部的能力，而且连自身的矛盾也解决不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的问题在苏共党内由来已久。斯大林时期搞个人迷信、个人专断，30 年代破坏民主法制，错杀了许多人，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形象。苏共二十大以来不断地批斯大林，但党并没能真正从中吸取教训。戈大讲民主但实际上党内缺乏民主，仍是戈一人说了算。利加乔夫回忆说，他在改革问题上与“激进派”有原则分

歧，1990年5月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书面意见，要求中央全会讨论，可是戈一直置之不理。对党的第二把手的意见是如此，对其他人的意见就可想而知了。雷日科夫回忆说：“党的二十八大会以后，我感觉不到政治局的存在”，许多重大问题都是戈个人决定。雷因病住院后，戈想建立总统内阁代替依照宪法而成立的部长会议，曾就总理人选去医院征求雷的意见。戈走时说“严肃问题”再考虑商量，但一天后总理人选却确定了。雷回忆时惊奇地说：“看来‘严肃的问题’并不需要长时间的决定。在总统星期六拜访我和星期一早晨确定新总理之间只有一个休息日。我无法钻到我高贵的来访者的心里去，但我倾向于认为，星期六晚上戈尔巴乔夫就非常清楚，谁将领导内阁。”决定总理人选可由戈个人决定，其他重要人选也是这样。据跟随戈左右多年的博尔金回忆：“有一次我走进戈尔巴乔夫的房间，看到他一个人坐在小房间一副孤独的、凄凉的样子，拟定着中央委员会这个几十年来在我国最高最有力的机关的成员名单。我看了纸上字迹潦草的姓名，突然感到，在这些纸上已经确定了一场大悲剧的最后几幕”，“戈尔巴乔夫这个在人民中已失去威信，甚至在党内也失去影响的人，竟然可以独自确定苏共的领导人，从而确定一个大国的领导人，确定自己意志的执行者。这又一次证明了现行体制的不完善和缺陷，它竟允许一个人决定千百万同胞的命运，决定一个大国的命运”。

苏共党内的问题到了60年代已很严重，但当时还有能力解决赫鲁晓夫搞“一言堂”的问题，1964年把他赶下了台。可是20年之后，戈尔巴乔夫上台，党内民主集中制进一步遭到破坏，苏共就再也没有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了。博尔金讲到苏共中央全会的印象时说：“在全会会议大厅中坐着的是过去伟大时代的一些影子，他们是否感到党和国家的崩溃已近在眼

前？我想，大多数人是感觉到了。但是，在现任总书记领导下，他们已无力改变任何东西了，很多人在等待他们时代的结束。”当时党内上下无可奈何地看着，直到戈尔巴乔夫个人下令解散苏共中央委员会，停止各级党组织的活动。足见苏共党内危机已达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2. 经济长期搞不好，动摇了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迷信“改制”就可以迅速过上西方富裕的生活。

经济没搞好是剧变的一个深层原因。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① 在近年来的讨论中，有同志说这还是个“觉悟问题”、“教育问题”，是这些国家的党放松了对群众的思想教育。我们认为，思想教育当然重要，但也不是万能的。“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② 只要不陷入唯心论，就决不应忽视经济没搞好这个深层的根源。

苏联的经济，在二战前和战后恢复时期曾经有过一段飞速发展时期。东欧国家的经济在50年代发展得也比较快。60、7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减慢。80年代后期经济停滞、或零增长、或负增长。苏联同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来已缩小的经济差距又重新拉大了。经济困难是引发动乱的重要原因。据报道，1989年12月22日齐奥塞斯库及其夫人在逃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

跑的路上问一名工人“你们为什么要推翻我们”时，那名工人就回答了两句话：我们为啥不推翻你们，一是面包不够吃，二是隆冬腊月没有暖气取暖。这名工人回答不一定十分全面，但却击中了罗马尼亚政局突变的要害。原波兰统一工人党最后一任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在谈到波党失败的教训时说：“波党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经济没有搞好，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经济建设搞好了，其他一切问题都好办。经济搞不好，群众不拥护，说话没人听，就有丧失政权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和人民生活水平比不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段时间可以，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原来的基础比它们差，但时间长了不行。特别是原来基础与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前差不多的国家，后来发展如果超过了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挑战就更严重、更尖锐了。经济问题就成了政治问题。

3. 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没搞好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好，而在于其社会主义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以及经济体制长期存在严重问题。

苏联和东欧国家虽然不断有人想改革，并断断续续搞过一些改革，但始终没跳出旧的框框，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如果说，这种体制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那么在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新的国际形势下，已越来越不适应。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没搞好的具体原因是：

(1) 总的建设指导思想上的长期脱离实际，超越阶段。苏共长期来对苏联社会主义所处阶段的认识和估计是脱离实际的，总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欲速则不达。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39年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一过程中断了。战后的1952年苏共十九大又恢复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口号。赫鲁晓夫时期，

继续坚持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口号。1959年，提出苏联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新时期。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提出要用20年时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修改了赫鲁晓夫的苏联“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估计，但仍认为已处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在安德罗波夫时期仍肯定苏联处在“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但在成熟程度的估计上较之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接近实际一些，认为苏联正处在发达社会主义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在1986年使用了“发展中社会主义”的提法，但这一估计并没有成为苏共制定纲领路线的依据。

(2) 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经济长期搞不好的主要原因。这种体制一是从超越阶段急于求成的思想出发，在所有制上追求纯而又纯，违背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水平的规律。苏东国家普遍采取高度单一的公有制，使经济缺乏活力。二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上长期奉行加速赶超计划任务，只求速度、数量，不顾质量效益，既浪费资源，又造成经济结构失调。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足，市场供应紧张。长期实行物价补贴政策，又使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重，严重影响这些国家的技术进步、设备更新和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对外经济关系上局限于经互会封闭式的合作机制，脱离世界经济和科技大潮，而向西方举债又超过了国力。

(四) 一个根本教训：背离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

苏东悲剧，原因有千条万条，但从本质上看就是因为背离、放弃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苏共在历史上，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不小成就，把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变成了一个能与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相抗衡的大国。但

是因为总的指导思想和路线上长期“左”的错误，在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在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上都出现了失误，长期搞输出革命插手别国事务，超出自卫需要的军备竞赛，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各种“左”的政策，严重阻碍了国内经济的发展。斯大林搞个人迷信、个人专断，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极大地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邓小平同志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①这说明苏共“左”的思想路线不纠正是没有希望的，政治经济体制上的严重问题不改革是不行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必须大大发扬，法制也必须完善。但问题在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尽管有各种严重问题和错误，包括对社会主义的严重扭曲，然而其基本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的，不能在改革和纠正其错误时，将“孩子”连同脏水一起倒掉，彻底学西方。在经济体制方面，苏联东欧国家断断续续地搞过一些改革，但长期没能突破旧的框框，总的说来未能跳出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后来又突然转到全盘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由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跳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顶礼膜拜。如果说斯大林时期的主要问题是“左”，那么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既有右的东西，也有“左”的东西，但长期来主要是“左”，导致最后的右。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东西，本质上都是背离马克思主义。东欧的情况虽有不同，但大的方面是一样的。它们的垮台，从根上讲也就垮在这里。

“老祖宗”不能丢，但时代在前进，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苏东剧变中应吸取的教训是，必须坚持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苏东地区的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在西方“和平演变”攻势面前解除了思想武装，导致了亡党亡国的悲剧，这个教训一定要记取，但不能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看到苏东的悲剧能够发生，经济没有搞好是深层的根源，于是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因此，我们要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无论如何不能干扰和动摇这个中心。把经济建设搞好了，在实践中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这是从根上铲除“和平演变”的土壤的大工程。一定要坚持一个中心，不是两个中心；一定要坚持两个基本点，不是一个基本点。牢记邓小平同志的告诫：“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① 这就是说，放弃社会主义是死路；不改革开放是死路，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胡改瞎改也是死路，只有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实行正确的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柳暗花明”、繁荣昌盛的康庄大道。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0 页。

第 2 章

废墟上的艰难与希望

——剧变后苏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

剧变后苏东地区国家多数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动荡，少数甚至发生了战乱。经过几年的搏击和磨合，现在多数国家在政治上已基本确立了总统制、议会制和多党制的政治格局，政治体制在总体上学西方中又各有变异和特色，政治斗争的方式则大多由动荡的“街头政治”逐步转向议会大厅和权力机构内部；在经济上，普遍推行“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制度，经济形势经历了衰退下滑开始逐渐恢复，但要完全恢复元气尚需若干岁月；在意识形态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狂热已降温，但在多元化的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不占主导地位；标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名、国旗、国徽等标志早已统统改掉；国家总的政治方向已不是社会主义，虽然

个别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当政的国家也宣称搞“民主社会主义”。总之，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在价值取向上已不是社会主义，但也不是简单地回归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尚处在调整和转轨过程中。

苏东大地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政治地震”之后，原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当中的波罗的海3国已独立，其他12国组成了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原东欧的8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中民主德国已并入联邦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南斯拉夫则分裂成5个国家；于是，这一地区原来的9个国家变成了27个国家。几年来，这27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如何？

一、震后的辛酸与苦难

剧变后苏东地区普遍经历了一个极不稳定的时期。一些国家出现了战乱，其余国家也经历了激烈的政局动荡。呈现出经济连年滑坡，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生活在这一地区的3.7亿多居民不仅没能迅速过上西方的富裕生活，反而饱尝了制度变化带来的辛酸和苦难。

1. 社会政治转轨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使战后长期和平稳定的“绿洲”，迅速变成了世界热点集中的地区。

苏东国家的剧变是“和平”的，但并非没有战乱和流血。由于转轨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以及民族分离主义的迅速发展，一些国家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内战和流血冲突。前南斯拉夫地区

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发生了连年的内战，前苏联外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为争夺“纳—卡”而发生了武装冲突，中亚塔吉克斯坦围绕建立世俗国家还是政教合一国家而爆发了内战，格鲁吉亚因民族矛盾发生了武装冲突，俄罗斯因车臣闹独立而引发了流血。这些硝烟弥漫的战火和流血事件，持续了多年，不仅给当地居民带来了苦难和造成政局不稳，还严重影响到地区乃至世界局势的稳定，引起了周边国家和世界的关注。经过多方努力，这些热点到1995年前后才逐渐趋向政治解决或降温。

波黑内战持续多年，使当地居民饱尝了二战以来最大的苦难，并严重影响到巴尔干地区和欧洲的稳定。波黑战争的直接经济损失达800亿美元，南斯拉夫联盟因国际制裁蒙受上千亿美元损失，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调解和干预下，塞尔维亚总统及克罗地亚、波黑总统于1995年11月21日才就政治解决波黑问题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同年12月14日波黑和平协议在巴黎正式签署，为全面解决原南危机奠定了基础。

“纳—卡冲突”即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争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而发生的武装冲突，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苦难，还造成两国政局严重动荡，政权几经更迭。1992年3月，阿塞拜疆政府军因在冲突中严重失利，总统穆塔利博夫被迫辞职。1993年，阿局势继续动荡，并发生了反总统的兵变，总统被迫下台。纳—卡冲突也影响亚美尼亚国内政局的稳定。1992年7月由于亚美尼亚当局与反对派在解决纳—卡冲突问题上意见相左，捷尔—彼得罗相总统解除了总理的职务。从1995年开始，亚美尼亚政局才逐渐稳定下来。

塔吉克斯坦武装冲突是国内为建立世俗国家还是建立政教

合一国家的两派发生的武装冲突。经过几轮争夺和谈判，在俄罗斯和中亚其他国家的支持下，拉赫莫诺夫总统才控制住塔吉克斯坦局势。但反对派仍要求分享权力，后来双方出现谈谈打打的局面，估计塔要真正实现和平尚须时日。

格鲁吉亚的民族冲突曾此起彼伏。1992年1月，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自治州要求独立，遭格鲁吉亚当局拒绝，矛盾演变为武装冲突。同年7月，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维护和平部队进入冲突地区，局势有所缓和。与此同时，格鲁吉亚西部的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也于7月宣布为主权国家，格鲁吉亚当局拒绝承认，又引发了武装冲突。1993和1994年，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格鲁吉亚内部的武装冲突才出现缓和趋势。1995年南奥塞梯的局势开始平静，南奥塞梯当局同意在格鲁吉亚内部实行政治自治。但阿布哈兹冲突仍时有发生，双方谈判未取得实质性进展。1996年1月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对阿布哈兹实行制裁，直到同意与格鲁吉亚统一为止。

在俄罗斯，除了车臣的武装冲突，还有1993年10月总统为解决其与议会的“两权之争”，而发生的地震“白宫”（议会大厦）的流血事件。

2. 政治动荡、国家重组和经济转轨交错并行，使各国普遍经历了经济倒退。大范围区域性萧条、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两位数的失业率、原有社会保障的丧失、国家和人民因此所受的痛苦，都是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以来史无前例的。

专家估计俄罗斯经济约倒退20年。自1992年1月以来，俄罗斯经济一直呈恶化趋势。1996年与1991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5%，工业总产值下降45%，农业总产值下降32%，整个经济下降幅度大大超过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当时国

民生产总值下降25%)和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当时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下降30%),整个国民经济倒退了20年左右。经济衰退,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据统计,1991—1966年,俄罗斯物价上涨了6188倍,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更大,职工名义工资虽有所增加,但远远落后于物价涨幅。当初存入银行准备用于购买小汽车的钱,如今只能坐3—4次公共汽车,原来买一个面包只需13个戈比,现在却需花3000—4000卢布。失业、半失业人数达到960万,约占劳动能力人口的13%,有4000多万人生活在官方公布的贫困线(月收入27.6万卢布)以下。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分化现象加剧。10%富裕阶层的收入约为10%贫困阶层收入的15倍。5%的居民月收入达2万美元以上,一般居民月收入为130美元,领养老金的人月收入仅为6万卢布左右。由于生产持续滑坡,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一落千丈。据国际权威机构统计,1991年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在世界上占第五位,在欧洲占第三位,而到1997年降至世界第十位和欧洲第六位,其竞争力排在世界第四十六位,其国内生产总值已远远落到发达国家之后,跌入中等发达国家之列。

1997年,俄罗斯在独立后首次出现经济好转迹象,1998年又出现金融动荡,2000年前不会有较快回升。据统计,1997年俄国内生产总值比1996年增长0.4%,工业总产值增长1.9%。联邦预算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1%,支出占15.3%,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2%,为俄独立以来的最低水平。年通货膨胀率为14.7%,大大低于前几年的通货膨胀率。居民收入比1996年增长2.9%,月平均工资为167美元。由于俄政局持续动荡,世界石油市场价格下跌,以及受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上半年俄经济出现了下跌迹象。俄领

领导人承认，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俄经济水平倒退了5年，间接影响也十分严重。1998年5月，俄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也一度出现了金融动荡。

其他独联体国家普遍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经济下滑。

独联体欧洲3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经济持续滑坡。乌克兰的经济，1992年比1991年下降14%，1993年又比1992年下降16%，全年通货膨胀率达8940%，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1995—1997年乌克兰的经济状况总体上仍呈恶化状态，1997年只有燃料、黑色冶金等个别部门生产略有增长。在原苏联时期综合实力仅次于俄罗斯的乌克兰，经济状况在独联体各国已跌到了倒数第三或第四的位置。白俄罗斯独立之初由于政治上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经济下降幅度较小。随着政治局势的动荡，与独联体其他国家经济联系的中断，白俄罗斯的经济形势也日益恶化。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94年下降10%，工业产值下降11.5%，农业产值下降5%，消费物价上涨7倍。1997年经济形势略有好转，下降幅度减缓，个别经济部门生产有所回升。1998年上半年经济呈平稳发展状态，经济的真正复苏尚需时日。摩尔多瓦独立后，经济状况持续恶化。1992年工业总产值比1991年下降22%，农业总产值下降18%。1995年工业比1994年下降6%，农业产值增长4%。由于能源和原材料奇缺，许多工厂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1997年摩的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但总体经济形势依然严峻。

中亚5国（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的经济也明显呈衰退趋势。国内生产总值1994年同1990年相比，哈萨克斯坦下降50%，吉尔吉斯斯坦下降50%，乌兹别克斯坦下降17%，塔吉克斯坦由于发生内战，经济下降

幅度更大。各国商品普遍短缺，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商品零售额 1994 年与 1991 年相比，哈下降 72.4%，吉下降 69.5%，乌下降 48.2%，塔下降 86.1%，土下降 73.8%。经过几年的经济改革，从 1995 年起，5 国经济下降速度趋缓，个别领域才出现积极迹象。1997 年，5 国的经济状况除塔吉克斯坦外，均有不同程度的好转，哈、乌、吉、土 4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均较 1996 年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外高加索 3 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因原有经济联系中断，经济衰退严重。阿塞拜疆 1992 年国民生产总值比 1991 年下降 35%；1994 年比 1993 年又下降 21.9%。1995 年经济下降幅度略有减缓（比上年下降 17%）。由于外国投资开始增加，全年共引进外资 1.6 亿美元。围绕开采里海石油，阿与美、英、俄等国签署了几个开采合同，并成立了两个石油开采集团，1996 年起，经济开始出现好转。格鲁吉亚自独立以来，经济形势一直呈下滑局面。1992—1994 年，生产下滑幅度平均每年为 26% 左右。1995 年起格鲁吉亚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下滑速度明显减缓，个别经济部门有所回升。但从总体上看，格鲁吉亚经济仍处于艰难的转轨时期，经济复苏时期尚未到来。亚美尼亚独立后经济持续下降。1991 年，阿塞拜疆关闭了通往亚美尼亚的天然气管道，使亚 80% 的企业被迫停产，经济受到严重打击。1993 年亚美尼亚经济降至谷底。1994 年 5 月，纳—卡冲突实现停火，为亚美尼亚获得国外贷款创造了条件，亚经济开始出现转机，并缓慢回升。1994 年同 1993 年相比，亚美尼亚国民收入增长 4.3%，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6.9%。1995 年，国内生产总值比 1994 年增长 5.8%。1996 年后，亚美尼亚的经济已连续出现增长势头。

波罗的海 3 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经济衰退

持续时间较短，但也经历了痛苦的过程。立陶宛 1991 年全面放开物价，并开始实行私有化。1992 年国民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和农业生产均下降 50% 左右。1993 年立陶宛经济仍比较困难，但由于退出卢布区，发行本国货币，金融形势较平衡，市场机制开始运行。1994 年经济下降幅度减缓，全年国民经济下降 6.9%。1995 年经济开始走出低谷，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3%。1996—1997 年立陶宛经济继续保持缓慢增长势头。拉脱维亚独立后，开始推行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改革。由于与原苏联各共和国的经济联系被破坏，能源和其他商品的进口供应遇到严重困难，独立后最初几年经济曾大幅度下降。1992 年通货膨胀率达 1050%。1994 年后，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生产大幅下滑的势头基本制止，金融机制稳定，通货膨胀率明显下降。1994 年国内生产总值仅下降 2%，全年通货膨胀率为 26.3%，在波罗的海 3 国中最低。1995 年起，拉脱维亚经济一直保持着缓慢增长势头。爱沙尼亚独立后经济形势十分严峻。1992 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28%。1993 年经济困难有所缓和，发展渐趋平稳。1994 年经济增长 3.4%，1995 年，爱沙尼亚的经济转轨基本结束，开始在新的市场经济轨道上运行。1995 年起，除农业部门外，其他经济部门基本上都呈增长趋势。

3. 东欧地区的经济比苏联地区恢复得要快，但大多仍处低谷徘徊阶段，本世纪末难以恢复到剧变前的水平；而且发展很不平衡，已出现了“南北差距”拉大的现象。东欧北部国家主要是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 5 国，南部基本为巴尔干国家。北部 5 国经济转轨已初见成效。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各国经济连续几年保持增长势头，多数国家已达到或接近剧变前的水平。斯洛文尼亚人均年产值近万美

元，居东欧之首。相比而言，南部各国情况却大相径庭。经济体制转轨普遍步履维艰。许多经济改革措施未真正启动。波黑等国尚处于战后重建阶段。虽然一些国家经济有所增长，但由于起点低，增幅小，问题多，总体经济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波黑、马其顿的失业率高达50%和37%以上。1997年头两月保加利亚通胀率创纪录地骤升至400%。罗马尼亚的经济状况也并不乐观，物价暴涨，引起百姓不满。

波兰1989年开始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为目标的经济改革，经历较短的下降，改革很快取得成效。1992年经济首次出现了增长，工业比上年增长4.2%。1993—1997年，波兰经济连续增长，年增长率均在5%左右。目前，波兰是东欧经济转轨较为成功、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

捷克1989年发生剧变，并开始进行经济改革，1989—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呈下降状态。1994年起，捷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开始出现增长趋势。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2%。1996和1997年继续呈增长趋势。1995年11月，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接纳捷为第26个成员国。

斯洛伐克1989年至1993年，经济一直处于衰退状态。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92年下降20%，通货膨胀率为14%。1994年起政府对经济政策进行了适当调整，开始放松银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注意引进外资。1994年经济略有回升，1995年出现增长势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6.6%。1996年起，斯洛伐克经济继续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

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初期（1990—1993年）经济形势恶化，国内生产总值共下降20%，工业产值下降40%，农业生产下降36%，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通货膨胀率年平均约为27%。1993年国际支付逆差高达30亿美元。1994年，

匈牙利政府总结了过去几年经济改革的经验，提出了“先治理、后稳定、再发展”的经济纲领，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制止生产下滑，控制通货膨胀，改善外贸失衡等。当年匈经济开始出现好转，生产从停滞转向回升。从1995年起，匈牙利经济出现了低速增长势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2%，投资增长7%，出口增加，国际支付逆差有所改善。目前，匈牙利是东欧经济转轨较为成功、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

罗马尼亚改革之初，经济形势呈下降趋势。1992年社会产品总值比1991年下降15%。1993年罗马尼亚议会通过了《经济和社会改革战略》，经过几年的改革，1994年经济开始出现整体好转趋势，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9%。但在东欧经济转轨国家中，从总体上看，罗马尼亚经济改革速度较慢，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

保加利亚1991年2月在世界银行的协助下开始实施“休克疗法”。改革造成生产严重衰退、通货膨胀率高、失业人数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后果。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9.5%，1993年又比1992年下降20%。但从1994年起，保加利亚经济在连续5年下降之后首次出现增长，当年较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2%，工业增长4%。

1995年，经济明显出现好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5%，工业产值增长5%。然而1996年经济又出现下滑局面，1997年出现好转。在东欧国家中，保加利亚属于经济转轨较慢，经济状况较差的国家之一。

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基础较差，属于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1989—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每年递减50%。1992年，阿尔巴尼亚政府决定加快经济改革步伐，1993年被阿当局称为“私有化年”。1994年私营企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0%。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6%，工业生产增长6%，农业生产增长11%。但1996年阿国内发生动乱，对经济复苏造成了严重消极影响，国民经济的增长势头陷入停滞。在欧洲国家中，目前阿尔巴尼亚仍属于最落后的国家之一。

南斯拉夫由于受波黑战争的影响，尤其是1992年5月联合国对南实行制裁以来，南经济形势急剧恶化。1993年南社会产值仅相当于1966年的水平，经济面临崩溃。1994年1月起，南开始实施“改造货币体制和复苏经济战略”的新经济纲领。新经济纲领实施后，取得了较好成绩，南的恶性通货膨胀得到初步控制，生产下滑幅度减缓。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陷入战乱，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等国独立后政局基本稳定，并与欧洲国家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1995年各国经济普遍出现增长势头。

二、政治体制：在总体学西方中 又有变异和特色

剧变时，苏联东欧国家普遍迷恋西方政治制度，如多党制、议会制、总统制等。剧变后经过修宪、立宪以及建立现行制度的法律框架，逐步确立了三权分立和多党议会民主制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与西方的政治体制是基本一致的，但又各具变异和特色。

东欧、波罗的海国家和独联体的摩尔多瓦基本属于一个类型，它们的政治体制更接近西方一些，但也不尽相同。如它们国内的政党在大选中获得多数，就可以单独或联合组成政府，成为执政党，这与多数独联体国家是不同的，而与西方相近。

然而它们的政治制度同西方的也不完全相同。如东欧有些国家的宪法规定，总统必须“超党派”，党的领袖当选总统后，必须退出原来的政党；有的国家还颁布了各政党不得在机关、厂矿、学校开展活动的《非政治化法》。此外，各国的多党制、总统制、议会民主制的框架虽已基本确立，但总的讲来还很不成熟，运转也不正常；有的政党对议会民主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为自己政治斗争需要，有时越出轨道转而采取“街头民主”手段，以致酿成严重流血事件。如1996年保加利亚“民主派”为逼社会党下台，组织数万群众围攻议会大厦，酿成了剧变以来最严重的流血事件。阿尔巴尼亚前执政的民主党和总统贝里沙大肆迫害打击对立面社会党，在党内也实行高压，清洗异己。南斯拉夫的“民主派”1996年组织首都和其他30多个城镇连续3个月举行大规模街头游行，引起政治冲突和动乱。这说明，这些国家要走上正常的议会民主轨道还需一个很长的过程。

独联体国家的政治体制，虽然总体上与西方是一致的，但差异性更大一些。独联体各国的宪法都规定了“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多数国家还规定实行政治多元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等原则。各国宪法一般还规定，人民是国家主权拥有者和国家权力的唯一源泉，人民直接或通过其代表间接地行使其权力。各国都把建成民主的法制国家和世俗的公民社会作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基于这一思想，各国宪法均载有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一部分人不得窃取国家政权，重大问题须提交全民讨论或全民公决的规定。西方社会普遍接受的民主、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各种所有制形式一律平等原则，在各国宪法中均有不同形式的表述。这些都是接近或类似于西方的。但是，独联体国家的政治体制又与

大多数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异：

第一，独联体多数国家虽都宣称实行多党制（土库曼斯坦仍实行一党），但政党的地位和作用与西方不同。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因为在本国议会中据多数席位而组成政府。俄罗斯共产党、乌克兰共产党都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但都不能单独或联合组成政府，成为执政党。在实行总统制、进一步扩大总统权力的情况下，即使是已进入议会的重要政党，其权力和作用也是有限的。一般情况下它们只能对行政当局制定和执行内外政策施加些影响，起些牵制作用。有些国家的政党干脆听命于总统，成为宣传、执行总统意志和内外政策的工具。

第二，独联体国家一般实行总统制，总统权力极大。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宪法明确规定，经议会同意，总理、内阁重要成员甚至全体成员由总统根据规定的程序任免。在这些国家中总统的权力在不断扩大，而政党、议会的作用在缩小。在前苏联地区各国，除摩尔多瓦实行多党议会制、总统只服从议会外，其他各国不管有无明确规定，实际上都在加强总统权力和推行总统制，总统的权力相当大。例如，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中亚五国的宪法都明确规定，总统是国家元首、国家武装力量的统帅，按照法定程序任免总理、副总理、重要阁员甚至全体成员。俄罗斯总统还有权“决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基本方针”，“领导俄联邦的对外政策”，有权主持俄政府会议，发布俄全境都必须执行的命令和指示，任免总统全权代表，按法定程序解散国家杜马；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总统为“执行机关首脑”，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为“内阁主席”，土库曼斯坦总统“领导内阁”，哈萨克斯坦总统“主持统一的行政权力体系”，吉尔吉斯

斯坦总统“有权主持政府会议”。有的国家总统还有权按照法定程序任免地方行政长官甚至司法机关领导人。总之，各国总统拥有难以监督和抗拒的巨大权力。

第三，为加强总统的权威，国家权力进一步向总统倾斜，一些原来设置副总统的国家纷纷取消了这一职位。在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起初都设有副总统，但在俄罗斯出现叶利钦总统与鲁茨科伊副总统发生冲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与副总统米尔萨依多夫发生龃龉之后，所有上述国家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宪法行动，取消了副总统职位。

第四，为巩固总统制政体，中亚国家为“跨世纪总统”作出了安排。土库曼斯坦的尼亚佐夫总统1993年即已被该国人民委员会授予“土库曼巴什”（意为土库曼大首领）封号，1994年初又经全民公决特准连任总统直到2002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通过全民公决，已将现任总统的任期延长到了2000年。

几年来，独联体国家为建立这种“总统—议会制”政治体制，总统与议会残酷厮杀，不乏血腥场面。总统要扩大权力，而议会要限制其权力，双方斗争非常激烈。斗争的结局一般是总统获胜，总统权力扩大、议会权力缩小，政府权力扩大、政党作用缩小。经过几年激烈斗争，陆续建立了这种“总统—议会制”。

俄罗斯在1991底苏联解体后，从1992年起出现了“两权之争”，即以叶利钦为代表的俄执行权力机关和以哈斯布拉托夫为代表的立法权力机关的斗争，导致俄政局全面动荡。当时的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对叶利钦奉行的全面放开物价、大规模推行私有化等做法不满；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

夫也抨击叶利钦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工作不力，领导无方，提出要削减叶利钦的权力，增大议会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一些持中间立场的俄政治人物和组织出面调停，希望双方彼此妥协，维护社会稳定。1992年12月在俄罗斯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叶利钦被迫免去了民主派代表人物盖达尔的代总理职务，任命切尔诺梅尔金为俄政府总理。但此举并未消除总统和议会之间的矛盾，双方的脆弱妥协很快被打破。1993年4月25日，俄罗斯就是否信任总统、是否赞同总统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是否支持提前选举总统和议会举行全民公决，在有65%选民参加的公决中，叶利钦获得略超过半数的支持票。叶利钦利用同反对派斗争占上风的机会，决定通过一部新宪法，以便从国家根本大法方面确保自己的权力。但此举又遭议会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于9月21日起颁布一系列命令，宣布停止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职能，并调用大批军警封锁议会大厦——白宫。10月3日对立双方展开武装搏斗，反对派因在力量上处于绝对劣势等原因而失败，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等人被捕，俄“两权之争”以叶利钦获胜而告终。1993年10月“白宫事件”之后，12月俄罗斯经过新议会下院——国家杜马的选举，并以全民公决方式通过了叶利钦领导制定的新宪法。1994年1月经过激烈斗争组成了新政府。从此俄罗斯政局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特点是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形式以在宪法范围内和在议会中的斗争为主，街头政治活动明显减少；由于总统握有巨大权力而议会作用有限，虽然议会中反对派占优势，但议会和总统关系较前明显减缓。1994年后，俄罗斯政治舞台上虽仍风云时起，但没有出现影响全局的重大事变，政治局势保持相对稳定。1998年3月23日，俄政局风波又起。叶利钦小病初愈回到克里姆林宫后会见切尔诺梅尔

金，突然宣布解散俄罗斯政府，由他本人代行总理职务。随后叶利钦又签发总统令，任命燃料和动力部长基里延科为政府第一副总理，代行总理职务。而在此之前，叶利钦已下令解除第一副总理丘拜斯和副总理兼内务部长库利科夫的职务。叶此举在俄引起强烈反响，俄共等反对派指责叶利钦独断专行。4月叶利钦正式提名基里延科任俄政府总理，杜马经过3次表决后才获得通过。基里延科随后组成了新政府，俄政局又恢复了相对稳定与动荡相交织的局面。

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在制定新宪法等问题上与议会产生冲突。库奇马主张建立一个以总统为首的总统一议会制共和国。而议长莫罗兹和议会中的左翼力量主张建立一个议会—总统制共和国，他们对总统班子制定的宪法草案表示不满，并起草了自己的草案，主张扩大各级议会的权力，提高其地位和职能，国家元首的权力应缩小等。由于双方在制宪问题上分歧严重，致使乌克兰制定宪法的工作一拖再拖。结果于1996年6月，乌克兰通过了独立以来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是以库奇马总统提出的“总统一议会制”为基础的。宪法规定，乌克兰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执行权力机关的首脑，有权独立组阁，任命或罢免总理和其他政府成员，有权就国家体制的重大问题宣布举行全民公决，总统可以就法律未作规定的经济改革问题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总统令，等等。根据这部宪法，乌克兰的真正权力掌握在总统和国家各级行政机关手中。

白俄罗斯议会与总统间的斗争曾酿成危机，后俄罗斯出面调解才得解决。1995年1月，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总统法》，开始限制总统权力，总统与议会的矛盾开始暴露。卢卡申科总统批评议会阻碍白俄罗斯摆脱经济危机，妨碍国家行政机关正常工作，要求议会自动解散，并提议举行全民公决。

议会否决总统建议，但卢卡申科称如果议会不改变立场，他将下令中止最高苏维埃的活动。经过讨价还价，议会最终同意将总统提出的问题提交全民公决。1995年5月14日，白俄罗斯举行全民公决，其结果有利于卢卡申科，总统获得了解散议会的权力，并逐渐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总统垂直权力体系。卢卡申科在同议会的斗争中初步占了上风。卢卡申科的权力得到巩固后，又要求修改宪法，以进一步扩大总统权力，此举又遭到议会以及反对派的强烈反对。1996年7月，白俄罗斯人民阵线指责卢卡申科压制民主，要求最高立法机关让卢卡申科辞职。随后，白俄罗斯的12个政党又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总统扩大自身权力，认为卢卡申科制定的新宪法是在为一个法西斯国家奠定基础。议会与总统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卢卡申科威胁说要解散议会，而议会则准备弹劾总统。在此情况下，白俄罗斯总理奇吉里因不同意卢卡申科的立场而辞职。白俄罗斯政坛斗争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叶利钦总统呼吁双方寻求妥协，切尔诺梅尔金总理和俄议会两院主席亲赴白俄罗斯参与调停，终于使白俄罗斯的上层政治斗争有所缓和。11月14日，白俄罗斯就总统和议会提出的7个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卢卡申科又获得了胜利，权力进一步扩大。总统有权解散议会下院，经上院同意可任命宪法法院院长、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等，并且有权任命宪法法院和中央选举委员会成员中的一半。反对派则在公决中严重受挫。

有学者认为，苏东国家的政治体制在总体上学西方中又带有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特色。“总统一议会制”根植于各国的历史传统和固有文化，即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国的“专制主义”的历史印迹；高加索国家的政治体制难免带有“强人政治”色彩；中亚一些国家则难免倾向于“新权威主义”模

式。东欧国家、波罗的海国家和摩尔多瓦则可能多一些西方民主色彩，但也要经历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这些国家的多党制目前仍处在不成熟阶段。除土库曼斯坦仍坚持一党制，乌兹别克斯坦实行没有反对派的有限多党制外，独联体多数国家的政党如林。俄罗斯的多党制较发达一些，政党的作用在加强，党派丛生时期逐渐过去，正逐渐集中形成几股势力，即以俄共为首的中左翼力量、以“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为首的中右翼力量两大阵营。列别德新近组成人民共和党试图走“第三条道路”。但总的讲来，独联体国家的多党议会民主制还在低水平上发展。

三、经济体制：私有化与 市场机制双重转轨

苏东国家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 50 年代以来各国断断续续搞过一些改革，但除南斯拉夫外，都未能从根本上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这是它们经济长期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因此改革是必要的、必然的。然而苏东国家认为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要抛弃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从改变所有制入手，变公有制为私有制。所以苏东国家经济体制的转轨是与“私有化”紧密相联的，是从计划机制到市场机制、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双重转轨”。

苏东国家所说的“私有化”，虽然各国含义不尽相同，但基本意思都是指将国有资产无偿或有偿地转变为个人所有或法人（股份公司等）所有，使每个企业都有“具体的主人”。它们把非国家经营管理的集体企业、股份公司也算在“私有化”

的目标之内，因此有的也把“私有化”称为“非国有化”，或二者同时并提，如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中亚诸国除了提“私有化”外，也提“非国有化”。

苏东国家的私有化一般分为“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两种。小私有化指的是对商业、服务业企业，以及小型工业、运输和建筑企业的私有化，是指将这些企业通过出售或公开招标竞争进行拍卖，转为私人或法人的企业。大私有化指的是对大型企业（在俄罗斯规定为职工人数在1000人以上，1992年1月1日固定资产帐面净值在5000万卢布以上的），先将其改造成开放型的股份公司，然后公开出售股票，变成公众的股份公司。对中型企业（在俄罗斯是200人以上、1000人以下，固定资产帐面净值在100万卢布以上、5000万卢布以下）既可以拍卖，也可以实行股份制。

私有化的实施办法是，一般先发放私有化证券。凡本国公民，不分年龄、地位、收入水平，每人领取等值的私有化证券。在俄罗斯，联邦政府决定，从1992年10月1日开始向每个俄罗斯居民发放面值为1万卢布（按当时汇率计算相当于32美元，或相当于4个月的平均工资）的私有化证券。当时俄罗斯全国所发证券的总值相当于全国国有资产总额的35%。居民凭私有化证券，在专门拍卖市场上购买公开出售的私有化企业的股票。企业职工可以优惠条件购买本企业的股票，还可以无偿获得25%的无投票权的普通股票。政府在实行大私有化时对职工的优惠程度规定了3种优惠方案，供企业职工选择。其中一种方案规定，职工不享受优惠，购买51%有投票权的股票，职工拥有多数控股权，就可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在实际执行中，已实行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大多数都选择了这种方案。

这种私有化办法在实际执行中也有不少争议。有人认为按人头平均分发私有化证券，没有考虑工龄和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大小，有几十年工龄的人与刚出生的婴儿同样得1万卢布是不公正的。企业职工享受优惠，他们所持证券的实际价值比別人高出几十倍，这实际上也不平等。企业领导人和职工购买本企业的股票，因未充分启动市场机制，用私有化证券购买本企业股票，价格低于企业帐面价值，实际上将全民所有的财产无偿地交给了企业领导人和职工。这种封闭型的股份制企业对外部投资者吸引力不大，产生了资本流动性差、资本流向不明、原班人马、原来的管理机制等消极后果，对企业转换机制不利。

苏东国家的私有化在实施中存在不少问题。第一，各国普遍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资金不足，国内很少有人买得起，因此私有化进展缓慢。因为这些国家长期实行的是低工资，居民存款很少，缺乏投资和购买能力。根据放开价格前的计算，俄罗斯有1.5万亿卢布的固定资产，居民能投入购买资产的最大货币量约有500—800亿卢布，只有固定资产总值的3%—5%。乌克兰计划对4000亿卢布的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但居民存款只有1082亿卢布，况且这些存款集中在7%的人手里。白俄罗斯1991年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约为840亿卢布，其中计划实行私有化的约有560亿卢布，而专家估计居民能为此拿出的存款只有20—30亿卢布。波兰国内居民的存款只能购买整个国有资产的6%—10%。匈牙利居民手中拥有的资金不足要实行私有化的国有企业财产的10%—20%。总之，居民的资产对实行私有化来说是杯水车薪，而对外国资本来说，它们考虑到苏东国家的投资环境和市场条件不佳，也不愿前来购买，所以这些国家的私有化，特别是大私有化进展缓慢。第二，苏东

国家私有化采取发私有化证券的办法，实际是无偿赠送，平分全民财产。这种办法没有带来新的资金投入，企业没有资金更换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即便所有者更换了，企业也缺乏发展资金。加上管理上基本上还是原班人马，原来的办法和机制，不能适应市场，难以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效果。不仅如此，由于对国有资产估价偏低，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腐败犯罪严重，大批国有资产被少数人侵吞；另一方面，许多居民一生辛勤劳动的存款已实际被价格自由化和恶性通货膨胀充公，而变得一贫如洗。于是私有化就加剧了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

几年来，苏东国家在私有化过程中，小私有化比较快，多数国家在两三年内已经完成，而大私有化所需资金量大，经营难以立即见效，进展缓慢。因此许多国家又将大私有化分成若干小阶段进行。俄罗斯等国把大私有化分为“证券私有化”和“现金私有化”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1992年7月至1994年6月，历时两年，通过发放私有化证券无偿转让国有资产。后一阶段从1994年7月开始，按市场价格出售国有资产，进行有偿转让，称为“现金私有化”。现金私有化的特点是把私有化与投资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可增加新资本投入，但因居民缺乏资金、企业经营不善等原因进展并不顺利。1996年以来俄罗斯停止大规模私有化，转为有选择地进行。东欧国家对少数经营好、亏损少或有盈利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然后将其余国有企业逐年分批实行私有化。波兰和匈牙利是大私有化进展较快的国家。匈牙利为加快私有化速度，国会通过了《企业职工股份制计划》，该文件规定，凡属本企业雇用的，其劳动关系在6个月以上的职工均有权购买企业股份；一个企业中只要有40%以上职工要求实行该计划，那就应立即组织实施；只要有40%以上职工拥有企业股份，这个企业就取得职工股

份公司的法律地位。职工购买股份可享有现金支付优惠和贷款优惠。规定购买 500 万福林以下的股票，只需交纳 2% 的现金；超过 500 万福林时，其超过部分再按 15%—20% 的比例交纳现金。未付现金的部分可通过贷款分期支付。贷款利息相当低微，只有发行银行基本利率的 60%，且偿还期长达 10 年。匈牙利按此计划到 1993 年底已出售国有财产 150 亿福林。

苏东国家的私有化，各国进度不同，具体做法也不尽相同。波兰私有化搞得较早、较快，它主要通过撤消（企业）方式和资本（拍卖）方式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前者是将国有企业先撤消，然后出租、承包或交给职工经营；后者是将大型国有企业变为国库独股公司，然后评估其资产，确定股份和股票数额并公开出售。波兰 8400 家国有企业，到 1995 年 9 月 30 日已有 3354 家走上了私有化之路。匈牙利 1995 年大力推进私有化，国有资产 70% 已为私人所有。捷克到 1996 年私有制成分占国民经济的 80%，被私有化的国有资产帐面价值约为 1 万亿克朗，私有化基本结束。原南斯拉夫地区各国将公有财产分为 3 大部分：一部分以优惠价格出售给本企业职工；另一部分以证券形式无偿分配或以优惠价格出售给全国的成年公民；第三部分划归国家发展基金和退休养老基金。但各国对上述 3 部分的分配比例和实施办法有明显差别。俄罗斯经过大小私有化，截至 1995 年底，实现私有化的企业共 12.2 万个，占现有企业总数的 50%；非国有经济成分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0%。组建股份公司 2.75 万个，其中完全私有化（没有国家股份）的公司为 1.25 万个。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金融与发展》1995 年 9 月、《世界经济展望》1996 年 5 月提供的资料，苏东国家私有化进展情况如下：

国 名	私营部门占 GDP 的份额 (%)	
	1994 年	1995 年
阿尔巴尼亚	50	60
保加利亚	40	45
波黑
克罗地亚	40	45
捷克	65	70
匈牙利	55	60
波兰	55	60
罗马尼亚	35
斯洛伐克	55	60
斯洛文尼亚	30
马其顿
南斯拉夫	35	40
亚美尼亚	40
阿塞拜疆	20
白俄罗斯	15	15
格鲁吉亚	20	30
哈萨克斯坦	20	25
吉尔吉斯斯坦	30
摩尔多瓦	20
俄罗斯	50	55
塔吉克斯坦	15
土库曼斯坦	15	15
乌克兰	30	35
乌兹别克斯坦	20
爱沙尼亚	55
拉脱维亚	55	60
立陶宛	50	55

四、右翼与左翼：风水轮流转

剧变初期，在反共改制狂热的气氛下，苏东地区除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个别国家外，几乎是清一色的右翼政权。从1993年起前共产党人相继在波兰、立陶宛、匈牙利、白俄罗斯等多数国家取得参政或执政地位。接着，1995年11月，波兰由共产党演变而来的社会民主党的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击败右翼对手瓦文萨，当选波兰总统；随后俄罗斯共产党又在12月杜马选举中获得大大超过其他政党的选票，成为占下院1/3议席的议会第一大党。于是苏东地区在剧变后首次形成了左兴右衰的发展势头。但是，从1996年下半年以来，除南斯拉夫、马其顿等国继续维持左翼政府，阿尔巴尼亚、捷克等右翼政府首次被左翼政府所取代之外，在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立陶宛等国又接连出现右翼取代左翼重返政坛的现象。真是右翼—左翼—右翼，风水轮流转！

在1993—1995年间，苏东地区出现左翼取代右翼执掌政权的浪潮，主要原因是：

(1) 人民对右翼当权派不满。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上台的反共亲西方右翼力量在执政的几年里，大都改革乏术，政绩不佳，造成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社会治安状况日益恶化，国家利益受损，从而导致民众对右翼当权派的信任危机和怀旧思潮的蔓延及社会情绪的左转。而前共产党人吸取下台教训，重整旗鼓，顺应民意，提出温和务实的政策方针，逐渐赢得了民心。

(2) 右翼靠街头造反上台，缺乏从政经验，拿不出明确的

治国方略，加之掌权后队伍分化内讧，使得本来就不严密的组织失去战斗力。前共产党人则有较为雄厚的干部力量和健全的组织基础及比较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

(3) 前苏联地区各国剧变后，政局动荡，经济危机。西方只顾收取剧变的政治“红利”，乘机扩展在该地区的政治、安全空间，削弱俄的影响，在经援问题上却口惠而实不至。这种利己实用主义政策打破了这些国家民众对西方的幻想，动摇了他们对西方右翼政府的信心，使得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潮抬头，为左翼利用这面旗帜争取民心创造了条件。

但是，苏东地区左翼力量重返政坛，并不是在左翼占有稳定多数和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出现的。右翼不甘居下风，要尽力维护手中的权力、夺回失去的阵地，这就决定了左兴右衰的趋势并非不可逆转，左翼的上台就包含着在一定情况下还可能下台的因素。果然，没过多久，苏东地区右翼势力开始反攻，并陆续在一些国家得手。

在波兰，1996年右翼开始反攻，造成左翼政府改组，总理换人，但波兰政府仍保持了左派联盟执政的格局。然而在1997年9月的议会选举中，右翼团结选举运动战胜了民主左派联盟。团结选举运动获得33.83%的选票，在众议院得202席（占40.9%），在参议院得51席（占51%），布泽克任总理组成了团结选举运动新政府。而左翼力量民主左派联盟下降到了第二位，得选票27.13%，在众议院占164席（占34.3%），在参议院得28席（占28%）。

在保加利亚，剧变初期成立的右翼政府，由于在1994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以社会党为主体的左翼竞选联盟以43.5%的选票获胜，随后就被社会党主席维德诺夫担任总理的左翼政府取代。但是在1996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社会党提出的候

选人败北，原民盟成员斯托扬诺夫当选为新总统。在1997年4月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右翼民主力量联盟以52%的选票获胜，社会党只获得22%的选票而败北，于是组成了以伊万·科斯托夫任总理的右翼政府。

在罗马尼亚，剧变后几年中尽管斗争很激烈，但中左翼的联盟一直在罗政坛占据上风。然而1995年以来执政党联盟开始分裂，1996年11月总统大选中，右翼的民主协议会候选人康斯坦丁内斯库，战胜了扬·伊利埃斯库，当选为罗马尼亚总统。在议会选举中，国家农民党在参议院占30.7%的席位，在众议院占30.17%的席位。1998年4月，右翼力量组成了以瓦西里·拉杜为总理的新政府。

在匈牙利，1990年选举中获胜的民主论坛等右翼政党，在1994年5月的议会选举中惨败，社会党以绝对多数获胜（在386席中获得209席）。但是在1998年5月的选举中，属于右翼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获得148席，占38.34%，社会党退居第二位（获得134席，占34.71%），结果由右翼组成新政府。

在克罗地亚，1997年7月的选举中，右翼的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获胜，图季曼担任总统。

在斯洛文尼亚，1997年11月的选举中，右翼的自由民主党获胜，组成了以德尔诺夫舍克为总理的新政府。

在立陶宛，1992年的议会选举中，前共产党人布拉藻斯卡斯领导的劳动民主党，战胜了以兰茨贝吉斯为代表的“萨尤季斯”。但是在1996年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兰茨贝吉斯领导的右翼组织“祖国联盟”又获得了胜利，兰茨贝吉斯取代布拉藻斯卡斯当选为立陶宛新总统。

在拉脱维亚，1993年选举中，持中间路线的“拉脱维亚

道路”获胜。1995年议会选举中，9个政党和组织进入议会，1995年12月组成了由无党派人士什凯列为总理的多党联合政府。

在爱沙尼亚，1995年3月议会选举中，祖国党、民族独立党等极右翼党失败，联合党和改革党等中右翼在野党获胜，10月成立了以联合党领导人维亚希为总理的新政府。

另一方面，剧变后一直是右翼掌权的阿尔巴尼亚和捷克，近年来出现了左翼取代右翼的现象。在阿尔巴尼亚1996年7月议会选举中，左翼的社会党获得65%的席位，而右翼的民主党仅获得18%的席位，从而组成了以社会党主席法·纳诺任总理的新政府。在捷克，1990年首次大选中，右翼公民论坛和斯洛伐克地区的公众反暴力组织获胜，1993年捷克成为独立国家后，维持了四党联合以克劳斯任总理的右翼政府，哈维尔仍任总统。但在1997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左翼力量中以泽曼为首的捷克社会民主党战胜了以克劳斯为代表的右翼执政党，获得32.31%的选票，在总共200个席位中占据74席，捷克—摩拉维亚共产党获得5席，于是捷克首次出现了左翼政党执政的局面。

此外，在南斯拉夫1997年7月选举中，左翼维持了政权，塞尔维亚社会党的米洛舍维奇任总统，黑山社会主义人民党的布拉托维奇任总理。

近年来一些国家的左翼政府为什么又被右翼政府所取代？为什么右翼左翼风水轮流转？各国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共同之点主要是国家经济没搞好，加上执政党本身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和政策上的失误，从而失去了民心。苏东地区在剧变之后，民众的意识形态已普遍淡化。他们选择左翼或右翼，并不在于他们所主张的“主义”，而主要是在经历多年动荡之后，

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人心思定，渴望稳定，改善生活，这已成为群众的强烈愿望。对多数民众来说，现在不在乎你是“左”还是“右”，谁能使国家经济摆脱困境，使居民的生活实际上有所改善，谁就有可能受到拥护。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执政，只要经济形势较好，能给百姓带来较大实惠，一般就仍能稳操权力，否则就可能失去民心而下台。此外，各国左翼右翼的力量对比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波兰近年来经济形势一直不错，但因右翼势力强大，而执政联盟中两党矛盾重重，左派联盟还是下台了。近年来这些国家政府更替充分说明了这点。譬如：

保加利亚在1994年12月的大选中获胜的社会党（前身为共产党），上台几年来在恢复国家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5%，通货膨胀率由年初的122%降到22%。但在上述成绩的背后仍隐存在着多年积累的严重问题，如企业亏损、金融财政体系混乱等。犹如坐在火山口上的社会党政府，因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采取了过激的改革措施，终致翻船。其主要失误是：1. 政策失误造成粮食危机。1995年粮食丰收后，政府低价收购大量出口，致使冬季粮食供应紧张，面包价格暴涨，老百姓怨声载道。深受粮贱之害的农民减少粮食种植面积30%，造成1996年全国性粮食危机；2. 金融税制改革不当引发金融危机。在企业亏损、紧缩财政已使银行亏空370亿列弗的情况下，1996年政府又采取过激的金融税制改革，造成列弗对美元比价暴跌，老百姓对本国货币失去信心，引发金融危机。银行将存款利息提高到108%也无法阻止居民提款人潮，造成全国经济混乱；3. 过激的经济措施使危机由经济领域发展到政治领域。为克服金融危机，政府强制关闭64家亏损大企业（占全部亏损企业27%，约有2.8万工

人)，对9家亏损银行实行特殊监督，并把银行利息提高到300%。这些措施不仅没有帮助渡过难关，反而造成严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高达10000%—15000%），本国货币进一步贬值，职工月平均工资只合10美元。群众难以忍耐，要求改朝换代。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在1996年11月总统选举中败北，继而在1997年2月议会选举后被迫下台，被右翼政府取代。

阿尔巴尼亚右翼民主党政府下台的直接原因，是由于非法高息集资败露，引发全国动乱，造成局势失控。阿尔巴尼亚自1992年以来成立了10多家高息集资基金会，而民主党政府对非法集资活动采取姑息、纵容甚至支持的态度，致使5年间集资总额之大超过国内年生产总值，参加人数之多，波及国内一半以上家庭。1996年部分基金会破产，有的集资者携巨款潜逃。储户因存款丧失殆尽而怨声载道，引发大规模游行，进而演变成武装冲突。反政府武装组织控制南部向北推进，军队自行解散，军火库被抢，犯人越狱，形势失控。这一事件反映出民众对阿政府腐败，权钱交易盛行，政府、警察和司法部门多数人卷入了被誉为“人民资本主义”的非法集资活动，一些官员甚至动用公款炒买炒卖、集资发财的严重不满，最终酿成武装动乱和全国失控的严重局面。于是，1996年7月议会选举中，执政的民主党惨败，仅获得18%的席位，而在野的左翼政党社会党获得65%的席位，左翼终于取代了右翼，从而组成了以社会党主席法·纳诺任总理的新政府。

五、希望在何方

剧变时居主导的社会舆论和民众心态曾经是，把过去几十年的错误和“罪恶”统统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反共改制”潮；似乎只要抛弃社会主义，选择资本主义，迅速投向西方，就可以“脱离苦海”，过上西方水准的生活。但是剧变几年来的现实是，痛苦的改制和体制转换并未带来福祉，群众切身感受到物价飞涨、生活水平下降和失业带来的苦难。有的国家还经历了战乱的痛苦。严酷的现实使过去的幻想破灭了。剧变使人们经受了锻炼，事实引发人们思索。现在多数人似乎都认识到了：盲目照搬西方模式、简单回归资本主义是不能成功的。与此同时，几年来民众中又兴起了一股怀旧情绪，他们怀念昔日稳定的工作、安定的生活和有保障的社会福利。他们感到过去并不是什么都不好。但是能否走回头路呢？尽管有一些政党和组织主张恢复苏联，有的甚至主张恢复到斯大林时代去，但是较多的人似乎认为：走回头路也不是出路，过去许多东西不改也不行。不改革也没有出路。究竟怎么办？人们还在探求和思考。看来，深刻反思，冷静抉择，从本国实际出发，从当前现实出发，寻找真正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已日益成为较普遍的倾向。

剧变时“回归欧洲”、“向西方靠拢”的倾向，在实践中已进行了调整。东欧国家这些年已感受到西方口惠而实不至，外援、外资、技术的进入远远低于预期，使“西援兴邦”的幻想破灭。它们不同程度地调整了对外政策，由一味向西，转向多元化的外交，开始重视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及区域合作，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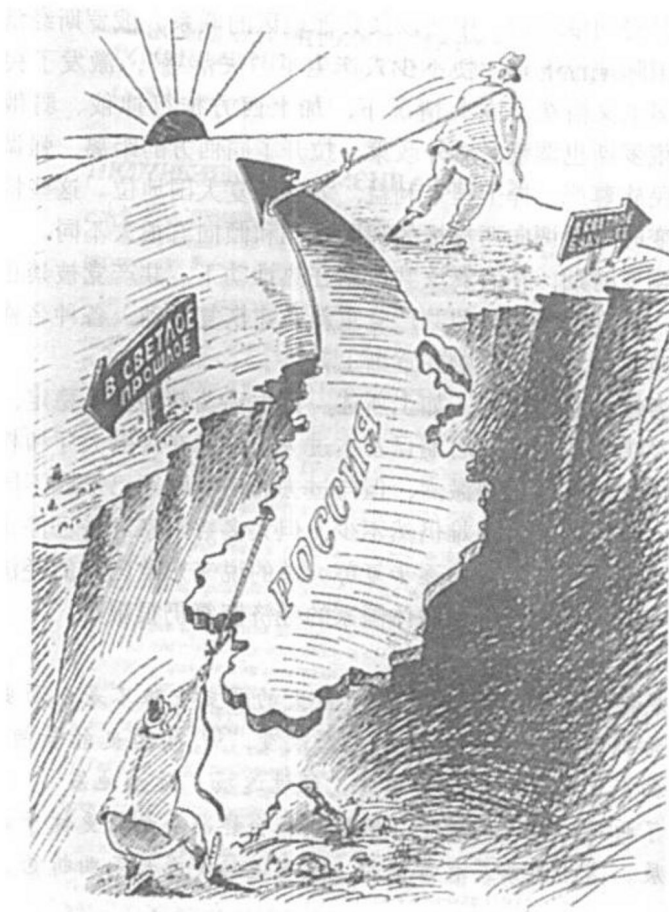
复和改善同俄罗斯、中国以及其他地区的联系。俄罗斯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下降，使不少人产生了“失落感”，激发了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在此情况下，加上西方推行抑俄、弱俄方针，俄罗斯也调整了对外政策，拉开了同西方的距离，强调要维护民族尊严，捍卫国家利益，力争恢复大国地位。这些情况与剧变时期强调向西靠拢的那股思潮和倾向有很大不同。

剧变时期，在右翼反共改制狂热推动下，共产党被禁止或取缔，现在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重新改建恢复活动，各种名称的左翼政党的力量和影响在逐渐上升。

各国的政治形势，如上所述，已由动荡转向基本稳定，大规模“街头政治”的时期已基本过去。虽然在议会大厅和权力机构内部的斗争仍很激烈，但与过去的动荡时期已形成不同的阶段。各国的经济困难仍然不少，但大多数国家经济已停止下滑，走到了谷底，开始逐步复苏。总的说来东欧国家的经济形势好一些，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的经济恢复仍很艰难。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有活动方式在改变。”^①从历史的长河看，这场剧变只是一个短短的插曲。经过这场“政治地震”，历史经历了曲折，但人民经受了锻炼，社会终将会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些国家是有希望的，然而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9卷，第149页。



漫画《俄罗斯向何处去?》。左边路标写着“通向光明的过去”，右边路标写着“通向光明的未来”。引自俄罗斯学者鲍利斯·斯拉温所著《社会主义之后……》一书。

第 3 章

消沉后的崛起

——俄罗斯的各类左翼力量

1991年苏共覆灭、苏联解体之后，国际反共势力曾兴高采烈地叫嚣：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社会主义失败了，共产主义彻底崩溃了。但是，时间刚过去几年，俄罗斯已涌现出一大批名目繁多的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它们是：

——重新崛起、主张坚持和革新社会主义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主张恢复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

——主张恢复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方式不尽相同的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俄罗斯共产党人联盟、俄罗斯共产党人党；

——自称为“新型共产党”的俄罗斯劳动

人民社会党；

——为重建苏共的跨国联合组织“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

——与俄共合作的左翼政党俄罗斯农业党，等等。

虽然它们还面临很多问题和困难，其发展的道路将是漫长的、曲折的，但雄辩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没有消亡，也绝不会消亡。

一、名目繁多的共产党

苏联共产党在 1991 年“8·19 事件”后就迅速灭亡了。事件后第四天，即 8 月 23 日，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叶利钦签署了“中止苏共和俄共活动”的法令，次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接着叶利钦又宣布了没收苏共和俄共的全部财产、禁止其活动、解散其组织等项“禁共令”。于是，这个有着 90 多年历史、执政 70 余年、拥有 1500 万党员的党就这样平静地覆灭了。随后，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也遭到沉重打击，有的被迫更名，有的被禁止，有的被解散，有的被宣布为非法。苏共的覆灭以及接踵而来的苏联解体，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对此，各种反共势力兴高采烈，拍手叫好。他们弹冠相庆，似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彻底崩溃，永远消失了。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没过多久，在这块

土地上，那些笃信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党人迅速行动起来，为取消禁共令和重建党的组织而斗争。于是，在俄罗斯土地上迅速出现了繁多的共产党和其他各种左翼组织。

1991年9月11日“共产主义者联盟”成立。它宣称“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反人民的政策断送了党。但共产主义思想并未死亡，也不可能被扼杀。几百万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者还在活动。因此，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基础上建立共产党”。

同年9月20日，“共产主义工人联盟”宣布成立。它声称要“联合愿意坚持自己的信念，但不希望得到某种好处的坚定的共产党人”。同一天，“捍卫共产党人权利公共委员会”也宣告成立，它自称是“争取自由、民主和民权的俄罗斯共产党人”，主张“与正在全国各地建立的俄罗斯当局的政治垄断作斗争”。

同年10月27日，“俄罗斯劳动人民社会党”诞生。该党认为自己是“苏共思想的法律继承者”、“苏共优良传统的继承者”，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使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决不是重返旧路”。该党主张“改组俄罗斯的国家制度，恢复联盟国家制度”，“实行集体——个体所有制形式，反对不合理的向市场过渡和不合理的私有化”。该党还称自己“是一个议会党，一个新型的共产党”，并主张团结左派力量，成立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方向的各政党联盟。

同年11月8日，“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正式宣布成立。它是从1988年3月以来，向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发起思想反击，从而成为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令人瞩目的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安德烈耶娃为首的一个组织。该组织明确宣布自己的

目标是恢复 30—50 年代斯大林时期那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

同年 11 月 16 日，“工人阶级列宁主义社会党”在新西伯利亚城举行了成立代表大会。大会声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该党的思想基础。

同年 11 月 16—17 日，“俄罗斯共产党人联盟”举行了成立大会。该党宣布，它的直接政治任务是“使国家重新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抵制资本主义复辟和社会不平等的增加”，“恢复苏维埃政权”。主张“发展社会主义”，“在商业和服务领域可利用各种所有制的情况下，公有制起主导作用”，“发展可调节的市场关系”。该党多次重申，要“恢复统一的联邦国家”，“在马列主义基础上成立共产党”，“争取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

同年 11 月 23—24 日，“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召开成立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党的纲领性声明说，该党以马列主义学说、以建立工人阶级政权为自己活动的指导方针。

1993 年 2 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重建。

此外，还有许多地区性的、人数较少、影响也较小的共产党组织。经过几年来的分化、改组、联合，现在俄罗斯有六七个较大的共产党。这些共产党组织的基本斗争方向一致，都坚持马列主义的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的目标，但他们的章程、纲领、政策和策略却有不同，甚至有着明显的差别。作为共产主义政党，他们都在为社会主义的复兴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进行着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尤其是恢复了合法地位并重新建立起来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斗争中取得的成绩更加引人瞩目。西方反共势力叫嚣“共产主义消亡了”的余音尚未散尽，由于俄共的迅速崛起，西方报刊又纷纷转变腔调说，“红色分子成了

俄罗斯最大的有组织的力量”，“共产党可能在俄罗斯东山再起”。当然，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力量的重新崛起，其道路是漫长和曲折的。但西方报刊腔调的转变，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证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没有消亡，也绝不会消亡。这些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的斗争及其所取得的成绩，正推动着俄罗斯和前苏联境内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向着新的阶段发展。

目前俄罗斯主要共产党和组织一览表

党或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领导人	法律地位	党员人数	议会席位	来源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1993.2.13	久加诺夫	合法	54万	157席	同名
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	1991.11	安皮洛夫	合法	5万		原苏共党内的“共产主义运动”派
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	1991.11	安德烈耶娃	未登记	数万		原苏共党内的“共产主义运动”派
俄罗斯共产党人联盟	1991.11	普里加林	合法	1万		原苏共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派
俄罗斯共产党人党	1991.12	克留奇科夫	合法	1.5万		原苏共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派
俄罗斯劳动人民社会党	1991.12	麦德维杰夫	合法	1万		原苏共党内的“民主纲领”派
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	1993.3	奥列格·舍宁	未登记			这是宣称为“重建苏共”的跨国联合组织，已有19个成员党，无自己的基层组织

二、重新崛起、主张坚持和革新社会主义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简称俄共）是目前俄罗斯最大的共

产党。它于1993年2月13日在原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恢复活动的基础上重建。现在拥有党员54万人，在俄罗斯17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2.2万多个党的基层组织，在全部89个联邦主体（共和国、边疆区、州、联邦直辖市、自治州和民族自治区）设有党的委员会。目前是全俄最大的政党。1993年以来在两届国家杜马选举中接连取得震惊国内外的胜利，在1996年的俄总统选举中也显示出自己的力量。然而，俄共重新崛起的道路却是不平坦的。

（一）起诉总统“禁共令”，力争成为合法政党

1991年“8·19事件”后，俄共被俄罗斯领导人3道“禁共令”取缔了。但是，许多共产党人并没有屈服，从而在俄罗斯展开了一场“禁共与复共”的激烈斗争。1991年12月，俄罗斯人代会中的36名共产党员人民代表向俄罗斯宪法法院提出起诉，指控叶利钦总统解散苏共和俄共的法令违反宪法。宪法法院受理这一申诉，但半年后才开始审理。在法庭上，支持总统的一方却提出关于苏共本身不符合宪法，因而总统的法令符合宪法的诉讼。双方在法庭上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毫不让步。总共开了52次听证和辩论会，历时半年之久，直到1992年11月30日宪法法院终于作出了折衷的裁决，判定叶利钦总统关于停止苏共和俄共在俄领土上活动的决定“符合宪法”，但解散它们的基层组织是违法的。

宪法法院的这个判决虽然逻辑混乱，不能自圆其说，但毕竟推翻了总统关于解散共产党组织的决定，标志着俄罗斯的共产党人为争取自己正当权利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然而重大的胜利，为恢复和重建俄共开辟了道路。随之，他们立即行动

起来，准备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重建俄联邦共产党。在宪法法院作出判决的第二天，就成立了由100多名各地区共产党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倡议委员会，筹备召开二大。与此同时，各地党的组织开展了党员重新登记工作，由几十名专家组成的大会文件起草小组也开始了工作。1993年1月9日召开的二大筹委会（倡议委员会）上决定在马列主义思想基础上重建俄共，并定于2月中旬举行党的二大。正当大会筹备期间，俄司法部又突然下禁令，宣布召开代表大会“违反宪法”。大会组委会只得又诉诸宪法法院。在大会召开前夜，宪法法院发表声明，宣布俄共有权在基层组织的基础上进行活动，有权召开会议。这样，俄共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终于在莫斯科近郊如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代表45万党员的651名代表（各地选出的代表总数为805人）出席大会，另有100多名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代表列席会议。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刚从监狱释放的前苏共领导人亚纳耶夫、卢基扬诺夫、克留奇科夫、舍宁等7人以及前苏共总书记伊瓦什科、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等也参加了大会。原俄共中央第一书记库普佐夫做了政治报告。大会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纲领性“政治宣言”、党章以及关于统一共产党人行动、反对拟于4月举行的俄全民公决、争取共产党员的权利和政治信仰自由和关于党的财产等4项决议。大会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原俄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久加诺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库普佐夫当选为第一副主席、尤·列洛夫、斯·戈里亚切瓦、米·拉普申、维尔卡尔采夫、伊·雷布金等5人当选为副主席。卢基扬诺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和《政治宣言》指出，俄共“将是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开展工作的党”，它将继承苏共和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经验中所有的精华，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它忠于工人阶级、劳动农民、人民知识分子和全体劳动者的利益；认为“历史未来的理想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自由和社会平等、集体主义、社会公正和真正的人道主义，为人民服务”；强调俄共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唯物辩证法——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库普佐夫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俄共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政治组织，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恢复苏维埃人民政权，维护国家统一。俄共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大会后不久，即1993年3月，俄共就在俄联邦司法部获准登记。这样，被禁止了达一年半之久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终于成为一个合法的政党，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

（二）首次参加议会竞选，成为国内第三大政党

俄共重建之时，正值俄国内政治和经济危机深化、各种矛盾加剧，尤其是联邦最高立法权力机关和最高行政权力机关围绕国家领导体制的分歧和矛盾日益激化。1992年1月叶利钦总统开始实施“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方针，试图通过全面放开物价、紧缩银根和企业私有化3大措施，以期迅速实现市场经济。结果欲速则不达，社会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1993年9月叶利钦总统宣布解散最高苏维埃和人代会，而议会坚持认为叶利钦总统的命令违反宪法，从而形成双重政权的局面，最后叶利钦总统以武力攻占议会办公大楼，并逮捕议长和副总统等人，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所谓“十月事件”。面对这种尖锐复杂的国内局势和斗争形势，刚刚重建的俄共遵循自己的纲领性声明，展开了一系列活动：俄共领导人经常举行记者招待会阐述党的主张，批评俄当局的种种政策尤其是“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政策，举行俄国内和独联体左翼党派领导人的会晤，同外

国左翼党建立联系，支持人民群众的正义斗争，发动和组织群众集会，举行各种抗议活动。例如1993年3月组织了十几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群众集会，反对举行全民公决和“总统治理”。对于议会和总统之间的斗争，则建立广泛的反对派联盟，同时支持议会一方，大力支持和配合“救国阵线”、“劳动俄罗斯”等群众团体和其他左翼党派，进行议会外斗争，反对解散人代会和最高苏维埃。在斗争中，俄共讲究策略，一般不走极端，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虽然俄共争取的阻止举行全民公决和通过新宪法、反对解散议会等目标未得到实现，但使俄政府终于停止执行“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政策，叶利钦总统在第九次人代会上承认经济改革中“存在许多失误”。更重要的是俄共通过自己的一系列活动，巩固了地位，扩大了政治影响。“十月事件”后，在俄当局又一次“禁共”中，“救国阵线”、“劳动莫斯科”等群众团体被解散，共产主义工人党、军官协会等组织被停止活动。俄共这次没有被抓住什么把柄，在被停止活动两周后又恢复了活动，并排除司法部的阻拦取得了参加于12月举行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的权利。

1993年10月27日，俄共宣布了自己的题为《恢复国内和平与法律，把国家重新纳入文明发展轨道》的竞选纲领。其基本点是主张改革，并分3个阶段实行：第一阶段是恢复国家3大权力机关的工作，首先解决立法机关的问题。第二阶段是稳定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放弃“休克疗法”，采取国家调控措施制止生产下降，遏制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实行社会保障，制止居民生活下降；与犯罪作斗争；执行符合国家民族和安全利益的对外政策。第三个阶段是制定和实行国家新宪法，它的基本原则是：人民政权、保证国家管理、各权力机关的统一、

立法机关对执行机关的领导，联邦制；以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成份，计划调控与市场相结合的多种经济管理形式。在竞选过程中，俄共等左翼党派处于十分不利的条件，它们不仅不能利用当局控制的舆论工具宣传自己的纲领和主张，而且还遭到排挤、中伤和破坏。俄共依靠自己的党员和基层组织深入群众，宣传党的纲领和主张，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同时俄共的竞选机构和新闻处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宣传自己，扩大影响，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竞选第一阶段的胜利。俄共在7个联邦主体内征得了18.7万个选民的签名（竞选规定须在7个以上的联邦主体内征集10万以上选民的签名），获得了实际的参选权利，成为达到上述条件有权参加竞选的13个党派、组织和选举联盟之一（登记参加竞选的总共91个）。随之，俄共提出了自己的151名竞选国家杜马代表的候选人。他们分别深入各地会见选民，旗帜鲜明地宣传俄共的主张，批评当局的种种政策，尤其是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破坏国家经济的“休克疗法”和新宪法草案，赢得了许多选民的支持和拥护。同时，俄共为便于开展工作，争取选民，取得左翼力量竞选的胜利，向农业党等兄弟党派去自己的干部和党员，协调行动。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1993年12月12日举行杜马代表选举全国投票，结果俄共获得了12.35%的选票，在13个参加竞选的团体中居第三位，而在国家杜马中占65席，在8个议会党团中也居第三位。这样，刚刚恢复活动10个月的俄共就成为俄议会的第三大政党。

（三）在议会内外同时开展活动，扩大了影响

杜马选举获得胜利后，如何在议会开展工作，是摆在俄共面前的一个新课题。为了统一全党认识，制定议会工作方针和

策略，1993年12月15日俄共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总结了在这次杜马选举中的工作，强调党的议会工作的重要性，认为议会党团是政党中的一个组织，应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下工作，并利用其特殊的条件为全党的任务服务。作为共产党员议员，有义务把杜马当作宣传党对所有社会现实问题的观点的全国性讲坛。强调共产党议员团应遵循的原则是：议会党团必须服从党，是议会党团给党作喉舌，作工作机构和执行机关，而不是相反。中央执委会主席久加诺夫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议会的实权问题，议会多数有权组建和监督政府，以及对政治和经济方针施加影响的问题，仍然是一切矛盾的焦点。他提出，为了“向文明的民主国家所公认的原则转变”，必须对“十月事件”做出政治评价。他还提出“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是立即放弃“休克疗法”并更换改革方针。在国际政策方面，他强调要更坚决地维护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利益和安全，主张完全以自愿和利益平等为基础，“重建统一的联盟国家”。他认为，现阶段的战略任务是扩大反对党的社会基础，并据此组成人民爱国力量联盟。俄共本身的“头等任务”则是面向社会，扩大共产党对劳动集体的影响。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1994年2月23日，俄共联合农业党和自由民主党等反对党议员团，在杜马提出《因俄罗斯联邦宪法通过而实行大赦的决定》议案，决定对1991年“8·19事件”、1993年“五·一”和“十月事件”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统统实行大赦。这一决定一公布，震撼全国，立即引起激烈争端。“民主派”称大赦是“搞乱社会的一个步骤”，是共产党等企图“达到篡权目的”的手段，“是对俄罗斯民主的挑衅行为”。俄共等反对派则认为通过大赦决定是“理性的胜利”，是实现社会稳定与和睦的必要步骤，是“伟大的历史事件”。俄

当局则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阻止实施大赦令”，寻找借口试图说明大赦令无效。但一切手段都无济于事，因为颁布大赦是宪法赋予杜马的权利，总统无权否决，最高检察院只得执行议会的这一决定。于是从3月26日，即杜马通过大赦决定的第三天开始，所有被捕人员陆续被无罪释放。

以俄共为核心的反对派在杜马提出大赦令并获通过和执行，而且得到社会的积极反响，说明俄共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已崭露出自己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在议会外，俄共也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1994年8月25日，它与农业党联合在莫斯科举行了全俄农村大会，要求政府降低税收和农业贷款利率，要求总统和政府辞职，举行新的议会和总统选举。9月16日，它又联合其他反对派在加里宁格勒举行首届俄罗斯爱国力量代表大会，决定采取一切措施争取提前选举总统，组建国务委员会和影子内阁，并制定了行动纲领。

俄共通过自己的活动，不但扩大了政治影响，在组织上也得到不断发展。1994年就有900名28岁以下的青年被吸收入党，党员人数增至50多万。在1994年秋至1995年春的俄罗斯地方选举中，俄共在许多地区也取得胜利，在某些州甚至是“压倒性胜利”。

与此同时，俄共的国际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它已同世界各国近100个左翼政党和组织建立了联系。对于俄共的发展壮大，俄舆论工具是这样评论的：俄共党员人数之多，分布范围之广，组织机构之坚强，“都是其他党派无与伦比的”。连“民主派”当时的头面人物盖达尔也称，俄罗斯真正的党还很少，其中最强大和最有活动能力的团体是共产党。

(四) 再次参加议会选举成为第一大党，但在总统选举中失利

1995年12月，俄罗斯举行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这是第一次多党制议会选举。各政党、组织和团体都积极准备，参加杜马450个席位的角逐。俄共在1995年8月举行的党的代表会议上，制定了名为《为我们的苏维埃祖国而斗争》的竞选纲领，肯定了十月革命的成果和苏联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重申使国家恢复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提出“恢复苏维埃祖国”的目标，要求按时发放工资和退休金，建立社会保障措施，制止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立即改变经济方针，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等等。纲领突出爱国主义，认为爱国主义就是民族平等，各族人民友好，并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人民政权结合在一起。俄共的竞选口号是：“俄罗斯，劳动，人民政权，社会主义”。竞选过程中，俄共依然主要依靠自己的党员和候选人深入群众，宣传俄共的纲领和主张，争取选民。在12月17日的投票选举中，俄共在按党派选举的225个联邦选区获得22.31%的选票，按得票比率分得杜马100席，在个人选区的225席中获得57席。这样俄共在杜马总共450个席位中取得157席，占34.88%，不仅遥遥领先于其他任何一个参选党派和联盟，而且比进入杜马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亚博卢”集团和自由民主党3个党派集团所得席位的总和（155席）还多2席。俄共议员谢列兹尼奥夫还被选为杜马主席，另有9名俄共代表被选任杜马28个委员会中9个委员会的主席。俄共由上届议会的第三位跃居为新议会的第一位，成为俄议会内外的第一大政党。

俄共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取得胜利之后，就为下一年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作准备。1996年1月11日俄共召开中央全会，总



俄罗斯共产党四大会场（1997年4月）

结了杜马选举，制定了参加竞选的政治方略。随后，于2月15日又举行党的第四次代表会议，完善1995年8月第三次代表会议上确定的总统竞选纲领，正式宣布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作为俄共候选人参加将于6月举行的俄总统选举。俄共竞选的主要措施是：第一，加强宣传力度，塑造革新形象，努力减少社会一部分人存在的对俄共的疑虑和反共宣传的消极影响。俄共领导人反复强调，俄共不是过去的苏共，有不同的任务和工作方法，不搞特权和官僚主义，不主张回到原来苏联的老路，也不赞成强行恢复原苏联，承认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多种经济成份。第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人民爱国主义联盟”。第三，加强基层组织和党员的思想和组织工作，同杜马议员和地方权力机构的俄共代表一道深入选民，尤其要做好青年人和中小企业领导人的工作，扩大选民基础。第四，利用议会中左翼力量的优势，作出有利于俄共竞选的决定。1996年3月，俄共与25个政党和组织建立了“左派政党

和运动联盟”，推举久加诺夫为统一的总统候选人，后来又有许多组织和团体陆续加入这一联盟，组成了近200个政党、组织和团体参加的“人民爱国力量联盟”，支持久加诺夫竞选总统。1996年6月16日，总统选举举行全国投票，久加诺夫获得31.92%的选票，与其他9名候选人中得票最高的现任总统叶利钦（得票34.96%）只相差了3个百分点。按照总统选举法规定，得票率最高的久加诺夫与叶利钦两人进入第二轮选举。在7月3日举行的第二轮选举中，久加诺夫和叶利钦分别获得40.3%和53.88%的选票，久加诺夫失利，叶利钦蝉联总统。

总统大选后，俄新闻媒体曾断言，鉴于久加诺夫总统竞选失败，以俄共为核心的“爱国力量联盟”会很快解散。但恰恰相反，8月4日，左翼力量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总结总统选举，并正式建立了“人民爱国力量联盟”，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左翼政党、组织和团体。它们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以反对派的面貌继续活跃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

（五）总结经验调整政策，坚持和革新社会主义

俄共重建和恢复活动后，在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成为俄罗斯最大的政党，对俄社会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自1993年恢复活动至1995年以前俄共尚无一个正式的党纲。几年来的斗争实践，特别是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的成功与挫折，也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于是俄共于1995年1月举行了党的三大，制定和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1997年4月又召开四大对党纲、党章和党的理论、策略作了某些补充和调整，使其“更加准确”（久加诺夫的说法）。从俄共这两次大会通过的文件看，俄共在总结苏共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久加诺夫会见记者

根据当前的时代特征和俄罗斯的实际，主张奉行既坚持又革新社会主义的路线。

1. 俄共认为苏联的解体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而是几十年来“执政党党内危机引起的”。关于苏联解体和苏共覆灭的原因，俄共认为：摧毁苏联社会的那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执政几十年的党内危机引起的。苏共从一开始，党内就存在着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官僚主义的对立倾向。正如列宁所警告的，在执政的共产党内混入了不少假革命者与投机钻营者。许多党的领导人对权力和意识形态实行垄断，专横跋扈，把苏共推向“狂妄自大的党”的境地，上层领导越来越脱离广大党员和劳动群众。苏共内部实际上早就形成了两种流派，并从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政治路线。在苏共内部为争取变革国家和争取真正社会主义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党的建设上，追求党员的数量，又缺乏领导干部有序的轮换与年轻化的机制，导致党的健康力量不能坚持

对党的领导干部实行监督的合法权利，不能防止越来越多的投机钻营者混入党内。党的历史性过失与不幸就在于此，以致后来戈尔巴乔夫等人篡改了党在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的方向。党和人民群众早已意识到必须变革——革新社会主义，即从早期的形式向更成熟的、符合真正民主的、富有创造性本质的形式转变。1983年，在党员群众和社会的支持下，安德罗波夫开始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和国家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进行改革。这一创举及其政策对人民的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这一政策的方向，被后来的领导者以欺骗的手段用于反人民反国家的目的。他们把党的宣传工具有意交给社会主义的诽谤者和仇视者，使他们竭尽歪曲苏联和俄国的历史、诬蔑苏维埃政权之能事。当他们的行径遭到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抵制时，他们就禁止共产党的活动，然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并企图永远禁锢共产党。那些掌权者粗暴地践踏了1991年5月17日全民公决的结果，在别洛韦日勾结中宣布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等人应对背叛党、无视民族国家利益、毁灭苏维埃国家负个人责任。然而，苏共的“垮台”并不是社会主义力量被摧毁，而实际上是久已存在于苏共内部的两翼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最终划清了界线。

2. 俄共不赞成全盘否定党的历史和十月革命，认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谋求民族国家自我生存的唯一现实的机遇”，极端严格的集中化、国有化的发展模式当时“带有被迫性”，并“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成就”，但后来被“绝对化”了，社会主义思想也被“简单化”了，按劳分配又“被歪曲了”。俄共认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产生了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和苏维埃各民族联盟这种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前所未有的国家和社会制度。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

俄罗斯文化与道德传统的基础之上的。因为俄罗斯传统的基本价值观就是：热爱集体劳动，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个人、社会和国家最密切的联系，对真理、善良、公正和最高理想的追求，全体公民——不论其民族、宗教和其他差异——权利与价值一律平等。因此，“可以大胆地说，‘俄罗斯思想’从本质上说，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几十年里，建立了大多数劳动者的政权，实现了在公有制基础上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并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成就。工业化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也加速完成了；消除了失业，实现了文化革命。卫国战争的胜利及其以后国民经济的顺利恢复，证明了苏联的发展道路具有历史意义的正确性。必须指出，苏维埃国家建立后，一直笼罩着帝国主义的外部威胁，要求作出迅速而准确的答案。“赶上和超过”是当时唯一适当的口号，经济社会生活许多领域极为严格的集中化和国有化带有被迫性。但后来这条道路被不适当地绝对化了，并且成了主导原则。结果，人民自己首创的自由的组织日益受到限制，劳动人民的社会热情和主动精神未能被吸收。同时，“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被歪曲和损害了，在一部分人中产生了依赖和消极性。当提出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任务时，社会主义思想被简单化了。“在科技革命的基础上日益充分满足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需求”这一原则上正确的口号未能实现，科技革命的成果未能与社会主义的潜力结合起来。在实践中贯彻国家的现代化计划有局限性。1961年通过的苏共第三个纲领仅限于原来的“赶超”口号，即仅限于完成实质上不加批判地模仿西方社会在生产和消费方面的早期模式的任务。这就一方面使社会主义经济注定扮演从属者的明显失败的角色，另一

方面又放慢了解决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这些任务是：不是形式上和法律上，而是现实地、本质上使生产社会化建立新的、较之资本主义更高的人民生活和生产发展的质量，在此基础上向劳动集体的自治过渡，利用对劳动更高的和更有效的刺激和促进因素，为人的自由和协调发展创造条件。由于以老化的生产力发展模式为样板，社会主义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很多方面丧失了历史的主动。

3. 俄共宣称“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最终走向共产主义；它强调自己是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到苏共的“一脉相承”的“继承者”，同时又强调要奉行“革新了的社会主义”，不是向过去的社会主义“倒退”。俄共纲领中宣布，俄共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俄国共产党（布）——全联盟共产党（布）——苏联共产党以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是一脉相承的，是它们在俄联邦土地上的继承者。她吸取俄罗斯、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以往经验中一切经过实践检验的东西，使她作为一个能对当代发展最尖锐的问题作出解答的真正劳动人民的党。久加诺夫在该党四大的政治报告中强调，要塑造俄共的新形象，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他强调：俄共主张国家回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但不是要向过去的社会主义“倒退”，而是“向社会主义前进”。因为返回过去的模式，就意味着自己将重复过去。因此那些关于俄共是“历史辩护士”、“左倾保守党”的论点是不正确的。俄共将抛弃共产党历史上出现的错误的东西，它要继承的只是“社会公正思想、国家爱国主义思想和苏维埃人民政权思想”。保护人权和公民自由也是俄共的重要武器。总之，俄共既珍视过去的东西，更着眼于未来；既忠于传统，又面向新的现实；既尊重老一辈，又

面向年轻一代；既善于在策略上作出妥协，又忠于自己的战略目标和原则。俄共要成为聪明的、强大的、诚实的、负责的和现代化的党。党要适应形势的变化，作好进入新世纪的一切准备。

4. 俄共主张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同时又强调从俄罗斯的实际出发，制定自己的最低纲领和斗争策略。俄共认为，现代资本主义虽然处于相对稳定，大国内部的社会冲突有所缓和，但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争论没有结束。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已越出发达国家的国界而在全球扩展，产生了至今尚未找到答案的全球性生态、人口、民族和社会问题。资产阶级的社会生活不仅已到了其内部的临界线，而且到了其自然的临界线。只有选择社会主义才是一种“稳定发展”的道路。

俄共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学说、一种群众运动，一种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耗费的特点将会逐步彻底消除，人的个性将得到全面发展，并成为生产的主要条件。劳动将更多地变为以智力劳动为主，并逐渐从谋生的手段、从被迫性变为个人自由创造的自我表现。随着科技的进步，城乡工人阶级的面貌将为之一新，他们都具有高度的技能、博深的知识和全面的视野。共产党人正是在这一被更新的工人阶级队伍中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体成员自由发展的条件。

俄共新党纲规定分3个政治阶段来循序渐进地、和平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一阶段组织和领导劳动群众起来为争取自己的权利、捍卫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利益而开展群众性活动；复兴和发展地方直接民主形式；加强同人民爱国力量的协调与合作；组建民族拯救政府，克服政治和经济危机，促进独

联体一体化。第二阶段，是过渡性和恢复性阶段，通过劳动者愈益积极而广泛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使社会主义经营方式的主导作用明显地表现出来成为最适合于保障人民福利的方式。第三个阶段是在最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要求的经济基础上，最终形成社会主义关系，其主要标志是公有制在经济中的统治地位逐步确立起来。

俄共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和完成3个阶段的任务，新党纲还提出了内容广泛的最低纲领，主要有：在政治方面，建立人民信任的政府，恢复苏维埃政权，制定新宪法，废除解散苏联的别洛韦日协定，并在自愿基础上分阶段恢复统一的联盟国家；制定新的民族政策，消除族际冲突，保障和睦，恢复友谊，实行各民族权利与义务平等；在经济方面，改变现行经济方针，实行国家调节；恢复国家科技潜力，制定有针对性的国家纲要，支持科技含量高的行业；通过土地法，规定土地属全民所有，不允许其私有化和买卖，但农户个人或集体可无限期租用；支持农工综合体经济，不论其所有制形式；稳定和降低食品和最需工业品的价格。对非法侵占的财产收归全民或集体所有，对商业银行等财政信贷机构实行国家监督，外汇业务由国家银行管理，对战略物资国家实行外贸垄断，反对资本外流。国家调节军用品的生产、订货和销售，制定军工转产的实际纲要。在社会和文化领域，通过就业法，消灭失业，保障居民实际的最低生活费，保障最低工资，包括退休金、助学金和补贴；打击犯罪，对贪污、盗窃、腐败、走私和倒卖国家资源和物质、精神财富等违法者强化惩罚措施，恢复儿童和青少年的文化、保健和体育机构网，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通过青年法，保障他们免费教育和劳动就业，保障军人、干警、司法工作人员、退休者、老战士和多子女等困难家庭的生活条

件，对巨额收入和拥有庞大个人财产者征收累进税，防止社会贫富分化，尊重俄罗斯和其他各族人民的语言和文化，向所有合法的社会政治力量开放国家舆论工具，并停止宣传和传播西方一切腐朽的东西，停止污蔑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以及列宁的学说，同关心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各种文化运动、政治运动、社会和宗教运动以及政党和组织实行合作，利用议会内外各种形式进行合法斗争。在外交上，奉行符合民族国家利益和加强俄罗斯大国国际地位的独立的外交政策，废除有损于俄罗斯利益和声誉的国际条约和协定，等等。



克林顿与久加诺夫会见

(六) 俄共当前的组织状况

俄共在苏联解体前有 1100 万党员，现在重建的俄共有 54 万党员、2 万多个基层组织，是当前俄罗斯最大、组织最严密的政党。它在议会占席位最多，对国内政治有重要作用和影响。

但是，俄共的进一步发展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一是党

内思想不一，行动受牵制。1996年秋至1997年春举行的地方选举中，一些地方的党员不支持俄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提出的俄共候选人。在杜马中，俄共议员也时有言论和行动不一现象。俄共的某些政策主张和行动方针往往也不得不照顾少数人的需要。在党的高层领导中，据说还存在不同思想派别。二是党的队伍趋于老化。俄共领导人说，目前俄共党员平均年龄已超过50岁，老战士、退休者多，青年党员少。三是俄共缺乏理论工作干部。原苏共强大的理论工作队伍已解体，有的年高退休，有的改行，仍在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人为数甚少。因此目前俄共思想理论工作薄弱，对当代世界和俄罗斯的发展缺乏理论和实践上的研究。四是缺少活动资金。俄共已不是执政党，党的原有财产被没收，现在党的经费只能靠党费、生产经营、科教活动的收入以及党员和其他个人自愿捐款。显然这些收入要保障完成一个大党的政治任务是不够的。五是俄共与其他共产党组织之间在理论、纲领主张和策略等诸多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使俄共受到很大掣肘，也影响它们之间的团结和共同行动。六是苏共的“消极遗产”，特别是苏共和苏联解体给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在形象、声誉上带来的负面影响尚未消除，加上反动势力不断制造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使俄国内许多人虽然对俄现实不满，但又非常害怕回到过去那种僵化的模式中去。1996年俄总统选举结果表明，俄当前的社会环境对国家前景的取向不利于社会主义。最后是，对立的“民主派”利用掌权的地位，不仅在宣传上肆无忌惮地对俄共进行诽谤和中伤，而且在组织和活动上竭力加以限制和打击。总之，俄共前进的道路将是极不平坦的，各种因素决定了它的崎岖。对俄共来说，机遇和挑战兼有，但挑战更多一些。

附：俄共主要领导人简况

中央主席根·安·久加诺夫 1944年出生于奥廖尔州一个乡村教师家庭，俄罗斯族，先后就读和毕业于奥廖尔师范学院和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哲学副博士。1961年参加工作，当过中学、大学教师，服过兵役。1966年加入苏共，1967年开始从事工会、共青团、党务工作，历任共青团区、市、州委第一书记。1974年起任苏共奥廖尔市委书记、第二书记、州委宣传鼓动部部长，1983年起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巡视员、处长，1989年任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副部长。1990年6月俄共成立，久加诺夫当选为俄共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并兼任俄共中央人权和意识形态问题常设委员会主席。苏联解体后，1992年1月被选为俄罗斯民族爱国力量协调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参与建立救国阵线并任该阵线主席之一。1993年2月，在俄共恢复和重建大会上被选为俄共中央执委会主席，1995年1月在俄共三大上当选为俄共中央主席。1993年和1995年当选为两届杜马议员，现为杜马俄共党团主席。

久加诺夫长期从事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是苏共和俄共的著名理论家和活动家。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因同其改革路线和方针政策有异议被称为“改革的反对者”。苏联解体和苏共、俄共被禁止活动后，久加诺夫以民族爱国力量联盟和救国阵线领导人的身份开展活动，为争取恢复俄共合法地位，营救被捕的前苏共一些领导人，组织和团结各地共产党员、联合其他共产党组织重建俄共做了大量十分艰苦的工作，终于取得了胜利。久加诺夫现在是俄罗斯政坛上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各方面多次进行的社会调查都被排位于前5名之中，而且被认为是下届总统选举的强有力的候选人之一。

久加诺夫高度评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久加诺夫在欧洲议会演讲

和中国的改革，羡慕中国有邓小平这样一位英明的改革总设计师。他说，他正在研究邓小平文选，认为邓小平关于建设经济特区的思想是一个“伟大的、智慧的创举”。说英明的邓小平既预见到经济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也看到了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思想和方针，保证了中国改革的顺利进行。久加诺夫还极为赞赏中国实行扶贫、共同富裕的政策。他强调，“中国的改革是真正的改革”，短短10多年，中国已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现代化强国，它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一个大国应怎样进行有效的改革，而不破坏社会政治结构，怎样把现代化技术和本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家经济发展，安全更有保障。久加诺夫表示相信，中国共产党十五大将成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新里程碑，随着中央领导采取的旨在进一步搞好党风、消除社会消极现象、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积极措施的贯彻，中国将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前进。

俄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瓦·亚·库普佐夫 1937年出生于沃洛格达州的一个农民家庭，1955年在集体农庄参加工作，后服兵役。1956年加入苏共，1958年在冶金厂任工长，车间党支部书记、厂党委书记，1974—1979年任沃洛格达市委第二、第一书记，1979—1990年任州党委第一书记。1986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是苏共二十六次、二十七次、二十八次和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代表。1990年任苏共中央社会政治组织工作部部长，1990年7月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1991年8月当选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92年任俄共二大筹委会主席，1993年2月在俄共二大上当选为俄共中央执委会副主席。1995年12月当选为国家杜马议员，担任杜马俄共议员团副主席。库普佐夫主张恢复苏维埃政权和联盟国家，被认为在政治思想上持革新的传统观点。

三、主张恢复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

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1991年11月8日在圣彼得堡成立，它的前身是原苏共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派”中的一派——“争取实现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团结协会”。1988年3月13日，列宁格勒工学院教师安德烈耶娃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题为《我不放弃原则》的文章，坚决反对和批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文章指出，“苏联国内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在改革的掩护下，正借助于修正主义分子的帮助，开展类似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那种进程”，“在恶毒贬低斯大林及其他领导人的盾牌背后，正

集合起攻击列宁、马列主义、十月革命的力量”，说“戈尔巴乔夫的胜利就是资本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因此，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起来，“从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准备未来的社会战斗”。一些赞成这篇文章观点的苏共党员于1989年5月在莫斯科成立了“争取实现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团结协会”。该组织在1990年4月召开的第二次全苏代表会议上宣布，如果苏共不能抵制其蜕变为议会式的社会民主党和孟什维克党的话，“团结协会”将成立新的布尔什维克党。苏共被禁止活动后，来自苏联14个加盟共和国（除亚美尼亚外）的“团结协会”及其拥护者的168名代表在圣彼得堡（原列宁格勒）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联共（布）”（后改为现名），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和与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批准的章程相似的党章。选举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安德烈耶娃被选为党的总书记。

党章规定，该党是“表达和捍卫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利益，献身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为复兴、保持和巩固苏联国家完整而自愿斗争的志同道合的列宁主义者的‘政治联盟’”。党“遵循列宁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从阶级观点出发，坚持经过考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马列主义原则”。凡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在党的一个组织中工作，执行党的决议，按期交纳党费的年满18岁以上的苏联公民，都可以加入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党员不能同时加入其他政党，原苏共党员可连续计算其党龄。党员必须“与反共主义、民族主义、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揭露资产阶级思想和议会民主的阶级本质”。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必须保持“思想和政治统一”，不允许党内建

立任何有特殊纲领的派别和集团。

该党纲领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恢复 30—50 年代斯大林时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在政治方面，“团结我们社会上一切健康的、进步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力量，给予资产阶级反革命以坚决的打击，挫败国内的资本主义复辟，复兴社会主义祖国昔日的伟大和强大，恢复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利和统治地位”。党的任务是，通过革命的途径推翻现政权，恢复苏维埃政权，但认为革命也可能是和平的、劳动人民总罢工的方式。同时，该党认为别洛韦日协议是非法的，不承认苏联解体，主张恢复 1922 年的联盟条约。

该党反对三权分立，反对“资产阶级议会和多党制”；认为现政权是“极右的、有独裁倾向的资产阶级政权”，因此反对共产党参加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认为当前俄罗斯的根本问题是发动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和向无阶级的国家过渡，舍此就不能彻底解决国内现存的任何一个重要问题，无论是政治、经济问题，还是社会、民族、文化、生态和生活保障问题都不可能解决的。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革命的道路挫败反动派，恢复焕然一新的社会主义，而全社会的政治罢工是这一道路的最主要的方法。

在经济方面，该党主张恢复作为宪法制度基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统治地位；在现代科学技术水平上恢复计划经济制度；恢复社会主义市场，在这种市场里，只有消费品才是商品，不应该有生产资料、资本和劳动力的交易和竞争；停止使用暴力使农村非集体化，停止买卖土地和集体财产，停止解散集体农庄和合作社，停止在苏维埃经济中经营外国资本，停止把国家拉到与外国资本家的债务契约中去等。

在社会政策和文化教育方面，该党主张立即恢复 1977 年

宪法保障的劳动人民的社会权利；恢复1922年联盟条约的基本原则，要在新的历史现实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苏维埃联盟体制，实现各民族的真正平等与和睦；恢复舆论工具、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文化机关的国家性质，反对文化艺术活动的商业化等。

关于同其他左翼力量的关系，该党赞成与其他反对党和运动，首先是与共产主义政党协调一致。该党同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关系较好，经常一起组织和领导群众举行各种示威游行和抗议活动。但与俄共等有较大分歧，认为俄共参加议会选举在客观上起了“分裂原共产党”的作用，“分裂”了国内共产主义运动。安德烈耶娃甚至称久加诺夫、“共产党联盟—苏共”领导人舍宁等都是“前苏共身上的毒瘤”，“背叛”了马列主义等。

该党成立之初据说有数万人，除分布于俄罗斯外，在白俄罗斯、乌克兰、中亚、波罗的海沿岸和高加索地区也有其组织和党员。成员多半是退休人员、老军人、前苏共基层干部，现在人数已不多。该党不承认俄罗斯现政权，而且在1992年1月的中央全会上作出过“不登记注册”的决议，所以该党至今未办理登记。俄罗斯一些报刊称该党是所有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中“最正统、最教条的政治小集团”。

该党主要领导人尼·安德烈耶娃1938年出生于列宁格勒一个工人家庭，1960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工学院，1963年获工学副博士学位，并任该校教师。1966年加入苏共，是最早公开发表文章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苏共普通党员，也因此及其后来的一系列言论和政见成为一个著名人物。苏共和苏联解体后，安德烈耶娃谴责戈尔巴乔夫“背叛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使社会主义国家解体，消灭列宁的党，欺骗劳动人民和蛊

惑人心”，并继续坚持自己“不放弃原则”的信念，积极与俄罗斯当局进行斗争，积极组织和领导“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

四、主张恢复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方式不尽相同的几个共产党

原苏共党内不赞成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的共产党人，在后期形成了一些派别，其中最主要的有“共产主义倡议运动”派和“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前一派中以安德烈耶娃为首的一批人在1989年5月组成了“争取实现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团结协会”，如前所述他们于1991年11月又组成了“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另一部分人后来组成了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后一派（即“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后来分别组成了“俄罗斯共产党人联盟”和“俄罗斯共产党人党”。这些相同和不同来源的组织，其共同点是都主张回归社会主义方向，恢复苏共、恢复苏联、恢复社会主义制度，但程度上、具体主张和方式上又有所不同，因而具有不同特点。

（一）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主张恢复苏维埃政权，恢复苏维埃联盟，恢复苏共，恢复社会主义制度，其斗争方式较激进，曾以“活跃于街头斗争”著名。

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前身是原苏共党内的“共产主义倡议运动”派。苏共和俄共被禁止活动后，该派于1991年11月23—24日在叶卡捷琳堡（原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宣布成立。来自原苏联14个加盟共和国和4个大工

业中心的525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党的章程和纲领性声明等文件，选举了由安皮洛夫、秋利金、马卡绍夫、谢尔盖耶夫等88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一个多月之后，即1992年1月9日，它在俄罗斯联邦司法部获准登记，取得了合法地位。

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强调自己是“工人运动中共产主义思想的继承者”，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学说”，“利用世界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好的经验”，“消灭任何形式的人剥削人”，“铲除社会和民族的不平等”，“建立无阶级的社会”。该党主张恢复苏维埃政权，恢复苏维埃联盟，恢复苏共，恢复社会主义制度。其成立大会通过的纲领声明指出，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依靠马列主义学说并以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权为自己的活动方针，而劳动农民和爱国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党的目标是“建立无阶级的社会”，“消灭任何形式的人剥削人”、“铲除社会和民族的不平等”，“保卫祖国的完整”等。纲领声明中还主张恢复联盟，不赞成废除1922年的联盟条约。认为在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化，将倒退到过去的公国割据局面。指出反社会主义势力实行的放开物价、非国有化、私有化、使农庄农场解体、国家体制非苏维埃化等，都是“反人民的措施”。强调党的各级组织主要工作方向是“振兴苏维埃政权，使其成为劳动人民的政权”。该党党章规定，“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是工人阶级因而也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政党”，是“工人运动中共产主义思想的继承者”。凡同意党的目标、执行党的纲领、意识和决议、在党的一个组织中工作并从物质上支持党的16岁以上的公民都可成为该党的党员。党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开展活动，实行集体领导制，少数服从多数，少数有权保留自己的观点，但集体作出决定之后必须执行决议。

党内不允许派别活动。党章还规定，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工农代表不得少于 50%。

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曾经以“活跃于街头的斗争”著名。它组织和领导群众性的“直接行动”组织——“劳动俄罗斯”和“劳动莫斯科”，经常走上街头，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活动，反对当局的社会政治方针和经济改革方针。1993—1994 年是其最活跃的时期，俄报认为它们在与当局的斗争中常常起着“撞针的作用”。1993 年“十月事件”后，“劳动俄罗斯”和“劳动莫斯科”被取缔，共产主义工人党曾一度被禁止活动，并被剥夺参加 1993 年议会选举的权利，其领导人安皮洛夫也被逮捕（后根据杜马大赦令释放）。据悉目前该党有 5 万名党员。就党员人数而言，是现阶段俄共产党组织中仅次于俄共的第二大党，但在 1995 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不足 5%，未能进入议会。

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成立以来的主要活动有：

——1992 年 1 月 5—6 日，在圣彼得堡召开中央全会，通过了 1992 年紧急行动纲领和策略，选举产生了由安皮洛夫等 11 人组成的中央组织局。全会发表了《告俄罗斯公民书》、《致联邦最高苏维埃的公开信》，号召全体居民抵制把列宁格勒市改名为“圣彼得堡市”，要求法庭在没有查清戈尔巴乔夫所有问题之前，不允许他出国。会议还制定和通过了《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号召人民做什么》的组织行动纲领和《就目前条件下的工作和行动策略问题致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组织的建议书》两个重要文件。文件认为，俄国内的形势是，“反动势力对劳动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对祖国的独立和完整正在实行向野蛮资本主义过渡和苏联被非法取缔，导致人民走向极端贫困和互相残杀战争”，“他们的目的是实现国家的资本主义化，

分裂国家”。在这种形势下，党应该加速完成自己的组织建设工作，同所有真正维护劳动人民利益、反对把国家财富出卖给外国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组织、工会和爱国运动建立牢固的联盟，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反对混乱和投机倒把活动，维护土地和工业企业全民所有制，恢复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反对私有化、私有制，加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恢复国家对外贸的垄断。恢复1922年的联盟条约，恢复苏联的宪法、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国家机构等等。

——1992年6月27—28日，在圣彼得堡召开中央全会，通过了党的纲领草案。纲领草案宣称，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学说，利用世界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好的经验，党的目标是“建立无阶级的社会”，恢复苏维埃政权，并置于劳动集体的监督之下；要确立劳动人民对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所有权，消灭任何形式的人剥削人，保障每个人的充分幸福和自由发展；使每个公民掌握文化和进行创造性的活动，铲除社会和民族的不平等；保卫祖国的完整等等。该纲领草案在1992年10月5日举行的党的二大上获得了通过。

——1993年10月13日，与俄罗斯共产党人党、共产党人联盟、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等一起发表告俄罗斯公民书，决定抵制并号召人民也抵制12月举行的议会选举，认为议会竞选不能消除失业、物价飞涨、工业破产、农业崩溃和科学文化毁灭，并谴责俄共参加议会选举。

——1993年12月4—5日，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主要讨论1992年10月以来的活动及近期工作任务和方针。大会认为，在当今俄罗斯，买办资产阶级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当局制造的十月暴力彻底打破了那种认为议会可以消灭法西斯制

度的神话。因此，完成党的最低纲领问题、苏维埃政权的诞生问题将必须采用新的斗争形式和方法解决。大会决定选派党员到各种劳动群众组织，首先是罢工委员会、劳动集体的领导机关中去，动员和组织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起来斗争。大会表示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新世界秩序”的进攻中，加强同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共产党人党、共产党联盟、共产党联盟—苏共等组织以及外国共产党组织的相互配合，并通过了与共产党联盟—苏共和其他共产党组织、运动共同行动的决议。同年底，该党与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等5个共产党组织（不包括俄共）组成了共产党联盟，以协调一致地制订和开展共同行动。

——1994年3月，与共产党联盟—苏共领导人举行会晤，确认在基本问题上的一致立场，强调必须致力于将来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建立俄罗斯统一的共产党。认为实现今天共产党组织联合的道路在于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中扩大行动，并在斗争中利用共产主义运动经验中已有的一切形式和方法。

——1995年12月，参加议会选举，得票率不足5%，未能进入议会。

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主要领导人维·安皮洛夫，1945年10月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曾当过工人，服过兵役，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担任过国家广播电视公司评论员，善于演说。他崇拜列宁、斯大林和古巴游击队领导人格瓦拉。1991年“8·19事件”后，是最先站出来谴责戈尔巴乔夫和俄当局领导人、捍卫苏共的俄罗斯社会活动家之一，被俄报刊称为“具有超凡能力的好斗的勇士”。

（二）俄罗斯共产党人联盟——主张“重新走上社会主义

道路”，恢复苏维埃政权，但又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也主张对其进行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俄罗斯共产党人联盟是原苏共内部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派”的一部分人及其拥护者在1991年11月16—17日召开的代表会议上宣布成立的。来自俄联邦7个州、2个自治共和国以及乌克兰、哈萨克、立陶宛、摩尔多瓦等6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210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赞成组委起草的纲领提纲和《关于成立社会主义力量和反法西斯阵线广泛运动的呼吁书》，选举了以原苏共中央委员、莫斯科大学教授阿·普里加林为首的组织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在11月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们打算“在马列主义基础上成立共产党”和争取“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共产党人联盟的“直接政治任务是：使国家重新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抵制资本主义复辟和社会不平等的增加”，“恢复苏维埃政权”。主张“在商业和服务领域利用各种所有制形式的情况下，使公有制起主导作用”，“发展可调节的市场关系”；有“统一的联邦国家”；“所有认为自己是苏共法定继承者的政党联合成统一的共产党或至少是共产主义运动联盟”。普里加林说，共产党人联盟基本上反对叶利钦开始的经济改革，一旦群众采取反对国家当局的自发行动，联盟“将同走上街道的群众站在一起”。

1992年4月和1993年10月，共产党人联盟先后举行两次代表大会，通过和修订了党章。党章规定，共产党人联盟是“把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民族知识分子的利益，把祖国的自由、独立和富强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公民的政治联盟”。任何16岁以上、赞成党的目标、承认党的纲领、章程和精神原则，并在党的一个组织中工作的公民都可以成为该党的党员。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的目标是“建立无阶级的社会”，

即：使劳动摆脱一切形式的异化，消灭人剥削人；确认为共同幸福而劳动是个人收入的唯一来源；使所有公民掌握文化和参加创造性活动；消灭社会和民族的不平等；保持俄罗斯和苏联的完整性。党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建立真正的民主，即劳动人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利，按照生产和居住地建立劳动集体苏维埃；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学说以及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好的经验。

共产党人联盟在政治方面，主张“恢复作为人民政权机关的、唯一能保证民主并不允许资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赋予劳动集体政治权利，恢复劳动集体苏维埃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基层组织，按照生产和地区的原则建立选举体系。在这样的政权体制下，就能保证国家机关和领导人都服从民主通过的法律，真正实现人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保证所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政党、组织和运动都能获得宣传工具，排除操纵社会舆论的可能；不允许个人（包括总统）过分扩大权力，并把权力置于代表机关的监督之下。

在经济方面，主张“实行国有制改革”，把大部国家财产无偿地转交劳动集体经营使用（不允许低价出售）；把部分国有财产、主要是中小型企业卖给劳动集体，变为集体所有；只对那些对社会有重要意义的工业企业保留社会所有制，并由国家直接管理；反对大规模私有化，限制雇佣劳动；不允许对私人商业活动提供经济特权；在所有企业中实行工人对生产、消费和分配的监督；实行国家调控和市场自行调控的“灵活结合”。

在社会政策方面，主张保障人民的劳动权、医疗保健权、免费受教育权、住房权等，恢复各民族的兄弟友谊和团结，反对肢解国家，反对成立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的政党，主张组织

广泛的社会运动，以便在民族自愿联合的基础上恢复统一的联邦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共产党人联盟还主张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组建“共产党人国际联盟”，赞成在将来建立统一的俄罗斯共产党。

共产党人联盟于1992年9月在俄罗斯联邦司法部获准登记，是合法政党，现有党员数千人，未参加杜马选举。

（三）俄罗斯共产党人党——宣称“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主张“重新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联邦制基础上恢复多民族的国家”，实行多党制、真正的多元化、公开性和言论自由，允许公有制占主导条件下的私有制存在。

俄罗斯共产党人党是原苏共内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派”的另一部分人及其拥护者在1991年12月14—15日召开的代表会议上宣布成立的。来自俄联邦8个市、州的135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该党自称是“俄罗斯联邦公民的组织”。凡承认其纲领目标和章程，在党的一个组织中工作，并交纳党费的16岁以上的公民都可成为它的党员。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对通过的决议，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党内允许由党员联合而成的、承认党的纲领目标和任务、但实现目标和任务的道路和方法不同的派别”。在该党1992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宣言中指出，党的战略目标是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种社会。党的近期任务是“使社会重新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是唯一能导致自由、社会公正、政治和经济民主的道路。在这种社会制度下，没有人对人的剥削，那些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人将成为生产的主人”。称该党捍卫

工人阶级、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和所有靠自己劳动的收入、退休金、助学金和补贴为生的人的利益；党“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具有实现自己的纲领原则、政治实践和利用一切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想的精神潜力”。

在政治方面，该党主张“在联邦制基础上恢复多民族的国家”、恢复“苏维埃的政权组织原则和管理原则，苏维埃应当成为人民的全权代表”；“反对把政权没有监督地集中在个别人或个别人的小圈子手中”；实行多党制、真正的多元化、公开性和言论自由；民主选举的权力机关要对执行机关进行领导。

经济方面，主张“以法律形式巩固国有经济的优先地位”；“允许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在某些领域存在各种形式的私有制”，同时“加强国家所有制，反对自发的大规模的私有化和把国家垄断变成私人垄断”；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实行反垄断政策；把市场和调整经济的计划基础有效地结合起来；发展就业服务和开拓新的工作岗位，消除失业；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和工农业之间的互利贸易；反对土地私有化等。

社会政策和文化教育方面，主张保障免费教育和住房，保证退休金和补贴不低于最低生活费；妇女平等，改善她们的家庭和生产劳动条件；增加教育和科研拨款，使之逐渐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反对国民教育、科技和文化的商业化等。

该党积极参加“劳动俄罗斯”组织的各种活动，包括1993年10月保卫议会大厦的斗争，并抵制当年底的议会选举，其后又开展各种活动反对“12月12日国家转变的合法化”（即国家杜马选举结果）和新宪法。

共产党人党1992年3月取得了合法地位。现有党员数千人，主要是知识分子、职员和工人。

党的主席阿·克留奇科夫，1944年生，1969—1974年在梁赞州内务部工作，1970年加入苏共，1974年毕业于全苏法律函授学院，1979年毕业于苏联内务部研究院附属高等军事学院研究班，获法律系副博士学位。

五、自称“新型共产党”的俄罗斯 劳动人民社会党

俄罗斯劳动人民社会党是原苏共党内“民主纲领派”的一部分人及其拥护者在苏共和俄共被禁止后宣布成立的。1991年10月3日，麦德维杰夫、杰尼索夫等原苏共中央委员、地区党的领导人、苏联和俄罗斯人民代表10人，以“联合俄罗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左派力量倡议小组”的名义，在《真理报》上发表声明，号召“捍卫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志同道合的共产党人，“立即开始在苏共进步力量的基础上进行建立新的俄罗斯政党的工作，把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左派联合起来”。声明建议赞同这一立场的人建立地区倡议小组，筹备召开成立代表大会。10月25—26日，来自俄罗斯56个地区的324名代表在莫斯科举行全俄会议，决定成立俄罗斯劳动人民社会党，并通过了党的章程和纲领性声明。当时有党员约5万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前苏共官员、老工人、退役军人和一部分农民。会议成立了党的组织委员会，主要领导人有麦德维杰夫、瓦尔塔扎罗娃（原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杰尼索夫（原苏联人民代表）等。12月21—22日，该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提纲和关于左派力量统一的决议，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

该党纲领性声明宣称不放弃共产主义。现在主要是通过多种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结构多元化来建设社会主义。瓦尔塔扎罗娃说，该党是“左派中心”，而按西方的认识，是“社会民主党左派”。麦德维杰夫说，该党是一个“新型的共产党”，一个“议会党”、一个“建设性的反对派”，是苏共的“合法继承者”。但不能将苏共与劳动人民社会党混为一谈，这两个党不论是纲领性文件和章程，还是工作方法，都有很大差别。劳动人民社会党在建立社会主义的同时将考虑当代社会主义思想的各个流派和发达国家的社会化进程。它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选择，主张非暴力斗争。

劳动人民社会党宣称自己是所有以工资为生和自食其力的人，包括工人、农民、职员、教师、工程师和从事创造性活动的知识分子的代表者和捍卫者。党的宗旨是“用和平的、符合宪法的方式使俄罗斯社会摆脱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精神危机，通过激进的改革建立法治的民主国家和多种经济成份的民主社会”。该党1994年2月召开的四大通过的党纲主要包括以下思想：

强调全人类价值的核心“人道主义”是该党思想原则的基础。党纲说，“解决21世纪产生的我们内部和全球性的问题，都应该以公正、民主、自由、团结、平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价值为依据”，“它们一起组成了社会主义理想的本质，是人道主义的全人类价值的核心”，“是劳动人民社会党的思想原则的基础”。

认为马克思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学者，19世纪和20世纪那些使世界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变化的最伟大的运动都与马克思主义有联系，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思想和观点是“空想主义的”，甚至是“错误的”，在理论思想上很有吸引力，但

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认为列宁是伟大的革命家，但“在列宁主义中，世界革命的思想占有过分重要的地位，而在改造社会的手段中过于强调暴力，特别是直接暴力的作用”。

强调“坚决同斯大林主义和集权主义划清界限”。反对把工人阶级看作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主张在经济方面，实行公有制占优势的多种成份的经济，劳动人民是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者。赞成和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研究私有化计划，要保障生产者不仅参加生产和经营活动，而且要支配自己劳动的成果。

主张在社会政策和文化教育方面，要采取制止多数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和缩小收入差别的措施；国家保障最低水平的免费医疗、教育和学前教育；保护国家的文化财产，防止文化领域的商业化等。

主张左派力量、社会主义力量、民主力量实现广泛的联合。该党1993年曾与一些组织建立竞选联盟，参加议会选举，但未能征集到规定的选民签名。1995年未参加杜马选举，在议会无代表。该党目前党员不足1万，活动不多。

党的主要领导人罗·麦德维杰夫，1925年生于现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1943年应征入伍，在高加索前线服役，1951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其后在中学任教，1956年加入苏共，1957—1971年先后在教育出版社和教育学院工作。1969年因发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而被开除党籍。1971年以后成为自由学者，教育学副博士，撰写和翻译出版多部著作。1989年恢复党籍，并被选为苏联人民代表，1990年7月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六、为重建苏共的跨国联合组织 “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

“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是苏共被解散、苏联不复存在后，原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新成立的共产党在原苏共的基础上改组而成的。苏共被禁止活动后，原苏联土地上的许多苏共党员就开始为重建苏共而开展各种活动。1993年3月26—27日，来自原12个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组织的416名代表在莫斯科举行“苏共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决定把苏共改组为“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并通过了新的党章和党纲，选举领导机关，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奥·舍宁被选为中央理事会主席。

该组织的章程规定，共产党联盟—苏共是在“苏联领土上形成的独立国家中，具有共同的社会阶级特点、在马列主义基础上活动、继承苏共事业的共产党组织中的共产党人的自愿联合”，是以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民主集中制为思想和组织基础的“共产党联盟”，是“苏共的唯一合法继承者”。参加共产党联盟—苏共的各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是独立的”，“彼此在共同的纲领和由共产党组织的基本特点决定的组织原则上，在思想一致、平等和相互团结的基础上进行活动”。联盟的主要目标是：“恢复社会主义社会，捍卫苏维埃政权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与政治权利，重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并根据联盟重建的情况恢复统一的苏联共产党。最高目标是“促进共产主义社会的兴起和建立”。

该组织的纲领规定，“作为积极进行政治行动的党，共产

党联盟—苏共将以苏联宪法和各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允许的一切形式和方法为劳动人民的政权而斗争”，“党将致力于在群众中进行日常斗争，组织群众集会、游行、组织纠察队、参加其他进步组织举行的政治行动”。党活动的基本方针和任务是：按照各成员党的政策和各共和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基本问题“制定共同的立场”，“协调”各成员党的活动，“促进经验和信息交流，使各党的章程和纲领的基本观点相接近，进行科学研究、宣传和信息活动，与赞成共产党联盟—苏共的纲领和目标的政党、运动、组织和机关联合行动”，各成员党要互相帮助。纲领中还提出了一些社会政治、经济的政策主张及其实施步骤。

该组织成立以来的主要活动有：

——1994年5月21—22日，举行了成员党领导人协商会晤，通过了《关于苏联土地上的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形势以及加强共产党人团结的任务》的决议等文件。

——1995年7月1—2日，举行第三十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和党的活动方针和任务，批准了修订的党章，选举了协调机构——理事会，舍宁再次当选为理事会主席。

共产党联盟—苏共是一个跨国联合组织，目前有包括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内的19个成员党，没有自己的基层组织，被俄报称为“无国之党”。至今尚未在俄罗斯司法部办理登记注册。

理事会主席奥列格·舍宁，1937年生，1954年毕业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矿业技术学校，1962年加入苏共，1976年在托姆斯基工程建设学院毕业。曾任苏共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委第一书记，1990年被选为该边疆区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在苏共1990年6月全会上被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

书记。1991年因参与“8·19事件”被捕入狱，1994年3月由杜马大赦令释放。舍宁主张恢复苏联，恢复苏共。

七、与俄共合作的左翼政党 ——俄罗斯农业党

俄罗斯农业党成立于1993年2月26日，同年4月在俄罗斯司法部获准登记，成为合法政党。其成员主要是农工综合体工作人员、农村知识分子、部分私人农场主以及集体农庄和农场干部和职员。

该党自称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代表农村居民利益的农民的政党。其宗旨是：1. 保护农民、农工综合体工作人员和全体农村居民的权利和自由。2. 彻底改善农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建立平等互利的城乡和工农关系，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3. 集体制定农业政策、方针、发展战略及其实施策略。4. 联合全社会复兴农村文化与传统。5. 参与建立国家政权和管理机构，并通过党在这些机构中的代表实现自己的纲领目标。

农业党主张实行有条件的土地私有制，把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使用，但反对买卖土地和把土地变成私有资本；实行国家、集体、个人并存的所有制和合理的生产资料非国有化，执行保护国内商品生产者，首先是保护农业商品生产者的国家计划和政策；发展粮食生产，逐步减少直到停止粮食进口；确定平等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减少农产品税赋，降低食品价格；在文明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私人农场，并保障其健康发展。

该党宣称它不仅代表农民的利益，还是一个为俄罗斯社会

和谐而建立的全民族的政党。认为维护农民的利益与解决关键的社会问题是密切相关的，现代农业只有在现代工业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因此主张建立可调节的、面向社会的市场经济；扶持有效益的生产实体，利用价格、税收、信贷等杠杆来发展经济；各种所有制和经营形式并存，市场机制和国家调节机制相结合。农业党的政治目标是：同盟友一道，通过竞选取得大多数数人支持获得政权，建立公正的社会。

对外政策方面，主张恢复前苏联各地区的关系，奉行既符合俄罗斯民族利益，又完全尊重国际法准则和其他国家合法利益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强调俄罗斯要作为一个有独自历史、文化和原则的强国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

农业党十分关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改革的进程，特别赞赏中国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就，说中国解决了粮食问题就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该党主张发展同中国共产党之间务实的合作关系和同志式的相互协作，主张俄中两国人民建立真正的兄弟般的关系。农业党同中国共产党已建立正式关系。以主席拉普申为团长的该党代表团曾于1995年4月访华。

农业党在政治上是俄共的盟党，也是俄国内左翼政党第二大党。据说现有党员约20万（其中相当一部分同时也是俄共党员），在77个联邦主体建有700多个区组织、近3000个基层组织，中央领导机构是理事会及其主席团，党的主席是米·伊·拉普申。该党在1993年12月国家杜马选举中得票7.9%，获得47席，加上按地区选举中的6席，共有53个议席，为杜马中第四大党。在其后的地方选举中，与俄共联合也在多数地区赢得胜利。上届杜马主席雷布金（现任安全会议秘书，已退出农业党）以及上届政府副总理扎韦留哈、农业部长纳扎尔丘克均出自该党。但在1995年12月的杜马选举中只在按地区选

举中取得 20 个议席。

党的主席米·伊·拉普申，1934 年出生于阿尔泰的一个农民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莫斯科外语师范学院。经济学副博士。从 1961 年起担任莫斯科州“列宁遗训”农场场长，长期在农村工作。他主张改革，1986 年在农场试行股份制，1992 年将农场改为股份公司并任董事长。1990 年当选为俄罗斯人民代表，是旧议会反对派议员团“农业联盟”领导人之一，曾是俄共党员，1993 年俄共二大上被选为俄共中央执委会副主席之一。他在“农业联盟”和一些农村组织的基础上创立俄罗斯农业党，并在成立大会上被选为党的主席。在 1994 年 11 月举行的农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主席。

第 4 章

低谷中的奋斗

——原苏联其他国家的各类左翼力量

前苏联境内的 15 个加盟共和国^①，除俄罗斯以外还有 14 个国家。这些国家中原来的共产党，在剧变中有的已改名易帜，变成了其他左翼政党；未改名的一些党在剧变后的几年间，经历了由被禁止和被取缔，到逐步恢复活动、重建或改建的曲折过程。随后在这些国家中涌现出一大批新的共产党、社会党等左翼政党。其中最主要的有：

^① 原苏联境内的 15 个加盟共和国，其中波罗的海 3 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已于 1991 年 9 月即苏联解体前独立；其余 11 个国家于 1991 年 12 月联合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格鲁吉亚 1993 年 11 月加入。独联体共计 12 个国家，除俄罗斯外，它们是位于欧洲的 3 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位于外高加索的 3 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以及位于中亚的 5 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

——独联体欧洲3国的4个共产党和其他4个左翼政党；

——独联体高加索3国的5个共产党和亚美尼亚民主党等左翼政党；

——独联体中亚5国的3个共产党和其他7个左翼政党

——波罗的海3国的劳动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等3个左翼政党；

以上由“前共产党人”新组建的各种左翼政党都主张议会民主，有的曾重返政坛，但后来议会选举失败而下台；而重建或改建的各种共产党，有的力量很小，有的虽已成为议会中的重要力量（如乌克兰共产党），但仍难以上台执政；有的党（如个别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当上了国家总统或政府领导人，但按国家现行宪法和政治制度，并不等于这些党就是原来意义上的“执政党”。总统可利用“党”作为其“工具”，而“党”难以借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总之，这些国家的共运和社会主义力量没有消亡、也决不会消亡，然而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低潮的形势。

一、独联体欧洲三国的左翼力量

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是独联体位于欧洲的3个国家

家。目前这3个国家的左翼政党共8个，总计约40万人。它们都是由原共产党改建或由原共产党人组建而成的，其中共产党4个（共约18万人），其他左翼政党4个。它们在本国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乌克兰的左翼政党——共产党、社会党和农民党

1. 乌克兰共产党

乌克兰共产党于1993年6月重建，同年10月获准登记为合法政党。该党现有党员14万多人，在1994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89席，占总议席的1/4强，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乌克兰共产党由被禁止到重建，经历了一年多时间的艰苦斗争。1991年“8·19事件”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于8月底先后两次颁布“暂时中止”和“禁止”共产党活动的命令。但许多共产党人不服当局的禁共令，积极开展各种活动，要求最高苏维埃取消禁令，准予恢复共产党的活动。虽然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大多数委员赞成作出取消禁共令的决定，但由于议会中的“民主派”（“鲁赫”运动等）的反对，这一决定经多次讨论未能通过。在俄共恢复合法地位和重建的巨大鼓舞下，乌克兰共产党人于1993年3月6日召开了“全乌克兰共产党人代表会议”，有来自24个州（全国共25个州）的450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一致同意重建乌克兰共产党的计划，并决定成立“争取取消禁共令和恢复共产党活动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共产党人发动其拥护者在全国各地展开了要求取消禁共令、恢复共产党合法地位的大规模活动。乌克兰最高苏维埃迫于形势的压力，终于在1993年5月14日发表声明说：“信奉共产主义思想的乌克兰公民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创建自己

的党组织。”这就意味着禁共令被撤消了。于是，在同年6月9—21日，乌克兰共产党人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全国25个州和克里米亚共和国的529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宣布重建乌克兰共产党。

重建的乌克兰共产党宣称自己是原乌克兰共产党的“合法继承者”，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准则”，捍卫劳动者的利益，反对改变社会政治制度和使国家资本主义化。这些原则性立场都是在重建大会通过的党章和纲领性声明中宣布的。大会还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原乌克兰共产党顿涅茨克州委第二书记西蒙年科被选为重建后的党的第一书记。

该党于1993年10月在司法部获准登记后成为一支合法的重要政治力量，活跃在乌政治舞台上。在1994年3、4月的乌克兰议会选举中，乌克兰共产党在总共337席中获得89席，占1/4强，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乌共在议会中与社会党、农民党等左翼党派建立统一阵线，推选了社会党主席莫罗兹为最高苏维埃（议会）主席，农民党主席特卡琴科为第一副主席，而乌共议员则担任了议会中许多委员会的领导职务。三党在议会中还联合其他支持者冻结了乌政府的私有化计划。

1995年3月11—12日，乌共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00多名代表出席了大会，还有来自朝鲜、越南、古巴、意大利及独联体其他国家等十几个外国党的代表团应邀参加了大会。乌共第一书记西蒙年科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说：乌共重建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已发展为乌全国第一大政党，拥有党员14万多人，在各州（共和国）建有500个党的组织。报告还抨击了现政权推行的政策，主张取消总统制。大会通过的新党纲规定，乌共是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及全体劳动者的党，它以马列主义学说为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并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和斗争中，不断丰富这一学说；党捍卫社会主义，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现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实际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将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势力赶下台，把一切权力交给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恢复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发展道路，恢复国家对国有经济的控制和管理，反对将国家财产私有化，反对解散集体农庄，主张采取具体措施使国家经济摆脱危机，改善人民生活。纲领还主张废除宣布解散苏联的“别洛韦日协定”，“在新的条件下恢复作为社会主义主权国家自愿联合体的平等的兄弟民族的联盟”。大会选出了由150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西蒙年科再次当选为第一书记。

2. 乌克兰社会党

乌克兰社会党成立于1991年10月26日，现有党员约6万人，主要是原乌克兰共产党的党员。在1994年议会选举中获得5个议席。

乌克兰社会党的章程称自己是劳动人民的政党，代表劳动人民和所有以劳动为生的人的利益，党是“永远忠实于社会利益的真正共产党人的继承者”。该党的宗旨是：建设以劳动人民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成就和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拒绝所谓“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党的政治纲领是：建立真正的法制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发展民主制度，通过合法手段解决社会关心的问题；实现政治多元化，每个政党都享有参加政治生活的平等权利，与所有捍卫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政党实行联合。在经济方面，主张真正体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公正原则；实行非国有化，为各种集体所有制形式的优先发展创造条件；在实行经济改革时，既要保护大企业的利益，也要促进小企业和个体劳动的发展，并采取保护民族市场的措施等。

乌克兰社会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政治委员会。在1994年举行的乌克兰议会选举中，该党获得5个席位。

党的主席亚·莫罗兹，生于1944年，乌克兰农学院毕业。乌克兰独立前，曾任原乌克兰共产党基辅州委农业部副部长，州工会书记。1990年当选为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1995年5月当选为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

3. 乌克兰农民党

乌克兰农民党的主体是农民，据称有7万多党员，基本上在农村活动，主张把恢复农业作为整个乌克兰复兴的基础。主席为多夫甘。

(二) 白俄罗斯的左翼政党——共产党人党、共产党和农业党

剧变后的几年间，白俄罗斯的共产党经历了由新建、被禁止再到恢复活动，以及两个共产党组织由分裂到联合再到分裂的曲折过程。在1991年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禁共令”颁布后，一部分共产党人重新聚集起来，不久就成立了“白俄罗斯共产党人党”。1993年“禁共令”被取消后，白俄罗斯共产党恢复活动。随后不久这两个共产党合并，统一叫作“白俄罗斯共产党人党”。联合起来的这个共产党，在1995年的议会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在总数198个议席位中占42席，居各党派之首。但1996年因该党与卢卡申科总统发生分歧，支持总统的一部分人分裂出去，重新成立了白俄罗斯共产党。因此，现在白俄罗斯又恢复了两个共产党的局面，另外还有一个左翼政党，即农业党。

白俄罗斯共产党人党成立于1991年12月。“8·19事件”后，在席卷前苏联土地上的反共浪潮的冲击下，原白俄罗斯共

产党也被当时的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禁止活动，财产被没收，组织机构被破坏。但许多坚定的共产党员不顾这一禁令，重新聚集起来，成立了新的共产党组织——白俄罗斯共产党人党，并宣布它是原白俄罗斯共产党的继承者。领导人是奇金。1992年5月该党在司法部登记成为合法政党。

在1993年2月俄罗斯共产党恢复合法地位的影响下，前共产党人占大多数的白俄罗斯议会通过了取消对共产党的禁令，但共产党被没收的财产却不予归还。此后，白俄罗斯共产党立即恢复活动，召开了中央全会，并决定筹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但是，在原来的48.6万共产党员中，只有1.8万余人确认了自己的白俄罗斯共产党员的资格。1993年4月25日，白俄罗斯共产党召开了第三十二次（非例行）代表大会，来自白俄罗斯各州、市、区党组织的285名代表参加了会议。该党中央第一书记阿纳托利·马洛费耶夫在大会报告中，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局势，强调共产党人必须团结起来。他说，白俄罗斯共产党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人党绝不是两个不同的政党，而“是一个树干上的两个分枝”，因此两个党应该联合起来。经过热烈的讨论和争论，大会最后作出了两党统一的决定。这一决定立即得到了白俄罗斯共产党人党的赞同。

在1993年5月召开的白俄罗斯共产党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顺利实现了两党组织上的联合，壮大了党的队伍，使党员增至3万多人。大会还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卡利亚金当选为党的第一书记。

统一后的白俄罗斯共产党人党，力主恢复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认为国家的经济危机和灾难并不是社会主义及其思想的失败，而是苏联在80年代中期采用的具体模式的失败，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导致苏联解体的结果。在这方面，前白俄罗

斯领导人舒什克维奇也负有直接的责任。因此该党赞成立即恢复同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建立经济联盟，同时国家要采取实际措施制止生产滑坡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该党反对私有化和损害大多数居民利益的市场改革，认为这是一条“掉进深渊的道路”。还主张国家对其他生活领域进行调控，以行政办法制止社会道德败坏。认为白俄罗斯应成为强大的主权独立的国家，但应参加各共和国的联盟。

该党重视与其他左翼政党和组织的团结和合作，1993年它发起成立“人民运动”，有20多个政党、组织和运动参加了该运动。在1995年的议会选举中，与农业党等建立左翼力量联盟，取得巨大胜利，在新议会198个议席中该联盟赢得近一半的席位，其中白俄罗斯共产党人党党员占42席，居各党派之首。该党中央书记诺维科夫还当选为议会第一副主席，党的第一书记卡利亚金被选为主席团委员，而农业党领导人沙列茨基当选为议会主席。新议会基本上为左翼力量控制。

但是，后来白俄罗斯共产党人党及其支持者占优势的议会，与卢卡申科总统在政策和权力分配问题上的分歧日趋加深，造成党重新分裂。该党与总统分歧的焦点是，要不要就扩大总统权力的宪法修正案举行全民公决。总统提出的宪法修订案的主要内容包括：总统令可以代替法律；总统不需要经议会批准，可直接任命国防、内务等强力部的部长；将议会改成上下两院，现议会（最高苏维埃）变为下院，地方行政长官组成上院；总统有权解散议会等。而共产党人党占优势的议会则坚决反对扩大总统权力，尤其反对总统拥有解散议会权。到1996年11月，这一矛盾更加激化，双方公开互相攻击，造成社会动荡，总理辞职。在双方始终不能达成妥协的情况下，俄罗斯领导人前去调解也未果。最后于11月24日，就总统和议

会分别提出的两个宪法修正案举行全民公决。结果议会提出的关于限制总统权力的修订案只得到7.93%的支持票，而总统提出的扩大总统权力的修订案却获得了70.45%的支持票。赢得公决胜利的卢卡申科总统，迅速对议会进行改组，即将现议会由总统批准的一部分议员改组成下院，而上院则由更支持总统的地方领导人组成。这样，以白俄罗斯共产党人等左翼力量为主的原议会就不复存在了。随之，白俄罗斯共产党人党发生分裂，支持总统的一部分党员又恢复原“白俄罗斯共产党”名称，另一部分反对总统的党员则继续坚持“共产党人党”的名称，并于1997年1月召开白俄罗斯共产党人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该党党员减至1.5万人左右。大会宣布该党作为现政权的反对派而继续活动。党的第一书记仍为卡利亚金。

白俄罗斯的左翼政党，除了上述两个共产党之外，还有一个白俄罗斯农业党。但其当前的情况尚不详。

（三）摩尔多瓦的左翼政党——共产党人党和农业民主党

摩尔多瓦的左翼力量主要由前摩尔多瓦共产党人组成，一部分人组成了“摩尔多瓦农业民主党”，另一部分人组成了“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前者现有6万党员，在议会占44席，是第一大党。后者现有1万党员，在议会占5席。

1. 摩尔多瓦农业民主党

该党成立于1991年10月19日，当时有750名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党员多数为原摩尔达维亚共产党党员和农工综合体、集体农庄的领导人，共有6万多名。该党自称是农工综合体工人和全体农民的代表者，主张保障各民族的权利和自由，实行土地所有制和经营形式的多样化。政治上主张维护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争取真正的民主，不允许在管理国家过程

中实行集权与专制。该党在 1994 年 2 月举行的摩尔多瓦议会选举中获得 43% 的选票，在议会占有 44 席，是议会第一大党。

该党党章规定，凡年满 18 岁的摩尔多瓦共和国公民，只要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不论其社会地位、民族、信仰，都可以加入该党。该党现任主席杜·莫兹潘，1940 年 5 月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服过兵役，1966 年在农机技校毕业后，先后任农场技师、乡苏维埃主席，县党委指导员。1990 年被选为摩尔达维亚最高苏维埃代表，1994 年当选为新议会议员，并被选为摩尔多瓦副议长。

2. 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

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成立于 1994 年 4 月。该党自称是真正的左派，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的理想，主张发展社会主义，把马列主义同摩尔多瓦国内实践相结合；反对实行私有化，认为私有化是对人民财富的公开掠夺，摩现行宪法是资产阶级宪法。该党主张全面发展与独联体国家包括军事关系在内的各种合作关系。现与俄共及独联体国家其他共产党保持着联系。该党在摩议会中有 5 个议席。现有党员 1 万多人。党的第一书记为弗·沃宁。

二、独联体中亚五国的左翼力量

独联体的中亚 5 国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 5 国的左翼力量的特点是：（1）“8·19 事件”后，当苏联其他地区掀起反共浪潮时，中亚 5 国当局虽然也宣布禁止共产党活动，但相对没有采

取严厉的反共措施，原进步力量基本上保留住了。(2) 5国目前的左翼党派都是由执政的各共和国共产党更名或重建的。(3) 各左翼党人数不少，但社会影响和实际作用不大，个别党的领导人和干部在国家 and 政府中担任要职，但按现行宪法和政治制度，总统是“超党派”的，并不等于这些党是执政党”，党实际上从属于总统。目前该地区左翼党派共7个，其中共产党3个，它们是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塔吉克斯坦共产党，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4个：哈萨克斯坦社会党、乌兹别克斯坦人民民主党、土库曼斯坦民主党、乌兹别克斯坦（公正）社会民主党。左翼力量共约85万人，其中共产党约10万人。

（一）哈萨克斯坦的左翼政党——共产党和社会党

1. 哈萨克斯坦共产党

哈萨克斯坦共产党是原哈共改名为“社会党”之后，一些不同意改名的共产党人于1991年10月成立的。1994年3月获准登记为合法政党。现有5万党员，在议会有2个席位。

在1991年苏联“8·19事件”后，原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于同年9月7日召开非例行的紧急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纲领性声明，宣布哈共脱离苏共并将党的名称改为社会党。于是，该党的另一部分不赞成社会党纲领主张的党员，于10月间召开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决定重新成立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并通过了党的章程和纲领性声明，宣称要“努力设法在已经掀起的反对共产党运动的条件下继续生存下去，并用合法手段为争取各级政治权力而斗争”。

1992年9月19日，新成立的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非常代表大会，修订了党章，通过了新的纲领性声明。党

章规定，哈共活动的出发点是，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建立保障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目的。它的社会政治主张是，恢复苏维埃政权，并在苏维埃中增加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代表。在经济方面，主张恢复和发展独联体国家统一的经济空间，实行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与市场的灵活结合。在民族关系方面，主张加强民族间的兄弟关系和友谊，恢复人民间的和睦生活的传统关系。

1994年10月22日，哈共举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党纲指出，哈萨克斯坦共产党是劳动者的政治组织，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联合志同道合者的列宁式的政党，其社会基础是劳动者，即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所构成；其思想基础是批判地分析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成功和失败，吸取其所有有益的经验，并加以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其目标是使国家回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恢复人民政权，并主张主权国家自愿联合起来组成联盟；但该联盟将不是过去的那种联盟，而是考虑到过去、现在和将来，实行充分尊重加入联盟的国家的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在划清中央和各共和国之间权限的基础上，焕然一新的联盟国家。为此，哈共提出自己的近期任务，是建立强大的中左力量和爱国主义力量的联盟，将来在这个联盟的基础上，建立社会和民族救国联合政府，并与其他各主权共和国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哈共还主张在原苏联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共产党。哈共的纲领还规定，党的最高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使国家成为民主、独立、繁荣的共和国。

该党纲领强调，哈共将在共和国宪法和法律范围内为劳动者的政治权利而斗争，通过党在国家权力机关中的代表实施自己的政策。党利用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各种形式和方法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排除使用武力解决社会政治问题。

1997年1月11日，哈共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对党纲和党章又作了修改和补充。党章规定，哈共“是为实现党的纲领目标，在自愿基础上联合哈萨克斯坦公民的政党，是依照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原则行动的党”。党纲又说，哈共是“劳动人民的党，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所有创造物质和精神价值的先锋队”。

党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党纲认为，“马列主义是随着周围世界的变化，随着社会发展的新因素和新现象的积累和认识而经常发展的创造性科学”。“只有在发展着的共产主义思想基础上，才能拯救人类”，“共产主义思想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鼓舞着人类最美好的社会意识”。因此，哈共的活动“从共产主义理想出发，从创造性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遗产以及进步的社会思想成就出发”。党章规定哈共的目标是“为在哈萨克斯坦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的自由和社会公正的社会创造条件”。

关于现阶段的任务，党章规定，党在现阶段以合法手段解决以下任务：恢复真正的人民政权；恢复和扩大劳动人民的社会保障规模；支持独联体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在所有制多样化的条件下，支持造福于人和社会的所有制；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宣传马列主义和社会进步思想，等等。在对外关系方面，主张世界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兄弟关系，力求同前苏联各共和国共产党积极合作，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积极合作。党纲指出，哈共现阶段作为反对派政党，向现政权机关施加压力，建立中左和爱国力量联盟，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和民族拯救联合政府，争得国家权力机关的多数席位。第二阶段，即取得政权之后，党将进行经济改

革，并根据党的纲领目标实行政治改革。

关于苏共的经验教训，党纲指出，“哈共的结论是，在已发生的事件中，是前苏共和各共和国共产党领导中叛卖者的巨大罪过，使共产党的政策丧失了阶级性，使劳动人民丧失了警惕性”。当然还存在着主客观的其他因素。纲领强调，“80—9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中，不是社会主义本质自身的危机，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失败，而是社会主义建设扭曲的理论和政策的失败。”

关于党的组织机构，哈共党章规定，哈共奉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及民主与党的纪律、主动精神与责任性相统一的原则”。党按地区建立组织，分为基层组织、区、市、州组织。它们在各自权限范围内独立自主地确定本地区实现党的政治目标和战略任务的途径。哈共的最高机关是代表大会，至少每两年召开一次，其职权和任务是，通过、重新审议和修改党章、党纲，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确定党的战略和策略等。中央委员会是代表大会闭会后的执行和协调机关，它选举产生中央第一书记、书记和政治局，中央书记同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全会至少每年召开两次，中央政治局是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关，负责解决政治和组织问题，每半年要向中央全会汇报工作一次。中央第一书记确定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职责分工。现任中央第一书记是图列巴耶夫。

2. 哈萨克斯坦社会党

哈萨克斯坦社会党是在1991年9月7日召开的原哈共非例行的紧急代表大会上由原哈萨克斯坦共产党改名而来的。

该党改名时发表的纲领性声明宣布，党的基本宗旨和方针是：始终不渝地体现和坚持劳动人民的利益，实现民主改革，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巩固族际和谐与公民和睦，拒绝任何暴力

变革的企图，党将以法律和议会方式为劳动人民的政权而奋斗。

1992年3月14日，该党召开第十九次（继承原哈共历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和党章。党纲指出，社会党的目标是建立公正、自由和人民团结的社会。在政治方面，赞成多党制，主张建立发达的政党制度，认为反对派的存在可以防止官僚专制。国家不应干预合法的政党和社会运动的活动，反对任何社会政治力量对真理和公正的垄断。在经济方面主张实行市场经济，主张建立全新的生产关系，以保障社会生产力的活力；严格财政政策，在改变国家支出结构和减少对亏损企业财政贷款的基础上保持经济稳定；实行财产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进行价格改革。在思想理论方面，表示“要在发展马克思学说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和列宁方法论的同时，吸收本国和世界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一切财富”。在民族关系方面，支持以民族友好、政治稳定为基础的公民和平与族际和睦的政策。

1994年1月15日，哈萨克斯坦社会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党在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选举和地方权力机关代表选举中的方针。1995年开展选举时，该党不同意当局的选举法而放弃参加，只是在个人参加的按地区进行的选举中取得一个议席。

哈社会党现有党员约3万人，拥有1586个基层组织，党的主席是K·阿尔达姆扎罗夫和P·斯伊克。

（二）吉尔吉斯斯坦的左翼政党——“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

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是原吉尔吉斯共产党的一些党员

倡议于1992年6月20日建立的。同年9月在共和国司法部获准登记，1993年春再次登记，成为合法政党。现有党员约2.5万人，基层组织6000多个，在州、市、区设有党的执行委员会或党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现任主席是A·马萨利耶夫。该党是参政党，在议会拥有3个席位，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在议会和政府担任重要职务，如前中央执委会主席阿曼巴耶夫任政府副总理，主管农业；执委会副主席西迪科夫任立法会议（上院）经济改革和财政问题常设委员会的银行活动、经济改革和投资问题分委员会主席；马萨利耶夫任下院国家制度问题委员会主席；等等。

1991年8月31日，吉最高苏维埃通过停止吉共活动的决议后，同年12月初，吉共的一些党员和“思想一致”志愿者协会会员倡议重建一个社会政党作为原吉共的继承者，并成立了倡议小组和起草党纲、党章的代表委员会。倡议小组曾多次发表致最高苏维埃和社会各界的公开信，要求重新审议和废除停止吉共活动的决议。经过充分准备，于1992年6月20日举行重建党的代表会议，决定建立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批准了党纲和党章草案，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1993年3月13日，吉共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原则上通过了党纲、党章，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阿曼巴耶夫当选为中央执委会主席，随后在4月5日的中央执委会上确定了党纲和党章最后文本。

党纲规定，吉共是志同道合者的自愿政治联盟，它反映所有劳动者的利益，主张公民和睦与民族和谐，并协调发展。吉共的宗旨和原则是社会主义和作为历史未来理想的共产主义、自由、社会平等、集体主义、社会公正、真正的人道主义、为人民服务，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各族人民的兄弟关系，尊重

民族传统，社会主义民主、苏维埃形式的劳动人民政权、广泛的人民自治，人权和公民的责任、言论自由、联合政党和社会主义组织的自由，捍卫宪法规定的苏维埃制度。

在经济方面，吉共主张进行改革，但认为改革必须有利于劳动人民，有利于巩固国家及其主权；主张形成计划—市场、以社会为方向的经济，保证稳定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阻止经济资本主义和强制私有化；必须保存国有经济成分，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必须保证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决定性作用；实行自治的人民企业应成为实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形式，把生产资料交由劳动集体全权经营管理，但不允许土地私有化和买卖，可无偿地交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农民企业和其他企业无限期地占有和使用。

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主张恢复和巩固宪法规定的有保障的劳动、休息和无偿获得住房的权利，免费享受保健、教育和文化的权利，根据劳动贡献获得报酬的权利，保护妇女和儿童等。反对社会思想退化政策，必须恢复对教育、基础科学、文化和艺术实行充分的财政拨款，保护人民文化遗产，排除精神领域的全面商业化和美国化；制止反共主义、鼓吹暴力和其他不道德行为，不允许在社会上提倡新的意识形态垄断。强调共产党人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信仰者，同时尊重每个人信教的权利。

关于党的政治方针，吉共纲领指出，自己作为议会型政党，将在选民中进行宣传解释工作，党将通过自己在代表机关中的共产党员影响国家政治路线的制订和国家机关干部结构的形成。作为国家现政权的建设性反对派，党将在议会内外与其他捍卫劳动者利益、国家利益和荣誉的政党、工会、社会组织、运动和公民个人进行建设性对话与合作，在宪法和法律的

范围内为取得政权而斗争。

对外政策方面，吉共主张本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平等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坚决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主张恢复与独联体各国中断的联系，过渡到在平等基础上的长期条约关系，以便共同努力摆脱深刻的危机，主张保存各独立苏维埃国家未来强大联盟的基础。吉共坚决反对外国资本的生意人掠夺吉尔吉斯人民的财富，把共和国变成外国的原料附属地；主张对重要的战略物资和原料资源实行国家垄断。党际关系方面，吉共主张与其他国家的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政党保持政治联系与合作。

关于吉共的组织原则，该党章程规定，党在民主集中制和思想一致的原则基础上开展活动。少数党员有陈述自己观点的权利，党组织在作出决定时应考虑少数人的观点，但组织作出决定后，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下级组织必须执行上级组织的决定。党员在党内讨论过程中可以根据纲领联合起来，但不允许在党内建立派别。

（三）塔吉克斯坦的左翼政党——塔吉克斯坦共产党

塔吉克斯坦共产党现为国内最大的政党，有党员7万。

塔吉克斯坦共产党，在苏联“8·19事件”后经历了改名又复名的曲折过程。1991年苏联“8·19事件”后，塔吉克斯坦共产党于同年8月28日举行了非例行的中央全会，宣布该党脱离苏共完全独立，接着，于9月21日又召开第二十二次非常代表大会“第一阶段会议”，决定把塔吉克斯坦共产党改名为“塔吉克斯坦社会党”。大会发表的声明说，社会党是塔吉克斯坦独立的共产党的继承者，继承塔共活动中最进步的原则和方针，“为了全人类的价值，放弃阶级对抗，将努力通过自己在合法权力机构中的代表，执行有利于塔吉克斯坦全体人

民的政治方针”。大会选出了以前塔共中央书记沙布多洛夫为主席的组委会。

尽管如此，但当时由于国内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共集会，仍然攻击改名的“社会党”实质上仍是“共产党”，要求“解散共产党”和彻底改组以塔共党员为主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经过紧张激烈的反复较量，共产党人战胜了反共势力，取消了当局的“禁共令”，并在同年11月24日举行的共和国总统选举中，使原塔共领导人纳比耶夫当选为总统。

1992年1月18—19日，塔共召开第二十二次非常代表大会“第二阶段会议”，大会以压倒多数票作出决定：取消第一阶段会议关于党更名的决定，恢复党的原名“塔吉克斯坦共产党”。

经过这番曲折斗争的塔吉克斯坦共产党，宣称坚持社会主义选择和共产主义理想，忠实于马列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价值。上述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和党章，选举了党的中央委员会，沙布多洛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党章规定，塔共是志同道合者的联盟，党坚持社会主义选择和共产主义理想，忠实于马列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价值。它是拥护社会主义思想的共和国公民在自愿基础上联合起来的独立的政治组织，是民主改革、社会公正、民族和睦、经济、政治和精神上自由的政党。党代表并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党的宗旨是：促进塔吉克斯坦所有健康力量的联合，使国家摆脱经济、政治、社会和宗教的危机，向市场经济过渡，改善人民福利，保证人的权利和自由，建立人道社会和法制国家，党将在国家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反对用暴力强制改变国家制度，维护国家宪法和通过议会方式产生的劳动人民的政权。党将“通过民主原则协助共

国实行彻底的经济改革，但反对经济全面资本主义化和任意损害劳动人民的社会成果”。党在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在政治方面，坚持民主政治原则，巩固国家主权，保卫领土完整和边界不可侵犯，促进法制国家的建设，深化民主进程，参与实施民族和公民和睦的政策；支持与独联体国家以及与国际社会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平等互利的关系。在经济方面，遵循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支持不损害劳动人民利益的经济改革，制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方针，以摆脱危机；“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促进多种经济成分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并在考虑现有条件、传统特点和人民生活方式的情况下，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防止两极分化；支持建立自由经济区、自由贸易区和独联体国家的经济联盟，使塔吉克斯坦的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民族关系方面，在拉平各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的基础上，克服地区主义，团结全体人民，发展本国经济和文化，形成真正的民族自我意识；从社会生活中根除任何形式的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民族歧视和种族危害。对外关系方面，主张在独联体内实行平等、居民和睦和利益均衡的政策，支持主权国家互不干涉内政，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主张和平解决争端，认真履行条约义务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塔共党员在1994年12月4日，即塔共建党70周年纪念日，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沙布多洛夫主席在庆祝大会上作了题为《共产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存在，人民跟着共产党》的长篇讲话。他指出，塔共“仍像过去一样忠于自己的理想，坚信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未来”，“依然忠于马列主义和共和国劳动人民的利益”。在说到苏共挫败和苏联崩溃的原因时，他说“在某一时期，苏共领导和党的机关开始脱离群众，使党

的活动陷入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党的机关中的保守分子变成了官僚主义上流社会，某些领袖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因而造成了苏共的挫败。苏共的挫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给苏联人民，包括塔吉克斯坦人民带来了种种灾难。沙布多洛夫表示坚信，社会主义一定会复兴，但塔共要复兴的不是“以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手段为本质的国家社会主义”，而是“关心人民福利、个性全面发展、保证真正的权利与自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强调“我们只有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只有一种能保卫劳动人民的政权，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只有一种政治力量能制定出建设新社会的科学体系，这就是共产党，人民将跟着共产党”。塔共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是全球性的、历史性的，复兴社会主义是完全可能的。但社会主义的复兴不仅需要各国共产党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国际支持，需要各国共产党的共同努力。任何一个共产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独地解决复兴社会主义的任务，而需要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现阶段最重要的是消除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矛盾和导致它们挫败的消极因素。

塔共自称是议会型政党，主张在选举中争取议席，并通过在议会中的代表开展工作，实行自己的政策主张。在1995年春举行的共和国议会大选中，该党获得20多个议席，在其后组建的政府中有5位副总理是塔共党员，大多数部的部长也是塔共党员。但1997年6月，塔政府与反对派达成停战协议，成立民族和解委员会后，议会即中止活动。塔共代表与政府代表为一方参加民族和解委员会。

（四）土库曼斯坦的左翼政党——土库曼斯坦民主党

土库曼斯坦民主党是由原土库曼斯坦共产党更名易帜而来

的，现为国内最大的政党。有党员 27 万人，在全国 5 个州都设有州委，另有 11 个市党委，46 个区党委，共 3000 多个基层组织。该党在国民议会占 82% 的议席，而在由 60 人组成的人民委员会中占 56 名。

1991 年 11 月 19 日土库曼斯坦共产党举行中央全会，讨论当前的形势，全会建议将党改为民主党，并得到于同年 12 月 16 日召开的土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批准。这次大会还通过了土库曼斯坦民主党的纲领和章程，选举了由 108 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会后在全国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当时登记的共 5.3 万人（未登记的原土共党员约有 5 万人）。

土库曼斯坦民主党的纲领和章程规定，它是议会型的独立的政治组织，是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所有劳动人民利益的政治力量。党的基本原则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实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改革，使社会政治、经济和精神生活进一步民主化。党的奋斗目标是，巩固土库曼斯坦的独立和主权，建立民主的法制社会，确立社会公正的原则。党的主要任务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确立土库曼斯坦法律的最高地位，支持土库曼斯坦人民合法选举的总统和政权机关的代表，在总统面前和议会中坚持自己的纲领性目标；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捍卫思想和信仰自由；全面发展土库曼斯坦人民的历史、民族和文化传统，确立和保护全人类价值。在经济方面，支持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为在国民经济一些部门实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为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发展创造条件，主张扩大对外经济联系，在互利的条件下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强调土库曼斯坦民主党在国家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同时愿与所有这样的社会团体、政治组织和运动进行合作。宣称彻底抛弃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强加给党的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空洞概

念，对共产党的过去不加追究。

该党自称是“执政党”、“总统党”，提出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的政策就是“土库曼斯坦民主党的政策”，“学习和掌握土库曼斯坦国家元首的思想和理论是党的一项主要任务”，因此该党政治上基本从属于总统，是现总统依靠的一支政治力量。

土库曼斯坦民主党主席尼亚佐夫是共和国现任总统，1940年生，1962年加入苏共。1985年任土库曼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同年12月任土共中央第一书记，1990年1月兼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改任总统。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后成为当然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8·19事件”后在反共浪潮的冲击下，尼亚佐夫曾宣布停止土共活动，但未实行明显的反共政策，而把土共改名为土民主党，并被选为该党主席。尼亚佐夫在国内推行改革路线，主张国家平稳地向市场经济过渡，并注重劳动者的社会保护。尼亚佐夫赞成多党政治，针对国内只有一党（民主党）的情况，他帮助成立了农民党。在对待苏共历史问题上，尼亚佐夫认为：“十月革命为土库曼人民提供了成立自己国家的可能性，我们的父辈为此献出了生命。尽管行政命令制度在政策中制造了扭曲，但我们不应为自己的过去感到羞愧。”据土方人士反映，尼思想开明，在国内享有较高威望。

（五）乌兹别克斯坦的左翼政党——乌兹别克斯坦人民民主党和乌兹别克斯坦（公正）社会民主党

1. 乌兹别克斯坦人民民主党

它是由原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改建的。1990年5月乌共曾宣布独立，奉行自己的政策，但名义上仍留在苏共内。1992年11月1日，乌共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改名为乌兹别克斯坦

人民民主党，并通过了新的纲领和章程，选举卡里莫夫为党的主席，拉苏洛夫为中央第一书记。

乌人民民主党的纲领和章程规定，它是从事建设性政治活动的政党，而活动的目的是在物质和精神上实现劳动人民和每个家庭的幸福，为他们的宪法权利和自由提供可靠的均等机会。在政治上，争取建立能够保证人们自由选择政治、经济和社会存在方式的国家制度，使乌兹别克斯坦成为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并尊重各族人民的传统、风俗、宗教、语言和文化的社会；要推动建立三权分立的法制国家，促使国家政策始终遵循维护国内和平与民族团结的方针，加强人民政权和发展人民参与国家管理的形式。在经济方面，支持在考虑本国社会发展特点与传统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向市场关系过渡，各种所有制形式平等但国家所有制在工业、航空、铁路交通和通讯领域中占主导地位。在思想文化领域，坚决摒弃“数十年来凌驾于社会和人民之上的意识形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创造有利条件，使本民族和全世界的文化成就成为每个家庭和每个人的财富，使创作知识分子的精神潜能得到发挥，为每一个人的精神追求开辟广阔天地，激励人们努力实现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自由而又自觉地选择生活方向。

该党章程规定，党以自愿原则为基础，凡承认党的纲领，执行党的章程并提供物质帮助的共和国公民，均可通过个别申请的方式加入人民民主党。党员可以是无神论者，也可是宗教信仰徒，但不得加入其他政党。党的组织实行自治，统一执行集体制定的政策；党的各级机关自下而上选举产生，在工作中实行公开性、开放性和集体性；自由表达意见，比较各种观点，并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党组织以多数做的决定所有党员必须执行，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有权在党的领导层、执行机关或通

过舆论工具坚持自己的意见。

关于党的活动方针，党纲规定人民民主党在国家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政党不得直接攫取国家政权，排除暴力；主张同其他社会政治力量自由竞争，党以制订并向社会推荐纲领的方式获得政治领导地位，以议会工作为主要形式实现党的纲领性目标和改革政策，同时开展群众性的宣传解释工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经济和民主改革方针提供社会政治基础，并促进其实施。在对外关系上，乌人民民主党主张进一步发展同外国政党、运动和 international 组织，特别是同加入了社会党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联系。

乌人民民主党目前是乌国内实力最强、政治影响最大的政党，拥有党员约40万人，在州、市、区均设有党的委员会，基层组织共有13370个。在1994年12月选举议会中该党获得69个议席（占28%）和一个副议长职位。卡里莫夫总统已于1996年6月辞去该党主席职务，现在党的主要领导人是乌科学院哲学和历史研究所所长、哲学博士阿·拉拉洛夫。

2. 乌兹别克斯坦（公正）社会民主党

乌兹别克斯坦（公正）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995年2月18日。来自全国各地的185名代表出席成立大会。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安·朱拉巴耶夫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该党是议会型政党，奋斗目标是巩固乌国家的独立，忠实为祖国服务，促进建立符合乌兹别克斯坦各族人民利益的法制国家，加强社会公正，保障人权，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大会批准了党的纲领和章程，选举了由51人组成的领导机关——政治委员会及其由5人组成的书记处，安·朱拉巴耶夫当选为第一书记。该党成立当天即在乌司法部获准登记。

据说乌（公正）社会民主党是为配合乌多党政治、由各级

政权代表机关组建的，因此与现政权关系密切，其纲领主张同乌人民民主党相似。现有党员 6000 人，绝大多数是原乌共党员和乌人民民主党党员。该党是在 1994 年议会选举后成立的，在议会有 47 个席位、一个副议长、3 个委员会主席职位。

三、独联体外高加索三国的左翼力量

高加索地区（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 3 个共和国）原执政的共产党被取缔或被禁止活动后，共产党人及其他左翼力量恢复或新建自己的组织较其他地区相对晚一些，而且除个别党以外，目前它们的人数不多（合计不足 10 万人），力量较小，影响有限，有的还未取得合法地位。

（一）亚美尼亚的左翼政党——共产党和民主党

1. 亚美尼亚共产党

亚美尼亚共产党是在 1991 年苏联“8·19 事件”后被解散的情况下，由一部分党员于 1992 年春重新组织起来的，并获准登记为合法政党。现有党员 5 万多人，在议会有 8 个席位，是议会第二大党。

原亚美尼亚共产党曾有 16 万人，但在 1990 年下半年召开的党的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以第一书记萨尔基相为首的一部分代表宣布亚共脱离苏共独立，另一部分代表反对，这样亚美尼亚共产党分裂了。“8·19 事件”以后，保留原名的亚共也被解散。1992 年春，一部分党员又重新组织起来恢复了党的活动，并在司法部获准登记。同年 4 月，亚共中央发表《致共和国共产党员和劳动群众的公开信》，宣布亚共已经恢复活动，

并指出恢复活动的亚共是自己70多年道路中优良传统的继承者，党从过去行政命令制度所造成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准备在多党制的条件下，以新的方式发挥自己的作用。亚共在公开信中还阐述了一系列主张：确立包括国家所有制在内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特别是当前要实行社会公正和社会保障政策，制止劳动居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和恶化；纠正私有化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使劳动者免受损害；反对苏联解体。该党认为，亚美尼亚是200多年前就把自己的命运与俄罗斯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各族人民因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不果断而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该党主张大力加强亚美尼亚与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联盟。公开信中还提出党在当前的任务和目标是刻不容缓地承认纳—卡共和国^①，党将始终不渝地为争取和平与政治解决纳—卡问题而斗争。

1993年亚美尼亚共产党提出的供全民讨论选择的宪法草案中，提出不搞私有化，而实行全民的国家所有制，主张实行社会保障。而实现这些主张，只有依靠社会主义，依靠苏维埃政权。

该党的第一书记格·巴达良，1947年生，数学、物理学副博士。1970年5月加入共产党，曾任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市委第一书记，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1995年8

^① 纳—卡共和国是阿塞拜疆共和国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简称纳—卡州）境内的亚美尼亚族人自行宣布成立的。80年代末，苏联境内的民族矛盾和一些共和国之间的领土争端激化。1988年2月，阿塞拜疆的纳—卡州内占居民76%的亚美尼亚族人要求把该州划归亚美尼亚管辖，亚美尼亚议会即做出这一决定。阿塞拜疆坚决反对，为此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时断时续，直至1992年9月在俄罗斯和欧安组织的调停下，两国达成停战协议，但纳—卡州的地位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月当选为共和国会议员。1996年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获得6.2%的选票。

2. 亚美尼亚民主党

亚美尼亚民主党的前身是原亚美尼亚共产党（独立派），1991年9月改为现名。该党宣称自己坚持社会民主主义方向，主张动用政治和宪法手段达到各民族和睦与解决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其成员中约一半是学术界和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1/3是青年人。党的主席是原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萨尔基相。

（二）阿塞拜疆的左翼政党——阿塞拜疆共产党

阿塞拜疆共产党这些年经历了被解散、恢复和成立、获得合法地位又被取缔的曲折过程。

阿塞拜疆共产党1991年9月被共和国当局宣布解散后，于1993年12月14日召开恢复成立大会，宣布恢复和成立阿塞拜疆共产党。该党称，所谓“恢复”是意味着恢复被禁止的阿塞拜疆共产党；所谓“成立”是表明党不再执行前领导人偏离了党的纲领目标和党章规定的政策方针，是“更新了的党”。

大会还宣称，更新了的阿塞拜疆共产党是劳动人民，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所有不剥削他人的诚实的人们的可靠的支柱，是“国际主义者的党”，是各族人民利益的保卫者和代言人。党不允许任何导致社会民族分裂的宣传和行为。大会指出，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主权独立的国家，并强调将严格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采取绝对的政治方法，通过议会道路实现自己的目标。大会通过的党纲中提出党在经济上主张确立国家对价格的控制，加强对退休者的社会保障，恢复原来的福利制度，如医疗、住房等等。

该党曾在阿司法部获准登记，已成为合法政党。但在1995年9月，阿塞拜疆举行议会选举前夕，阿最高法院借故阿塞拜疆共产党纲领中规定其宗旨是“建立革新后的联盟”，称这一宗旨与国家规定的“国家独立”相矛盾，也是共和国“政党法”不允许的，因而再一次遭到取缔。目前阿塞拜疆共产党尚未取得合法地位。

该党恢复时，据称有3000多名党员。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拉马兹·艾哈迈托夫。

（三）格鲁吉亚的左翼政党——三个不大的共产党组织

格鲁吉亚现有共产党、格鲁吉亚统一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盟、格鲁吉亚斯大林共产党等3个共产党组织。这3个政党（联盟）人数和活动都不多，社会影响和作用不大，在1995年11月议会选举中分别获得1.99%、4.62%和2.19%的选票，均未达到5%的要求，未能进入议会。

四、波罗的海三国的左翼力量

波罗的海沿岸3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是原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最早（1990年）宣布独立的，并于1991年9月6日得到原苏联国务委员会的承认。3国原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在党和国家是否脱离苏共和苏联而独立的问题上，发生过尖锐分歧，结果导致有的党分裂成两派，有的更名易帜。苏共被取缔和苏联解体后，各独立派共产党都改名为“劳动民主党”。目前这3国的3个“民主党”的总人数不超过1万人，而原来的共产党在国内则基本销声匿迹了（据俄罗斯报

刊报道，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时，拉脱维亚共产党的代表曾在莫斯科参加纪念活动)。

(一) 立陶宛的左翼政党——劳动民主党

立陶宛劳动民主党的前身是原立陶宛共产党(独立派)。在1989年12月举行的立陶宛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以党的第一书记布拉藻斯卡斯为首的一部分代表主张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而独立，另一部分代表反对，主张执行苏共的纲领，仍作为苏共的一个组成部分。结果党发生分裂，形成“独立派”和“苏共纲领派”。“独立派”于1990年12月召开非例行的代表大会，经过讨论决定把立陶宛共产党(独立派)改名为立陶宛劳动民主党，布拉藻斯卡斯当选为该党主席。当时有党员1万余人。

大会文件宣称，立陶宛劳动民主党是一个主张国家独立和民主的社会政治组织。党主张从宪法上保证政治多元化，反对任何政党在社会上的垄断地位。声称党与所有以国家独立和民主为目标的政党和组织进行合作。

该党在1992年下半年举行的立陶宛议会选举中，获得141席中的77席，取得了执政党的地位，单独组建了政府。接着，在1993年2月15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该党主席布拉藻斯卡斯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与此同时他按规定宣布退党。契·尤尔纳斯继任党的主席。

立陶宛劳动民主党执政后，宣布自己在政治上属左翼政党，经济上属自由派。主张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但在这一过程中应考虑劳动人民的承受能力，尽量减少社会的消极后果，不能损害劳动人民和劳动集体的利益和福利。但该党在1996年10月的新议会选举中，仅获得12个议席，

丧失了执政地位。

（二）拉脱维亚的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的前身是劳动民主党。1990年初，原拉脱维亚共产党发生分裂，一部分人成立拉脱维亚共产党（独立于苏共），1990年12月，在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改名为劳动民主党，1995年10月，在该党非常代表大会上又将劳动民主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并选举尤·波亚尔斯为党的主席。

该党宣称自己是议会型政党，主张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个别阶级和一些社会团体的利益，反对任何一个党派独揽社会大权；主张以宪法保障政治多元化。该党提出的任务是：在自由、独立和法制的拉脱维亚建立以社会公正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在经济上，主张建立统一的波罗的海市场，与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保持密切的文化和政治关系。

（三）爱沙尼亚的左翼政党——劳动民主党

爱沙尼亚劳动民主党是1992年11月28日举行的爱沙尼亚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改名而成立的。该党主张发展国有经济成分，但不反对私营经济的发展，赞成加强职工的社会保障，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外关系上反对把爱沙尼亚置于任何国际组织和欧洲组织的支配之下。据爱报称，该党的纲领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

该党总书记为季特·托姆萨尔，主席为希·艾列尔。

第5章

动荡后的重组

——东欧国家的各类左翼力量

这里所说的“左翼力量”，是“大左翼”，指的是除疯狂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翼“民主派”之外的各种力量。一般包括共产党人、社会党人以及由共产党演变过来的各种后续组织和在“民主派”基础上形成的其他左翼组织。就东欧地区而言，大体包括以下4种情况：

第一，剧变中由原执政的共产党改变名称和性质、加入或未加入社会党国际的各种新社会党或新社会民主党。

第二，原来执政的共产党内不同意改变党的名称和性质，仍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种后继组织。

第三，重新独立活动和重建的老的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

第四，剧变中在“民主派”基础上新成立或与其他政党和组织联合组成的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

在上述各种左翼力量中，社会民主主义力量是主体，而共产主义政党的力量很小，其合法地位也不稳固。至于对各种社会民主主义力量，也要进行具体分析，既不能将其等同于原来的共产党，也不能将其简单地等同于一般社会党。

一、概 述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发生的剧变，首先是由共产党内部的变化开始的。当时各国执政的共产党内，思想混乱，派系林立，斗争激烈。在内外各种因素的推动下，各国执政党相继改变名称和性质，于是组织上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和改组。同时原来与共产党合并了的老社会党也重新独立活动。此外，在“民主派”当中的左翼，后来与右翼分裂形成了一些左翼政党和组织。这样，在东欧地区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左翼政党和组织。

总之，我们这里所说的“左翼力量”，是“大左翼”，指的是除疯狂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右翼“民主派”之外的各种力量。一般包括共产党人、社会党人以及由共产党演变过来的各种后续组织和在“民主派”基础上形成的其他左翼组织。就东欧地区而言，大体包括以下4种情况：

第一，原来东欧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在剧变中已改变名称

和性质、加入或未加入社会党国际的各种新社会党或新社会民主党。它们是：波兰社会民主党、匈牙利社会党、斯洛伐克民主左翼党、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劳动党、保加利亚社会党、阿尔巴尼亚社会党、塞尔维亚社会党、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克罗地亚民主纲领党、马其顿社会民主联盟、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改革党等。

第二，原来执政的共产党内不同意改变党的名称和性质，仍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种名称的政党和组织。这类政党和组织的人数已不多、影响也较小，而且思想理论上也比较混乱。它们是：波兰共产主义者联盟—“无产阶级”、匈牙利工人党、捷克摩拉维亚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等。

第三，重新独立活动和重建的老的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东欧地区上个世纪成立的老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在二战后已与本国的共产党合并，但剧变开始时有的又重新独立活动，后来逐渐发展成独立的政党。它们是：波兰社会党、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捷克社会民主党等。

第四，剧变中在“民主派”基础上新成立或与其他政党和组织联合组成的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它们是：波兰劳动联盟、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保加利亚欧洲左翼党、南斯拉夫左翼党联盟等。

在当前各式各样的左翼力量中，社会民主主义力量是主体，而共产党的力量很小，其合法地位也不稳固。原来东欧地区8个执政的共产党，有党员1300多万，现在虽然仍有几个共产党，但其人数不超过40万人，其中捷克摩拉维亚共产党就占20万人，可见其他共产党力量很小。至于对东欧地区的各种社会民主主义力量，也要进行具体分析，既不能将其等同于原来的共产党，也不能将其等同于一般社会党。因为它们的

多数是在原来共产党的基础上改建的，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而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目标，并且强调要与原来的共产党的错误划清界线，已不同于共产党；但是这些政党和组织，不管是否加入社会党国际，与一般社会党仍有所不同。因为它们是在原共产党的基础上改建的，至少他们有一批干部、有多年治国和管理经济的经验，在这方面它们与右翼民主派相比，不能不占据特殊的优势，因此后来在不少国家相继上台。

下面分四类简要介绍一下各类主要政党的情况。

二、由原执政的共产党改建成的社会党

（一）波兰社会民主党

1990年1月29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的十一大上成立。出席这次大会的1600名代表中有约1400名代表参加了社民党的成立大会，并通过了《纲领宣言》和《党章》，提出了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理想”的目标，主张实行议会民主和多党制。

该党成立时发表的《纲领宣言》提出：摒弃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作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原则，党致力于建立法制和议会民主的国家。党的目标是把波兰建设成为自由、平等、团结一致和社会公正的法制国家，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推进议会民主和多党制，允许在党内建立各种政治性和纲领性论坛。在对内政策上，社民党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反对全面私有化，反对把国家财产出卖给外国资本，反对国家放弃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干预；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对结

构性失业。在对外政策上，主张波兰问题必须由波兰人自己来解决，反对外来干涉；在国际关系中摒弃支配手段和武力，主张裁军和扩大信任，支持建立安全的、友好相处的欧洲共同大厦的构想。主张致力于民主与合理地解决全球问题、民主问题和社会问题。珍惜和发展同社会党国际的关系，并要求参加社会党国际。

在1993年9月19日波兰举行团结工会执政后的第二次议会大选中，社民党同其他左派组织组成的“民主左派联盟”获胜，得票达20.41%，在460名众议员中占171席，占议席总数的37.2%。左派联盟同农民党结成“议会联盟”，两党议席相加，超过议席总数的65%，共同组阁，成立联合政府。大选后，社民党副主席奥莱克西任议长，社民主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任由众、参两院议员组成的“宪法委员会”主席，负责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在政府中，左派联盟有两名副总理，6名部长。

社民党内已明显分成两派，一派以克瓦希涅夫斯基为代表，称为“自由派”，另一派以米莱尔为代表，称为“社会主义派”。“自由派”主张加速私有化，更多地继承团结工会政府的政策；“社会主义派”主张保持社民党的本色，不能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市场经济而要广大劳动者作出巨大牺牲。目前党内“自由派”占优势，因此波兰报刊认为，社民党正在向右转。

在1997年9月26日波兰举行的大选中，社民党为首的民左联败于团结选举运动。社民党主席奥莱克西认为大选结果落后于团结选举运动的主要原因是，地方上有些选举委员会工作疲沓，没有积极宣传左派的纲领来争取选民，有些候选人自己不主动做竞选工作，而是完全被动地听从选举委员会的安排；

不善于宣传左派执政时的成就；电视中充斥着反对左派的宣传；中央选举指挥部主任与政府总理是同一个人，这种做法影响了竞选工作的有效开展。他说：我们不能小看左派受到广大选民的支持，我们也不要认为只有执政才能为国家服务。当右派在议会内占多数的情况下，具有左派纲领的各派力量应该团结起来，我们是遏制国家向右转的唯一力量。

社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直接选举党的主席。最高委员会由150人组成。原主席亚力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于1995年11月当选为波兰总统后，党的主席先是尤则夫·奥莱克西；1997年议会大选后，党的主席是莱塞克·米莱尔。社民党1997年12月6—7日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议题是：1. 讨论吸收左派人士参加社民党问题；2. 扩大左派联盟问题，3. 通过党的新纲领，使波兰社民党更加符合欧洲传统社民党的特点。大会对党的中央执委会主席团工作作出评价，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同时还对地方自治问题发表宣言。会议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主席是米莱尔（兼任民左联议员团主席），总书记是雅尼克，副主席共有5人，第一副主席是皮耶霍塔，其他副主席有谢拉科夫斯卡、博罗夫斯基、什麦津斯基、伊文斯基。米莱尔当选党的主席后，举行了首次记者招待会。他说，党面临的任务是尽快适应充当反对党的角色，“反对党并不意味着什么都反对，如果新的当局进行行政改革，同样可以指望得到社民党的支持”。

（二）匈牙利社会党

1989年10月7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将党改建为匈牙利社会党，并称此次代表大会为社会党代表大会，通过匈牙利社会党《纲领声明》和《党章》。声明称，

该党是接受人类发展的普遍价值、人道主义、自由和民主的，具有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政治组织，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永恒传统的继承者；党的目标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该党主张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和民主的法制国家，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合理的收入分配和人道的社会。该党声称是国际工人运动、欧洲左翼的有机组成部分，希望同致力于改革的中欧、东欧左翼党，同世界各国改革的共产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保持密切的合作。大会选举涅尔什·雷热为社会党主席。

改建后，在1990年春天的大选中，匈牙利社会党仅获33个议席，占总数8.55%，沦为在野党。同年5月社会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第一阶段会议，明确该党是社会民主党性质的党，是承认并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社会党，接受1989年6月社会党国际的原则声明；宣布自己在政治上已不是斯大林式政党的继承者。在对外交往中，强调愿与社会党国际进行最密切的合作，并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大会选举霍恩·久洛为党的主席。11月第二阶段会议通过《纲领声明》。1992年5月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政治声明》，表示坚决不同意现政府的政策，强调没有现代的左翼、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没有社会安定和进步；在现代的民主匈牙利，具有独立自主面目的中左政治力量、社会主义运动是不可缺少的；指出在社会党人的思想和政策上，代表民主的法制国家、政治自由和人的自由权利以及社会利益，是相互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提出一系列经济、社会和外交主张，尤其是社会福利政策。

在1994年5月大选中，社会党以54.15%的得票率获胜，在国会386个议席中独占209席，成为全国第一大党。该党联合自民盟组成联合政府，党主席霍恩任总理。同年10月，该

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强调匈牙利社会党是欧洲的民主左翼政党，是除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外的匈牙利第三种势力。大会选举霍恩连任党的主席。

1996年3月，社会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进行重大人事调整。霍恩再次当选党的主席，原劳动部长科沙妮当选执行副主席，主管党务工作。亚诺什·久尔吉、考托璠·贝拉和议员团主席塞凯莱什当选副主席，鲍姚·费莱茨当选全国委员会主席。主席团成员由19人减至15人。这次大会为1998年的大选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匈牙利社会党强调，在政治上努力实行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党是匈牙利人历史上民族价值、左翼价值的继承和继续者，承认并尊重党员的信仰、世界观、宗教、发表意见和行动的自由。组织建制分党组织、地区联盟和全国性机构，并允许党员组成协会、联合会、俱乐部等。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代表和决策机构，至少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选举党的主席、执行副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委员、全国委员会主席、司库、全国协调委员会主席和中央财务监察委员会。全国委员会是党员的直接代表机构。全国主席团是党的政策形成、执行和领导机构。

1992年9月匈牙利社会党被接纳为社会党国际观察员，1996年成为社会党国际正式成员。该党有4万名党员。党报、党刊为《人民自由报》（日报）、《社会评论》（月刊）。

（三）斯洛伐克民主左翼党

民主左翼党的前身是斯洛伐克共产党，是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地区性组织。1992年2月改为现名。现为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

1939年德国法西斯扶植成立了斯洛伐克国。为便于开展地下斗争，捷共决定在斯洛伐克地区成立斯洛伐克共产党，并建立地下中央，但在政治上仍属捷共领导。1948年9月斯共和捷共实现了组织上的统一。1989年11月捷发生剧变后，斯共中央主席团书记处成员集体辞职，同年12月召开斯共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斯共例行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行动纲领草案，用新的思想统一了党的组织和行动。1990年10月召开代表大会，决定自同年12月起将党名改为“民主左翼党”，并从8月起与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结成联邦委员会。1991年12月民主左翼党召开改名后的首次代表大会，决定退出同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结成的联邦委员会，成为斯洛伐克的独立政党。

党的宗旨是在斯洛伐克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维护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与劳动人民的利益。提倡多元化民主制度，认为多元化民主政治体制是建立现代的、社会公正秩序的基础。强调民主社会主义既要反映社会党国际和周边国家新的思维动态，也要反映斯洛伐克的改革实践，应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民主化”和“广泛的社会公正”两方面的内容。主张实行区域自治，称只有自治才能实现真正的分权。赞成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种所有制成分平等竞争。私有化的作用应是促进所有制“民主化”，使更多的人参加实际管理，而不应成为“财富再分配”。主张斯洛伐克加入欧盟和北约，积极参加欧洲一体化进程。同时亦希望发展与俄罗斯、乌克兰等邻国的关系。目前党对外交往的重点是欧洲各左翼政党。1995年民主左翼党加入欧洲社会党，1996年正式加入社会党国际。

党的最高机构为代表大会，截止1993年8月有党员5万名。现任主席约瑟夫·米加什现年43岁，1996年4月在该党

四大上当选，此前为斯洛伐克驻乌克兰大使。副主席为彼得·维斯、约瑟夫·弗加什和普利吉塔·斯赫莫格内洛娃。

该党是议会中的第二大党，也是最大的左翼政党，在工人和中层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在1994年议会大选中，该党与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农民党结为“共同选择”，获10.41%的选票，在150名民族议会中拥有18个席位。大选后，该党拒绝与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联合组阁，成为在野党。在1996年的四大上强调实行“独立的、具有明显左翼特色的反对派方针”，同以争取民主斯洛伐克为首三党执政联盟既有斗争也有合作。

（四）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劳动党

社会主义劳动党成立于1990年11月，主要由原罗共党员和干部组成。它宣称不是原罗共及其继承者，而是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以及民主运动的继承者和代表，主张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多元化、三权分立和法制国家。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把社会主义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私有成分结合起来。经济上主张实行国家干预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并存和自由竞争，在不损害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前提下广泛发展私有经济。对外坚决主张捍卫罗马尼亚的独立和人民的尊严。认为罗马尼亚加入欧盟是长远目标，但反对加入北约。主张实现中左翼力量的团结。在罗马尼亚社会民主主义党执政时期，该党因与其政策主张有一定区别，采取有条件地支持执政党和政府的态度。

社会主义劳动党在1996年大选中，分别获得参众两院2.15%和2.16%的选票，未能进入议会。目前它同塞尔维亚、乌克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德、法、西、朝、越、古

的社会党或共产党都有交往关系。党主席维尔德茨在原罗共时期任过政府总理，是周总理生前接见的最后一个外国客人。他1992年11月曾率党的代表团访华，与中国党有友好关系。

（五）保加利亚社会党

前身是保加利亚共产党，1990年4月3日改为此名。保社会党党章规定：党是议会党、群众性的党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党，依据现代科学成就、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和传统开展活动；赞同社会党国际的思想和价值观，是世界左翼力量的组成部分；党的目标是在人类共有的、本民族的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公正和人道的社会，代表和捍卫各阶层劳动群众的权益，维护民族利益。该党政治上主张多元化、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原则，反对集权政治，强调在进行政治改革时要坚持左翼选择方向，把保加利亚建成民主、社会和法制国家。在经济上，该党主张各种所有制形式平等竞争，实行民主的社会市场经济，建立国家所有制、合作所有制和私有制的混合型经济，进行能维护广大劳动者利益的经济改革和社会政策改革，不赞同进行过激的经济改革，反对复辟旧的所有制关系和原始资本主义。在对外关系方面，该党积极发展同欧洲各国左翼政党的关系，致力于早日加入社会党国际，同巴尔干邻国的左翼政党比较密切。保社会党一直保持着原保共同我党建立起来的联系，重视同我党继续发展关系，赞赏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希望学习中国经验。该党前主席利洛夫和维德诺夫曾分别来华访问。

保社会党现有党员25万人左右，仍为保国内最大的政党，具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一致原则，不求思想一致，但求行动统一，以一致赞同或多数同意的方式通过决

议。党内允许存在各种派别和思潮，并规定各种派别在党的各级领导机构中要有一定比例的代表。目前党内派别有10余个，其中有一定影响和代表性的是“争取社会民主联合会”和“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前者主张使党完全社会民主化，成员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后者主张党要坚持马列主义，成员主要是原保共的老党员。为避免党内发生分裂，各个派别之间经常作出妥协和让步。社会党的全国领导机构是代表大会和由89人组成的最高委员会，党的日常工作由16人组成的执行局负责。党的组织结构为最高委员会、乡（市）委员会和基层组织3级。根据保各政党不得在机关、厂矿、学校开展活动的《非政治化法》，保社会党的基层组织按居住地原则建立。现任最高委员会和执行局主席是格奥尔基·珀尔瓦诺夫。

保社会党自成立后，一直同右翼势力进行着艰苦的斗争。1990年6月，保社会党以绝对多数赢得了第一次多党制议会——大国民议会选举的胜利，成立了剧变后的首届政府。但由于该政府未能启动改革，造成国内经济崩溃，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再加上右翼势力的压力，此届政府于同年11月被迫辞职，组成以无党派人士为首的联合政府。在1991年10月举行的议会大选中，右翼的民主力量联盟获胜并上台执政，对社会党的限制和迫害也随之加剧。先后通过全部没收社会党财产、在国家机关对社会党员进行清洗、就外国党提供援助等问题立案审讯前保共和社会党领导人等决定，企图将社会党搞垮。社会党则利用议会内外合法手段顶住压力，保持了党的基本稳定，同时积极扩大影响，为再次执政作准备。1994年12月社会党以43.5%的选票赢得议会大选，组成以该党主席维德诺夫为总理的新政府。该政府在社会党党员的强力影响下，在改革方面只作表面文章，企图摆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

护，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偿还外债，引起国家的金融动荡。与此同时，1995年又在农业政策上犯了极大错误，由于不加控制地出口小麦，造成国家的粮食危机，使得1996年春天居民明显地感到面包供应困难。同时，本国货币的贬值变成了真正的财政滑坡，使通货膨胀以3位数计算。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联合反对派候选人彼得·斯托扬诺夫获胜，助长了反对派推翻社会党政府的频频攻势，以民主力量联盟为首的反对派发动游行、示威、罢工，甚至于街头暴动，迫使社会党交出组阁权。1997年2月，社会党在提前议会大选中仅获得22%的选票，以民盟为首的右翼势力上台执政。社会党受到沉重打击，内部矛盾加剧，派系斗争日益激烈。在此危急时刻，该党于1998年5月召开了第四十三次代表大会，各派达成共识，共同维护社会党的统一和稳定，确定了今后作为建设性的反对党的任务和目标，为社会党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和组织上的基础。

（六）阿尔巴尼亚社会党

阿尔巴尼亚社会党是1991年6月在已执政近50年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基础上改建成的党。几年来，阿尔巴尼亚社会党经历了下野又重新上台的曲折过程。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1990年12月11日召开的九届十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多党制。次日阿尔巴尼亚民主党等20多个反对党和组织应运而生。在1991年3月31日阿尔巴尼亚进行第一次议会自由选举中，劳动党获票最多（占67.2%，在议会中获168个席位），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利雅当选为阿尔巴尼亚首任总统。但是反对党拒不参政，继续制造动乱，结果1991年6月4日，执政仅22天的劳动党政府被迫辞职。6月

11日，阿尔巴尼亚第一届多党联合政府组成，从而结束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党执政47年的历史。

在此背景下，劳动党于1991年6月10—13日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改名为阿尔巴尼亚社会党，并通过了新的党纲和党章。大会认为劳动党的历史作用和活动已经结束，宣告社会党同过去决裂，同劳动党的错误路线划清界线，以便作为一支健康的政治力量向欧洲左翼政党转化。为此，大会对劳动党执政40多年来的历史进行了公开的检讨和批判，彻底改组了党的领导机构，决定将九大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几乎全部开除出党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大会选出了由81人组成的社会党领导委员会和由15名成员组成的主席团。法托斯·纳诺当选党的主席。

劳动党改建为社会党之后，在1992年3月举行的议会大选中，大为失利，在140个席位的议会中，只占有38个席位，而民主党获得92个席位，社会党沦为在野党。

社会党在下台后的几年间，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

1992年6月20—21日，社会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阐明自己的纲领主张。大会强调，社会党是“新党”，它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指导，属于欧洲左翼，同社会党国际成员党有同样的意识形态，社会党不要马列主义，同专制的社会主义和前共产党毫无联系；社会党主张进行慎重的经济改革，尽量减少社会痛苦，要维持政治、社会均衡；改革不能盲目照搬别国的模式，要考虑阿本国条件和特点；市场经济是使国家摆脱危机和走向繁荣的战略目标，但市场经济应以所有制多元化为基础，要发挥个体和国营两个积极性，不能排斥国家的调节和指导作用。在对外政策方面，社会党主张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强调阿的外交政策不应片面、不应受地理位置的限制，不仅要同巴

尔干国家、欧洲、美国保持友好关系，而且也要同加拿大、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发展关系。大会选举产生了由 15 人组成的中央领导委员会主席团。法·纳诺连任党的主席。格拉莫兹·鲁齐当选为总书记。但是次年，即 1993 年 7 月 27 日，阿议会撤消了社会党主席纳诺的议员豁免权。事隔 3 日，纳诺被当局以 1991 年任总理期间在意大利援阿物资问题上“滥用职权”和“伪造文件”罪名逮捕。

在新形势下，社会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研究对策。二大的第一阶段会议于 1996 年 3 月 23—24 日举行。大会听取了副主席帕隆比作的《社会党随时准备在国家生活中发挥新作用》的政治报告，宣读了党的主席纳诺（在监狱中）致大会的贺信《我们必胜》。大会讨论并通过了竞选纲领、议员候选人名单、致全国选民的公开信和《保护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决议。社会党的竞选纲领的要点是：（1）重申社会党是一个新型政党，与霍查的劳动党毫不相干，社会党对阿的过去不负责任；（2）主张建立自由、公正和民主的社会，保护人权，把阿建成西方式的民主和法制国家；（3）实行市场经济，确保占阿人口多数的中、下层人的利益，高速、稳步发展经济，优先发展农业，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等；（4）广开就业门路，将在执政的四年中解决阿目前 20 多万人的就业问题；（5）反对民主党当局制造社会、政治紧张，呼吁中、左派政党同社会党合作，组建竞选和执政联盟，共同争取在新的议会中占 2/3 以上的席位，随后组建联合政府，以改变目前民主党控制议会、独家掌权的局面；（6）加速同欧洲的一体化，争取尽快加入北约，进一步发展同美国的关系，不断发展同希腊、意大利等国的睦邻关系，加强同德国、法国、英国等欧盟重要成员国的伙伴关系，在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加拿大、

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关系。

二大的第二阶段会议于1996年8月24—25日举行。大会修改了党纲、党章，通过了要求释放纳诺和不承认新议会的决议，选举了党的机构。大会再次强调，社会党是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特点和观点的左派政党，彻底同过去决裂，取消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放弃国家社会主义，主张加强同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合作，尽快加入社会党国际。大会重申，谴责民主党在选举中施暴和舞弊，坚持不承认新议会和新政府。要求当局修改地方选举法。大会还要求制定新宪法，举行各党对话，尽快重新进行议会选举。大会提出社会党必须在思想、观念、组织、工作方面不断进行革新，目的在于迎接挑战和夺取政权。主张在党内解放思想，增加透明度，开展辩论，自由发表意见，重大问题通过民主讨论决定，以避免片面性和官僚主义。大会精简了领导班子，取消了原4位副主席的建制，保留了总书记职位。大会坚持了团结，没有分裂。选出61人组成的全国领导委员会。纳诺当选党的主席。党的副主席帕隆比因同纳诺意见分歧，主动辞职。

在这一时期，阿又举行了第三次议会选举（1996年5月）。民主党在选举中舞弊，引起所有反对党的不满，在投票结束前4小时，社会党、社民党等7个政党宣布退出大选。选举结果，民主党获胜，在140个议席中占122席，社会党占10席，共和党、人权党和国民阵线党共占8席。社会党、社民党等左、中派政党拒不承认选举结果，要求在国际社会监督下重新进行选举。1996年10月，阿举行了地方选举，通过两轮投票产生了新一届乡、市和区级政权。按照新的行政区划，阿全国共有310个乡、64个市、37个区（含地拉那）。选举结果表明，民主党赢得267个乡长、58个市长职位。社会党居

第二位。

在1997年6月29日阿尔巴尼亚举行的第四次议会选举中，民主党遭到惨败，由社会党、社民党和民主联盟党组成的中左翼联盟获胜。在第一轮投票中左翼联盟获得了议会155个席位中的98个，其中社会党独得80多个。虽然社会党获议会绝大多数席位，但不单独组阁，而同社民党、民主联盟党、人权党、农民党等组成联合政府。在内阁成员中非社会党人占1/3以上。社会党主席纳诺任总理。社会党总书记迈尼达当选阿尔巴尼亚新总统。

附：法托斯·纳诺简介

法托斯·纳诺，阿尔巴尼亚社会党主席。1952年9月16日生于地拉那一个干部家庭。1975年毕业于地拉那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专业。1982年获科学院士称号。1989年获高级研究员称号。1975—1978年任爱尔巴桑钢铁厂经济师。1981—1983年任地拉那普里什格地区经济师。1983—1990年任研究员。曾在阿劳动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经济部工作。1991年1月任部长会议秘书长并被增补为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同年2月任部长会议副主席，主管国家经济改革和规划方面的工作。同年4月任部长会议主席，6月辞职。1991年6月12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改名为社会党，当选为社会党领导委员会主席。1992年6月在社会党一大上继续当选为该党主席。在1991年3月和1992年3月议会大选中均当选为议员。1993年7月27日，被取消议员豁免权。7月30日以在任总理期间滥用职权、伪造官方文件，使意大利援阿物资遭受重大损失罪由被当局逮捕。1997年3月出狱。1997年7月任总理。通晓英、法、意、俄、塞等5种语言。

(七) 塞尔维亚社会党

它是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及其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主要执政党。1990年南联盟实行多党制、南共联盟解体后，由原塞尔维亚共盟和塞尔维亚社盟合并而成。1990年7月16日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成立。

塞社会党成立后，在南斯拉夫联盟和塞尔维亚共和国的历次多党选举中均获胜而始终保持着执政党地位。目前，在南联盟议会公民院138个席位中，以塞社会党为首的塞左翼政党同盟占64席，与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占20席）联合执政。在塞尔维亚共和国议会250个席位中，塞社会党占123席，与新民主党联合执政。

塞社会党的纲领和目标称，该党是现代化的、民主的左翼政党，它代表人民、代表知识分子、农民以及所有依靠自己劳动而生活的人们的根本利益。党的基本目标是：发展民主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的民主社会主义，保障人权（包括政治和社会、经济权利），保障各种所有制形式一律平等，实行市场经济，建立现代化的民主的法治国家。党的最高目标是为全体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繁荣而斗争。党的基本价值观是自由、社会公正、创造性、团结与和平。党的政策是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多党议会制和三权分立。

关于党的思想基础，塞尔维亚社会党表示维护并继承塞尔维亚人民的人民自治思想和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对社会公正思想所作的贡献。塞尔维亚社会党认为，代议制民主是现代文明必不可缺的成果。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条件保证了更加广泛和发达的民主。只有在没有一党垄断的社会中，伟大的解放者的自治思想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塞尔维亚社会党主张建

立法制国家。独立的司法权是法制国家的重要标志。完全有效的决议只能在法律的基础上产生。公民必须严格遵守法令。同时，公民享有出版、公开集会和言论的自由，可以自由地组成政党、运动、联盟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政治组织。塞尔维亚社会党主张在立法工作中坚决实现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其他条约规定的所有人权。关于国家体制，主张建立现代联邦体制，这样的国家体制比中央集权体制和邦联制都更优越。在民族关系方面，主张各民族平等。在经济方面，主张实行市场经济，建立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在法律面前都应平等，反对对社会所有制财产进行完全的和无条件的私有化，这样的私有化是全面的侵吞和盗窃行为。按劳分配不仅仅是社会法则，而且是增加生产的重要条件。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允许存在长期失业、流离失所、长期忍饥挨饿、缺乏任何医疗保护等。塞社会党在国际上奉行和平、睦邻政策，致力于同前南斯拉夫各国恢复正常外交关系。重视加强与周边国家和欧洲及世界其他各国的合作。反对大国干预巴尔干事务，主张巴尔干国家联合与合作，把巴尔干建成和平合作区。

塞社会党成立7年来，一直是南斯拉夫最强大的政党。在1990年12月前南斯拉夫联邦塞尔维亚共和国多党选举中，塞社会党获塞议会250个议席中的194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单独组阁执政。前南斯拉夫解体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于1992年4月成立。1992年12月南联举行建国后第一次大选，塞社会党在南联盟议会和塞尔维亚共和国议会均为第一大党，与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其前身为黑山共盟）联合控制南联盟议会。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塞社会党得到塞激进党的支持，继续组阁执政。1993年12月塞尔维亚共和国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塞社会党获胜，在塞议会250个议席中获得123席，比

1992年选举(101席)增加22席。塞社会党得到新民主党的支持,成立联合政府。在塞政府成员中,政府总理和3名副总理及18名部长均为塞社会党党员。1994年9月,南联盟政府改组,其成员完全由塞社会党人和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人组成。1996年11月3日,南斯拉夫举行了联盟议会公民院的选举。以塞尔维亚社会党为主的塞左翼政党同盟在公民院138个席位中获64席,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获20席。执政党以压倒多数获胜,执政地位大大加强。

附:塞尔维亚社会党主要领导人简介

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党的主席。1941年8月20日生于塞尔维亚的波扎雷瓦茨,塞尔维亚族。父亲是神学教授。毕业于贝尔格莱德大学法律系。1959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曾任贝尔格莱德大学共盟思想委员会主席、贝尔格莱德银行行长、共盟贝尔格莱德市委委员、市委主席和塞尔维亚共盟中央主席团委员。1989年5月当选为塞尔维亚共和国主席团主席。1990年7月16日塞尔维亚社会党成立,米洛舍维奇当选为该党主席。1990年12月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多党选举中,当选为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根据当时宪法要求,米洛舍维奇辞去了塞社会党主席职务。1992年12月塞尔维亚提前举行大选,米洛舍维奇再次当选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米洛舍维奇于1992年10月举行的塞社会党二大和于1996年11月举行的塞社会党三大上连续当选塞社会党主席。1997年7月15日米洛舍维奇当选南联盟总统。

佐兰·利利奇 党的副主席。1953年生于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族。毕业于贝尔格莱德大学技术学院。曾任雷科尔德橡胶厂厂长。1991年当选为塞尔维亚议会议员,并任塞社会党议

员团团长。1993年1月起任塞议会主席。同年6月任南联盟总统。

杜什科·马特科维奇 党的副主席。1953年生于斯格特莱沃，塞尔维亚族。经济学系毕业。斯梅特莱沃一公司的总经理。议员。

戈丽察·加耶维奇 党的总书记。女，1958年生于塞尔维亚的瓦列沃，塞尔维亚族，《特殊条件下不动产转让法》监督委员会主席，法律委员会副主席，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董事会成员，毕业于贝尔格莱德大学法律学院，曾任拉什卡区法院法官，1989—1990年任塞共盟拉什卡区委主席，1990—1992年任塞社会党拉什卡区执委会主席，1992—1993年任南议会公民院议员，后历任塞社会党最高委员会国家宪法体制和法律制度理事会、卫生理事会、妇女儿童社会地位理事会和信访委员会成员。1993年起任塞尔维亚社会党总书记、塞议会议员和塞社会党议员团主席。会讲俄语、英语和法语。

（八）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

原名黑山共产主义者联盟，是南斯拉夫联盟及其黑山共和国的执政党。1991年6月改为现名。是黑山第一大党。成员以黑山族为主。1990年、1992年和1996年在黑山共和国议会选举中连续获胜而执政。在1996年11月南斯拉夫联盟议会大会中，与塞社会党为首的塞左翼政党同盟联合执政。但由于党内矛盾激烈，该党目前已经分裂。

在1991年6月22日黑山共产主义者联盟十一大上，正式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社会主义者民主党”。党主席布拉托维奇在会上的报告中说，更改党的名称“一直是个最敏感的问题，现在是作出这种决定的恰当时机”。他说，“更改名称本身

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对当前和将来的情况及时作出有效的和明智的回答，是用新的名称来更客观地表达已经完成的党的改革和更精确地规定党的目标。”他说，“人道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政党和运动的理想、价值和目标，是永远都不会被抛弃的。”大会发表的《关于更改党名——党的新名称的宣言》说，黑山共盟决定改名为社会主义者民主党是“因为对大部分党员来说，民主和社会主义是重要的价值观念，因此，要强调我们党是具有社会主义信念的人们的民主的政党。这在政治上是完全合适的，在概念上是清楚的，其处境是众所周知的”。

党的纲领称，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是一个通过民主途径，为实现人道的社会主义思想而斗争的政党。它是由原来的社会政治组织（黑山共产主义者联盟）经过彻底的内部改造而成，它彻底摒弃了过去的失误，并在纲领和组织上都按照现代欧洲左翼的民主传统和精神进行了现代化。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是为确认黑山全体公民的自由和尊严而斗争的党，是黑山人民的党。它的基础是依靠劳动、知识和经营企业而生存的全体公民和劳动人民。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团结一切接受其政治纲领和民主社会主义目标和原则的男女公民包括城乡居民、知识分子和工人，它的大门向全体公民开放，而不管其民族、性别、哲学信仰和宗教信仰如何。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实行入党和退党完全自由，退党时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党员和党的同情者享有党章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在经济方面，主张实行市场经济，实行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各种形式的所有制进行平等竞争，为维护自己在市场上占有的地位而斗争。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自由支配的资金。应该实现和保证对资本的管理，按照劳动和管理的贡献以及资本的所有权来分配劳动的成果。在对外政策方面，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主张加入欧洲的经济

和社会进程，在民主的、联合的欧洲范围内发展本共和国。

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是黑山的第一大党，该党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1990年、1992年和1996年在黑山共和国议会选举中连续获胜执政。在黑山共和国议会的125个席位中，该党占83席。在南斯拉夫联盟议会的138个席位中，该党占20席。社会主义者民主党现有党员6万人，比原黑山共盟减少2万多。1997年7月12日，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中，以久卡诺维奇为首的一派单方面召开最高委员会会议，解除了布拉托维奇的主席职务，选举佩亚诺维奇（女）为该党主席。原最高委员会99名委员中的62名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由此，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分裂。

（九）克罗地亚民主纲领党

原名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在1990年5月多党选举中丢权。1990年11月改为现名。

在东欧剧变的影响下，原克罗地亚共盟内以伊·拉昌为首的所谓“改革派”提出“东欧的神圣的先锋队像纸塔一样垮了”，如果继续“坚持布尔什维克模式”，只能“导致共盟政治上的死亡”。这些观点遭到以斯·安德里耶维奇为首的所谓“教条主义派”的反对。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1989年12月13日克罗地亚共盟十一大上，“改革派”与“教条主义派”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了交锋：（1）关于党的性质：“教条主义派”认为应该保留共盟的布尔什维克模式，即保留其革命的性质，但要增加一些民主化。如果修改党章中规定的革命性质，就是消灭共盟；“改革派”认为共盟应该是现代民主化政党，共盟的民主化是保证它得以在政治舞台上继续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导致共盟在政治上死亡的不是它的民主化，而是坚持经典

的布尔什维克先锋队的模式。(2)关于党的作用：“教条主义派”主张坚持共盟的领导作用，在共盟范围内实行政治、思想多元化；“改革派”则要求取消共盟的领导作用，主张实行多党制。(3)关于党内生活原则：“教条主义派”主张继续坚持民主集中制；“改革派”认为民主集中制不合时代要求，主张实行民主的统一，认为民主的统一是所有民主党的党内生活原则。

斗争的结果，“改革派”获胜，大会通过了《共盟改革的基本方针》的文件，要求取消南共联盟的领导作用，取消民主集中制，代之以“民主统一制”；在克罗地亚实行多党制并进行“自由选举”。大会选举伊·拉昌为克罗地亚共盟中央主席。

1990年2月10日，克罗地亚共盟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克罗地亚共盟民主改革党”，并提出了克罗地亚共盟参加多党选举的竞选纲领，供各基层组织讨论通过。竞选纲领的主要内容有：“克罗地亚共盟是左翼政党，党的纲领的基础是现代社会文化财富，是社会主义的总的理论以及欧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克罗地亚共盟不再是建立在教条的基础上的政治组织，党的纲领也不再以意识形态的排他主义为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已不再是党的唯一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依据。”会议决定了克罗地亚共盟继续进行改革的方针，并立即进行组织上的改革，使专业机构合理化，并决定减少党费30%。1990年5月，克罗地亚共盟在多党选举中失败，成为议会中的反对党。

1990年11月5日，克罗地亚共盟举行十二大，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再次改为“民主纲领党”，并把代表大会改为民主纲领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通过了4项宣言：(1)《政治宣言》，批评克罗地亚现政权限制民主的政治状况；(2)《历史

宣言》，强调继承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的遗产；（3）《民族间关系宣言》，指出只有通过共和国间的协商才能解决现在的国家危机；（4）《关于左翼力量合作的宣言》，声明这种合作应建立在尊重相互间的差别的基础上，通过民主对话进行。

经改建后的克罗地亚民主纲领党宣布，民主纲领党是“新的现代化的欧洲左翼党”，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方针，接受议会制民主。党要在克罗地亚进行政治、文化上的深刻改造，实现社会公正、平等、团结。

民主纲领党的政治纲领称，克民主纲领党不再具有克共盟原有的古典的革命性质和合法的执政党地位。克民主纲领党人不是战斗的革命者，而是政治改革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们不是单纯的“马克思主义者”，任何意识形态上的排他性都与党格格不入。作为民主主义者，克罗地亚民主纲领党人主张建立自由和民主的社会，而作为社会主义者，克罗地亚民主纲领党人主张社会公正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支援。民主纲领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欧洲文明遗产中许多重要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之一。

克民主纲领党认为，南共盟和克罗地亚共盟有功绩，但也犯过根本性错误。南共联盟和克罗地亚共盟的最主要功绩是，在军事、政治、意识形态和文明方面反对了20世纪两个最强大的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对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和政策进行了改革，建立了在整个社会主义的东欧最自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从而使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不同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南共联盟与克罗地亚共盟的最根本性错误是，建立了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政治制度没有建立在用完善的法律保护人权和人的自由的基础上。每当政权感觉到来自内部的威胁时，总是发动政治和意识形态运动，这些运动不仅仅

针对个人，而且针对整个社会集团和民族集体。这样的运动有：40年代和50年代的强制性国有化和反农民的集体化；60年代的反改革运动；70年代的反民族的清算；70年代和80年代的反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革和对文化和精神生活的专政。

民主纲领党现有党员4.6万人，在议会的356席中占73席。

（十）马其顿社会民主联盟

原名马其顿共产主义联盟，在1990年11月多党选举中丢权。1990年5月改名为马其顿民主改造党，1995年改成现名，并成为联合执政党之一。

1989年11月26日，马其顿共盟举行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纲领性文件”《马其顿共盟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实现更富裕的生活而斗争》。文件主张实行“政治多元化”，“公民有进行政治联合的自由和权利”，认为，“这是对国家和政权进行民主监督的保障”。1990年2月25日，马其顿共盟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认为“南共联盟十四大的失败标志着‘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结束”，主张以“民主统一制代替民主集中制”。会议说，“马其顿共盟已经成为社会民主党，与此相应，应该改变党的名称，而那些不同意这个纲领的人们，则应该离开这个组织”。

1990年4月8日，马其顿共盟中央委员会再次举行会议，不顾两名中央委员（代表两个区共盟）的坚决反对，强行作出决定，抵制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为南共联盟十四大复会所作出的努力。认为南共联盟“十四大”中断后，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已没有合法性，因而要求包括马其顿代表在内的全体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辞职。此外，会议还决定把马其顿党组织的

名称改为“马其顿共盟—民主改造党”。1990年5月3日，马其顿共盟—民主改造党举行代表大会，宣布党的名称是“马其顿民主改造党”。会议通过了党的纲领。纲领说，马其顿民主改造党属于欧洲左翼，它将继承马其顿和南斯拉夫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民主传统。党的纲领奠基于欧洲民主传统成果、马其顿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其顿共产党、马其顿共盟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在革命中取得的胜利和建立马其顿国方面建立的功绩。党的目标是促进马其顿和南斯拉夫更迅速地发展，把马其顿彻底改造成民主和发达的欧洲国家。党致力于建设一个自由、公正和互相支援的社会，使马其顿的公民生活得更好。

（十一）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改革党

原名斯洛文尼亚共产主义联盟，在1990年4月选举中丢权。1990年10月改为现名。

1989年，斯洛文尼亚共盟率先放弃共盟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主张实行多党选举，并要求共盟实行决定性转折。在1989年10月26日举行的斯洛文尼亚共盟中央全会上，就“纲领性文件”展开了争论。文件改变南共联盟的性质，使之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的联盟”，文件强调要“同布尔什维克主义决裂”，“重新确认资产阶级革命取得的成就”，为此，文件要求把象征共产党的红五星改为黄五星，用蓝色和绿色取代红色。会上解释说，黄五星代表改革和欧洲联合，蓝色是自由的象征，而绿色代表生态平衡。中央委员维·哈弗纳尔在会上发言，尖锐批评这个“纲领性文件”，他反对改变南共联盟的性质，认为文件所提的要求使人对共盟是否还继续是工人阶级的党的性质产生怀疑；他反对文件中否定过去的一

切，包括所取得的成就；他反对抹去代表共产主义的标志；反对否定社会所有制。结果会议不顾维·哈弗纳尔等两名中央委员的反对，通过了所谓的“纲领性文件”作为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的基本文件。

1989年12月22日，斯洛文尼亚共盟举行十一大，通过了上述纲领性文件，大会还作出决议，责成出席南共联盟十四大的斯洛文尼亚共盟代表，向十四大提出并坚持改变南共联盟性质的提案。决议说，如果南共联盟十四大作出与此相反的决议，则对斯洛文尼亚共盟组织无约束力。此外，代表大会还决定取消一党制，实行多党制，同反对派展开公开的竞争。大会选举里比契奇为党的主席。

1990年1月，在南共联盟十四大上，斯洛文尼亚共盟的代表在其提案被否决时中途退场。南共联盟十四大中断，导致了南共联盟的最终解体。

1990年2月4日，斯洛文尼亚共盟代表会议一致通过将斯洛文尼亚共盟改名为“斯洛文尼亚共盟—民主改革党”，并宣布脱离南共联盟的领导而成为独立自主的政党。斯洛文尼亚共盟中央主席齐·里比契奇说，更改名称是因为有些反对党提出共盟不能以原来的名称参加议会选举，同时，这个名称也表达了斯洛文尼亚共盟渴望民主。

1990年10月28日，斯洛文尼亚共盟—民主改革党再次举行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取消该党名称中的“斯洛文尼亚共盟”，正式定名为“社会民主改革党”。这次代表大会也就成为社会民主改革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决定说，改名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清洗掉共产主义的标志，从而割断党与其前辈们所犯下的血的布尔什维克错误的联系，而且是为了根据新党纲的要求，去敲开欧洲社会党国际的大门”。“改革派”和

“教条主义派”展开了激烈斗争，最后，大会以斯洛文尼亚共盟主席齐·里比契奇为首的“改革派”取胜。齐·里比契奇再次当选为党的主席。

新的党纲称，新建立的党是一个现代化的、民主的、组织灵活的欧洲的党。新党团结一切在当代民主世界中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工会、新自由主义的左翼、新社会运动的左翼。新党纲说，民主改革党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一党制，自觉地脱离自己的政治垄断，从而保证了斯洛文尼亚向新的多党代议制政治体制的和平过渡，为在南斯拉夫建立多党制民主作出了贡献，并为斯洛文尼亚人民取得新水平的自主权创造了条件。纲领最后说，民主改革党已经从垄断政权的宝座上走下来了，现在要在普通人们中活动，它正在拟定一个使左翼力量再次高涨的宏伟计划。

新发表的宣言说，社会民主改革党是左翼的民主党，它选择了社会主义方向，并且不完全否定共盟的过去，反对攻击人民解放战争，而主张客观地和高质量地评价过去。宣言说，民主改革党将改革过去对新执政党——斯洛文尼亚民主反对党联盟的软弱态度。坚决反对政府通过国籍法，使那些来自其他共和国的现在在斯洛文尼亚劳动和生活的劳动者被宣布为外国人。反对政府用国家资本主义来代替国家社会主义。反对通过社会住宅的私有化，来把那些生活在住宅中的住户驱逐出住宅。反对新的教权主义。

1994年，社会民主改革党与工人党、社会民主联盟联合组成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人士联合党，共有党员2.3万人，该新党曾成为联合执政党之一。但在1996年1月，因同总理发生歧见而退出联合政府。

三、原执政的共产党的后继组织

(一) 波兰共产主义者联盟—“无产阶级”

1990年3月22日成立，同年7月7日波兰共产主义者联盟—“无产阶级”（下称波共盟）在卡托维兹市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该党是目前波兰唯一主张按马克思主义原则实行社会主义的政党。虽然该党人数不多（自称有党员3000人），但也是波兰民主左派联盟的集体成员之一。按照1997年7月通过的《政党法》，该党已在华沙获得登记，成为合法政党。

该党在召开一大前，曾发表《21点宣言》，提出了党的纲领主张。《宣言》认为，波兰“正在走向全面的右派专政”，批评原来的波兰统一工人党“背离党的基本原则，执行独断专行的政策”，表示“党必须摒弃极权主义的活动和任何形式的暴力和专制”，“党的首要目标是抛弃外来因素的共产主义”，“坚决反对斯大林主义”，“党致力于按照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为消灭现制度而开辟道路”；波共盟是“真心实意地按照劳动人民真正利益改造社会制度的所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继承人”。

该党在国内某些城市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但在波兰政坛上基本上看不到它的活动。在1993年的议会大选时，波共盟参加了“民主左派联盟”，但它所推荐的8名候选人无一人当选议员。1997年议会选举中同样无人当选。该党出版刊物《黎明》。

(二) 匈牙利工人党

匈牙利工人党是原来的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的后续党、重建党。

1989年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将党改建为匈牙利社会党，通过匈牙利社会党纲领声明。部分党员反对党的改建，要求保留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并于同年12月召开十四大第一阶段会议，蒂尔迈尔·久洛当选为党的主席，1990年1月召开第二阶段会议，通过党的政治声明。1991年10月匈社工党召开十五大第一阶段会议，11月召开第二阶段会议，通过党的纲领声明。1993年3月改名为匈牙利工人党。同年11月召开十六大第一阶段会议，通过1994年大选竞选纲领。

重建后的党声称，党的政策建立在创造性运用并进一步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传统的基础上。该党强调是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传统的继承者。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活动。继续与共产党和工人党、其他进步力量及左翼力量建立联系。党的历史目标是创建劳动者权利平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其目标是维护公有制社会的尚存价值，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扩大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力。组织建制分为基层组织、地区协调委员会和中央机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代表和决策机构，至少每两年举行一次，选举党的正副主席、顾问团主席和财务监察委员会、党的道德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选举主席团指导日常工作。中央党报为《自由报》(周报)。该党现有党员3万左右，有1400个基层组织，是合法的在野党。1990年大选中获3.68%的选票，未能进入议会，1994年大选仍未进入议会。

（三）捷克—摩拉维亚共产党

捷克—摩拉维亚共产党（简称捷摩共）原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一个地区性组织，成立于1990年3月。捷克与斯洛伐克分裂后，捷摩共是捷克共和国人数最多（现有党员近20万）、也是当前东欧唯一仍保留“共产党”名称的政党。

捷摩共在剧变后一直是议会第二大党，但在1996年5月底至6月初举行的大选中得票率被捷克社会民主党所超过，降为议会第三大党。在有200个席位的众议院占有22席，在82个席位的参议院占有2席。由于历届大选中得票率最高的右翼公民民主党不愿与之组阁，捷摩共一直处于在野地位。该党党员分布在全国7500个基层组织内。党的基层组织较强，在县、镇、村中的基层组织健全。除正常组织生活外，还经常利用“五·一”、反法西斯周年纪念日等机会开展活动，吸收群众参加，宣传党的政策，争取群众的拥护。党的最高机构为代表大会。党的中央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现任主席米罗斯拉夫·格雷贝尼切克1947年3月21日生于捷克共和国。毕业于布尔诺大学师范和哲学系。毕业后曾在各类学校工作，教授经济政治理论、近代史和农业史。1975年加入捷共。1991年11月任捷克—摩拉维亚共产党和民主左翼党联邦委员会副主席。1991年12月捷摩共与斯洛伐克民主左翼党分裂后在1993年党的四大上继续当选为主席。

捷摩共的奋斗目标是“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在最大范围内为所有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该党宣称要将捷摩共改造成现代化政党，使其成为捷克民主运动中的一员；与党内和社会上的斯大林主义模式最终决裂。该党认为，斯大林模式就其一切形式来说，都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是与社

会主义相对立的。该党主张摒弃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赞同摆脱一切思想教条的创造性的理论思维，实行政治多元化。认为政治多元化将确保所有尊重宪法的政党和社会组织有权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开展自己的活动，各种政治力量应相互尊重；捍卫工人、合作社农民以及广大阶层人民的利益，反对威胁他们合理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需要和利益的任何企图；赞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为根据社会需求由国家来进行调节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是必要的；主张在保持社会所有制占决定性比重的同时，各种所有制形式平等，反对出卖和侵吞国家财产；赞成国民经济向世界广泛开放，尤其是使捷克尽可能广泛地参与欧洲市场。

捷摩共于1990年10月召开一大，通过了党的纲领和组织章程等文件。1992年12月召开二大，修改了党纲；代表们围绕是否更改党的名称等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最后大会根据大多数代表的意愿，决定不改变党的名称。1993年6月召开三大，批评当局的现行内外政策，称5月议会通过的《反共法》严重违反捷克宪法和一系列国内外法律，称“休克疗法”的经济转轨使国家经济进一步削弱，政府的对外政策使捷克陷入新的依赖关系和争端之中。这次大会还修改了党章，决定不允许在党内搞任何派别活动。中止了党内争取社会主义论坛派领导人什捷潘和奥布齐纳的党籍。坚持要求更改党名和彻底修改党章的该党执委会委员麦奇尔等70多名代表当即退出会场，并发表组建“民主左翼党”的纲领声明。原党的主席伊·斯沃博达因与党内其他领导存在原则性分歧，在这次大会前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并退出捷摩共。新当选的主席格雷贝尼切克在会议结束时强调，党并未因某些人退党而发生分裂。称捷摩共保留了党的性质和党的名称，仍是左翼联盟中的一个较大的组织。他在1995

年12月召开的四大上再次强调要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恢复资本主义,要加强与左派党的合作。提出党当前的三大任务是:(1)增强党的经济实力,更多地开展国内外活动,以扩大自己的影响。(2)提高党的思想水平,克服1989年捷剧变以来党内的消极状态,统一全党思想,加强党的信念。(3)加强党的基层工作,提高党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在对外关系上,该党坚决反对加入北约和欧盟。主张加强国际安全与合作。强调致力于加强同欧洲和世界上所有左翼政党发展平等伙伴关系与往来,与愿意建立社会公正和民主社会的所有力量站在一边。力争加入社会党国际。目前捷摩共与意大利、法国、斯洛伐克、俄罗斯等国的左派党交往较多,同朝鲜劳动党和越南、日本共产党及古巴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有交往。

(四)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改建为社会党之后,一部分持不同意见的党员于1991年9月10日成立的。同年11月9日获司法部批准,但1992年7月16日被取缔。6年之后,又于1998年4月9日被允许合法存在。

阿共称,该党的世界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和宣传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经典著作是阿共和每个党员的任务。但当前和长期的任务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革命精神客观和科学地认识和解决今天及未来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反对神学和宗教,但尊重教徒的信教权利。阿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因为党的纲领和基本路线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它也是城乡劳动群众的党。人民民主是实现人民争取平等和普遍福利的最合适的政治制度,是走向消灭阶级矛盾、城乡矛盾、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矛盾的道路。只有把党的组织扩大到人民的

各个阶层，广泛开展活动，才能实现人民民主。

阿共对霍查基本持肯定态度，认为霍查是阿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国家的解放事业和发展变革中起了巨大作用。霍查犯有错误，但没犯过路线错误，在许多时候他的思想被歪曲了。霍查应留待历史去评价，阿共将来要科学地阐明霍查在阿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阿共主张国家实行多党制，但应由一党执政，因为一党政府最稳定。阿共主张在多元化和法制化的条件下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党的崇高目标是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消灭政党，使国家消亡，但这是今后的事。至于今天，不管承认与否，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政治斗争、思想斗争都是阶级斗争。

阿共反对复辟资本主义。认为尽管社会主义遭到暂时的失败，以及在实践中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但社会主义是最民主的社会制度，是属于未来的社会制度。在所有制方面，赞同国营、合作社和私营所有制进行竞争，但认为前两者应占主导地位。批评贯彻《土地法》摧毁了农业社，使农村形势严重，造成尖锐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主张农民自愿建立独立于国家的全国合作社体系。反对买卖、出租和不耕作者继承土地。认为关键的经济和生产部门不应实行私有化，应置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私有化进程带来了尖锐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共产党反对这一经济政策。

阿共主张建立人人平等的、自由的社会生活，实行“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人道主义原则。尤其要关心妇女解放及其平等权利以及青年问题。

阿共的愿望是团结一切力量，同所有坚持国家主权和人民民主的力量合作。但愿望与现实相悖。阿共反对国内外打着反共旗帜、反对民主、进步及国家和人民主权的政党。但有些政

党的纲领中有真诚的、爱国和民主的思想及主张，反对建立法西斯专制，反对内战和屈从外国，反对严重歪曲历史，这些都与阿共的纲领相近，当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需要时，阿共应同这些党结成联盟。

阿共主张建立一个以表达和保证劳动群众意志和利益的宪法及法律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阿共反对破坏立法、执法和司法三权鼎立的原则。在坚持政治多元化的同时，反对国家组织和机构偏袒任何政党和政党的联盟，不许任何政党以党代政。

在对外政策方面，阿共坚持众所周知的与各国人民和平、合作、友好，支持民主、解放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平等、不干涉内政、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共处的原则。主张阿进一步扩大国际关系，加入欧洲和世界组织，尤其是联合国各组织。主张与邻国发展友好关系。全力支持生活在科索沃、马其顿、塞尔维亚南部和黑山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的权利以及被赶出恰默利亚地区和仍在那里受到歧视的阿族人的权利。

阿共中央临时领导机构是“中央组织委员会”。希斯尼·米洛什任党的主席。米洛什毕业于地拉那大学政法系新闻专业，曾任阿人民军《7月10日》杂志记者，作家兼诗人，是“霍查志愿者”协会主席。

四、重建、改建的老社会党

（一）波兰社会党

1892年成立。党内曾有几派，1945年6月召开波兰社会党统一代表大会，确定了同波兰工人党合作和支持人民政权的

方针路线。1948年12月该党同波兰工人党合并成立波兰统一工人党。社会党从政治生活中消失。80年代末，波兰开始发生剧变后，社会党又重新开始活动。1996年2月18日，以参议员扬·姆拉克为主席的波兰社会党“11”派召开会议商讨了同彼得·依科诺维奇为主席的社会党“13”派合并的问题。会议通过决议称：根据1995年3月联合代表大会第二阶段会议的决议，联合起来的社会党应当在民主左派联盟内开展政治活动。这两派的数字代号是因法院登记的次序而得。以依科诺维奇为首的3名社会党人议员在议会表决时违背了左派议员团的纪律而被开除出议员团，结果单独成立了议员小组，但是他们仍然属于民主左派联盟的成员。

1996年2月24—26日波兰社会党的两派（即所谓“11”派和“13”派）一致通过决议，合并成一个政党，选举扬·姆拉克参议员为党的主席。波兰社会党“13”派最高委员会主席彼得·依科诺维奇和波兰社会党“11”派的副主席众议员雅采克·卡斯普沙克为党的副主席，选举安杰依·利普斯基众议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合并决议说，无论波兰社会党议员小组的社会党人还是民主左派联盟的社会党人，都支持联合政府并同民主左派联盟议员团、农民党议员团合作。波兰社会党将致力于同社民党、劳动联盟一起建立中左联盟。会议讨论了党的思想主张。社会党没有历史包袱，现在特别关注波兰社会的两极分化，关注社会的结构性失业，关注年轻人的前途。社会党认为民主左派联盟作为一个整体，站在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前列，所以波兰社会党将是民主左派联盟的一个忠实的合作伙伴。社会党内以克拉耶夫斯基为首的一些人对成立波兰社会党—民主左派很积极。

彼得·依科诺维奇 1956 年 5 月 14 日出生。1980 年华沙大学法律行政系毕业。曾任团结工会玛佐夫舍地区分会的专职记者，是波兰记者协会成员。1981—1989 年是团结工会活动家，是波兰社会党重建者之一。1987—1993 年曾任波兰社会党主席。1993 年 7 月由于同民主左派联盟结成议会竞选委员会而被解除主席职务，但仍担任党的领导人。1998 年 4 月，社会党召开中央全会，依科诺维奇当选为主席。

（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

成立于上世纪末。1948 年 6 月与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原社民党总书记萨卡希奇当选为劳动人民党主席，1956 年 11 月劳动人民党改组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 1956 年匈牙利事件期间，社会民主党一度恢复。1989 年 1 月重新成立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同月组织委员会召开会议，雷维斯担任主席。

社会民主党强调自己是工人政党、左翼政党，宗旨是在匈牙利建立公民民主国家、福利社会，把建立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制度的任务，维护并代表劳动者和工人的利益，强调该党根据社民党传统，对所有工会组织开放，并尽最大可能与工会组织建立最佳合作关系，壮大左翼队伍。匈牙利社会民主党 1989 年 11 月加入社会党国际，1991 年 11 月被暂停成员资格，1992 年 9 月降为社会党国际观察员。

社会民主党主张建立福利社会，建立以多党制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和法制国家，自由、不受限制地实现人权；使匈牙利享有真正的主权和保持中立。主张对所有制实行彻底改革，建立以经营自由和市场优先为基础的混合经济。1989 年 11 月召开重建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此次大会为三十六大。提

出社民党是左翼政党，接受社会党国际的社会党基本价值，要求成为社会党国际一员。大会选出全国最高委员会，派特劳肖维奇·安娜当选为党的主席。主张实行社会民主制度，建立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的福利国家；指出其基本价值是自由、公正、团结互助；该党是工人、劳动者的党，该党致力于与独立的或革新中的工会建立密切的合作。

在1990年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仅获3.55%选票，未能进入议会。同年11月召开三十七大，12月续会，强调加强党的工人性质，指出社民党是欧洲式（非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同时，党内反对派另行召开代表大会，认为党的领导机构并未体现党员能接受的政策，不同意党的领导作风，并选出自己的执行机构。1991年11月在执行副主席领导下，暂停主席职务，更换总书记，党的领导机构分裂。9月社会民主人民党成立。1993年初开始磋商协调，10月独立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人民党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联合召开代表大会，宣布合并，党的名称仍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并选出领导机构和主席团，原社会民主人民党主席基什·佐尔旦当选为党的主席。1994年大选中该党仍未能进入国会。同年11月，该党召开十大，卡波伊·拉斯洛当选为党的主席。

（三）捷克社会民主党

原名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1993年1月捷克共和国独立后改为现名，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在历史上，它作为奥匈帝国社会民主党的组成部分成立于1878年4月，1938年解散，1945年恢复组织，1948年6月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合并。1989年11月，即捷剧变后作为独立政党恢复活动。党的最高机构为代表大会，机关报是《人民权利报》。截至1995

年底有党员 1.25 万人。

党的纲领目标是继承捷克和世界社会民主运动的传统，以及捷克人民为社会正义而斗争的优良传统。致力于多党基础上的议会民主，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主张各种所有制权益平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私有制，支持国家对外开放，吸收外资。主张国家统一。

1990 年 3 月召开恢复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建党后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推举长期居住在美国的伊日·霍拉克为主席。1991 年 4 月召开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新党章，重申自由、社会公正和团结的社会民主原则。自称是“中左政党”。1990 年得到社会党国际的承认和支持，成为社会党国际的成员。1993 年 2 月召开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米洛什·泽曼当选为主席。泽曼 1944 年 9 月 28 日生于捷克高林县。1968 年学生时代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69—1970 年在高等经济学院任教。1970 年因反对苏联入侵被开除党籍。1989 年 11 月捷剧变后加入公民论坛，并参与起草公民论坛纲领。1990 年在捷科学院预测研究所工作，同年加入捷克社会民主党，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民族院议员。1990—1991 年任捷联邦议会主席团委员。1990 年 8 月至 1992 年先后任联邦议会民族院计划和预算委员会主任、罗马俱乐部捷克斯洛伐克联盟副主席、捷联邦议会社会民主党议员俱乐部委员。1996 年 6 月当选为捷众议院议长。

在 1990 年 6 月的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因未获得 5% 的选票而未能进入联邦议会。但由于以后争取到 7 名“公民论坛”的议员加入该党而成为议会党，并于 1991 年 1 月在议会里成立了社会民主党的社会自由俱乐部。1992 年 6 月在捷议会大选中获 16 个席位。1996 年 6 月捷大选中该党地位显著上

升，以 26.44% 选票跃居第二大政党，与第一大政党公民民主党仅有不到 4 个百分点的差距，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力量。

该党主席泽曼担任议长后，利用手中掌握的议会大权，在议会中推行社会民主党的方针，不时提出各种议案扩大本党的影响，削弱克劳斯政府的行动能力。该党强调改善社会福利和维护劳动者的利益，揭露和批评执政党在住房、教育、社会福利政策上存在的问题。在对外政策上，该党虽然赞成捷加入欧盟和北约，但坚决反对北约在捷领土上布置核武器，这不仅得到捷摩共、民主左翼党的赞同，亦得到不少其他在野党的响应。

社会民主党是捷克的第二大政党，但它拒不同捷克一摩拉维亚共产党，也不与无政府主义的捷共和党合作。在 1997 年 6 月的议会选举中，捷克社会民主党获得 32.31% 的选票，74 个议席，战胜了右翼执政党，组阁上台。

五、剧变中新形成的社会党

（一）波兰劳动联盟

波兰劳动联盟是团结工会衍生的政党，由劳动联盟、民主社会运动、大波兰社会民主联盟等 4 个派别于 1992 年 6 月正式合并而成。主席是布加依，该党的主要成员是团结工会里的左翼人士和前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普通党员。

劳动联盟自称是左派政党，其宗旨是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主张在波兰实行能使劳动者接受的市场经济。反对团结工会政府实行的“休克疗法”和使广大劳动者受穷的私有化政策。该党领导人指出，政府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应当是为广大劳动者谋福利，而不是不顾实际条件，推行使少数人发财、多数人贫困

的政策。

劳动联盟在团结工会执政时期有6个议席，1993年9月议会大选中得票占第4位，在众议院中获41席，占议席总数的8.9%。这证明该党在选民中的威望在提高，是团结工会基础上形成的诸多政党中进入议会的第二个政党（另一个是民主联盟），在组成现议会的6个政党（左派联盟、农民党、民主联盟、劳动联盟、独立波兰联盟和“支持改革的无党派人士”）中排行第四。

劳动联盟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进入议会后，左派联盟和农民党均希望与它合作。但劳动联盟认为，在私有化政策上同组成联合政府的两党有“原则分歧”。布加依认为，目前实行的私有化纲领，只对少数有钱人有利，对广大劳动者来说是一种掠夺。该党在一项决议中指出，新政府的私有化纲领，是一个继承前政府的纲领，私有化政策仍然是“急于求成”的政策，却又不知具体如何贯彻；实际上是为创造“中产阶级”服务，而不是为了广大劳动者的利益服务；抱怨左派没有按照议会竞选时所作的允诺行事。因此，劳动联盟指责结盟的两党并没有持对国家负责的态度，选民必将改变对左派的支持。所以，布加依宣称，要“从零开始，重建波兰左派”。劳动联盟没有参加议会联盟和联合政府，对此左派联盟领导人克瓦希涅夫斯基（社民党主席）感到惋惜，他表示，议会联盟是开放的，希望劳动联盟在几个月内能参加进来。1997年议会大选中，该党严重失利，因得票不足5%（得票4.74%）未进入议会。大选后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党发生分裂，党的主席易人，许多党员退党或转向别的政党。

（二）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

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成立于1991年4月，现有党员4万人，是斯洛伐克目前最大的执政党。其前身为执政的“公众反暴力”组织中的民主斯洛伐克派。同年6月正式举行成立大会，脱离“公众反暴力”组织，并被迫退出执政地位，成为在野党。在1992年捷联邦大选中，该党在斯洛伐克地区获胜，在拥有150名议员的斯民族议会中占74个席位，并与民族党结成“默契联盟”，1993年斯独立后，该党政府作了调整，放弃了原联邦时的“休克式”经济改革方案和“投资券私有化”方式。在1994年9月举行的议会的选举中，该党再次获胜，得票率为34.96%。占居议会2/5的席位，并与民族党和工人联盟组成联合政府。

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自称中左翼政党，观点倾向于社会党国际。对内主张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和社会市场经济，崇尚民主、人道主义、法制国家、人权，反对激进的改革，强调尊重斯洛伐克的民族特点。对外主张重点发展与西欧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要求将斯洛伐克纳入欧洲一体化进程，力争在本世纪末加入欧盟，并希望成为北约正式成员。

该党设中央、州、县3级机构，最高机构为代表大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两次代表大会期间，由108人组成主席团主持工作，每月举行一次会议。主席团的执行机构为政治局，每周举行一次会议。政治局设主席和4位副主席，分别负责经济、社会事务和对外关系等工作。

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主席为弗·麦恰尔。他生于1942年，1962年加入捷共。1968年因反对苏军入侵捷被开除出党，在钢铁厂当工人、科长和法律工作者，1990年11月出任斯内

务部长，同年6月任民主斯洛伐克运动主席。1990年6月—1992年4月和1992年6月—1994年3月两次出任总理。1994年12月第三次担任总理职务。

（三）保加利亚欧洲左翼党

前身是成立于1997年2月22日的竞选联盟“欧洲左翼组织”，由共和国公民联盟、社会主义选择同盟（独立派）和争取社会人道运动3个党派及由保社会党分离出来的人士组成，其中公民联盟占主体，系中左翼政党。在1997年4月举行的议会大选中，欧左以5.5%的得票率进入议会，占有14个席位，后两名退出实业家集团的议员加入该组织议员团，使其席位增加到16个。

1998年2月28日，欧左召开首届全国代表大会，2737名代表出席。会上以2736:1决定将欧左改变为政党，名称是“保加利亚欧洲左翼党”。同时通过了新党章、党纲，选出111人组成的最高领导机构——全国委员会和21人组成的政治局，原欧左主席亚历山大·托莫夫当选为新党主席。该党目前有党员2.5万人左右，52%为40岁以下的中青年，60%—62%的成员受过高等教育，是保国内较有前途的党。

欧左主张既摒弃集权社会主义，也反对野蛮资本主义，主张消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的企图，团结社会上所有的社会民主力量，使保社会民主派具有西方色彩并改变保左派政治格局；在国家方针上主张回归欧洲，融入西方体制；经济上主张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强调私有化的社会取向，主张按贫富差异征税，保护社会弱者；追求自由、平等、公正和互助，具有明显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特征。欧左政策务实灵活，渐得民心。该党以新左派自居，准备争取对右翼民盟和左翼社会党均

不满的中间阶层群众，在下次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二大政治力量。该党倡导以其为中心的左派联合。

欧左游刃于执政党民盟和反对党社会党之间，成为它们倚重的制衡力量，同时又得到独立工团的支持和总统的青睐。成立伊始，民盟就表示希望与之相互信任，相互批评；社会党愿意在相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实现左派联合。

（四）南斯拉夫左翼党联盟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联合执政党之一。由共盟—维护南斯拉夫运动、社会党、共产党等 23 个左派政党于 1994 年 7 月 24 日联合组成。成立大会通过了党章、纲领性宣言。1995 年 3 月 25 日正式选出主席、副主席和领导机构。目前，该党在全国 80% 的地区有党的组织，共有 10 万名党员，成员以青年、知识分子、企业家为主。

南斯拉夫左翼党联盟的纲领性宣言说，维护所有人的自由是左翼党联盟的方针。主张实现欧洲一体化、南部斯拉夫民族及巴尔干民族一体化，主张促进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及政治合作。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而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是实现民族平等的基础。在经济领域里，主张多种所有制并存，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主张停止无组织的、常常是对社会财富进行掠夺的私有化。鉴于当前在原南斯拉夫地区战争和暴力冲突不断扩大，贫穷和愚昧无知不断泛滥，南斯拉夫左翼党联盟主张，左翼党应联合起来，制止战争和暴力冲突，维护原南斯拉夫地区的和平，实现民族间的和平与合作，建立一个富裕的、高度发达的社会。南斯拉夫左翼党联盟希望建设一个新的、更人道的、更美好的世界。

南斯拉夫左翼党联盟在国内是位于塞尔维亚社会党、塞尔

维亚复兴运动之后的第三大党。在1996年11月举行的南斯拉夫联盟议会大选中，该联盟参加了塞尔维亚社会党为首的塞左翼政党同盟。塞左翼政党同盟在大选中获胜，在联盟议会公民院138个席位中获64席，从此，南斯拉夫左翼党联盟成为南斯拉夫的联合执政党之一，参加了联盟政府，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呈上升趋势。南斯拉夫左翼党联盟联合了南本国绝大多数左翼党，积极开展对外活动，是巴尔干左翼党联合与合作的主要倡导者。

附：南斯拉夫左翼党联盟主要领导人简介

留比沙·里斯蒂奇 南左翼党联盟主席。1947年生于科索沃。1963—1969年为南共联盟盟员。1968—1977年在贝尔格莱德艺术学院学习，曾编导过一些戏剧作品，如《大学生》、《前景》等。受托洛茨基主义和无政府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较深，曾经是1968年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1977年在萨格勒布创建戏剧剧院。1985年任苏博蒂查人民剧院院长至今。曾主办南斯拉夫联欢节。

米拉·马尔科维奇 南斯拉夫左翼党联盟总部主席，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米洛舍维奇的夫人。生于1942年。贝尔格莱德大学社会学系毕业，1979年获社会学博士学位。1975年起在贝尔格莱德大学自然—数学系任助教、副教授和教授，兼任贝尔格莱德美国—法国企业家系和国际企业家系社会学教授。是俄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家大学巡回教授。1995年3月被选为南斯拉夫左翼党联盟总部领导成员，是该联盟的核心人物。1995年和1996年曾两度访华。

第 6 章

蒙古的剧变 ——与苏东剧变的异同

与苏联东欧国家不同，蒙古不是通过反对派把执政党轰下台之后，才使国家的性质和方向发生变化的。蒙古的剧变是在执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台上时，由于本身性质的变化而逐步完成的。剧变时和剧变后几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仍在台上，但国家的性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苏东剧变的冲击下，蒙古人革党 1990 年 4 月特别代表大会作出了一系列转折性决定，如实行多党制、放弃党对国家的领导、党纲中删除“共产主义”，宣布该党是“向一切阶级和阶层敞开大门的群众性的政治组织”等。1992 年 1 月，蒙古第十二届大呼拉尔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删去了“社会主

义”、“革命”等提法，改国名“蒙古人民共和国”为“蒙古国”，将原国徽上象征社会主义的向左奔驰的白马，改为展翅飞向右方的飞马，并去掉了国旗上象征革命的红五星，对原国歌的歌词也作了一些修改。这标志着蒙古在政治取向上已脱离社会主义。

在1990年举行的首次多党选举和1992年举行的以新宪法为基础的选举中，人民革命党仍保住了执政党地位。在1996年6月的选举中，人民革命党失去优势，8月被“民主联盟”组建的新政府取代。剧变后几年来蒙古的情况怎样？

一、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变化

蒙古长期以来在政治上追随苏共，经济上依赖苏联和经互会国家的援助，因此，苏联和东欧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蒙古。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理论得到蒙古上层领导的赞赏和认同，他们认为蒙古的改革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在最终目的上，都应该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其他国家一致。当时的蒙古部长会议主席索德诺木说，蒙古的改革“在打破多年来垄断蒙古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斯大林模式这一点上，同苏联、东欧的改革性质是相同的”。因此，从1987年起，蒙古就开始了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探索，如实行了“公开性”、“民主化”的一系列措施，承认历史错误，精简党政机构等，努力同苏共保持步调一致。在经济方面则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存，实行经济

核算,对企业实行有限的承包和租赁等。

1. 人革党放弃对国家的领导地位。

1989年底,苏联和东欧的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对蒙古的政局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冲击。形形色色的“民主组织”相继出现,他们在民主和公开性的口号下,煽动罢工、罢课和举行示威游行,提出了推翻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以下简称人革党)的口号,要求实行多党制。这些“民主组织”甚至采用了绝食等极端的斗争手段向人革党施加压力。蒙古的政局一时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

在国内外的巨大冲击和重重压力下,1990年3月,蒙古人革党提前召开了十九届八中全会。在这届全会上,以总书记巴特蒙赫为首的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全体成员集体辞职。全会还全盘否定了蒙古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泽登巴尔的历史功绩,取消了授予他的一切荣誉,并把他开除出党。全会决定于同年4月召开党的特别代表大会。贡·奥其尔巴特接替巴特蒙赫担任了新的总书记。接着,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十一届八次会议,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取消了其中有关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的提法,这就意味着人革党放弃了对国家的合法领导地位。

1990年4月,人革党召开了特别代表大会。大会就蒙古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人革党自身的革新等问题做出了一系列转折性的决议。这些改革步骤包括同意实行多党制、议会制和设置总统;承诺建设法制国家,精简党的机构,实行党政分开,放弃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等,并在党纲中删去“共产主义”一词,宣布该党是“向一切阶级和阶层敞开大门的政治组织”;以“民主一致”原则取代“民主集中制”;承认其他党派的存在并表示将与他们进行合作。在经济方面则强调

要改革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由国家调节的市场经济体制；取消对公民私有牲畜头数的限制；调整对外政策，奉行不结盟方针，等同对待同苏联和中国的关系，积极扩大和发展同亚太地区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关系。

2. 多党制在蒙古的正式实施。

1990年5月，蒙古大人民呼拉尔十一届九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政党法》，这标志着蒙古在法律上确定了多党制的合法性，并正式开始实行多党制。《政党法》的颁布为蒙古各政党参加同年7月举行的蒙古历史上的首次差额制大呼拉尔选举提供了合法的机会。这次共有7个政党参加的第十二届大呼拉尔选举的结果虽然还是人革党以绝对优势取得了胜利，但人革党在各政党所获的信任票中，只占了61.7%，其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已不复存在；其执政地位虽受到来自反对党的激烈挑战，但当时还是保住了。

3. 蒙古新宪法的产生及议会制和总统制的形成。

1991年2月底举行的人革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又一次对党纲进行了修改。新党纲规定：人革党就其性质而言，是“坚持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民主党”，这即是说，人革党已不再是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政党了。同年8月苏联发生的“8·19事件”导致苏共被迫解散、苏联解体，这一事件对蒙古政局产生了更加巨大的冲击，蒙古的“民主势力”反对人革党及其政权的活动再度活跃起来。

1992年1月，在反对党的动议下，蒙古大人民呼拉尔召开了十二届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蒙古的新宪法。新宪法删去了“社会主义”和“革命”等提法，将国名由“蒙古人民共和国”改为“蒙古国”，还修改了国徽和国歌。这部宪法是蒙古改变国家政治体制，脱离社会主义方向，向西方资本主义社

会制度靠拢的一个标志。

在颁布新宪法后不久，人革党即举行了党的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国内外和党内的重重压力下召开的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和纲领指出，人革党将奉行民族民主思想，是一个民族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党的指导思想的基础是“中道思想”；党的奋斗目标是在蒙古建设公民的民主社会。这表明，人革党已由一个有着70年奋斗历史的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演变为民族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了。作为执政党的人革党性质的根本改变，也必然影响到蒙古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彻底改变。

随着多党制的实施，议会制在蒙古也逐渐确立起来。自1992年蒙古颁布了新宪法之后，分别于1992年和1996年举行了两次全国议会（大人民呼拉尔）选举；于1993年和1997年举行了两次总统选举。人革党凭借以往的优势，取得了1992年议会选举的胜利；而反对党则赢得了1993年总统选举的胜利。在1996年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反对党组成的“民主联盟”以较大的优势获得了胜利；而下野后的人革党也不甘示弱，连续赢得了地方议会选举乃至1997年5月总统选举的胜利。不难看出，几年来，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在蒙古交替进行，蒙古的政治活动和政党活动也都围绕着上述选举展开，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亦在上述活动中体现。由此可见，议会制和总统制在蒙古已经渐成气候。

二、多党制与政党格局的变化

1990年蒙古大人民呼拉尔十一届九次会议通过了蒙古历史上第一个《政党法》，这就在法律上确定了多党制在蒙古的

合法性。

1. 蒙古民主派政党早期的政治倾向。

自1921年3月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至1990年初的近70年的漫长历史中，蒙古政坛上始终是由一个政党单独执政。在80年代末期，苏联、东欧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变化的直接影响下，蒙古陆续出现了民主党、社会民主党、民族进步党、自由劳动党、绿党、宗教民主党、牧民联合党、独立党等10多个民主派政党。当时，一些对苏联模式深感失望，对苏共的强权控制十分厌恶的知识界人士（其中有不少是原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党员）聚合在一起，以“民主、自由”为口号，从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当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张搞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化。他们全盘否认蒙古70年的革命历史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历史功绩，既指责苏联对蒙古进行“殖民统治”，也攻击中国企图变蒙古为附属国。他们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持批评态度，提倡政治多元化，主张实行多党制和议会制。这些党从建立之初，就积极寻求西方国家及其政党的政治支持和经济资助，甚至要求西方国家帮助他们培训干部和传授竞选经验，以便他们同人革党进行争权斗争。

2. 民主派势力的逐渐壮大和走向联合。

蒙古民主派势力中的各党起初力量比较分散，各自为政，他们在政治上很难同人革党抗衡。在1990年7月举行的实行多党制后的第一次大呼拉尔选举中，民主派势力的得票率还不足10%。结果，人革党又组成了一党执政的政府。在1992年6月举行的以新宪法为基础的全国议会选举中，由于民主派势力尚未形成有效的联合，人革党再次以绝对优势取胜。民主派势力只得到76名议席中的5席。尽管在议会中民主派势力同人革党的力量对比还十分悬殊，但总算有了落脚之处，他们可

以利用在议会的发言权向人革党的政府发难了。

出于夺权的需要，民主派势力逐渐感到了联合的重要性。1992年10月，蒙古民主党、民族进步党、复兴党和联合党等4个党合并成立了蒙古民族民主党，他们同社会民主党联手，在1993年的蒙古首次总统直选中击败了人革党，从而在政治力量的对比上增加了自身的份量。

3. 民主派势力赢得大选胜利，取代人革党的执政地位。

1996年3月，尝到了联合甜头的蒙古民族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再度联合，组成“竞选联盟”即“民主联盟”参加当年6月举行的全国议会选举，并以较大的优势取得了这次大选的胜利，赢得了总共76个议席中的50个席位（民族民主党35席，社民主党15席），成为议会中的多数，并组成了两党联合政府，从而取代了人革党的执政地位。蒙古政坛上的这一重大变化，极大地改变了蒙古的政治格局和政党格局，一度形成了由民主派势力同时控制议会、政府和总统的局面。

到目前为止，从党员人数上看，民族民主党已发展到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也发展到了5万多人。“民主联盟”两大执政党党员总数已经超过了人革党。

4. 人革党极力奋争，力求摆平政治力量对比的天平。

下野后的人革党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重整旗鼓，利用“民主联盟”缺乏掌权经验和在政策、措施上的失误，从1996年10月起，连续取得了地方议会选举和1997年5月总统选举的胜利，从而使蒙古的政治格局又变成了由“民主联盟”控制议会和政府，由人革党控制多数地方议会和总统的两大政治势力抗衡的局面。被认为是“稳健改革派”的人革党前主席巴嘎班迪当选新总统后，提出了“国家为人民，社会为公民”的口号，主张把国家利益摆在首位，加强法制建设，减少失业和贫

困现象，提倡全民团结，共同建立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的人道民主的社会。他的当选被看作是起到了“平衡政党关系，制约政府行为”的作用。

三、主要政党思想理论和政策的变化

1. 人革党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的变化。

苏联解体、苏共消亡和东欧剧变，对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方面紧紧追随苏共的蒙古人革党来说，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冲击。1990年4月，人革党迫于党内外的压力召开了该党历史上第一次特别代表大会。这次特别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和党章中仍然指出“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人们世界观的基础”，强调“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原理”；指出党的奋斗目标是“建立平等、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但与此同时，当时的该党中央主席·奥其尔巴特在谈话中已开始表露，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危机的情况下，人革党也不得不为了适应这种变化而进行自我批判和反思；人革党将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和策略。

1990年11月召开的人革党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人革党的改革构想》在谈到社会主义问题时说，人革党的长远目标仍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但是，由于蒙古从经济发展的水平上讲，尚不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所以不能把实现社会主义当作近期的目标。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全会把“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改为“人道民主的社会”。在谈及马列主义时，贡·奥其尔巴特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马列主义的某些观点已经过时，其理论已不再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的唯一正确的学说了，因此人革党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也不应只限于马列主义。他强调，人革党将放弃一党专政的斯大林主义，而要实行多党制。在评价人革党的性质时他说，人革党在建党初期就不是马列主义性质的政党，后来教条主义地模仿苏共奉行马列主义，走入了误区。他认为，人革党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左翼民族民主党”，只不过是受在外因的影响下，被人为地变成了一个“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政党”。今后要还人革党以本来面目，即成为一个“人民民主党”。

贡·奥其尔巴特的观点在随后举行的人革党二十大上得到了体现。1991年2月底举行的人革党二十大再次修改的党纲和党章规定，人革党就其性质而言是坚持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民主党。二十大上新当选的党中央主席达希云登说，看来马列主义不适合蒙古的社会土壤。同年7月，达希云登提出了“体现阴阳统一和对立统一”的“中道思想”。按达希云登的说法，要振兴蒙古就必须靠“否定一切暴力和一切极端”的“中道思想”。人革党的党报《真理报》不断发表文章鼓吹“中道学说”，甚至有人建议把“中道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时隔一年，人革党又举行了党的第二十一代表大会。为了同脱离社会主义方向的蒙古新宪法相适应，二十一大对二十大的党纲和党章进行了原则性的修改，通过了题为《人革党的理论与道义之基本依据》的决定，从根本上改变了人革党的性质、目标和指导思想的基础，成为人革党由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变为民族民主主义性质政党的宣言书。这次大会正式宣布，人革党不再是马列主义政党，而是坚持民族民主主义思想的民族民主主义政党；民族民主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东方哲学中的“中道学说”，即是一种不偏不倚的观点和思维方式。

党的代表大会为改变党的理论基础而专门通过一份文件，这在人革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人革党选择“中道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基础并非偶然，这种思想顺应了当时蒙古人心思定的社会心理，也为人革党在同“民主派势力”的斗争中一再忍耐、退让的政策找到了理论依据。按照人革党的新设计，全党将在行动上提倡“谨修思维”，在道义上遵循“人伦规范”，在实践中依照“蒙古品格”，全面调动自身力量，保障个人的自我发展和全民族的发展进步。这样，人革党便以“中道思想”取代了马列主义，填补了改变党的性质时在理论上出现的空白。

达希云登等对人革党的“革新”，受到了党内为数不多的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们的批判和抵制。以当时负责党的意识形态和对外关系的人革党中联部部长楚纳格苏伦为代表的党内“保守派”，严词批评了党内出现的反对和取消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对所谓的“蒙古复兴学说”和“中道学说”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不能把当前国际共运遇到的困难说成是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陷入危机或正在走向死亡；背叛马列主义即是全盘否定人革党70年的革命历史和斗争成果，必将种下亡党亡国的祸根；“中道思想”不过是见风使舵，随波逐流，将互不相容的各种思想柔和成意识形态的折中主义的一种手段，它将导致党在政治上迷失方向，在政策上无所适从；抨击时下蒙古时兴的“民主”，不过是无政府主义、虚伪的人道主义的大杂烩。尽管楚纳格苏伦代表了人革党内一部分人的呼声，但终因势单力薄，寡不敌众，遭到了排斥和冷落，很快便销声匿迹了。

但是，“中道思想”既未解决人革党内部思想上的混乱和组织上的涣散，也未解决蒙古经济转轨时期所面临的种种困

难，反而从某种程度削弱了人革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降低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1993年6月，人革党由于党内意见不一，在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问题上产生了失误，使“民主派势力”提名的候选人彭·奥其尔巴特登上了总统宝座。而这仅仅是人革党在政治上失利的开始。1996年6月，“民主派势力”组成的“竞选联盟”——“民主联盟”在全国议会选举中以较大的优势击败人革党，并取代了人革党的执政地位，从而改变了蒙古政坛的政治格局。人革党终于在执政75年之后沦为在野党。

1997年2月，下野后的人革党召开了党的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二十二大又一次修改了党纲和党章，将党的性质明确为“民族民主主义性质的中左翼政党”，确定党的理论基础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这就意味着人革党终于放弃了“中道思想”。大会强调党的任务是建立“自由、公正的社会”；主张继续实行多党议会民主，推进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进程。再次革新后的人革党认为自己的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都更加接近西方国家的社会党与社会民主党，并已正式申请加入社会党国际。

2. 民主派主要政党的思想倾向和政治主张。

作为蒙古民主派主要政党的蒙古民族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其早期的思想倾向和政治主张如前文所述，都带有明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色彩。两党的个别领导人曾发表过一些对华不够友好的言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这些政党在政治上的逐渐成熟，也出于争取国际支持和争取国内选票的现实需要，他们的反共、反华言论渐渐有所收敛。随着同我国接触的增多和眼界的开阔，他们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了较多的感性认识 and 了解，态度已由反感逐渐转为认可甚至钦佩。这也是近年来他们愿同我党开展党际交往的原因所在。

蒙古民族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就其思想体系而言，仍属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范畴。他们倾慕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模式，同时为赢得国民的支持，强调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以振兴蒙古民族和建设福利社会的口号吸引民众。由于选择了议会民主道路，两党的党内活动基本上围绕议会选举和议会活动开展。党组织平时比较松散，也不太强调思想理论基础。

四、经济转轨与经济形势

剧变后蒙古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复苏势头很缓慢。

1. 蒙古经济陷入严重困难。

80年代后期，蒙古在前苏联“改革”等口号的影响下，也曾实行过某种程度的经济改革的探索。但这一探索并未取得明显的进展。蒙古始终没有摆脱苏式的计划经济模式，产业结构也不合理，经济发展相当缓慢。因此，当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后，蒙古便突然失去了作为其经济发展支柱的来自苏联和经互会国家的大量经济、技术援助，同这些国家的贸易关系也中断了。其直接后果是，蒙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国家面临着极其窘迫的局面。在情况最糟的1992年，农业减产40%，国家对肉、乳和奶油的征购任务均没有完成。4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的35种大幅度减产。有2/3的大、中型企业没有完成生产指标。国家的外汇储备接近枯竭，无力偿还的外国贷款已达1亿多美元。当年的物价指数比年初上涨了近3倍。许多部门和单位接连数月发不出工资。

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居民的食品和日用品的供应全面短缺。人均收入同 1991 年相比减少了 66%。全国约有 1/4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有近 20% 的人饥寒交迫。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 1993 年的上半年才稍得缓解。

2.90 年代以来蒙古各政党及其政府为使经济走出困境所采取的措施。

90 年代以来，无论是人革党政府，还是 1996 年上台的“民主联盟”政府，都不能不把使蒙古经济走出困境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

(1) 人革党政府采取的措施及其成效。

1991 年 5 月，人革党政府颁布了《财产私有法》，决定除了铁路、能源、矿山、民航、邮电等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大、中企业之外的所有企业和农牧业合作社、国营农牧场，全部实行私有化。私有化分两步进行：先实行小私有化，即把大部分商业服务单位和小型工厂企业的财产进行拍卖。然后是大私有化，将大、中型国营企业相继转变为股份制公司。与此同时，把原来的农牧业合作社和国营农牧场以股份公司的形式保存下来，扩大私营农牧场和个体农牧户的队伍。

1992 年 6 月大选后上台的以扎斯莱为首的人革党政府，为制止经济下滑采取了以下一系列措施：加速推行并基本上完成了私有化的任务，为向市场经济转轨打下一定的基础；改善财政金融状况，紧缩银根，回笼货币，增加税收，提高利率，放开物价，实行外汇自由兑换；抑制通货膨胀和控制物价指数上升；调整产业结构，重点扶持工业生产，扭转工业滑坡现象；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和争取外援。

由于实行了上述措施，从 1993 年下半年开始，蒙古经济的下滑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从 1994 年开始，蒙古经济

有了逐渐回升的势头。但这种势头只持续了一年多。从1996年上半年起，因受全国议会选举的干扰，特别是下半年缺乏掌权经验的“民主联盟”政府上台之后，蒙古的经济形势又再度变得严峻起来。

(2) “民主联盟”政府掌权后经济形势出现的反复和缓慢进展。

1996年8月“民主联盟”政府上台。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兑现竞选时的诺言，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加大经济改革力度的措施，如全面放开物价和改革税收制度，加快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住宅私有化的步伐，积极引进外资改造基础设施等。由于操之过急，造成了物价急剧上涨，蒙币贬值，国民收入下降，失业人口大量增加，经济形势非但没有迅速好转，在一段时间里还出现了再度下滑的颓势。直到1997年下半年，新政府才基本上控制了局势，使经济逐渐走上了缓慢回升的道路。

3. 西方国家增加对蒙古的经济援助。

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6年蒙古“民主联盟”政府上台以来，为了稳定和加快推进蒙古“民主化”的进程，西方国家不断增加给蒙古的经济援助。据不完全统计，1991年至1997年西方国家给蒙古的无偿援助、低息贷款、物资援助等已经超过了20亿美元。

西方国家在援助蒙古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1) 援蒙国和国际组织不断增加。在美、日等国家的带领下，德国、法国、韩国、意大利、丹麦等国家先后加入了援蒙的行列。除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教科文组织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联盟和世界卫生组织等也都积极参与了对蒙古的援助。由日本牵头每年在东京举行的国际援蒙会议的成

员国已经由十几个增加到了 20 多个。(2) 援助范围扩大, 援助金额增加。以往对蒙古的援助偏重救济。近几年已更多地投向了蒙古的相关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如采矿业、能源、航空、交通、通信和改造供水、供电设备等。援蒙金额有大幅度增加的趋势。在近 7 年提供的约 20 亿各种类型的援助中, 有约 5 亿美元是在“民主联盟”政府执政以后的一年多的短时间里提供的。(3) 投资额度加大。1995 年以前, 中国、俄罗斯的投资和同蒙古的合资企业在蒙古曾名列前茅。但 1996 年“民主联盟”政府执政以来, 西方国家对蒙古的投资额度逐年加大。美国对蒙古的石油和铀矿的开采、能源、航空和通讯的投资有了明显的增加; 日本对蒙古的矿山改造、旅游业和外贸中介等行业兴趣浓厚。蒙古吸收的外国投资的一半来自日本。德国也不甘落后, 目前在蒙古的合营企业已经有 20 多家。(4) 逐渐渗透并操纵蒙古的经济部门和发展进程。有迹象表明, 来自日本、美国和德国的经济专家分布在蒙古的各个经济部门, 他们经常参与蒙古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蒙古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 一方面, 当前蒙古的经济发展如果离开了西方的经济援助, 恐怕是寸步难行; 但另一方面, 如果仅仅依靠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 蒙古的经济也很难走出困境。

4. 蒙古经济复苏缓慢, 前景不容乐观。

1990 年以来, 由于政治体制的急剧变化, 蒙古政局中的不稳定因素一直存在。多党制实行后, 政党之间争权夺势的斗争和政权的更迭, 必然影响到经济改革的进程。因此, 尽管人革党政府和“民主联盟”政府都为挽救蒙古的经济危机作出了不少努力, 国家已先后颁布了私有化法、银行法、税收法、海关法、外国投资法、公司法、土地法和公平竞争法等一系列法

律和法规，但直到1997年底，蒙古经济的困难状况都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民主联盟”政府提出的当年经济增长5%—8%的目标没有完成，其激进的改革措施收效甚微，除了畜牧业和个别基础工业略有增长外，其他情况均不乐观。财政金融状况未见好转，对外贸易略有萎缩，粮食产量有所下降。失业人口增加，贫困化现象更加严重。物价涨幅居高不下，人民生活负担加重。社会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加上蒙古经济基础落后，产业结构不很合理，新的经济体制及相关法规尚不健全，资金和原材料严重匮乏，能源供应不足，设备和技术老化，投资环境不够完备等原因，从总体上讲，蒙古经济回升势头相当缓慢，很难在短期内从根本上摆脱困境。

五、“多支点”的外交走向

蒙古剧变后在对外关系上呈现出背靠西方，交好南北两大邻国的“多支点”外交走向。

蒙古自90年代初选择了离弃社会主义制度，投向西方“自由民主”思潮以来，以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为楷模的发展方向就成为了必然。在西方国家支持下上台的“民主联盟”政府，虽然也强调重视对华、对俄关系，但在加强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方面，明显加大了力度。蒙古从其安全战略及经济利益的需要出发，认为西方国家才是对其国家和民族利益“最为有利的合作伙伴”。因此，蒙古把美国放在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地位。“民主联盟”政府新任总理恩赫赛汗一上台就表示：“加强同美国的关系是蒙古外交最重要的任务。”该联盟的施政纲领指出：“为了通过政治手段保障国家的安全，为了巩固蒙

古的政治民主和顺利进行经济改革，蒙古必须把全面发展同美国的关系作为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支柱。”蒙古议会议长和政府总理上台后不久即访问了美国。从政党角度讲，朝野3大政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也都出访了美国。他们均把蒙美友好关系看作是在蒙古建立民主与自由社会的可靠保障。日本等西方国家也积极参与了在政治上对蒙古施加影响。有消息说，为了给蒙古的“民主力量”以政治支持，1997年蒙古进行总统选举前后，日本向蒙古的“民主力量”提供了2000万美元的援助，以增强他们对付人革党的实力。

蒙古在发展同西方国家政治关系的同时，在军事合作领域也有了新的进展。“民主联盟”政府上台后不久，美军就向蒙军提供了50万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蒙、美军方的高层互访、联合军事演习、情报交换和人员培训等都有了一定的规模。蒙古同日本自卫队也建立了包含经济因素的军事关系。德国于1997年8月出资为蒙古军队举办了干部培训班。显然，西方国家对蒙古的政治、军事援助已经超出了“扶贫”的范畴，其政治目的与战略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蒙古在经济方面对西方国家依赖程度的加深，前文已有叙述，在此就不赘述了。

虽然“民主联盟”政府在外交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把同美、日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但出于其政治、经济特别是经贸方面的需求，仍然很难忽视同南北两大邻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近年来，“民主联盟”政府在调整其对外关系时，明显加重了对华关系的分量。蒙古新总统巴嘎班迪上任时，强调蒙古同中、俄两大邻国的关系，仍然是蒙古对外关系的两大支柱。这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蒙古过于倒向西方的外交政策。因此，中蒙两国关系自90年代以来，并未因蒙古

国家性质和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两国关系在总体上保持着正常的发展趋势。政治、军事、经济和经贸领域的交往逐年扩大。两国国家领导人、政府总理和议会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互访不断。

附：

一场离奇的“社会主义”试验 ——柬共式“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

在苏东剧变之前大约10年，柬埔寨共产党（简称柬共，又称红色高棉，后又称民柬）推行极“左”路线，实行以不要城市、不要商品、不要货币、不要工资、不要学校、全民实行供给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由于种种内外原因，结果于1979年“亡国”，1981年“亡党”（失去全国政权后柬共被迫宣布“解散”，改为“民柬方面”从事活动）。1992年柬埔寨四方签订巴黎和平协议后，1993年柬埔寨举行大选，但民柬拒不参加，继续从事反政府游击活动。后来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民柬内部发生严重分裂。1997年7月，民柬最高实权人物波尔布特被民柬内部公审判处“终身监禁”。1998年4月14日民柬总部被其起

义军和柬埔寨政府军攻占，15日波尔布特病故，红色高棉以彻底失败告终。邓小平同志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① 研究柬共的这段历史，研究其失败的原因及教训，对于全面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红色高棉”运动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事件。柬埔寨共产党所领导的运动，曾在抗美救国斗争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为柬埔寨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做出了贡献。但在抗美救国斗争中取得全国胜利并建立民柬政府后，却因严重路线错误、政策失误而使国内怨声载道，国际上声名狼藉，以致不到4年即政权易手，再度落草为寇。此后，在抗击越南攻占的斗争中又曾有过短暂的中兴时期，但后来又拒绝参加大选，而占山为王，苦苦挣扎，以致最终未摆脱失败的厄运。“红色高棉”运动成也有因，败也有因，其留下的历史教训令人深思。

一、柬埔寨近半个世纪的内忧外患

柬埔寨领土面积1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000多万，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柬埔寨于公元1世纪建国，1863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940年9月被日本占领。1942年西哈努克继承王位。1945年日本投降后，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西哈努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克国王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为争取柬埔寨独立而斗争，同时印支三国人民也对法国殖民者展开了凌厉的攻势，迫使法国于1953年8月同意柬埔寨独立，并同柬埔寨签订了移交军队、警察和司法协定。同年11月9日，柬埔寨宣布独立。在1954年7月召开的关于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上，与会各国一致认为柬埔寨应成为一个独立和中立的国家，迫使法国同意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同年9月美国在马尼拉拼凑了一个侵略性的军事联盟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并多次压柬埔寨参加此条约，遭柬埔寨王国政府拒绝。1955年3月20日，西哈努克“逊位”，由他的父亲苏拉玛里特担任国王。西哈努克逊位后，立即成立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人民社会同盟”，并亲自担任主席。该组织在1955年9月全国大选中获胜，组成了以西哈努克为首相的王国政府，执政至1970年3月。1970年3月18日，美国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政权。西哈努克奋起反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同柬共一起开展抗美救国斗争，于1975年4月17日解放了柬埔寨，建立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民主柬埔寨。1979年1月7日，越南应由柬共分裂出来的韩桑林、谢辛和洪森派的要求，派军队攻占柬埔寨，建立以韩桑林、谢辛和洪森为首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后改称柬埔寨国）。从此，民柬再次联合西哈努克和宋双开展反对外来武装干涉的斗争。1991年10月23日柬埔寨四方（民柬、西哈努克、宋双、洪森）签署巴黎和平协定。1993年5月柬全国大选后，成立了柬埔寨王国政府。但民柬拒不参加大选，继续从事反政府活动。

二、柬共的成立和初期的活动

据柬报《柬埔寨之光》、《人民报》刊登的波尔布特答南斯拉夫记者问的文章说，柬共源于1930年成立的印度支那共产党。1945年6月印支共中的柬籍党员在柬成立了“高棉伊沙拉武装小组”进行抗法斗争。1951年2月，印支共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解散印支共，由越、老、柬3国分别建立党组织。同年6月28日，柬籍共产党员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高棉人民革命党”。1954年印度支那日内瓦会议后，法国军队撤出印支，高棉人民革命党就将武装斗争转为政治斗争。该党的一部分党员及其领导下的部分武装力量撤到越南北方，另一部分党员留在柬埔寨成立了公开合法组织“人民派”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维护民族独立、保卫和平与中立。1959年，该组织遭到破坏，损失惨重，1960年9月30日，高棉人民革命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重建党组织，将高棉人民革命党改称“高棉劳动党”，波尔布特当选中央常委。1963年，该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波尔布特当选为中央书记。自此，该党走上了由波尔布特主宰一切的长达30多年的由兴到衰的道路。

波尔布特究竟是何许人？这里不妨简要作个交待。波尔布特原名沙洛特绍，又名布特，1925年出生在柬埔寨磅通省一农民家庭。小时在农村寺庙读书，后到金边上中学。初中毕业后，考上电工技校。1949年官费留学法国。在法期间参加了柬法学生组织的一个马列主义小组。1951年加入法共。1953年回国参加反法武装斗争。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在金边以教

员身份为掩护做地下工作，负责金边和农村的一部分革命工作。1956年，为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1960年柬共一大，被选为中央常委。1961年，任中央副书记。1962年任中央代理书记。1963年转入丛林。在1963年柬共二大上被选为中央书记。1971年柬共三大，继任中央书记。1976年柬共四大，连任中央书记。1976年任民柬总理。1978年柬共五大，再次连任中央书记，1979年12月，任民柬国民军最高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1981年12月柬共宣布解散，建立新的政治组织，即“民柬方面”，但仍基本保持了原柬共的组织系统，波尔布特仍是民柬方面最高领导人。1984年，由原柬共中央常委、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宋成接替波尔布特的职务，波尔布特退居幕后，仍是民柬实际最高决策人。据柬报《柬埔寨之光》报道，1997年6月初，波尔布特发觉宋成通过已归顺政府的两个弟弟与洪森秘密联系后，于同年6月9日晚派人杀死了宋成夫妇及其子孙和警卫共11口人后逃跑。6月20日，民柬电台宣布波尔布特已被抓住。7月25日，红高顽固派以背叛民族、背叛人民罪行判处波尔布特“终身监禁”。1998年4月15日病故。

在60年代，柬共制定了反帝民主革命路线，1968年后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并取得了一定发展。1960年9月30日召开的高棉人民革命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波尔布特将此次大会改为一大），制定了民族民主革命路线，确定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战略任务，把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赶出柬埔寨，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大会通过的党章草案规定高棉人民革命党是高棉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和先锋队，以马列主义为自己的思想基础和一切行动的指南。党的战略目标是完成民族

民主革命，在柬埔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党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为群众服务；支持世界一切革命运动；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支持1960年莫斯科声明和宣言；遵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以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武装自己。1963年2月，该党召开二大，制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路线。随后，柬共中央委员90%下到农村，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成立农业合作社，组织农民进行生产。同时，该党的城市工作委员会也发动工人、知识分子、学生和僧侣展开政治斗争。1964年1月，发动市民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朗诺集团的示威游行。迫使政府于1965年同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1967年，马德望省桑洛地区人民在金边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发动了武装暴动，反对地主霸占土地，反对贪官污吏横征暴敛、营私舞弊。经过这次暴动，该党认为只有进行武装斗争，才能打击敌人，为巩固和发展革命力量创造条件。同时也认为要搞武装斗争，就必须有革命军队。因此，柬共于1968年1月17日成立了柬埔寨革命军（当时各大区的游击队共计不足1000人），并制定了建军路线，按照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建立自己的正规军和游击队；实行正规战、游击战同时并举，但以游击战为主。1968年5月，该党在全国19个省中的17个省开展了游击战。到1970年初，柬共党员增加到近4000人，武装部队也发展到4000人，游击队约5万人，在全国拥有30万人口的游击基地，70万人口的游击区，在东北、西南大区建立了根据地。

三、在抗美救国斗争中取得全国政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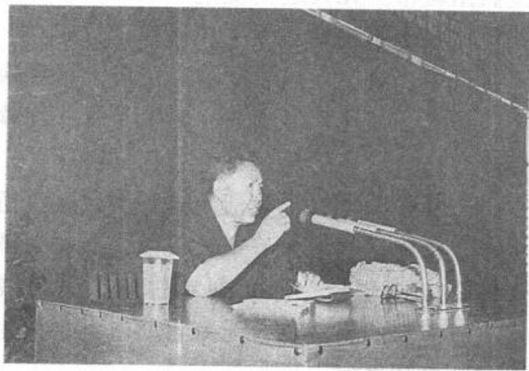
70年代初，柬共利用反美救国形势，结成广泛统一战线，迅速取得全国政权。1970年3月，美国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政府。西哈努克奋起反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柬共联合西哈努克和各阶层爱国力量，进行抗美救国斗争。柬共公开声明支持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愿同亲王一起打倒卖国贼，把美国赶出柬埔寨。随后，柬共参加了西哈努克组建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柬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柬共领导成员乔森潘被任命为民族统一阵线政治局委员、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兼国防大臣，柬共中央常委英萨利作为柬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派驻北京特使，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首相合作，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不久，王国政府就得到50多个国家承认。柬埔寨在国内的王室成员和学生也都纷纷投奔柬民族统一阵线或国内解放区参加战斗。

这期间，柬国内的武装斗争也如火如荼。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武装起义。1971年6月，柬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任命乔森潘为柬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同年9月，该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党名改称柬埔寨共产党。波尔布特连任中央书记。到1971年7月，柬解放区已扩大到占全国土地的85%，人口增加到500多万。1975年4月，柬共武装力量总兵力发展到20万人，柬共党员4万人。1970—1973年，尽管美国每年向柬右派提供2.5亿美元的援助，1974年美援增加到6亿美元，但也没有挽救美国及其仆从在柬失败的命运。1974年6月，柬共召开中央会议，决定

发动解放全国的大决战。1975年3月，柬共在首都金边周围集结了90个营的兵力。同年4月1日，解放了通向首都的战略要地湄公河上的乃良渡口。当天，美国用直升飞机把朗诺接到夏威夷。4月12日，美国驻金边大使迪安和美军司令部指挥官狼狈逃出金边。4月17日，柬共革命军攻进金边，解放了柬埔寨，建立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民主柬埔寨，标志着柬共已掌握全国政权。

四、胜利后迅速推行极“左”的“社会主义”

胜利后，柬共抛开昔日共同斗争的盟友而独揽大权，推行了一条极“左”的路线。1975年4月17日红高解放首都金边后，立即召开特别国民大会，提出把柬埔寨建设成为一个“没



1975年柬共取得全国政权后，波尔布特号召搞“超大跃进”。

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全体人民幸福生活，团结协作从事劳动，共同保卫国家”的理想社会。1976年初，无视柬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宪法形式规定：“柬埔寨是工人、农民和一切其他劳动者的国家”，“一切主要生产资料属全民和集体所有”。同年1月召开的柬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脱离实际地将“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在柬埔寨实现共产主义”确定为柬共的战略任务。为此，柬共立即实行以不要城市、不要商品、不要货币、不要工资、不要学校、全民实行供给制为特征的兵营式“社会主义”。从而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不要城市，把居民撤到农村。为了改造社会，改造富人，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了缩小三大差别；为了解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以及干群之间的矛盾；为了粉碎敌人的复辟计划，把城市居民统统赶到农村去。柬共利用人们害怕美国B52轰炸机的心理，散布美国要炸毁柬城市的谣言，紧急动员市民撤出城市。几天之内就把金边200多万居民全部撤到农村，其他城市也不例外。

在撤民过程中，许多人风餐露宿，传染上各种疾病，因无医无药病死、饿死。居民们撤出时，只随身带些细软物品，其余财产全被剥夺归公。不管他们过去担任何种职务，都一律强迫干农活，过着原始公社式的生活。这种撤民政策留下的严重后遗症迄今难以消除，许多家庭亲人失散，无法团圆，在心灵上造成了创伤。1979年后，原撤到农村的市民回城，许多人的房屋已被有权有势的人进驻，无家可归，不少人为抢占房屋相互厮杀，结下世代冤家。

（二）在农村推行极端平均主义的政策，盲目扩大合作社规模，让社员过兵营式生活。把城市居民全部安置到合作社，

按阶级成份、年龄、性别编组劳动，凡地主、富人由自己动手盖新房，凡贫苦农民由当地驻军支援。对官僚、资本家、伪军及其家属则强迫劳动。原自然村的农户迁移他处。实行财产公有、平均分配，过兵营式的生活。合作社的人像军队一样编制，男女老幼都一律穿黑色衣服（由国家统一发的服装，后来人们称民柬为“乌鸦队”），青年男女编组，过集体生活，吃大锅饭，已婚青年半月探亲一次。六七岁的孩子就让离开父母，组成儿童团过集体生活，放牛或养鸡鸭或学认字、算数等。民柬领导人说，这样做可以减少家庭私有观念，让小孩从小就不认识钱和佛祖，对今后成长有好处。此外，还把老太太、老头也编成组，老年妇女组负责看管小孩或养鸡鸭，老头组负责竹、藤编织等。农业合作社的农具、耕畜，过去社员饲养的家禽和房前屋后种的果树、蔬菜等一律归集体所有。一般按饭锅大小限定开饭人数。每年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标准留口粮、种子和储备粮 320 公斤，其余粮食全部上交国家。国家把上交的粮食中的一部分作为生产资料统一发给合作社用于购买农具，另一部分作为合作社与国家交换工业消费品用。日用品由合作社按实际可能进行分配。乡与乡、县与县甚至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物资和劳动力互相支援，不计价酬。柬共领导人称这样做，就可以消灭人们的私有观念。

柬共还要求全民每天早出晚归，大力兴修水利、种水稻，其口号是：“有了稻便有了一切”。但每天只让吃两餐饭，故民众对此消极对抗，因此水稻收成很低，有些地方靠吃香蕉充饥，许多人营养不良病死。有的人被迫偷偷逃跑，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到 1977 年，全国拥有 700—1000 户的大型合作社，已发展到占全部合作社的 50%，大多数已发展为一乡一社。

(三) 无视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阶段，实行无商品、无货币、无工资，财产公有、平均分配的全民供给制。波尔布特曾说，“有了货币，就会滋长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容易产生资产阶级思想。”“没有货币有利于思想革命化，断绝追求私利之路。”在“一切推倒重来，消灭三大差别，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的口号下，柬共从1972年开始，就在解放区逐步取消货币流通，实行原始的实物交换方式。当时，由于正处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生活尽管艰苦，但大家也都能忍受，做到一致对外。1975年掌权后，柬共仍沿用这种办法，把私营工业、商业全部收归国有，学校、寺庙全部关门。用简单的行政命令来处理商品、金融、流通和社会发展的极其复杂的关系。而且还认为从旧社会过来的工人、技术员受旧社会恶习影响太深，难以改造，必须重建一支新的工人阶级队伍，用军队战士取而代之，还把大批知识分子打倒，甚至强迫和尚也去接受劳动改造等。恢复经济所需的各种人才被一扫而光，工业、商业、农业、医院等无人管理。结果事与愿违，导致国家经济彻底崩溃，人民生活极端困苦。

柬共还企图在几天内“彻底改变”、“全部废除”柬2000年遗留下来的传统思想、风俗习惯，实行由组织择偶成婚。柬共规定，为了缩小三大差别，知识分子间不准通婚，必须找工农或战士。同时不允许男女青年不通过革命组织，私下自由恋爱。如发现男女之间有些暧昧，就调离。还规定干部和荣誉军人可以优先选择对象，优先结婚。例如贡布水泥厂有位领导，战时负伤，就由省委找了3个对象，由他挑选其中一人。有些由组织包办的婚姻，在领导人主持集体结婚典礼对号入座时，才看见对象是啥模样。

柬共军队进金边时群众敲锣打鼓迎接，以为把美帝及其傀



柬共将城市居民迁到农村从事集体劳动，
这是兴修水利的场景。



这是在集体种水稻。

儻赶走了可以过安定太平的日子了。可万没想到柬共胜利后采取的这一切作法给柬埔寨人民带来了沉重苦难，抗美救国战争时期形成的民族凝聚力毁于一旦。

（四）过河拆桥，抛弃盟友，自毁统一阵线。1970—1975年，柬共同西哈努克、宾努、王室成员和在国外留学的学生组成了广泛的柬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抗美救国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解放后，柬共却采取了过河拆桥的办

法，将阵线和政府其他成员全部送往农村劳动，有的人甚至惨遭杀害，致使统一阵线夭折，未能在解放后的国家建设和抵御外敌侵略中发挥作用。

(五) 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作茧自缚。1976年，世界上有86个国家承认民柬政府，而民柬只同其中12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77年，民柬宣布除中、朝、老挝外，其他驻柬使馆一律关闭。因此，1979年初，由于得不到国际社会应有的关注和支持，越南军队遂悍然攻入柬埔寨并长驱直入，几天之内就攻占了柬埔寨。

(六) 大搞“肃反”，滥杀无辜，激化内部矛盾，造成众叛亲离的恶果。柬共在执政短短3年多时间就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并宣称先后破获了越南、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和台湾国民党等4个特务系统。在中央党政机关、8个部委、5个大区和一个特区的一大批干部被清除，其部下和亲属受株连。总参谋部负责人除宋成（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外全部被处决。跟随柬共革命多年的华侨、华裔干部亦少有幸免。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署后撤到越南北方的柬军政干部近千人，在1970年“3·18”政变后陆续回国参加抗美救国斗争后几乎被一扫而光。

在肃反运动中，秘密特工用残暴的手段大搞逼供讯，凭主观臆断乱抓乱杀。每肃掉一位负责人，他们家属、部下、战友几乎全部受株连，统统被杀掉。这种滥杀无辜的行径弄得人人自危，草木皆兵。同时在敌人的反间计面前，自相残杀屡有发生，受害者不计其数。西方报道说柬共在此期间杀了200多万人。虽难核准，但被害人数确实惊人，致使柬共力量遭到极大削弱，内部矛盾急剧恶化。

1978年5月，在柬东部大区发生了反对波尔布特独裁统

治的武装叛乱。此次叛乱被镇压下去后，其主要领导人原柬共东部大区执委会委员、第四师师长韩桑林、第二十区党委书记谢辛、第二十一团团团长洪森等人逃往越南，并于同年12月2日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随后这66名脱离柬共的党员召开大会，通过了救国纲领，决定推翻波尔布特统治，并请求越南帮助。1979年1月7日，20万越军大举入侵，推翻了柬共领导的民主柬埔寨政府，酿成“亡国”悲剧。1980年柬共余部退到柬泰边境地区开展抗越游击战，虽在西北山区站稳了脚，但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不得不于1981年12月6日宣布解散柬埔寨共产党，建立新的政治组织，即“民柬方面”（简称民柬），又造成了“亡党”的结局。

五、失败后继续坚持极“左” 路线，导致彻底失败

柬共的极“左”路线所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在不到4年的时间内，丢失了政权，不仅亡党亡国，而且声名狼藉。但是他们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继续推行极“左”路线。

柬共败退到柬泰边境从事游击活动。1982年7月9日再次同西哈努克亲王及宋双领导的两支抗越力量联合，组成了民柬联合政府。1984年波尔布特退居二线，由宋成接替，但民柬最高领导层仍是原柬共中央常委原班人马，波尔布特仍作为最高决策人掌握实权。他们继续推行极“左”政策，视统战工作作为权宜之计，无视知识分子的作用，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需要时就用，不需要就一脚踢开。越南攻占柬后，民柬竭力号召柬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抵抗。由于柬国内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

矛盾，过去逃往国外的一些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以民族利益为重，对波尔布特等既往不咎，再次投身救国斗争，使民柬力量有所恢复，兵力一度恢复到6万人。然而民柬因担心这些知识分子篡夺他们的领导权，又把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如吉春、秀木等弃置不用。致使这批人中的一些人再次奔向法国，另找出路。民柬轻视西哈努克的影响和作用，把西哈努克当成装饰品，对宋双亦是防范多于合作，总想通过军事手段东山再起，独家掌权。在领导层内部搞家长制，一言堂，对持不同意见的人采取调整、排斥、打击、甚至暗杀的做法。在干部政策上，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因而，民柬联合政府内部，甚至民柬领导层内部都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

越南1989年从柬埔寨全部撤军，1991年10月23日民柬与西哈努克、宋双及洪森四方签署了关于政治解决柬问题的巴黎和平协定。在新形势下，民柬继续执行极“左”路线，最后拒不参加全国大选。1992年11月30日，民柬宣布成立柬埔寨民族团结党，准备参加大选。但由于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联合国驻柬临时权力机构偏袒洪森，“大选将是把柬埔寨拱手送给越南侵略者和向越南在金边扶植的政权提供合法外衣的一种途径”，决定不参加1993年全国大选。错失良机后仍继续攻击柬大选产生的新政府，并把力量分散到各地进行游击战，与政府对抗。因此，1994年7月7日，柬国会通过认定民柬方面为非法组织的法案。7月10日，民柬宣布在柏威夏省成立民族团结救国政府。

自此，民柬又全盘恢复极“左”政策。80年代初，民柬曾宣布过一些新的经济政策，如实行个体私有制和提倡家庭手工业生产等，在柬泰边境地区曾出现过自由贸易活动。可是后来又担心这样会滋生私有观念，为敌特活动提供有利条件，影

响支前和动摇军心，于是就加以限制或取缔个体经济，要求把一切私有财产全部上交中央司令部。农业是唯一允许谋生的手段，一个由中央控制的商店成了民柬控制区人民购物的唯一去处。长期生活在丛林作战的民柬官兵及其家属、群众对此日益不满、厌战，向往自由的生活。

在此情况下，民柬内部开始发生分裂。先是一部分军队和家属投向政府方面。1996年1月26日，民柬中央常委、驻守在奥拉山地区的民柬国民军第18师师长兼磅士单、磅清扬、菩萨、茶胶和戈公5省游击队总指挥盖乌邦率350名军人及其家属向政府投诚。

随后，主要领导人英萨利脱离波尔布特独立。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民柬认识不到盖乌邦此举的严重性，对所施行的极“左”政策毫无反思之意，反而变本加厉地坚持军事优先的强硬路线和顽固坚持“战时共产制”，实行封闭式的统治。据柬报《柬埔寨之光》和《华商日报》报道，民柬原副总理兼外长英萨利主张在保持军事力量的同时，也应重点开展政治斗争，让大家有权参加政治；在经济上主张自由民主体制，人们有权拥有自己挣来的财产，但民柬主要领导根本不予采纳。于是两派尖锐对立，导致内部第二次严重分裂。英萨利所控制的驻守在拜林市的415、450师，于1996年8月宣布独立。不久，民柬总兵力的70%及其家属、群众约10万余人也都归顺了政府。英萨利这一举动，在政治、经济和心理上对波尔布特派造成了巨大冲击，对波的离心倾向不断增加。

接着，高级领导人宋成开始动摇。长期紧跟波尔布特的宋成也开始寻找出路，通过已归顺政府的两个弟弟与政府秘密联系，准备与波尔布特分道扬镳。不慎此事被波尔布特发觉，他遂派人于1997年6月9日，杀死了宋成夫妇及其子孙和警卫

11人。此残暴之举激起公愤，同年7月25日，红高在安龙文召开大会公审波尔布特，判处波终身监禁，并宣布波尔布特运动至此结束。由红高第三号人物努刚继续领导余部开展游击战。

1998年3月26日，红高驻守安龙文地区的5个师约1500名官兵及4000余群众归顺政府，4月14日，政府军和投诚部队攻占了红高总部安龙文，努刚等人下落不明。4月15日，波尔布特病故，至此，红高终于宣告终结。

六、失败的根本原因

柬共的失败虽然有内外多重原因，但根本原因还在自己内部，在于党的领导人的极“左”路线。当时中国领导人对柬共及时提出了不少正确的忠告，他们始终听不进去。

柬共胜利后刚两个月，即1975年6月，中国有关方面曾向他们善意表示过：你们把金边300万人撤到农村，国际上很多人就不理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还要利用他们。人民需要他们的产品，他们受了损伤，人民的生活就要受到影响。工业再进一步发展，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恐怕就比较困难了。考虑经济建设就必须考虑财政、金融、商业政策，否则，血脉不通就很困难。全国解放后，总得办教育，搞科学研究……

1975年10月在纽约召开第三十届联大前，柬共派乔森潘、英萨利夫人英蒂丽作为特使前往北京邀请西哈努克亲王返回金边。回国前，他们去向周恩来总理和毛主席辞行时，周总理对乔森潘等人温和地告诫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如果犯了错误，就必须对由此引起的灾难的后果负责。我们想对你们提

点建议：不要企图通过一个大跃进就想达到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稳步前进。你们的目标并不是要立即实现共产主义，而是逐渐地向社会主义迈进。如果你们抛开谨慎和明智的作法，那肯定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周总理还说：共产主义应当是给人民带来幸福、繁荣、主权和自由。如果有人想通过短短的一跳就完全实现共产主义，而不顾人民的思想状况及民族的现实，那肯定把人民和国家拖进灾难的危险。我们中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提醒你们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毛主席对乔森潘和英蒂丽说，请转达他的意思给国内领导人，不要虐待莫尼克公主和她的两个儿子，不要强迫他们去干重体力劳动。^①

后来的事实说明，柬共领导人对这些劝告，根本没听进去，他们仍然坚持极“左”的一套，失败是必然的。

^① 杨木著：《西哈努克国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189页。

第7章

坚持“主体的社会主义”的朝鲜

苏东剧变后，朝鲜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形势下，坚决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阴谋，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原则。1994年7月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这对朝鲜人民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他们在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领导下经受住了这一考验，坚持进行“主体的社会主义”或“朝鲜式的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没有“统一的模式”，各国人民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衷心希望朝鲜人民在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大胜利。读者们一定想了解什么是“主体的社会主义”或“朝鲜式社会主义”，本章根据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著作和讲话，以及朝鲜报刊的报道，客观地作些介绍。

朝鲜本世纪初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朝鲜人民在金日成同志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1945年8月获得解放,同年10月10日在平壤召开党的成立大会,组成北朝鲜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1946年2月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成立,随即完成了土地改革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同年8月北朝鲜共产党与朝鲜新民党合并成立北朝鲜劳动党。1948年9月9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宣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6月北朝鲜劳动党同南朝鲜劳动党合并,发展成为朝鲜劳动党。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位于朝鲜半岛的北半部,面积为12.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2300万。境内多山,山地面积占80%,水产资源和地下资源丰富,有200多种有用矿物;平原较少,大部分集中在西部沿海一带。首都平壤有人口200多万。

朝鲜人民在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45年以前朝鲜是个殖民地,朝鲜北部的民族资本不足6%,工矿企业总资本的94%掌握在日本垄断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手里。1950年爆发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深重灾难。1953年7月停战后,朝鲜在一片废墟上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其成绩得来不易。据报道,朝鲜工农业增长速度一直较高,如1978—1984年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达12.2%。1953—1986年间,电力由10.2亿度增至520亿度,煤炭由71万吨增至7800万吨,钢由0.4万吨增至673万吨。1944年全年生产的工业品,到1977年只需5天就能生产出来。1953—1984年间粮食由232.7万吨增至1000万吨。农业实现了电气化和水利化,机械化和化学化也有很大进展。随着工农业的发展,人均

国民收入逐年增加。据朝鲜公布的资料,1975年超过1000美元,1979年为1920美元,1986年达到2400美元。文教卫生事业也有较大发展。解放前80%的人口为文盲或半文盲,学校只有中小学,连一所大学都没有。目前有280多所大专院校,全国知识分子有180多万,其中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约20万人。从1959年起实行免费教育,1975年起实行11年制义务教育。1953年起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人民健康水平大大提高,人均寿命由解放前的38岁提高到74岁。目前,朝鲜人民正在贯彻执行“思想上树立主体、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的路线,为建设“主体的社会主义”即独特的“朝鲜式社会主义”而奋斗。

一、朝鲜式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主体思想”

朝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反对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坚持自主立场和创造性立场,“树立主体”。1955年底,金日成同志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到要克服思想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时,第一次提出要树立“主体”的问题。十年后,即1965年4月,金日成同志在印度尼西亚“阿里亚哈姆”社会科学学院的讲话中,首次公开提出“主体思想”的概念。1970年11月朝鲜劳动党五大规定:党的坚定不移的指导思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体现于朝鲜现实的主体思想”。1980年10月劳动党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朝鲜劳动党“以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思想——主体思想作为唯一的指导方针”。因此,朝鲜式社会主义是与“主体思想”密不可分的,它在各个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点。所以,要了解朝鲜式社

会主义,先要弄清什么是主体思想。

(一)金日成同志对“主体思想”的阐述

究竟什么是“主体思想”?现根据金日成同志自己的权威性解释介绍如下。

五六十年代,金日成同志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丢掉依赖心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一切问题。因此,他把“主体思想”概括为“在思想上树立主体,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认为“主体思想”是“直接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体现于朝鲜的现实”。

——1955年12月,金日成同志对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人员说,“我们的宣传工作在许多方面陷入了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不深入钻研各种问题,没有主体,这是思想工作中的最主要的缺点。”“朝鲜革命,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工作的主体。”“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创造性的学说。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加以运用的时候,才能发挥它的战无不胜的威力。”

——1963年10月,金日成同志在金日成军事大学第七期毕业典礼上说:“目前,我们党的口号是:在思想上树立主体,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在思想上要彻底树立主体。换句话说,就是所有的人都要有为朝鲜革命服务的主体思想。”

——1965年4月,金日成同志在印度尼西亚“阿里亚哈姆”社会科学院演说时说,“树立主体,这意味着坚持这样的原则:独立地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并且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一切问题。这是反对教条主义,并根据本国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国际革命运

动经验的现实的创造性的立场。这是丢掉对别人的依赖心理，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坚持自己负责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自主的立场。”“每个党在本国的具体环境和条件下进行革命斗争，并通过这一斗争丰富国际革命运动的经验，为进一步发展这一运动作出贡献。主体思想是符合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种原则的，是直接来自这一原则的。”

——1967年12月，金日成同志在朝鲜第四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发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政纲》中指出，“我们党的主体思想，是有效地进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是共和国政府的一切政策和活动的坚定不移的指针。”

——1970年11月，金日成同志在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说，“我们党的革命思想——党的唯一思想的精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体思想。”“树立主体，一句话就是以主人的态度对待本国的革命和建设。这意味着坚持自主的立场，也就是说，丢掉对别人的依赖心理，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相信自己的力量，发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自己的问题任何时候都要自己负责解决；同时还意味着坚持创造性的立场，也就是说，反对教条主义，根据本国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他国的经验。主体思想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的，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发展阶段及其必然要求的反映而产生的。”

因此，1970年劳动党五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把主体思想定义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体现于朝鲜的现实”。又过了两年，1972年12月通过的朝鲜社会主义宪法也规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现实的朝鲜劳动党的主体思想作为自己活动的指针。”

70年代以来,金日成同志强调主体思想是“以人为主的哲学”。他说:“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这是主体思想的基础”,“一切都要以人为中心来考虑,一切都要为人服务,这就是主体思想的要求。”“主体思想”是“我国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 and 理论的总结”,是“实现劳动人民群众的自主性为目的的革命学说”。

——1972年9月,金日成同志答日本《每日新闻》记者问时说:“用一句话来说,主体思想就是认为革命和建设的主人是人民群众,推动革命和建设的力量也在于人民群众这样一种思想。换句话说,就是认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是自己本身,开创自己命运的力量也在于自己本身这样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并不是我们最先发现的。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论谁都是这样想的。我不过是特别强调了这种思想。”“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这是主体思想的基础。”“一切都要以人为中心来考虑,一切都要为人服务,这就是主体思想的要求。”

——1975年10月金日成同志在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主体思想是以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这一哲学原理为基础的。主体思想科学地阐明了人在世界上所占的地位和作用,从而给予人们对于自然与社会的最正确的见解,给予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有力的武器。”“主体思想是以劳动人民群众为中心加以阐述的革命理论,是以劳动群众的作用为基础的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我国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 and 理论的总结——主体思想,极其丰富,它包括了对自然和社会进行改造的所有领域的革命理论,对革命和建设中的一切问题做出了正确的解答。”“在长期艰苦的抗日革命斗争过程中,主体思想产生并发展和丰富起来,朝鲜共产主义运动中树立了主体的思想体系。”

——1980年10月，金日成同志在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说，“主体思想是一切都要以人为中心来考虑，一切都要为人服务的、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是以实现劳动人民群众的自主性为目的的革命学说。”

——1981年10月，金日成同志在答加纳政府机关报《加纳时报》总编辑问时说，“主体思想，是以人为主的哲学。这意味着主体思想是把人放在哲学观察的中心，以回答人的命运问题为使命的哲学”。“主体思想所观察的社会人的本质属性，是自主性和创造性。”

——1982年6月，金日成同志在答外国通讯社社长问时说，“人由于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才成为世界上占有特殊地位和起着特殊作用的存在。”“主体思想要求劳动人民群众应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革命和建设，思想上树立主体，实现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和国防上自卫。”

（二）金正日同志对“主体思想”的进一步阐述

自70年代以来，金正日同志在讲话和著作中，对主体思想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主体思想已形成“主体的思想、理论、方法的完整的体系”，并称之为“金日成主义”。他强调主体思想是“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框架内解释的独创的思想”。他说：“主体思想”是以唯物辩证法“为前提”的，二者“具有共同性”，但同时又克服了唯物辩证法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近年来他进一步强调，“主体哲学”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根本区别”的。“先前的社会主义理论，只把物质经济的因素看作革命斗争的根本条件”，主体思想“把社会主义提到了新的科学基础之上”，从此“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主体时代”。

——1976年10月，金正日同志在同党的理论宣传工作者

的谈话中说,“无论从内容上看还是从组成来看,金日成主义是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框架内解释的独创的思想。”“形成金日成主义的精髓的主体思想,是人类思想史上新发现的思想。”“主体思想的哲学原理,是不能在唯物辩证法的框架内解释的。”“其社会历史原理不能按唯物史观来解释”。“金日成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区别的独创的革命思想。”

——1982年3月,金正日同志在《关于主体思想》一文中说,“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为已登上斗争舞台的工人阶级指明了历史使命和解放的道路,推动了反对资本的斗争,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已变为帝国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发展,提出了列宁主义,从而鼓舞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投入了摧毁帝国主义堡垒、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开辟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端。(金日成)主席深入洞察到曾备受压迫和歧视的人民群众已作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而出现的新时代的要求,创立了伟大的主体思想,从而使人民群众争取自主性的斗争发展到新的更高阶段,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主体时代。”

“主体思想是以人为中心的新的哲学思想”,“是以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这一哲学原理为基础的”。“人是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的社会存在。”“自主性,是作为社会人要求成为世界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而自主地生活和发展的属性”;“创造性,是社会人有目的、有意识地改造世界,开拓自己命运的属性”;“意识性,是社会人决定自己的认识并改造世界和自己本身的一切活动的属性。”“人类历史是人民群众为自主性而斗争的历史”,“在革命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群众的自主的思想意识。”“主体思想,在以唯物主义原理阐明了世界的本原问题的

前提下,又崭新地把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提了出来,对世界的主人是谁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历史上有过各种类型的世界观,但未曾有过以人为中心来阐明对待世界的观点和立场的。”

——1986年7月,金正日同志在《主体思想教育的若干问题》中指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把人放在世界的主人地位上阐明世界的本质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以人为中心的哲学世界观。有些人一听到说主体思想是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就以为是无视客观世界,只片面地重视人的主观欲望或愿望。这种看法是大错而特错的。我们是说要以人为中心来看世界,从未说过只要看人。”金正日同志认为,以往的哲学原理只是“阐明物质世界的一般特征,但无法阐明人在世界上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而主体哲学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理为前提,“科学地阐明了人在物质世界中所占的特有的地位和所起的特有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唯物辩证法”。

——1992年1月金正日同志在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的谈话中说,“社会的主人不是别的,就是人;人是具有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自主地、创造性地开拓自己命运的社会存在。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意识性的发展水平,决定社会的发展水平;随着人的自主的思想意识和创造能力的提高,社会财富得到增加,社会关系也与之相适应地得到发展。因此,不应该以物质条件为主,而应该以人为中心来观察社会;对社会发展过程,不应该以自然史过程来观察,而应该以社会运动的主体——人民群众自主的和创造性的活动过程来观察。”

——1994年11月金正日同志在《社会主义是科学》中指出,“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先前的社会主义学说,未能摆脱历史的局限性。先前的理论,没有把社会历史运动看作是,由于它的

主体即人民群众主动的努力和作用而发生和发展的主体运动，而把它看作一个主要是由于物质经济上的因素而变化 and 发展的自然史的过程。据唯物史观的原理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越发展，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剥削阶级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敌对矛盾就越激化，以工人阶级为首的革命力量就越成长壮大，因而革命就越趋成熟。先前的社会主义理论，只把物质经济的因素看作革命斗争的根本条件，未能指出加强革命的主体、增强其作用是革命的根本途径。”

“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先前理论的局限性，在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得更明显。”“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的改造工作即思想改造工作是比较创造社会主义物质经济条件的工作更重要的首要任务。只有使人的改造工作领先，才能加强革命的主体，增强其作用，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对客观的物质经济条件赋予决定性的意义，只追求经济建设，而忽视人民群众的思想改造工作，忽视加强革命的主体、增强其作用的工作，就不能正确地进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而且经济建设本身也难免停滞不前。”

“把社会主义提到新的科学基础之上来的历史课题，由于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创立了主体思想，并以主体思想为基础独创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理论，才胜利地得到了解决。敬爱的金日成同志发现了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的哲学原理，崭新地阐明了作为主体的运动的社会运动的规律性，从而把社会主义提到了新的科学基础之上。主体思想阐明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完全实现其自主性的自主事业。”

——1996年7月26日，金正日同志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理论杂志《劳动者》上发表谈话，强调主体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他说：“主体哲学为哲学思想发展建树的

历史功绩,不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而是阐述了以人为中心的新的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论证了物质的第一性与存在的第一性原理,在此基础上阐明世界统一于物质,并依靠物质运动而变化发展。主体哲学则把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即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崭新地提了出来,阐明了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这样一个哲学原理,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开拓人的命运的最正确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重要课题是阐明物质世界的实质及其运动的普遍规律;主体哲学提出的重要课题则是阐明人的本质特点和人的运动即社会运动的固有规律。可见主体哲学及其哲学课题和原理是同先行哲学有根本区别的独创性哲学……主体哲学是阐明了新的哲学原理的哲学,用先行哲学的框框是无法解释的。”

二、“主体的社会主义”的战略思路

在“主体思想”指引下,朝鲜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思路是:

(一)认为要建成共产主义“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实现共产主义并不是那么遥远的将来的事”,“一国能首先实现共产主义”。

——1967年5月,金日成同志在《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中说:“一个国家或一部分地区实现共产主义是可能的。”“所谓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是这样一个社会,它不仅不存在工人和农民的差别,也不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

——1971年12月，金日成同志在全国教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要完全建成共产主义，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实现共产主义并不是那么遥远的将来的事。能不能更快地建设共产主义，完全取决于我们怎样进行斗争。只要全体人民同心协力，做好工作，就能很快地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1986年5月，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中说，“人类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是只有通过实现全社会主体思想化的斗争才能胜利建成的。只有实现了全社会主体思想化，把社会的全体成员都造就成为主体型的共产主义新人，按照主体思想的要求彻底改造社会和自然，才能攻占共产主义的思想堡垒和物质堡垒，才能向人民群众的自主性得到完全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1990年5月金日成同志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九届一次会议上说，“为了完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就要在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以后继续进行革命，占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基本战略目标——思想堡垒和物质堡垒。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同时大力开展攻占共产主义的两个堡垒的斗争，并使攻占思想堡垒的斗争走在前面。”

(二)认为朝鲜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社会主义建设还没有完成”，目前处于“不完全的社会主义”阶段，其任务是“争取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1967年5月，金日成同志对党的思想工作部门的干部说，“并不因为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打倒了资产阶级，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建成了。因此，我们从来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要到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被消灭、中产

阶级特别是农民群众积极拥护我们的时候才能实现。”“当我们促进社会主义建设,把中产阶级完全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当消灭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差别,建成了无阶级社会的时候,可以说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任务。”“当然,并不是过渡时期一结束就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要想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即使过渡时期结束了,也需要继续进行革命和建设,把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水平。”

——1980年10月,金日成同志在劳动党六大上说,“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奠定同完全胜利了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牢固的物质技术基础,大大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样,“我国人民争取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斗争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1986年12月,金日成同志在《争取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一文中指出,“朝鲜已经接近了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转折性界线”。并且说,“要完全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就必须经过一个巩固和发展完全胜利了的社会主义社会,完成共产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经过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再经过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这是合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

(三)在60年代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保证全体人民都过上富裕而文明的生活,号召人民为实现“住瓦房、吃大米饭、喝肉汤、穿绸缎”、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而奋斗。90年代以来,朝鲜更强调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实现人的自主性”,使人们摆脱种种奴役,作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过自主的创造性的生活。

——1961年9月，金日成同志在劳动党四大上说，“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保证全体人民都过上富裕而文明的生活。”

——1962年10月，金日成同志在第三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说，“三四年以后，我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将会发生新的巨大变化。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将生产300万吨稻谷、20万吨肉类和3亿米布匹；到了那个时候，城市和农村新建的新式住宅将达到几十万户。要是这样，我国人民都将住瓦房，吃大米饭，喝肉汤，穿绸缎，过上富裕的生活。”

——1965年4月，金日成同志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完全消灭剥削和民族不平等，并要求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

——1992年1月，金正日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教训和我们党的总路线》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群众做了主人的社会，是靠统一和团结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得以发展的社会。”“如果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人们没有具备集体主义思想，视个人所有重于集体所有，不积极进行共同劳动或没有具备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高度创造性能力，因而没能搞好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就成为没有主人的社会。”

——1994年11月，金正日同志在《社会主义是科学》一文中说，“社会主义是为自主性而斗争的人民群众的思想和革命的旗帜。人民群众的自主性，是依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得到实现的。”“要实现人民群众的自主性，就必须从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过渡到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总结。”

——1997年6月，金正日同志在《在革命和建设坚持主

体性和民族性)中说,“社会主义事业是实现人民群众的自主性,并依靠人民群众的斗争向前发展和得到完成的自主的革命事业。”“国际社会主义事业是通过每个国家的革命取得胜利和发展的过程而向前发展并完成的。只有每个国家的人民当家做主,搞好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胜利前进。”“今后,我们党将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主体的原则和民族自主原则”,“完成主体的社会主义事业”。

(四)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朝鲜一是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二是强调加强和巩固政权,三是强调思想教育,把全体人民团结到党和领袖的周围。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占领“物质堡垒”和“思想堡垒”,而“攻占思想堡垒的斗争要走在前面”。朝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的改造工作即思想改造工作比创造社会主义物质经济条件的工作更重要的首要任务”,要“用革命的领袖观、组织观、群众观武装人们,把全体人民团结到党和领袖的周围,使之成为一个共命运的社会政治生命体”。

——1971年12月,金日成同志在全国教员大会上讲话时说,“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就必须发展生产力,占领物质堡垒,同时还必须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革命化、工人阶级化,占领思想堡垒。”“要想实现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在丰富社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必须进行思想革命,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改造人。当然,搞好经济建设,物质财富丰富了,就能使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但是,只偏重于经济建设一面,而忽视思想革命,不把人们的思想意识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1986年5月,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党对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就是政治领导。党

的政治领导的实质在于：对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进行政策的领导，用做政治工作来发动人们的方法领导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党领导革命和建设，重要的是正确地解决政权问题，在此基础上推进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工人阶级的党只有正确地解决政权问题，才能使人民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才能依靠人民群众无穷无尽的力量有效地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一切问题。”

——1990年5月，金日成同志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九届一次会议上说，“为了完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就要在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以后继续进行革命，占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基本战略目标——思想堡垒和物质堡垒。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同时大力开展攻占共产主义的两个堡垒的斗争，并使攻占思想堡垒的斗争走在前面。”

——1990年10月，金正日同志在《朝鲜劳动党是我国人民一切胜利的组织者和向导者》中说，“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命线”，“是加强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及其作用的决定性保证”，“是按照正确的斗争战略和策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根本条件”。

——1992年1月金正日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教训和我们党的总路线》中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首先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提高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创造能力，使人民群众尽到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的责任，起到主人的作用。”“在物质万能原理起作用的资本主义社会，钱是生命；在人民群众做了主人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说思想是生命。如果人民群众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团结一致，社会主义就会取得胜利；如果人民群众的思想发生了毛病，社会主义就会灭亡。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优越，指的就是思想上的优越性；社会

主义的威力,不外乎是思想的威力。因此,忽视思想革命,就等于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失掉了生命线”。并说,朝鲜劳动党“在进行思想革命中,把重点放在用革命的领袖观、组织观、群众观武装人们,把全体人民团结到党和领袖的周围,使之成为一个共命运的社会政治生命体”。

——1994年11月金正日同志在《社会主义是科学》中认为,“以唯物史观为先前的社会主义学说,未能摆脱历史的局限性……先前的社会主义理论,只把物质经济的因素看作革命斗争的根本条件,未能指出加强革命的主体、增强其作用是革命的根本途径”。“勿庸赘言,在革命斗争中,客观条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因素并不在于客观条件,而在于如何加强革命的主体,如何增强其作用。无论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的国家,只要做好加强革命的主体,增强其作用的工作,就能争取到社会主义的胜利。”“以唯物史观为先前的理论的局限性,在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得更明显。”“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的改造工作即思想改造工作比创造社会主义物质经济条件的工作更重要的首要任务,只有使人的改造工作领先,才能加强革命的主体,增强其作用,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对客观的物质经济条件赋予决定性的意义,只追求经济建设,而忽视人民群众的思想改造工作,忽视加强革命的主体、增强其作用的工作,就不能正确地进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而且经济建设本身也难免停滞不前。”

三、“主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朝鲜重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金日成同志在 1986 年 5 月的《朝鲜劳动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指出，“经济建设是掌握了政权的工人阶级政党面临的最重要的革命任务之一。只有搞好经济建设，才能使国家富强，使生产力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才能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只有搞好经济建设，才能切实保证国家的政治独立和自主性，也才能加强国防力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以后，促进经济建设是工人阶级的党面临的重要任务。”至于社会主义建设究竟如何搞法，朝鲜劳动党从自己的国情、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主体思想”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性思路，有自己的一套体制、路线、政策和具体做法。近年来，朝鲜根据国内的形势，在经济政策和具体做法上有些调整，但强调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伟大领袖的路线”。

（一）关于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关系，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愿与别国“互通有无”，80 年代以来也主张吸收外资，试办自由经济贸易区。

朝鲜在经济建设领域贯彻主体思想，提出了“自立民族经济”建设路线，强调不建立自立的民族经济，就不可能建设独立自主的国家。自立民族经济建设路线的内容是：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主要依靠自己的技术、自己的资源、自己的民族干部和人民的力量来发展经济。1962 年金日成同志在朝鲜第三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说：“建设自立民族经济，意味着多方面地发展和用现代技术装备经济，并建立自己的巩固的原

料基地,从而形成一个所有经济部门都有机地联结在一起的综合性的经济体系,以便基本上在国内生产和供应为建设富强的国家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需的重工业产品、轻工业产品和农产品。”朝鲜认为,用自己的力量发展自立的民族经济,绝不意味着拒绝国际的经济交往,完全由自己制造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并指出,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那些需要量不多的、不够的和本国不能生产的东​​西,就要本着互通有无的原则通过同别国的贸易来解决。

朝鲜采取了一些对外开放措施。1984年9月,朝鲜公布了《合资经营法》,鼓励外商到朝鲜投资设厂,搞合营企业。朝鲜指出,“根据自力更生的原则建设自立的民族经济,决不意味着关起门来进行经济建设。”截至1991年,合资企业达130多家。1991年12月,朝鲜政务院作出建设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的决定。这一地区位于中、朝、俄3国接壤的图们江三角洲,总面积为621平方公里(后扩大为746平方公里)。1993年10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通过了外国人投资法等10多个法规,允许外国投资者可在朝鲜领域内建立合作企业、合营企业,可在自由经济贸易区内建立和经营外国人企业;朝鲜将向外国投资者和外国人投资企业出租必要的土地,出租期最长为50年。

(二)关于经济体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如果拒绝接受国家的领导和监督,“就会招致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复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后果”。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要实行“一元化和细部化”,而且要把国家的“一元化”计划,与各部门、各企业的“细部化”计划准确地衔接起来。因此,朝鲜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朝鲜领导人的主要论述有:

——1971年10月，金正日同志在《加强党对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领导》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离开了计划，经济就无法运行；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有计划地发展。”“计划的一元化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保证计划的唯一性的计划化体系；计划的细部化是将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直到细部都准确地衔接的计划化方法。”“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有执行也可、不执行也可那种‘道义上的计划’。即使是零碎的东西，只要是发展国家的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所需要的，我们就要把它纳入计划，生产供应。”

——1984年12月，金日成同志在《切实贯彻主体的经济管理的体系和方法》中说，“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有计划地发展，没有计划，就一步也不能前进。”

——1992年1月，金正日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教训和我们党的总路线》中说，“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经营管理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合乎规律的要求。在生产资料归人民所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应当由人民的代表——国家统一地经营管理经济。……把国家对经济的统一领导和发挥企业创造性对立起来，或者认为在经济规模扩大了条件下，有计划地经营管理经济是不可能的，便否定国家的统一领导，是根本不对的。问题在于在什么样的原则下，用什么样的方法实现国家对经济的统一领导。如果说，过去有些国家在统一领导社会主义经济方面有错误，那么，可以说那是无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具体实际，用行政命令方式管理经济，只强调统一性，而忽视了发挥个别部门与单位的创造性的问题。因此，不应该反对国家对经济的统一领导本身，而应该根据社会主义的要求改进其方法。如果把个别企业的独立性和眼前的经济利益放在首位，拒绝接受国家的领导和监督，那么，到头来，就会招致破

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复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后果。”

(三)关于经营管理体制,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只能用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否则“意味着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取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1969年3月,金日成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中批评说,“有些人追随修正主义理论,过高地评价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意义,因而犯了想用资本主义的方法进行经济管理的右倾偏向;另一些人则无视我们社会的过渡性质,完全不承认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因而犯了极端的‘左’倾错误,不能使企业管理合理化,招致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许多浪费。”

——1984年12月,金日成同志在《切实贯彻主体的经济管理的体系和方法》中说,“社会主义经济既不能用资本主义的方法经营管理,也不能用混合社会主义方法和资本主义方法的杂烩式方法经营管理。社会主义经济,只能用社会主义方法经营管理。在经营管理社会主义经济中采用资本主义方法,归根结底意味着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取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朝鲜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在工农业的具体管理体制方面,又带有各自不同的某些特征。

在工业管理体制方面,实行“大安工作体系”。1961年底,金日成同志到大安电机厂进行现场指导,从而建立了新的工业管理体制——大安工作体系。其基本内容为:(1)废除一长制,把工厂的经营管理置于党委的集体领导之下,使政治工作领先,发动生产者完成经济任务。(2)建立集中统一的生产指挥体系。厂长领导工厂的全盘工作,总工程师担任全厂的“参谋长”,统一领导生产。(3)建立自上而下的原材料供应体系,由上级负责把

原材料送到企业,企业把材料送到机床旁。(4)建立全面负责职工生活的后勤供应体系,设立主管后勤工作的副厂长。随着大安工作体系的建立,朝鲜不断改善工业领导体系。首先,把一部分原归中央部委直接领导的工业企业移交给地方,并建立了道(相当我国的省)经济委员会,1972年后改为在道人民委员会内设立地方工业管理局,来领导地方工业。重工业和大型企业仍由中央各部委直接领导,但党务工作归所在地的道党委领导。1974年以后,朝鲜在采掘、冶金、化学工业以及水产业和基本建设等几个部门,把在生产和技术上有直接联系的企业联合起来,建立了如兴南肥料联合企业、黄海钢铁联合企业等联合企业。1977年,朝鲜撤销了重工业委员会等部门,重新恢复了金属工业部等部,直接领导中央工业。不久,在政务院内又成立了地方工业部,由它通过道地方工业总局对地方工业实行间接领导。1981年,朝鲜又把政务院领导工业的部门改组为委员会,政务院不再直接领导中央工业企业,只抓规划、技术开发、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等方面的工作,具体生产管理权下放给道。各道新设了经济指导委员会,1985年改为行政经济指导委员会(后称为行政经济委员会),其任务是在政务院和道党委领导下负责领导道内的工业和基本建设。朝鲜的电力、铁道系统的工厂和企业自成系统,不属道行政经济委员会管辖。

在农业领导体系方面,建立领导农业的专门机构“郡合作农场经营委员会”。1960年2月,金日成同志为确立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深入到平安南道江西郡青山里进行现场指导,总结了他们的工作经验,作了题为《为了正确地经营社会主义农业》的报告。后来,他又在党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青山里精神和青山里方法”。其基本内容是:上级机关帮助下级机关,领导干部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及时解决存在问题;政治工作先行,

做好对人的政治思想工作,充分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改进工作方法,依靠群众力量完成各项任务;加强党委集体领导等。在建立大安工作体系的同时,金日成同志到平安南道肃川郡进行现场指导,建立了新的农业领导体系,即:把领导农业的职能从郡人民委员会分离出来,新设郡合作农场经营委员会,作为领导农业的专门机关;将农业技术人员和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国家企业都集中于该机关,使它既领导合作农场又对农民进行物资技术帮助。同时设立道农村经济委员会,把中央的农业部改组为农业委员会。此后,郡合作农场经营委员会用企业方式领导农业,即在对生产进行技术性指导的基础上,直接抓制订计划、组织生产、发展技术、组织材料供应、安排劳动力、分配产品、管理财政等工作,使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国家对集体经济的领导和帮助。

1966年,朝鲜在农村普遍推行“分组管理制”。1965年5月,金日成同志在视察江原道淮阳郡浦泉合作农场时,创立了“分组管理制”,次年全国推广。主要内容是:合作农场给各作业班的分组固定一定数量的土地、劳动力、耕牛和生产工具,并按照国家计划确定每公顷土地的产量,并根据其完成情况评工记分。年终,合作农场根据各分组的实际产量和每个分组农场员的累计劳动日进行分配。如果超额完成计划,就相应地多算劳动日;若是完不成计划,就要减扣劳动日。1996年,朝鲜改进了分组管理制的一些做法,降低了国家给分组的计划指标,规定上交任务,超产部分由分组自己进行实物分配。

在计划工作体系方面,实行计划的“一元化”和“细部化”相衔接。朝鲜在改组工业和农业管理体系后,为进一步加强集中制和更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1964年实行了计划的一元化和细部化方针。当时,朝鲜在工业和农业之间、积累和消费

之间、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出现了比例失调现象。朝鲜认为,之所以产生比例失调,主要是由于经济计划工作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地方、企业的本位主义,加上计划体制本身不健全等原因造成的。因此,实行了计划的一元化和细部化。所谓计划的一元化,就是把分布在全国的计划机关组成一个计划体系,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保证计划的统一性。为实现计划工作的一元化,朝鲜成立了直属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地区计划委员会和市(区)、郡的国家计划部以及工矿企业的国家计划部。它们按照中央集权制的原则领导和掌握计划化工作。同时,仍旧保留省(政务院的部)、中央一级的机关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计划部门,使它们在计划化工作中既受所属机关的领导,同时也受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为了计划的细部化,国家计划机关直接把整个经济的发展和每个工厂、企业的经营活动紧密联系起来,并根据各经济部门和地方以及各企业的实际情况,将计划具体化,使所有指标,直到细部都能准确地衔接起来。1970年11月金日成同志在劳动党五大上指出:“由于全面地确立了新的经济管理体系,我们在经济管理中最正确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要求,把政治道德鼓励与物质奖励、集中与民主正确地结合了起来。特别是我们在经济管理中完全克服了无视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的‘左’倾偏向和忽视道德鼓励而强调物质刺激,在经济领导中热衷于地方分权化和企业自由化的右倾观点。”

(四)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必须继续革命,把集体所有制改变成全民所有制,实现无阶级社会,争取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然后,再巩固和发展完全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金日成同志认为,在步骤上,重要的是划清过渡时期的界线。1967年5月,他指出:“如果因为消灭了剥削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认为过渡时期已结束,就会犯右倾的错误;如果把过渡时期看成直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则会犯‘左’倾偏向。”他认为,过渡时期的界线应该划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为止。1986年12月金日成同志说,完全胜利了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全社会实现了工人阶级化,全体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的平等的主人过上自主的创造性生活的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它是无阶级的社会,是所有社会成员的完全的社会政治平等和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保障的发达的社会。他强调: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其阶级差别虽已消灭,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物质生活水平上的一定的差别依然存在,社会生产力也没有达到足以实行按需分配的水平。要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就必须经过一个巩固和发展完全胜利了的社会主义社会,完成共产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

金日成同志指出: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是被消灭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过渡时期可以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并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敌对因素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之间思想、技术、文化方面的落后状态还存在,城乡差别还存在,生产力也没有达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高度。所以必须继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革命。

从上述指导思想出发,几十年来朝鲜在所有制上一直没放松向更“大”更“公”的方向过渡:

——1958年朝鲜完成农业合作化,同年年底以里(相当我国的乡)为单位对农业合作社进行合并,实现“政社合一”。

——1962年,把农业合作社改为合作农场,由新设立的郡

合作农场经营委员会来领导,实现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相结合。接着,朝鲜在全国选定先锋、长渊等4个郡作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试点单位,进行试点工作。

——1964年2月,金日成同志发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农村问题提纲》,提出了使集体所有制越来越接近全民所有制,从而创造出现实的条件和可能,使集体所有制逐步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任务。

——1986年12月,金日成同志在《争取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一文中指出,“朝鲜已经接近了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转折性界线”。以后他又多次指示“要在近年内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

——1994年2月,姜成山总理说,朝鲜“正在使所有合作农场向大规模的全民所有制农场发展”。同年年底,朝鲜在平安南道肃川郡新建农业联合企业,使郡内20多个合作农场成为国营农场;在平壤市万景台区使区内的合作农场变为一个国营农场,正式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朝鲜报刊还报道,其他郡也将逐步实现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转变。

(五) 强调发扬革命精神,视经济建设为“战场”,大力开展群众运动,不断提出各种战斗口号,以激励群众的劳动热情。

劳动竞赛等群众运动一个接一个。从50年代起,为动员人民大力开展“争取最大限度地增产和节约”的斗争,提出了“以跨上千里马的气势奔驰”的战斗口号。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掀起了以技术革新同教育人民相结合的“千里马运动”。从1959年开始,朝鲜在全国开展了“千里马作业班运动”。70年代中期以来开展“争取三大革命红旗运动”。这一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大力推进思想革命,提高人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开展技

术革命,进一步推动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开展文化革命,为培养共产主义新人而奋斗。这一运动是以工厂、企业、机关、合作农场等单位开展的,对完成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任务成绩卓著者授予“三大革命红旗”。这一运动一直开展到现在。在开展群众运动中,朝鲜还开展了“争取近卫工厂称号运动”和“速度战”等突击运动。如:1974年全国工矿企业开展了“70天战斗”,创造了新的千里马速度——“70天战斗速度”。1975年为庆祝建党30周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总突击战”。进入80年代,朝鲜开展了“创造80年代速度”运动。1982年7月,金策钢铁厂全体职工向全国职工发出了“以千里马大高潮时期的气势创造80年代速度”的号召,使争取三大革命红旗运动更加蓬勃发展。1988年,为迎接建国40周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掀起大高潮,开展了“200天战斗”突击战。1989年继续开战了“200天战斗”。进入90年代,开展了“创造朝鲜式社会主义总进军速度”运动。最近又开展了“争取电气化模范郡称号运动”、“争取卫生模范郡称号运动”等群众运动。

大力开展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运动”,并通过各种组织把全民高度地组织起来。朝鲜把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规定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必须完成的革命的基本内容,规定为直到建成共产主义为止必须进行的继续革命的任务。在进行三大革命方面,朝鲜坚持了使思想革命先行的原则,在干部和群众中大力开展了思想工作,还通过加强革命的组织生活,使党员在党组织,工人在职业同盟组织,农民在农业劳动者同盟组织,青年在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组织,妇女在妇女同盟组织,少年在少年团组织里过组织生活,在组织的指导和帮助下接受教育和革命锻炼。

在思想革命中,朝鲜把基本点放在教育所有的人,使他们成

为无限忠于党和领袖的忠臣。为此,加强了主体思想教育、党的政策教育、忠诚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阶级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

在技术革命中,朝鲜大力进行了三大技术革命,即:缩小重劳动和轻劳动的差别、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差别,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务负担中解放出来。由于在工业部门广泛实现机械化、自动化和遥控化,在农业部门实现机械化和化学化,在全国各地建立大量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大大增加各种服务设施,三大技术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文化革命中,朝鲜把实现全社会知识分子化作为重要战略目标,并把教育事业放在首位,从1975年起全面实行普及的11年制义务教育,还不断改进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的教学工作。

开展“三大革命小组”运动。为加强对思想革命、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领导,从1973年开始,劳动党中央直接组织派遣由各级党政机关及群众团体的干部、科技工作者和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三大革命小组”(类似过去中国往下派的“工作组”)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定期轮换。一般来说,派往普通工厂企业的三大革命小组有20人至30人,派往大工厂企业的有50人左右,基本做到大中型工厂企业和合作农场的作业班都有1名小组成员。小组的任务是帮助所在单位有力地推进“三大革命”。在思想方面,帮助基层干部破除因循守旧思想,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在技术方面,发动技术人员和群众革新挖潜,减少有害劳动和繁重劳动。在文化方面,宣传普及科技文化知识,实行文明生产,开展文体活动,美化环境。三大革命小组下去时,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对他们说,“你们下去要启发和帮助干部,你们斗争的对象是干部头脑中的保守主义、经验主义、官僚主义等旧思想,绝不是干部本身。因此,要对干部头脑

中的旧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同时也要尊重他们,辅助他们。”“干部水平低,又业务缠身,不能好好学习,因此你们下去要把现代科学技术教给他们,通过实践让他们看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威力。”金日成同志指出,“过去党中央和政务院都是用派一两个指导员下去指导企业的方法进行指导工作的。指导员到企业去不是深入了解全面的工作情况,而是只找出一大堆缺点带了回来。”还说,“各个单位都有党组织,因此也可以通过党组织推进三大革命。但是我们没有把这项工作只交给下面的党组织,而是由党中央直接派遣三大革命小组,使党组织和三大革命小组同心协力推进了三大革命。”目前,三大革命小组运动仍在进行。

四、苏东剧变后的朝鲜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1993年12月朝鲜劳动党六届二十一中中全会认为朝鲜进入了“国内外形势最为复杂和尖锐的时期”,“严重的国际形势和复杂的事态给朝鲜革命和建设造成了严重影响”。国际反共势力企图趁机搞垮朝鲜,加强了对朝鲜的渗透和“和平演变”措施;1994年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不幸逝世;因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农业歉收粮食不够吃。在这样严峻的形势面前,朝鲜坚定地走“朝鲜式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一)分析总结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认为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受挫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了错误,而朝鲜劳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因而更加坚定了走“朝鲜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1990年5月,金日成同志说:由于帝国主

义者为实现称霸世界的野心,进行狡猾无耻的阴谋活动,世界许多地区接连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复杂事态,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遇到了严重挑衅,但这是暂时的曲折。他强调:“形势越复杂,反动派的攻势越疯狂,革命人民就要坚持革命原则,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前进。”1992年初,金正日同志在同党中央负责同志谈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教训时,讲了以下看法:

1. 马克思主义是在反对资本斗争时期产生的革命学说,它反对剥削和剥削制度,为实现人民群众的阶级解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但是,由于时代在变化,历史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不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它未能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如何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提供正确的答案。本来应该根据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的要求,发展共产主义理论,在此基础上制订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可是有些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没有能够正确解决这一历史课题。他们一方面“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并教条主义地运用这一理论;另一方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华,走实行修正主义政策的道路”。

2. 一部分国家的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原因,还在于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遇到暂时困难时发生动摇,接受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和经济管理方法。

3. 社会主义和“多元化”是势不两立的,“多元化”是资本主义的政治方式。将“多元化”引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就会促长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引起社会的无秩序和混乱。

4. 有的国家社会主义遭受挫折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政党之间没有在自主精神基础上加强国际声援。有的国家的党自称自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对其他国家的党指手划脚,

甚至肆无忌惮地干涉别国的内部问题。一些国家的党没有自主精神,屈服于大国的压力,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

5. 一部分国家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致力于改造人的工作,“没有以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为中心来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没有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加强主体和提高主体的作用作为根本问题来抓”,使社会主义“失去了自身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和巩固的社会政治基础。不具有坚固主体的社会主义,就不能发挥优越性和威力,就不能应付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挑战和考验”。他指出,朝鲜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巩固和不可战胜,其秘诀就在于她让人民群众做了社会的真正主人,社会的一切都为人民服务,她是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社会主义。

因此,苏东剧变后的几年来,朝鲜特别强调要坚持朝鲜式社会主义,要坚持原来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同时根据新的形势,进一步调整和采取了一些措施。为巩固朝鲜式社会主义,朝鲜劳动党大力宣传朝鲜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91年5月5日,金正日同志在题为《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我国式社会主义是战无不胜的》的讲话中说:朝鲜式社会主义是“实现伟大的主体思想的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它是“体现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社会”,是“保障人民真正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民主社会”。“像我国这样彻底保障劳动的权利、吃、穿、用的权利和学习、医疗权利等所有权利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难以找到。”为进一步巩固朝鲜式社会主义,他又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1)工人阶级要忠实地拥护党的领导。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巩固性要同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性质和领导作用联系在一起。(2)对领袖尽忠尽孝。强调“领袖是人民实现意识化和组织化以及统一团结的中心,是以科学理论和战略战术引导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走向胜利的中心”。(3)克服干部中的霸道和官僚主义作

风,要求干部树立为人民大众忠实服务的风气,不摆架子、不霸道、不牟私利、不企盼特权和特惠、清正廉洁,成为群众的楷模和表率。(4)加强思想工作。(5)在革命和建设中更加牢固地树立主体思想,坚持主体立场。

(二)加强党的领导和对群众的思想教育,抵制西方的思想文化渗透和“和平演变”。朝鲜一贯重视党的领导,苏东剧变后更加强要党加强党的领导。强调必须在主体思想的基础上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党内不允许有与主体思想相悖的别种思想,如果允许党内有这样或那样的异己思想,党就会从思想上瓦解,组织上四分五裂。全党必须以领袖为中心,用一个思想团结起来。要求党政机关干部不断加强自身的革命化,经常到群众中去进行政治工作,把人们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发挥群众的力量和智慧,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坚持每周参加一次报告会和集体学习,干部每年都必须到培养机关去学习一个月。

1991年5月初,金正日同志在一次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工作,抵制西方的思想渗透和“和平演变”。他说当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社会主义国家疯狂地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稍微削弱思想工作,资产阶级的自由化之风就会吹进来。因此要坚持思想革命先行的原则,深化思想工作,“把我国人民培养成主体型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使他们把对党和领袖、祖国和人民的忠诚看成是自己的信念和道义,根据“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原则,为争取社会主义事业胜利而奋斗。与此同时,朝鲜还加强了党员和群众的组织生活。朝鲜所有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少年都参加一定组织,并必须过严格的组织政治生活。

(三)金日成同志对“接班人”早已作了安排,苏东剧变后加

快了金正日同志的接班。1974年2月,朝鲜劳动党召开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了把金正日同志定为金日成同志唯一接班人的决定。在会上,金正日同志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党中央书记,主管宣传和组织工作。1980年10月,朝鲜劳动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金正日同志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中央军委委员,主管中央日常工作。进入90年代,加快了金正日同志接班进程。1991年12月金正日同志任人民军最高司令官,1993年4月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长,从法律上掌握了三军统帅权。同时,金日成同志多次发表谈话,赞扬金正日同志“是文武忠孝兼备的真正的人民领导者”,“是无限忠于祖国和人民的尽忠尽孝的忠臣和孝子的典范”。并指出,“由于金正日同志英明领导党、国家和军队的全盘工作,我国很早就出色地解决了领导的继承问题。”“要捍卫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我国社会主义,出色地完成主体革命事业,全党和全体人民就必须衷心拥护金正日同志的领导,这是继承和完成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保证。”“把班交给金正日同志是我的主要总结”,“是我对党的政治交待”。1994年7月金日成同志逝世后,金正日同志顺利地接管党政军领导大权,成为最高领导人。1997年10月8日,金正日同志被推举担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1998年9月5日又当选为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

(四)在国际形势剧变、国内连续遭受自然灾害,经济严重困难的严峻形势下,朝鲜缩小了经济建设规模,相应地调整了一些政策。

进入90年代,朝鲜经济情况恶化。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朝鲜失去了社会主义市场,传统的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基本停滞。由于农业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粮食产量减少,致使粮食供

应紧张。目前,朝鲜能源、原材料短缺,运输紧张,工厂开工不足。外贸进一步萎缩,贸易总额从1990年的47亿美元下降到1996年的近20亿美元。

据朝鲜公布,1995年粮食减产200万吨,被洪水冲走100万吨库存粮,损失金额达150亿美元;1996年因受自然灾害共损失金额22.7086亿美元,耕地流失29.7659万公顷,粮食损失价值7.8249亿美元。公布的1996年粮食产量为250万吨,仅为1984年产量的1/4。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朝鲜在大政方针不变的前提下,政策有所调整。

1. 在农村改进“分组管理制”。1996年初,朝鲜为发展农业生产,解决缺粮问题,对合作农场作业班所属的分组进行调整,实行了新的管理办法。主要内容是:降低国家给分组的生产计划指标,将最近几年的实际产量的平均值定为计划指标,规定上交任务,超额部分则由分组自己进行实物分配。据了解,合作农场给分组规定单产指标,并规定必须上交国家的粮食数量,即从生产指标中扣除饲料粮、种子粮和口粮,剩下的便是上交国家的粮食数量。如果分组生产的粮食超过必须上交的粮食数量,则超过部分由分组自己进行实物分配;如果达不到必须上交的粮食数量,则留给分组的部分要相应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过去的老框框,克服了计划指标过高、分组无分配权、超产只能多得工分的弊端。

1997年,朝鲜在全国范围内缩小了分组的规模。据了解,分组的规模由过去的20—30人缩小到10—15人。全国分组由前一年的1万个增加到2万个。每个分组原则上由家属成员和亲戚或邻居组成。朝鲜还改变了计酬方法,实行“以量计工”,取代了“按时计工”,即按完成实际劳动成果计工分,不再像过去那

样按时计工分。这是对“分组管理制”的完善。

2. 逐步活跃农贸市场。近年来,朝鲜不断放松对农贸市场的限制。首先,扩大了农贸市场的规模,有的场地扩大一倍以上,能容纳上千人。过去,每隔10天才开市营业1天,现在则几乎每天营业。其次,允许粮食、鱼、肉和服装、鞋帽、布料等轻工业产品进入农贸市场,使自由市场销售的物品种类明显增多。再次,过去农贸市场只有私人摊位,出售多余的农产品,现在还允许小集体单位设立摊位,出售自己制作的各种食品,甚至还允许国营商店到农贸市场设摊出售商品。

3. 进一步采取了一些对外开放措施。朝鲜虽不使用“开放”这个词,但在逐步实行经济开放政策。朝鲜提高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的地位,并将该区扩大到清津地区。1996年9月,朝鲜和联合国工业开发机构、联合国开发署一起共同举办了罗津、先锋地区国际投资洽谈会,共洽谈、签署了2.7亿美元的合作和5.7亿美元的意向书。朝鲜在洽谈会上宣布,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内的生产、价格、贸易等均由外商自由决定,声称要将该特区建成轻工、材料、电器、汽车等10大出口基地和货运、金融、旅游中心。1997年10月,朝鲜宣布在元山、南浦建立加工和贸易保税区,宣布降低自由经济贸易区的外商所得税,并计划在若干港口和内陆城市设立“经济特区”。朝鲜政务院决定,任何单位都可从事外贸活动,只要对国家有利,政府就将提供方便。这一切说明,朝鲜在探索克服困难、发展经济的各种办法。

目前,朝鲜人民以对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充满革命热情,在劳动党领导下,正在大力开展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坚定地走“主体的社会主义”即“朝鲜式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8章

推进社会主义“革新”的越南

越南自1976年全国统一后，立即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由于思想认识上超越阶段脱离本国实际，以及当时对外政策上的失误，使人民不能休养生息，国家陷入了困难和危机。1986年越共六大决定实行全面“革新”。

苏东剧变给越南带来很大冲击和影响，但越南共产党顶住了内外压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搞“多党制”，同时全面推进革新事业，实现了政治和社会基本稳定，治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有所发展，粮食（大米）由进口转为出口，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对外关系迅速发展，国际处境改善。虽然越南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但总体形势大大好于冷战时期。

那么，越南是如何应对苏东剧变的？是如

何认识和坚持社会主义的？又是如何进行革新开放的？几十年来越南搞社会主义有什么经验教训？

越南位于印支半岛的东部，总面积 32.96 万平方公里，人口 7600 万。10 世纪开始建立封建国家。19 世纪中叶法国入侵，1884 年沦为法国保护国。1945 年越南共产党领导八月革命成功，9 月 2 日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同年 9 月 27 日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越南共产党又领导人民进行了 9 年抗法战争。1954 年抗法战争胜利后，按照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定》，越南被分为南北两方，越南北方获得解放，美国取代法国在南方扶植西贡傀儡政权。越南共产党领导越南人民开展抗美救国战争，迫使美国于 1973 年 1 月在巴黎签订《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美国撤离南方，1975 年 4 月南方获得解放。1976 年 7 月越南实现国家统一，改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越南全国统一后，由于当时所实行的政策，人民不能休养生息，经济一度濒临崩溃边缘。1986 年越共召开六大，调整内外政策，确定实行革新路线。1991 年 6 月越共七大坚持并完善了革新路线，采取一系列深化革新开放的措施和步骤，使越南经济连续稳定增长，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绝大多数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外汇储备增加，粮食自给有余还大量出口，政局稳定，社会安定。对外实行独立自主、全方位、多样化的外交路线，利用当今世界多极化、区域化发展趋势，广交朋友，改善了国际形象，并成为东盟成员国，对外交往不断扩大。1996 年 6 月底，越共召开八大，全面回顾、总结越十年革新事业，继承发展七大路线，确定跨世纪的战略目标；明确宣布到 1996 年越已摆脱经济、社会危机，过渡时期初级阶段提出的为工业化准备前提的任务已基

本完成,开始进入一个大力推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新时期;规定了到2000年和2020年的具体发展目标,即:到2000年和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比1990年翻一番和增长8—10倍,争取到2020年把越南建成一个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文明的工业化国家,逐步迈向社会主义。

总之,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虽然给越南带来了多重困难和影响,但是由于越南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越南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总体形势比冷战结束前还要好。

一、重新认识国情,调整过急过“左”的政策

1976年越南实现统一后,越南共产党认为已“进入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采取了“加速社会主义改造”、迅速“从小生产走上社会主义大生产”的方针。1976年12月,越共召开四大,主张尽快取消多种非社会主义成分经济,马上把资本主义经济变为国营经济,否认商品生产规律,决定要在五年内基本完成南方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决定要争取在约20年内(即到1996年)基本完成越南从小生产走上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过程(亦即结束越共提出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由于对这一过渡时期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认识不足,党的路线和政策发生了脱离本国实际、违反客观规律、超越发展阶段的错误,致使越南经济、社会陷入了深重危机。自1979年底起,特别是1982年3月越共五大之后,越南在政策上进行了一些调整,试图摆脱困境,但未能奏效。1985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价格、工资、货币“同步改革”,造成商品供应奇缺,市场物价猛涨,1986年通货膨胀率高达774.7%,加深了经济和社会危机。客观形势迫使越南党不

得不考虑全面改革的问题。

1986年12月越共召开六大，阮文灵出任总书记，越共对过去的路线进行反思，重新认识国情，纠正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错误，并决定实行全面革新开放，才使越南的形势开始发生转折。六大对过去十年的严重挫折进行深刻反思，承认越共“长期以来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必须经过许多阶段；因此超越阶段，急于在过渡时期初级阶段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许多目标，犯了“主观主义、唯意志论、急于求成和简单化的错误”。越共六大决议强调，上述错误是“重大方针、政策的错误”，是“指导思想的错误”，是“既‘左’倾，又右倾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越共六大指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必须经过一段过渡时期，这是客观的必然；而过渡时期的长短取决于每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正如列宁所说：在这整个时期（过渡时期）内，我们的政策是把它分成若干个更小的过渡步骤，而我们要完成的任务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制定政策方面所遇到的一切困难，以及政策的一切高明之处，就在于考虑到每个过渡步骤的特殊任务。因此，越共强调，由于越南是从小生产起步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所以越南的过渡时期，必定是长期而充满困难的。并强调越南当时是处于“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而这个初级阶段又是整个大过渡中的小过渡。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为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必要的条件。越共六大的上述观点，表明越共对本国国情有了新的认识，即越南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

六大后，越共逐步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对内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对内，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和实行全面革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外，开始奉行“广交友、

少树敌”的政策，以从柬埔寨撤军、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为契机，逐步改善同中国、东盟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为国家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1991年6月越共召开七大，杜梅出任总书记。七大通过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以下简称《纲领》）和《2000年前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战略》（以下简称《战略》）。《纲领》进一步明确提出，越南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将分为许多阶段，强调越的总目标是到过渡时期结束时，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的上层建筑，使越南成为一个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战略》确定2000年前战略总目标是：摆脱危机，稳定经济、社会形势，努力奋斗以摆脱贫困、不发达国家的状态，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和安全，为国家在21世纪初有较快的发展创造条件；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翻一番。越共七大继承、发展了六大全面革新的路线，以经济建设为重心，以党的建设为关键，采取了一系列深化改革开放的步骤和措施，对外奉行“独立自主、广泛开放、全方位、多样化”的外交路线，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关系。1991年11月，越南同中国的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越内外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总之，越南党从实践中认识到必须正确估计本国社会主义发展所处的阶段，纠正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政策，全面地进行革新开放。

二、顶住苏东剧变的冲击，坚持既定方向

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给越南造

成了巨大冲击。越共顶住压力,继续高举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的旗帜,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全面革新事业,进一步调整政策,探索适合越南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一) 苏联东欧剧变对越的冲击

1976年越全国统一后,越南同苏联及东欧各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978年6月,越加入经互会,在经济建设中长期依赖苏联东欧各国。1978年11月,越苏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1982年越共五大政治报告称“苏联是越南的最强大、最可靠的盟友”,并称“越苏团结和全面合作是越对外政策的基石”。苏联东欧剧变前,越平均每年从原苏联获得近10亿卢布援助,越苏贸易额一直保持在20多亿卢布的水平。因此,苏联东欧剧变给越南造成了巨大冲击,党内外思想曾一度混乱。在政治上,越共中央有人大肆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甚至有人认为越共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错误的,主张越应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有些党员由此动摇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申请退党或者不过组织生活等。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加紧了对越南实行“和平演变”的阴谋活动。在经济上,苏东大幅度削减甚至停止了对越援助,越同苏东贸易也改为按国际市价和用硬通货结算。越不能再从苏东国家中得到入超贷款和优惠价格进口的燃料和主要生产资料,越南的轻工产品也几乎完全失去了苏东传统市场。1991年越南同苏联的贸易额锐减至2亿卢布,使越南在资金、原料、市场等方面面临严重困难,给越南工农业生产造成巨大影响。

(二) 越共对苏联东欧剧变的看法和措施

越共一直十分关注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改革和局势的变化。在苏东的改革发展到推行“政治多元化”和“民主社会主义”时，越南共产党逐渐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越共在1989年3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越南革新过程中必须遵循的“五项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目标和理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实行有集中的社会主义民主；将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民族力量与时代力量相结合。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政治“多元化”和“公开性”时，越共明确反对多党制、多元化和极端民主化。1990年8月召开六届八中全会，断然撤消了同中央唱反调、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效法苏东“改革”路子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春柏的党内一切职务。1992年颁布的新宪法，重申要“坚持共产党对国家政权和全社会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越党领导人发表讲话，撰写文章，越党报刊也多次载文，阐明越共对苏联东欧剧变的看法。主要观点有：

1. 强调要用历史的观点评价苏联社会主义，不能片面地批评或者全盘否定。越党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崩溃了，但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苏联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过程中取得了多方面的巨大成就，苏联作为最早的社会主义模式，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否定的。苏联曾经是世界和平与革命运动、防止核战争的支柱，为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与社会进步的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2. 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崩溃并不表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越共认为，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垮台是世界上正在为自由而斗争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各民族革命事业的空前的损

失,完全改变了世界上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有利于帝国主义,不利于革命力量,使革命处于空前的低潮,使越南革命事业更加复杂、困难。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只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历程的短暂的挫折和反复,并不表明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已经告终,反而证明了马列主义没有错,也没有过时。

3. 认为苏联模式的缺点和错误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所固有的,而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的教条观念所造成的。越共认为,长期实行极权体制使苏联经济停滞不前,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之中;没有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受到严重侵犯;违背了客观规律,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

4. 认为苏联东欧剧变有两个主要的和直接的原因:一是苏共的改革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等方面都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一些背叛马列主义的最高领导人逐步控制了党的领导权,改革的路线实质上是从右倾机会主义滑向修正主义,完全放弃了马列主义。二是帝国主义和国际上的反动势力从未停止过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它们利用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困难和路线上的错误来加紧推行极其恶毒、危险的“和平演变”战略,最终在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不战而胜。苏联东欧剧变的实践表明,“和平演变”是当前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政权发动进攻的主要手段,而“政治多元化”是“和平演变的突破口”。共产党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

5. 越共在总结苏联东欧剧变的经验教训时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是要探索符合客观规律和本国国情的道路。要革新思维,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克服缺点,改正错误,制定符合客观规律和本国国情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推选忠于党、忠于人民、德才兼备、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不移的领导人 and 舵人。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是具有生死存亡意义的重大问题。

三、越南革新的主要思路、理论和政策

越共认为,要防止“和平演变”,必须堵住政治多元化这个“突破口”,坚持“五项基本原则”,同时必须迅速把经济搞上去。因为说到底,经济实力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斗争中赖以取胜的基本保证。只要人民的生活不断改善,群众得到实惠,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自然就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使西方的“和平演变”图谋难以得逞。越共强调经济建设是重心,党的建设是关键。要把革新整顿党与发展经济、革新政治体制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党的领导,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

越共认为社会主义必须革新。越南的革新路线始于1986年六大,1991年七大又作了完善。越共认为革新是多方面的,但必须以经济革新为重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民富国强。

越南随着社会主义革新事业的发展,在理论上提出一些“革新思维”。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维松(被视为当今越南的理论权威)1995年年中在答记者问时,论述了越共“革新思维的若干问题”。其主要观点是:越南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以社会主义为定向”,走的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生产力很弱小的小生产走向社会主义,必须运用和发展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越南“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但要“会使用”资本主义的形式和方法,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使用资本主义经济,以建设社会主义;越南革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是“建立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由国家管理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认为多种经济成分的政策不是权宜之计,

而“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它“具有从小生产走向社会主义的规律性，具有动员人民建设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巨大作用”。在多种经济成分中，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它为其他成分开路并提供帮助，是国家按社会主义的定向进行调节和引导市场经济的具有物质力量的工具。陶称越南“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或曰过渡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已经在主要的方面成形，已经有皮有肉”，但越共“并不认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完整”。

从近年来越南共产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言论看，越南在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基本看法是：

1. 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问题。

认为在越南搞社会主义是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分析及越南历史 and 实际出发的，越南仍将“坚持社会主义的目标”，并归纳了越南社会主义的六大特征：(1)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2)有以现代化生产力和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发达的经济；(3)有先进的民族色彩浓厚的文化；(4)把人从压迫、剥削和不公正中解放出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有温饱、自由、幸福的生活，有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5)国内各民族平等、团结，相互帮助，共同进步；(6)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民保持友好和合作关系。

2. 关于经济体制的发展模式问题。

认为50—80年代初，越南经济模式的特点是迅速取消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个体经济，建设并大力发展国营和集体经济，以早日形成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旧模式的弱点是生产发展缓慢，成为导致发生社会、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越共六大认为，多年来，越实行的官僚集中、统包统管的管理体制，主要靠行政命令管理经济，没有充分注意商品、货币关系和经济利益，并产生了臃肿的管理机构和一批决断力差、经营

不在行、官僚主义严重的管理干部,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会议决定建立符合客观规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新体制。当时所说的“新体制”仍具有分权、放权的性质,主张分级管理,必须保证“三级作主”,即:中央对关键领域和对整个经济平衡发展具有战略意义问题的“决定权”;地方在其管辖地区内行使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责的“主动权”;基层经济单位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劳动集体当家“作主权”。同时要做到责任与权限挂钩,义务与利益挂钩。

自六大以来,经过多年实践、总结,越南的认识有很大发展。后来的提法是实行“国家通过法律、计划、政策和其他手段进行管理的市场机制”,1996年八大正式归纳为“遵循社会主义方向、由国家进行管理的市场机制”。

越共在总结10多年革新经济管理体制经验时,强调要正确认识以下观点:(1)商品生产并非与社会主义相对立,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就,是客观存在的,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乃至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后,都是必要的。(2)在多种成分商品经济中,社会主义市场同参与生产、流通的许多力量是一个统一体,其中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国内外两个市场紧密相连。(3)市场既是计划的依据,又是计划的对象,计划主要起决定方向的作用,在宏观方面特别重要。(4)市场机制的运用要求提高国家的宏观管理能力,同时充分确立生产经营单位的自主权,以发挥市场巨大的积极作用。同时又要防止、限制和克服其消极面。

越共八大提出的目标是到2000年取消官僚集中、统包统管的机制,形成一个相对配套的、以社会主义为既定方向的、由国家管理的市场机制。其主要内容是:配套培育各种市场要素,其中包括商品、劳务市场,劳动力的雇佣和使用,土地和不动产市场,资金市场;完善经济法规体系;继续革新计划化工作;革新财

政、货币和价格政策；提高国家管理经济的能力和效益。

3. 关于所有制结构问题。

越共主张实行多种经济所有制，认为“多种成分的经济政策”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具有从小生产走向社会主义的规律性，具有动员人民建设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巨大作用，“但不以私有制为主导”。认为目前越南存在五种经济成份，即：国有经济、合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和小业主经济以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并与合作经济一起，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各种所有制形式可以混合在一起、交织在一起，形成多种形式的经营组织。各行各业不分所有制形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律自主经营、相互合作和健康竞争，首要目标是解放生产力。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包括国营经济与国内私人资本的合作联营，国有经济与外国资本的合作合资。强调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具有重要作用，可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及经营管理等发展经济。

个体、小业主经济具有重要、长期的地位。越共主张要帮助个体、小业主经济，解决资金、科技、产品销售市场等方面的困难，并引导个体和小业主逐步自愿地合作经营，或者成为国有企业、合作社的“卫星”经济。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能力为国家建设作贡献。越共主张鼓励私人资本进行生产性投资，安于长期经营，国家保护其所有权和合法利益，但要加强管理并引导其依法经营，以利于国计民生。

4. 关于国有企业主导地位问题。

1986年越共六大以前，越共坚持国有企业必须处于垄断地位。六大以后，越共的认识发生了变化，逐步把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转为确保其“主导地位”。越共八大再次肯定了国有企

业的主导地位。国家加强国有企业主导地位和作用的领域是：(1)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行业，包括道路、桥梁、港口、文教、卫生等；(2)财政、金融、银行、保险、邮政等主要服务业；(3)重要的生产劳务和商业(包括对外贸易)，但其中有些环节可以由私人搞；(4)涉及国防和安全的领域。

越南确定国有企业的3个标准是：由国家100%投资的大中型企业；需要由国家控股的拥有先进技术和工艺的企业；国家占有一定股份的生产经营好的企业。

5. 关于股份化问题。

认为企业实行股份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战略选择。越共实施股份化的目标是全方位的，其目的是企业通过所有制形式的变化，转换经营机制，更有效地进行生产和经营。越南采取积极、稳妥的步骤，开展国有企业股份化，但不是使其私有化。越共认为，国有企业股份化是在目前情况下实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一种形式。合理成立各种总公司，把各家总公司真正建成实力雄厚、效益高、竞争力强的经济集团，使之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加强国有企业管理中党的领导和群众组织的作用。选择股份化试点的条件，一是中小型企业，二是有盈利、经营效益好的企业，三是没有必要由国家100%投资的企业。

6. 关于分配方式问题。

越南主张现阶段要实行多种形式的分配方式并存，即以按劳动结果和经济效益分配为主，同时根据对生产、经营结果的贡献多寡，以及通过社会福利进行分配。要承认各种形式雇佣劳动的长期存在，但强调不能使之变成统治关系，以致社会分化为对立的两极。要合理地分配和再分配各种收入，保护劳动者的利益，鼓励合法致富，同时积极进行扶贫工作，避免各地区发

展水平和各阶层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过大,逐步实现公平。

7. 关于现行市场机制同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区别问题。

越共自六大以来,逐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并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其主要观点是:商品生产并非资本主义独有,社会主义也需要商品生产;在多种成份的商品经济中,应有多种不同的力量参与商品生产和流通,国有经济在其中起主要作用;市场既是计划的依据,又是计划的对象,计划主要带有定向的性质和作用;市场也有负面影响,即促进贫富分化和投机、走私等活动,因此不能没有国家的定向和管理。

越南的市场机制同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本质区别是:越南的市场机制以多种成份的商品生产为基础,但以社会主义为本质的公有成份起着主导的作用;越南的市场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来管理的,这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重大的区别。

8. 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结合”问题。

越共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本质上不同的两种社会经济形态”,所以“谈不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但是,越南是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走向社会主义的,因此,越南“要会使用资本主义的形式和方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使用资本主义经济,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是走向社会主义过程中适合我国条件的过渡形式”。

9. 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

越南实行多样化、全方位的对外经济关系。强调越在奉行独立自主、扩大开放、全方位、多样化的对外路线的同时,主张在维护独立、主权、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同一切国家、一切经济组织发展多样化、全方位的对外经济关系。重视制定出口战略,把出口视为发展对外经济的优先环节和重心,实行出口市场多元化,扩大和提高对外经济的效益。

四、越南革新开放的进程及其成就

(一) 农业改革及其成就

1986年12月越共六大确定全面推行革新路线,而越南革新事业是以农村作为重点、以农业作为突破口的。1981年1月13日越共五届中央书记处发布了“关于扩大农业合作社承包到组到劳动力”的第100号指示。六大后,1988年4月5日越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又发布了“关于改革农业生产承包制”的第10号决议,这被认为是越南农业改革的两个重大里程碑。总的来看,越南农业改革的进程大致分为3个阶段:

1. 农业改革探索前进阶段(1976—1985年)。

1976年越南全国统一后,在北方,由于长期走苏联式的集体化道路,维持僵化的农业体制,北方农业合作化运动陷入了死胡同。在南方,由于“强制”、“粗暴”地按照北方农业生产规模推行集体化,虽然到1979年南方有21.1%和22.4%的农户分别加入了合作社和生产集团,共建立了1300个合作社和15300多个生产集团,但因急于求成、管理不善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造成集体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均低于个体农民的后果,并出现了许多农户退出合作社和生产集团的情况。总之,1976年至1980年期间,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越南全国农业生产下降,农民与整个社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明显,农业生产已陷入了危机。全国人均粮食拥有量从1976年的274公斤降至1980年的268公斤;国家粮食收购量,从1976年的200万吨降至1979年的160万吨;北方和南方每年要分别进口粮食50万吨和30万

吨。70年代末,在北方的一些合作社自发实行承包到户,并取得良好结果。越共中央在总结群众做法的基础上,于1981年1月作出“100号指示”,正式推行“农业承包到户制”。该“指示”规定,合作社负责整地、种子、肥料、排灌和防治病虫害,农民在承包土地上负责插秧、田间管理、收割;农民要上交给合作社部分产量,剩余部分归农民所有,并可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实行这种承包制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集体和农民两个积极性,鼓励农户把更多的劳动力和资金投入农业生产,以便超额完成上交的定额后,余下产品全部归己所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粮食产量。1981—1986年期间同1976—1980年期间相比,年均粮食产量从1335万吨增至1725万吨,农业发展速度从1.6%上升至4.5%,猪存栏量从910万头增加到1130万头。

但上述承包制没有把土地等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交给农民承包,仍由合作社决定经营的方向和产品的分配方式,农民还没有获得自主进行生产经营的权利。加上合作社逐步提高承包定额,致使许多地方农民只能获得承包产量的15%—20%,超包部分难以弥补农民投入的支出。农民欠国家和合作社的债务越来越多,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许多地方又出现农民退包现象。农业生产从1986年起再次停滞不前,产量下降。许多地方又“悄悄地”实行“彻底的包产到户承包制”,即让农民自行决定自己的事,收获时只需按合同交足农业税就行。这就预示着还必须深入地进行改革。

2. 深化农业改革阶段(1986—1996年)。

1986年越共召开六大,一方面增加对农业投资,提高对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另一方面采取相应措施进一步完善农业承包制。1987年4月举行的越共六届二中全会,制定了更灵活、

宽松的新政策,如规定农业税和承包额稳定到1990年;除农业税外,严禁向农民乱加“义务”,调整工、农业产品价格,保证农民获得承包产量的30%—40%。1988年4月越共六届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第10号决议”,又在所有制、管理机制和分配方式3个方面实现了质的变化。在所有制方面,把土地重新交给农民承包,稳定15年不变;在管理机制方面,加强民主管理,决定由农民自己管理自己,自行确定生产经营的方式、规模和方法等,合作社和生产集团的职能转为向农户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成为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在分配方式方面,使农民承包收入从占承包产量的15%—20%提高到40%,并规定农民完全可以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按议价出售,承包额一定5年不变。此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进一步发挥。

1989年3月,越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加大农业改革力度,改革农产品流通和价格政策。其基本内容是:(1)承认国有、集体、私人、个体各种经济成份将长期存在,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2)合作社和生产集团是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合作经济单位,由劳动者自筹人力、物力,按民主原则进行管理。(3)承认社员户是自主经济单位,实行耕地承包到户。(4)取消按工分和按实物的分配方式。社员除了向国家纳税和履行合同的义务之外,剩余产品可自由流通和自主出售。国家对农用物资的供应实行商品化,不再通过中间环节从上往下供应。(5)鼓励合法致富。(6)承认农、林、渔业中的个体经济和私人经济,并鼓励其发展。(7)全面放开粮食市场,取消对城乡和地区之间粮食流通的各种限制。

1993年越南又颁布《土地法》,规定农民拥有使用耕地权的期限,一年生作物的土地为20年,多年生作物的土地为50年。该法还允许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出租权、继承权、转让权和作

为向银行贷款的抵押权。鼓励农民加大对生产的投入,按兴办家庭农庄的方式进行生产资金(含土地)的积蓄和集中,发展专业化商品生产。1993年6月,越共七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继续改革和发展农村经济、社会的决议》。决议指出“三农”(农村、农业和农民)始终是越南革命所有各个时期的战略问题,意义重大。五中全会认为越南耕地的潜力很大,且大部分集中于西原地区和九龙江平原。主张通过加大投资、兴修水利、发展交通和第三产业来发展山区,提高粮食产量;要科学种田,精耕细作,提高农作物和牲畜单产;要提高农副产品附加值及其质量;大力发展水产业;加强农业科研工作,特别是生物工程的研究及应用等。1994年1月,越共召开七届期中全国代表会议,强调要改革合作社经济,发挥社员户经济的主导作用;在自愿、互利和民主管理的原则下,国家帮助、扶持、引导各种合作经济形式的发展,把集体力量与社员户力量结合起来;按照全会精神,在农、林、渔业中改革合作社,并发展各种合作经济形式。此后,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越南农村中出现了新的生产经营形式,一些农户自觉筹集人力、物力从事家畜饲养、水产养殖、植林和农、林、水产品的加工等。

通过上述改革,越南农业生产得到较大发展:(1)耕种面积从1986年的681.3万公顷上升到1993年的761.68万公顷,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从568.9万公顷增至638.7万公顷,杂粮从112.4万公顷增至123万公顷。(2)粮食产量年均增长100万吨(折成稻谷)。1988年以前越南年均需要进口大米数十万吨,到1989年一跃成为大米出口国,当年出口大米142万吨。1996年出口大米达300万吨。(3)饲养业不断发展,水牛、黄牛和生猪分别从1989年的266万头、278万头和1180万头增至1993年的296万头、332万头和1486万头。淡水鱼从1986年的

11.18 万吨增至 1993 年的 13.97 万吨。(4)农产品出口创汇从 1985 年的 2.355 亿美元,上升至 1992 年的 8.276 亿美元,增加了 3 倍多。

3. 按工业化、现代化和合作化、民主化方向发展和开发农业、农村,进一步深化农业改革阶段(1996 年以来)。

1996 年 6 月,越共八大把七大关于 5 种经济成份中排在第二的“集体经济”的提法改为“合作经济”,并主张按照自愿、平等、互利、民主管理的原则,由低到高、从合作组到合作社发展多种多样的合作经济。八大还提出从 1996 年至 2000 年实现农业和农村的工业化、现代化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全面发展农、林、渔业,形成各个集中产区,种植、养殖结构合理,提供量多、质优的商品,保证社会的粮食安全,满足工业和国内市场需求;农、林、渔业的全面发展要与农、林、水产品加工业相结合,实现水利化、电气化、机械化和生物化等等。据越报道,越南的“农户经济”正逐步转向“农村家庭农庄经济”,并认为这是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转向农村商品性农业经济的必然发展趋势,它将为发展新的经济区作出贡献。荒地、荒山秃岭、沿海地区将成为从事经营多年生作物、水产养殖、养牛和农、林、水产品加工的大型农庄所在地。一些土地抛荒地区逐步变成富裕的商品生产区,其中农户规模式的农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西原地区的经济作物区、同塔梅的水稻种植区、龙川四角区已成为越南最大的商品农业生产区,并被视为转变地区经济结构的重要因素,对越南农业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有重大意义。

目前,越南农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农民自身能力有限,尤其是生产条件差,每个农户都有进行合作的愿望,但多为自发性的,合作形式简单。到 1997 年底,越有 4 万个小型合作组,1.36 万个合作社。(2)合作社职能虽转向从事服务业,但多是

搞农田水利服务,没有为农民做好投入、产出、销售等服务工作。(3)不少已经建立起来的多种经济成份的合作组织,未能正确处理农民与其他各方的利益关系,在利润分配上存在不公平、不平等现象。特别是国营企业,按议价向农民供应物资和收购农民的产品,不受经济关系所约束,不管价格是涨是落,遭受损失的都是农民。(4)有的合作社瓦解后,商业系统没有在农村做好对农副产品的收购、销售工作,让私商占领了该市场。(5)越农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均不如周边国家,目前越南农产品出口属生产过剩型出口,称不上是外向型出口。越大米每吨出口价比泰国低50美元。(6)农、林、水产品销售困难,利润低,农民受损。(7)农产品加工工业落后。

1997年12月,越共举行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按照工业化、现代化和合作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农业和农村,并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农业改革。主要措施有:(1)加快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并与重新部署农村劳动力紧密结合。主张建立商品率高、又有加工厂的种植区、专种区,以合作形式扶农,使农业生产稳定发展,旨在转变经济结构,形成配套出口拳头产品。要加大水利工作力度,采用生物工程,面向出口。要继续执行土地政策,决定在1998年完成向农民发放土地使用证工作,鼓励农民进行规模生产。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小手工业和第三产业。增加投资,发展基础设施,鼓励国内外投资发展农村经济。(2)解决农产品销售市场问题。要求巩固在农村的国家商业系统,特别是重视发展国家商业同合作社、农民和小商业的各种联合形式,克服由于放开农村市场而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3)在农业和农村中大力发展各种合作经济形式,革新国营单位的运作,发展边远地区的国营单位。要集中力量大力发展农民的各种合作经济形式等。目前,越南农业改革还在深入进行。

(二)工业改革及其成就

越南工业改革大致可分为以下3个阶段：

1. 探索起步阶段(1976—1986年)。

1976年越南全国统一后，提出大力促进工业化的主张，并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1976—1980年的五年期间，对重工业的投资占工业总投资的比重从30%提高到37.8%，而对轻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的投资则从70%降为62.2%，加上对南方的工业和私营企业实行过“左”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等，不仅重工业没有发展起来，而且五年间工业年均增长速度仅为0.6%，几乎踏步不前，整个五年计划没有完成。

在此情况下，越南开始探索着搞改革。1979年9月越共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发展日用品工业和地方工业的方向、任务的决议，采取了一些扩大地方、部门和基层生产单位的生产经营主动权的措施，同时提出要纠正南方社会主义改造中过“左”的错误做法。1981年越南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发挥国营企业生产经营主动权和财政自主权》的第25号决议和《关于国营企业贯彻承包、计件工资和奖金制》的决定。第25号决议提出对企业实行指令性、指导性、自主性等“三种计划”。因为第三种计划能给企业带来直接的利益，所以企业对此十分感兴趣。1984年7月，越共五届六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鼓励企业自找物资、自产自销，允许企业自筹贷款，允许企业经理解雇工人，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允许其享受应得的收入，长期经济效益差的企业要转产或解散，等等。

实行上述措施后，越南的工业生产有所发展。1984年工业生产比上年增长13.2%。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企业的自主权有限，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仍未能充分调动起来；二是企业热

衷于第三种计划,放弃第一种计划,结果造成混乱现象。加之1985年下半年越南实行物价、工资、货币同步改革的失败,在全国又引起相当大的混乱,于是1985年越南工业发展速度又开始下降,1985年增长率减为9.9%,1986年为6.2%。总的看,越南在这一阶段所采取的措施,旨在完善、维持和补充指令性计划,不是要废除旧的机制,因此,不仅使新措施、新政策作用有限,而且还使官僚主义、统包统管的机制也日益不起作用。

2. 全面和深化改革阶段(1986—1996年)。

为克服上述状况,1986年越共六大确立了全面革新的路线。六大决议通过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并决定废除官僚集中、统包统管的机制,实行社会主义定向的多种成份的商品经济。其后越南党和政府作出了一些重要决定,如:1987年8月越共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改革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的决议,决定取消官僚集中、统包统管机制;同年10月越南部长会议作出了关于扩大国营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决定,要求进一步改善国家对企业的管理,让企业有更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1988年1月越南颁布新的《外国在越南投资法》,鼓励外国企业与越国内企业以多种形式合资办厂;1988年扩大国有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改国家对企业的“指令性计划为主”为“以方向性指导计划为主”,决定到1990年全部废除所有下达给企业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对企业只有一个指标就是上缴国家财政的利润指标。鼓励企业自筹资金,广开流通渠道,允许企业自行生产和销售合同外产品。越国有企业开始走上面向市场、自负盈亏轨道。与此同时,国家对商品、物资、资金、货币等进行市场预报。国家从宏观上仍维持下达一些指令性计划指标,如:电力、汽油和化肥的进口,大米的出口额,基建总投资,重要工程项目及其投资资金等。到1989年底,越有12048个国营企业,其中

中央工业企业 1695 个,地方企业 10389 个,总共掌握着 80% 的固定资产和 80%—90% 的熟练工人和科技人员。但从总体来看,此阶段国营企业经营状况普遍不好,1986—1990 年期间,越工业年均增长速度为 5.9%,国营企业创造的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3.4%,企业产品滞销,积压产品价值上千亿越盾。70% 的国营企业开工率仅为 30%—40%。大部分企业亏损严重,拖欠债务严重。此外,许多企业钻国家政策的空子,滥发工资和奖金,大吃大喝,侵吞国家财产,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面对上述状况,1991 年 6 月,越共七大通过了《纲领》和《战略》,提出要以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为基础,并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制定了一系列措施。1991 年 9 月,越部长会议颁布了清理和整顿国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决议。同年 10 月,还颁布了关于解决国营企业破产后的债务和职工干部权利问题的决议等。同年 11 月,越共七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对一部分企业实行股份化的决定。1994 年 3 月,越南政府总理下达了关于企业联合总公司和大公司继续重新安排、成立和登记的决议。1995 年 4 月越国会通过《国营企业法》,同年 8 月,越政府总理又下达了关于国营企业重组、重新安排方案的指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这一阶段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对国营企业进行重新安排,保证国营企业生产经营有效益,并掌握关键的领域和部门,在国民经济中要占到主导地位。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扶持国营骨干企业,如扩大国营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并在使用土地、银行贷款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对长期亏损、无法维持下去的企业,或出租,或转变所有制形式,或予以破产解体。

第二,采取必要措施正确处理好所有权与使用权、国家与企

业、经理厂长与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等之间的关系。在国营企业中,广泛采取各种承包形式,贯彻执行好《国营企业法》。建立一些大型公司或大型联合企业,使之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有威信、有竞争力。

第三,对部分中小企业逐步实行股份化试点,成立股份企业、股份公司。强调实行股份化,国家要控股,使国营企业的作主权变得更加具体,从而使企业财产的管理更加严密,为从根本上铲除腐败创造条件,也是有效地巩固、发展和提高国营企业的较好措施。主张要研究并实现国家以入股、买股票等形式向其他经济成份的企业投资,在国家和其他企业互利的原则上,帮助、促进这些企业发展。

第四,大力发展由国营企业与外国企业实行多种合作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这一阶段,越南国营企业改革有较大的发展。国营企业逐步适应市场机制,大型国营企业的实力和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不断得到加强。以1994年为例,越经济发展速度为8%,而国营企业发展速度为11.6%。国营企业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占60%以上,完全控制着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和重要产品,如电、水、煤、水泥、化肥、原油等的经营权,为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奠定了基础。

3. 进一步深化改革阶段(1996年以来)。

1996年6月越共八大提出越已进入一个大力推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新时期,强调国有经济要发挥好主导作用,并与合作社经济一起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同时确定了到2000年和到2020年国营企业改革的目标。八大指出,要从根本上改革国营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机制,提高其经济效益;要发展国营企业之间及国有经济与国内外其他各种成份经济的合资、合作形

式；要加强国家的宏观管理效力，并保证所有企业和个人（不区分经济成份）在法律面前权利和义务的平等。在具体方针、政策方面，八大强调，越南国营企业是拥有先进的技术、经营效益好、上缴财政数额大的大中型企业；要把资金增值率作为评估企业经营效益的主要标准之一，以落实各项社会政策作为评估公益企业效益的主要标准；要正确履行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管理职能以及国家作为公共财产所有者的职能，各部和各级政府不干涉企业的管理经营职能和自主核算权；要积极、稳妥地实行国营企业股份化，但不是使其私有化，除国营全资企业外，还将有许多由国家控股的企业；要根据具体情况，向本企业职工或非本企业的个人和组织招股或售股，所筹集到的资金必须用于投资扩大生产经营；要合理组建各个总公司等。

八大后，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越南政府颁布了关于国营企业重组、重建和破产的决议，关于将部分国营企业转变为股份公司的决议等。特别是1997年12月，越共举行八届四中全会，对两年来贯彻落实八大决议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到2000年前要落实好的重大措施。在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方面，全会决定：（1）要运用合理的保护政策，帮助和推动企业提高其效益和竞争力。（2）鼓励并为出口创造最有利条件，允许各种经济成份的注册企业拥有直接出口权，缩小有进出口配额规定的商品范围，由税收政策取而代之；考虑建立几个经济特区、自由贸易区。（3）重新部署国营企业，划分公益企业和经营企业，确定必须保持国家独资的、国家必须控股的和国家只需占有低额股份的企业目录；对国家不必占有100%资金的企业，应制定实行股份制计划；对于拥有10亿盾以下资产、长期经营亏损而不必维持国家所有制的小型企业，应采用各种适宜的处理形式，如合并、公开招标租赁、承包经营或变卖，在

保证劳动者就业和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交给干部、工人集体经营；实行破产法所得收入首先要用于解决就业问题。(4)继续革新管理机制，整顿和提高国营企业的运营效益，使经营企业按照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机制运行；国营企业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是国家设在企业直接代表产权所有者的机构，负责保全和发展国家交给企业的财产和资金。经行政职能机关的批准由董事会聘任经理并与其签订合同。(5)确定有关各部和财政部代表国家在发展战略、规划、计划、政策、检查、监督等方面对企业进行管理的职权范围。(6)尽早颁布企业强迫性审计制度和财政公开化制度，使企业财政健康化。(7)对近年来实行的国家总公司模式进行总结，把各家总公司真正建成实力雄厚、效益高、竞争力强的经济集团，使之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8)加强国营企业管理中党的领导作用和群众组织的作用。

目前越南国营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是：技术设备落后，管理水平低，企业经济效益差，产品质量差、缺乏竞争力，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尚未真正起到主导作用等。此外，由于认识不一，国营企业实行股份化也遇到许多困难。总之，越南国营企业改革要走的路还很长。

(三) 价格改革和抑制通货膨胀

越南进行价格改革和抑制通货膨胀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1. 1975—1986 年阶段。

1975 年越南南方解放后，越南国家银行即接管伪政权银行机构，清理所有私人银行和外国银行，同时在全省、郡、县成立银行系统。1975 年 9 月在南方收回旧币并发行新币。1978 年 5 月，在全国发行并流通新币。从 1978 年起，南北双方无论是在主要农产品的收购和农用生产物资的销售或是在主要物资的批发和

日用品的销售等方面已基本实现了全国统一价格。鉴于商品供求关系一直不平衡,从1978—1980年初,越南已在全国对不同种类商品实施不同的价格制度:对一些必需品和按定量供应的商品零售价保持稳定,如:粮食、肉、食用油、鱼、燃料、鱼露、糖、布、肥皂、药品、奶、书写纸等等;对一些主要日用品实行双轨价(供应价和商业经营价);对一些高级商品实行高价。但由于收购价格不断提高,生产资料价格也日益上升,而零售价却基本稳定不变,各种价格之间的差别和矛盾日益严重。特别是自由市场价格与国家指导价格相距日远,国家预算中补亏、补价款项也日益增加,从1976年的4.42亿盾增至1978年的7.31亿盾和1980年的12.67亿盾。自由市场的价格不断上涨,与1976年相比,1978年和1980年分别增长85.1%和260%。与此同时,越南全国发行新币后,货币状况日益不稳定,现金透支很大,与1978年底相比,1980年底流通货币的数量增加了两倍,银行货币周转期越来越慢,货币购买力不断下降,给越南经济和人民生活,特别是国家职工的生活造成很大困难。

1981、1982年越南对价格进行总调整。主要做法是:一方面,政府对9种按定量供应的商品和其他一些不按定量供应的日用品仍维持稳定供应价格,另一方面,政府颁布了一个新的零售价格系统,比稳定供应价格高10—15倍;颁布了新的双向合同收购价格,比原来的义务收购价格高5倍;颁布了新的批发价格系统,比总调整前的批发价格高5—7倍。此次价格总调整后,使有组织的市场价格年均上涨200%,1982年自由市场的价格比1981年上涨了165%。越南经济、社会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财政透支日益严重,货币发行量越来越大,1983年货币发行量比1980年增加了4倍,1984年自由市场价格比1980年增长了14倍。

面对上述状况,1985年6月越共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在全国范围进行价格、工资、货币“同步改革”的决议。全会确定:废除价格和工资中的官僚集中、统包统管制是“转入社会主义核算经营的具有决定性的突破口”,它体现了越共中央的“重大战略决心”。主要做法是:要求在一段时间内从实行国家牌价、指导价和自由市场价过渡到实行一种价格,把收购价、零售价、批发价提高10倍左右,于1985年10月,公布并开始实行全新的价格系统;工资改革重点是废除票证制度,取消实物定量供应,将实物配给折成货币工资发放,并于1985年9月1日起实行新的统一的工资制度;关于货币改革,于1985年9月14日实现兑换新币,规定1盾新币等于10盾旧币,停止使用并收回旧币,同时实行越币贬值。但此次价格、工资、货币“同步改革”由于准备不周,没有把价格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在实施过程中又犯了严重错误,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目的,反而使经济、社会形势更加困难、复杂,特别是分配流通领域更加混乱,物价飞涨、财政赤字巨大、货币不断贬值,越政府不得不靠增加货币发行量来弥补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日益严重。1986年通货膨胀率高达774.7%,财政透支占国家财政支出的22.7%,超过国会批准的10%的规定,物资供应只达到年计划的20%—30%。至此,“同步改革”已告失败。

2. 1986年以来阶段。

1986年12月,越共六大政治报告指出,越在分配、流通领域中的错误是“过去五年在领导工作和经济管理方面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并强调价格改革必须综合利用各种规律,其中价值规律具有直接的影响。价格要与价值相符合,同时必须与货币的购买力相适应。六大后,越南共产党和政府从本国国情出发,对通货膨胀采取一系列综合治理措施,经过几年的探索实

践, 艰苦努力, 在抑制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其主要措施是:

(1) 放开物价。1989年以前, 越南价格系统基本上是由国家物价委员会制定的国家价格系统。与此同时还有自由市场价格。国家制定的价格一般都低于商品价值, 而自由市场价格则由供求关系所决定, 且高于国家牌价1—2倍。这就易被投机者所利用, 他们以低价购买国家供应的商品, 然后在自由市场高价出售以牟利。由于越实行的是价格双轨制, 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因此, 从1989年第二季度起, 越南部长会议决定废除国家物价制度, 除少部分重要进口物资, 如钢材、化肥、汽油以及电、交通运输、邮电等价格由国家根据市场价格情况决定外, 其余所有物资、商品价格一律放开, 由市场来确定价格。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粮食价格也于1989年4月放开。越共认为, 上述决定极其重要。此后, 越南价格系统转入了市场价格系统, 废除了低价格的统包统管制, 从而减少了财政赤字。

(2) 利率实行浮动。坚持银行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高于通货膨胀率。1989年2月通膨率为9.2%, 越政府规定的月存款利率为12%。同年4月通膨率为3.5%, 银行月贷款利率为6.5%。其后, 尽管月利率有所下调, 但均高于通膨率。越南认为, 这一措施是空前之举, 促进了货币和商品的流通。

(3) 严格控制货币的发行。从1989年起, 越严格控制通过国家银行超量发行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据越统计, 1988年越南货币量增加445%, 物价相应增长441%。1989年货币量增长减至189%, 物价涨幅降到只有70%。1989年后越南继续有效控制货币的供应, 物价也随之下跌。值得指出的是, 从1992年起越南不再靠发行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 而是根据货币流通的需求来发行货币。为此, 越南政府重视开源节流, 并通过向国

内外举债以弥补财政赤字,强调举债时要注意考虑偿还债务的能力和合理、有效使用借款。

(4)实行浮动汇率,并根据市场变化进行调整。1989年以前,越南汇率由国家制定,并低于自由市场上实际汇率。官方公布的外汇固定牌价没有正确反映汇率的实际情况。因此,人们纷纷把手中的越币换成美元以保值。从1989年3月起,越南政府允许国家银行根据自由市场汇率来确定大体相等的官方汇率。1989年1至2月,自由市场上越币与美元的汇率高于官方牌价1800—2450盾,但1989年3—12月,仅高于官方牌价250—359盾。1990年以来,该差价相差无几。越国家银行每天公布官方汇率。近年来,越盾币值已稳定在1美元兑换11000越盾左右。1998年以来,因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美元与越盾的汇率略有上升,但仍基本稳定。

由于采取上述得力措施,越通货膨胀得到有效的控制,越通胀率基本上逐年下降,从1986年高达3位数的774.7%降至1989年的两位数34.7%。自1990至1997年越年通胀率分别为67.4%、67.6%、17.6%、15.2%、14.4%、12.7%、4.5%和6.7%。

此外,越南之所以能够有效控制通货膨胀还与越实行多种经济成份政策、废除国家独家经营制度、鼓励健康竞争、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改革经济计划化制度以及大力发展生产、增加商品供给、扩大对外开放等有密切关系。总之,近年来,越南经济一直保持高增长、低通胀势头,为世人所称道。

(四)对外开放及其成就

1. 为扩大对外开放创造宽松的国际环境。

1976年全国统一后至1986年底,越南与苏联及东欧国家

关系十分密切。政治上,越共五大把苏联作为越南的“最强大、最可靠的盟友”,称越同苏联的团结和全面合作始终是越党和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石。经济上,越共六大进一步提出越南把同社会主义共同体,首先是同苏联的紧密联系作为越南对外经济战略的基石。越南对外经济关系主要是与各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密切贸易关系,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仅占对外经济关系的很少一部分。特别是1978年底,越南出兵柬埔寨后,外交上十分孤立,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终止对越的经济援助,并对越实行经济制裁,越基本上断绝了与西方的经贸关系。为摆脱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局面,为革新事业创造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争取更多的西方国家的援助、技术和市场,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在调整国内政策的同时,开始调整对外政策,主张奉行多元化的对外政策。1987年越南国会通过了第一部《外国投资法》,1988年初,越南国会决定修改宪法,接着以从柬埔寨撤军为契机改善对外关系,并于1991年11月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1991年越共七大和1992年越南新宪法又明确规定,越奉行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在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世界上所有国家扩大交流与合作。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1996年越共八大进一步确定,越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国际关系多样化和全方位的外交路线,强调把政治外交和经济外交紧密结合起来,提高对外活动的效果。近年来越外交工作十分活跃,迄今越已同170多个国家建交,与120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经贸关系,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越有直接投资,许多国际和地区金融组织也积极与越发展双边或多边经济关系。所有这一切为越坚持全面革新路线、扩大对外开放创造了宽松的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2. 调整出口战略,扩大对外出口。

(1)关于出口战略。越南把出口视为越3大经济任务之一。过去,越对外经济活动主要集中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在越主张同一切国家和经济组织实现经济关系多样化和全方位。武文杰在六大上指出,出口是越整个对外经济工作中的主要环节,具有关键意义,必须成为各部门、各级共同关心的问题。过去,越对外经济管理机制是按集中计划化模式进行,由中央统一经营,生产与市场脱节,其中一些总公司、中央的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特权,控制着价格、利润等。现在,越对外经济活动虽然仍由政府统一宏观调控,但在管理机制上更加宽松和民主了。原来由国家独家经营外贸,现在除各专营公司外,国家允许其他各种经济成份的生产企业可以依法直接经营进出口业务。允许地方政府在外贸、旅游等方面也拥有一些权限,并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地方和企业多出口创汇。越共八大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增加出口,把出口视为对外经济的优先环节和重心,扩大和提高对外经济的效益。

(2)关于出口产品结构。目前,越主要出口产品是初级产品,因此,越共八大强调要调整出口商品的结构,增加出口拳头产品,提高出口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降低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增加深加工和精加工产品的出口比重,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比重等。

(3)关于出口市场。1989年以前,越出口市场主要是苏联、东欧各国。苏联东欧剧变后,资本主义国家市场日益成为越出口的主要市场。迄今,越已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关系,其中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贸易协议,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逐步增加。越称,这表明越扩大出口市场和实行出口市场多元化的主张是正确的。1994年至1995年越出口市场比重如下:日本占27%,新加坡占16%,欧共体占15%,香港

占 5%，韩国占 4%，中国、台湾省、独联体各占 2%。

3. 建立出口加工区、集中工业区，大力吸引外资。

(1)建立涉外政策法规。1987 年越国会通过了第一部《外国投资法》，以优惠的条件、灵活多样的方式和宽广的投资领域吸收外资，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之后，越又于 1990、1992 和 1993 年分别对该法进行了修改、补充，并制定了具体实施细则，以比较优惠、宽松的条件吸引外国资金。为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越国会于 1996 年 11 月又通过了一部经过修改、补充的《越南外国投资法》，同原外资法相比，条文内容更加广泛、详细、明确，条件也更加优惠、宽松。

越革新开放后，外界在越投资大幅度增长，截止 1998 年初，已有 60 个国家和地区向越投资，累计 2363 个项目，协议金额约 362 亿美元。截止 1997 年年中，在越的四大投资者为：新加坡、台湾、韩国和日本；越南五大贸易伙伴为：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和香港。1997 年底以来，因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越吸引外资明显下降。

(2)建立出口加工区。为吸引更多的外资和技术，越南于 1991 年 10 月颁布了关于建立越南出口加工区的规定，并于 1992 年经修改、补充后写进《外国投资法》。新外资法明文规定建立出口加工区，允许外资向该区投资，免征进、出口税；外商可根据投资许可证规定的目标和范围进行自主经营，进口设备、直接或委托出口、销售自己的产品；有权转让投资股金；可在国外的银行开立贷款帐户等等。至今，越南已有 7 个出口加工区：海防出口加工区、岘港出口加工区、胡志明市的灵中出口加工区和新顺出口加工区等。

(3)建立集中工业区。与出口加工区不同，外商在集中工业区投资，产品不一定全部都要出口，部分产品可以内销越南。自

1994年底越政府颁布建立工业区的规定以来,迄今,越已在河内、海防、岘港、胡志明市及同奈、巴地—头顿、平阳等省建立了50多个工业区。

应该看到,由于越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干部素质差,贪污腐败严重,政策法规不配套,加上越配套资金不足等等,影响了外国投资者在越投资的信心和外资落实、到位的比率。但总的看,越对外开放前景是好的。

(五)政治体制改革与精神文化建设

六大后,经过5年的探索、实践和总结,到了1991年6月的七大,越共政治改革的思路更加明确。越共七大政治报告对政治改革的目标、必要性、重要性、要求、方针及政治改革的实质等都作了明确的阐述。

七大后,越共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逐步加大政治改革力度。1996年6月越共八大把10年政治改革的经验教训归纳为3条:

第一,强调从总体而言,越共革新事业是从更新路线和对内对外政策的政治思维开始的。认为没有这一革新,就没有其他一切的革新。强调越党的正确之处,就在于首先致力于胜利实现经济改革,消除经济、社会危机,奠定物质和精神的必要前提以保持政治稳定,巩固人民的信心,为社会主义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创造了顺利条件。

第二,强调在改革政治系统的组织和活动机制方面,步子要慎重、稳妥,要从解决最紧迫和已经成熟的问题开始,并要求认识到这是十分必要但又特别复杂、敏感的事。如果匆忙而犯错误,就将付出十分昂贵的代价,有时甚至是不可收拾的。

第三,强调政治系统的改革主要目标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

会主义民主,充分发扬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强调一大经验教训是民主必须与纪律纲并举,要克服违反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现象,同时要反对极端、过激的民主倾向。坚决揭穿利用“民主”、“人权”制造政治混乱、反对并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或者干涉越南内政的一切阴谋。重申越不接受多元化、多党制。

越南政治改革的主要特点是:1. 重视党建工作,开展整顿和纯洁党的运动,改善和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战斗力,加强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领导,确保党在革新事业中的领导地位。2. 发挥人民当家作主权利,改革国家机构,建设和完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强调建设和完善国家体制必须贯彻以下方针:(1) 建设一个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为了人民,由共产党领导的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知识分子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充分贯彻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严守社会道德,对侵犯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一切行动实行专政。(2) 国家的权力是统一的,国家机关间在行使立法权、执法权和司法权时,要既有分工,又有配合。(3) 在国家的组织和活动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4)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建设一个法制化的越南国家;依法管理社会,同时重视教育和提高道德水平。(5) 加强党对国家的领导作用。3. 重视革新和提高国会的立法工作质量,加强国会对外国机关的一切活动进行最高监察。4. 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强调党要统一领导干部工作和管理干部队伍。5. 积极进行反腐败斗争,重视从政治、思想、行政等各方面采取措施,防范和严惩贪污腐败和其他不法行为,同时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树立新人。

随着越南革新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在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新旧体制转轨、引进外资等过程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蔓延,一些党、政领导干部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政治蜕化、道德败坏、生活腐化堕落、营私舞弊、贪污受贿、走

私漏税、非法致富、侵吞国家财产,使国家经济蒙受巨大损失,严重影响了越共在人民中的威信。广大人民群众痛斥为“国难”、“国祸”。据越统计,1992—1996年,已有12613名腐败干部受到行政处理,3448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仅1996年就有3713名腐败干部受到行政处理,1921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对此,越共已引起高度重视。首先,越共把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道德品质下降视为当前越面临的“四大危机”之一,把反腐败斗争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来抓。其次,从政治、思想教育等方面加强反腐败斗争力度。一是重视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和管理,对干部进行勤政廉政教育,同时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模范和监督作用;二是重视加强革命传统、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文化;三是加强对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防范,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宣传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增强对党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认清“和平演变”的阴谋手段。再次,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具体防范、惩治措施。自1990年以来,越党、政领导机关颁布了许多文件,1996年1月越决定成立政府反贪污反走私工作委员会,1998年3月,越公布《干部、公务员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法》和《反贪污法》,并采取法律制裁、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综合治理措施,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越还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1995年以来,越政府陆续颁布了《关于加强文化和文化服务业的管理,严厉打击和清除严重社会弊端的决定》等一系列政策规定和措施,要求各级加强对旅游景点、文化娱乐场所的监督、检查工作,严打不法行为,巩固社会主义文化阵地。1998年7月,越共召开八届五中全会,专门讨论了关于“建设和发展先进的、具有浓厚民族本色的越南文化”问题。全会在肯定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强调指出在文化精神生活中的消极现象越来越严重,为数不少的部分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包括一些

有职有权的人在道德和生活方式方面堕落衰退,特别是一些有职有权的党员、干部贪污腐败,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削弱了人民对党的信任,危及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全会在总结存在问题的主、客观原因时强调,许多党委对领导建设和发展文化工作不力,对党内和国家机关中出现的蜕化变质分子处理不严,许多党员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衰退,没有建立起进一步充分发挥人民内部力量的机制和政策等。全会指出,今后一段时间里,建设和发展文化的具体任务是:培养品德高尚的越南人;创造良好的自然和文化环境;发展文化艺术事业;保存和发展文化遗产;发展科教事业;发展和管理好大众传媒系统;保护和发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实行宗教文化政策;扩大国际文化交流;建立和完善文化体制。从现在到2000年以及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心任务是在社会中,首先是在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每个家庭中建设健康的思想、道德和生活方式。为此,越共决定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竞赛运动,制定有关文化的法律和各项政策,增加文化投资,并决定在党、政机关开展思想、道德和生活方式方面的组织生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

此外,越共还重视发挥祖国战线及各种政治、社会团体在政治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越共八大强调要巩固和扩大这些组织及其活动。指出祖国战线及其成员是人民政权的政治基础,是协调、统一各阶层人民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及国家法律的机关,参与党和国家监督执行民主,关心和维护各阶层人民的正当利益,保障党和政府贯彻执行经济、文化、社会、国防、安全和外交任务,为加强人民与党和国家的密切联系作出贡献。为此,越党强调,在作出重大决定和方针的过程中,要形成党和国家与祖国战线讨论并征求意见的制度。

五、冷战后的越南共产党

越南共产党约有党员 220 万人,其中 1976 年全国统一前入党的老党员占 50%。全国共有基层党组织约 4 万多个。越南共产党的组织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集体领导个人负责。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由中央委员会召集,通常每五年召开一次。

1996 年 6 月 28 日—7 月 1 日,越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杜梅再次当选党中央总书记。

越共八大政治报告的基调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全面革新为核心内容的路线,强调“改革而不改色,融入而不融化”。政治报告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形势以及越南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认为越共七届期中全国代表会议(1994 年 1 月)指出的“四个危机”(经济发展滞后、和平演变、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以及官僚、腐败和道德品质下降)“至今仍是重大的挑战”。“这些危机互有联系、相互作用,都是危险的,不能对任何一个危机掉以轻心”。报告重申越共将继续坚持革新路线,坚持以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作为党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强调“党的领导和活动是革新取得成就的一个决定因素”,保持和增强党的工人阶级本质是当前“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任务”,“必须坚持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目标。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动摇,不背离这一目标和思想”。

越共八大在人事安排上有重要变化。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实现了大幅度的年轻化,但最高领导权暂时维持原状。其特点是(1)中央委员会大幅度年轻化,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70 人,

其中近 50% 是新人。(2) 新中央政治局大体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方针。新政治局共 19 人, 其中超过 70 岁的 5 人(杜梅、黎德英、武文杰、国防部长段奎和主管意识形态的阮德平), 50 岁以下的 2 人(阮晋勇和张晋创, 均为 47 岁); 年龄为 60 岁以下者居多数。(3) 核心领导班子仍具有过渡性。八届中央政治局选出 5 名常委作为领导核心, 其成员为: 杜梅(79 岁)、黎德英(76 岁)、武文杰(74 岁)、黎可漂(65 岁, 原越军总政治部主任)、阮晋勇(47 岁, 原内务部副部长)。

1997 年 12 月 22—29 日, 越共召开八届四中全会, 决定接受杜梅、黎德英、武文杰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 并委任他们为中央顾问。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黎可漂接替杜梅任越共中央总书记, 增选了四名政治局委员, 并于 1998 年 1 月 6 日决定成立由 5 人组成的新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附:

(一) 越共新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

黎可漂	总书记
陈德良	国家主席
潘文凯	政府总理
农德孟	国会主席
范世阅	主管政治局日常工作

(二) 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

1931 年 12 月 27 日生于清化省东山地区, 农民家庭出身。1946 年参加革命。1949 年加入越南劳动党, 1950 年入伍。1967 年 7 月任步兵 304 师 9 团政委, 同年 9 月任步兵 304B 师政委、党委书记。1974 年 5 月任第二军区政治局局长, 上校军

衔。后任军区副政委。1982年晋升少将军衔，任第九军区副司令兼979司令部司令。1988年7月任478兵团副司令，主管部队政治思想和党的工作，中将军衔。1988年任越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91年在越共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升任越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事党常委，兼任越共中央军事党委检查委员会主任。1992年6月在越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7月晋升为上将军衔。1994年1月在越共七届期中全国代表会议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96年6月在越共八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1997年12月在八届四中全会上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1992年9月当选为第九届国会代表，1997年9月当选为第十届国会代表。

(三)越南共产党重要会议一览表

届次	时 间	地 点	代表人数	党员人数	当选的主要领导人
第一次 全国代 表大会	1935年 3月27 —31日	澳门 (中国)	大会代表15名 正式代表12名	约600	总书记阮文渠(1938—1940年) 总书记长征(1941年起)
第二次 全国代 表大会	1951年 2月11 —19日	河宣省 沾化县	大会代表191名 正式代表158名	约74万	党中央主席胡志明 总书记长征(1956年止)
第三次 全国代 表大会	1960年 9月5— 10日	河内市	大会代表576名 正式代表525名	50多万	党中央主席胡志明(1969年9月止) 中央第一书记黎笋
第四次 全国代 表大会	1976年 12月14 —20日	河内市	1008名	约150万	党中央总书记黎笋
第五次 全国代 表大会	1982年 3月27 —31日	河内市	1033名	约173万	党中央总书记黎笋(1986年7月止) 党中央总书记长征(1986年7月起)

续表

届次	时 间	地 点	代表人数	党员人数	当选的主要领导人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6年 12月15—18日	河内市	1129名	近200万	党中央总书记阮文灵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1年 6月24—27日	河内市	1176名	约215万	党中央总书记杜梅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6年 6月28日—7月1日	河内市	1198名	约213万	党中央总书记杜梅
八届四中全会	1997年 12月22—29日	河内市		约220万	党中央总书记黎可漂

第9章

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老挝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曾给老挝造成较大冲击。但老挝党顶住了压力，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并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理论和政策继续进行了反思和调整。老挝人民革命党认为，老挝还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当前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其任务是“巩固和完善人民民主制度”，为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物质基础。1991年3月老挝人民革命党五大重申坚持“六项基本原则”。同年8月颁布的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宪法》，规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是人民民主国家”；“老挝人民革命党是人民民主政治体系的领导核心”；并将建国后长期使用的政治口号“将老挝建设成为和平、独立、民主、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国家”中的“社

会主义”改为“繁荣昌盛”；把国徽图案中的五角星、镰刀、斧子改为老挝民族的象征——塔銮佛塔。老挝人民革命党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在国内实行“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前进的方向是社会主义。

一、概 述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位于印支半岛北部，北部与我国云南省交界，东部与越南为邻，南部毗邻柬埔寨，西部和西北部分别与泰国、缅甸相接。面积 23.68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我国云南省面积的 2/3），人口 484.2 万（1997 年）。老挝建于公元 749 年，近代长期遭受外国殖民主义统治。1893—1940 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940—1945 年又被日本占领。1945 年 8 月老挝人民举行武装起义，10 月 12 日宣布老挝独立，成立了以佩差拉亲王为首相的老挝独立政府。但 1946 年 3 月再度被法国占领，老挝独立政府解体。

早在 30 年代印度支那共产党（简称印支共）即已成立，当时老挝的革命者加入印支共。1951 年 2 月，印支共二大决定印支 3 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分别建党。1955 年 3 月 22 日“老挝人民党”宣告成立，1972 年二大改称为“老挝人民革命党”。老挝人民革命党长期处于秘密状态（1975 年 10 月公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其领导的公开的统战组织——“老挝爱国战线”贯彻执行。1972 年老挝爱国战线领导的武装力量已解放了全国 3/4 的土地，1/2 的人口，解放区

南北连成一片，并建立了各级民主政权。1973年2月爱国战线同各爱国力量一起与以富马为首的万象政府签署《关于在老挝恢复和平和实现民族和睦的协定》。1974年4月以富马为首相的第三次联合政府和以苏发努冯为主席的民族政治联合委员会宣告成立。1975年5月在柬埔寨、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相继取得胜利的有利形势下，老挝人民奋起开展夺权斗争，相继建立各级革命政权。同年12月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老挝人民革命党公开执政。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宣布：“老挝已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开创了走向独立、自由和社会主义的新纪元”。

革命胜利后，老挝人民革命党认为，根据列宁的有关论述，“老挝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从1976年开始，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随后在全国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农民的余粮实行国家收购政策。由于政策过激，脱离了老挝实际，造成经济停滞生产下降。1979年11月老挝人民革命党二届七中全会对经济工作失误进行反思，随后进行调整和放宽政策。1986年11月老挝党召开四大，明确老挝革命的目标是要实现社会主义，但目前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仍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从而提出了“革新开放”的战略方针。1988年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政治体制也逐步进行了一些革新。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给老挝的政治、经济造成较大的冲击，但老挝党顶住了内外压力。1989年1月老挝党提出当前老挝处于“巩固和完善人民民主制度，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同年10月老挝党又提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等“六项原则”。1991年3月老挝党召开五大，重申了老挝党对老挝所处

历史阶段的论述。同年8月老挝最高人民议会通过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规定“老挝人民革命党是人民民主政治体系的领导核心”。1996年3月老挝党召开六大，重申继续实行“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并制定了1996—2000年和到2020年的老挝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方针及具体任务。

二、对苏东剧变和社会主义前途的看法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老挝的冲击较大，但老挝党的态度鲜明，立场坚定。

(一) 老挝对苏联东欧的变化持批评态度。1989年12月，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代理国家主席富米·冯维希说，过去老挝一直提向苏联学习，现在苏联正在变化，不能再这样提了。斯大林虽然有错误，但他领导战胜了德国法西斯，不能把他比作希特勒。全盘否定斯大林，对社会主义事业不利。1990年2月，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万象市委书记兼市长西沙瓦·乔本潘在一次谈话中说，东欧国家已经放弃共产党的领导，背离了社会主义。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果统统被毁掉了。戈尔巴乔夫宣布废除宪法第六条，即党的领导地位，搞多党制和民主社会主义，这是违背马列主义原则的。同年4月，他又说，社会主义国家确实需要改革，不改革就不能发展。但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搞改革，全是民主社会主义那一套，背离了马列主义，显然是错误的。同年11月，老挝党中央政治局认为，由于帝国主义的颠覆阴谋，右倾机会主义的背叛，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崩溃。苏联遭到削弱和分化，陷入严重危机。革命与和平的靠山社会主义体系已不复存在，力量对比

日益不利于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目标的国家。

(二) 分析了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的原因。1991年12月召开的老挝党五届四中全会认为,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一是没有坚持马列主义原则,放弃了民主集中制,搞“民主化”;二是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造成思想混乱;三是没有及时、有效地改变过去僵化的经济体制,经济没有搞好;四是受国际上意识形态淡化思潮的影响,放松了警惕。实际上资本主义始终在向社会主义进攻,只是方式方法有所改变而已。对此要提高警惕,保持清醒头脑。

(三) 及时采取积极措施,统一全党思想,稳定国内局势。柏林墙事件发生不久,老挝党四届八中全会(1989年10月底)明确提出要坚持“六项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列主义是党的思想基础;党的领导是一切胜利的决定因素;坚持在集中原则基础上发扬民主;增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和效力;坚持真正的爱国主义和纯洁的国际主义相结合。随着苏东剧变的影响波及老挝,老党领导人表示老党坚持马列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目标不动摇。在党内开展学习和讨论,统一全党认识,并对主张搞自由化的人采取了措施,迅速平息了反政府武装的袭扰,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四) 总结反思,提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一步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老挝党政领导同志反复强调:苏联东欧已变色,西方宣传说到本世纪末,地球上的社会主义将不复存在了,老挝党认为这只是幻想。目前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但坚信一定能克服困难,重新获得发展。无论在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多少困难,世界局势还会发生多么严重复杂的变化,老挝党决不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目标。无论如何,老挝仍要坚持马列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老挝党曾多次表

示，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得逞后，必定把矛头对准中、越、老、朝、古等国，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团结起来对付共同敌人。

老挝领导人除一再重申坚持“六项原则”外，又强调“五个观点”，即：1. 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2. 资本主义本质没有改变。3. 改革是客观需要。4. 坚定社会主义目标，牢牢掌握六项原则。5. 加强思想教育，提高革命品质，加强内部团结和思想统一。

老挝党还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他们说，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作为自己的思想理论基础，同时也要吸收人类智慧的精华，并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运用各国的科学理论和经验。

三、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老挝人民革命党于1975年夺取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之后，对社会主义认识和实践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大体上经历了3个阶段：

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75—1979年）。

在1972年召开的老挝党二大上通过的《老挝人民革命党政治纲领》，就明确提出“老挝将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建国后，老挝党认为老挝已“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阶段”，把苏联视作社会主义建设的楷模，把加强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友好关系与全面合作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柱石。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搞建设。老挝把发展生产，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希望寄

托在开展“三大革命”（即生产关系革命、科学技术革命、思想文化革命）运动上，以便“彻底改造和消灭资产阶级”，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胜谁负的问题”。在这一《纲领》指引下，老挝脱离本国实际，照抄外国做法，着重变革生产关系，大抓社会主义改造，急于实现国有化、农业合作化，执行了一系列过“左”的政策，阻碍了生产发展，使经济陷入了困境。

老挝全国解放后，老挝党认为老挝已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开创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新纪元”。随即迅速开展“三大革命”。

一是对原王国政府控制区的私营工厂企业实行国有化或公私合营。进行公私合营时，政府不投资，硬性规定要占51%的股份，加上有些企业领导不懂经济、不善经营、缺乏管理经验，致使工厂企业年年亏损，靠国家补贴过日子。对私营商业则推行“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严格限制私商的经营活动和经营范围，禁止私商收购稻谷和牲畜，禁止从事进出口贸易，并以原价的1/20强行收购私商已进口的商品，并且规定私商销售的商品必须从国营商店进货，对销售价格也作了严格规定，甚至还以“征用”或“代管”名义占用私商的汽车和货物，严重损伤了私商的积极性。

二是在农村实行余粮征购，推行合作化运动。规定农民的余粮不得在市场上出售，必须如数卖给国营收购站，否则将被没收。1976年9月28日政府颁布的《农业税条例》，规定农户从年收成中扣除下一年的种籽和每人100公斤免税粮后，剩余部分按“少产少征、多产多征”的原则，由500公斤以下征税8%，逐渐递增至2500公斤以上征税30%，大大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8年5月，老挝党决定在全国开展农业

合作化运动，为了尽早把农民组织起来，规定到1980年底要在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即全国70%—80%的农户加入农业社。为了完成上述指标，农村基层干部采取了种种办法，强迫或变相强迫农民入社，并让入社的农民表示“本人系自愿入社，愿将土地、耕牛无偿交集体使用”，搞得农民不入社不行（因为农村小学不收非社员的子女入学，供销社不为非社员户提供服务），入了社利益又受损害。

三是统战政策过“左”。对数以万计的旧军政人员，包括一些在1975年8月老挝党开展夺权斗争时曾宣布起义、支持老挝人民革命党的人，也不加区别地统统送往老挝北部山区老根据地去进行改造。

上述政策造成了严重后果。由于政策脱离了老挝当时的社会经济实际情况，致使工厂主、私商纷纷外逃，资金大量外流。工厂因资金不足、原材料缺乏而被迫停产或开工不足。原有商业秩序被打乱，新的商业秩序一时又建立不起来，加之关闭了边境口岸、断绝了商品来路，造成商品匮乏、物价飞涨、市场萧条。农民纷纷要求退出农业社，有的农民宁肯砍掉果树、杀掉耕牛，也不愿交给合作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加上连年遭灾，使全国粮食总产量多年徘徊不前。1976年粮食总产量为85.8万吨，1977年仅为53万吨，1978年为79.6万吨，均低于建国前的产量（1973年为88.4万吨，1974年为90.5万吨）。不少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大，造成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知识分子的大量流失，对老挝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使老挝经济陷入了困境。

第二阶段：初步总结经验教训，酝酿改革阶段（1979—1986年）。

在困难和挫折面前，老挝党重新认识本国国情。1979年

11月，凯山总书记在答外国记者问时说，在走向社会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老挝存在着5种经济成份，即：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公私合营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同年12月，凯山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表示：在存在着私营经济的过渡时期里，“任何政党，如果禁止人民交换商品、从事贸易，都是不合适的，实际上是愚蠢的。一个政党如果实行这种政策就等于自杀”。他还进一步指出，“我国的私营经济，对生产和生活仍然是有用的，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利用它。”随后老挝党采取了一些调整和放宽政策的措施。如：1985年11月，凯山提出了“把责任与劳动成果挂钩，实行承包制”的主张，并开始有部分农业社进行承包试点。后来，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在谈到建国初期这段经验教训时说：“我们主要的缺点是急于铲除非社会主义经济。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搞工业国有化、农业合作化。”以往所犯错误的原因是“对老挝国情的估计不符合实际，犯了急躁冒进，超越阶段，取消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错误。一切都想国有化、集体化，加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他在党的五大上，把以往的工作失误概括为两点：“一是照抄外国模式，二是没有独立自主。”

自1979年11月老挝党召开二届七中全会之后，老挝党陆续采取了一系列调整和放宽政策的措施：

——1979年12月10日宣布进行货币改革，发行新货币取代旧货币，并调整了外汇牌价。

——新货币发行后，随即大幅度提高干部职工工资，并发放生活补贴、家庭补贴、艰苦地区补贴和加班费等。

——1980年元旦宣布提高粮食、牲畜和其他农产品的收购价。

——1980年1月8日政府决定放宽对私商从事商业活动的限制，并允许私商从事日用品的进出口贸易。1981年2月发表了《关于进出口业务公告》，对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进出口商品作了明确规定。

——1980年6月老挝党中央发布《关于整顿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若干问题的紧急指示》。要求各地农业社严格遵守“自愿”、“国家、集体、个人共同受益”和“民主管理”3项原则，并把原定在1980年底基本实现合作化的计划推迟到1985年；把原定要求70%—80%的农户入社，降低为平原地区入社农户应占60%—70%，山区应占30%—40%。

——1980年8月颁布了《关于农业税规定的通告》，对1976年的农业税政策作了较大的调整，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从1984年起，陆续解散一些农业合作社，让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1985年1月凯山总书记提出了“把责任与劳动成果挂起钩来，实行承包制”的主张，并开始有部分农业社进行承包试点。

——1985年颁布《国营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开始进行改革试点。

由于老挝党适时地总结经验教训、调整了部分经济政策，尽管这些调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和观念，但仍然使老挝建国头10年（1975—1985年）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成就：全国耕地面积由1976年的58.2万公顷扩大到1985年的79.4万公顷，农田灌溉面积增大3倍多，粮食（包括杂粮）总产量由74.4万吨增至154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由245公斤增至426公斤，实现了粮食自给。新建公路1628公里，桥梁377座，全国80%的省份已通汽车。普通教育、

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扫盲工作都有发展。商业、外贸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员外流现象逐步消失，国内政局基本稳定。

第三阶段：重新认识国情，开创革新开放新局面（1986年以来）。

1986年11月，老挝人民革命党召开四大，纠正过去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思想，明确提出了要“革新开放”的方针。随后党的历次会议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老挝还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当前的任务是“巩固和完善人民民主制度”，并正式提出了要实行“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

党的四大，审议并通过了总书记凯山·丰威汉所作的《政治报告》、政治局委员诺哈·冯沙万所作的《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的方向和任务的报告》和政治局委员西宋喷·洛万赛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及相应的决议。《政治报告》除表示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外，还提出了关于革新经济体制的一些设想。大会对建国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认为“党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存在主观、急躁思想；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存在过分集中、官僚、统包和不充分考虑经济效益等问题”。凯山总书记指出：“我们主要的缺点是急于铲除非社会主义经济，如在工业方面，在尚无条件进行管理的情况下，就把一切工厂收归国有；在贸易方面，有阻碍地区间商品交流的现象，对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不良影响；急于完成合作化运动，以为这样会加速社会主义，不考虑农民的觉悟、干部的管理水平和生产的发展水平，就强迫他们入社”。大会认为，高度集中、行政统包的经济管理体制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大会指出，老挝革命的最终目

标是实现社会主义，但当前老挝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以后还要经过若干阶段和相当长的时间。

1989年1月，老挝党召开四届七中全会。凯山总书记在全会上发表的讲话，反映了老挝党对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重大变化。老挝党重新认识本国国情，认为老挝农民占全国人口的90%，农林产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生产力水平和国民经济的起点很低，迄今为止仍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因此，“目前老挝尚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老挝党在总结本国革新实践和借鉴外国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1. 老挝仍处在建设和发展人民民主制度、为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创造必要条件的历史阶段。2. 老挝现阶段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发展生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各方面需要之间的矛盾。为此，当前老挝最迫切的任务是大力发展商品生产，逐步把老挝的自然、半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3. 老挝现阶段的所有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经济成份包括：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股份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国家职工和合作社社员的家庭经济、对外合作经济。各种经济成份在国家的指导和监督下有生产和流通的自由权。国家允许生产工具私人占有，但资源、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人民群众依法享有使用权。4.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凯山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将走向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种在国家的指导监督下，国家利益和各种经济成份利益之间的联合。只有把商品经济建设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才能在人民民主制度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生产。

1989年10月底，老挝党四届八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六项原则。1991年3月老挝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四届七

中全会关于目前老挝所处历史阶段的论述，重申坚持六项原则。随后，又将五大确定的上述基本原则写进了同年8月颁布的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宪法规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是人民民主国家”；“老挝人民革命党是人民民主政治体系的领导核心”；“国会和国家机关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和活动”；“国家鼓励各种经济成份在生产经营中相互竞争和合作，各种经济成份在法律面前平等”；并将建国后长期使用的政治口号“将老挝建设成为和平、独立、民主、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改为“繁荣昌盛”；把国徽图案中的五角星、镰刀、斧子改为老挝民族的象征——塔銮佛塔。

1996年3月，老挝党召开六大。大会政治报告重申老挝今后将继续坚持老挝党五大提出的“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其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政治上以老挝人民革命党为核心，继续建设和发展人民民主制度，为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创造基本条件。坚持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为主要内容的六项原则。

政治报告总结了10年革新取得的“五条经验”：1. 加强全党全民团结统一和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是革新事业成功的决定性因素。2. 一切靠人民、为了人民是党的一贯宗旨。3. 维护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宁是革新的必要条件。4. 加强党对各个领域的领导和提高国家机关的管理效能是革新沿着党的路线和目标前进的保证。5. 本国的力量与时代的力量相结合，有原则地争取国际援助是老挝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六大通过的新党章增写了老挝人民革命党是“领导核心”、“领导实行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等内容。

经济上将进一步完善五大以来的革新措施和经济政策。大会制定了从1996年分别至2000年及至2020年的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今后五年（1996—2000）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8%—8.5%，至2000年人均收入达到500美元（1996年为350美元）。至2020年基本摆脱不发达状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一定程度的现代化。为实现上述目标，老挝党重申继续贯彻“三多一平等”的经济结构，即：多种所有制成份、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组织形式长期并存的方针；各种经济成份依照市场经济机制在国家管理下开展活动，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在发挥各种经济成份积极作用的同时，今后还必须继续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并使之在某些部门起骨干作用。政治报告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从一开始就建立农林业与工业和服务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以农林业为基础，以建立优势工业为重点，大力发展服务业，逐步实现现代化。大会要求着手研究制定长期发展战略（即到2020年发展目标纲要）。

外交上，老挝今后外交活动的目标，旨在为老挝继续革新事业创造有利的环境，树立老挝在国际舞台上的良好形象，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广交朋友，争取各方援助。报告认为，总的来看“国际形势仍复杂多变，新旧矛盾交错，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老挝今后将继续奉行五大制定的和平、独立与各国友好合作的外交政策，但又作了必要的调整。

以上表明，老挝党从1986年革新起步开始，逐步完成了革命阶段、中心任务、外交路线的“三个转变”，开创了老挝革新和建设的新局面。

四、革新开放事业的进展及成就

老挝自1986年人民革命党的四大之后，“革新开放”在全

国逐步展开。10多年来已取得了很大进展和成就。1986—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8%，1990—1997年年均增长6.7%，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政局稳定，社会安定，对外关系扩大，群众生活有所改善。

首先是在农村，1987—1988年间不少农业合作社相继解散，家庭承包制逐步得到推广。在农村普遍实行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政府又鼓励农民扩大承包范围，除可承包菜园、鱼塘外，还可承包荒山、树林；政府还制定或修订了《农业税政策》、《农业价格补贴政策》、《农业优先信贷政策》；颁布了《土地法》和《土地税法》，向土地法人颁发了土地证，规定“保护农民长期享有土地使用权、继承权和转让权，承认土地可按国家规定作为财产担保”；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鼓励发展农田水利设施，发展农机、农药和化肥生产，培育和引进良种，促进专业化生产。

其次是在城市进行革新。在工厂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扩大经营自主权的基础上，1990年3月政府又作出“关于把国营企业转为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决定”。起初只是将经济效益差的国营企业转换所有制，1991年2月在第一届日用商品和出口商品生产工作会议上，凯山主席明确指示“要继续主动地把从事日用品和出口商品生产的企业，绝对地转向其他所有制形式”。根据这一精神，政府决定除电力、邮政、自来水、公路桥梁建设、采矿和军品生产等骨干企业外，其他企业均陆续通过承包、租赁、合资、股份制等不同形式，由公有制转为其他所有制。至1994年9月，老挝的5946家工业、手工业企业中私营企业有5861家，约占工业手工业企业总数的98.57%；公私合营企业17家，约占0.28%；国有企业68家，占1.15%。这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成份、

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组织形式并存的格局逐步形成，社会经济生活逐渐活跃起来。

随着上述政策、措施的出台，老挝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农业因受气候影响较大，粮食总产量尚不稳定，自1990年以来正常年景均可达150万吨以上，能基本自给，略有储备；在鼓励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政府还增加了对畜牧业的投入，使各种牲畜的存栏头数有较大幅度增长，并从1991年开始成为每年创汇几千万美元的出口商品；长期处于自然、半自然经济状态的老挝农村，已出现了一些年收入达100—200万基普（约合1400—2800美元），个别达1000万基普（约合1.4万美元）的生产专业户和联户承包的组织形式。如万象市郊一农户建了6个鱼塘，1993年投放市场1200—1500公斤鲜鱼，每公斤按1200基普计算，全年仅养鱼一项的收入则达144—180万基普（约合2057—2571美元）；万象省一老农以种植甘蔗、木瓜、香蕉、椰子等水果为主，兼作饲养黄牛、家禽，1993年收入达170—200万基普（约合2428—2857美元）。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企业的经济效益也普遍有所提高。如老挝啤酒厂是目前老挝唯一的啤酒生产厂家，1973年建厂，原为老挝法国合资的私营企业，共和国成立后收归国有，由于缺乏原料和实行旧的经营机制，经济效益较差。1992年与泰商合资后，老方占股49%，泰方占股51%，泰方全权委托老方经营。当年产量增至868.96万公升，为开始执行革新政策的1986年的4倍，1994年产量达1000万公升，创产值1000多万美元，上交税款250万美元，产品在国内仍供不应求；1994年又进行了扩建，1995年产量达2000万公升，1997年产量约3000万公升。1994年时工人平均月工资100美元，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月工资约300—400美元，每天免费供

应一顿午餐，年终还有奖励。另一家企业老挝饮料厂于1993年8月同一泰国公司合资经营，政府持30%股份，泰国公司占70%股份。合资当年超产9%，比1992年增产28%，工人平均月工资近100美元。这两个企业是国有企业转换机制的佼佼者。

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为贯彻党的四大确定的方针，努力变自然、半自然经济为商品经济，建立了农业与工业手工业、服务业相结合的新型经济结构。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农业、工业手工业、服务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产值1985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以上，1995年占55%，1997年占51.3%；工业手工业1985年占11%，1995年占18%，1997年占21.1%；服务业1985年占16.7%，1995年占24%，1997年占27.6%。

在实行国家调节的市场经济方面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就：1. 最根本的转变是由中央集中计划，转变为国家指导性计划和宏观调控，让企业根据市场机制和市场供需规律自主经营。2. 由多种价格和汇率，转变为单一价格、单一汇率。国家仅控制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自来水、电、燃料油、通讯和空运价格，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价格的稳定，通胀率由1989年的80%左右逐步下降到1992年的6%，1993、1994年仍控制在10%左右，1995年回升到19%，1996年降至12%，1997年因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通胀率又上升至18%。与此同时，汇率也发生了较大的波动，较长时间以来，老挝基普与美元的兑换率一直保持在700—720:1的水平，1996年贬为930:1，1997年老币与美元的汇率由上半年的1100:1贬至2500:1。3. 从1988年开始，对银行体制也进行了改革，由一级银行体制改为二级银行体制，即分别设立担负货币流通宏观管

理职能的中央银行和担负储蓄、发放贷款的商业银行。同时将国库从银行体制中分离出来。此举促进了储蓄增长、资金流动、债务偿还,使银行成为推动生产投资的重要因素,储备金呈增长势头。此外,经政府批准,外国银行已在老挝开设分行。4. 改变了财政管理办法,由过去工商企业上交全部利润改为照章纳税,从而使国家财政预算收入每年均以较大的幅度增长,1995—1996年度财政预算收入为2203亿基普,1996—1997年度为2559亿基普。5. 经济管理体制由过去按中央、省(市)、县分级管理改为按部门垂直管理。明确规定各部门的职能和任务。各级行政机构人员精减30%以上。在新旧管理体制交替阶段,凡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的决策仍集中在中央,以便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基础设施建设。6. 逐步制定和完善有关经济法规。自1988年至今,老挝国会共制定并颁布了38部法律,其中有关经济法规就有27部之多,有效地规范了革新开放以来的经济活动。

在交通、运输和通讯方面,加强了基础建设,以尽快改善投资环境。政府将每年预算总投资额的40%,用于改建、扩建公路、机场、桥梁和更新通讯设备。已维修和新建的有1、9、13和20号公路,以及包括湄公河大桥在内的十几座大小桥梁。现有的公路全长1.8344万公里,其中全年能通车的有7584公里,基本形成了贯穿东西南北的公路网络。已建成机场14个,除万象机场外,琅勃拉邦、百细、沙湾拿吉、川圹和琅南塔机场均可供中型飞机起降。在原有的万象—曼谷、万象—河内、万象—胡志明市和万象—金边4条国际航线之外,近几年又相继开通了万象—昆明、万象—清迈、万象—仰光和万象—新加坡4条新的国际航线。1991年动工兴建,1993年竣工的通讯工程,使万象市的电话由4位数升至6位数,可与

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直接通话。1994 年开工的第三期通讯工程，将把原有的 6 个省的通讯线路扩大到 11 个省。截至 1996 年 3 月全国共有 132 家邮电所，52 个自动电话中心，共有电话 1.8232 万门，与 1990 年相比，增长了 364.64%。

在商业、外贸和引进外资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政府对商业实行依法自由流通政策后，全国各主要城镇的商业网点、商品交易市场与日俱增，商业活动日趋活跃。自 1995 年以来每年的国内商品流通总额都相当于革新开放前的 1985 年的 60 倍左右。外贸发展势头良好，目前老挝同世界上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进出口总额逐年上升。1990 年外贸总额为 1.6 亿美元，1991 年增至 3.3 亿美元，1992 年为 4.53 亿美元（其中进口总额为 2.84 亿美元，出口总额为 1.69 亿美元），1993 年增至 6.05 亿美元（其中进口总额为 3.83 亿美元，出口总额为 2.2 亿美元），1995 年增至 7.59 亿美元（其中进口总额为 4.85 亿美元，出口总额为 2.74 亿美元），1997 年增至 10.99 亿美元（其中进口总额 7.37 亿美元，出口总额 3.62 亿美元）。自政府颁布《外国投资法》以来，来老挝投资的外商日益增多，老挝政局一直比较稳定，投资环境也逐步得到改善，因此，1988—1997 年共有 33 个国家和地区来老挝投资于 632 个项目，协议金额达 72 亿美元。此外，自 1991 年以来，老挝政府每年可争取到 2—3 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1997 年获外国无偿援助和贷款共计 2.3147 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增长 4.7%，其中双边合作款项为 1.0203 亿美元，国际组织援助款项 2666 万美元，国际金融机构贷款 9839 万美元，非政府组织援助款项 439 万美元，有效地保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资金来源和国家财政预算的平衡。

老挝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重视加强同越南、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积极发展同

东盟各国和美、日、法等西方国家的友好交流与合作关系，为国内建设和革新开放事业创造了较好的国际环境。1997年老挝的外交工作空前活跃，党中央主席兼政府总理坎代·西潘敦先后访问了缅甸、古巴、法国、印度等国，年底又出席了东盟及东盟—中日韩首脑会晤；国家主席诺哈·冯沙万出席了第七次世界法语国家首脑会议；国会主席沙曼·维雅吉出席了第十八届东盟议会联盟会议，并正式加入该组织；副总理本扬·沃拉吉访问了越南、中国，出席了第六届国际援老圆桌会议，会议允诺向老挝提供12亿美元援助；外长宋沙瓦·凌沙瓦出访更为频繁，相继访问了古巴、泰国、朝鲜、韩国、中国、北欧3国和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并与欧盟签订了一份合作协定，年底又出席了东盟外长会议和第五十二届联大；内贸部长宋巴迪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世界贸易组织大会，并递交了入关申请；7月老挝还正式加入了东盟；一些东盟和周边国家的领导人也相继访问了老挝。迄今为止，同老挝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已增至102个。外国驻老使馆达25个，老驻外使馆已有22个。

五、加强政治建设，稳步推进 政治体制改革

老挝人民革命党实行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强调不断加强政治建设。

首先是强调要加强思想教育，反对自由化思潮，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维持社会稳定。苏东剧变以来，老挝党的历次会议强调要吸取苏东剧变的教训，重视政治思想工作，不要

放松对西方搞“和平演变”的警惕，并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一是通过举办干部学习班，举行各种会议，加强思想教育，统一全党全国的认识。1990年先后通过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知识分子座谈会，举行庆祝建党35周年、纪念列宁诞辰120周年、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45周年、纪念胡志明诞辰100周年的庆祝活动，组织全党讨论修改五大的政治报告、全民讨论修改宪法草案等活动，多次重申“要在六项原则基础上坚持革新事业”，“要经受形势的考验”，“要提高对党领导的坚定信心，提高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坚定信心”，“要提高警惕，粉碎敌人的破坏阴谋”。二是组织各级领导干部下基层，听取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意见，关心和改善群众生活，密切党群关系。三是针对西方的歪曲诽谤，注意加强对新闻媒体的领导，加强正面宣传，批驳错误观点。如1989年在纪念十月革命72周年时，老挝党报《人民报》发表文章说：“社会主义建设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客观需要，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相信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互相学习，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就一定能够经受住这场考验，使社会主义向前发展，走向新的阶段。”1990年4月，在纪念列宁诞辰120周年时，老挝党报的文章批判了“列宁主义早已过时了”的论调后，指出“今天，不仅要高呼马列主义万岁这一口号，还必须捍卫和运用她，使之真正开花结果”。四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加强对进口影片、录像带的管理；加强对文化娱乐场所的整顿和管理。五是对破坏社会稳定、制造混乱的分子依法严惩。1991年1月底2月初老挝反政府武装趁机在万象省西南部老泰边境地区，6月

中旬又在沙耶武里省老泰边境地区以及万象省万荣县苗族群众聚居地区袭击运输车辆，企图扰乱社会安定，老挝政府随即派遣军队迅速平息武装袭扰，维护社会稳定。

其次强调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991年召开的老挝党五大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艰难复杂、涉及面很广的工作，必须积极稳妥地进行，要与本国的现行制度和实际情况相适应。这项改革并不意味着要改变现行的政治体制，而是进一步完善人民民主制度的组织和机构。强调在当前的党建工作中，要大力解决好党群关系问题，清除党内腐败现象，维护党的纯洁以及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1996年的六大的《政治报告》强调指出：“要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战斗力，以便真正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反对多党制、多元化思想。”政治报告要求各级党委和全体党员坚持革新事业的六项基本原则，并以此作为衡量各级党委工作质量的方针和标准。党员队伍不断扩大，现有党员8.4万名，党支部7000多个。

老挝还强调要加强法制建设。近几年来，老挝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果，各项法律、法令、法规日趋完备。已颁布实施的法律条文有《宪法》、《国会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国籍法》、《家庭法》、《遗产及其继承法》、《劳动法》、《国营企业法》、《外国投资法》、《土地法》等30余部，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目前，老挝国会还在继续制订必要的法律，完善法制建设。

近年来，老挝党在政治建设和体制改革方面主要抓了以下工作：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完善干部制度，提高干部素质，在确保国家政局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领导层的新老交替，高度重视干部革命化、知识化和年轻化，加大惩治腐败力

度，纯洁干部队伍，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以法治国。以上各项工作有力地配合了经济建设，保持了社会稳定。

六、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

老挝的建设和革新事业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制约老挝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因素依然是老挝尚未解决、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经济基础薄弱。解放前，由于长期遭外族侵略，战争绵延几十年，资源被掠夺，生产得不到发展，老挝经济基础十分薄弱。1975年全国解放迄今已近23年，由于老挝党和政府的重视和不懈努力，生产得到一定的发展，经济基础也有所增强，但仍远未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仍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农业迄今仍是老挝的支柱产业，农业产值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但农业生产依然是靠天吃饭，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差；生产方式落后，平原地区主要靠人力、畜力，偏远山区依旧是毁林烧荒，刀耕火种；单位面积产量很低，平均每公顷产量不足3吨。近几年来，正常年景全国粮食总产量徘徊在150万吨上下，基本能自给，如遇天灾，还得进口几十万吨粮食。老挝有丰富的林业资源，但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只顾大量砍伐，不注意培植新林，致使森林资源锐减，特别是一些贵重木材已所剩不多了。老挝国土上蕴藏着丰富的各种矿藏，但至今没有完整、可靠的勘探资料。目前老挝的工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而农用产品产值又不足工业产值的0.5%，日用工业品包括针、线、牙膏、香皂几乎全靠进口，老挝原有的牙膏厂、肥皂厂、鱼露厂、制鞋厂等均因竞争

不过外来产品而纷纷倒闭，只有啤酒厂、卷烟厂、饮料厂的产品销路尚可。

(二) 资金严重不足。长期以来，老挝财政一直入不敷出，连年赤字，1995—1996 年度财政预算收入为 2203 亿基普，预算支出为 3637 亿基普，赤字 1434 亿。1996—1997 年度全国财政收入为 2559 亿基普，完成全年计划的 92.5%，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2.6%，财政支出为 4293 亿基普，赤字为 1734 亿基普，超出年度计划的 5.3%。财政赤字历年均由外国拨款或贷款来弥补。近几年来老挝每年约获得外国无偿援助和贷款 2—3 亿美元，已相继竣工的湄公河大桥、安装程控电话、改造自来水管、扩建 13 号、9 号公路干线等大工程，亦均需依赖外援来完成。尽管进出口总额逐年有所增长，但贸易逆差仍较严重，到目前出口额仅为进口额的 60% 左右，政府计划到 2000 年使出口额达到进口额的 70%—80%。自实行革新政策以来，老挝累计已吸收外资 60 多亿美元，其中实际利用的外资约为 20 多亿美元，投资的项目多为投资少、收效快，投资大、工期长、收效慢的项目外商较少问津。特别是利用外援和贷款的建设项目容易受形势变化的影响，比如为结束老挝无铁路的历史原计划修建由泰国等国贷款援建的从泰国廊开府至老挝万象市的铁路，因泰国陷入严重经济危机而告吹。

(三) 专业管理人才缺乏。长期以来，在印度支那 3 国中老挝的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较落后，当时老挝学生想获得知识，均需去金边、西贡上学，经济状况好一些的就去法国学习，以学医学、政经、法律、工程的居多，知识分子数量很少。解放初期因政策失误造成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才纷纷逃往国外。国内已建立了几所大学，培养了一些学生，但数量和质量均满足不了实际需要。解放后老挝陆续派学生去苏联、东欧、越南

留学、培训，累计派出的学生数量不小，但其中部分人学的是政治理论，部分学其他专业知识的回国后又改行从政、从商，当然也有学成后不归的。真正学以致用、学用结合的人才不多，难以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长时期的努力。

老挝也有许多有利条件。老挝党和政府是团结一致的，政局稳定，吸取了20多年实践所积累的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并且找到了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加上老挝有丰富的水力、矿产、森林、劳动力资源，为今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只要能把握住时机，善于利用本地区已成为国际经济合作开发的中心地带之一的地缘优势，充分挖掘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发展潜力，坚持革新开放政策，就能使国民经济保持8%—8.5%的年增长率，到2000年实现人均年收入500美元（1997年为400美元），各项社会发展指标有所改善，重点地区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进而到2020年脱离最不发达国家行列。

七、冷战后的老挝人民革命党

老挝人民革命党源于1930年成立的印度支那共产党（简称印支共），当时老挝革命者加入印支共。1951年2月，印支共二大决定印支3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分别建党，随将印支共改名为越南劳动党，并由越南劳动党派人协助老、柬建党。1955年3月22日“老挝人民党”宣告成立，1972年二大时改称为“老挝人民革命党”。老挝人民革命党自成立之日起长期处于秘密状态，其路线、方针、政策均通过公开的统战组

织——“老挝爱国战线”贯彻执行。1975年9月该党公开，同年12月2日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诞生，该党成为执政党，现有党员8.4万名。老挝党迄今共召开过六次党代表大会，其中执政前两次，执政后四次。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老挝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党内一些干部和党员，特别是一些青年人一度出现思想混乱，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产生怀疑。有的人甚至主张搞多党制，并酝酿成立反对党，党内个别高级干部也参与了这些活动。与此同时，流亡国外的反政府武装也趁机窜回国内进行武装骚乱。在经济上，政权性质改变后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停止了对老挝的经济、军事援助，并相继要老挝接回其留学、进修人员，有的国家甚至开始向老挝索还欠债，有的国家则对老挝施压，要求老挝公开支持他们的“民主”运动。面对上述严峻形势，老挝党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统一全党认识，稳定国内局势。老挝党的领导人反复强调“无论在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多少困难，世界局势还会发生多么严重复杂的变化，老挝党将决不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目标”，“无论如何老挝仍要坚持马列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冷战后，老挝人民革命党更加强调自身建设。1991年3月老挝党召开五大，选举产生了由59人组成的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和由11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凯山·丰威汉当选为党中央主席。1992年11月21日，长期担任老挝党政第一把手的凯山·丰威汉逝世。11月24日、25日，老挝党中央特别会议和最高人民议会特别会议分别选举坎代·西潘敦和诺哈·冯沙万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职务。1993年下半年召开的老挝党五届七中全会就人才开发、培养一代新人问题作了决定，制定了通过党校培训和在实际工作中考察等渠道培养干部的计划。

同年年底召开的全国党支部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基层党支部的领导，结合各地特点，制定工作计划并定期汇报，使党委和基层支部的联系制度化；党委要建立下基层的制度，下去宣讲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和工作计划，帮助基层干部提高工作水平；要加强对群众组织的领导，帮助他们制订工作计划；要求各基层党支部要掌握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并坚持贯彻执行；对党的路线和领导要有统一的认识，对敌人的阴谋保持警惕，尊重集体决定，团结一致，积极进取；要光明磊落，纪律严明。1994年召开的五届八中、九中全会又研究了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问题，要求党中央委员和部级领导干部加强理论学习，真正搞懂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提高对党的全面革新路线的认识。五届九中全会还总结了1993—1994年度的工作，制定了1994—1995年度经济社会发展计划，通过了关于新时期文化工作的决议，要求抵御外来文化的消极影响，保护和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

老挝人民革命党1996年3月18—20日在万象举行了六大。来自全国381位代表，代表该党7.8万党员出席了大会。六大继续坚持五大提出的“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确立党的基本路线是：以老挝人民革命党为领导核心，继续建设和发展人民民主制度，为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六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对党的性质的规定是：党是老挝人民民主制度政治体制的领导核心。党由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中经过实际工作考验、有觉悟、勇于革命、愿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牺牲的最受信赖的人所组成。与五大的党章的有关规定相比，进一步突出了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

六大改选了党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新的领导班子更趋年轻化、知识化。长期担任老挝人民革命党第二把手的诺哈退出

政治局，担任党中央顾问，坎代被选为党中央主席。党中央委员会共有 49 名委员，60 岁以上的占 20.41%，46—59 岁的占 63.27%，45 岁以下的占 16.32%，新中央委员平均年龄 53 岁，高等文化程度的占 90%，大大高于上届的 40.67%。9 人组成中央政治局。1998 年 2 月，第四届国会上坎代当选为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西沙瓦·乔本潘当选为政府总理。同年 4 月，坎代主席表示，老挝党和国家领导人变动后，老挝内外政策没有任何变化，将继续实行六大确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

第10章

实行“稳步的改革开放”的古巴

古巴在苏东剧变后的极其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毫不动摇；近年来又进一步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以稳步的改革开放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使形势逐步好转。目前虽仍很困难，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挺过去了，经济已开始复苏。

古巴是怎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近年来是怎样挺过最困难的时期的？其改革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的特点和趋势怎样？

古巴是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是一个美丽的岛国，位于加勒比海西北部，美国的佛罗里达半岛像大象的鼻子从北面伸向古巴，距它仅 180 公里。全国领土总面积 11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近 1100 万。古巴革命是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取得胜利的，后在激烈的反帝反颠覆斗争中走上了社会主义道

路。30多年来，它在特殊的环境下坚持和建设社会主义，必然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做法。

一、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 是如何建立的

古巴早在20年代就有一个共产党，叫古巴人民社会党。但古巴50年代的革命不是它领导的，而是在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7·26运动”的领导下经过长期游击斗争取得胜利的。卡斯特罗开始并没有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后来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在严峻的现实斗争面前，终于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古巴1511年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1868—1878年进行第一次独立战争。1895年在民族英雄、著名的思想家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何塞·马蒂领导下进行了第二次独立战争。1898年美国以援助古巴为名与西班牙宣战，作为战胜国占领了古巴。1901年古巴被迫接受美国提出的“普拉特修正案”，承认美国有权出兵干涉其内政。1902年古巴共和国成立后，实际上又沦为美国的半殖民地。美国于1903年强租古巴两处海军基地，迄今仍占领着关塔那摩基地。

菲德尔·卡斯特罗于1953年7月26日率领100多名青年发动了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起义。事败后被判处15年徒刑。1955年5月独裁政权在外界压力下，提前释放了卡斯特罗等人。出狱后，卡斯特罗组织了“7·26运动”。为便于继续斗争，同年7月到了墨西哥。1956年11月他率领81名革命者乘“格拉玛号”游艇从墨西哥出发到达古巴东部，登陆时遭重



卡斯特罗 1957 年在山区坚持开展反独裁武装斗争。

挫，转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卡斯特罗把游击战同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结合起来，经过多年游击斗争，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于 1959 年 1 月 1 日攻克首都哈瓦那，推翻了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亲美独裁统治，建立了革命政权。

古巴在革命过程中和革命胜利之初，所举的一直是反帝反独裁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旗帜，而不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革命。卡斯特罗说：“如果在起义斗争时期提出搞社会主义，人民还不会理解，帝国主义就会对我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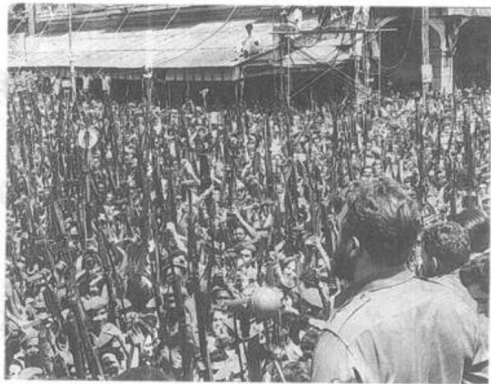
直接进行军事干涉。”^① 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在1959年5月访美回国后的电视讲话中仍然说，“古巴革命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而是“橄榄绿色的人道主义的革命”。但卡斯特罗的民主主义思想与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同，他很重视劳苦大众的利益。他强调古巴革命是“穷人所有、穷人所治、穷人所享”的革命，其强烈的爱国主义、反帝思想和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促使革命采取激进的反帝反寡头的民族民主革命措施，如没收美国资本实行土改等。

尽管当时古巴还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但美国仍然不能容忍在它的鼻子底下存在一个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政权，下决心要把它扼杀在摇篮里。美国立即对古巴采取政治颠覆、贸易禁运、外交孤立乃至组织雇佣军入侵等手段。卡斯特罗在与国内外敌人作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不断发展和升华。正如他1961年在答英国《新政治家》周刊记者问时所说：“我对列宁的工作和生活知道得越多，特别是对革命了解得越多，就越敬佩列宁。只有今天，我才体会到列宁曾战胜过的那些困难和他留给人类的遗产的价值。”他还说，“越是面对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现实”，就“越是相信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全部真理”；“越是深刻认识帝国主义血淋淋的魔爪”，他“在感情上就越是马克思主义者”。

1961年4月，美国派雇佣军入侵古巴吉隆滩，在胜利地粉碎了这场进攻之后，卡斯特罗公开宣布古巴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就在当年，卡斯特罗领导的“7·26运动”与人民社会党（共产党）等3个革命组织合并为“古巴统一革命组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第一、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中心报告》，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织”，1965年10月又改称为“古巴共产党”。于是，通过一系列革命措施和改革，古巴成了美洲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卡斯特罗在1975年12月古巴共产党一大上谈到古巴革命的这场转变时说：“在一个像古巴这样情况的国家，革命能否只限于单纯的民族解放的目标，而保留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或者还应当朝着彻底的社会解放的方向前进呢？……古巴民族没有别的选择，人民不想也不可能停顿下来。我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是密切相连的。前进是历史的需要；停顿就是怯懦，就是背叛；停顿会使我们重新沦为美国的殖民地，成为剥削者的奴隶”^①



美国组织雇佣军从吉隆滩入侵古巴，古巴人民坚决反击。1961年4月16日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第一、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中心报告》，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

古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来，在教育、卫生、体育、科技等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进步，在经济建设方面亦有所成就。当然，古巴以产蔗糖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基础薄弱的状况，决不是短期内能改变得了的。几十年来，许多产品包括基本生活用品都依靠进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原来的经济联系和援助突然中断或减少，对古巴冲击很大。同时美国趁机对古巴加紧实行封锁高压，企图一举搞垮古巴社会主义政权。当时古巴所面临的是生存威胁，形势非常严峻。但是古巴坚持社会主义毫不动摇，1993年又宣布搞“改革”，迅速扭转了经济下滑的趋势，使形势逐渐好转。现在古巴虽然仍很困难，但最困难的时期已基本挺过去了。

二、古巴是如何挺过最困难时期的

苏东社会主义政权崩溃后，古巴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非常严峻和困难。西方有人自信地预言：“古巴迟早要垮台”、“下一个该轮到古巴了”。但是，古巴没有被言中。现在古巴社会主义政权仍傲然屹立。古巴为什么没有倒下，它这些年是如何挺过来的？

（一）在最危险、最困难的形势下“誓死捍卫社会主义”

古巴1972年加入“经互会”，经济等各方面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依赖性很大。苏东剧变后，由于原来的国际援助和往来大多中断，特别是缺乏燃料和食品，国内面临严重困难。由于美国对古巴长期实行封锁和禁运，30余年来古巴外贸的85%、石油供应的90%以及每年15亿美元的军援和大批

机器设备主要依赖苏联供应。古巴每年国内的粮食消费约需200万吨，其中160万吨靠进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古巴许多工厂因缺乏燃料和原材料，而被迫停工停产；居民基本消费品的配给量进一步减少，经常面临断炊威胁。当时每个居民每月供应5—6磅大米，每日供应一个80克重的小面包，每天供应7岁以下和65岁以上老人1升牛奶，每月还有20盎司豆类、5磅食糖、1/4磅食油、3/4磅鸡肉、10—15个鸡蛋，猪肉、牛肉、鱼类等均难见到，其他牙膏、肥皂等也靠配给。商店柜台空空的，居民有钱常常买不到东西。民航和公共交通因缺油而减少班次，自行车、马车等成为主要交通和运输工具。居民区经常停水停电，电台也减少播放时间，拖拉机开不动，以马车替代。总之，苏东剧变后古巴面临的是生存威胁。

另一方面，美国趁机对古巴加紧实行封锁高压，企图一举搞垮古巴社会主义政权。流亡于美国的反古分子也曾兴高采烈地叫嚷“要返回哈瓦那过（1990年的）圣诞节”。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古巴共产党号召和动员人民度过“和平时期的特殊时期”。古巴全国上下英勇地喊出了“拯救祖国、拯救革命、拯救社会主义”，“誓死捍卫社会主义、誓死捍卫马列主义”的庄严口号。

在此情况下，古巴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把坚持社会主义同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人民自决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作为古巴革命的成果和目标来捍卫。国外的压力越大，国内的凝聚力反而越强。卡斯特罗说：“革命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原则，永远不会放弃我国人民斗争换来的成果，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决不屈服于帝国主义。主权是不能出卖和拿来谈判的，革命决不放弃建设由我们人民自己选择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权利”，“我们斗争所处的历史

条件表明，如果不反对帝国主义，就不能算是革命者，也不能算是社会主义者。”卡斯特罗还向人民说明，古巴革命的发生和胜利同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仅是“一种偶然的歷史巧合”，“没有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古巴革命仍将继续下去”。

在坚定人民对革命和社会主义信念的同时，古巴党和政府为稳住局势保证生存，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如打击破坏活动，优先发展食品生产，保证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进一步密切干群、党群关系，领导人与群众打成一片，同舟共济等。苏联解体后，在国外反共势力煽动下，古巴发生多次冲击外国驻古代表机构，兴起多起非法移民潮等社会扰乱事件。但由于古巴党和政府态度坚决，措施灵活、果断，并获得国内多数基本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古巴国内局势总体稳定。尽管经济仍很困难，但古巴形势已逐步好转，经济已出现了复苏迹象。正如卡斯特罗1996年5月30日在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闭幕式上所说的：古巴目前形势“远非令人失望”，古巴之所以能坚持至今，“因为它没有改变红旗的颜色，没有改变思想意识，也没有改变革命原则”。“我们所作的努力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所希望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我们所捍卫的也正是社会主义”。

（二）积极推行“全方位的对外政策”，在反封锁中扩大国际空间

美国对古巴的全面封锁是1962年开始实行的，其目的是想通过制裁来扼杀古巴的革命政权。苏东剧变后，美国强化了对古巴的封锁，1992年通过了针对古巴的“托里切利”法案；1995年又通过了“赫尔姆斯-伯顿法”，1996年克林顿批准了

该法案。在这种形势下，古巴加强了反封锁的斗争，并把打破封锁作为其外交战略的重点。

古巴调整了对外战略，奉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在 1994 - 1995 年，卡斯特罗主席先后出访 13 次，其中 9 次是访问拉美国家，古巴还以创始国身分加入了地区一体化组织加勒比国家联盟，签署了拉美禁核条约并同近 10 个拉美国家签订了双边合作扫毒协定。古巴同拉美国家的贸易额从 1989 年占其外贸总额 6% 提高到 37%。古巴在加强同拉美国家关系的同时，积极开展同西欧国家和加拿大的交往与合作，通过推行经济外交来加大反封锁斗争的力度。1995 年 3 月，卡斯特罗主席在参加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后首次访问了法国，他表示欢迎法国等西方国家的企业家到古巴投资和做生意。随后，



1995 年卡斯特罗访问法国，与密特朗在一起。

西班牙、加拿大、英国和法国企业家也纷纷在古巴旅游、矿业、石油、烟草和糖业方面进行投资。此外，古巴还努力调整了同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的关系。1995年10月，俄罗斯第一副总理索斯科韦茨率领庞大代表团访问了古巴，双方签署了8项合作协议。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与调整，古巴已同俄罗斯及东欧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1995年12月卡斯特罗访问中国和越南，进一步发展了古中、古越关系。为了打破封锁，古巴还发展了同美国企业、新闻、宗教界人士和旅美侨民的关系和联系。1995年10月下旬，卡斯特罗在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期间，同上述阶层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近年来，美国企业界到古巴探索合作机会的人士日益增多，仅1994年就有500多名美国工商界代表访问了古巴，其中100多位还同古方签定了合作意向书。

古巴的斗争赢得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1992年，当联合国大会首次就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封锁的决议进行表决时，只有59国投赞成票。而在1993年、1994年、1995年和1996年联合国大会再次表决时，投赞成票的国家增至88个、101个、117个和138个。同时，在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伊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等国际或地区会议上都发出了“要古巴，不要封锁”的正义呼声。现在古巴与世界上156个国家有外交关系。古巴还通过吸引外资、发展国际旅游、调整对外贸易体制，扩大了与国外的经济联系。到1994年底，古巴已同世界38个国家兴办各类合资合作企业173家（1年内增加了63家），吸引外资总额15亿美元，投资领域扩展到26个部门。1995年合资企业已发展到200多家，外国直接投资额达到21亿美元，分布在34个经济行业。1995年9月，古巴又正式颁布新的外资法，以更加开放和更加灵活

的政策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机会。目前在古注册的外国公司有 600 多家，其中 400 多家在古还设立了办事机构。

1996 年美国通过了“赫尔姆斯—伯顿法”，宣布要制裁与古巴有贸易和投资往来的公司或个人，企图切断古巴与国际经济的联系，把美国对古巴的单方面封锁国际化。由于该法案侵犯了与古巴有经济贸易往来的国家的主权和利益，遭到了有关国家的强烈谴责、抵制和反对。1996 年 6 月 4 日在巴拿马城召开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通过了谴责“赫—伯法”的决议（34 名成员中，23 名投赞成票，其他 10 名没参加投票，美国代表一票反对）。欧盟 15 个国家一致谴责和拒绝“赫—伯法”，英国愤怒指责美国的这种做法“破坏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加拿大抵制美国这种蛮横的政策，继续发展与古巴的经贸合作，并用本国的“外国治外法权应对措施法”来保护在古巴从事贸易的加拿大公司不受美国“赫—伯法”的惩罚。1997 年 1 月加拿大外长阿克苏沃西对古巴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其目的就是强调加拿大在古巴问题上将继续推行独立自主的“对话政策”，并借此向美国重申，加拿大不打算理会美国 30 多年来无视世界上多数国家反对制裁古巴的立场，更不会被美国的“赫—伯法”吓倒。在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下，克林顿被迫推迟实施该法的部分条款。

古巴外交在 1998 年又频频得分，古美关系出现松动。1 月下旬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古巴，严厉谴责美国政府对外古实施的封锁是“不公正的，从道义上说，是不能接受的”。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顾问委员会代表团也访问古巴，与古巴全国人大主席阿拉尔孔举行了会谈，双方原则同意首先在医药和食品方面取消对古巴的禁运。3 月 20 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声明，宣布采取 4 项放松对古巴制裁的措施，即允许

人道主义组织包租飞机从美国直飞古巴；允许美籍古巴人每年向他们在古巴的亲属汇款 1200 美元；加快向古巴销售药品的审批过程；建议国会修改现有法律，以允许向古巴销售食品。卡斯特罗说美国的这些措施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有助于为古美关系创造一种良好气氛”。4 月下旬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访问了古巴，卡斯特罗在机场送行时对记者说，古巴准备同美国对话，但古巴并不着急。几年来的事态发展说明，古巴在国际上的朋友越来越多，国际处境明显好转。

（三）借鉴国际正反经验，推行“稳步的改革开放”

古巴“开放”起步较早，但国内搞“改革”是近几年的事。这是因为古巴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使其改革行动必须稳妥谨慎。古巴长期来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缺乏生机活力。古巴气候等自然条件很好，按理讲吃饭不成问题，关键还在于政策。近年为求生存，逐步放宽政策，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拨出闲置土地让机关、学校、企业的职工自种自用，允许城镇退休人员和家庭妇女利用闲置土地种菜，缓解了人民的生活困难。古巴领导认识到只有调整政策，才能度过危机。1993 年卡斯特罗在“7·26 讲话”中郑重宣布古巴要“改革”。他说：“为了拯救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成果，我们准备做一切必须做的事情。”正如古巴一领导人所说的：“古巴党和政府在革命面临崩溃的形势下进行抉择，与其自我灭亡，不如冒改革风险。”

古巴的改革借鉴了国际上的正反经验教训，一开始就强调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和原则。卡斯特罗说：改革的目的是“改进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摧毁这个制度”。古巴领导人认为，拉美一些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暴露的问题

很多，值得深思；苏联的改革“毁灭国家、毁坏历史、毁灭秩序”，不能学；古巴要借鉴“中国人的榜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此，古巴提出在改革的同时，要坚持“三不放弃”，即：不放弃革命原则，不放弃人民政权，不放弃为民造福的目标。古巴强调改革一定要从古巴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做法。

古巴自1993年开始改革。同年宣布实施私人持有外币合法化；放宽对个体经营的限制。1994年，陆续采取建立税收制度、改革价格体系、取消部分免费项目、减少国家补贴、开放农贸市场及工业、手工业品市场、将部分国有闲置土地承包给个人等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1995年又颁布了新的投资法，并着手研究国营企业、银行体制的改革。1996年古巴政府宣布建立自由区和工业开发区，以进一步吸引外资。

古巴的改革虽起步不久，但已取得明显成效。首先是初步制止了经济继续下滑，缓解了群众的生活困难。自1994年起，经济连年下滑的形势已经缓解。据古政府宣布，1994年古经济增长0.7%，是90年代以来的首次增长。1995年又在此基础上增长了2.5%，1996年增长率达7.8%，1997年增长2.2%。目前虽然人民生活依然困苦，但食品、燃料、电力供应都有起色，财政趋稳，古比索币值明显回升，流通领域开始活跃，社会日益安定，财政赤字逐年减少：1993年高达33%，1995年降到3.6%，1996年约为3%。

（四）古巴靠什么挺过最困难时期

综上所述，古巴能挺过极其困难和危险的时期，主要是因为：

第一，靠领导坚强，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古巴革命不是

借助外部力量，而是依靠本国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取胜的；卡斯特罗等革命领导人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具有相当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其领袖地位是稳固的。卡斯特罗等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信念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立场毫不动摇。古巴还有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发挥了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1991年10月，古共四大重申坚持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决不后退、决不搞多党制，顶住了内外压力，稳住了阵脚，保持了国内政局的基本稳定。

第二，靠群众基础好和民众广泛的理解和支持。古巴的党和领导人廉洁为民，当政以来为民众谋了不少福利。古巴即使在最困难时期，仍继续实行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广泛的社会保险，人民虽然物质上仍很清苦，但社会公正、种族平等、无贫富两极分化，受益的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是拥护的。加上古巴绝大多数党政干部能以身作则，与民众同甘共苦，干群关系较为融洽；他们能联系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国家的困难告诉群众，与群众商量，因而能得到广大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靠强大的精神支柱和正确的舆论导向，增强民族凝聚力，保持社会临危不乱。古巴党历来重视政治思想教育，重视干部的道德建设，重视精神、道德和人格的力量，重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气节的教育。卡斯特罗等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包括民族英雄何塞·马蒂的爱国主义思想精神、切·格瓦拉为理想和信念宁死不屈的高尚人格，多年来已在古巴深入人心，形成了凝聚古巴民族的强大精神力量。“誓死捍卫社会主义”、“誓死保卫祖国”已深入人心，有力地抵制了西方的“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古巴临危不乱，靠的是

这种强大的精神支柱。

第四，靠健全严密的组织，使敌对势力无隙可钻。古巴人民有严密的组织。除70万共产党员外，古巴工、青、妇、保卫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很健全、很有效。保卫革命委员会有700万会员，中央工会有300万会员，共青联有60万成员，妇联有360万成员，可以说古巴1100万人都通过不同的团体组织起来了。反古分子多集中在美国，在国内的反对派虽搞过一些骚乱，但没有群众基础，形不成气候。

第五，靠改革缓解经济困难，提供了起码的物质保障。古巴党和政府在重视思想、精神、道德力量的同时，在经济领域放宽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性措施；后来又由“应急措施”发展成“稳步的改革开放”，对古巴经济由滑坡转为复苏起了关键性作用，从而为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稳定古巴社会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

第六，靠调整对外政策和策略，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同情。古巴调整了对外政策和策略，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一是善于把坚持社会主义同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人民自决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对外赢得了国际上的同情，对内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外来的压力越大，国内的团结反而越强。二是积极推行全方位的对外政策，通过“经济外交”加大了反封锁斗争的力度，扩大了国际空间。尽管美国强化了对古巴的封锁，但古巴在国际社会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近年来在各种国际或地区会议上都发出了“要古巴，不要封锁”的正义呼声。古巴在国际上的朋友越来越多。

三、90年代前古巴探索建设 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历程

卡斯特罗在1961年4月粉碎美国雇佣军入侵之后，向世界宣布：古巴革命是“一场贫苦人所有的、由贫苦人进行的、为了贫苦人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紧接着古巴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1963年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外国企业国有化，实现了“土地的、反帝的、人民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目标，并迅速建立起以国有为主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体系：工业企业全部国有，农业中国营农场占土地总面积70%，合作社占18%，个体农民只占12%。1968年又发动了一场“革命攻势”，将除部分小农之外的残余的私人经济、零售商业、小服务业统统取消，实现了彻底的生产资料公有化、国有化。在此基础上，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

古巴从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着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在经济体制、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精神与物质鼓励的关系等问题上，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历程。总的看来，有以下几个阶段：

（一）60年代：从“理想”出发、凭“激情”办事，犯了违背客观规律的“唯心主义”错误（卡斯特罗语）。

革命胜利初期，古巴有些急于求成，认为人民掌握了政权，革命的理想很快就能达到，提出迅速工业化和农业多样化的主张。由于以生产蔗糖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没有几年就放弃发展多种经济的方针，重新把

蔗糖生产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并提出到1970年糖产量要达到1000万吨的指标。因指标太高未能实现，反而导致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经济混乱。

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当时古巴缺乏经验，在经济体制上，开始实行过财政预算制（工业）和经济核算制（农业）并存的体制。后来决定创造一种“新体制”，即实行既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当时所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而是一种独特的取消财政预算、放弃统一计划、否定企业间购销关系的“经济簿记登记制”。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内部没有产值指标，也没有利润核算；企业之间实行无价调拨，因为当时有人认为企业间的购销关系的“资本主义味道太浓”。由于这一体制脱离实际、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造成经济混乱和生产下降。后来卡斯特罗说，这一创造新体制的决定是“极为错误的决定”^①。

卡斯特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曾谈到古巴当时从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出发，实行“高福利”、不断增加免费项目的情况。一是实行免费教育。1961年颁布教育全面国有化法的同时，宣布实行免费教育的决定。同时推行庞大的奖学金计划，当年12月第一批领取奖学金的学生达4万多人，他们都是工农子女和扫盲大队的成员。全国的教育经费是古巴资本主义时期的11倍。二是实行免费医疗。革命前古巴农村没有任何医疗条件。1960年1月政府颁布723号法令，规定医学院毕业生必须到农村从医一年，后又延长到两年，从而建立起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卡斯特罗说：在古巴“所有病人都有免费看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第一、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中心报告》，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8—89页。

病和住院治疗的权利”。为此，古巴公共卫生所花的经费是革命前的 20 倍。三是实行社会保险。1963 年古巴颁布了第 1100 号社会保险法令，规定凡领工资者都可享受社会保险，保险资金和管理由国家负责。1968 年 10 月颁布了 270 号决议，决定将成绩突出的单位的工人的退休金提高到工资的 100%（由于这一决定使社会保险费增加过多，同时也促使一些人提前申请退休，后来不得不作了调整）。保险法还规定，产妇享有 12 周带薪产假，产妇住院及初生婴儿所需服务和用品一律免费提供。对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判刑人员的家属，需要救济的也给予帮助。卡斯特罗说：在古巴“没有一个人是不受到保护的”。古巴不断增加免费项目的情况在 1967 年进入高潮，1968—1969 年达到顶峰。当时免费的范围越来越广，标准越来越高。如免费教育，不仅包括各级各类学校免费，而且包括免除学生的食、宿、交通、制服费；免费医疗，不仅包括免除医疗费，还免除病人和陪床人的食宿费；国家还对大量食品提供补贴，体育比赛、公园和博物馆不收门票，工厂免费提供午餐，部分住宅免收房租，煤气、公共交通的收费也是象征性的。后来，卡斯特罗曾指出，“某些方面实行免费是不妥当的”、“不切实际的”。

与此同时，古巴突出“精神”和“觉悟”的作用。取消了财政部（1965 年）；取消中央统一计划（1965 年）；取消国营企业间的购销关系（1967 年）代之以簿记登记制度；取消贷款利息和农业税（1967 年）；取消工资级别和工人加班费，鼓励人们凭觉悟劳动（1968 年）。从 1967 年起，大学里不再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公共财会专业也取消了。由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没有实行按劳分配原则，造成旷工和不遵守劳动纪律的人增多；由于消费过度超前，商品和劳务供不应求，

“过剩的流通货币迅速增加”。

卡斯特罗后来谈到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时说，当时“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违反了“我们必须遵循的客观经济规律”。“看起来我们当时好象在向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日益靠近，实际上背离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正确道路越来越远。”他强调：革命者要有理想，但也应当是“现实主义者”。^①

（二）70年代，开始纠正前一时期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思想和做法，1972年加入经互会，1975年古共一大决定建立“经济领导与计划体制”。

“经济领导和计划体制”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经济规律，承认工资、价格、计划、指标、利润、成本等经济概念和机制。主张企业独立收支，企业之间建立购销关系，个人物质所得应和劳动成果挂钩。在实行这一体制后，逐步恢复了全国统一计划和财政预算。1972年，古巴开始加强宏观方面的计划管理，恢复了由中央计划委员会制定的全国统一计划，编制了1973至1975年的“三年经济计划”。从1975年起，古巴又开始制定五年计划，并恢复了预算制度。计划在中央、省、市人民政府机关和企业3级制定，由中央统一协调之后，再分别作为指令性和指导性计划下达给企业。与此同时，古巴还分别设立了国家财政、统计、价格委员会，建立了全国财会体系，整顿了银行，注意利用信贷、利息、价格等经济手段对企业实行领导。1978年古巴宣布，以后发放工农业贷款要征收利息；企业除完成生产任务外，还要保证上缴利润。同时给企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第一、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中心报告》，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6-90页。

业一定经营自主权，企业内部实行成本核算，强调运用经济手段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一定程度上重视物质鼓励等。这一体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古巴经济工作的困难局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但是，这一体制基本上是苏联式的高度集中、粗放经营的经济模式，在企业与国家的关系上，国家向企业下达的基本上都是指令性计划，实行统收统支，企业财权、物权、人权有限，亏损则由国家补贴。这种体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

（三）80年代上半期进行了一些利用市场的局部性改革，下半期开展“纠偏运动”。

80年代上半期的局部性改革的内容是：

一是注意运用经济手段调动农民和个体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1980年以后提高了咖啡、可可、肉类、鲜奶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向个体农民发放优惠贷款，并在各城市普遍开放了自由市场，允许农民议价出售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后的剩余产品，如蔬菜、水果、家禽、花卉等。很快在全国出现了约260个农民市场和手工业者市场。此外，还允许私人卡车主从事运输业务。

二是进行工资改革，以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并取消一部分免费项目。1980年，古巴实行全面工资改革，制定了新的工资等级，并在适合实行计件工资和劳动定额制的企业、工种推广了这种制度。此后又宣布取消许多免费项目，如学生制服、工人的午餐、体育比赛的门票等。这次全面的工资改革既增加了工资级别的档次，拉开了最高与最低级别之间的距离，以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又为职工普遍提高了工资，使约250万人

受益。

三是调整零售物价，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古巴的零售物价在1962年规定下来后，近20年没有变化。国家长期实行物价补贴，仅1967—1981年国家就补贴了18.87亿比索，加之成本长期高于价格，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1981年底，古巴在工资改革的基础上初步调整了物价，提高了1500多种零售商品的价格。某些价格虽然在调整后仍低于成本，但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同成本挂上了钩，减少了国家的财政补贴，调动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古巴的这场小改革为古巴经济注入一定活力，1980年以后拉美国家经济出现停滞或下降，而古巴仍基本保持了4%的增长率。1981—1985年的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7.3%，工业产值年均增长8.8%。蔗糖年产量一直稳定在800万吨左右，除蔗糖以外的出口产品增加了30%。

但是由于措施不配套，出现了不少偏差，如投机倒把、贪污受贿、哄抬物价、滥发奖金、化公为私等。国内不正之风越演越烈，群众不满情绪有所增长，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大。对此，古巴领导人提出要“整顿不良倾向”，从1986年起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纠偏运动”。其主要内容是：批判经济工作中忽视党的领导和思想工作的倾向，强调经济工作中精神因素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取消农民自由市场，恢复国家统购统销制度，修改允许私人建房卖房的住宅法，禁止私人行医和出售手工艺品等。

四、90年代古巴改革开放的特点 及其发展趋势

(一) 建设的成就、问题和改革的必要性

由于物资匮乏，古巴曾长期对居民所需的食品和生活用品实行严格定量供应，但大多数人对党和政府是理解和满意的，人们一提到“祖国”、“领袖”都会流露出几分自豪。这对外国人、西方人来说可能是个“谜”！

革命胜利后，古巴政府投入大量财力、物力，搞了不少福利，大多数古巴人都是革命的受益者、拥护者。30多年来古巴在教育、卫生、体育、科技等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进步，群众从中获得了实惠。古巴在文教体育方面的成就居第三世界前列，并可与不少发达国家媲美。在联合国1992年发布的世界129个国家的5岁儿童死亡率、中小学普及率、成人扫盲率的综合指数名次中，古巴属领先的30个国家之列。每15人中有一名大学生，每8个劳动者中有一名中级技术人员，每100万人口中就有1050个科技工作者和工程师。古巴实行医疗保健免费制，国际卫生组织承认已达到了2000年世界期望的水平。古巴还被公认为世界体育大国。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获14枚金牌，仅次于中国，名列第五。在1991年的泛美运动会上获140枚金牌，比美国还多10枚。女排在多次国际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并获奥运会金牌。所以，卡斯特罗1975年能自豪地说：“我们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公平分配财富，处处伸张正义，因此我们在社会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解决了本

半球其他任何国家都还未能解决的问题。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宣布，我们国家没有失业，没有种族歧视，没有饥饿、乞丐、赌博、卖淫和吸毒，没有文盲和赤脚失学的儿童，没有穷人区，也没有被遗弃的病人。我国的教育和卫生事业是社会成就的样板，博得了世界上许多人的钦佩。”^①

古巴建设的成就与其存在的问题是密切相联系的。因为古巴免费的福利项目搞得过多，而生产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赶不上消费基金的增长，影响着古巴的继续发展。古巴1996年社会福利预算就占35.5%，而同年生产投资仅占14.3%。

30多年来，古巴的经济发展虽有可喜的成就，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总的说来不能算很快。据古巴公布的材料，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1961—1965年是1.9%，1966—1970年是3.9%，1971—1975年是10%，1975—1985年是4%（其中1981—1985年是5.1%），1986年是3.5%，1987年是1.5%。苏东剧变后，古巴经济连续几年是负增长，1990—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累计下降了34.8%。1993年古巴开始改革，次年经济停止下滑。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的经济的增长率分别是0.7%、2.5%、7.8%、2.2%。

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为体现社会公正，古巴长期对食品和生活用品实行定量供应。由于国家实行财政补贴，所供应的商品是十分低廉的：面包0.05比索一个，大米0.24比索一磅，白糖0.14比索一磅。一个人一个月定量供应的食品要不了10个比索就全买下来了，按古巴人平均工资250比索来算，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第一、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中心报告》，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页。

物价确实相当低廉。然而，为维持这一制度，政府的财政负担是很重的。

社会主义既要考虑如何把“蛋糕”分得更“公平合理”，更要千方百计把社会这个“蛋糕”做得更大一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古巴领导人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强调古巴必须改革！

（二）90年代古巴改革的主要特点

1. 古巴的改革是由“应急措施”发展成“稳步改革”的。古巴90年代的改革，开始是由于环境所逼，正如古巴领导人当初所说改革是“不得已的让步”。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古巴领导人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和发展。1995年7月26日，卡斯特罗在关塔那摩市为纪念攻打蒙卡达兵营42周年所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已把坚持社会主义和实行改革开放纳入了马列主义范畴。他认为中国和越南按照这一方针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古巴采取的经济措施也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他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推动了经济工作的总体变化，也使我们对经济工作形成了新的观念”，“有些措施涉及面很广，且相当激进，目的是完善经济工作，特别是要使我国经济适应当今世界的现实。中国、越南等国一直在这样做。难道说这是放弃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列主义信念吗？不！恰恰相反”，“作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我们应该这样做，形势也要求我们以现实主义态度勇敢地这样做。但这并不是有人所说的，是转向资本主义，更不是朝资本主义方向狂奔迅跑。拥有大量能源、原材料和外部资金来源的前苏联及东欧各国发生的不可思议的灾难，以及中国和越南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功，明确地告诉我们，如果想要拯救社会主义，我们该做

什么和不该做什么。”

2. 古巴的改革借鉴了国际正反经验，一开始方向就很明确。卡斯特罗很强调，古巴不能学苏联的那种毁灭国家、毁灭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而要借鉴中国、越南的榜样，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并强调要从古巴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抄照搬。

3. 古巴的改革因其所处的特殊环境，以“稳步”为明显特征。古巴距美国近在咫尺，美国至今未放弃对古巴的敌视封锁、以压促变的方针，而古巴国内仍较困难，改革的社会承受力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搞改革，必然带有很大风险性。如果改革过急而出现社会不稳定，就会被敌对势力所利用。不改革国内经济难以上去，固然不利于稳定；但是，如果步子过急、过大，也不利于稳定。所以古巴领导人既强调必须“改革”，又强调必须“稳步地”进行。

4. 古巴强调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但决不会忽视政治、精神和道德的重要性。古共五大突出了对经济重要性的认识，强调“经济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芸豆比大炮更重要”，要做“经济战士”，要“学会管理”，“没有效益就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在政治与经济、稳定与改革、精神与物质、公平与效益、计划与市场等关系中，看来古巴会更偏重于前者。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古巴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负面消极现象，古巴更加强调整要加强精神和道德建设。1996年7月古巴颁布了《国家干部道德法规》，为打击国家机关的腐败之风，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规定26条戒律。卡斯特罗亲自签署并出席法规通过仪式，部长会议副主席卡洛斯·拉赫在仪式上强调：“没有精神道德就没有社会主义。如果我们的人民在干部身上看不到共产党人特有的品德，就没有社会主义”，我

们“需要一种道德、一种精神、一种榜样”，“我们要永远牢记总司令的思想：‘社会主义就是榜样的科学’”，古巴党和政府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消除腐败。

5. 古巴的改革具有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特点。由于古巴社会福利、免费项目多，一方面国家财政负担很重，不改革不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福利具有“刚性”，能上不易下，因涉及许多人切身利益，不能不谨慎行事。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增强群众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已成为改革的一大关键性问题。

（三）古巴改革的发展趋势

从近几年古巴改革的实践和古共五大精神看，可以看出以下趋势：

1. 不放弃计划，但要“利用市场”，将逐步加大市场因素在古巴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古巴曾明确表示“古巴决不搞市场经济”，但近年来卡斯特罗说：“如果要讲市场经济，我们也许不得不讲中国人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近召开的古共五大，仍强调坚持“计划经济”，但要“利用市场”这一点很明确。随着开放农贸自由市场和工业产品、小商品市场，这些产品的公开销售已合法化，而这些产品的生产是根据供求规律来进行的。到1995年8月，这些市场的销售额已达10亿比索以上。看来，在古巴经济中市场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加重已是大势所趋。

2. 坚持公有制不搞私有化，但其他经济成分的比重会增加。近几年来古巴已放宽了政策，扩大自我就业，允许个体经济存在，肯定了个体劳动者对国民经济“起补充作用”。因此已涌现了不少称之为“巴拉达尔”的家庭餐馆、称之为“博特

罗”的私人出租车，个体户已由原先的 4.6 万人，逐步增加到现在的 20 多万人。在农业经营机制上，先是划小国营农场经营单位，建立自负盈亏的“基层合作生产单位”，在农村大部分地区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现全国共有 5000 多个合作社，它们掌握着古巴 64% 的耕地。目前，国营农场耕地面积已由过去的 70% 降至 16%，合作社耕地面积由 20% 上升到 44%，个体农民耕地面积由过去的 10% 上升到 40%。此外，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外国独资、合资的成分也迅速增加。但是，古巴不会放弃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并将捍卫国有经济的存在，努力提高国有经济的效益。卡斯特罗在 1997 年 10 月召开的古共五大强调，如果一个私人通过他的公司或他的管理人员能够管理几千家商店，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不能拥有几千家商店并把它们管理好？鉴此，我们必须向私人学习管理。他强调要坚持公有制不搞私有化，但同时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他说，现在已经产生了“一些富人”，但“不会有人因开一家小饭馆而成为百万富翁”，有的人通过出租房子的途径获得很高收入，只要他充分纳税、遵纪守法，我们也应“表现得心平气和”。总之，古巴仍坚持公有制为主，但其他经济成分还会有较大发展。

3. 调整过高的社会福利性分配，逐步减少平均分配财富的比例，但某些基本的福利制度不会改变。古巴长期对文教、卫生、体育以及用水、用电实行免费，工人学生免费供应午餐，使国家财政负担很重。1996 年 8 月发表的古巴共产党《当前党的工作》的报告提出：今后的工作基点是，不再实行平分财富，而将要严格按照劳动的数量与质量和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来实行分配。现已取消了部分免费项目，削减了政府的部分补贴。但是免费教育和医疗的基本福利体系的格局不会变。

卡斯特罗在党的五大上说：“今后，我们在医疗、教育等领域依然不收费，它们是国家无偿给予人民的基本福利。这属于我们革命的本质特征之一。”

4.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大力吸引外资。古巴对外开放搞得早，近年来步伐进一步加快。古巴包括制糖业在内的生产部门均向外资开放，外资已出现在古巴的 34 个经济部门和行业里，外资来自 43 个国家，截至 1996 年夏季已签署 240 个合资协议。古巴还进一步下放外贸经营权，鼓励企业面向国际市场，并着手建立自由区和工业开发区。去年政府宣布首批自由区将设立在距首都哈瓦那 35 公里的马列尔港湾、靠近首都机场的瓜海以及西恩富戈斯湾。有关法律规定，在自由区开展的工业、贸易、农牧业、技术和劳务活动均实行特殊制度。进入



卡斯特罗笑谈形势

(1994 年)

自由贸易区和开发区的外国公司将享有免税进口原料、使用古巴工人加工、免税出口的权利。古巴有一支受教育程度较高、基本工资低的劳动队伍，对外资很具吸引力。

1997年10月举行的古巴共产党五大，总结肯定了前5年的工作，讨论通过了政治决议、经济决议等文件，突出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强调“芸豆比大炮更重要”、“没有效益就不是社会主义”。总的看来，古巴出于自己所处的特殊环境和情况，其改革强调“稳步”，但决不是“停步”，更不会“逆转”。

五、“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探索中前进

卡斯特罗强调古巴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古巴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借鉴别国的经验，但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近年来，卡斯特罗很重视中国和越南的经验，他高度赞扬中国改革的成就，他说：“中国人民正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任务，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巨人，是一个在特别困难的世界中进行抗争的巨人，它所做的一切确实令人钦佩。”他在访问了中国和越南之后回答记者提问时又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越南，尽管古巴可能会学习这两个国家的有益经验，但是这不等于说必须原封不动地照搬这种经济改革的模式。古巴与它们“有共同之处，但也有不同的地方，这是由于各国的客观条件不同”。看来，由于古巴与美国近在咫尺，国内情况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大差别，古巴的改革将更需谨慎探索前进，不仅速度上不宜过急过快，而且在其他许多方面必然会有自己的特点。正如

1995年12月卡斯特罗访华与江泽民主席会谈时，他所说的：“古巴正在进行稳步的改革和开放，建设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

古巴仍面临重重困难，社会主义将在复杂困难的条件下探索前进。首先，古仍面临美国已持续30多年的敌视和经济封锁；美国针对古巴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没有放弃，而且还在千方百计地加紧进行；西方其他国家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虽然反对美国的“赫—伯法”，但在“人权”、“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上，又与美国有共同点，有些国家主张把同古巴的经济合作与古巴的人权、自由选举挂钩，增加了古巴反封锁斗争的难度和复杂性。在这方面斗争将是长期的。其次，古巴以产蔗糖为主，其他产品高度依赖外部的经济结构是长期历史形成的，改变起来并非易事；另外，古巴改革时间还不长，经验不足，在思想理论上深化对改革开放规律性的探索和认识还需有个过程。

古巴虽然仍很困难，但有一个坚强的党。卡斯特罗在古共五大上强调：“我们应该设法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保障党的领导。在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长期斗争中，更不能放弃党的领导。近几年国际上发生的事，决不能让它在我们身边重演。我们的革命是任何人摧不垮的，我们的党是任何人摧不垮的。这场革命决不能被我们自己摧垮。为了确保这一切永远不会发生，首要的保证就是党员的觉悟和党的觉悟。既然我们在寻找预防艾滋病和癌症的疫苗，那么，对最严重的政治病也需要打预防针。对我国而言，在政治、社会和历史方面可能会出现的最严重、最可怕、最悲惨的疾病是，某一天我们的革命被我们这些革命者自己毁掉了。有鉴于此，必须做到百分之百的免疫。要保证这一点，党的领导是关键。我对中央委员会的同志

们说过，对所有这些事情应该预防，必须永远保证革命的连续性”，“我们应该建设一个钢铁般的党。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我们始终要保证我们的革命能够得以延续，不误入歧途，能够经受得起内外危险的考验。这就是我今天要给你们讲的关键的思想。”“在没有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的条件下进行斗争，拯救祖国，拯救革命，拯救社会主义，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一些曾是共产党人的人发誓自己不再做共产党人或后悔自己曾是共产党人，不少人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而我们再次重申我们的理想。历史和现实正在证明我们是正确的。我可以更加坚定地说，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的人民将坚持自己所热爱的事物和最神圣的利益。我们的人民必将在历史上赢得重要的一席之地。”

我们相信，古巴经受住了最严重的打击而傲然屹立，经济形势已开始好转，虽然全面恢复发展尚需时日，但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定会在克服重重困难中继续前进。

第11章

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

欧洲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源地，社会主义流派众多，但除了共产党的科学社会主义外，主要是社会党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长期来，这两股力量相互对立和斗争，但也进行联合与合作。

苏东剧变使欧洲共产党受到严重冲击。有的党已解散消失（荷共等），有的已改变名称性质（意共、英共、圣马力诺共等），其他党普遍出现党员退党现象。经过剧变，欧洲共产党由剧变前30多个减少到20来个，党员总数由剧变前的200多万减少到不足100万。经受剧变考验而生存下来的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普遍进行理论反思和政策调整。它们在探索中，已形成了两种类型，即：希共、葡共、德国的共等在积极探索中保留马列传统观点较

多一些的共产党，以及法共、西共、意重建共等探索步伐较大，提出一系列与马列传统观点不尽相同的新观点的共产党。

社会党在组织上获得了发展，力量有较大增长。但是在反共浪潮推动下，由于各国舆论普遍向右倾斜，许多人将对共产主义的否定自然引伸为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贬责和摒弃，使“民主社会主义”也面临“丧失信誉”的严峻“挑战”。冷战后，社会党在调整理论和政策中进一步与右翼政党趋同，另一方面它们又出现了与共产党联合与合作的趋向，从而度过了暂时的困难，成为当前主导欧洲政局的重要政治力量。同时，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加强了国际联系和交往，使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一些新动向。

欧洲是世界工人运动的发源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自上个世纪以来的 100 多年间，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高涨与低落交替、胜利与挫折相伴，波浪与曲折式向前发展的过程。上个世纪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很高涨，第一、第二国际的成立，以及巴黎公社起义即世界无产阶级第一次夺取政权的尝试都发生于欧洲。本世纪以来，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社会主义运动有过两次大的发展。战后以来的几十年间，经过 50、60 年代的低落，70 年代以“欧洲共产主义”为标志出现过一段时间的回升和发展。但 80 年代后又转入低落，直到 90 年代初苏东剧变时，再次遭受了空前严重的挫折。

一、苏东剧变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冲击和影响

苏东剧变不仅使欧洲共产党经受了战后最猛烈的冲击和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而且使社会党在组织上有所扩展的同时，思想上因受牵连而一度造成社会党影响和选票下降。于是在欧洲一度出现了左翼力量下降、右翼势力上升的现象。近年来，社会党和共产党加强了“左翼联合”，情况才有所好转。

（一）共产党所受冲击最为严重

在苏东剧变前，欧洲共产党仍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在本国和欧洲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当时，欧洲地区共有 30 多个共产党，260 多万党员。其中力量最大的是意共，其党员人数高达 150 万人，得票率为 26.6%，选票 1000 万张，在议会拥有 177 个席位。法共、葡共、希腊共和西共也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它们的得票率在 10% 左右。其中法共有 60 万党员，得票率为 11.3%，选票 60 万张，在国民议会有 26 个议席。葡共有 20 万党员，得票率为 12.1%，选票 70 万张。西共有逾 70 万党员，得票率为 9.5%，选票 180 万张，在众议院有 17 个议席。当时欧洲还有一个唯一参政的共产党，这就是圣马力诺共产党，它的得票率达 28.9%，多年来与天民党共同执政。但是苏东剧变给欧洲共产党造成了全面、严重的冲击，使其力量损失过半。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欧洲共运发生新的分化，共产党的力量大为削弱。在

苏东剧变造成的强大压力下，有的共产党改变了名称和性质，脱离了共运队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意共。该党于1991年2月改名为左翼民主党，加入了社会党国际。意共是西欧共运的主力，其党员人数和选票分别约占西欧共产党党员总数的一半和选票总数的2/3，它的离去无疑使西欧共运的力量蒙受重大挫折。圣马力诺共也改名为民主进步党，放弃了共产党的原则。现属于联邦德国政党的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则是由原民德统一社会党（共产党）改名而来，它宣称自己不是社会民主党，也不是共产党，而是欧洲新左翼党。英共改名为民主左翼党。有的党，如荷共，宣布解散，不复存在。此外，欧洲各国共产党都不同程度地发生退党现象。由于以上这些因素，苏东剧变后，欧洲共产党由剧变前的35个减少到21个，党员总人数由260多万减少到不足100万，在本国议会中所占席位的总数由288席减少到89席。

2. 造成党内思想上混乱，组织上分裂。苏东剧变在欧洲共产党内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不少党员提出党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苏东剧变是否意味着共产主义前景的消失等问题。有人还提出解散共产党、改变党的性质，把共产党变成“左翼论坛”、“左翼运动”。党内的思想混乱导致了组织上的涣散、分化。意共1991年2月改名后，原党内少数派科苏塔联合原意共一部分党员共约15万人退党，另建“重建共产党”。法共党内出现“革新派”、“重建派”和“再造派”。奥共党内也出现“教条主义派”、“革新派”和“取消派”。葡共党内出现了批评党的领导的“革新派”。西共前副书记库列尔拉走数百名党员加入了西工社党。西劳动者党决定集体加入工社党。

3. 欧洲共产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进一步恶化。苏东剧变

后，资本主义和各种反共势力、甚至社会民主党欣喜若狂，以为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胜利了，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死亡了。它们在各种场合、通过新闻媒体大造反共舆论，叫喊共产党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应当“解散共产党”、“取消共产党”，宣扬共产党就是“古拉格群岛”，是“历史的罪人”，恨不得一夜之间把共产党从地球上全部消灭掉，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概念从人们的头脑中彻底抹掉。当时在西方掀起的这股反共浪潮确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对欧洲的共产党造成了和平年代从未遇到过的巨大压力，使它们确实实实在在地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二）社会党有喜有忧有升有降

欧洲社会党的力量自五六十年代以来发展很快，特别是在北欧地区社会党长期处于执政地位。1994年6月欧洲联盟12国的社会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全部567个议席中的200个议席，欧洲社会党党团保持了在欧洲议会内最大党团的地位，在欧洲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苏东剧变时期，社会党是推波助澜的。苏东剧变既给社会党带来了发展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由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席卷欧洲，共产党受到冲击，社会党也受到牵连，其形象受到影响，各国社会党的影响及选票普遍下降。在各国舆论普遍向右倾斜的情况下，许多人把对共产主义的否定自然引伸为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贬责和摒弃。对此，不少社会党公开承认，苏东剧变既是机遇，也使“民主社会主义”面临“丧失信誉”的严峻“挑战”。

社会党本来是有两重性的，它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同时，又在实际活动中为维护本国工人的近期利益而与右翼政党相抗

争。因此，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一直视其为社会主义的传统势力和主要竞争对手，并为此于1983年在伦敦成立“国际民主联盟”（保守党国际），以同社会党国际相抗衡。苏东剧变后由于共产党“社会党化”，社会党的数量增加，力量上升。但另一方面，在反共的社会舆论影响下，社会党也受牵连，处于不利地位，纷纷在选举中失利。西欧各国的社会党一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危机、思想理论危机、道德危机和领导危机。

法国社会党在1993年3月立法选举中惨败而被赶下台，仅得票17.62%，获53个议席，比1988年立法选举减少15个百分点，丢失了近一半选票和200多个议席。长期参政的意大利社会党，主要领导人几乎都陷入丑闻，内部四分五裂，组织上处于瘫痪，在一次选举中只得了2%的票。长期执政的西班牙工社党因日益不得人心而不得不宣布提前于1993年6月举行大选。德国社民党主席易人，凡此种集中地反映了西欧各国社会党的困难处境。

近年来社会党与共产党加强合作，实行“左翼联合”，在许多国家的选举中又出现了左翼力量上升的势头。不少国家社会党又重新上台执政或参政。现在欧盟15国中，社会党执政或参政的有12国。事实说明，社会党真把共产党都搞垮，就剩其与资产阶级右翼势力对峙，未必对其有利。这就是说，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虽有原则分歧，但实际上也有共同利益。近年来它们有超越意识形态分歧，求同存异，谋求合作的趋向。法国社会党和意大利左民党，如没有法共和意重建共的支持，均不可能上台执政。

二、冷战后欧洲共产党组织上的变化

欧洲多数国家的共产党虽然由于苏东剧变的冲击等原因力量 and 影响进一步削弱，但经受住了考验，保住了基本力量。目前，在西欧地区尚有约 21 个共产党，近百万党员，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拥有 800 多万选民，有 20 多名欧洲议员。当前，力量 and 影响比较大的党有法共、葡共、意重建共、西共、希腊共等。这是一支经过历史风雨的考验，有一定群众基础和政治影响的政治力量，在西欧和本国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的党在国内政局中甚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共在 1997 年 6 月举行的立法选举中得票率为 9.9%，在国民议会 577 个席位中获 36 席，并参加了社会党政府，在政府中有 3 名成员。意重建共在 1996 年 4 月的议会选举中得票率为 8.6%，在众议院 630 个席位中获 35 席，在议会中支持以左民党为主体的中左政府，但未参政。如无法共和意重建共的支持，法国社会党和意大利左民党均不可能维持其执政的地位。葡共在全国范围内为在野党，但在首都里斯本与葡社会党联合执政。这些党在困难的条件下，顶住国内外的压力，坚持共产党的名称和共产主义信念，揭露和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坚持不懈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促进社会进步。它们针对西欧经济不景气、失业问题日益严重、社会形势恶化等情况，利用各种机会开展活动，组织或参与社会政治斗争。

在对外关系方面，欧洲共产党明显加强了国际交流与合作。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和集团化的日益加强，特别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化，欧洲各国共产党在维护劳动群众权益的斗争

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深感各自为战难以有效地对付资产阶级的联合进攻。从这些年情况看，其党际关系的重点是在欧洲内部，它们着力开展欧洲共产党之间以及欧洲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党的对话和交往，多边活动也多围绕欧洲当前存在的问题和欧洲民众关心的问题。

总的说来，当前欧洲共产党基本度过了最困难时期，其党员队伍和选民队伍在低水平上趋于相对稳定，并千方百计谋求新的发展。但它们的处境仍然是困难的，其力量和影响仍然有限，今后也难有大的发展。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仍处于低潮。

欧洲共产党之所以多年来力量和影响不断下降且至今仍未走出困境，除有苏东剧变冲击的因素外，还有许多年来就存在的一些因素，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战后随着经济、科技的持续发展，西欧各国的经济、社会、阶级结构和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产业结构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大下降，第三产业迅速增长；传统工业衰退，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兴起。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引起了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减少，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迅速增加，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口增加，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口减少，白领工人增加，蓝领工人减少。而西欧各国共产党的主要力量植根于传统工业领域，这一工业领域的衰落使共产党的传统地盘逐渐萎缩。

战后西欧工人阶级一度发展后即呈下降趋势，中间阶层蓬勃发展，而共产党长期以来忽视中间阶层的工作。它们所依靠的工人阶级在思想状况和政治态度方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2. 战后欧洲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发展，西欧国家的经济实力持续增长，社会福利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随之提高，人民的思想和要求也发生很大变化，他们普遍求稳怕变，希望和平、安

定地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在战后初期形成的一套比较激进的主张和做法对广大人民群众已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采取种种手段对工人阶级组织上进行分化，思想上通过舆论宣传攻势加以弱化，涣散他们的斗志，这使工人阶级的斗争性和集体精神大为减弱。

3. 苏东剧变前的苏联模式也对西欧共产党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使这些党严重脱离本国实际和本国群众。当时的苏共以“老子党”、“领导党”自居，以种种手段迫使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在国际政策上同苏共保持一致，在国内政策上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立为“样板”、奋斗的目标，把是否支持苏联的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这种情况妨碍了西欧共产党深入研究本国的具体国情，并从具体国情出发深入研究制定什么样的政策主张、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种情况也有损于很多西欧国家共产党的形象，使人们总是把它们与苏共和苏联模式联系在一起，资产阶级和反共势力也以此来诋毁它们。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苏侵捷、苏出兵阿富汗一系列事件不仅使苏共和苏联的形象变得日益暗淡，也使西欧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受到打击。

(4) 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欧国家共产党自身的问题，它们未能及时认清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和社会的变迁，从而及时调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重点。不少党的领导思想僵化，因循守旧，不重视党的自身革新。它们在统战问题上摇摆不定，反复无常。党内缺乏民主，听不得不同意见，对与党的领导持不同意见的人打击、排斥。

三、冷战后欧洲共产党 理论政策上的新探索

苏东剧变把欧洲共产党进一步置于困境，同时也促使他们反思。冷战后西欧共产党一个突出的情况是，为了走出困境，谋求新的发展，它们普遍地总结过去，面向未来，调整政策，刻意变革，积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主张。

1. 关于党的建设问题。近年来，西欧共产党在党内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内生活的原则和党的作用等涉及党本身的诸多方面均提出了一些与传统不同的概念。

第一，关于党的性质。除希共继续强调它是“工人阶级先进的、有觉悟的、有组织的队伍”这一传统提法外，西欧的其他共产党均宣称，今天的共产党已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要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还必须是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工薪者的群众组织，必须从维护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葡共称，它是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的先锋队。西共表示，它是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会各阶层的组成部分。意重建共宣布，它是一个新的群众性党，是“意大利工人阶级、劳动者，所有男女、青年、知识分子和公民的一个自由的政治组织”，是意大利现实生活中一支生机勃勃的对抗性政治力量。法共表示，它是一个为所有拒绝被剥夺干预权和选择权的男女服务的政党，是人类解放的旗手，是各国人民为自身解放而战斗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共强调，由于世界发生了划时代的

变化，西欧共产党不可能再是第三国际时代所说的工人阶级政党了。今天，共产党必须“革新”，法共必须成为一个“新型的共产党”，一个“现代的、开放的、充满活力的、民主的共产党”，以适应法国社会的新需要，在即将进入 21 世纪之际能起到同法国人民一道建设美好未来的作用。

第二，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除希共和葡共继续强调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外，西欧其他共产党仅提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的理论，普遍强调必须重视本国的一切进步思想和革命传统，应从实际出发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西共主张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认为并非马克思主义的一切论点在今天都是有效的，必须根据新的情况加以革新和发展。法共和意重建共则强调“回归马克思”，主张批判地吸收马克思理论的精华，摒弃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恢复马克思理论之本，比较看重马克思的早期学说，特别是人文主义思想。法共表示，“回归马克思”并不是重复马克思的论点，而是继续和深化其论点，甚至超越马克思在其时代认识的局限性中所作的分析和所确定的观念。认为，人类解放的思想必然具有多元化的特点，所以法共吸取人类的进步思想和人民的革命传统，特别是民主、自由、博爱和人道主义。

第三，关于党内生活的原则。除希共和葡共表示民主集中制依然是党内生活的根本组织原则外，其他党均强调民主、自由、多样性。法共强调，它不能继续保留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方式，而应促进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和多样性。法共认为，民主化是使党生机勃勃的关键，是调动每个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关键；党内应有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坚持公开和坦率的原则，个人对现实的看法是集体的财富；集体领导的首要任务是表达党员的意志，使之变成政治力量，而保持集体领导的活力

应以集体原则为基础，把个人的努力置于集体行动之中。西共认为，党内生活的原则是民主、自由、互助和公正，实现所有人的平等和尊严，消除各种形式的歧视。但在西欧共产党内，仍继续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

第四，关于党的作用。除希共和葡共继续强调党应始终起领导作用外，其他党则认为，今天应变革有关党的作用的传统观念，不宜自称是“领导党”，党必须适应新形势的挑战，同所有希望改造现行社会的组织和个人对话，在增强人民的自由参与能力和争取文明的新进步中起推动作用。法共强调，它竭力摆脱所谓“领导党”的旧观念，社会需要共产党发挥新作用，即：恢复和重建人们在行动中的联系，全力改造现行社会，为千百万公民参与政治创造条件，同法国人民一道为建设一个人道和博爱的社会而斗争。西共为吸引更广泛的社会力量，有意淡化党的色彩，与其他左翼组织和力量组建“联合左翼”，并通过它来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意图。西共称，“联合左翼”是“西班牙共产党人最具远见卓识、最具战略意义的杰作”。

2. 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主问题。西欧共产党继续坚持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但特别强调民主，表示坚决摒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认为这种模式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实际上排除和放弃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扼杀了民主和自由，从而蜕变为“国家干涉主义”、官僚主义和平均主义，成为共产主义的悲剧。许多党认为，历史经验表明，民主、自由、人权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本因素。

希共表示，它的最终目标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必将是民主的最高形式，其特征是

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人民真正行使权力并有效地监督政权及其机构。

葡共表示，它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最高奋斗目标。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的深化，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建立一个人道主义价值观为指导的、没有对抗阶级的新社会，从而使人人享有民主、自由和平等。

西共认为，社会主义在于实现最深刻、最完全、最有参与权的民主，要切实为实现人权和所有人都享有神圣的自由权而奋斗，要不断扩大和深化民主，不断扩大和深化社会对政治活动 and 经济活动的监督，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中实现充分民主，争取建立一个没有暴力和保护自然并能代代相传的理想社会。该党还主张将生态主义和共产主义溶为一体，主张所谓“生态共产主义”。

法共表示，它以解放人类的共产主义前景为目标，努力通过普选表达人民的意志，建立一个人人自由平等、团结互助、尊重个人能力和个人发展的社会，这就是“法国式的共产主义”。它认为，鉴于苏联和东欧“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和教训，尽管法国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发祥地，尽管社会主义在人民心目中仍有重要价值，但今天毋须再提建立社会主义，应实现共产主义运动的革新，提出朝共产主义目标前进更为科学。法共强调，共产主义不是拉平的“集体主义”，而是一种尊重个人并让个人充分发挥才能的社会；共产主义不是人人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一种通过尊重差别来加以实现的平等；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一致的，因为人道主义首先是对人的尊严这个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本身所作的肯定，并且也是公民民主的中心问题；共产主义是民主，即人民当家做主，共产主义社会应是民主在各方面占首要地位的社会，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

3. 关于革命道路问题。近年来，西欧共产党从本国的现实出发，强调并积极探索新的革命道路。除希共仍主张通过社会主义革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外，西欧其他共产党均程度不同地强调通过发展民主的道路来变革、改造现行资本主义社会，“超越”资本主义，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葡共认为，21世纪在葡萄牙实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为深化民主而斗争的道路，今天葡共极力执行建设“先进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文化民主的斗争纲领，这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创造有利的条件。它强调，通往社会主义的进程不仅取决于推动其发展的各种力量的意愿和行动，而且还取决于其他因素，特别要看反对这一进程的力量如何行动和采取何种抵抗形式。

法共、西共、意重建共等主张变革和改造现有社会，反对资本主义，“超越资本主义”。西共表示，它不主张先通过民主机制夺取政权而后再进行变革，而是主张从现在起就团结社会的大多数对政权机构和社会进行变革，争取通过政治和社会运动实现对现有社会的取代，以和平的方式组织起一个新社会。法共认为，“超越资本主义”意味着超越它的一切，特别是超越它对社会和人的一切统治形式。超越既不是“适应”，也不是“消灭”，而是一个对社会的改造过程，即一个由运动和变革组成的总体。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这个过程只能开始于现存社会，其动力只能是本国人民，其方式是人民通过斗争和选票，使那种与“一切为了金钱”的逻辑完全不同的逻辑占据统治地位。现实生活表明，仅仅宣布“消灭”资本主义并非行之有效，要从现实出发，改造现实，建设未来，才能消灭过

去。苏联模式失败的主要教训就是，当人们不是通过民主和人民干预来“超越资本主义”时，其最终结果是资本主义复辟。《国际歌》唱得好，“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但是，人类和文明运动的进程从来不是这样，从来不是先打碎一切再开始建设新东西，而是在建设新世界的同时消灭旧世界。“消灭”这一概念并未体现当今西欧社会的迫切要求。应当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同时具体地消灭资本主义的逻辑，力量对比和人民运动将决定改造旧世界的速度和强度。法共的道路不同于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的那种仅限于“调节”和“限制”资本主义某些方面的道路，法共的选择是一种革命的选择，是通过人民运动和民主力量在新型革命道路上推进我们时代的一场革命。这是一种人道的、公民的、互助的革命。

四、冷战后欧洲各社会主义流派的新动向

二次大战以来，特别是自 60 年代末期以来，社会主义在西欧主要分为三大流派：第一，欧洲各国社会党和社民党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即在民主、自由、互助和多元化旗帜下推行改良主义，建立“福利国家”；第二，欧洲不少共产党宣布坚信马列主义，紧跟苏共，主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力图建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第三，意大利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等所提出的“欧洲共产主义”，强调民主是西欧社会极为重要的传统，主张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要走既不同于苏联的“现实社会主义”也不同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80 年代末苏东剧变，使世界形势特别是欧洲形势发生了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巨大变化，欧洲的社会主义力量和社会主义思想也随

之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总的看来，目前欧洲各社会主义流派出现以下新动向：

第一，欧洲社会党和社民党所坚持的“民主社会主义”，在调整中进一步与右翼政党趋同。

苏东剧变后，西欧社会党兴高采烈，认为这是它们推进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胜利。社会党国际趁机实施“东进战略”，在东欧积极培植和发展势力，促使东欧许多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并吸收它们为成员党。与此同时，社会党大力调整政策，如削减福利，取消党章中有关公有制的条款等等，进而丧失其传统特色，与右翼政党日益趋同。他们一再宣称，其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实行民主、多元化和人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反对剥削和压迫，反对权力集中和阶级专政，各国和各国人民应享有民主自决权；强调只有在宏观调节下，通过市场才能使社会创新；重视生态平衡，认为保护环境是劳工运动的新使命；支持欧洲一体化，主张通过联合国建立“民主的世界社会”。社会党是目前西欧的一支十分强大的政治力量。

第二，原来欧洲共产党当中跟随苏共、主张走十月革命道路、建立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趋向已消失，现在所有共产党一致否定苏联模式，积极探索新路子。但是它们在探索中既有共同点，也存在差异，出现两个类型。

各党探索中的共同点是：普遍认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的重大挫折，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失败。他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破产论”是毫无根据的，因此继续坚持为共产主义奋斗是所有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继续坚持不改变共产党的名称。但是在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认识上，与过去比较，在坚持社会

主义是实现自由平等、人类解放、消灭剥削和压迫之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规律的同时，更突出地强调民主的必要性。认为社会主义是民主的深化，是民主的最高形式，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本因素。此外，他们主张，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必须尊重本国的传统和民族特色，必须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表示坚决拒绝苏联模式，认为这种模式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扼杀了民主自由，从而蜕化为“国家干涉主义”、“官僚极权主义”，造成了世界共运的悲剧。

但是在关于社会主义前景以及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各国共产党的观点各异，强调重点也不同，大体上形成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如希共、葡共、德国的共产党等，积极调整其方针政策，但坚持马列的传统观点多一些。它们强调，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的先锋队，其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其最终目标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建立人人享有民主、自由、平等和幸福的新社会。强调，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原则，全面发展生产，保证充分就业，不断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葡共主张，为给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有利条件，在葡萄牙首先应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全力为建立先进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文化民主）而斗争。认为，通往社会主义的进程，不仅取决于希望推动其发展的各种力量的愿望和行动，而且还取决于其他因素，特别是要看反对这一

进程的力量如何行动，采取何种抵抗方式。

第二种类型，如法共、西共、意重建共等，积极进行新探索，其方针政策的调整力度较大，提出了一些与马列的传统原则不尽相同的观点。它们强调，今天的共产党已不可能再是第三国际时代所说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了，它必须成为一个代表所有社会阶层利益的、充满活力的、开放的、民主的政党，必须从实际出发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在于实现最深刻、最完全、最有参与权的民主，实现人权和神圣的自由权，不断扩大人民对政治和经济活动的监督，在社会关系中实现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应成为一个使没有剥削并保护自然的理想社会能代代相传的社会。这些党认为实现社会主义是一个过程，不是先打碎现存社会再建设新社会，而是在现存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民主的道路来逐步变革。最后达到“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法共认为，超越资本主义意味着超越它的一切，特别是超越它对社会和人的一切统治形式。超越既不是去适应也不是去消灭现行社会，而是对现存社会的一个改造和发展过程，即由运动和变革组成的总体。这个过程只能开始于现存社会，其动力只能是本国人民，其方式是通过斗争和选票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取代。法共表示，人类文明运动的进程从来就不是先打碎一切再开始建设新东西，而是在建设新世界的同时消灭旧世界。“消灭”这一概念未能体现当今西方社会的迫切要求。

冷战后，欧洲共产党在努力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中，提出了上述新观点和新主张，是有其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的。

首先，要显示它们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毫无共同之处，从而更好地争取群众。苏东剧变后资本主义在十月革命的故乡、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复辟，几十年来领导建设

社会主义的苏共和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垮台，世界共运的这一空前的大挫折，给西欧各国共产党以深刻的教训，迫使它们认真反思，从而在客观上为它们解放思想，从本国实际出发进行探索提供了可能。正如西共所说，苏联模式的失败使西方工运获得了更大的自由来探索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战略。长期以来，西欧各国共产党与苏共关系密切，其方针政策受苏共的影响颇深，有些党甚至被视为“苏共代言人”，对它们来说，苏东剧变的最严重后果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遭到严重损害。在此情况下，西欧各国共产党为摆脱困境，恢复和发展力量，就不能不调整方针政策，提出有关社会主义的新主张，力图以新的面貌展现于世人面前。

其次，要适应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自 80 年代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当代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西欧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产业工人明显减少，中间阶层日益扩大。西欧资产阶级不能不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革调整，改进议会民主，加强政权结构的法制化、政治化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力促其统治方式和剥削方式的“现代化”和“文明化”。它们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力，一方面协调生产关系，安抚群众。近 20 年来西欧经济有很大发展，大多数群众的整体生存条件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从而显示出资本主义仍有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发展能力。西欧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时不能不充分考虑这种新情况。

第三个新动向是，冷战后欧洲左翼党积极加强国际联系。近年来，欧洲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积极寻求进行国际联系的新途径，彼此间的交往明显加强，联合行动日益增多。这是西欧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又一新动向。首先是创建和发展“西

欧左翼论坛”。1992年，在葡共的倡议下，意重建共、西共、葡共、法共、希腊共和塞浦路斯人民进步党等6个党聚集在里斯本，举行了“西欧左翼论坛”首次会议。与会各党就苏联和东欧剧变的严重后果及在新形势下西欧共产党应如何开展斗争交换了意见，一致表示必须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和目标。随后，“西欧左翼论坛”分别在米兰、马德里、雅典、赫尔辛基、柏林等地举行会议，现已举行过12次会议。目前，该论坛已成为西欧各国共产党的一种非正式的国际组织，是它们之间协调立场、加强合作、共同决定采取联合行动的主要渠道。至1997年底，该论坛已拥有16个成员党，法共、希腊共、西共、意重建共、德民社党等是这一组织的核心力量。其次，大力开展联合行动。近年来，西欧各国共产党不仅在本国发动和参加群众运动，而且针对当前西欧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积极在全欧范围内开展联合行动。如1996年5月，在欧洲议会联合左翼党团（由西欧各国共产党欧洲议员组成的党团）的倡议下，西欧4个共产党和左翼党云集巴黎，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失业的群众大会。法共、西共、意重建共等党的书记分别发表讲话，揭露现代资本主义对劳动者权益的新进攻，强烈要求西欧当权者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西欧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失业问题。第三，召开各种国际会议，呼吁加强国际主义团结。近几年来，欧洲各国共产党为交流经验，加强合作，不时召开各种类型的国际会议。

近年来，欧洲各国共产党之所以加强国际联系是出于主客观方面的迫切需要，是国际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西欧各国共产党经受了苏联和东欧剧变巨大冲击的考验，它们顶住了重重压力，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但是面对国际大资本全球化和集团化的加强，特别是西欧一体化的深入发展，西欧共产党

深感势单力薄，从而得出了加强国际联系、开展联合行动、寻求新的团结形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共识。它们认为，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后，应交流经验，相互支持，加强协调，采取联合行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反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粉碎国际资本的联合进攻战略。另一方面，随着欧盟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各国面临着共同的社会问题（失业、社会福利制度的危机等），需要交换意见协调行动。但是，鉴于过去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不可能重建什么新的共产国际。今后欧洲各国共产党在开展联合行动、发展国际联系与团结方面将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困难的曲折进程。

第12章

欧洲的共产党及其新探索

苏东剧变后欧洲还有 20 来个共产党，近百万党员，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拥有 800 多万选民，20 多名欧洲议员。当前，力量和影响比较大的党有法共（27 万）、葡共（14 万）、意重建共（12.7 万）、西共（4 万）、希腊共（3 万）等。这是一支经过历史风雨的考验，有一定群众基础和政治影响的政治力量，在西欧和本国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这些党在困难的条件下，顶住国内外的压力，坚持共产党的名称和共产主义信念，并根据新的情况进行理论反思和政策调整，揭露和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坚持不懈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促进社会进步。

一、法国共产党及其“新共产主义”

法国共产党在苏东剧变后，顶住压力，坚

持不改变共产党的名称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目标，并继续进行革新。它现为法国第四大党，有党员27万人，国民议会议员36名，参议员15名，欧洲议会议员7名，大区议员148名，省议员294名，控制着3个省议会和55个较大市镇议会。1997年6月参加以社会党为主的左翼联合政府。

法共是西欧发达国家中具有长期革命斗争传统、仍有一定影响和群众基础的主要共产党之一。苏东剧变后，它在坚持不改变共产党称号的同时，强调要实行“共产主义变革”，建设一个“现代的、开放的、富有活力和民主的新型共产党”，并提出了“新共产主义”理论，以取代原来的“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

（一）历史概述

法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12月29日，由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图尔代表大会分裂出来的多数派组成。1935年7月，法共同社会党、激进党等69个政党组织建立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并支持以社会党为主体的人民阵线政府。二战期间，法共积极参加抵抗运动，开展游击战争和地下斗争，有7万多名党员英勇牺牲。

战后初期，法共一度成为法国第一大党，党员达80多万。1946年9月至1947年5月，曾先后参加过五届政府，多列士等8名领导人入阁，并提出有可能考虑走与俄国共产党人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法共十四大提出，不通过起义和

内战建立人民政权的可能性业已增大。1968年12月，法共中央发表《尚比涅宣言》，明确提出通过议会道路实行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1972年，乔治·马歇任法共总书记，同年6月，法共同社会党、左翼激进党建立“左翼联盟”。

70年代中期，法共开始实行党的革新，提出走“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即“民主的、多元化的、自治管理的社会主义”道路。1975年，法共批判斯大林主义。1976年，二十二大放弃无产阶级专政。1977年，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并在政权形式问题上提出“自治管理”的主张。1979年，二十三大放弃马列主义，代之以科学社会主义的提法。1981年6月至1984年7月，法共参加社会党莫鲁瓦政府，菲泰尔芒等4人入阁。法共的力量和影响从80年代初开始下降，其得票率从1978年立法选举的20.6%跌到1988年总统选举的6.8%。

苏东剧变后，法共受到严重冲击，但仍坚持共产党名称和社会主义奋斗目标，并继续进行党的革新。1993年立法选举，法共获9.18%的选票，初步遏制住党的下降趋势。1994年，二十八次放弃民主集中制，代之以“民主”的运转原则，并由罗贝尔·于接替马歇，担任法共全国书记（相当于总书记）。1995年4月，罗贝尔·于参加总统选举，获8.46%的选票。同年11月，罗贝尔·于发表其第一部理论性著作《共产主义的变革》。1996年底，二十九次放弃“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的提法，代之以“新共产主义”，主张实行共产主义变革。1997年6月，法共参加社会党若斯潘政府。

（二）冷战后法共的革新和政策调整

近年来，法共先后于1990年12月、1994年1月和1996

年12月召开了党的二十七次、二十八次和二十九次，重申坚持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和共产党的名称不变，坚持党从7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的革新，并在否定苏东社会主义经验、实行新共产主义、实行民主运转原则、建立左翼进步力量联盟等方面进行重大的政策调整。这集中反映了法共在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之后，为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斗争需要，寻求一条符合法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进行的新探索。

1. 法共在批判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的问题上进行了深刻调整，从过去长期基本上肯定苏东社会主义经验转变为基本上否定苏东社会主义经验，否定苏联思想模式。

由于历史的原因，法共从1920年建党以来长期同苏共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参照苏联的社会主义经验，在国际政策方面无条件地维护社会主义苏联的利益。尽管法共在70年代中期主张“欧洲共产主义”，批判斯大林主义，否定国际共运中心和社会主义统一模式，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从总体上肯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却一直沿袭下来，没有大的改变。

苏东剧变使法共在政治思想上受到严重的冲击，同时也促使法共对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经验的失败进行新的思考和认识，逐步从总体上肯定走向总体上否定：（1）1994年法共二十八大发表的《宣言》，加深了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弊病的认识，强调苏联东欧社会是建立在一党制、完全的统制经济与窒息个人首创性和观点多元化的突出国家作用之上的。其主要弊病在于严重缺乏真正的政治讨论、广泛的民主和自行管理，即缺乏人民对建设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参与。其结果是加深领导者同被领导者之间的鸿沟，依靠强制和镇压来实现国家对社会的经济的控制，造成的思想一律与信息、对话和观点交锋这些要求相对立，造成的党政不分，又使共产党变成成为一种与公

民民主干干预相对立的执政和管理的工具。(2) 1995年2月法共新领导人、全国书记罗贝尔·于在参加总统竞选活动时发表讲话，首次提出了法共从总体上否定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经验的论断。罗贝尔·于郑重宣布，苏东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蜕变”，其经验总结“从总体上说不是积极的”。此外，他还承认法共在50年代没有同斯大林主义的专制权力观念进行决裂是个错误，法共对自身自80年代以来的衰落也负有责任。罗贝尔·于的上述讲话标志着法共在苏东社会主义评价问题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3) 罗贝尔·于在同年11月发表第一部论著《共产主义的变革》，在批判斯大林主义问题上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4) 1996年法共二十九大着重分析和批判了苏联的思想模式。二十九大文件指出，法共过去遵循马列主义的思想模式，把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看作是一种决定社会发展的现实。这种思想模式曾使法共摆脱过民主主义，并在斗争中捍卫过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利益，但在许多方面却违背了那些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继承下来的关于公民性、政治与共和的独特观念，因而遭到了失败。经验表明，如果由这种思想模式主宰和控制人民，那就不可能实现有利于人民的社会变革。

2. 法共在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进行了深刻调整，从过去长期主张“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转变为主张“新共产主义”，强调要“超越资本主义”。

苏东剧变后，法共在政治思想上受到来自党内外的大量压力和冲击。右翼势力进行反共宣传，叫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灭亡；社会党鼓吹法共应向社会民主主义靠拢；法共党内不少老党员对苏联的演变、特别是苏共的解散感到困惑和担忧；党内反对派则要求法共放弃共产党称号，在新的基础上建

立一个新的进步运动。面对这种严峻考验，法共在加深对苏东社会主义经验再认识的同时，重新思考和认识了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换言之，即如何在坚持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和共产党称号的同时，加大党的开放、革新力度，探索一条能够改变法共过去长期亲苏、僵化、保守的形象，适应冷战以后新时期斗争需要的新路线。

因此，法共放弃了过去马歇时期长期遵循的“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即“民主的、多元化的、自治管理的社会主义”的提法，代之以“新共产主义”。为此，法共经历了一个调整的过程：（1）法共在1991年9月中央全会上强调，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国家遭到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失败，而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的失败。法共不会因为苏联发生的事情而放弃共产党的特性和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的目标。（2）法共二十八明确重申法共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景”，为建设“民主的、自治管理的、使全体社会成员均能全面参与决策的社会主义”而斗争。（3）法共全国书记罗贝尔·于在《共产主义的变革》中，首次提出了“新共产主义”的政治主张。罗贝尔·于强调法共为共产主义而斗争，但这种共产主义既同过去苏联主张的、现已死亡的那种共产主义毫无关系，又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新颖，因而是新共产主义。（4）法共二十九大根据罗贝尔·于提出的共产主义变革的指导思想，正式放弃了马歇时代长期坚持的“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改提“新共产主义”，突出“超越资本主义”这个战略口号。这标志着法共在探索共产主义变革理论和实践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3. 法共在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上进行了深刻调整，从过去长期执行的“民主集中制”转变为实行“民主的运转原则”，

进一步促进党的民主革新。

法共从 1920 年建党以来一贯实行民主集中制。从 70 年代中期以来，法共在党的革新中，在提出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加强了对社会主义与民主关系问题的思考和认识。法共认为民主是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主张走“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要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把民主一直推进到社会主义。尽管如此，法共在苏东剧变后的最初几年，仍然坚持民主集中制，强调民主集中制是法共必须遵循的基本组织原则，并且揭露资产阶级及其舆论工具歪曲法共的民主生活。

法共放弃“民主集中制”经历了一个过程。随着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原因讨论的深入，法共在党内民主问题上又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广泛的讨论，终于作出放弃民主集中制的决定：（1）在 1990 年法共二十七大会上，少数人提出了取消民主集中制的主张。由于意见分歧，二十七大会决定将此问题留待二十八次修改党章时予以解决。（2）马歇总书记于 1993 年 6 月，以个人名义提议法共放弃民主集中制。此后，法共党内就此问题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激烈讨论，最后意见趋于统一。（3）1994 年法共二十八次修改党章，决定正式放弃民主集中制。法共认为，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内生活的运转原则，过去曾适合于法共的革命斗争，在法共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但现在已不能很好地反映党内出现的新的民主生活方式。民主集中制已不再是法共的观念，应当完全超越。党内唯一运转的原则是民主。按照这种原则，党员是党的主人；支部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党要通过观点多样化和思想交锋，来建立多样化的统一；党的决定要以民主的方式通过多数作出；但党内不允许存在有组织的派别。此外，为了体现民主的运转原则，突出集体领导，反对专

制主义和独揽大权，法共在组织机构上作了重要调整，其中包括将原先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全国书记处和总书记职位改为全国委员会、全国局、全国书记处和全国书记，并将党的机关报《人道报》改为党报。(4)法共在1996年筹备二十九大工作中实行民主的原则。以罗贝尔·于为首的二十九大筹委会改变过去马歇时期实行的那种由中央决定一切的、自上而下的筹备方式，首次实行了先从基层党员中提出问题，经过全党上下多次反复讨论，然后由全国委员会起草筹备文件，再交地方各级组织民主讨论和表决的新方式。(5)法共二十九大认为，党的民主运转是实行新共产主义和建立新型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内容，并重申党内生活多样性的原则。法共强调不仅可以容忍和接受多样性，而且应当承认多样性是一种财富，一种与民主的政治观念不可分割、为法共新作用和公民干预服务的财富。(6)法共在1997年6月初，就参加若斯潘政府问题在党内多次进行紧急的民主磋商，通过民主方式取得了广大党员的赞同和支持。

4. 法共在党的联盟政策问题上进行了深刻的调整，从过去长期主张的左翼联盟转变为在公民干预的基础上实行左翼进步力量联盟，并在1997年参政中积极推动共社两党关系的新发展。

法共从建党以来，同社会党有过3次重要的合作。第一次合作在30年代中期，法共同社会党等政党组织一道建立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并支持人民阵线政府（不参政）。第二次合作在战后初期，法共同社会党等一道参加过5届联合政府。第三次合作在70—80年代，法共同社会党等签订《共同纲领》，建立左翼联盟，并参加莫鲁瓦政府。综观这3次合作，法共的联盟政策总的来说并未奏效。尤其是在左翼联盟时期，法共的

力量和影响遭到社会党的蚕食，大幅度下降，使法共在法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变得无足轻重，在左翼内部的处境变得非常孤立。

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之后，法国内政治形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其中主要有：密特朗总统的 14 年执政结束，右翼戴高乐党总统希拉克 1995 年上台执政；左右翼力量对比不断变动，社会党在 1997 年国民议会选举中获胜，若斯潘政府上台，法国开始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第三次左右翼共处。这种世纪之交的政局变化对法共摆脱困境和重振雄风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法共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调整联盟政策，提出并实行左翼进步力量新联盟的：（1）法共二十八次在总结左翼联盟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要在人民干预权和左翼多元化的双重条件下进行“新的政治建设”，即“将所有的左翼进步力量都联合在议会和政府的多数派里，同人民一道，实行由人民选择的变革政策。”（2）法共全国书记罗贝尔·于 1994 年 4 月倡议在公民之间、在公民同左翼政党之间建立“进步联合协议”，积极开展反右翼的斗争，发展人民运动和公民干预，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多数派和一个真正实行改革的政府”。为此，法共主张同社会党、公民运动、左翼激进党、生态一代、绿党、红绿联盟、民主与社会主义联盟、共产主义革命同盟等政党和组织进行对话和会晤。（3）法共在 1994 年 9 月全会上，对 1965 年和 1974 年法共放弃参加总统选举一事进行自我批评，决定由罗贝尔·于参加 1995 年总统选举。罗贝尔·于在竞选总统中谈到左翼联盟的历史经验教训，强调 80 年代法国左翼联合政府所以遭到失败，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历届社会党政府实行的改革基本上没有触动“为金钱而金钱”的资本主义逻辑，结果不仅没有解决危机，反而加剧了危机，导致人们的失望。因

此，为了进行真正的改革，法共不能重蹈左翼联盟的覆辙，而应以不同的方式，即以“尊重分歧、观点明确和有透明度”的方式，建立左翼进步力量新联盟。(4)法共二十九大提出在建立公民干预的基础上实行左翼力量变革联盟，强调这种联合是一切左翼进步力量和生态学派进行的、尊重多元化和拒绝任何领导权的联合。与此同时，二十九大提出在同右翼政策决裂的条件下法共参加以社会党为主的左翼联合政府的方针，强调法共负有领导国家事务、参加政府，使政府决策最终符合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使命。(5)法共本着求同存异、加强联合的精神，于1997年4月同社会党签署《共同声明》，在反对右翼和极右翼、实行改革、创造70万个就业机会、缩短工时、停止私有化、反对帕斯瓜移民法、建立一个民主、社会欧洲等方面同社会党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从而为左翼获得国民议会选举胜利和法共参加左翼联合政府奠定了政治基础。(6)法共于1997年6月参政，遵循“左翼多元化”的方针，以建设性的态度积极支持若斯潘政府的新政。这标志着法共同社会党第四次合作的开始。

(三) 法共“新共产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

法共当前的政治思想路线是坚持共产党的名称，坚持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坚决反对资本主义“为了金钱而金钱”的逻辑，主张超越资本主义。法共认为在资本主义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之间不存在一个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主张超越资本主义，在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实行深刻的社会改革，依靠发展现有社会的“成果、需求和潜力”，来否定乃至取消资本主义的“剥削、异化和统治”，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组织”。

法共二十九大提出的“新共产主义”理论主张，可概括为以下10个基本观点：

1. 坚持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强调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男女自由、联合和平等的社会”，一个“发展和尊重个人的能力，使人类进行合作，分担费用，共享资源、知识、信息和权力的社会”，一个“没有失业，没有压迫，没有就业不稳定，没有不公正，没有暴力和没有武器的社会与世界”。法共要“通过法国人民的运动和民主的力量，沿着新型革命的道路即一种人道的、公民的和互助的现代革命的道路前进”。

2. 坚决反对资本主义金钱逻辑。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阶级的力量和破坏力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过”，“那些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程度上身受剥削和异化之害的人不仅包括工人阶级，而且包括占工薪阶层人数90%的绝大多数劳动者。管理无序、生活不稳定、被社会排斥等问题破坏了整个社会的平衡和发展。法国和欧洲统治力量的计划使法兰西民族本身及其主权、特性和共和国价值处于危险之中。由此产生了阶级斗争的新含义和新面貌。”因此，“选择一条与现行资本主义逻辑不同的道路，不是要求优先考虑某个阶级的利益，而是围绕这一选择目标，把一切深受资本主义逻辑之害的多种多样的人们联合起来。”

3. 提出超越资本主义的战略主张。强调“超越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目标，是一种“崭新的革命观念”。“超越”既不是“放弃向另一种社会绘声绘色过渡的目标”，也不是“通过颁布法令突然‘消灭’资本主义”。“超越”是一种“社会变革进程的观念”，主张“不是通过将现有的社会打个落花流水，而是在斗争中，依靠发展现有社会的成果、需求和潜力来否定

乃至取消剥削、异化和资本主义统治”。认为人类的运动和文明的运动所采取的方式“不是先打破一切，然后再建设新的东西，而是一边建设新世界，一边消灭旧世界”。



法国《今日马克思》杂志以“超越资本主义”为主题的封面。

4. 主张建设新型的共产党。强调实行共产主义变革是要“将个人的作用、个人的参与和民主置于首位”，把法共建成一个“现代的、开放的、充满活力和民主的党”，“把党为之奋斗的社会、实现此社会的道路和党的自身运转同加强个人参与能力和民主视为同一的党”。在法共的民主生活中，共产党人的

多样性“不仅应当被容忍，被接受，而且应要求将其视为一种财富”。

5. 彻底否定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强调“斯大林主义”是“对1917年十月希望的可怕的歪曲”，“肯定共产主义的现代性则要求对过去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所做的事情和斯大林主义在法共历史上留下的烙印继续进行思考”。法共过去遵循的思想模式是“把资本家阶级同工人阶级、剥削阶级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模式“在很多方面，是同那种从法国大革命继承下来的关于公民性、政治和共和国的独特观念相抵触的”，因此遭到了“失败”。历史已经证明，“国家干涉主义是不能完成社会变革的任务的”，因为它“以统制经济为主体，其结果是将人们拉平，并使个人处于从属的地位”；它“远未消灭对生产资料、权力和知识的异化，而是使这种异化以另一种形式保留下来”。

6. 主张实行左翼进步力量变革联盟。强调要“进行新的政治建设”，即“把一切左翼进步力量联合在议会多数派和政府之中，以便同人民一道实行由人民决定的变革政策”，“只有实现法国人民的多数联合，实现左翼、进步力量和生态党派那种尊重多元化和拒绝任何领导权的联盟，才能实行真正的变革”。法共主张建立的“不是过去那种将我们引入死胡同和失败的联盟，而是一种没有领导权和富有多样化的新联盟”。

7. 坚持参加以社会党为主的左翼联合政府。强调法共“担负着参与领导国家事务，参加政府的使命”，“愿为国家 and 人民服务，做出建设性的贡献”。“我们竭尽全力，争取立法选举后（左翼执政）的形势能满足变革的需要”。“我们并不以完全实行法共的建议为参政条件，但（左翼联合政府）必须同右翼政策进行决裂，实行左翼政策”。

8. 提出发展公民干预的新主张。强调法共要“在公民干预基础上‘建立左翼进步力量新联盟’。公民干预“不需要一个‘第三国际’式的共产党”。“长期以来，工运和共运怀疑‘公民’的概念，因此宁可使用‘劳动者’、‘人民群众’、‘工人阶级’的概念”，并且认为“‘阶级斗争’属于革命者所有”，“关于‘人’和‘公民’的甜言蜜语则属于资产阶级所有”。这种区分“有其功劳，也有其可怕的弊端”，例如，“把公民性概念固有的那些‘权利’和‘自由’拱手送给统治阶级”，“低估法兰西伟大革命传统所做的政治贡献，以致人们在思想上把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同争取公民性和人权的斗争割裂开来”。所有这些都“已被我们远远地抛在身后”了。

9. 坚持民主的斗争目标。强调争取民主的重要性，指出“当今法国社会出现君主统治的偏向”，“在欧洲一级，人民无法参与决策”，因此，要“恢复民主的活力”，“把民主扩大到企业和公共生活、国家机构和新闻媒介等社会各领域里去”，“使公民享有比代议制民主大得多的、新的权利和权力”。要“对国家机构进行重大改革”，“积极调整那些把公民和共和国联系在一起的权利和价值观”，“充分发挥代议制民主的作用，并使代议制民主从直接民主中吸取营养”，“以开创法兰西民主的新纪元”。

10. 主张实行合作的全球化。强调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包含着当代的一些客观要求。尽管这些要求能够同信息技术一道促进文明的重大进步，但它们却被资本家力量用来实行统治和增加金融利润，因而成为无数困难和衰退的根源”。法共主张“用旨在获得各国人民共同发展的合作的全球化来取代现有的金融和唯利是图的全球化”。

（四）对当前国内外重大问题的政策主张

法共根据法国 90 年代的实际情况和二十九大确定的政治思想路线，近年来在国内外政策方面作了相应的调整，提出要实行一种与资本主义金钱逻辑截然不同的、优先满足人的需要的方针，大力为所有的法国男女提供就业和培训保障，实行“人的新型发展”和建立一个民主的新时代。尤其是 1997 年 6 月参政以来，法共遵循“左翼多元化”的方针，以“建设性”的态度积极支持以社会党人若斯潘为首的左翼联合政府。

关于国内政策，法共坚决反对右翼和极右翼，强调实行深刻的社会变革，争取左翼变革的成功。在政治方面，强调争取领薪者、公民在监督、干预和决策等方面拥有新的权利和权力；对国家机构实行改革，其中包括结束总统制，扩大议会和政党的作用，在选举中实行比例代表制；反对种族主义，要同极右翼的国民阵线进行真正有效的斗争。在经济方面，强调摆脱金融资本的统治，对公用事业部门和国有企业实行革新和民主化，发挥其动力作用，反对私有化，实行重新国有化，并实行由公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混合经济。在社会方面，强调对培训、税收等 6 大方面实行重大改革，反对解雇、关厂和迁厂，建立“就业和培训保障制度”，实行不减薪的 35 小时工作周，主张采取对月薪在 1.5 万法郎者增加 1500 法郎，对领取最低生活补助金者每月增加 1500 法郎，创造 150 万个就业机会等措施。在移民问题上，强调对外籍人重新实行出生地权和避难权的基本原则，在平等基础上同法国人实行一体化，要求取消帕斯瓜移民法等。

关于国际政策，主张奉行和平与裁军的外交政策，在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中发挥法国的积极作用，用一种旨在各国人民

共同发展的合作的全球化来取代现有的金融和唯利是图的全球化，争取一个和平、合作和发展的世界。为此，要反对贫困，争取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提高人的能力；保护环境；用经济、政治和道德的方法来解决世界安全问题，促进和平与各国人民之间的信任，实行裁军，特别是消灭核武器，控制移民；在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基础上实现联合国的民主化等。

在欧洲问题上，法共坚决反对“马约”和“阿约”，反对单一货币，主张法国深刻修改其在欧洲问题上所作的承诺，积极参加另一种欧洲建设。强调捍卫国家主权；要求就单一货币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建议在欧洲各国货币基础上建立新的埃居，实行货币合作；对资本流动征收共同税；捍卫欧洲各国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社会成果；建议召开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在内的“欧洲国家论坛”；主张北约非军事化，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在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上，实行“欧洲—南方互助公约”等。

（五）组织状况、力量和影响

由于战后法共未能进行适应法国社会演变的政策调整，也由于密特朗总统执政以来社会党对法共的影响，使法共的力量和影响从80年代初以来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法共有党员274862人（1996年公布的数字）。其社会成分如下：就业者占54%，退休者和提前退休者24.6%，家庭妇女和男子14%，失业者5.5%，大中學生1.9%。在就业者中间，工人占43.1%，职员33.3%，技术干部8.7%，教员7.1%，小商人和手工业者3.5%，农耕者2.6%，自由职业者1.7%。

法共组织机构分为支部、总支、省委和全国4级。全国代表大会每3年举行一次。二十九大选举产生及二十九大后增补



法共二十八次（1994年1月）会场，新任全国书记罗贝尔·于
（左）与卸任书记乔治·马歇拥抱。

的全国委员会有145人，全国局29人和全国书记处7人。罗贝尔·于继续任全国书记。全国书记处成员有尼科尔·波尔沃（女），让-弗朗索瓦·戈，保尔·莱斯帕涅奥尔，让-保尔·马涅翁，皮埃尔·扎尔卡，达尼埃尔·布律内尔和皮埃尔·布洛坦。

法共在1997年立法选举中获选票251万张，得票率为9.94%，获36议席。在1998年省议会选举中获选票113万张，得票率为10%，有参议员15名，欧洲议会议员7名，大区议员148名，省议员294名，控制着3个省（塞纳-圣德尼省、瓦尔德马恩省和阿利埃省）和55个较大市镇议会。市长920名，其中3万人以上市镇的市长39名。

法共有3人参加若斯潘政府。全国局委员让-克洛德·盖

索任设备、运输和住房部长，全国局委员玛丽-乔治·比费（女）任青年和体育部长，参议员米歇尔·德梅西纳（女）任受设备、运输和住房部长委托负责旅游的国务秘书。

法共出版的全国性刊物主要有党报《人道报》、《人道报周刊》、《土地》、《目光》、《经济与政治》、《今日议员》等。地方性日报有《马赛报》和《中部回声报》。

受法共领导或影响的群众团体有法国总工会、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和法兰西妇女联盟。

附：

法共全国书记罗贝尔·于简介

罗贝尔·于，1946年10月19日出生于瓦尔德瓦兹省科尔梅叶-昂-马里齐市一个建筑工人家庭。社会职业是护理人员。1962年加入法共青年团。1963年加入法共，曾任瓦尔德瓦兹省委委员。1977年起任蒙蒂涅-莱-科尔梅叶市市长，曾领导该市的反毒品斗争。1987年当选为法共中央委员。1988年起任瓦尔德瓦兹省议员。1988—1992年任巴黎大区议员。1990年当选为法共政治局委员。1991—1994年任全国共产党和共和党人议员协会主席。1994年当选为法共全国书记。1995年参加总统选举，获8.64%的选票。1996年2月访华，同江泽民总书记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见。1997年5月当选为瓦尔德瓦兹省的国民议会议员。据悉，于为人热情，富有人情味。业余爱好是柔道、绘画和研究城市历史。著有《共产主义的变革》（1995年）等。

夫人埃迪特，护士。有两个孩子。

罗贝尔·于新著《共产主义的变革》简介

1995年11月，罗贝尔·于出版了他就任法共主要领导人以来的第一部政治论著《共产主义的变革》。

关于此书的定名和写作动机，于在《前言》中指出，所谓共产主义的变革，就是“对法共的特性进行一系列深刻的变革”。他写作此书是一次“探索”，旨在进一步深化他1995年5月参加总统竞选时对社会的发展变化，以及对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运转的“许多思考”，继续同法国人民对话，通过讨论丰富这些思考。

《共产主义的变革》长达340多页，从法国社会和国际形势的演绎出发，介绍了法共多年来的革新进程，并论证了继续革新的必要性，旁征博引，内容丰富，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西欧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探索。现将该书的基本观点扼要介绍如下：

1. 关于共产主义问题

于认为，法共主张的共产主义观念包含下述主要内容：(1) 共产主义是一种在资本主义之后，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倒退、对抗和逻辑的，更加文明和更加人道的社会前景。(2) 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变革运动，是超越资本主义。(3) 共产主义与当代的人道主义相一致。法共坚决反对“为金钱而金钱”，主张对人的重视应甚于对金钱的重视，要从每个人身上体现人类的最大发展。(4) 共产主义反对社会分裂和“被社会排斥”现象，要求实行“参与民主”，由人民当家做主。(5) 共产主义主张尊重多数法国人的选择，在其丰富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中实行民众联合。(6) 共产主义是一种将社会的全部资本——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优先用于有利于就业、公正、环保和满足人

们需要的新的混合经济。

法共认为，上述观念“同过去苏联主张的、现已死亡的那种共产主义毫无关系”，也“比马克思的思想新”，因而是“新共产主义”。

2. 关于批判斯大林主义问题

于认为，21世纪是苏联模式失败的世纪。斯大林主义是“共产主义理想的蜕变”和“共产主义的悲剧”，它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集体主义、官僚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一种中央高度集权、军队与警察机构拥有无限权力并实行专制与恐怖统治的国家政权，一种实行一党制的政治生活。苏联的解体业已证明，苏联社会缺乏民主和公民干预，结果不仅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反而导致资本主义复辟；那种导致苏联模式产生的被扭曲的马列主义思想方式最后也遭到了失败。

法共过去曾经错误地把苏联模式当作其开展国内活动的重要依据。这种“斯大林主义化”给法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其中主要有，使法共在1956年产生历史性的“延误”，即妨碍了党及时考虑到多列士早在1946年提出的走人民民主道路的可能性问题；使法共思想上长期僵化，妨碍党及时认识到，苏联的问题不仅是个人崇拜，而且是一个制度问题；使法共在1956年后错误地认为必须实行“人民阵线式的新试验”，从而导致后来“左翼联盟”战略的形成。

3. 关于法共实行的革新问题

于认为，从70年代中期以来，法共在前总书记马歇的推动下，开始摒弃苏联模式，实行党的革新。1975年谴责斯大林主义；1976年二十二大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决定走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道路；1977年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并在政权形式问题上提出“自治管理”；1979年二十三大大放弃马列主

义提法，主张科学社会主义；1994年二十八次放弃民主集中制，代之以民主的原则。法共现在坚持共产党的名称不变，同时继续实行党的革新，对法国社会、人民和政治实践的新形式持“完全开放”的态度。

法共对法国人民的有用性问题，是法共变动中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法共生死存亡的问题。法共之所以在苏联解体时没有消亡，是因为它坚持反对社会不公，反对不平等，抵制右翼的进攻，对法国人民有用。而今，法共仍应积极工作，使法国人民能够参与决策，改变那种由政党上层妥协来搞政治的方式，开辟一种替代右翼权力的政治前景。

法共过去让群众跟随自己，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种做法已不符合法国人民对法共的期待。因此，法共必须同这种“向导党”和“先锋党”的做法实行决裂。在实行变革的政治计划中，法共要同工薪劳动者和公民们一道，共同思考和探索，共同制定和实现奋斗目标。

4. 关于超越资本主义问题

于认为，苏联模式的失败，法国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失败，均未使资本主义变得更好。危机中的法国出现了失业、“被社会排斥”现象和“被牺牲的青年一代”等问题，资本主义同文明之间出现了真正的“离异”。因此，人们要求改变目前这种人为金钱服务的状况，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制度进行“深刻的结构性改革”。

目前，法共提出的口号是超越资本主义，建设一个如马克思所说的“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体成员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新社会。法共不赞成那种为了“建设”一个在理论上事先设计好的新社会而“消灭”现有社会秩序的做法。法共主张的超越资本主义是一个“过程”，是进行社会变革，要以法国人民为动

力，通过斗争和投票，建立一个“民主第一、人及其社会发展第一”的社会。

5. 关于建立左翼进步力量联盟的问题

于认为，80年代法国实行的“左翼联合执政尝试”之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历届社会党政府实行的改革基本上没有触动“为金钱而金钱”的资本主义逻辑，结果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危机，导致人们的失望。右翼卷土重来和极右翼影响扩大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因此，为了进行真正的改革，法共不能重蹈“左翼联盟”的覆辙，而应以不同的方式，即以“尊重分歧、观点明确和有透明度”的方式，建立左翼进步力量的新联盟。

法共必须努力在公民之间、在公民同左翼政党之间建立“进步联合公约”，开展反对右翼的斗争，向右翼夺取一切可以夺取的东西，并发展人民运动，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多数派和一个真正的实行改革的政府”。为此，法共建议同社会党、公民运动、左翼激进党、生态一代、绿党、红绿联盟、民主与社会主义联盟、共产主义革命同盟等政党组织进行对话和会晤。

于还认为，基于对法国大革命和战后法国工人阶级新变化的思考，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应是多元化的，关于人类解放的联合斗争也应是多元化的。法共摒弃过去主张的那种“工人运动中心主义”和斗争的“单一形式、单一色彩和单一前景”，并认为多样性不是“障碍”，而是“财富”，是使法国人民的联合得以实现并获得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

二、葡萄牙共产党的调整

葡萄牙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3月6日。70年代以前，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组织发展缓慢。70年代中期葡“4·25”革命推翻法西斯独裁统治葡共取得合法地位后，党的组织迅猛发展。到苏东剧变前党员人数已超过20万。但由于葡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苏东剧变的冲击，党员人数已减少至14万人。

在1995年10月举行的大选中，以葡共为主体的民主团结联盟得票50多万张，得票率为8.61%，在全国议会230个议席中占有15席。葡共成为议会第四大党。此外，该党还在葡全国305个市镇中的41个执政，在首都里斯本与社会党联合执政。

（一）认为苏东剧变不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失败

葡共认为，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其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目前继续经历着极大的困难。但是，所谓的“共产主义寿终正寝了”、各国共产党“不可逆转地衰落”的言论并未得到证实。全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以这个或那个名义继续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葡共将继续为革命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恢复、更新和加强而努力。

葡共认为，由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建立，20世纪作为人类社会转折的时代载入史册。

苏联和东欧国家虽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进行了伟大的改造，并取得了革命性的民主成就，但最终却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建立起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破坏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并在一些主要方面“背离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在那里，政权不属于人民，而是越来越集中在官僚阶层的手中。这些官僚阶层日益脱离群众的参与和意志，其行为越来越不受监督机制的制约。在那里，政治民主不但没有深化，反而加强了国家专制的性质。在那里，没有建立以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动力的经济，而实行一种过分国家化的经济，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那里，没有建立起民主运转的、深深扎根于群众的、并从群众那里获取革命能量的党，却建立了一个以党内和国家内行政机构强制性决策的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并由于党政不分和职能划分的模糊不清而加剧了这一现象。在那里，应是具有生命力和创造性的理论却被教条化和工具化了。

因此，葡共认为东欧、苏联的演变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理想失败，而只是社会主义一种模式的失败，而这种“模式”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政权建设、民主、党的作用和对待马列主义理论的态度等问题上背离了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些主要方面，因此，“共产主义事业仍然是值得信仰和为之奋斗的事业”。

葡共十四大通过的文件指出：社会发展的前景是要求把人类数十年的梦想变成现实，即实现共产主义，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一个具有社会平等、人人自由和文明权的社会，一个能发挥集体和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社会，一个自由而自觉劳动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劳动不再是财富的源泉，而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是人们得到快乐、自由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源泉。在这个社会中，和平、医疗卫生、文化、休息、文娱活

动、平衡的自然环境、集体活动和个人价值的实现都将成为人类幸福的组成部分。

文件强调，葡萄牙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是：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建立一个以人道主义价值观为指导的、没有对抗阶级的社会。通向社会主义的社会的政治进程，不仅取决于希望推动其发展的各种力量的意愿和行动，而且还取决于其他因素的作用，特别要看反对这一进程的力量如何动作，采取何种抵抗形式。21世纪在葡萄牙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为深化民主而进行斗争的道路。

（二）主张建设有葡萄牙特色的社会主义

葡共认为，葡萄牙的社会主义社会应有如下特征：

1. 在政治制度方面，劳动者掌握政权，对国家机构的活动进行长期的监督，同时不断加强民众参与，全部国家生活民主化，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包括新闻自由和建立政党的自由，在司法方面保护公民权利，尊重社会利益和意见，尊重各种不同要求，尊重宗教信仰和活动。选举产生的各种权力机构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广大劳动者通过权力机构及其各级组织、工会组织、群众组织以及政治组织等参与对国家政治和经济事务的领导。

2. 在经济组织方面，主要生产资料属于全社会所有，对经济的计划性指导与各生产单位和劳动者的直接干预和倡议相结合，国有的、自主经营的、合作的、集体的、家庭的以及个人的经济形式与不同规模的私营企业并存，完全按照劳动者和农民的意志彻底实现土地改革，重视市场的作用，协调开发全国经济和地区经济的资源，经济发展计划要考虑对环境带来的影响，在更好地实行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增强经济的活力和效

益。

3. 在社会领域，劳动者从各种形式的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实行充分就业，按劳取酬，人人有劳动的权利，特别保证青年第一次就业。保证对发展生产给予物质鼓励，通过自己劳动获得的个人财产受到尊重。公民在相互尊重个性和尊严的基础上建立社会关系，发展社会服务，解决住房问题，广泛开展体育活动和健康的休闲活动。保护环境，彻底消除诸如饥饿、文盲、贫困、污染、吸毒、卖淫、酗酒和犯罪等社会弊端。

4. 在文化领域，把文化变为全体人民共有的财富，发展科技，开拓文艺创作领域，鼓励创造，保证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并享有高度的文化民主。

5. 在伦理道德领域，根据对自由，对公民义务，对尊重人，对尊重大自然，对团结、友谊、和平的向往，形成社会的与个人的观念。

葡共认为，该党提出的在葡萄牙建设社会主义的蓝图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并且根据人民的意志进行修改和完善。葡萄牙的社会主义制度将不可避免地带有葡萄牙的特色和独创性。

（三）主张通过和平道路在民主中走向社会主义

葡共认为，葡萄牙现阶段的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其主要任务是“建立民主国家，取消垄断资本和大庄园主的权力，摆脱帝国主义的操纵，对葡社会进行深刻的变革”，通过“和平道路”，“在民主中”走向社会主义。

1. 强调葡现阶段的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早在1965年召开的葡共六大，该党就提出了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并确定了推翻法西斯政权、建立民主国家、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垄

断资本和大庄园主的权力、摆脱帝国主义统治、消灭殖民主义、促进经济全面发展、提高劳动阶级和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等8项斗争目标。1974年4月25日，葡法西斯政权跨台后，葡共利用当时群众运动高涨的有利形势，推动左翼政府进行了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并在工厂和企业中成立了维护劳动权益、参与企业管理的工人委员会。葡共把“4·25”以后进行的国有化、土地改革和劳动者取得的自由民主权利称之为“四月革命成果”，并把“巩固和维护四月革命成果”等内容写进了党章。葡共认为，“4·25”以后，民族民主革命的有些目标已经“全部或部分地”实现，有些目标只有到“革命的最后阶段才能实现”，“不实现这些目标，民族民主革命就不能算结束”。“为民族民主革命而斗争就是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前景是社会主义。”

2. 提出建立先进民主的斗争纲领。1988年12月，葡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21世纪初“先进民主”的斗争纲领，强调实现“先进民主”的目标为“葡萄牙社会通向社会主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1992年12月，葡共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进程，特别是对东欧、苏联等国演变的原因进行认真反思的基础上，丰富和充实了建立“先进民主”的斗争纲领，并提出了“民主和社会主义是葡萄牙未来”的口号。

1996年12月召开的葡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了建立“先进民主”的斗争纲领，并强调，彻底实现民族民主革命将会为推动葡萄牙社会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创造有利条件，同样，建立先进民主蓝图的实现也必将为葡社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指出，葡共在葡萄牙

继续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而奋斗。

从该党最近几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看，葡共认为，“先进民主”有4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文化民主。政治民主的基本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从上到下选举国家权力机关，最高权力机关分开和互相依存，政治组织和观点的多元化，个人和集体的自由，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和参加政治生活，监督和检查权力的行使。经济民主的基本内容是：经济权力从属于民主政治权力，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战略性部门以及主要的自然资源的公有制，经济的民主计划，多种经济形式的共存，经营管理的调控和管理。社会民主的基本内容是：切实保障劳动者权力，劳动者有劳动权和取得公平报酬的权力，所有公民都应有良好的生活、工作条件以及在卫生、教育、住房、社会保障、文化、体育、运动和业余活动等全面享受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文化民主的基本内容是：人民群众能够切实进行创作和文化享受，支持文化生产，实现文化生产的自由。先进民主有5个基本目标：（1）建立一种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制度，和一个民主的、有代表性的、广泛参与的、现代化的国家。（2）经济发展应为人民和国家服务，以现代化的、有活力的混合经济为基础。（3）实行保障改善人民生活的社会政策。（4）实行保障创作自由和文化享受的文化政策。（5）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实行与各国人民和平、友好、合作的政策。葡共认为，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为解决葡萄牙现存的诸多严重问题，葡共给本国人民提出了建设先进民主的斗争纲领。而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真正彻底地消除社会歧视、不平等、不公正等社会弊端，是只有依靠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

（四）党的力量和组织情况

1. 关于党的性质。葡共的党章指出：葡共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和葡萄牙全体劳动者的政党，是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的先锋队。党的先锋作用体现在它的阶级性质，原则与实际的统一，组织领导人民斗争与群众建立紧密的牢不可破的经常性联系的能力以及它的政治方针和建设新社会的蓝图。

葡共把工人、职员、中小农民、知识分子、技术干部、中小工商业者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为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

葡共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科学分析现实的工具，是行动的指南。马列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更新和发展的，对新事物、新情况、新进程和新的发展动向作出回答。这种世界观是同实践和认识的不断进步联系在一起的，它必然是创造性的。因此，这与教条化和机会主义地修改基本原则和观点是背道而驰的。

葡共认为，它在本国的使命与国际主义的义务是密不可分的，是相辅相成的。葡共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指导党员及其活动，与各国共产党、革命进步力量进行合作，声援世界各国人民为反对政治的、社会的、民族的剥削和压迫，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为争取自由民主、社会进步、民族独立、和平和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

葡共强调，其组织原则是以深入的党内民主、统一的总的指导方针和统一的中央领导为特点的民主集中制。在党的各级领导机构中，实行集体工作（集体领导）的制度，不允许主要领导人个人说了算。

2. 领导班子的调整。80年代后期,葡共内部出现了以该党全国委员会候补委员济塔·西亚布拉为首的“革新派”,其主要成员为党内一些知识分子和少数工会领导人。他们要求改变党的名称、纲领和目标,放弃“葡共是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先锋队组织”的提法,取消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内民主,“实行党内意识形态多元化”,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党代会代表和中央委员。他们认为,库尼亚尔是该党进行革新的主要障碍,因此,要求他辞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前后,该派的活动更加频繁。济塔除背着葡共中央参加了一些派别活动外,还在报上发表反党文章,否定葡共的路线、方针,鼓吹马列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已经失败,要求葡共中央“体面下台”,集体辞职。面对“革新派”变本加厉的活动,葡共中央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该派的代表人物济塔先后给予解除领导职务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对该派的普通成员做说服争取工作。为了澄清是非,统一思想,加强党内团结,葡共于1990年5月召开了第十三次全国特别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对东欧各国剧变的原因及苏联当时国内事态的演变作了全面的分析,重申葡共作为共产党的特性和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目标,并采取组织措施,增设副书记。卡洛斯·卡瓦略斯当选为副书记,成为库尼亚尔总书记的接班人。1992年12月,葡共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调整中央领导班子。大会增设了带有顾问性质的全国委员会,同时取消了副书记职务。库尼亚尔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委员会主席,卡瓦略斯当选为总书记。由于“革新派”在党内的派别活动遭到了绝大多数党员的坚决反对,他们的言论在十四大上受到了与会代表的严厉驳斥。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革新派”纷纷落选。会后,约有数百人的“革新派”党员退党,“革新派”因此在党内消失。1996年

12月召开的葡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了党章，取消了该党十四大增设的全国委员会。83岁高龄的该党老一代领导人库尼亚尔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但在党内不再担任其他领导职务。卡瓦略斯以全票再次当选为该党总书记。卡瓦略斯的连任和库尼亚尔彻底退居二线标志着该党领导核心的新老交换已经顺利完成。目前，该党内部团结，不存在任何有组织的派别。

3. 组织结构和党员成分。葡共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每4年召开一次，特殊情况除外。党的组织分为中央、地区、市和基层组织4级。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同人民群众和工人阶级联系的主要环节和基础。根据葡共十五大的统计，该党党员的社会成分如下：工人占党员总数的53.4%，职员占20.9%，知识分子和技术干部占5.4%，中、小企业主超过3%，其他成分占17%。近年来，女党员人数有了明显增加，占党员总数的24.4%。年龄在21岁以下的党员人数也有所增加。在由188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有8名中委的年龄在26岁以下。

4. 力量 and 影响。70年代以前，葡共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组织发展缓慢。葡共取得合法地位后，党组织迅猛发展。到80年代中期，该党党员人数超过20万。由于葡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苏东剧变的冲击，该党党员人数从80年代末开始呈下降之势。据葡共十五大的统计，近年来该党党员人数稳定在14万人。

5. 群众组织。受葡共影响的群众组织有：

(1) 葡萄牙总工会。成立于1970年10月，是葡萄牙最大的工会组织，拥有150万会员，在葡全国338个工会中，受总工会控制的有201个。该总工会的各级领导人绝大多数是葡共

党员，在该总工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中，葡共党员约占70%。

(2) 葡萄牙共产主义青年组织。1979年12月由原来的两个青年组织（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和共产主义大学生联盟）合并而成。现有成员约3万人。

(3) 葡萄牙妇女民主运动。成立于1969年，为争取妇女和儿童的权益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系葡萄牙唯一的群众性的妇女组织，有会员2万多人。

6. 党报党刊。

葡共中央机关报为《前进报》（周报），1931年2月15日创刊，社长是该党老一代领导人卡洛斯·布里托，发行量4万多份。党的理论刊物为《党员》杂志（月刊），1933年创刊，社长是葡共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费尔南多·布兰基·特谢拉，发行量2万多份。

7. 中央领导机构。葡共十五大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有：中央政治委员会（19人），中央书记处（10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1人）。

总书记：卡洛斯·卡瓦略斯。

附：卡洛斯·卡瓦略斯简历

1941年11月9日生于葡萄牙南部圣·彼得罗市。毕业于里斯本大学，获经济硕士学位。60年代和70年代初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是葡萄牙和平与合作委员会创始人之一，并任该委员会副主席。1973年作为葡萄牙代表参加国际和平力量代表大会。早在法西斯统治时期参与创办《经济》杂志，担任《阿玛多拉消息报》社社长，并经常给《新土地》和《顶峰》等进步杂志撰稿。1974年任葡萄牙冶金工会负责人。1974年葡法西斯独裁政权垮台后，任第一届至第五届临时政府劳工国

务秘书。1976年任葡共中央委员。同年当选为全国议员，并任共和国议会经济、财政和计划委员会委员、欧洲事务委员会委员，并任议会共产党党团领袖。1988年12月，在葡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全国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1989年6月当选为欧洲议员，并任欧洲议会共产党议会党团领袖。1990年5月，在葡共第十三次特别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副书记，1992年12月，在葡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书记。1996年12月，在葡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总书记。卡对华友好，1988年3月曾以欧洲委员会委员身份访华。1996年2月，以葡共总书记身份访华，江泽民总书记予以会见。

三、西班牙共产党的新探索

西班牙共产党现为西班牙第三大政治力量，有党员4万余人。在众议院350名议员中，以西共为主体的联合左翼占有16个议席，在欧洲议会中有9名议员。

西班牙共产党长期在非法状态下进行斗争。1975年佛朗哥法西斯统治结束后，于1977年获得合法地位。因党内矛盾和西国内及外国党的干涉，西共的力量和影响经历了大漲大落。90年代苏联东欧剧变后，西共仍坚持共产党的称号，为在西班牙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并根据新的条件在理论和政策上进行新的探索。

（一）简史

西班牙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4月15日。当时的名称为西班牙的共产党，主要成员来自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其《成立宣言》强调，必须反对改良主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以此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同年6月，西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二大，成为共产国际西班牙支部。西班牙共产党初期党内宗派主义严重，党员人数不多，影响不大，直到1932年3月西共召开四大，宗派主义才得以克服，党员人数到1936年发展到10万人。1936年7月18日，法西斯军官佛朗哥发动武装叛乱，西班牙共产党成为反对法西斯、捍卫自由的主要力量，西共与西班牙其他进步力量一起，进行了3年反对佛朗哥武装斗争。1939年4月1日，佛朗哥上台，宣布除长枪党外的所有政党为非法，对西共实行残酷镇压，西共主要领导人被迫流亡国外。从此，西共开始了38年的地下斗争时期。

1939年4月1日，佛朗哥宣布反对共产主义事业胜利，开始其独裁统治，对参加过反对武装叛乱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实行野蛮镇压，使近30万西班牙人流亡国外。西共主要领导人也被迫出走，只有少数中层干部留在国内，进行反对佛朗哥独裁的斗争。

1954年9月，西共在捷克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伊巴露丽当选为主席，卡里略当选为总书记。50年代形势与二战前已经有很大不同，法西斯势力已经垮台，共产国际已经解散。面对二战后的国际新格局，西共认为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把西班牙革命继续向前推进。1956年6月，西共召开中

央全会，分析了战后西班牙的形势，认为有可能在反对独裁的斗争中，使 20 年前相互对立的力量取得谅解，有可能不必经过一场内战而推翻独裁统治。中央全会发表了“全国和解”声明，说对那些为了争取公正而牺牲或受过苦难的人，最好莫过于在西班牙建立起民主自由了……西班牙需要的是文明的和平、西班牙下一代人之间的和解与自由。西共开始其策略的转变，由过去的武装革命转为和平斗争。

1959 年底，西共在布拉格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全国和解”政策，强调要在所有的反佛朗哥力量之间达成协议，以便发动全国和平罢工和政治总罢工，争取大赦，重建民主、自由，改善生活条件，执行有利于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举行制宪议会选举。六大以后，党内在全国和平总罢工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加之 60 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中、苏两党间的论战，1964—1982 年间西班牙共产党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分裂。

60 年代初，佛朗哥在西班牙实行了第一个稳定计划，西班牙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官僚技术集团。这一阶层人士的利益与佛朗哥独裁统治开始产生矛盾，对佛朗哥的体制和政策已有不满，西班牙人民尤其是佛朗哥上台后出生的一代，要求改变现状的心理强烈。与此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展开了大论战，苏共老子党的作法引起不少西欧共产党的不满。1972 年 8 月，西共一改过去在东欧国家召开党代会的习惯，在法国巴黎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争取自由协议》的文件，把它作为民主的替代。《争取自由协议》的基本内容是建立一个广泛的联合临时政府，实行大赦和无歧视的政治自由，选举决定西班牙国家社会政治体制的制宪议会。大会决议说，西班牙需要的政治革命

不应是一场内战，也不应是旧式的起义。由于力量的对比有利于政治转变，极右势力陷于孤立，这一场政治革命可能需要的暴力将比现政权为维护政权所用的暴力要小。政治革命将是全国的民主转变，所有渴望政治自由的力量都应参加到政治革命中来。决议重申西班牙共产党人的目标是用政治总罢工和全国总罢工来结束独裁统治。这可以算是二战后，尤其是西欧国家在经济上经过恢复和发展、原苏联“现实社会主义”模式失灵后，西欧共产党在思想观念上的变化，也可算是“欧洲共产主义”的胚胎或萌芽。

60年代科技革命已初步显示其给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第三世界国家崛起，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的许多原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纷纷脱离殖民主义统治，成为独立国家，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中、苏两大党的论战，对苏共的老子党的做法是一个打击，中、苏两大党的大论战对欧亚以至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形成了不少国家的共产党的大分裂、大改组；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的变化给人们观念带来变化，正是在这样一个形势下西欧国家的一些共产党为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1968年捷克发生了“布拉格之春”，苏共用坦克镇压了这一运动，苏共的这一举动遭到中国共产党、西欧共产党的谴责，也遭到其他不少国家舆论的谴责，西班牙共产党也谴责了苏共的这一行径。在如何对待各自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上，西班牙共产党考虑到70年代西班牙的具体现实，认为不能走俄国十月革命式的道路，也不能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只能走适合自己国情的“第三道路”，即欧洲共产主义。

西班牙共产党表示准备同西国内的反佛朗哥的各种政治力

量一起，尊重、保证和发展集体和个人的各种自由：思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公民进出国内外自由，工会自由……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而努力。主张进行多数人的革命，建立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劳动阶级要掌握领导权，尊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样化，不搞一党制，在任何时候都完全尊重普选的结果。主张这一进程通过和平的渠道进行，由人民群众广泛和持续地参加。但也不排除，如果选举中被击败的一小撮反动派要发动政变，威胁民主自由，那必须用武力来捍卫。

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病死。22日，胡安·卡洛斯登基，开始民主化进程。1977年4月9日，首相苏亚雷斯宣布允许西班牙共产党合法。1978年4月，西共在马德里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继1932年西共召开四大经过46年后才在国内再一次合法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立“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宣布西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的、革命的政党”，并以多数通过取消列宁主义的提法，同时决定不再提无产阶级专政。这样，西共便完成了从以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到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策略上的过渡。

从1977年西共取得合法地位至今已经20年，在此期间，西共主要是通过合法手段参加西社会、政治生活。20年来，西共经历了其发展的高峰、低谷和恢复等阶段。70年代，西共在刚刚获得合法地位后，党员人数曾达20万，在1979年大选中获10%的选票，在众议院的350个议席中占23席，1981年西共召开十一大，党内问题已经暴露出来，总书记卡里略的工作报告仅以689票赞成、266票反对、66票弃权获通过，从1981年底开始，当时西共总书记卡里略把包括3名中央执委

在内的10名中央委员开除出党，后又解散了几个省的党委。1982年6月，西共高层领导人之间再次发生矛盾，总书记卡里略和副书记萨托里乌斯意见分歧已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最后萨辞去副书记职务，另一名执委、工人委员会主席卡马乔也辞去执委职务。由于党内矛盾的激化，面临当年10月的大选，西共已无法全力投入竞选了，在10月的大选中，西共的选票由1979年的191万张锐减至86万张，议席也由23个减至4个。11月7日，西共总书记卡里略辞去总书记职务并提议由阿斯图利亚斯地区共产党总书记伊格莱西亚斯担任总书记。卡里略不担任总书记后说自己要成为西共的精神领袖，而伊格莱西亚斯则表示不愿当稻草人，要担任有实权的总书记。不久，卡、伊二人的矛盾便公开了，在1983年12月西共十一大后，西班牙共产党便一分为三：由代表大会多数选出的主流派，即西班牙共产党；以卡里略为首和支持其观点的部分党员建立了西班牙劳动者党；已退出西共的原执委加列戈在苏共的支持下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列宁主义派”一起另建了西班牙人民共产党。这是西班牙共产党60多年历史最严重的一次分裂。1986年正值西班牙大选，西共总书记伊格莱西亚斯在党内老同志的帮助下，通过与社会主义行动党、进步联盟、共和左翼等政党和组织谈判，建立了联合左翼，提出了共同的竞选纲领、统一的候选人名单，在6月的大选中，联合左翼获得7个议席，选票也有所增加，表明西共已走出困难的谷底。在此后的1989、1993和1996年的大选中，以西共为主体的联合左翼所获选票和议席逐次增加。现以西共为主体的联合左翼是西班牙的第三大政治力量。

（二）冷战后的新思考

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后，西班牙共产党坚持不改变党的名称，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目标。1995年12月，召开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世界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行了分析，主要观点如下：

1. 认为世界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文明的技术基础变了，环境变了，社会和文化生活变了，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变了，因此对《共产党宣言》中过时的原则要进行更新，并使之符合现实。《共产党宣言》认为，共产党人没有与劳动人民的一般利益、与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奋斗的所有人的利益不同的特殊利益，西共希望将整个解放运动的共同利益置于优先地位，从而促进各种不同的社会解放运动的改革力量同其他争取人类解放的力量结合在一起。

2. 认为苏联东欧国家的“国家所有制模式”扭曲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含义，是既非资本主义的，也非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一种生产方式。西共认为，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在生产资料国有制（不是公有制）基础上，国家对调节经济生活起着几乎绝对的主导作用。因此，将这些社会制度称之为国家所有制制度，要比“现实社会主义”称呼更为贴切。事实上，这些政权体现了一种特殊生产方式，既非资本主义的，也非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多数情况是脱胎于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形态。这种国有制制度的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没有预见到的。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国家不仅没收以前存在的工业生产资料，而且还直接将工业化进程掌握在自己手中，进行着类似其他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时的工作。从历史角度上看，这种生产方式起过进步作用，它确实通

过非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了高速工业化，实现了高度的社会保障，这给大多数居民带来的痛苦后果要比资本原始积累时带来的后果要小一些。把这些制度错误地称为社会主义制度，扭曲了这些制度的含义，很难按其真正意义来评价其成就及其历史局限性。事实是，同资本主义对抗时，国有制制度曾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同盟者，并曾为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争取社会成果提供了可能。但是，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工人运动应效仿的模式，那它就使工人运动难以正确地承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因为它使这一目标的自由含义模糊不清，促进了国有制制度对此目标的歪曲。资本主义和国有制制度之间的对抗基本上是前者取胜。由于资本主义取得了胜利，反对资本主义的工人运动失去了强大的同盟者，但是它却获得了更大的自由来实行自己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解放战略。

3. 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通过大多数人的真正革命、自觉自愿行动的结果。西共在其宣言中说，为了解决当代世界存在的公正现象，为了结束各种形式的压迫和剥削，为了争取建立一个公正、自由和相助的人类社会，西共主张建立一个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为此，我们必须将我们的伟大的解放目标同我们的日常活动联系起来。社会的变革应是这一社会的所有成员，通过大多数人的真正革命、自觉自愿行动的结果。

4. 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提倡新国际主义。西共在其宣言中说，西班牙共产党维护和平、反对战争。因为战争是最高级别的暴力行为，它摧毁一切价值观念。和平价值观念就是铲除滋生暴力的罪恶根源。意味着要开展具体而系统的行动，反对战争和好战分子。意味着从政治和文化方面开始斗争，争取裁军，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失业和被排斥现象；反对毒品、贫困

和居住拥挤；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不容忍和种族主义。

西共表示，实行全球性的相助是西班牙共产党的意志，国际主义是左翼的固有特征。为此，西班牙共产党将努力推动社会反对一切不公正的表现，不管这一不公正出现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西共重申它对和平事业的庄严义务，指出由于保持不平等状态和对各国人民的蹂躏，使和平事业经常受到威胁。和平是同全球边缘地区的经济发展、民主和社会进步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西共认为新国际主义有如下两个内容：一是最彻底地声援那些被剥削的、被蹂躏的人民；二是在行动纲领或具体行动一致的基础上同社会上发挥主要作用的力量保持一致。

（三）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一些主张

西班牙共产党现为西国内第三大政治力量，是一在野党，但与执政的人民党及最大的反对党工人社会党的议席相差甚远，其力量 and 影响在议会里起不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西共在对内政策上维护西各族人民拥有自决权，各族人民平等；主张西班牙国家政体采取联邦制；反对将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私有化；实行每周 35 小时工作制，必须做到“减少劳动时间以便大家都能劳动”，有更多时间去享受生活，以及共同分担家务劳动；应该维护一项激进的环保政策，把环境保护视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组成部分；要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妇女要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工作；要扩大和深化民主原则，扩大和深化社会对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监督，扩大和深化相应的立法，扩大和深化追踪和监督政治活动的有效手段。

在对外政策方面，西班牙共产党主张建立一个政治、社会

与经济充分联合的欧洲联盟，支持欧盟向其他国家扩大并在欧盟巩固的基础上推进整个欧洲最充分的联合，保证欧洲各国人民各种不同文化的发展。反对由国家组成的欧洲，推进由地区和人民组成的欧洲，支持欠发达地区的人民，反对完全歧视性的新自由主义的方案。主张西班牙退出北约，同时解散北约。反对新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支持各国人民行使主权的权利与和平共处的权利。反对使用武力解决国际冲突，反对军备竞赛，反对一切军事集团及设在国外的军事基地。支持各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支持各国人民行使主权、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斗争，支持国际合作的倡议，主张通过同各国人民谈判，公正地解决其外债问题，

西班牙共产党同欧洲共产党的联系密切，与拉美国家的共产党也有往来，与古巴共产党关系密切。西班牙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有着传统的友谊，60年代中、西两党关系曾一度中断，1980年两党恢复关系后每年都有往来。

（四）西共的组织、力量 and 影响

过去，西共长期处于地下状态，组织相当严密，佛朗哥长达40年的独裁镇压也未能摧垮西班牙共产党。1977年西共取得合法地位后，党员人数曾过20万，但自1982年10月西共在大选中惨遭失败后，由于西共的分裂及当时苏共支持分裂派，西共党员人数骤然减少，只剩有4万余人，党员以劳动群众居多，工业工人约占60%，农业工人约占12%，技术人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和学生约占10%，农民6%，而且老年化趋势明显。

西共组织机构分为支部、区、市、省、大区和全国6级。全国代表大会每3年举行一次，1998年底将召开第十五次代

表大会。在1995年底举行的十四大上，选举胡利奥·安吉塔为总书记，弗朗西斯科·弗鲁托斯为联邦委员会书记，同时选举出由56人组成的联邦委员会。

在1996年3月西班牙的大选中，以西共为主体的联合左翼共获260余万张选票，在众议院350个议席中获21席（1997年底联合左翼五大上因分裂有5名议员转到混合议员团，现有16名议员）。在欧洲议会中联合左翼有9名议员。

附：西共总书记胡利奥·安吉塔简历

胡利奥·安吉塔1941年生于西班牙南部的马拉加市（同名省的省会），幼年时曾在塞维利亚居住，后移居科尔多瓦市，在科市师范学校毕业后任教师。以后又到巴塞罗那大学学习，从大学历史系毕业改教历史。1972年加入西班牙共产党，在1979年的市政选举中，安吉塔参加科尔多瓦市长竞选，获得30%的选票，与其他力量一起联合执政，成为西共的第一个在省会执政的市长。1982年参加竞选安达卢西亚大区议会议员。1983年在科尔多瓦市政选举中以59.6%的选票再次当选为该市市长。1984年安达卢西亚左翼联合成立，安吉塔作为该组织的候选人参加大区主席竞选。1986年辞去科尔多瓦市市长职务而致力于安达卢西亚大区左翼联合的工作，在1986年安达卢西亚大区选举中，左翼联合获19个议席。1988年在西班牙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西共总书记。1989年2月，在联合左翼第一次联邦大会上当选为联合左翼总协调员并任该组织参加全国大选的首相候选人。1989年10月，在西班牙大选中在马德里选区被选为联合左翼的众议员。1991年在西班牙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西共总书记并在该党十四大连任至今。在1993和1996年西大选中连

续当选为众议员并担任联合左翼议会党团主席。

安吉塔已婚，有4个子女。

四、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反思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简称重建共）是意共改变名称和性质成立“意大利左翼民主党”之后，党内不同意这一改变的派别，于1991年2月成立的一个新党。现为意大利政坛第五大党，有党员12.7万，众议员34名、参议员11名（1996年4月大选结果），在欧洲议会拥有议员3名。它是意大利现任政府在议会中不可缺少的支持力量。近年来意重建共在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进行理论反思和政策调整，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一）成立经过及政策调整

意大利共产党1991年1月31日至2月4日在其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大多数代表投票赞同成立“左翼民主党”以取代原来的党，并采用新的标志，这标志着意共已变成了社会党。党内早就存在的以科苏塔为首的第二反对派等90名代表全部退出会场，并在场外通过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准备成立新组织。

2月10日该反对派在罗马召开第一次全国会议，宣布成立了“争取共产主义重建运动”。5月初，该运动又举行全国会议，选举了领导人。原意总工会领导人和原意共第一反对派

重要成员塞尔焦·加拉维尼成为运动的协调人。会议还选举了由 49 人组成的全国协调局、17 人组成的中央行动小组。科苏塔出任这一运动的组织负责人。这次全国大会还选出 98 人组成的委员会，为重建意共进行准备。与此同时，运动在众、参两院另行组成自己的议会党团，同左翼民主党的议会党团分庭抗礼。6 月 9 日，拥有 9000 成员的“无产阶级民主”派召开自 1975 年改组以来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宣布自行解散，并决定以个人形式参加“争取共产主义重建运动”。“重建运动”于同年 12 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成立“重建共产党”。加拉维尼当选总书记，科苏塔任党的主席。1991 年底，党员人数曾达到 15 万人。在 1992 年 4 月的全国大选中，该党在众参两院分别获得 35 席和 20 席。重建共成立以后，保持共产党的传统，积极推动工人群众斗争。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实力得到逐步增强。

重建共建党初期的基本政治路线是“充当坚定的反对派”，反对实际上由左民党、人民党和北方联盟支持的迪尼政府。由于采取较为激进的自我封闭的政策，与左民党等其他左翼力量时有冲突。加上该党成分比较复杂，既包括原意共成员，也有原“无产阶级民主党”，甚至还包括了托派等其他组织的成员，因此自成立以来内部就充满了矛盾。党的前总书记加拉维尼因为主张向左民党等其他左翼力量开放，与党的主席科苏塔等人发生严重分歧，在全国政治委员会上受到批评，因此于 1993 年 6 月辞去了总书记职务。1995 年 6 月，又有 26 位少数派领导人批评重建共“脱离共产主义传统”、党内缺乏民主、压制排挤少数派，进而集体退党。他们中包括 14 名众议员、2 名参议员、2 名欧洲议员和众院议会党团正副主席和前任总书记，他们中有 14 人是党的全国领导机构成员，2 人是书记处

书记。这使重建共力量削弱，一度处于孤立境地，党员人数和得票率均有所下降。

后来由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长期把持国家政权的以天民党和社会党为中心的执政体系垮台，同时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意大利力量”、以原法西斯运动（民族联盟）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和以北方联盟为代表的地方分离主义力量日益扩大，重建共对联盟政策进行调整，从而使重建共的地位和影响扩大。1994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党的政治纲领作了转折性调整，改变了“做坚定的反对派”的立场，确定了“以参政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其策略是支持左翼进步力量达成广泛的政治联盟，以抗击国内日益扩张的右翼势力，争取大选的胜利，进而共同组成左翼政府。

1996年4月21日举行的全国大选中，为防止右翼上台，重建共与以左民党为首的中左联盟达成了竞选协议，并在大选中获得8.6%的选票，众参两院分获34名和11名议席，成为意国内第五大政治力量。在中左联盟获胜后，又从反对右翼的目的出发，在议会支持意战后首届中左政府。但其支持政府的条件是：如果政府不把战后争取到的劳动、声援和社会公正文明的成果放在其行动的中心地位，重建共就会撤出对政府的支持；要求政府采取具有与过去明显不同的经济社会政策。由于执政联盟仅在参院拥有绝对多数，在众院必须再加上重建共的议员才能构成多数，因此重建共在议会中采取对政府既支持又制约的灵活政策，既保持了自身纲领政策的独立性，又能有效地影响政府的决策，从而成为影响政府稳定的重要力量之一。1997年4月重建共在议会中投票反对政府出兵阿尔巴尼亚，1997年10月重建共在财政预算问题上反对政府，曾迫使普罗迪政府辞职，造成政府危机。但在多种因素作用下，重建共又

与政府重开谈判，并在双方各作妥协、达成为期至少一年的合作协议的基础上，恢复对政府的支持，从而使普罗迪政府起死回生。

在中左联盟执政的国内形势和欧洲国际大气候下，重建共在与右翼的斗争中，在与中左联盟内部的妥协合作及其党内各种势力的较量中仍面临许多困难。目前该党正努力完成“从为生存而战到提出计划”的过渡，在错综纷纭的政治舞台上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而努力。

（二）理论和政策上的新探索

1996年12月重建共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这次大会提出的主要观点是：

1. 认为共产主义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远景，而是政治变革和为此所作的执著追求。重建共认为把东欧和苏联的失败说成是共产党没有理由再存在下去是站不住脚的，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在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由于实行集权和压制民主而遭到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因为“现实社会主义”这一历史阶段表明它是与共产主义思想背道而驰的。“共产党的历程起步于十月革命，结束于1989年”的说法是不正确的。重建共依然从根本上重视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在经历了苏东社会主义垮台之后，新的共产主义的希望在全世界继续重新发展。

由于苏东政权的垮台而造成的世界两极格局的结束，并没有实现原来的设想——建立一个能包容不同政治地理现实的世界政府；相反，由于民族和宗教冲突的爆发而出现了民族国家危机。

2. 要反对资本主义的选择,“超越”资本主义。重建共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实际是反对社会改革,实行新的专制主义。这一现代化依靠的是资本和阶级社会结构出现的技术性变化。阶级的社会结构变化表现在:一方面,经济脱离了社会;另一方面,雇佣劳动和处于不同形式剥削下的不同主体遭受到全面系统的破坏。

重新提出对资本主义变革,也就是要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抛弃现阶段变革的主观条件和政治条件尚未成熟这一明确认识,而是意味着要正确认识如下事实:尽管资本主义现代化依然极为活跃和强大,但文明的矛盾和困境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重新提出变革也意味着指出一条人类解放和实现其愿望的道路。然而,今天也只能为全球的保护,为劳动的开发和民主的最基本寻求找到答案。如果不对变革进行调整,连这些都满足不了。

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在1968—1969年的群众运动期间就提出来了。在新的阶段,主要问题是重新确定变革主体。这个问题在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文化中体现为建立历史性集团。现在,由于资本的技术性成分变化、阶级的社会结构变化以及在群众文化和主观中出现的革新等因素,这一问题已经以全新的形式提了出来。这就要求重建共采取不同于传统的解决办法。

3. 追求社会主义价值,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重建共认为,反资本主义的选择是发起这一行动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反资本主义的立场,这一行动甚至不可能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支配一切的现状是可能的,但仅从这一立场出发已经不够了。从这一点出发,要追随马克思主义思想,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是可资利用的财富。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及其

生产模式的批评性分析方法，而且是因为马克思就革命的范畴，即向一个不同的社会秩序的历史性过渡这一思想，达到了其思想总结的最高点，因而只有利用它，才能达到政治的最高点。

追求社会主义价值。认为应该为社会主义的理想财富贡献自己的革新能力，并使之具有新的生命力，因为社会主义思想无论是在文化还是在艺术生产领域中，或是在群众运动方面，贯穿了阶级和国家生活的历史。因此，不断丰富社会主义理想财富是我们重建进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 要革新意大利共产党人的传统。重建共宣称，重建共是一个新的群众性共产党，是意大利政治生活中一支对抗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它愿意继承所有反资本主义的传统，因为它的目标不是简单地反对资本主义，而是要在新阶段把消除资本主义作为建立民主社会的条件，重新确定变革主体，用社会主义方式变革和改造社会和国家。

重建共提出要革新意大利共产党人的传统。党今天的政治目标并非是要使自身的形象温和化，而是要改革党的自身以及党与社会的关系，使其成为适应代替运动建设需要的主角。加强重建，也就是对重建共的文化及其自身进行重大革新，完成从为生存而战到提出计划的过渡，即建设一个为争取代替前景的群众性政治运动。

在社会变革进程中，要重新确定代替性政治中的现实与远景之间的关系，在今天发现、建设和确立变革中的主角已成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这一主角在当今资本主义发展处于两个不同周期的过渡阶段中，还未直接而明确地显露出来，因此，像重建共这样的力量首先站起来在政治上代表它，同时提出了从工人阶级本身开始进行重新组合的问题。将来重建共若要成

为第一大党，就需彻底重组现有联盟，联合一切代替力量，在代替欧洲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纲领基础上执政。

5. 现行国内政策主张是：

(1) 该党反对大资本的统治、反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反对战略工业包括航空、通信、能源的私有化；反对总统制和任何形式的新专制主义，强调要对国家进行全面深刻的变革和改造，消除资本主义。

(2) 重建共的目标是保护、组织下层阶级和社会主体的利益以及妇女、青年的主体性，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寻找现存经济全球化进程和自由主义政策的代替答案。重要斗争任务是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争取劳动者的自主权。其中包括保护低层劳动者的福利，反对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主张改善国家财政要在保护福利制的基础上通过让富裕阶层多做贡献来实现；保护公平竞争，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仅有利于资方，还要有利于劳动者；减少工时但不减少工资。

(3) 反对失业、争取充分就业。认为经济全球化进程和欧洲政府实际采用的军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了群众性、结构性的严重而长期的失业，当经济困难时变得更为加剧。认为解决失业的办法首先是打破欧洲单一货币政策的束缚，抛弃把治理国家财政作为唯一目的的经济政策，全面缩减工作时间，也就是重新分配必要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吸收市场无法组织因素，如文化财富，因为它在今天也能创造就业。

(4) 认为中左联盟为击败右翼而作出了贡献，但是不具备完全代替右翼的能力；而普罗迪政府是对1996年大选所体现出来人民期望的尚未完成的答复，其政治和纲领思想尚不适合这一期望。认为左民党的愿望是变成一个群众性的自由党。主张改善与左民党的关系，认为虽然双方有很多分歧，但在维护

劳动者利益等方面也有共同点，双方应共同斗争，以捍卫民主机制。

(5) 反对各种形式的新的分离主义、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

(6) 强调保护移民的生活和参与权利；正确处理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重建共及其前身重建运动自成立以来，还组织多次大规模群众运动，如动员了有数万人参加的群众示威，抗议政府损害劳动者利益的财政法案；在罗马组织了有 14 万人参加的群众性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工会与政府签定的取消浮动工资和缩减社会福利开支的协定，呼吁左翼团结行动，准备全国总罢工。

6. 国际方面的政策主张是：

(1) 该党反对建立在美国武力独霸全球地位基础上的军事秩序；批评美国通过军事、经济、金融等手段扩大资本主义统治范围，认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分裂和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国向这些国家输出野蛮的资本主义。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应通过公众的斗争，建立反帝国主义力量及一切和平与民主力量的新联合；谴责美国在苏东垮台之后剥夺了联合国的作用。反对任何军事力量干预波黑地区的冲突，呼吁制定一项和平计划重新恢复经济。

(2) 主张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左翼力量联合起来，尤其主张加强同西欧其他共产党的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

(3)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尤其是欧洲事务。主张裁军和解散北约，批评政府忠于北约实际上是允许美国充当世界警察；坚决反对以武力解决一切国际冲突，主张通过改革联合国运作

机制来加强它在处理国际矛盾中的作用，用和平的手段建立国际新秩序。

(4) 认为欧洲的一体化是没有民主的一体化。批评马约，认为这一条约只有利于大资本、大金融集团加强对欧洲的统一治。反对为达到马约规定的趋同标准而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主张以民主、群众参与、实现充分就业、改革福利制为首要内容，代替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建设一个人民的欧洲。

重建共建立不久即努力开展国际交往，与德国的共产党、荷兰共产党、朝鲜劳动党、拉美的共产党以及东欧的一些原执政党等建立了接触和联系，并先后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了今年在里斯本和雅典举行的部分欧洲共产党会议，与其他渠道交换意见和信息，以谋求建立“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左翼力量国际”。目前该党与世界上几十个共产党和社会党保持关系。

(四) 组织力量及在国内影响

重建共组织建制分大区委员会、省委员会、基层委员会。中央设全国政治委员会(335人，相当于中央委员会)、领导机构(47人，相当于政治局)、书记处(9人)和全国保障委员会(33人)。目前在全国20个大区设有委员会，省一级设有党委(113个)，省以下为支部，目前在70%以上的市镇有党的组织。截止到1996年12月份，共有党员12.7万人，党员主要来自于劳动阶层。法乌斯托·贝尔蒂诺蒂于1994年1月和1996年12月在第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连续当选为总书记，阿尔曼多·科苏塔自建党以来一直担任全国政治委员会主席。

近年来，重建共在青年中的影响扩大了。民意调查证明在

18—25 岁的青年中重建共已成为第一大党，在该年龄段选民中得票率超过 20%。

1996 年 4 月全国大选中，重建共获得 3215960 票 (8.6%)，比前一届大选 (1994 年) 增加 2.6 个百分点，现有 34 名众议员和 11 名参议员；1994 年 6 月欧洲议会选举获 2007651 票 (6.1%)，现有 3 个议席；1997 年 4 月举行的部分地方选举中，重建共在 6 省的议会选举中得票率平均为 12%，比去年大选和上次地方选举分别高出 2.6 和 2.8 个百分点。在 1997 年底进行的地方选举中，重建共在不同地区虽各有得失，但保持了原有的地位。

根据意大利法律规定，任何政党不得拥有企业或直接从事经济金融活动。该党财政拮据，截止 1993 年底赤字 11 亿里拉 (约 67 万美元)。

重建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报》于 1991 年 10 月 1 日正式发行，起初为周报，后改为日报。同年 7 月，该党前身重建运动曾在维亚雷焦成功地举办了第一次党节，参加者达 10 万人次。1992 年 9 月，重建党又在卡拉拉举办了首届“解放报节”，在 10 天中参加者达 40 万人次。现在每年夏季举行一次“全国解放报节”，约一星期左右。现社长为皮埃尔焦尔焦·贝尔贡齐，副社长为卡尔洛·贝内代蒂，责任社长为加尼·蒙代萨诺。

附：党的总书记法乌斯托·贝尔蒂诺蒂简历

1940 年生于米兰，24 岁时技校毕业，获工业技师学位。1964 年加入社会党，但主要从事工会工作，在诺瓦拉地区纺织工会中任领导职务。1968 年转向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并继续领导地方纺织工会。1969 年进入意大利总工会皮埃蒙特

大区书记处，并在1975—1985年间担任大区书记，1971年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解散后进入意共，1985年进入意大利总工会全国书记处，先后领导工业部和劳动市场部。1991年3月任当年意大利总工会里米尼代表大会上出现的少数派——“工会实体”的领导人。波洛尼亚转折之后，加入左民党，属民主共产党人派。1993年4月退出左民党，同年9月决定加入重建共，在退出意大利总工会之后，于1994年1月重建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总书记。1996年12月重建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总书记。1994年首次当选为众议员，任众院重建共—进步联合党团领导委员会成员，公共与私人劳动常务委员会成员。1994年6月当选为欧洲议会议员，任社会事务与就业委员会成员，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和保护消费者委员会候补委员和发展与合作委员会候补委员。1996年当选为众议员，任对外事务和共同体常务委员会成员。

五、希腊共产党的新思考

希腊共产党（简称希共）现为希腊第三大党，有党员3万多人。在议会300个议席中占有11席（1996年9月大选结果）。在欧洲议会有2名议员。希共经住了苏东剧变的冲击，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进行思考和探索。

（一）经住了冲击，稳住了队伍

苏东剧变给希共造成了冲击，党内出现思想混乱，并发生

了分裂。党内“革新派”带走了一大批党员，111名中委只剩下59人，党的力量大为削弱。但是以总书记帕帕莉卡为首的希共中央于1991年12月决定提前召开十四大，以消除党内的思想混乱，统一全党认识，振奋全党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信心。十四大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基本稳住了党的队伍，决定仍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奋斗目标和共产党的性质。到1996年5月召开十五大时，希共已基本走出困境，党的力量有所上升。在同年9月举行的全国大选中，希共获5.6%的选票，议席从9席增加到11席，从全国第四大党跃居为第三大党。

希共是一个有着80年光荣历史的共产党。1918年11月成立时称希腊社会主义工人党，1924年改为现名。1920年加入共产国际。1931年11月尼·萨查利阿迪斯任希共总书记后，党的力量发展较快，在1936年的大选中获15个议席。1936年8月希腊发生军人政变后，希共遭受残酷镇压，被迫转入地下。

二次大战期间，希共倡导成立了“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人民解放军”，积极开展反对意、德法西斯侵占希腊的武装斗争，解放了大片国土。1944年3月，民族解放阵线在解放区成立了民主政府性质的“希腊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同年8月，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已超过150万人，登记的希共党员已达40万人。9月，民族解放阵线参加希腊民族团结政府，获6个部长职位。民族解放阵线的力量及其在人民中的影响使希腊资产阶级十分恐慌。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瓦解和解散民族解放阵线。1944年5月，希共同政府签署一项协议，同意希腊一旦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就解散希腊人民解放军。1945年2月，希共与政府签订《瓦尔基扎》协议，宣布

交枪和解散希腊人民解放军。保守力量加强了自己的地位，掀起了一股针对民族解放阵线支持者的白色恐怖。为了反对英美扶植的反动势力的残酷迫害，希共在1945年10月召开的七大上决定再次开展武装斗争，并在山区成立了“希腊民主军”。民主军战士只有3.5万人，在国内外形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很难对付数量上超过自己并且装备精良的敌人。南斯拉夫关闭南希边界成为导致希腊共产党人失败的最具决定性因素。1949年夏，政府军和美国部队发动总攻，民主军撤退到阿尔巴尼亚，并在那里分散到各个社会主义国家。10月，希共正式宣布停火，内战结束，希共领导人纷纷流亡国外，中央领导机构也迁至国外。

1951年6月，在希共倡导下在国内成立统战组织“统一民主左翼党”，进行公开活动。1956年3月，在苏共操纵下，由苏、罗、捷、匈、保、波组成的“六党国际委员会”主持召开希共七届六中全会，会上解除了尼·萨查利阿迪斯的总书记职务，并选出阿·格罗佐斯和科·科里西尼斯为首的希共新领导。1961年希共八大选举科里西尼斯为第一书记。1968年2月，科里西尼斯在匈牙利主持召开了希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这次会议是由政治局的多数委员决定召开的。因意见分歧，3名政治局委员被清洗出去，随之中央委员会一分为二，全党发生分裂。主张独立自主的一些领导人于次年4月另建“希腊共产党（国内派）”。在1972年12月的八届十七中全会上，哈里劳斯·弗洛拉基斯当选为希共中央第一书记（1978年改称总书记）。1974年希腊军政权垮台，希共在国内取得合法地位，中央领导机构迁回国内。力量有所回升，党团员共20万人。在1985年的大选中获9.89%的选票和全国300个议席中的12个席位。

1989年1月，希共与其他左翼政党和组织组成“左翼与进步力量联盟”（简称左联），协调竞选活动。在1989年6月、11月和1990年4月的全国大选中，以希共为主的左联均获得12%的选票，并曾两度参政。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希腊左翼力量也面临严重危机。希共内部的革新派和其他左翼政党中一部分人受国际上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也开始酝酿改变左联性质，将其改变成一个统一的、自主的多派别的党。他们提出更新左联纲领和选举领导机构问题。而希共传统派则坚决反对把左联变成一个多派别的党，强调党在左联中的独立性。在左联领导机构成员产生问题上，希共传统派坚持采取任命形式，而另一方则坚持按比例选举产生，任何一方都不能占绝对多数，实为限制希共的影响（希共在左联内力量占70%）。最后，希共传统派被迫退出左联，与左联公开分裂。希共本身也发生分裂。

1991年6月，左联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会议通过的纲领宣言称，左联的目标是复兴希腊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左联超越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也超越现实社会主义形式。会议还选出了左联领导机构。左联这次会议不仅使左联本身发生重大变化，而且使希腊左翼范畴内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有利于左联的变化。这是由于希共将近一半的革新派以及所属的青年和工会等群众组织中的大部分力量加入左联。该联盟从年龄结构来看，中青年人居多，且文化程度也较高。希共传统派力量受到了削弱，党员人数下降到3万多人，111名中委只剩下59人。以总书记帕帕莉卡为首的希共中央于1991年12月决定提前召开十四大，以消除党内的思想混乱，统一全党认识，振奋全党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信心。十四大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基本稳住了党的队伍，仍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奋斗

目标和共产党的性质。到1996年5月召开十五大时，希共已基本走出困境，党的力量有所上升。在同年9月举行的全国大选中，希共获5.6%的选票，议席从9席增加到11席。从全国第四大党跃居为第三大党。十五大上，帕帕莉卡再次当选为总书记。

（二）新历史条件下的思考

希共在1996年5月召开的十五大上通过的纲领中强调，希共是工人阶级先进的、有觉悟的、有组织的部分。它的最终目标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希共确立自己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为指导，在总结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的情况下，努力掌握并创造性地发展这一理论。

1. 总结分析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希共认为，资本主义在苏联、东欧国家复辟是这些国家的主客观因素和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而这些国家自身的问题和失误是根本原因。经济方面，希共认为，战后这些国家都提出通过把科技进步应用于生产和更新物质技术基础来促进社会繁荣，加速创造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他们虽然取得显著成就，但大量的目标未能实现。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这些国家生产发展缓慢，明显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导致在与资本主义的对抗中失利。

这些国家忽视了社会矛盾的解决。原苏东国家工农业发展不平衡现象严重，工农业产品价格存在剪刀差，导致工人阶级和中、小农之间的矛盾，根本违背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另外，构成唯物辩证法核心的社会主义内部矛盾体系

被忽视，保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在发展的每个阶段和水平上辩证统一和相互作用的需要被低估，导致社会生产和消费、个人和社会利益的冲突。工人阶级和农民、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别和社会主义社会中继续存在并可能激化的阶级斗争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和恰当的解决。

这些国家在总的战略和具体策略上也有失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他们低估帝国主义的侵略性，甚至对其本性产生错觉，片面执行“和平共处”路线，实行阶级调和以及意识形态调和政策。对战后以来民主社会主义的前景和作用的评论也失当。共产党应寻求与社会党在缓和与和平事业、反帝斗争中联合行动与结盟，但也应看到社会党在反社会主义的“人权”运动中实际上是站在帝国主义一边的。

希共文件指出执政党的蜕化变质是关键因素。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丧失了先锋领导作用，组织松散无力，党的原则、行动准则和提拔骨干的政策已经失灵。民主集中制遭到践踏，直接民主制和代议民主制之间的辩证关系遭到削弱。党群关系松弛，党脱离群众。中央机构和工会等群众组织相分离。创造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政府研究工作被削弱。旨在培养社会主义觉悟和确保社会主义建设所需新型人才茁壮成长的多方面教育活动也受到削弱。

希共认为反革命的“改革”政策是直接原因。原苏共领导核心打着对社会主义更新和调整的旗号，借口“民主”、“公开性”，别有用心地推行“改革”。“改革”依靠夸大苏联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歪曲历史、抹杀苏联建设成就的策略和方法。其本质是变生产资料公有制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改变生产资料的分配制度，强制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分工中的平等关系。并

且借口外交政策中的“新思维”，试图使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抹杀其政治内容。原苏共领导人推行的所谓“改革”，实际上是蓄意复辟资本主义。

希共强调，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是促使原苏东国家变化的外因。帝国主义从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时起就企图扼杀社会主义，其手法是封锁、包围和孤立，继而又运用“冷战”和宣扬“共产主义威胁”的策略。与社会主义国家展开军备竞赛，也是帝国主义企图拖垮社会主义的伎俩。它们还大力支持原苏东国家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个人和团体。所以，帝国主义是导致苏东社会主义制度发生逆转的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

希共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主张重建国际共运团结，加强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联合行动。希共认为，苏联和东欧的演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的政府和思想的失败。面对帝国主义更加嚣张的反动气焰，如果共产主义运动组织上和思想上是涣散的，反帝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就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成功。应在调整国际共运，摆脱目前的危机和倒退，在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统一战略基础上恢复国际共运的团结，并以此为方向推动协调和联合行动，就保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现代反帝和革命斗争战略等进行对话。希共将竭尽全力推动和支持加强这一方向的主动行动，与此同时加强自己相应的行动。

2. 认为历史地看资本主义已经过时，资本主义总危机还要继续。希共十五大通过的纲领中指出，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形成了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垄断资本。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资本和生产全球化的新阶段。银行资本融入工业资本，形成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资本输出与商

品出口相比具有特殊意义。在庞大的资本主义力量中，为了瓜分世界，建立了资本家的国际垄断联盟，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希共纲领认为，21世纪前夜，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帝国主义野蛮地强行推行世界新秩序。帝国主义力量不断进行公开干预和竞争，以瓜分市场，导致国家间新的依赖和附属关系，出现新的紧张根源和局部战争。一小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和剥削世界上的大部分财富。在推行新秩序方面，美国有首要发言权。这些力量还控制着联合国。北约变成了世界宪兵和新秩序的维护者。国际帝国主义机构及联盟，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等的作用和职能得到加强。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帝国主义激烈争夺的场所。希共党纲认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要继续，大多数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的相对和绝对穷困在扩大，移民潮在不断高涨；失业、贫困、缺少住房、黑市劳务市场、犯罪、各种社会弊端、吸毒、卖淫，更广泛和社会群体受排斥等在资本主义的宗主国大规模蔓延。价值观念危机、舆论工具的自由化，知识和文化的商品化，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等越来越冲击着资本主义社会。寄生和腐败泛滥。随着新技术的利用，生产力得到了发展，但其他方面却遭到大规模破坏。综上所述，希共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过时。

3. 认为马克思主义仍具有强大生命力，要继续坚持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的目标。希共在十五大上再次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胜利是必然规律。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被证明是超越时空的，证明它作为分析、认识和革命性地变革社会的理论工具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希共十五大纲领强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必然规律。人类社会的进程

不取决于某个具体时期，特别是短时期发生的事情。指出一些科学家和政治力量提出的关于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还存在另一个制度的观点是乌托邦。希共同时认为也不存在通往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继续有效并富有生命力。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着深刻的危机，没有出路。资本主义的基础受到动摇，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将再一次证明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如果正确运用社会主义失败的结论，暂时的失败是为胜利做准备。希共坚信，社会主义的失败不仅在希腊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为社会主义前景的必要性带来许多新的证明。劳资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压迫以及强加于国际关系中的新殖民主义形式客观上已提出推翻资本主义，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进行革命变革的必要性和现实性。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生产力的巨大的发展不能容忍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资本活动的国际化，从民族的、国家垄断的调节向多国调节的转变证明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不相称。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生产力已超越资本主义界线，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客观上已成熟。反革命的复辟不能改变时代的性质。世界革命运动在现阶段处于低潮和倒退，这是暂时的。上升的新阶段正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在国际工人阶级的反抗中，在人民的觉醒和战斗中成熟。希共对前途充满信心。认为21世纪将是革命力量重新组合，向国际资本发起进攻和决定性的反攻的世纪，是世界革命运动和新的一系列社会革命新高潮的世纪。

4. 认为在希腊存在争取社会主义变革的物质前提，这是由希腊资本主义及其矛盾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希共十五大认为，希腊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处于依附和受压迫的地位。以上特征是由其历史原因决定的。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

济、政治和军事直接干预下，在依赖外国资本的条件下，希腊的资本主义得到缓慢和痛苦的发展。希腊的垄断资本主义比其他已经形成了国际帝国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晚。结果是希腊只能依靠相对低的物质技术基础。在最近几十年里，特别是 80 年代，希腊在组织上在欧盟、北约和参加国际跨国协议的范畴内更多地向帝国主义制度靠拢。欧盟帝国主义中心的干预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得到加强。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希腊的经济和基本经济部门，希腊资本已同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紧密相联。希共认为最近十几年来，希腊的工业生产基础萎缩，破产、赎买和兼并现象层出不穷，农业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希腊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私有化和开放市场的政策使人民雪上加霜，失业在增加，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和福利下降，劳动者的地位在下降。国民生产总值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最近 15 年，服务业的比例上升，工业、制造业和农业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缩小。希腊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劳动力人口的数量增加，工薪阶层的数量及其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上升，工人阶级相应增加，他们更多地集中在商业和服务业，而工厂无产阶级的数量在减少。外籍工人大量增加。农民的阶级分化在加剧，农民数量减少的总趋势在加强，城市中间阶层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在增加。资产阶级比例在下降。

希共认为，希腊社会发展只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道路是为多国资本和资本家的利益服务，是屈服于欧盟和北约的反人民的选择。另一条道路是建立反帝反垄断民主斗争阵线。这条道路能为工人阶级、城乡中间人民阶层和青年提供前景。不存在超越的或第三条道路。

5. 认为从工人阶级及其盟友夺取革命政权时起，就开始

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阶级斗争并不停止，只是改变表现形式。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资本主义的一些残余还保留相当长一个时期。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能自动消除这些残余，而是根据本国的内部条件和国际形势发展的影响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就在社会主义基本建成和资本主义所有制消灭后还存在旧矛盾激化和新矛盾出现的客观物质基础。正像20世纪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证明的那样，忽视这些矛盾可能使其演变成严重的竞争，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增强反革命因素，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社会主义是其产生和发展都同作为社会进步的共产党的领导活动紧密相连的社会。党的领导作用在其活动和生存中得以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建设不单是执行政权的革命先锋队的事，而是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事业。党的社会构成、提拔工人干部的政策、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捍卫自己的能力不能停留在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以及国防装备所进行的努力上，而且还应在思想上武装工人阶级及全体人民继续进行努力。应懂得，帝国主义是不甘停止破坏的推翻新社会的努力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是在同一个阶级的社会里进行的。党同劳动人民及其群众性组织之间的活生生的领导关系取决于党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和发展自己的革命特征。党内民主和党的集体运作，坚持党内生活的原则和规章是避免偏差和违反制度的重要前提。希共在当政的情况下应在其方针和行动中始终关心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的党内生活的发展。培养和充分利用非党组织的主动性，有效地进行自上而下尤其是自下而上的监督。批评和自我批评地考察干部的工作，如他们的行动不是积极的，应予撤换。严肃处理违反党的运转原则和规章以及共产主义道德的干部是非

常必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特别是对那些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执政党。

6. 认为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反帝反垄断的民主阵线。希共认为这个民主阵线有助于团结绝大多数人民捍卫自己的利益免受大资本的进攻，是有助于改变力量对比的道路，有利于接近并在某些先决条件下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反帝反垄断民主阵线客观上代表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代表承受着多国资本和国家加入帝国主义机构造成后果的绝大多数人民，代表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城市中间阶层和为争取民主权益而斗争的社会运动的利益。在最初阶段，阵线的作用是把社会力量团结在反帝反垄断要求和目标的周围。希共谋求同认为有必要同帝国主义、多国垄断资本进行斗争，捍卫劳动者的权利，争取人民当家作主和国家独立的那些力量进行合作。反帝反垄断人民阵线的领导机构，在阶级斗争较量中产生的来自人民的立法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新政权的萌芽。社会政治较量、阶级冲突的发展将把政权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希共把使反帝反垄断斗争得到发展、工人阶级和人民阶层反对资本主义的觉悟得到提高作为方向。希共主张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强调只是使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同盟军离开执掌的政府是不够的，应该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机器，建立一个新的人民政权。这个政权只能是社会主义政权。在阶级斗争高涨、人民革命运动处于高潮的条件下，当革命过程已经开始时，能够产生作为人民政权工具政府，它已经得到战斗的人民的批准和赞同，无需举行大选和组成议会。这一政府等于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的政权。在阶级较量和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同盟军的影响大大下降的情况下，可能产生以议会为基础的反帝反垄断力量的政府。

7. 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希共认为社会主义的建设

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府为基础，并用党从20世纪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问题加以丰富。社会主义建设以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普遍规律为指导。希腊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最低阶段的开端是：工人阶级与其同盟军合作夺取革命政权，基本生产资料社会化；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科学和新技术的成就将用来全面发展劳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保障所有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有工作，不断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实行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法则服务。这个法则就是在更高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的现代成果基础上，以更广泛更全面地满足社会需求为动力进行生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将彻底改变社会关系。社会主义将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失业、半失业、雇佣和国家恐怖，不安全感，对未来的不确定，贬低和忽视人的作用，违反人的权利和自由等现象。社会主义国家不管采取什么国体，从阶级实质的角度来说，将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是阻止资本家和国际反动派搞资本主义政权的复辟，建立消灭人剥削人的新社会。这个社会将代表民主的最高形式，其基本特征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积极参与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基本问题，监督政权及其机构。革命的劳动人民的国家在希腊要采取的国体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进程发展的条件下得到解决。

社会主义民主将肯定政党的存在，它们在社会主义宪法范畴内行动。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国家赖以建立和运转的基本原则，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社会组织的基石是立足于国家社会所有制的新的生产和分配关系，特别是立足于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和现代技术；发达的生产消费品的工业部

门；矿产和能源部门；通讯、交通、银行；外贸网。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扩大到中央贸易网，大型旅游单位、航运公司，大众舆论工具，服务保险部门。取消商业秘密。保障对教育、卫生、福利、社会保障和其他面向儿童和老年人的社会福利的免费服务。大资本家的土地，教会、修道院的土地国有化。解决地区发展差别。社会主义政权关注工人阶级特别是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工人、农民和中间阶层不断增长的现代需求。通过社会化的各种形式为小生产和分散服务的发展和集中创造条件。通过具体的政策鼓励各种类型的合作化。满足劳动知识分子，客观评论他们服务的社会价值。对那些移民国外并愿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劳动者实行鼓励他们回国和人尽其才的政策。承认个人通过劳动获得财产的权利，为消灭阶级剥削的各种根源和社会压迫的各种根源创造物质条件。在希腊，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过程将是复杂的过程。由于新社会是从希腊资本主义及其参加的帝国主义机构中产生的，这一过程肯定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这些困难将通过劳动人民自己的革命行动来克服，通过基本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在商业、服务业和小生产中的扩大社会主义关系来克服。充分利用生产力的所有能力来战胜困难。判断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领域是生产力有计划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以保证人的更高水平的需求。社会主义政权重视价值规律运转的影响。在有计划的生产和社会所有制范畴内充分利用商业金融关系，目的是深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阶段根据形势和面临的问题，可有条件地允许一部分资本——非垄断资本活动。

（三）组织力量及其影响

希共是希腊第三大政治力量，有党员3万多人。该党下属

的青年团有团员2万多人；受该党影响的工会力量也较强。在希腊工人总联合会领导机构45名成员中希共占有10位，位居第三。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每4年召开一次。组织机构分为中央委员会、州委员会、总支委员会和基层委员会。希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由75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委员9人。

近几年来，希共力量有所上升。在1996年9月举行的全国大选中，该党获近38万张选票和5.6%的得票率。在议会300个议席中占11席，比上届大选增加2个议席，为希共开展议会内外的斗争、在希腊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可能性。在1994年6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该党获41万张选票（得票率为6.29%）和两个议席。同年10月在希地方选举中的得票率为7.85%。

希共党员中工人比例占17.35%，其中产业工人占5.36%，职员占44.2%（其中国家公务员占一半），失业者占3%，农民占5%，自由职业者占15.2%，知识分子占2.5%，退休者占8.9%，大、中学生占0.9%，家庭女佣占0.9%。

希共中央机关报为《激进者》日报；理论刊物为《共产主义评论》。希共还设有“902”电台和“902”电视台。

附：总书记阿莱卡·帕帕莉卡（女）简历

阿莱卡·帕帕莉卡1945年生于雅典，其父母是希腊抵抗运动战士和希共党员。帕毕业于雅典大学哲学系历史考古专业。由于受当局的政治迫害没能分配工作。连续8年担任企业会计和担任家教。1961年起投身于和平运动并加入统一民主左翼党青年团学生组织。多次参加学生斗争。军人独裁期间曾任兰

布拉基斯民主青年学生组织局的书记。1968年加入希共。1976年起专门从事党务和社会工作。曾任希共雅典市委委员。亦是希腊妇女组织创始人之一。在1978年希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委。1986年当选政治局委员兼任雅典市委书记。1991年2月党的十三大上当选为总书记。1991年12月党的十四大和1996年党的十五大上蝉联总书记职务。在1993年和1996年的全国大选中，均被选为希共议员。已婚，有一女儿。会讲英语和俄语。

六、北欧和英国的一些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

北欧和英国是欧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力量相对薄弱，政治影响很有限。目前在北欧地区的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和冰岛5个国家里一共有6个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而在英国有两个。它们分别是：挪威共产党、挪威工人共产党、瑞典共产党、丹麦共同路线党、芬兰共产党、芬兰共产主义工人党、英国共产党、新英国共产党。在冷战结束后，这些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困难，在组织力量和政治影响方面有程度不同的滑坡，但经过斗争和调整，它们现在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其党员总数不过两三万人，但仍在继续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探索奋斗。

(一) 北欧五国的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

北欧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很强，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本来就较弱，经历苏东剧变，他们的力量和影响进一步削弱。在剧变中，有些党已消失（例如丹麦共产党），有的党已改名易帜（例如冰岛共产党已改为社会党性质的人民联盟），但经过努力，仍有一些党保存下来了。

1. 芬兰共产党。其主席为哈卡宁，总书记为维达涅米，现在仍然拥有分布在300个基层组织的1万名党员。主要成份是工人、职员和知识分子。中央委员会有50名委员，政治局有10名成员，每两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出版发行机关报《通讯员报》周报。该党目前是北欧力量最大的共产党，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1987年大选中，以其成立的竞选组织“民主选择”名义获得4个议席。1991年大选中，参加芬兰左翼联盟，共同获得19个议席，但1995年该联盟参政需要与社民党协调一致，故把芬共开除出盟。

2. 芬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其主席是拉赫登麦基，总书记是曼尼科。现有党员1000人，其成份主要是抱怨芬共“僵化”的前芬共党员、退休工人和职员。他们主要在首都赫尔辛基和乌西马省开展一些活动。最高权力机构是每年召开一次的党代会，中央委员会由27名委员和13名候补委员组成，内设由11人组成的政治局。出版机关报《工人新闻》。该党从未获议席。

3. 挪威共产党。成立于1923年，但长期发展不大。它在1945年6—10月支持本国工党的施政纲领，曾经参加本国联合政府，并谈判两党联合。此后在同年进行的大选中，获得11.9%的选票和11个议席，但并没有能够再次入阁，也未能

实现与工党的联合，从此该党不断走下坡路。1953年大选中只得3个议席，1957年只得1个议席，1961年完全没能够进入议会。1971年其十三大提出要走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1973年与挪威社会主义人民党等组成选举联盟，共同获得了16个议席，其中自己占1个议席，但1975年丢失了该议席，1977年大选中只得0.4%的选票。冷战结束后，在形势的冲击下，该党继续削弱。但由于它仍然坚持维护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的利益，现在仍然有大约1000名党员，在1997年的大选中获得大约0.1%的选票。该党目前有完善的领导机构，即中央委员会，并且出版机关报《自由报》。

4. 挪威工人党。主席是索尔维·欧姆达尔。1990年改称现名，其前身为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改名后继续出版发行机关报《阶级斗争》。在1983年大选中获得两万张选票，即1.2%的得票率，而在1993年大选中，得票率为1.1%，获得1个议席。在1997年大选中获得4万张选票，得票率为1.6%，但因为奥斯陆选区得票率下降失去了唯一一个议席。

5. 瑞典共产党。它在1995年11月召开了重建大会，通过了《瑞典共产党宣言》，这是冷战后重新活动的重要标志。该党现在有党员3000余人，其中工人占70%，最高权力机构是每3年召开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组织分为中央、地区和地方3级，主要活动是利用党刊《方针报》宣传党的思想和主张。

6. 丹麦共同路线党。有党员5000人，以工人和退休者为主，其中很多是不满丹共与社民党妥协的前丹共党员。每年举行一次全国会议，出版双月刊《路线》，主办人民电台，1989年获哥本哈根市议会两个议席，1993年减为1席。

上述保持下来的共产党，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

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目标。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实践相结合，在斗争中加强自身的改革和建设。芬兰共产党宣称自己是芬兰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理论，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必须保障每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表示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芬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宣称自己是芬兰唯一的马列主义革命党。挪威共产党宣称自己是以马列主义为基础、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工人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挪威工人共产党在1995年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坚持提出实现共产主义是自己的奋斗目标，阶级斗争是手段。丹麦共同路线党则声称其活动基础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党的目标是赢得政治和经济权力并达到社会主义和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无阶级社会。

各个党根据本国情况进行探索，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和策略。芬兰共产党主张实行高度的政治开放和多党制。规定自己当前的战略是实现共产党与环境保护组织的“红绿合作”，以“红绿政策”替代资产阶级政策，粉碎芬兰社会中的“右派霸权”，维护芬兰人民的社会保障。提出要扩大公民的民主权和自治权以及劳动者对企业管理的参与权，要实行公平分配，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和福利，节约利用自然资源和能源以保护环境。其近期的目标是通过管理资本和金融市场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反对国家金融机构和主要经济部门的私有化。要求保证失业者、退休工人和学生的基本福利，要求补充立法保障青年人的学习、就业、收入和住房，批评政府在减少失业方面工作不力，要求政府尽快解决失业问题，要求实现6小时工作制度等。芬兰共产主义工人党提出其政治目标是通过民主改革和基

本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争取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并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国内政治方面，主张加强左翼力量的民主合作，主张建立广泛的民主阵线，要求对银行、保险公司、大工业企业等实行国有化和取消金融垄断，要求实现社会充分就业和男女同工同酬。瑞典共产党提出，创建反映平等、集体思想和团结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自己的目标。挪威共产党主张通过国有化、扩大民主监督和市政自治等革新措施限制垄断资本权力，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建立一个民主的人民政权。

多数党认为苏东剧变后，尽管目前世界共运面临巨大困难，但国际社会主义不会消亡。中国等国仍在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正在各国重新兴起。在当今的形势下，所有共运和工运力量应从苏共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互相交流、往来和支持，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进攻。对国际形势特别是西北欧的形势，多数党主张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中立地位。主张实现国际和平、缓和、裁军和共同安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支持第三世界争取民族自决权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反对推行欧洲一体化政策，反对本国政府加入欧洲联盟、西欧联盟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等。芬兰共产主义工人党不赞成芬兰加入欧盟和纳入欧洲一体化，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赞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丹麦共同路线党则要求丹麦退出欧盟和北约。挪威共产党主张挪威退出北约。

（二）英国的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

英国的共产主义政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初期有过一段高涨时期，但在冷战结束前已经严重衰落，对国家政治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在苏东剧变时老英国共产党演变成为“民主

左翼”组织。现在仍坚持共产主义方向的力量不仅很弱，而且在组织上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目前，还存在的两个主要的共产主义政党，一个是英国共产党（也称为“晨星报派”），另一个是新英国共产党。两党加在一起约有党员 1500 人，但它们的刊物的读者达两万多人。

1. 目前组织上基本稳定并开始略有回升。

早在 80 年代，老英国共产党内就有一部分党员对当时党的状况很不满意。他们终于在 1988 年退党，另立组织；而因为他们控制老英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晨星报》，也被称为“晨星报派”。在老英国共产党在 1991 年演变成为“民主左翼”组织后，晨星报派逐渐地把英国共产党这个名称和旗帜接过来了。近几年来，该党在总书记希克斯的领导下，坚持高举共产党的旗帜，在工会中的影响扩大，力量有所回升，党员人数达 1200 人左右。该党也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出版发行现在已经成为西方唯一一份有共产党背景的英文日报《晨星报》，发行量为 8000 份，读者达两万人。

新英国共产党的党员大部分是在 70 年代从老英国共产党里分裂出来的。他们在 1977 年成立了新英国共产党。该党长期被各种困难特别是经济困难所困扰，一度欠债高达 4—5 万英镑。通过募捐等活动和工作，现在已经基本上做到收支相抵，正在走出经济困难。现在有党员 300 人左右，出版发行党报《新工人报》（周报，发行量达 2000 份）。总书记为安迪·布鲁克斯。

2. 在坚持马列主义前提下，调整路线政策。

英国共产党对原党的纲领《英国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修改。它提出要坚持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坚持共产主义方向，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它剔除了原纲领里对共产形势

的错误分析和估计，坚持党的基本方针，从本国实际出发，调整政策，表示要广泛争取左翼和劳工运动的支持，要注意同其他进步力量结成广泛的反垄断联盟，开展议会内外的斗争。

新英国共产党表示要继续坚持马列主义，重申自己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自己的主要目标是帮助工人阶级获得国家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英国国内政治中，新英国共产党在选举中不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而表示支持英国工党，同时要求工党加强同工会的关系。

3. 吸取苏联崩溃经验教训，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在对苏联东欧剧变进行反思时，英国共产党认为，该剧变是世界工人阶级运动的严重挫折，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但社会主义并没有失败。

在苏联东欧剧变后，新英国共产党批判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提出社会主义没有失败，社会主义是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唯一出路。

第13章

欧洲社会党及其理论政策调整

一、冷战后欧洲社会党的新动向

冷战刚结束时，欧洲各国的社会党也曾受反共浪潮中社会舆论向右倾斜的影响，造成“民主社会主义”受贬责，社会党的选票下降，相继被右翼政党取代上台的局面。但是总的说来，社会党呈发展上升趋势。这不仅是因为在剧变中有意大利共产党这样有力量和影响的党转变为社会党，扩大了社会党的队伍，而且还表现在近年来各国的议会选举中，社会党又纷纷得势，陆续取代右翼政党上台执政。1994年6月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社会党获得全部567席中的200席，成为欧洲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团。现在欧洲联盟15国当中，有13国是社会党执政或参政。纵观冷战结束以来的形势，欧洲社会党出现了以下新动向：

第一，社会党的组织和力量呈发展趋势，欧洲社会党共有党员 400 万左右，执政或参政的社会党有 15 个。详见下表：

党的名称	党员数量 (单位: 万人)	在国内政治地位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	38	在 野
葡萄牙社会党	8	单独执政
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	15	单独执政
意大利左翼民主党	80	主要执政
意大利社会党人党	不详	参 政
意大利社会民主党	不详	在 野
德国社会民主党	78	执 政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不详	主要执政
荷兰工党	6	主要执政
卢森堡社会主义工人党	0.6	参 政
法国社会党	11	主要执政
比利时法语社会党	18	主要执政
比利时荷语社会党	14	主要执政
英国工党	40	单独执政
北爱尔兰民主工党	不详	在 野
爱尔兰工党	0.7	在 野
瑞典社会民主工党	20	单独执政
芬兰社会民主党	10	主要执政
丹麦社会民主党	10	主要执政
挪威工党	10	在 野
瑞士社会党	0.2	

党员总计 400 万左右

第二，社会党联合趋势增强，作为区域性政党联盟的“欧洲社会党”（最初叫“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党”，后改称现名）1992年11月9—10日在荷兰海牙正式宣告成立。该组织是社会党国际中具有较强独立性的区域性组织，名称虽然叫“党”，但其组织的严密程度不可能像单一政党，但却比其前身“联盟”的纯协商性组织更紧密。1996年该组织已有16个国家（欧盟15国加挪威）的20个正式成员党，还有来自欧洲以外国家的3个联系党和11个观察员党。近年来该组织已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1992年11月9—10日，在荷兰海牙举行首次代表大会，宣告该党成立，发表题为“欧洲，我们的未来”的成立宣言（《海牙宣言》），比利时外长W·格勒斯当选为党主席。

1992年12月9—10日，在英国爱丁堡举行党主席联席会议，发表该党关于发展经济、科技，解决就业、环保、社会福利政策原则立场的声明（《爱丁堡声明》）。

1993年11月5—6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特别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该党将于1994年6月参加欧洲议会选举的竞选宣言（《布鲁塞尔宣言》）。

1993年12月9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党主席联席会议，通过该党就业专题工作小组起草的关于就业问题的倡议，发表题为“欧洲就业倡议”的声明。

1994年6月21日，在希腊科弗岛举行党主席联席会议，就欧洲议会选举后的形势和该党任务发表声明。

1994年12月7—8日，在德国埃森举行党主席联席会议，进一步就解决欧洲的就业、环保、男女平等问题阐明该党立场，呼吁次日举行的欧洲首脑会晤制订一个长期的欧洲投资计划（《埃森声明》）。会议欢送J·德洛尔（法国社会党）离任欧

洲委员会主席职务（此后他担任欧洲社会党名誉主席）。会议还建议翌年由 R·沙尔平（德国社民党）接任欧洲社会党主席职务。

1995年3月6—8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该党环境专题工作小组起草的关于解决欧洲环境问题的倡议作为该党的一项重要政策文件（题为“环境、就业、富裕——一个社会主义的幻想”）。大会还通过一份阐述该党关于实现欧洲一体化政策设想的原则声明（《巴塞罗那声明》）。R·沙尔平正式当选为该党第二任主席。

1995年6月24—25日，在法国嘎纳举行党主席联席会议，通过了题为“建立就业、环境和男女平等的公正制度”的政策文件。

1997年6月5—7日，在瑞典马尔默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各成员党在“建设一个新欧洲”的口号下，进一步就欧盟的就业政策、社会政策、建立经济货币联盟及欧盟扩大等问题协调立场与战略，旨在对一周后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发生影响。

第三，欧洲社会党普遍加强了理论和政策调整，其趋势是进一步向右倾斜，呈现出与右翼政党趋同的现象。

在理论上，更坚定地崇信伦理社会主义，强调同科学社会主义决裂。它们进一步批判和抨击现实社会主义是“专制独裁”、“极权主义”、“官僚主义”、“政治与经济特权高度集中”的体制。同时对其过去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清理和反思，剔除其中某些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因素。以前强调民主社会主义的双重含义，即既是一种“学说”，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意思是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还主张进行“变革”，现在倾向摒弃后一层含义，强调与科学社会主义“彻底

决裂”。它们强调本着伦理社会主义学说，来改革现代西方社会，用“自由”、“公正”、“互助”等基本价值，以及“和平”、“民主”、“社会进步”等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传统来建设欧洲，塑造一个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欧洲社会模式。

在政策上，不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化，而主张对私有化取务实态度；主张捍卫社会保障制度的成果，但赞成削减社会福利；许多社会党上台后执行的是右翼政党要实行的政策。西方学者认为已出现了左翼与右翼在政策上趋同的现象。如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为使工党彻底“非社会党化”，主张将“社会主义”概念改为“关于社会的主义”（SOCIAL-ISM）的概念，或者干脆不再使用这个概念。他在竞选纲领中说，工党将对私有化采取务实态度，只要有利于提高效率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工党也将搞私有化。他还宣布工党是全民党，不再像过去那样强调是工会的党。主张今后吸收企业和个人的政治捐款，减少经费上对工会的依赖。西方舆论评论说，英国工党的改革和胜利应归功于“布莱尔的革命”，而布莱尔获胜是因为“抛弃了老的信仰”；英国这次权力更迭并不是“对撒切尔主义的历史否定”。德国社民党近期内提出的经济政策纲领，也部分地吸收了保守党人多年来坚持实行的供应学派的政策。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也有类似情况。这说明社会党正逐渐向右翼靠拢。

二、法国社会党的理论和政策调整

法国社会党现为法国执政党，成立于1905年。二战前后法国社会党多次执政或参

政。1971年，由弗朗索瓦·密特朗领导的共和制度大会党和老社会党及几个左翼组织合并，实现了社会党的重建，仍称社会党。数十年来，法国社会党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1981年至今已三度执政，前后近15年。在这期间，法国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情况以及世界的形势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国社会党几上几下，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近年来，该党在利奥内尔·若斯潘的领导下，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适度调整政策，克服了苏东剧变后一度出现的危机，党的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党的影响和力量逐渐上升。

（一）密特朗的“激进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法国是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摇篮。法国大革命及其《人权宣言》、空想社会主义、巴黎公社起义及其失败后出现的保卫共和制的激进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都对法国社会党人产生过影响。法国社会党早期的领导人和理论家主要有盖德、饶勒斯、勃鲁姆。盖德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主张阶级斗争，反对改良主义，在党纲中提出了建立共产主义的目标，但对本国现实重视和研究不够。饶勒斯接受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激进主义思想影响，同时也接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是理论多元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他主张把马克思的观点及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的思想同法国的现实相结合，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空想的唯心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同蒲鲁东主义调和起来。勃鲁姆继承了饶勒斯的思想。该党表示其目标是“建立一个以阶级政党为形式的无产

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组织，通过夺取政权和使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社会化，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为集体的或共产主义的社会”。

资本主义世界在70年代经历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当权多年的右翼势力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对策，适应经济繁荣时期而风行一时的社会民主党的福利主义也已失灵。1971年新社会党成立后，继承了老社会党的理论和传统，在密特朗的领导下，以“左翼联盟”、“阶级阵线”和“同资本主义决裂”作为党的三大理论支柱。密特朗自称为饶勒斯和勃鲁姆的接班人，他早在1965年就提出要建设“法国式的社会主义”。70年代他曾解释说，“法国式的社会主义”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苏联模式。社会民主主义“不触动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经济决定权”，苏联模式实行的是“集权主义和全面集体化”。1981年密特朗当选总统后，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依照密特朗的话说，“法国式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激进的社会主义”，是“阶级斗争和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于市场法则的社会主义，对私有垄断资本主义实行国有化的社会主义，实现基层权利要求的社会主义”。法国社会党主张的社会主义包括自由、民主、人道主义、人的解放和自治管理的内容。

法国社会党1981年上台执政后，在初期对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改革，在经济方面执行了激进的经济膨胀政策。其主要做法是：（1）大力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开展了法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将最主要的36家银行、5大工业集团、两大金融财团实行国有化，并用控制股份的手段将两大军火集团掌握在国家手中，使法国成为西方国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2）实行权力下放，把部分中央政

府的权力移交给大区、省和市镇，使地方拥有自治权和单独制定预算的权力，发挥地方优势，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3) 建立健全各类社会福利机构和措施，提高劳动者福利，实行每周 39 小时工作制等，改革税制，增收大财产税，以便缩小社会不平等现象。

尽管如此，法国仍没有能够摆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共同经济危机的影响。加之上述政策推进迅速，短期内虽收到一定的成果，但因操之过急，超过了国家的财力和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并造成资金外流，以至在 1982 年上半年出现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为克服困难，社会党政府迅速调整政策，从膨胀政策转为紧缩政策，冻结工资和物价，限制社会福利开支，压缩财政赤字。1984 年后紧缩政策更加严厉，这使社会党开始转向较为务实的政策，“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在密特朗的词汇中消失了，法国社会党政策开始出现重大转折。

(二) 密特朗的“两不政策”和法国社会党的政策调整

1988 年密特朗蝉联总统后，任命党内的温和派代表米歇尔·罗卡尔为总理。社会党进一步调整政策主张，在理论上向社会民主主义靠拢，认为整个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应包含变革社会、社会公正、民主自由及现代化等内容。1990 年 3 月社会党雷恩代表大会修改了 1974 年制定的党的《原则声明》，去掉了原声明中的“把生产及交换资料社会化”、“消灭剥削和阶级”等提法，把“推进建立在自由和责任基础上的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主张建立“混合经济”、“通过改良主义来实现革命的愿望”。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社会党政府除了经济上实行紧缩政策外，密特朗还提出了“两不政策”，即不再搞私有化，也不再搞国有化，赋予计

划经济以新的职能，强调计划经济应适应需要并设计出展望未来的方法，采取温和和务实乃至自由主义的措施，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对外，积极倡导欧洲联合，为使法国进入1992年的欧洲统一大市场作好充分准备，以利用统一大市场提供的良好机会，发展法国经济和迎接将面临的激烈竞争。

1991年12月，法国社会党在巴黎召开特别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题为《开辟新前景》的纲领和政治决议，重申“混合经济”的重要性，认为有必要建立“国家与企业的新型联盟”和创立“新的经济调节机制”。在社会问题上，不再坚持80年代初期“恢复全员就业是可能”的提法，而改提“解决就业问题的中心目标是创造就业机会”。认为“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并不是大规模的和普遍的，它主要涉及处于社会两端的阶层”。在国际问题上，不再提建设一个“劳动者和人民的欧洲”，而主张建设一个“社会的欧洲”。1993年10月法国社会党第六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题为《重建》的决议，表示社会党“已经同企业的集体化决裂”，左翼和右翼的分歧不在要不要市场经济上，而在要不要社会公正上。

密特朗1981年至1995年连任两届总统，社会党也曾于1981—1986年和1988—1993年两度执政，虽在推动国内社会经济改革、推进欧洲联合和增强法国国际地位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但对法国国内失业率不断攀升、经济增长缓慢、市场疲软、需求不旺、企业投资停滞、国家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以及治安状况恶化等问题，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群众对社会党丧失信心，右翼利用社会不满，加紧了对社会党政府的抨击和压力，最终导致社会党在1993年3月立法选举中惨败下野。

（三）若斯潘的“左翼现实主义”

冷战结束后，世界和欧洲局势进入了一个大调整和大转变的时期。欧洲政治一体化步伐加快，国家关系出现稳定发展的良好势头。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为欧洲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欧洲作为世界一极的作用和地位得到加强。与此同时，西欧国家左翼力量受到削弱，右翼势力发展，民族主义抬头。新自由主义冲击了法国的传统社会模式。失业痼疾日加严重，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边缘化”现象加剧。在新形势下如何探索法国的发展之路，成为法国左右翼各党派研究的重点和争论的中心。

1993年3月法国社会党下台后，法国右翼组成由巴拉迪尔为总理的政府。1995年5月保卫共和联盟主席希拉克当选总统，开始了右翼的“一统天下”。右翼上台后大力调整内外政策，实行了一套带有新保守主义色彩的改革措施，紧缩财政，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但遇到重重阻力，遭致民众反对，引起了新的社会危机。希拉克和保卫共和联盟的声望不断下降，右翼政府陷入了困境。在这时，法国社会党利用右翼的困难，开始对右翼展开了反攻。

1995年10月，曾在1981—1988年间担任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的利奥内尔·若斯潘再度出任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在他的领导下，法国社会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96年社会党在党内先后开展了关于“全球化与欧洲和法国”、“民主和公民权利”以及“社会党的社会经济建议”的大讨论，明确提出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加强公平分配是社会党社会经济政策的三个主要目标。该党的目的是制定出有号召力的竞选纲领，为社会党在议会选举中东山再起作思想和组织准备。1997年4月希拉克总统在错误估计国内局势和左右翼力量对

比的情况下，宣布将原定1998年3月举行的全国立法选举提前至1997年5月进行，结果不仅没有达到形成新的右翼多数派的目的，反而加速了左翼的重新上台。法国社会党联合法国共产党、绿党等左翼组织取得选举的胜利，组成由若斯潘任总理的左翼联合政府。

上台后，若斯潘政府面对一大堆难题：经济回升迟缓无力，失业队伍持续扩大，社会不公正现象有增无减，公众对前途缺乏信心……若斯潘一方面要取信于民，遵守社会党的竞选诺言，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法国的现实情况，因而执行了一套既有别于社会党80年代的执政纲领，也不同于右翼政策的“左翼现实主义”治国纲领，并总结80年代教训，注意保持政策的连续性。1997年11月法国社会党在布雷斯特召开了党的第七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进一步确认了若斯潘政府的政策，强调社会党要革新思想，适应当今世界的挑战。归纳起来，目前法国社会党的政策主张主要内容如下：

1. 以发展和批评的双重目光看待当今世界。

该党认为世界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期。承认全球化是一个进步，有助于促进经济、技术的发展，认为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是全面的贸易自由化和事实上不受限制的资本流动。跨国金融资本的崛起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该党批评经济全球化损害了人的政治权利、劳动的权利和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主张加强对国际资本的监督和调节，认为对付自由主义的唯一办法是在全球建立经济规范、社会准则和生态标准。

2. 继续坚持社会党的自由、平等的传统价值观。

该党认为，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寻求另一种生产、分配和消费方式、维护社会公正和人类尊严这些曾造就社会主义

运动的观念，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主张维护公正、民主的欧洲发展模式。法国社会党新政府注意优先解决民众最关心的社会问题，照顾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通过增加政府投入和开拓就业思路特别是增加社会服务性工作的办法来优先解决青年就业，推出 35 万青年就业计划；提高最低工资、宣布从 2000 年起实施每周 35 小时工作制；改革税制，向贫困阶层倾斜，增加对大企业和高收入者的税收；维护外国移民合法权益，推出较为宽松的新国籍法和新移民法。

3. 主张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益要两者兼顾。

该党认为一个社会和一国经济仅仅依靠市场调节是不够的。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就业不稳定和工资下降，该党主张把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该党要建立的社会模式是反对自由主义，把民主和市场、团结与效益结合起来。社会党政府在具体操作上，把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和凯恩斯主义及货币供应学派的观点结合起来，既坚持再分配的作用，又强调生产的重要性，经济上坚持量入为出，注意福利政策的落实不能过度增加国家财政负担，继续进行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并通过增加企业税收和合理分配资金的方式压缩财政赤字。

4. 坚持并调整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

该党明确批评右翼政府的私有化作法，认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家的干预仍是不可少的，提出社会契约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标志，国家应该通过发展公共部门、促进劳资谈判等来进行干预。应该保持公共部门的国有性质，并将其作为该党建设新型共和国纲领的中心内容。该党认为，国家应主要在投资、培训以及加强调控、促进合作和推广新技术方面发挥作用。同时该党又指出，用新的办法发展和保护公共部门具有战略意义。强调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仅仅由国家来掌握企业的

体制已经不能继续存在，应该调动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两方面的积极性。在私有化问题上，社会党新政府采取了灵活和慎重的态度，既有限度地开放法国电信公司、法国航空公司、汤姆逊公司等国有大公司的股份，增强企业实力，又通过政府保持对企业的某些监控，以维护国家的利益。社会党布雷斯特代表大会称这是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合作的一种形式，可以促使法国的工业发展更加适应欧洲建设的需要。

5. 继续坚持民主和多元化的原则。

该党对内要求加强议会的立法和监督作用以及公民的民主权利，主张将总统的任期由 7 年改为 5 年；进行司法改革，加强司法的独立性，保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严格限制内阁成员和议员的兼职；大力提倡男女平等。对外把人权与和平和发展并列，作为左翼政府对外政策的三大基石。

6. 在对外政策方面，基本保持连续性。

继续坚持欧盟建设和如期向欧元过渡，推动欧盟东扩，发展法俄特殊伙伴关系；对美的霸权行径说“不”，在美拒绝北约南欧司令一职交欧洲人担任的情况下，社会党政府与总统共同决定中止法国重返北约的进程；积极调整对非政策，根据国力削减驻非部队，同法语非洲国家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并加强对南非等英语非洲国家的工作。

法国社会党执政半年多以来，形象得到改善，赢得了一定的好评，特别是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支持，其谨慎、稳重的变革也为多数民众所理解和支持。此外，1997 年以来外部经济环境明显好转，法国社会经济发展开始复苏，这为法国社会党的改革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条件。但从长远看，社会党仍面临很多困难，如何在满足选民的要求的同时又跟上国际经济发展的步伐，这需要法国社会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继续进行不断的探

索。

（四）法国社会党与欧洲建设

欧洲一体化建设一直是法国社会党的重点政策之一。密特朗在1989年11月欧洲议会的讲话中强调，“一个强大的、组织严密的共同体将是整个欧洲成功的主要因素。”他积极推动1992年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实行共同的农业政策改革，促进工业、外贸、文化更加统一的政策。密特朗主张与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相适应，必须建立起欧洲政治联盟，建立一个“政治的欧洲”，制定和实施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并最终建立西欧独立防务体系，使欧盟在世界多极化格局中成为独立的一极。

法国社会党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反应迅速，密特朗1989年10月称“我们正在目睹本世纪出现的决定性事件，它预示着未来的新时代”。密特朗认为苏联东欧发生的事情“震动着我们的思维方式，改变着我们的习惯”。法国社会党认为苏联的解体是民主和自由的胜利，但也对民族主义的抬头表示担忧。

东欧变化对法国最大的直接影响莫过于柏林墙的倒塌和两德的统一了。两德统一后，德国在欧洲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日益引起法国舆论的不安和忧虑。密特朗认为德国统一使欧洲一体化建设更加紧迫。在推进欧洲建设的目标中，密特朗把法德合作作为轴心，努力加强两国在各个领域里的合作。密特朗甚至在1994年邀请有德国部队组成的欧洲军团参加法国国庆阅兵式，引起极大反响。

密特朗逝世后，法国社会党继承了他的遗志，继续坚持欧盟建设和如期向单一货币过渡。同时该党在1997年立法选举

竞选中照顾到近年来公众舆论对现行单一货币进程的疑虑和抵触情绪，提出建设社会和公民的欧洲，强调欧洲建设要注意解决社会问题；还提出以“团结和增长公约”取代惩罚性的“稳定公约”；反对以德国马克为核心，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也应首批加入单一货币联盟；设立“欧洲经济政府”来制约欧洲中央银行的作用；欧元对美元的比价不能过高。在法国社会党新政府的积极推动下，1997年欧盟新签署的《阿姆斯特丹条约》中写进了维护民众福利的社会条款，同年11月欧盟召开特别首脑会议，专门研究欧洲的就业问题。一时，德国等一些欧盟国家开始对法国社会党政府推进欧洲建设的意愿产生了怀疑。在此情况下，法国社会党及时重申加强欧洲联合、维护欧洲独立、保持欧洲强大力量、加强欧盟在外交和防务上的自主权的一贯主张，并以在1997年6月执政后数月内就将财政赤字从1996年占国内生产总值4.1%压缩到1997年底约3%、按时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趋同标准来证明了法国社会党坚持欧盟建设的决心。

（五）同法共及其他政党的关系

法国社会党在历史上曾于1936年人民阵线时期、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时期和二战后初期，三度同法国共产党合作。1971年社会党重建时，密特朗曾指出，社会党同共产党虽然不代表同一种“政治哲学”，但“代表着同样的利益、同样的社会阶层和同样的劳动者”。1972年法国社会党同法共和左翼激进党人运动建立“左翼联盟”，发表了《共同施政纲领》。1981年法国社会党上台后吸收法共参政。后法共由于反对社会党政府推行的紧缩政策，并指责社会党削弱法共力量，而于1984年退出政府，两党联盟破裂。左翼力量的分裂不仅严重削弱了法

共的影响，也使社会党在同右翼政党斗争中孤立无援。80年代后期两党均表示了加强相互关系的愿望，但未有实际行动。1993年社会党下台后更加认真考虑同法共加强合作的问题。

1997年在立法选举中，法国社会党就竞选纲领先后同法共签署共同声明，同绿党签定竞选协议，求同存异，形成合力，共同赢得了选举。6月社会党再次吸收法共入阁参政。加入社会党新政府的还有公民运动、绿党和激进社会党人。目前法国左右翼“共治”，社会党在国民议会中议席不过半数，只有联合其他左翼政党和组织，才能巩固和扩大左翼政府的政治基础，推行社会党的左翼政策，同右翼势力抗衡。因此，谋求缩小同法共等左翼组织的政见分歧、进一步协调行动、维护多元化的左翼多数派，成为法国社会党和若斯潘政府的基本政策之一。1997年11月十月革命80周年之际，法国出版了一本名为《共产主义黑皮书》的书，该书恶毒诋毁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一名右翼议员在议会拿着这本书质问若斯潘，是否还想同法共联合执政，若斯潘回答道，“共产党人也曾为捍卫自由而斗争，我为在我的政府中有法共人士而感到骄傲。”在社会党布雷斯特代表大会上，法共全国书记罗贝尔·于到场，受到热烈欢迎，这是两党1920年分裂以来的第一次，再次突出体现了社会党同法共之间关系的改善。目前以社会党为首的左翼联盟中的各党虽在国内外许多问题上特别是欧洲建设问题上仍存在许多分歧，但仍能以大局为重，和衷共济。

（六）在国内和社会党国际中的地位 and 影响

法国社会党是法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曾多次执政，但在80年代之前，多数情况下处于在野的地位。它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始于1936年，当时它在法共的支持下组

成了人民阵线，这是法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左翼政党执政，对国内、国际都产生过较大影响。战后从1944年至1958年，社会党在法国第四共和国时期的27届短暂政府中，参加了21届政府，并在其中5届政府中任总理。社会党于1981—1986年和1988—1993年两度执政，影响迅速扩大。1986—1988年形成密特朗总统和希拉克总理左右翼“共治”的政权。1988年社会党在立法选举中获得34.71%的选票和国民议会575个议席中的279席，重新执政，结束了“共治”时期。90年代初期，社会党由于不能解决国内社会经济问题，在民众中的影响急剧下降，1992年3月在大区议会选举中得票率下降为18%，使右翼在全国22个大区中的20个获得多数。1993年3月社会党在立法选举中得票17.59%，所获席位在577个议席中骤减至56席。到1994年欧洲议会选举，该党仅得票14.48%，为1971年以来最低，该党影响跌至谷底。

1993年右翼执政后重蹈社会党的覆辙，执政时间不长就开始走下坡路，而社会党则在悄悄地恢复力量。1995年5月法国举行总统选举，若斯潘代表社会党出阵同希拉克和巴拉迪尔竞选，最后虽败在希拉克手下，但得票率高达47.33%，出乎人们的预料。1997年5月提前举行立法选举，法国社会党在第一轮选举中获选票约630万张，占25.5%，获议席242个，是1993年的4.3倍，再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随后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若斯潘出任政府总理，前第一书记洛朗·法比尤斯出任国民议会议长，新内阁中有18名社会党人士。1998年3月在大区议会选举中，社会党同法共等左翼政党联合共得票约35.3%，在12个大区获得多数，社会党当选大区议员396名。社会党在同时举行的省议会半数选举中得票24%，当选省议员647名。选举使社会党等左翼政党扩大了在地方政权

中的地位和影响。此外，社会党现有参议员 67 名，在地方政权中还控制 119 个市镇，有市镇议员 33218 名。

法国社会党是社会党国际和欧洲社会党的重要成员，法国社会党原第一书记、现任全国局成员皮埃尔·莫鲁瓦 1992 年出任社会党国际主席。若斯潘现在仍然担任社会党国际副主席和欧洲社会党副主席。此外，该党在欧洲议会中现有 15 名议员。

（七）法国社会党的组织状况

根据法国社会党 1997 年公布的材料，该党 1905 年成立时有党员 34688 人，1946 年达到历史最高峰，逾 35 万。1971 年新社会党成立时有党员 80300 人，至 1980 年执政前党员人数为 189580。1981 年执政后，党的力量有所发展，党员最多时为 1982 年的 213584 人。1989 年还保持在 204172 党员。但进入 90 年代以后，随着党的影响的下降，甚至许多党员也弃之而去，使党员人数逐年减少，到 1995 年减至 93603 人。1996 年又回升为 111536 名党员。党员以中层职业者、工人和雇员为主。

以多元化为基本原则的法国社会党在其党章中规定，党内允许存在不同的思想流派，但不允许存在有组织的派别。中央机构根据各思想流派的力量按比例选举产生。在中央通过决议后，少数必须在行动上服从多数，但在下届代表大会上仍允许提出新的争论。

长期以来，法国社会党党内的派系之争一直影响着该党的建设。法国社会党内在 80 年代主要有密特朗派、罗卡尔派、舍韦内芒派和莫鲁瓦派。每一派都有自己的历史和领袖，派别之间存在着政治和战略上的分歧。密特朗派是前共和制度大会党；罗卡尔派是前统一社会党；舍韦内芒派是前工人国际法国

支部青年派；莫鲁瓦派是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传统派。在战略问题上，主要是罗卡尔派与其他各派的分歧，罗为党内的温和派。在对外政策上，主要是舍韦内芒派与其他派别的分歧，舍派思想比较激进，反对欧洲联合。舍派已于 1992 年退出社会党，另组公民运动。1990 年在雷恩代表大会上，若斯潘和法比尤斯之间争取党内继承人宝座的权力之争公开化，导致了密特朗派的分裂。90 年代以来，社会党第一书记频繁易人，党的建设处于不正常的状态。

近年来，法国社会党内加强团结的呼声日益高涨。1995 年若斯潘出任社会党第一书记以来，注重团结各派力量，若斯潘在党内的地位加强，党内的矛盾有所缓解。1997 年 11 月在布雷斯特代表大会上，除了观点激进、反对欧盟建设的左翼社会党人外，其他各派均高举团结的旗帜，一致拥护代理第一书记弗朗索瓦·奥朗德提出的动议，奥朗德本人也以 91% 的高票率当选为社会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第一书记，为法国社会党的历史上仅见。

由于历史的原因，法国社会党党内的派系依然存在。目前在该书书记处 26 名成员中，若斯潘派 6 人，法比尤斯派和奥布里派各 3 人，罗卡尔派、莫鲁瓦派和德洛尔派各 2 人，埃马纽埃利派和梅尔马兹派各 1 人。

法国社会党组织机构为全国代表大会，一般每两年召开一次。该党还不定期召开全国大会。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是全国委员会（本届正式委员 305 名，候补委员 106 名）、全国局（55 人）、全国书记处（26 人）。党的第一书记原由全国委员会选举产生，1995 年后为加强党内民主，改由全体党员选举产生。党的基层组织为大区委员会、省委员会和区委员会。该党布雷斯特代表大会决定在全国委员会下增设一个由各界党员和社会

团体代表组成的社会、经济委员会作为全国委员会的咨询机构。

该党下属的群众组织有：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社会主义大学生运动。此外，该党下属还设有饶勒斯基金会、社会主义学术研究所。

党的刊物《社会党人周刊》，《新社会主义评论》双月刊。

附：法国社会党领导人简历

(1) **利奥内尔·若斯潘** 法国社会党领袖，现任法国政府总理。1937年7月12日出生于法国巴黎大区一个收入微薄的教员家庭，其父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成员。若斯潘1956—1959年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1960年曾加入统一社会党，但很快失望退出。1965年毕业于以“政治家的摇篮”而著称的国立行政学院后，在外交部供职。1970年离开外交部到大学教授经济学。1971年加入社会党，很快得到密特朗的赏识和器重，两年后进入执行局（相当于政治局）并担任全国书记。1981年密特朗当选总统后，若斯潘接任社会党第一书记及社会党国际副主席。1984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1988年出任教育部长，不再担任社会党第一书记。1993年社会党下台，若斯潘也落选国民议会议员，仅保留了上加龙省省议员职务。在社会党80年代执政后期，若斯潘批评社会党脱离民众的政策，同密特朗拉开了距离。1995年5月参加总统竞选，败给希拉克，但若斯潘在党内的影响迅速上升。同年10月当选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此后，若斯潘潜心制定党的新政策，加强党的建设和团结，终于带领法国社会党走出逆境，重新执政。1997年6月出任左翼联合政府的总理。若斯潘曾先后于1981年和1986年两次应中国共产党邀请访华。

(2) **弗朗索瓦·奥朗德** 现任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1954年8月出生於法国鲁昂市，其父为医生。奥朗德曾先后就读于著名的法国商学院、巴黎政治学院和国家行政学院。1981年任总统府专员。1983年在密特朗的推荐下任政府发言人办公室主任。1988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起点。在当时法国社会党内部派别纷争的情况下，奥朗德属德洛尔派，他应德洛尔的要求，于1992年成立了“目击者俱乐部”，这一俱乐部集中了年轻的社会党人，他们在后来大都进入了若斯潘政府内阁。1994年12月奥朗德任法国社会党全国局委员。1995年10月任该党发言人、书记处书记，为该党此后赢得立法选举作出了贡献。1997年11月当选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奥朗德积极拥护和贯彻若斯潘的政策主张，他一方面维护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强调社会公正，另一方面又认为应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主张推进社会党的革新，建设一个开放和有活力的党。他注意加强党内团结，不搞自己的派系山头，性情温和，易为党内各派所接受。

三、意大利左翼民主党及其“新社会主义”

意大利左翼民主党（简称左民党）现为意大利政坛第一大党，有党员近80万，众议员138席、参议员68席（1996年4月大选结果）。1996年5月联合其他中左翼组织和人士联合执政，在现政府中拥有1名副总理、9名部长、22名副部长，以及169名大中城市市

长职位。此外在欧洲议会有议员 15 名。总书记达莱马现任社会党国际副主席。

意大利左民党是 1991 年 2 月由意大利共产党易名而来的后续党。它由共产党转变成社会民主党，并非一日之寒，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里及表的渐变过程。党内不赞成这一转变的共产党人随后另外组成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

（一）意共改名易帜，最终完成向非共产党的演变

1991 年 1 月 31 日—2 月 4 日，意大利共产党在里米尼召开二十大，与会代表 1547 人（其中 300 人来自党外“左翼俱乐部”），另有世界 50 多个国家的 100 多个政党和组织的代表应邀出席了大会。大会以 807 票赞同、75 票反对、49 票弃权、328 人缺席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放弃意共现有名称及标志，同时宣告成立“意大利左翼民主党”。意共二十大标志着一个有着 70 年光荣历史的共产党最终完成了向非共产党类型的左翼政党的演变。大会经讨论还通过了新的临时党章，并选出由 547 人组成的全国委员会（相当于过去的中央委员会）和 71 人的中央保障委员会。大会结束后，新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了 118 人组成的全国领导机构，并经两轮投标选举奥凯托担任左民党第一任总书记。前党外左翼代表人物罗多达当选为左民党主席。

意共改名为左民党，标志着党的性质已发生质的变化，在社会民主党化的道路上实现了“真正的飞跃”。

首先，在思想上，左民党已实现了“意识形态的非共产主义化”。该党宣称，“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失败”，“以共产主义名

义建立起来的专制制度已经破产”；宣称要“超越共产主义的历史经验”，把“自由、平等、团结”作为自己的“根本价值”，实现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即新的民主社会主义。为了表示与共产主义传统划清界线，左民党临时党章删除了意共原党章中有关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和有关列宁、葛兰西、陶里亚蒂理论的段落，对上述人物只字未提。而且决定尽快申请加入社会党国际。

第二，在政治目标上，左民党不再主张“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它虽然仍认为“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胜利”，“对工业化社会的生产、消费方式的批判，越来越表明是有历史根据的”；仍表示要“反对剥削”，争取“使人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各种压迫和统治形式中解放出来”；但是，该党实际上已不再把“超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强调对西方现行制度的改造“只能在民主的范围内”、“以民主的、强有力的改良主义”的手段来进行；认为建立社会经济新秩序的问题“已不再是从一种特定的制度向另一种特定的制度过渡”，而是一个对现行制度和社会的“长期的民主化改革”的问题。它宣称“民主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左民党的目标就是“逐步实现政治、经济和公民社会的民主化”。

第三，在组织制度上，左民党宣布“同共产主义的传统决裂”，彻底放弃民主集中制，组织结构上更趋松散化、地方化。该党把“多数原则”作为党内生活的准则，认为党内“政治文化、哲学观念、宗教信仰的不同将丰富党的思想财富”，“党内多元主义”有助于扩大与社会的多渠道联系。因此，该党是一个“向各种思想文化流派开放的多元化的党”，党内允许不同思想政治立场及各种派别合法存在，允许各派建立活动中心，创办刊物，组织大规模集体性文化政治活动。左民党还对党的

组织系统作了重大调整，将意共原来的总支部改称为基层组织，增设了城市联盟，并把大区委改成大区联盟。新党章加强了大区联盟的权限，在大区政治、行政选举中允其使用自己特有的竞选名单、名称及标志，党的大区联盟有权制定本区的党章，建立自主的组织，与中央组织签署政治和纲领公约。另外，妇女党员也可成立自主的组织机构和活动中心。

左民党成立后，党内不同派别间的分歧和斗争依然存在。二十大自始至终充满矛盾和斗争。出席大会的代表分为以奥凯托为首的多数派（占 67.7%）和两个少数派（占 26.6% 和 5.7%）。这 3 派曾在建立新党、拟定新党章、选举总书记等问题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与较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原少数派中以科苏塔为首的“强硬派”在大会进行期间，因坚持反对改变党名和党的标志，愤然离开会场，并于不久后成立了“争取共产主义重建运动”，最终采取了公开决裂的行动。

（二）由意共演变成左民党非一日之寒

意共是一个有着 70 年光荣历史的共产党。1921 年意大利社会党中的“共产主义派”组建成意共。意共的第一任总书记波尔迪加犯有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后来葛兰西掌握了领导权，党的工作有了改观。在意共三大上彻底清算了波尔迪加的错误，形成以葛兰西为核心的领导集团，走上了比较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1926 年葛兰西等一大批领导人被捕后，意共从此转入了地下斗争时期。1931 年流亡国外的领导人在德国科隆召开意共四大，批判了党内右的倾向，决定采取公开与秘密斗争相结合的方式，陶里亚蒂进入最高层领导。1934 年意共同社会党签定了反法西斯统一行动协定。二次大战爆发后，意共同社会党、天民党一起成立了民族解放委员会，并组织大规模

模的罢工和示威游行。1943年墨索里尼被捕和德国占领意大利中北部以后，意共转入抗击侵略者的斗争，并着手组建游击队，这支队伍最多发展到近17万人，成为抵抗法西斯运动的主力军。1944年陶里亚蒂从苏联回国，主张建立以抗击外来侵略为主要目标的民族团结政府。终于在南部萨莱诺成立巴多里奥政府，陶里亚蒂出任不管部长，史称“萨莱诺转折”。关于党的性质，开始提出意共是工人阶级和群众性的党。在抵抗运动的烈火中，意共的力量迅速壮大，至1945年底党员人数猛增到177万之众。

意共还是一个多产“革新”理论的党。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在罗马召开的意共五大上，陶里亚蒂提出了“结构改革论”。几十年来，意共不断提出各种“改革”理论。除了40年代提出的“结构改革论”，还有50年代“党的革新理论”，70年代的“欧洲共产主义”、“历史性妥协”，80年代的“民主替代”、“强有力的改良主义”，以及后来的“民主即社会主义”等。90年代初苏东剧变之风由东方吹向西方时，以奥凯托为总书记的意共决定改名易帜，与共产主义划清界限，完成了向非共产党演变，这决不是偶然的事情。可以说，由意共演变为左民党并非一日之寒，而是几十年来这个漫长的、由里及表的渐变过程的继续和发展。

1. 陶里亚蒂的“结构改革论”以及党的“革新”理论。40年代，陶里亚蒂提出“结构改革论”的同时，宣布意共游击队交出武器，走合法民主斗争的道路。这是意共和平议会道路的正式开始。1945年意共五大对党的性质和斗争目标都作了本质性的修改，把“无产阶级最先进的组织”改为“劳动者组织”；删除了党章中关于“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在

1945年意共五大上陶里亚蒂首次当选为总书记。在1946年决定政体的公民投票中，意共得票率为18.89%，共获104个议席，成为仅次于天民党和社会党的第三大党。1947年在国际冷战的大气候下，意共和社会党被排挤出政府，自此意共沦为在野党。

50年代，意共对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研讨，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党的革新”。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在同年12月意共八大上，确立了以和平民主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这一时期，陶里亚蒂的立场和观点是：(1) 完全支持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时期的错误所进行的批评和二十大所提出的路线，并认为大会不足之处是对错误根源的分析不够。(2) 完全赞成“战争不是可以避免”的观点。意共主张争取共处与缓和，放弃组织集团；在世界各地撤除国外军事基地；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禁止原子武器和实行普遍裁军等。(3) 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苏联的经验，不再是“独一无二”的，并不包含能够解决今天一切问题的方针。现在有可能采取民主的方式甚至采取议会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制可以而且必须以新方式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中央集权制并不是非采取不可的一种形式。(4) 关于国际共运中各党之间的关系，陶里亚蒂先是提出“单一中心”已经过时，应采取“多中心”的形式；后又认为多中心的组织形式同各党的充分自主不相容，“双边关系”才符合自主的需要。在双边关系下，党与党应互相了解和互相尊重，允许友好批评，但不许攻击和干涉他党内部事务或破坏其内部团结。各党间的团结应是“差异中的团结”。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应承认社会主义的发展在原则上要以不同的道路为基础，小国的主权不能由于

大国的干涉和压力而受到限制。为了加强运动的团结，可举行多边会晤研究重大问题，借鉴彼此的经验，但不作出约束大家的决定。社会民主主义的或者民主主义的组织，只要不反共，都可以参加会晤。这将是克服国际工人运动分裂的一个步骤。陶里亚蒂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后来隆哥和贝林格等推行的“新国际主义”的先导。

2. 贝林格倡导的“欧洲共产主义”、“历史性妥协”和“民主替代”。在1969年意共十二大上隆哥当选为总书记，贝林格为副书记。但隆哥继任总书记后并未形成一个时代，是一个事实上的过渡阶段。1972年3月意共十三大选举贝林格为总书记，隆哥为主席之后，意共正式进入了贝林格时代，直至1984年贝林格逝世。

1973年秋智利发生右翼政变，阿连德社会党政府被推翻，这一震惊世界的事件引起意共党内的极度混乱和恐慌。如何从中吸取教训，避免在意大利重演这种事件，重新评价“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成为意共的紧迫课题。贝林格大声疾呼进一步扩大政治联盟和社会联盟的必要性。认为推进政治力量之间的缓与共处，可以缩小帝国主义干涉的可能性；只有左翼政党和左翼力量单枪匹马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团结广大中等阶层。即便是左翼政党获得51%的选票，也不能单独保证左翼政府的生存和正常运转。据此，意共主张与天民党之间实行“历史性妥协”。贝林格认为，基于意大利形势的严峻性，右翼的冒险性，甚至搞政变的危险性日趋严重，因此在意大利实现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不仅是“左翼力量”）的伟大“历史性妥协”的时机日渐成熟。此理论一经提出，在党内外引起颇大反响，党员对同天民党的关系从对立变为妥协不甚理解，天民党和社会党也怕意共的新策略威胁到他

们的利益。然而随着政局的不稳和经济的不景气，旨在团结各方力量的“历史性妥协”逐渐被各方所理解和接受。1975年意共召开十五大，正式通过了“历史性妥协”战略。

贝林格认为任何政治力量都无法单独解决欧洲的问题，1974年1月他在布鲁塞尔西欧共产党会议上指出，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必须展开讨论，采取联合行动，并同其他民主力量进行对话。贝林格还指出，意共和西欧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前景和特点方面已基本取得共识：社会主义是民主的不断发展和充分实现，包括承认保障个人自由和价值，包括实行多党制、工会自主、信仰自由等原则。1976年贝林格与法共马歇和西共卡里略多次进行会商，最后把上述原则作为西欧共产党的行动准则，后被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而贝林格领导的意共则是“欧共”的创始者和象征。按贝林格的说法，“欧洲共产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争取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应该在充分扩大民主和各种自由中进行。当时“欧洲共产主义”是作为既不同于社会党的“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第三条道路”而提出来的。对此，1979年意共十五大又作出了进一步的阐述。这次大会认为，马、恩、列的思想不是教义体系，单提“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体现整个意共的理论与思想宝库的丰富内容。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列宁和其他工人运动理论家和领袖们的思想，尤其是葛兰西和陶里亚蒂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一向是意共分析形势和制订政策的根据。因此大会将马、恩、列与意共领导人拉布里奥拉、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等的思想并提，取消了党员必需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的规定，改为要研究意共和整个工人和革命运动的历史和思想财富等。大会还认为，十月革命的经验是有效性和局限性同时并存的，十月革命的模式不适合欧洲和意大利，实现社会

主义不必把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化；但是社会民主主义并不能使社会脱离资本主义逻辑。因此，“欧洲共产主义”是既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第三条道路”。

在 1979 年 6 月大选中，意共的选票从 1976 年的 34.4% 降到 30.4%。党内开始批评最高领导人的政策，在 7 月中央全会上，“历史性妥协”不再提及。1980 年 11 月 28 日，贝林格在萨莱诺讲话，提出“团结全国民主和左翼力量，争取替代以天民党为中心的政权体系”，这就是有名的“民主替代”战略，它代替了前一时期的“历史性妥协”战略，有人称贝林格讲话为第二个“萨莱诺转折”。1983 年 3 月 2—6 日意共在米兰召开十六大，通过了“民主替代”战略，确立了争取由意共、社会党以及其他民主进步力量联合取代以天民党为中心的政权体系的战略。关于党的建设，大会提出“要建设一个开放的现代化的党”，宣布民主集中制不是意共的意识形态特征，而只是党内的生活方法。

1984 年 6 月 11 日，贝林格倒在欧洲议会竞选讲台上以身殉职后，意共上层领导集团措手不及，匆忙推举纳塔为总书记，出现了党内领导危机，这种危机一直持续到意共改名和奥凯托辞去总书记职位。原是保障委员会主席的纳塔接替贝林格后，完全执行贝林格的纲领和路线。在贝林格逝世的当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意共意外地获得了 33.3% 的选票，首次超过天民党而位居第一。当然内中有同情票的因素。

3. 奥凯托提出“新进程”和“强有力的改良主义”，为以后的“转折”打下基础。意共在 1988 年的地方选举失败以后，纳塔辞职，奥凯托继任总书记。奥凯托公开提出：“意共寻求的不再是第三条道路，而是欧洲左翼的道路，也不是寻求共产党的特性，而是追求欧洲左翼的特性和作用”。与此同时，意

共又对社会主义在理论上作了新的描述。意共宣称不赞成生产资料全部国有化的做法，发达国家超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像俄国和中国那样经过痛苦的决裂，而是通过一些经济形式的全面结合，其中某种生产方式可以占主导地位。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案的性质已发生变化，再也不可设想以国际大冲突促成或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争取和平与缓和的斗争，已成为任何进步运动的有机部分。在这个前景下，同社会党和其他左翼力量的团结则是根本性的。在1989年3月意共十八大上，奥凯托依据这些思想，概括地提出“新进程”和“强有力的改良主义”。

所谓“新进程”，即认为欧洲工人运动应成为建立“进步新边疆”的主角，“不应把社会主义视为制度，视为历史规律”，社会主义能够通过最大限度地扩大民主来实现。重申了意共的“民主替代”战略。认为意共已进入争取“民主替代”反对派的阶段，决定建立影子内阁，争取团结一切世俗和天主教的民主进步力量，特别是要同社会党和各种群众运动组成广泛的“民主替代阵营”，推进国家改革和解决重大社会问题。

所谓“强有力的改良主义”，即主张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强有力的改良。它主要包括：提高妇女地位，克服男女在工作方面的差异，在各种机构中男女代表均衡；扩大公民的权利，克服国家包揽一切的观念，对斯大林主义进行批判性反思；强调人民享有尽可能充分的权利是完备民主的条件；进行国家体制改革，改组国家的机构，改革选举法，实行议会一院制，扩大各级议会的权利，使地方享有政治、行政、财政和组织方面的自主；实现欧洲统一，共同体机构民主化；进行新闻、教育改革；解决就业问题，整顿环境和经济，使经济发生“转折”；实行经济民主，企业民主化，改革社会福利制度，重新分配收

入、财富和财产，打破垄断集团对知识和信息的垄断，工人直接参与管理企业等。此外，十八大对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也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包括取消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等。

在苏东巨变风暴的冲击下，奥凯托首先提出为了党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实行政治上的根本转折，甚至改名易帜和参加社会党国际。在涉及改变党的名称和性质重大问题上，党内分成了几个派别，其中包括以主张“转折”的奥凯托为首的主流派、反对改名的共产党人派以及改良派和左派等等。各派之间斗争十分激烈。但是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奥凯托主流派占居上风，在1990年的十九大上，在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通过了主流派的开始筹备组建新政治组织的建议。但是改变党的名称并未形成最后决议，直至1991年意共二十大上通过了改名易帜的决议，才由意共改名为左翼民主党。

坚决反对改名和改变党的性质的共产党人派愤然退出会场，先是成立争取重建共产主义运动，后又在1991年12月一大上正式定名为重建共产党。易名为左翼民主党的意共，在经过党内斗争导致的严重分裂后大伤元气。党员人数和选票都降至历史最低点，因1994年左民党在大选和欧洲议会选举中失利，奥凯托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由达莱马接任。到这个时期原意共的演化过程已基本完成。

（三）现行理论和政策主张

左民党成立以来，已经历了两任总书记的领导，先是被称为“转折之父”的奥凯托，后是现任总书记达莱马。他们在理论观点上基本一致，但又各有所侧重。

1. 奥凯托的“新社会主义”。早在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以

前，特别是在意共改变名称和特征的过程中，奥凯托就在不同场合陆陆续续谈到他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新构想。1993年他在该党《团结报》上发表题为《2000年人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性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思想，并正式冠之以“新社会主义”的名称。从根本上说，奥的“新社会主义”其实并不新鲜，只不过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当代条件下的翻版和发展而已。

首先，奥的“新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基本纲领，声称应从历史角度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重新思考。他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基本纲领是要通过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通过有意识的经济计划，来达到消灭剥削的目标。围绕这一目标，历史上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不同派别在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上虽有过激烈争论，但至少在初期，它们在这一根本目标上还是一致的。奥宣称历史现实已表明，“那种力图通过专制集体化来改变生产资料所有者与非所有者之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方案，那种力图通过取消市场、对整个经济进行集权化管理来解决剥削及异化问题的思想，已经遭到可悲的失败”。“现实社会主义”的衰落和“彻底失败”，使上述社会主义基本纲领的核心内容受到了“根本的置疑”，并对社会主义思想本身构成一种“几乎是不可挽回的打击”。

与此同时，奥也表示，“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并没有使我们面临社会主义价值和社会主义目标的荒漠”，也不意味着左翼力量不再需要社会主义思想了，因为先前导致社会主义运动诞生的那些问题，大部分至今仍未解决。问题是，目前必须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重新思考，重新确定其历史位置。

其次，奥的“新社会主义”强调，新时代的社会主义不是

力求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而是要通过对现存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进行改革。奥认为，本世纪一个悲剧性的特点，就是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相互对立，西方为了自由而忽视平等；东方为了平等而忽视自由。“新社会主义”的目标既不包括在“自由资本主义”之中，也不包括在已经死亡的“专制集体主义”之中，而是要在不断调整资本主义现存社会关系中实现平等与互助的价值。奥称，斯大林主义最严重的历史错误之一是造成了这样一种幻觉，似乎使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与原有整体相分离，便是实现各国人民和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确立世界新秩序的道路。戈尔巴乔夫主义虽然因提出“相互依存”的主张而在这一点上带来了观念上的革命，但它本身仍包含着一个明显的思想，即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仍看成是历史岔道上完全对立的、自成系统的两种制度。奥直言不讳地宣称，“社会主义思想现在已不再体现为人类在摆脱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所应进入的下一一种社会制度”，即不再追求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奥甚至进而认为，对社会主义进行重新思考就意味着“应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有效的进程，而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对存在局限、矛盾和不平衡的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不断改革”。奥主张，现在应摒弃任何策略性妥协，把社会主义思想同民主思想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视为不断扩大民主、扩大公民权利、实现彻底民主化的永久性运动，以便使人从统治状态下解放出来。

再次，奥的“新社会主义”强调在新时代要对社会主义最高纲领进行“彻底修改”，通过逐步的社会化和利用市场来实现指导社会经济发展、扩大公民权利和民主的目标。奥称，通过取消市场和主张全面国有化是不能解决剥削和异化问题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富有生命力的那一部分内容不是把人们导

向完全的国有化，而是导向社会化。社会主义思想与在彻底的民主化的进程中逐步实现社会化的思想恰恰是结为一体的。社会主义的新方案应该符合下述必不可少的需要，即利用市场机制来达到重新调整人与人关系的那些结构性目标。因此，左翼力量不应把市场看作是主宰一切的场所，而应将市场看成是可以驾驭、可以引导的，要扩大市场主体的范围，并在经济民主的范围内扩大劳动者的参与、监督权利。奥认为，把民主问题与社会问题结合起来，是一种强调公民权利的新战略、新文化。应该提出包括经济民主、国家改革、公私关系改革在内的各种根本性、结构性的目标，力求不断超越现存社会关系。如果说左翼力量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分别把民主问题和社会问题作为自己的中心课题的话，那么在 21 世纪，左翼则应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并把它们与妇女解放、环境保护、文明化进程、南北冲突的解决及建立世界政府的前景联系到一起。

2. 达莱马强调“民主即社会主义”。达莱马在 1994 年继任总书记之职后，理论上沿袭奥凯托时期的既定方向，路线上进一步向中间摆动，舆论界称之为“自由主义革命”，但实际上也难以完全失去其左翼特性。1995 年 7 月 6—8 日左民党在罗马举行“专题性的纲领代表大会”，集中研究新形势下左民党的方针政策，尤其是结盟政策。为进一步拓展联盟的领域，左民党更加把目光对准中等阶层，尽量争取除右翼以外的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达莱马在一些场合，有意强调消除左民党给人残留的“后共产主义”形象，让人相信它已彻头彻尾民主化了。党章删除了“源于意大利共产党文化和政治传统”、“反对压迫和剥削”之类的句子，取消了党徽中的镰刀锤子等最后一丝共产主义色彩和马克思主义痕迹。1997 年左民党二大通过的政治文件《团结和革新意大利左翼》中说，“一个想真正为

社会公正进行严肃斗争的左翼，就必须承担起改革国家、治理公共财政、为公共权利和市场制定新规则的任务。从这一意义出发，说‘自由革命’是正确的。”但是，左民党淡化左翼特性向中间摆动，也受到种种牵制，如党内的“共产党人派”力争保留所剩不多的“民主共产党”特征。达莱马的基本理论与奥凯托的“新社会主义”是一致的，仍强调“民主即社会主义”。所谓“民主即社会主义”，就是认为建立社会主义新秩序的问题，已不是“从一种特定制度向另一种特定制度的过渡”，而是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改造，就能把人从目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所产生的压迫和统治中解放出来。因此，民主不再是手段，民主就是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就是不断扩大民主、扩大公民权利、实现彻底民主化的永久性运动。

3. 当前左民党的纲领主张。左翼民主党自称是一个群众性的、民主的、多元的、非意识形态的左翼政党，它把民主、自由、人权、平等作为自己的根本价值观念，主张建立公正的、个人自由发展的社会。认为必须把平等思想同自由、民主的要求结合起来，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民主化改革，达到实现新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目标。主张推行“新社会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理论。

在民主人权方面，认为各国政党之间不仅应进行对话，而且可以进行公开的批评。这不再是干涉别党的内部事务，而是应尽的义务。

在经济方面，反对右翼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张以注重质量的经济发展模式取代以数量为主的旧有模式。重新调整国家与个人、公与私之间的关系，在承认市场作用的同时，促进国家发挥应有的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宏观调控职能；削弱非生产性的金融寡头集团的权力，扩大经济民主，使劳动

者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正确解决意大利南北之间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严重的两极分化；改革劳动、就业、职业培训及税收制度，保障扩大就业和合理分配。

在政治方面，主张对现行政体进行深刻的改革，并在其大力推动下成立了以该党总书记为主席的两院体制改革委员会。该委员会起草的政改方案已提交议会讨论，建议变两院制为一院制，并大幅减少议员人数，实行半总统制，由选民直接选举总统。加强代议制下的政府的权威和稳定治理，提高行政机构的效率。同时扩大地方政府、特别是大区政府的权力，使地方公共机构更贴近公民，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和监督权。主张改革现行的选举制度，彻底将当前的混合选举制改为有利于聚合多数的多数选举制。认为要在意大利实行稳定治理，必须促进尽快形成两大政治集团对垒，并能轮流坐庄的政治格局。

关于国际政治，认为旧的两极政治格局已不复存在，反对一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主张推动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使欧洲成为多极世界中独立的一极发挥作用。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人类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技术发展与就业之间的矛盾，世界的核心问题是南北关系问题，必须对现存的发展模式进行根本的改造。一切左翼、民主、进步的力量加强合作与交往，争取建立更公正、更民主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确立世界南北之间新的合作关系。左民党对外奉行以非暴力为基础、以和平为直接目标的国际政策；以民主的、政治的手段公正地解决各种民族、宗教及地区冲突；积极支持欧洲政治、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全面参与欧盟建设，要求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具有公民和社会权利的欧洲。认为仅把欧洲建成经济和货币联盟是远远不够的，更应建成政治联盟，并应制定欧洲共同的外交和防务政策。呼吁警惕一个大国在世界上建立单极世界

的企图，明确表示反对军备竞赛和核试验。

1997年左民党召开二大，从当前参政的现状出发适度调整了其政治路线和领导集团。认为本世纪末世界是以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的跨国性和相互依存为特点的，只有积极参与欧盟的建设，意大利才能有所作为。从与失业作斗争到福利制度的改革，从环境保护到信息技术管理，从同有组织的犯罪作斗争到控制新的移民潮，所有这些问题是无一可以靠单个国家能够解决的。所以，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每个阶段是欧洲左翼的战略选择。如果意大利被排除出欧洲一体化和货币联盟，将是一场悲剧性的失败。

左民党在成立后的第二年就急忙参加了社会党国际，其总书记达莱马现任该国际副主席。左民党主张加强该国际的作用，使它从以欧洲和拉美地区为主向亚洲地区扩展。左民党与社会党国际联系十分密切，1997年底该党派国际书记拉涅里参加了在新德里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年会，对亚洲局势，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进行了讨论。左民党多次表示，它已不是昔日的共产党，完全是一个新党。该党还是欧洲社会党重要成员，前任总书记奥凯托任欧洲社会党副主席。

（四）组织力量及其影响

左民党是目前意大利第一大党，位于执政联盟之首，是意大利政局中炙手可热的力量。在执政联盟中居于执牛耳的地位，除占有副总理和众多部长及副部长职位外，总理普罗迪也是左民党一手扶植起来的。德国总理科尔在同普罗迪会谈之前，先与左民党总书记达莱马进行内部会晤，统一意见。在政体改革完成以后，达莱马亲任总理的可能性很大。

党的组织建制分为中央、大区委员会、省委员会和基层委

员会。从中央来说，设有由 10 人组成的政治委员会，12 人组成的执委会，125 人的领导机构，15 人的保障委员会和 5 人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近 80 万党员分布在 20 个大区委、119 个省委以及 7 个海外省委。在 1996 年 4 月的大选中，该党得票率为 21.1%，参院以该党为主体的“橄榄树联盟”获 44.1% 的选票；在众参两院分获 138 和 68 席。在 1997 年年底进行的地方选举中，左民党和中左执政联盟取得出人预料的胜利，不仅支持率大幅上升，而且罗马、威尼斯、那不勒斯、热那亚等大都市都掌握在左民党和中左联盟之手。左民党领导干部 82% 为男性，18% 是妇女，干部中大学文化的占 25%，高中毕业占 43%。多数是兼职干部，领取党内工资的人很少。党员议员每月要将议会工资的一半以上交给党，个人得到相当于五金工人的工资。

左民党在组织上一定程度继承了意共的传统，在它的周围存在着工、青、妇、合作社联盟、老游击队员协会、文体协会等群众组织。其中受其影响的意大利总工会拥有 400 多万会员，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该党在新闻舆论界的存在也不断扩展，中央电视台第三台基本由它控制，而且在罗马还开设了自己的电台。该党办的日报《团结报》是意大利最重要的报纸之一，发行量排在前 5 名。

附：达莱马简历

马西莫·达莱马，1949 年 4 月 20 日生于罗马。1963 年加入意共青联盟，1968 年转入意共。曾任意共比萨市议会党团主席、市委书记。1975 年任意共青联盟全国书记。1979 年被选入意共中央委员会，1983 年调任南部普利亚大区书记，在同年召开的意共十六大上进入全国领导机构，1986 年意共十

七大上进入书记处，1987年任组织部长。1988至1990年担任党报《团结报》社长。1991年意共改名时紧跟奥凯托路线，支持更名易帜的“转折”，并在此间实际起到主流派与反对派之间的桥梁作用。左民党成立后，进入最高决策机构——全国协调局。在1994年3月大选和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左民党失利的情况下，奥凯托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同年7月达莱马在全国委员会上击败了竞争对手韦尔特罗尼当选为总书记。达莱马的议员生涯是从1987年开始的，1992年曾任左民党众院党团主席，后连选连任至今。身为社会党国际副主席的达莱马在意大利和欧洲颇具影响，是有一定国际影响的政治家和实力人物。

四、德国社会民主党的 理论与政策调整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的第一大党。现有党员78万人，是欧洲社会党和社会党国际的重要成员党。该党历史悠久，是西欧历史上成立最早的工人政党，在上一世纪的国际工运中颇有影响。一战后，该党在资产阶级议会制的魏玛共和国中作为第一大党联合执政。希特勒统治时期转入地下，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反法西斯斗争。二战后1946年5月重建。1959年发表《哥德斯堡纲领》后，强调党是左翼人民党性质的党。1966年参政，1969—1982年作为

主要执政党联合执政。1983年后在野。1998年秋该党在联邦大选中获胜，重新夺得执政党的地位。

冷战结束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政策和实际活动都在进行调整，随之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德国社会民主党战后多年来素以奉行具有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政策闻名。其主要特色在于，奉行的基本理论、原则具有一贯性；而奉行的政策方针有较大的应变性，能不断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发展进行调整和更新。这一特色使该党长期以来，不论其在野还是执政，一直能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保持举足轻重的地位，且在国际事务中拥有相当的影响，党的组织也能保持相对稳定和一定的凝聚力。

90年代国际、欧洲、德国形势的巨变，使该党倍受冲击，也使其面临着全新的挑战。该党一度陷入徘徊、迷惘、不知所措的境地。组织上也变得松散，党员人数骤减（1990年92万，1993年86万，1995年82万），力量削弱。党的影响力陡然下跌，1990年大选获票率33.5%，为该党6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为获得自身的发展，该党重新分析形势，探讨对策，对其90年代前的理论、政策作出调整。由此也使党的态势发生转机。

（一）围绕“民主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澄清思想，统一认识

苏联东欧剧变不仅是国际共运本身的一次重大挫折，也是对西欧社民党人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信念的一次严

重冲击。该党首先遇到的是来自保守党人的攻击，他们故意把“民主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混为一谈，说二者之间存在同一性，因而宣称一切类型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都已失败。还有一种论调，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所争取的目标——实行民主制和社会福利国家都已达到，其历史使命业已完成，它可以寿终正寝了。其次遇到来自党内外左翼知识分子悲观失望情绪的袭击。他们原本要求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向往“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模式。他们虽认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不可取，但坚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而苏东剧变后则认为“现实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第三条道路”的构想是虚幻的，资本主义处处优越于社会主义。由此，他们不仅放弃“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幻想，而且连“改良”这一制度的热情也全然丧失，变得厌恶理论、脱离政治。再其次在该党的主流派（中左和中右）中又出现了关于要不要把“民主社会主义”（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的提法改为“社会民主化”（Soziale Demokratie）的争论。主张修改者意在避免“民主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概念的混淆和引起误解。以上种种情况迫使该党加紧在党内作澄清理论认识的工作，要求该党尽快对于要不要继续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如何继续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问题作出回答。

全党上下经过约两年之久（1992—1993年）的探讨和争论，尽管他们之间在许多具体观点上尚存在分歧（如是否需要更改“民主社会主义”的提法等），但在以下几个理论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这就是：

1. 全盘否定“现实社会主义”，主张进一步同“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划清界限。认为“现实社会主义”是一个“经济上、生态上、政治上和伦理上彻底失败的制度”。声言

“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恰恰说明“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是正确的。强调自一战后国际工运分裂以来，“民主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一直存在着原则对立，毫无共同之处。由此主张该党要以“历史的”和“批判的”态度深入研究“现实社会主义”失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原因，进一步划清“民主社会主义”同“现实社会主义”及其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界限，澄清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别，以摆脱因共产主义崩溃而给社民党人加上的负担。

2. 决心继续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政策。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政策自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后数十年来，在改良资本主义制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它在同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竞争中深刻地改变了社会。若没有“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的纠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的民主制以及社会福利都不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今后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自由、公正、互助）和民主原则改革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是“绝对必要”的，只有奉行这样的目标和原则，才能使社会达到更高程度的社会公正和社会共识。

3. 准备改掉在该党党纲中包含的某些带有科学社会主义含义的提法。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并非是一种社会模式或是一种新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而是一种由“自由”、“公正”、“互助”的基本价值加以界定的规范性的政治与伦理思想。民主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畴内，以一种替代性原则和替代性政策所作的改良，而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全盘的制度性替代，因而不宜作出关于谋求实现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表述。

但在该党二战后重建以来制订的两个重要的党纲（“哥德

斯堡纲领”和“柏林纲领”)中,都对“民主社会主义”目标作了包括伦理目标和制度目标的双重含义的解释。占主导地位的解释是伦理社会主义目标,强调以“自由”、“公正”、“互助”这些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为准则改革社会,指出实现这些基本价值和完善民主,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持久性任务,民主社会主义没有终极目标,它是体现着基本价值不断臻于完善的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与此同时,也作了带有科学社会主义含义的解释,即把“民主社会主义”目标解释为谋求“建立一种新的和更加美好的经济与社会制度”,“建立一种没有阶级、没有特权、没有歧视、没有相互排斥的社会”。又称,“民主社会主义所谋求实现的那种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消除阶级隔阂的社会”。目前,党内多数人实际上已不再提谋求建立“新的”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字样,只提追求建立“更好的”经济与社会制度。去掉对追求“新的”制度的提法,说明该党尽力排除其本来保留的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某些认同成份。该党某一理论家强调,“我们社民党人应当表述和实现一种改良的前景,就是对非常具体的社会不公正和生态不合理情况,实行具体的改变。”这说明,该党目前实际上更注重政策的改革作用,几乎全然放弃了对制度改革的设想。

综上所述,该党对苏东剧变的冲击作出的回答是:坚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清界限,继续坚持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但改良的着眼点更多地集中在具体政策上。

(二) 对经济、社会政策作出方针性调整

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浪潮对德国乃至欧洲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也提出挑战。带来的直接冲击是:资本的全球性自

由流动使在德国的生产性投资减少。资方总是以赢利为目的，或搞国际性的金融投机，坐吃利息，或搞房地产投资，而不愿进行生产性投资。即便进行生产性投资，也投到工资成本低的国家和地区。而德国的工资成本相对高。因而 90 年代以来，德国资本严重外流，内需（投资与消费）不足。提出的挑战是：国际性争夺商品市场的竞争加剧，尤以争夺高科技产品市场的竞争为激烈。在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最为明显。美国遥遥领先，发展中国家也在快速追赶。而德国的竞争地位不断下降。这一竞争态势向德国提出调整产业结构、特别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挑战。

就德国本身而言，自它统一以来，经济形势持续不振：经济增长乏力，失业居高不下，财政拮据，它们之间形成恶性循环。这些问题的背后各有其深层次原因，除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外，还有科技的迅猛发展引起生产方式的改变，两德统一加重经济负担等原因。失业是个最为严峻的问题，也是西欧国家普遍存在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面对以上的情况和问题，该党加紧调整自身的经济政策。经过几年的酝酿、讨论，1997 年底提出新的经济政策框架。它的总的构想是：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发展科技教育，运用多种调控手段，促进德国经济重新振兴和克服失业，并相应调节国家职能和社会政策。具体政策要点是：

1. 以开发高科技产业为龙头调整经济结构。改革科研、教育体制，促进经济增长，使德国增强经济实力和保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2. 对经济发展实行多方位的宏观调控方针。既实行新凯恩斯主义从需求方面调节日气周期的政策和结构政策相结合的宏观调控方针；也实行从供应方面促进经济增长的调控方针

(供应学派的政策思想)；还运用以国际性(包括欧洲)协调的经济政策为内容的宏观调控方针。总之，用各种调控方针和相应的配套政策相配合，刺激经济增长。

3. 对德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进行机制性调整。(1) 改革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放松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调控机制，提高管理效率，简化管理程序，增强管理机构的服务性功能；(2) 调整劳资行业工资合同制度，将劳资谈判的最后决定权下放到企业一级，根据企业的需要和解决就业问题的可能，灵活地确定劳动时间和报酬等问题；(3) 对社会福利制度作一定调整，在保留德国社会福利制度基本结构的前提下，对现行社会福利制度作一定改革，一是注重使用社会福利基金的实效和针对性，避免滥用和浪费，二是团结互助与个人负责相结合，以互助帮助、自助。还主张实行将社会福利政策与解决失业问题结合起来的措施：使有劳动能力的、领取社会救济的失业者变成领取低工资(加补贴)的就业者。

该党当前经济政策的主导思想是：优先注重促进经济、科技的发展，寄望于以经济实力的增长和高科技的突进，促进就业问题的解决和带动对社会利益的调整。这一政策思想亦是对该党 70—80 年代的经济政策思想作出的某些方针性调整。从 50 年代末到 70 年代中期，该党一直主张将经济政策目标(促进经济、科技发展与扩大就业)和社会政策目标(公正分配、经济民主、社会福利)置于同等地位；7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末，改为主张生态政策目标(改善生态环境、爱惜资源)和社会政策目标优先于经济政策目标。现在则主张经济政策和生态政策目标优先于社会政策目标。这一政策方针同 70—80 年代的政策方针相比，主要差异在于：(1) 修正了该党 70—80 年代强调的对经济增长重“质”(有益于生态环境和提高人的生

活质量)不重“量”、主张低速增长的方针。目前主张在保持“质”的前提条件下,尽可能促进“量”的增长,力促德国加速增强经济实力和保持相当的经济增长率(不低于3%)。(2)修正了该党70—80年代奉行的关于科技发展的“进步观”。该党当时强调并非任何科技发展都会带来社会进步,如核能、生物遗传工程等对大自然和人的生存都构成了威胁和危害,应当谨慎对待并加以限制,全社会应对科技发展实行民主性监督和调控。现在则主张,对任何科技发展都持积极支持和鼓励的立场,首先着眼研究其有益的方面加以利用,不轻易因其显示出某些有害方面就予全盘否定,一概排斥。提倡实行积极的科技政策,使德国在高科技领域内获世界领先地位。(3)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方针作了重要补充。直至80年代末,该党只重视运用新凯恩斯主义的需求调节政策和结构政策相结合的宏观调控方针,现在则既重视国际性协调政策对本国经济的调控作用,也十分重视运用供应学派的旨在给企业发展提供更多活动余地的调控方针。该党决定实行这种多元的经济调控方针,意在促进在国际范围内建立起公正的竞争机制和经济秩序,限制跨国公司的逃税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也意在更多地倚重本国的经济界、企业界振兴国内经济。(4)提出“革新”德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策措施,决心对构成“德国经济模式”的各方利益和相互关系作出切实的、有成效的调整。很少强调扩大经济民主,较多强调协调各方利益,加强“共识”。

总之,该党当前对经济政策的调整,是基于其对90年代以来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分析,为使德国经济摆脱困境并在未来得以顺利发展而作出的适应性抉择。这一政策的特点是: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色彩淡化,新自由主义政策因素增加。该党试图用以这种包含着新自由主义政策因素的混合型经

济政策同保守党和自由党奉行的纯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进行竞争和较量。

（三）初步调整了国际政策

东西方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错综复杂，该党在一段时间内无力对国际形势作出总体分析和清醒的估计，且由于其在两极对峙时期谋求和平、缓和的政策思想和政策观念仍在起作用，因而既提不出明确、完整的政策思想，也难于对国际重大事件作确定的表态，往往踌躇、迟疑，不置可否。特别是在德国应如何作为政治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又防止出现德意志民族主义再度扩张的危险的问题上，该党感到无良策可寻。

经过近几年的调整工作，该党到 1997 年底，初步确定了自己在今后一个时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该党这一政策是依据其对目前国际形势的分析确定的。它认为，当今世界虽不再面临随时可能爆发核战争，由此毁灭人类的危险，但却存在由于饥饿、贫穷、破坏环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引起的新危险，存在恐怖主义、国际犯罪、毒品交易等大量不安全问题，以及存在层出不穷的地区性冲突，而对这些问题至今尚未找到有效的解决机制。因而，该党确定其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总目标是：谋求国际和平与稳定；实现更多的民主与人权；争取持久的富裕（包括保护环境与资源）。该党当前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基本思想是，德国以欧盟作为基础和阵地，参与对国际事务与全欧事务的建议与决策。

1. 通过推动欧盟经济一体化，参与世界经济的发展。促进德国和欧盟推行一条使自身经济体制现代化的战略，从而利用自身影响推动国际范围内经济、生态、技术和社会关系的革

新，加强同国际金融、经贸组织的政策协调，建立起有国际约束力的竞争秩序。

2. 加强欧盟政治、经济一体化。以此作为欧洲文明模式的基础，推动国际范围内展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消除敌对形象（以1993年联合国维也纳人权声明为准则）。

3. 加速推动欧盟建成一个政治联盟，实行统一的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以此为基础，建设全欧的和平秩序。与此相关，将西欧联盟纳入欧洲联盟条约；提高欧安组织的地位。

4. 主张在北约内加强欧洲成份。支持北约本着建立信任与合作的精神东扩；认为北约应扩大欧洲—北美稳定区，通过开辟新的合作领域巩固和扩大跨大西洋关系。

5. 继续促进国际性的全面裁军，坚持全部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目标，也要求削减欧洲与世界范围内的常规军备。要求所有国家加入核不扩散条约。

6. 本着“团结互助”的精神促进发展援助，为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奋起直追创造条件。提供相应的结构性援助，支持地区性合作，减免贫困国家债务，保证足够数量的发展援助金额（财政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7%）等。

7. 支持改革联合国，主张加强其维护和平、消灭贫困、解决全球问题的作用，扩大其在经济、发展、社会和环保领域的功能。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德联邦议会和社民党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同意联邦国防军参与实施联合国的有关使命。在欧洲国家未能实现在安理会常任理事会中拥有一个集体席位的目标的情况下，德国可接受关于本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邀请。

由于该党当前的国际政策大多是以建树欧盟为基础的，因而它同执政的保守党的政策几无差别。

（四）党的松散状况有所改观

90年代以来，该党组织上的涣散状况相当明显，主要是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在党的中、上层领导之间权力分散，形不成有权威的领导核心。该党于80年代完成了各级领导人的更新换代。现有的各级领导人多半为参加过1968年学运的骨干，其资历和能力旗鼓相当，不分上下。他们在党的联邦领导机构、联邦议院和州一级的领导机构中各司其职、各行其是。往往从局部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出现政见分歧时难于协调，且常常公开化。此间该党主席频繁更迭（恩格霍姆——沙尔平——拉封丹），党的领导显得软弱无力。其二是，党内自80年代后期以来，实际上形成两个思想流派：物质主义派和后物质主义派。他们因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要求不同，对党的政策所持的态度亦不同。物质主义者，主要指那些处于社会低层的党员，如传统产业工人、非技术性工人、失业者。他们没有专门技术，工资待遇低，生活没有保障，因而主要关心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改善现有生活状况。还有那些虽生活优越，但更注重物质利益的中、小企业主也属此列。他们对于该党在80年代突出强调生态因素不满，认为这不利于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他们极力反对社民党与绿党结盟。后物质主义者，主要指那些在社会上处于中等地位的党员，如专业工人、属于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者。他们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专业技术，工资待遇较高，就业条件好，生活有保障。他们已不甚关心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更多关心的是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改善环境，实现男女平等等问题。他们对于该党提倡重视生态因素没有异议，但较多地接受了追求“个性化”社会思潮的影响，要求在生活和工作领域能更充分地发展个性，而团结

互助的观念淡化，非政治化倾向增加。以上两个流派的人，既有相互之间存在政见分歧的情况，也有因各自原因（或对党的政策不满，或对政治不感兴趣）远离或脱离党组织的情况。

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主要是拉封丹出任党主席（1995 年 11 月）以来，该党的松散状况逐渐有所改观。拉封丹着重从组织和政策两方面对党进行整顿。在组织方面，他将党的中、上层领导人拢在一起，尽力在他们之间统一思想 and 协调行动，争取将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和争论在内部解决，不公开化，从而加强了联邦理事会在中、上层领导间的主导与核心作用。此外，他还能从党的整体利益出发，较合理地安排党内高层领导的人选，荐举在德国选民中威望较高（但在党内威望较低）的下萨克森州州长施罗德出任该党联邦总理候选人，为该党在 1998 年 9 月联邦大选中争夺执政地位。在政策方面，拉封丹从 1996 年年中起即筹组人马，着手制定该党参加 1998 年联邦大选的竞选纲领。该纲领的框架已于 1997 年底出台，该党现行的对内、对外政策方针已基本确定。这对统一全党思想认识、改善松散状况大有裨益。特别是在经济、社会政策上，由于该党当前突出强调以发展高科技产业带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方针，将会有助于弥合党内多年来存在的两个思想流派的分歧，增强党的凝聚力。

目前，该党业已摆脱持续数年的被动处境，正以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温和改良的姿态；以旨在促进本国科技、经济现代化，改善生态环境，协调各方利益和旨在促进欧洲一体化，促进国际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对内、对外政策；以充满活力，机敏果断，敢于负责的领袖人物；以对未来的挑战富于探讨性争论、团结气氛日增、更多向中间阶层开放的党的形象活跃于德国政坛。这一切都为其向 1998 年联邦大选进击增加了

筹码。1998年秋该党在联邦大选中获胜，重新摘取执政党的桂冠。

五、英国工党与“布莱尔革命”

英国工党是世界上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中历史最悠久和影响较大的党之一。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它长期是最大的党或最大的在野党。它大力推动福利国家制度的建设，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然而自1979年后它持续18年未能上台，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但从1994年托尼·布莱尔当选工党领袖后，该党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改革，面貌大为改观，组织力量和政治影响迅速恢复上升，终于在1995年5月1日大选中获胜，并重新上台执政。西方有人将布莱尔上台以来英国工党的改革，称之为“布莱尔革命”。究竟什么是“布莱尔革命”？布莱尔领导英国工党以来进行了哪些自我改革？他执政后将对英国的经济和政治进行哪些改革，其前景如何？

（一）工党领袖布莱尔其人其事

托尼·布莱尔1953年生于爱丁堡市一个从工人阶级上升到了中产阶级的家庭里。曾经就读于最好的大学，读书期间由接受一些嬉皮士影响转变为信奉“基督教社会主义”，于是在1975年大学毕业后加入工党。在党内同情右翼不少观点，例

如提出，因为社会结构变化，传统工人减少，工党应该到工会以外吸收党员。同时又注意不以右翼形象出现，例如在80年代参加左翼色彩的核裁军运动，还参加较左倾的工党议会论坛派。1983年首次当选议员。

工党在1987年大选中失败后，提出必须依社会的变化而变革工党自身。工党用了3年时间对其内外政策和同工会关系作了调整，以期重振旗鼓。但在1992年大选中又败北，当时的领袖金诺克引咎辞职。接着同年召开的特别代表大会选史密斯为新领袖。同年，布莱尔开始提出工党必须“现代化”，并去美国考察克林顿获胜的经验，从此两人建立了私人友谊，共同认为民主党获胜是因为摆脱了“穷人的党和属于过去的党的影响”，工党如果想获胜，必须成为以中产阶级和政治中间势力为主体的党，还要使选民相信工党不会增税。1994年史密斯逝世后，布莱尔当选新领袖，提出“新工党、新英国”口号，主张全面调整工党政策。1995年克林顿访英，布向克请教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问题。随后党的支持率迅速上升，在1997年5月大选中获胜，布莱尔出任英国首相，既成为工党领袖，又成为英国的领袖。赞扬他的人说他思路开阔、思维敏捷、实用务实、意志坚决、决策果断、灵活机动、有个人魅力、擅长文艺、平易近人、生活作风严谨。但批评他的人说，他政治思想左右界限含混不清、政策摆动较大、有独裁倾向等。

（二）在建设“新工党”口号下的改革

布莱尔任工党领袖后，立即在建设“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下对党进行改革，具体内容如下。

首先是与党内传统力量辩论，主张对党章关于公有制的第

四条进行修改，经过反复曲折较量后，导致工党1995年特别党代会以65%多数通过修改案，即承认“积极的市场竞争是个人与国民财富的基础”。这样做的效果是使工党能够接近和吸收中产阶级人员。

其次是拉开工党与工会的距离。目的是消除工会对工党的传统影响（工党原来是工会建立的，过去只有工会会员才能入党，现在仍然有350万工会集体党员，在70年代工党政府对工会动辄罢工束手无策，工会的激进主张和行动严重影响了工党形象），扩大在工人以外的支持率。具体做法是宣布工党是全民党，不再是工会的党。主张今后吸收企业和个人的政治捐款，减少经费上对工会的依赖。目前工会捐款占工党资金的比重已经从90年代初的90%降到1/3。工党还说如果工会今后不服从工党政府就要全党表决断绝关系。

第三是整顿和加强工党内的组织纪律，以克服长期派系多、纪律松弛的不利状况。具体做法是突出领袖权威，果断解除传统派头目的党内职务，开大会前先统一执委会认识并分头做各派工作，在现代派和传统派之间搞平衡，大量吸收中产阶级人员入党（当时，党员人数翻了一番，达40多万人）。在1997年大选前，经执委会决定，没有将竞选纲领交1996年年会讨论，而交全党表决，结果避免了党内争吵损害党的形象。目前，工党上层也已经同意使工党年会变成美国民主党式政治集会和由执委会成立咨询机构“全国政治论坛”，准备全党表决通过。

第四是迎合选民稳中求变的心理。1996年夏制订的1997年大选的竞选纲领就主张以低通胀、低利率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维持保守党的经济改革和它建立的劳动市场秩序不变，同时在社会政策方面实行小步改良；提出国家干预的目的在于使

企业和个人获得在市场中竞争的能力，工党政府是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伙伴；主张发展教育和培训并解决部分青年的长期失业问题。这一切得到了选民的欢迎。在1997年大选前的竞选中，布莱尔又进一步修改竞选纲领。他借鉴撒切尔在1997年的竞选经验，强调价值观，而不是过多地提出具体政策。他承诺不提高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和基本税率，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5%，在执政头两年内维持现政府对公共开支的限额不变，并承诺保持私立学校。他还肯定了保守党执政18年有可取之处，表示要坚持其政策的积极方面。该竞选纲领发表后，布莱尔又进一步明确表示，工党将对私有化采取务实态度，只要有利于提高效率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工党也将搞私有化。还说，工党不会屈服于工会的压力，不会向罢工低头而使劳资关系回到70年代。这样，选民的疑虑进一步消除了。

然而，布莱尔关于使工党彻底“非社会党化”的主张，即关于将“社会主义”概念改为“关于社会的主义”（SOCIALISM）的概念或者干脆不再使用该概念的主张，至今受到党内多数人强烈抵制。因此布莱尔还是宣布工党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

（三）理论和政策：向何处去？

工党理论基础源于费边社倡导的社会改良主义，其中心思想是主张采用温和的渐进方式，通过选举和代议制，利用现存的国家政权逐步把土地和资本变为社会所有，以实现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将费边主义同凯恩斯主义结合起来，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张，大力推动福利国家制度的建设。1987年开始政策检讨的出发点是，工党不得不接受撒切尔主义改造英国的现实，从而必须改变工党重社会正

义与福利、轻经济效益与个人自由的形象。目前，工党重新解释其民主社会主义宗旨是保障个人自由，肯定社会主义有赖于经济繁荣，承认市场与竞争机制有积极意义，放弃国有化政策，修正单方面核裁军的防务政策，放弃上台后废除保守党制定的全部工会法的承诺。

1991年发表的题为《工党—英国的机会》的政策文件提出，极端的指令性经济与原始的自由市场经济都行不通了，为保障个人自由、公平与机会，需要政府承担责任与提供帮助。强调社会正义与经济效益相结合。提出经济政策重点是发展现代化制造业。主张通过利率与政府信贷控制治理通货膨胀。提出社会政策重点是废除保守党对国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改革、保护环境、改革地方政府机构、收回退出地方教育当局和学校、承认工人有参加或不参加工会的权利。要求修改宪法、通过权利宪章、取消上院、下放中央权力、设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在北爱尔兰问题上，支持英国与爱尔兰达成的主张通过各派协商和平解决南北爱尔兰统一问题的协议。

布莱尔任工党领袖以来，对工党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强调以“新工党”建设“新英国”，工党对内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在经济政策方面，工党认为英在国际竞争中落后，竞争力下降，是保守党过于强调市场作用，忽视教育培训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但是，过去工党用高税收搞高福利、以通货膨胀换取经济增长的路子也不合时宜，因此要用新的方法解决当前的问题，应采取低通货膨胀、低公共开支、低税收的政策，还要加上相应的产业政策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并通过加强教育提高英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在社会政策方面，他主张严厉打击犯罪并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提出要解决青年人的问题，使人人在社会中有份，有生活的机会。强调以家庭为核心的传

统价值观，要使家庭成为强大的社会的基础。主张改革福利国家制度，但反对使教育、医疗商业化，主张使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结合，增加个人的投入与选择，保证公平，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在政治改革方面，工党认为，英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一些制度过时、权力过于集中、官僚主义严重、政府动作过于保密等问题，同时这些问题往往被用来掩盖无能，公民对政府不公正的决策进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主张改革现有选举制度，向地方政府放权，增加政治透明度。

在修改工党章程后，布莱尔多次表示，如果工党上台，它将不改变保守党政府推行的政策；工党不再实行过去工党政府所实行的政策；工党也会代表企业主的利益。工党的行动赢得了以企业主为主体的中间阶级的好感和支持，据民意测验表示，中产阶级中支持工党的人数明显上升。不仅如此，还出现了企业主给工党提供财政资助这样破天荒的事情。从工党上台后近一年的政治实践来看，布莱尔的确是这样做了。1998年2月他访问美国时，还与克林顿商量，宣布准备于夏天在伦敦召开世界“左翼党”的会议，讨论制订“中左理论”的问题。

（四）对外政策与国外的反应

工党声称其对外政策的目标是，要为促进世界摆脱贫困、不平等和战争以及为使人类摆脱政治、经济压迫而创造条件。主张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增强北约的政治职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支持中东和平进程。赞成欧洲联盟，改变退出欧洲联盟的立场，但要求欧盟应实行被保守党政府排斥在外的“社会宪章”。主张增加外援，加强南北对话，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公平的贸易制度。另外，还主张加强英国在欧洲的作用，保持同美国的传统关系，发展同亚洲的关系，通过国际合作和

与有关国家协调政策，加强英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并在欧洲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布莱尔本人主张使英国发挥超过其势力和人口的作用。

布莱尔担任首相后，立即与老朋友克林顿加强关系。克林顿在工党上台后不久访问了英国表示祝贺。由于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广泛一致，美国报刊赞扬说，他们两人有很多共同点，政治风格相似，例如，他们都出生于战后生育高峰期，都去教堂做礼拜，都读过牛津大学，都充满进取心和政治热情，都是政治上讲求实际的人，都率领长期萎靡不振的党东山再起，因此，他们将会相处得相当融洽。果然，1998年初布莱尔访问美国时，就最坚决支持克林顿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使人感觉到昔日美国和英国之间的传统联盟关系完全恢复了。法国报刊赞扬说，布莱尔的胜利是对欧洲的好兆头，相信他将有能力推行连贯的、积极的欧洲政策。德国报刊除了刊登科尔的祝贺外，还说，工党的改革和胜利归功于“布莱尔的革命”，获胜是因为“抛弃了老的信仰”，英国这次权力更迭并不是“对撒切尔主义的历史否定”。

（五）工党的组织结构、力量 and 影响

工党是英国的重要政治力量，历史上曾多次执政，也多次为议会最大的反对党，并且是社会党国际及欧洲社会党的重要成员。

工党的组织成份目前主要由工会集体党员、选区个人党员、费边社等社会主义团体与合作党三个部分组成。党员总数1984年为623万人，后急剧减少，在90年代初进入谷底，仅为20多万人，但在布莱尔采取措施后，1997年恢复到大约530万人，是英国最大的政党，但其党员中350万人为工会集

体党员，个人党员仅为 36 万人。工党内部历来派别林立，但 1987 年以来一直是温和派力量占优势。

工党的组织机构由 4 部分组成：（1）工党议会党团，由该党在下院的全体议员组成；（2）工党年会，为党的最高机构，负责审议和通过全国执委和议会党团的工作报告、政策声明和各项提案，选举新的全国执委和党的正、副领袖；（3）全国执行委员会，是党的最高常设机构，负责指导和监督议会外各级党组织的工作；（4）工党总部，为党的办事机关。工党组织分为中央执委会、地区委员会（9 个）、选区委员会（651 个）和基层俱乐部 4 级。

目前党的领袖是托尼·布莱尔，副领袖普雷斯科特，总书记汤姆·索耶。现出版发行党刊《工党新闻》和独立的工党左翼周刊《论坛报》。

工党是典型的选举党，即主要活动是围绕选举展开的。在 1997 年的大选中，工党的口号是“英国理应更好”，但布莱尔十分谨慎地宣布“我们不做国家财政负担不起的承诺”，结果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工党获得了全部 659 个议席中的 419 个议席，获议席总数的 63.6%，增加 146 个议席。比所有的反对党多 179 个议席，比保守党多 254 个议席（该党只得 165 个议席，比原来少 178 个议席）。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国任何政党从未获得过的最大胜利。

六、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及 其他左翼政党

北欧地区是世界上社会主义运动发展

比较早的地区之一。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个地区已经有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战后，这些党更是长期执政，推动了北欧国家建立和发展福利国家制度，带来了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局面。冷战结束后，各国经济上的问题凸显，维持福利国家制度的沉重负担也日益暴露，面临危机，以致著名的“瑞典模式”风光不再，各国社会民主党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危机。但是，尽管一些党的确遇到了困难，甚至被迫下台，但多数的党对福利国家制度的理论和政策进行了新的探索和调整，有的又重返政坛。另外一个新的事态发展是，这些国家里的一部分共产主义组织改名易帜，自称为新左翼政党，变成了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组织。因此，从总体上讲，该地区的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尚呈发展之势。

（一）北欧五国的社会民主党

北欧的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和冰岛5国里，有5个传统的社会民主党，它们是瑞典社会民主工党、挪威工党、丹麦社会民主党、芬兰社会民主党和冰岛社会民主党。它们的党员人数共计约50多万人，其成份主要是工人、职员和知识分子，议席数在全部956个议席中占360席，超过了总席位的1/3；5国内阁首相或总理中有3位是社会党人，超过了一半；在各国内阁里还有大批大臣和部长由社会党人担任。另外，还有不少党的官员出任国际组织和机构的要员或负责人，例如挪威工党前领袖布伦特兰夫人现任联合国卫生组织总干事。

北欧国家社会党的力量及其影响一览表

党的名称	国家总人口 (百万)	党员总人数 (万人)	社会党所占议席 (括号内为总议席)	得票率 (%)
瑞典社会民主党	8.80	20	161 (349)	45.4
挪威工党	4.34	6.5	65 (165)	35.1
丹麦社会民主党	5.21	10	62 (179)	34.7
芬兰社会民主党	5.11	10	63 (200)	28.3
冰岛社会民主党	0.27	0.5	7 (63)	11.4
总 计	23	50	358 (956)	30.92

注：各国大选时间：瑞典 1994 年，挪威 1997 年，丹麦 1994 年，芬兰 1995 年，冰岛 1995 年

1. 瑞典社会民主党

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于 1889 年，现为社会党国际重要成员。曾有集体党员 120 万，1991 年 1 月取消集体党员制，现有个人党员 20 多万。

瑞典社会民主党是本地区力量 and 影响最大的党，长期作为本国最大的政党而领导政府，以推行“瑞典模式”而闻名于世。瑞典社会民主党 1920 年 3 月首次组成一党内阁。1932 年重新执政后，提出把瑞典建成“人民之家”的思想。二战期间，积极支持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1944 年制定《工人运动的战后纲领》，强调通过改良实现社会福利，把全面就业作为党的首要目标。1960 年党代会认为瑞典已经进入福利社会，取消了原党纲中“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等提法。1976 年大选失利下台。1982 年重新上台后，提出实行介于紧缩与扩张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经济政策。冷战结束后，瑞典的经济问题十分凸显，瑞典党不得不对经济政策进行

调整，即减少工资福利水平，结果引起中下层群众的不满，1991 年大选失利而被迫下台。但 1994 年又重新上台，恢复了执政地位。党的领袖佩尔松出任国家政府首相。

瑞典社民党 1990 年通过的现行纲领主张“革新”民主社会主义，用在自由平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民伙伴关系的社会，取代在阶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主张以和平的手段对社会进行变革。实现民主自治管理，反对中央过度集权。实行议会制民主，为发展经济愿意同中间党派进行合作。该党主张消除经济权力集中，通过资本积累实行部分集体所有制，将自然资源、信贷机构和个别企业归社会所有或置于社会的控制之下，由全体人民掌握生产的决定权和分配权。现阶段，加强税收手段，增加国家财政，努力降低预算赤字和国家债务。在社会政策方面，主张实现充分就业，收入公正分配，人人富裕，人人价值平等，每个公民有权民主地影响社会的发展。认为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基础在于相信人们有意愿、有能力创造一个与大自然长期并存的人人相互关心并且富有尊严的社会。在国际方面，主张瑞典奉行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加强国际合作和国际法秩序，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和对联合国进行改革，争取国际缓和、裁军、和平与进步。主张富国援助穷国，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斗争。

2. 挪威工党

挪威工党 1887 年成立，1889 年参加第二国际，1891 年首次提出以实现社会主义为党的政治目标。1903 年就获议席，20 年代就已经首次组阁，是目前挪威执政时间最长的党。在冷战结束前后，其执政地位则经历了一些起伏，即在 1973—1981 年和 1986—1989 年期间两次组成少数政府后，由于在 1989 年大选中得票下降而下台。1990 年保守党联合政府因内

部分政辞职后，社民党又重新上台执政。1993年大选中获得36.9%的选票，组成一党少数政府执政，党的领袖布伦特兰夫人出任首相。但在1997年的大选中，挪威工党的得票率下降而下台，布也辞去党内职务，到联合国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现有党员10万多人。最高机构为全国代表大会，中央领导机构为中央委员会，其下设郡、市和地方三级。主席为托·雅格朗。出版机关报《现实前景》。

挪威工党的目的是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取消阶级差别，消除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不平等。对内主张实现全体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改变所有制内容，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内实行国家和市政所有制；实现劳动生活中的民主是整个社会民主化的重要环节，职工有权参加生产和劳动条件的计划和安排。对外主张缓和与裁军，加强与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合作，主张由团结一致的世界经济秩序取代现有的经济秩序。

3. 丹麦社会民主党

丹麦社会民主党20年代首次单独组阁。它长期执政，但在冷战结束前的1982年到1993年的时期内，却一直处于在野地位。1993年，它与激进党、中央民主党和基督教人民党组成了联合政府。1994年大选中，它获得34.7%的选票，在全部179个议席中获得62席。在此基础上与激进党和中央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1996年11月，中央民主党退出政府，社民党和激进党组成两党少数政府。该党现有党员近10万人，成员以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和退休人员为主。按照国家行政区划设各级地方组织。最高决策机构为每4年开会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执委会负责日常工作。出版《时闻报》。现任党的主席为1943年出生、自1993年以来任首相的保尔·尼罗普·拉斯姆森。

该党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主张通过“变革和更新”的方式在丹麦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即“建立在平等和团结基础上的社会”。称其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实现集体占有生产资料。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形态没有固定的模式，但它既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主张发展经济和福利。对私人经济权力集团包括多国公司的企业实行社会控制，并加强职工在企业中的参与权。由国家和劳资双方共同制定“团结一致的收入政策”，以遏制通货膨胀，保障个人福利和就业。通过工资收入者在企业中入股的形式扩大其在企业中的所有权。该党称其制定外交政策的基石是联合国、北欧合作、北约和欧盟四根支柱。对外政策的目标是维护和平，实现裁军，推进缓和与南北间国际合作。主张丹麦成为无核区。声称党要影响国际社会向社会主义、全球团结、和平与合作方向发展。

4. 芬兰社会民主党

芬兰社会民主党成立于 1899 年 7 月，原称芬兰工人党，1903 年改为现名。自 1916 年以来，该党长期单独或联合执政，对芬兰内外政策的制订和芬兰自 70 年代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现有党员 10 万人，其中传统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职工各占 1/3，余为技术人员、退休人员等。1995 年 3 月大选后，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与联合党、左翼联盟、瑞典人民党、绿色联盟联合执政，党主席巴沃·利波宁任联合政府总理。在 1996 年 10 月 20 日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获 4 个席位。该党是社会党国际正式成员、欧洲社会党成员，还是由北欧各国各类政党组成的北欧理事会中的重要成员。党的前主席索尔萨 1978 年就任社会党国际裁军咨询委员会主席，1980 年以来任社会党国际副主席多年。党的前国际书记彭蒂·韦内宁自 1983 年始任社会党国际秘书长长达 6 年之

久。现任党的主席是巴沃·利波宁，总书记卡里·拉伊蒂宁。群众团体有：芬兰社会民主青年联盟、芬兰社会民主妇女中央联盟、芬兰社会民主学生青年中央联盟等。在全国总工会中居领导地位。机关报《芬兰社会民主党人》，每周5期，发行量4.5万份。

由于实行高福利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进入90年代后芬兰经济严重恶化，芬兰社会民主党在1991年大选中失利下野。1995年3月大选后再度上台执政。1987年该党新党纲强调社会民主传统是一项改革运动，社民党致力于通过“改进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建立以自由、平等和团结一致为特点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并为实现一个合作与和平的世界而努力。该党1996年6月的党代会对党纲和党章做了部分内容的修改。对内，该党政治上主张实行民主自治管理，反对中央权力过度集中；赞同“中左合作”组成“中左政府”。经济上主张扩大经济民主、限制资本利润、实现充分就业和公平分配、保障社会福利。主张通过“企业民主”扩大职工及工会组织对企业活动的参与权，以加强经济计划性指导资本流通、企业活动和调节劳力的使用，要求实现地区均衡发展，以“社会化”措施消除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和所有制关系中的不公现象。在社会政策方面，主张社会成员平等、生活方式多样化、公平分配收入、资财归公共负责使用、公民独立地从事劳动和支配业余时间、合理发展社会福利。军事上赞同拥有一支适应芬兰战略形势的必要防务力量，反对同任何军事集团结盟。

5. 冰岛社会民主党

1940年成立，前身为1916年成立的各工会组织的松散联盟。1944年冰岛独立后该党多次同独立党、进步党、人民联

盟等联合执政。在1979年大选中获10个议席，在1983年大选中获6席，在1987年和1991年大选中均获10席，在1995年大选中获11.4%的选票和议会63个议席中的7席。1994年11月，该党发生分裂，以前副主席西古达多蒂尔为首的部分党员因与主席汉尼巴尔松政见分歧退出该党，另组“民族觉醒党”，并在1995年大选中获得4个议席。1996年9月两党议会党团宣布联合，从而成为议会内最大反对党。

该党自称是以民主为基础的政党，争取自由、平等和博爱，反对独裁、压迫、财阀统治和共产主义。对内主张发展渔业和工业，缓和通货膨胀，改善工人生活条件，增加就业；对外主张依靠北约，保留美国在冰岛的军事基地，赞同冰加入欧盟。

该党有党员约5000人，分属全国60个支部。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代表大会。现任主席荣·巴·汉尼巴尔松。机关报《人民报》。

（二）北欧五国的其他左翼政党

目前北欧5国还有其他一些左翼政党，如：瑞典左翼党、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芬兰左翼联盟和冰岛人民联盟等。它们大约有4万多人，在议会有一定席位。他们的理论主张与社会党接近，但又不尽相同。

1. 瑞典左翼党

该党宣称其斗争目标是在瑞典消灭资本主义和阶级社会，建立一个团结的、民主的社会。最近又提出女权主义和环境保护的主张，以适应新的政治形势。主张执行一种向左转的紧缩经济政策，其中包括提高财产税和高收入者的税、削减社会保险和国防费用、保护低收入者的利益。强调今后将重点开展与

北欧左翼以及第三世界那些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运动的合作。

该党历史可追溯到 1917 年，现有党员 1 万，其中 70% 为工人和职员，党的主席是 48 岁的舒曼女士。出版发行党刊《辩论》。

2. 挪威社会主义左翼党

该党宣称其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实现这一目标，党要走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主张通过分散权力和开放，继承挪威的民主传统，实现人民自治的社会主义。对外强调尊重各国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和自己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权利。主张缓和、裁军和不结盟、挪威退出北约。支持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反对挪威加入欧盟。

该党是 1975 年在原挪威社会主义人民党基础上成立的，其成员主要是挪威共产党党员和主张挪威退出北约、反对挪威加入共同市场的原挪威工党党员。现有党员 1 万，在 1989 年大选中获得 10.1% 的选票和 17 个议席。但 1993 年、1997 年大选中分别下降至 7.9% 和 13 席、5.9% 和 9 席。党的主席是哈尔沃森。中央机关报为《新时代》。

3. 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

该党自称是社会主义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目标是在丹麦实现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并非完美无暇的体系，而只是一种用以分析在不同时间内和在变化的条件下取得实践经验的方法”。主张走既不同于社会民主党，也不同于苏联、东欧国家的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致力于以和平手段实践社会主义。认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必须由人民自己来决定，建设社会主义应该根据丹麦的现实基础进行，不

应该机械地抄袭别国模式。对内主张执行这样的方针，即在具体斗争中，要同社民党内的社会主义力量合作，要与社民党进行政府合作。主张实行受需求控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实现自治、分级、团结和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对外主张和平、缓和和裁军、建立北欧无核区。要求丹麦退出北约和欧盟。主张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主张各国人民和工人阶级自由选择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反对外来干涉。主张把现有的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扩大到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国际。

该党是1959年由退出丹麦共产党或被开除出该党的人员成立的。在60年代曾有30个议席，在80年代上升为国内第三大党，冷战结束前夕因内部分裂而开始削弱。1990年大选中议席由上届的24席下降为15席，1994年大选中又降至13席，但仍为丹麦第三大党。它有党员0.7万人，与丹麦共产党合作出版党刊《盐》。主席为尼尔森。

4. 芬兰左翼联盟

该党自称是芬兰“红绿政党”。宣称成立目的是更新、扩大和联合芬兰所有左派政治力量，通过建立一个广泛、强大和具有活力的新型左翼党，恢复左翼在芬兰政局中的传统地位。强调其宗旨是“通过实行红色政策建立一个绿色和公正的未来”。声称自己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人道主义、欧洲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生态平衡和妇女平等。声称民主的公民权是联盟工作的中心思想。称联盟的指导方针是通过自由辩论确立共同目标。对内主张按照民主、自由、平等、团结一致和公正合理的价值观，建立公民拥有广泛民主权利、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的法制国家；并按照自由选举中体现的公民意志行使国家权力，同时保障反对派的权利。规定左翼

联盟在现阶段的目标是，在有利于生态平衡的前提下，促进芬兰经济的持续发展，致力于建立公民都享有公平合理权利的社会。对外，支持官方实行的和平中立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维护同北欧各国和东方邻国的关系。但认为芬兰的外交路线应该能适应情况的变化而更具有积极主动性和批评性，突出人权、环境和对外开发合作，积极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作出贡献。表示愿意继承芬兰共产党和人民民主联盟已经建立的国际关系，也愿意发展同各国左翼政党、组织以及同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的交往合作，但不建立“兄弟党”关系。

该联盟 1990 年成立后，缓解了同芬兰共产党各派之间的矛盾，还接纳绿色左翼、人民民主运动、工会等团体会员，曾有 3.6 万人，在全国有 1600 个基层组织。在 1995 年大选中获得 11.2% 的选票，22 个议席，为议会第四大党，而且与社民党、联合党等联合执政。但是为与执政党保持一致，1995 年代表大会将芬兰共产党党员开除出盟，使议席减少 2 个，盟员人数减少到目前的 1.7 万人。联盟主席是安德松，总书记是圣德。出版报纸《人民新闻》。

5. 冰岛人民联盟

该党宣称自己是冰岛唯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在 1993 年召开的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时的联盟主席格里姆松宣布联盟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宣称其目标是建立“平等的社会主义和人民政府”，争取以民主和议会制为基础，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主张发展民族经济，保障就业。反对冰岛参加欧盟。要求冰岛退出北约，但近年联盟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主张普遍裁军和建立冰岛无核区，反对外国在冰岛设立军事基地。

该联盟的历史可追溯到 1922 年，当时冰岛社会民主党左

派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该小组1930年成立冰岛共产党,1968年发展为联盟。后来4次参加联合政府。在1991年大选中获得14.4%的选票,在1995年大选中获得14.3%的选票,两次均在议会中获得9个议席。现有党员0.2万人。党的主席是弗里曼斯多菲尔。机关报为《人民意志报》。

七、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 建立及其调整

民主社会主义党(简称民社党)前身是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现为德国合法政党。在1994年10月的联邦选举中进入联邦议会,成为议会内反对党,在联邦议会中有30名议员。现有党员10.5万人,主要集中在德国东部地区。该党自成立以来,始终以东部地区公众利益代言人的形象开展工作,经历了逐步脱离历史影响、为生存而斗争和逐渐进入稳定发展的历程。目前,该党在德国东部为第三大政治力量。

(一) 民社党的成立

民社党的前身是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成立于1946年4月21日,由当时苏联占领区的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后,德国统一社会党遂成为执政党。1989年下半年,民主德国政局发生动荡,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发生分

裂，党中央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昂纳克被迫辞职，原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克伦茨取而代之。以克为代表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一系列问题上步步退让，如同意与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同意修改宪法取消党的领导作用，赞成举行“自由秘密选举”，匆忙全面开放边界等，致使党和国家陷入严重的混乱和危机之中。在党内“改革派”的强大压力下，以克伦茨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被迫辞职。

1989年12月，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了党的特别代表大会，彻底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强调在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上同过去决裂，对党进行革新，并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以体现该党在法律上的继承性与革新。特别代表大会之后，该党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企望通过采取革新步骤重新赢得广大党员和群众的信任，如将党的大部分财产交给国家、对昂纳克等人作出组织处理、对党和国家前领导人的所谓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违纪问题进行调查，将克伦茨等14名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开除出党，并对德国统一社会党历史上遭受迫害的人士进行平反。尽管如此，该党并未摆脱困境，到1990年2月初，仅半年时间里就有近160万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退党。

1990年2月4日，该党中央理事会决定，取消党的双重名称，仅保留“民主社会主义党”之称呼，以表明同过去决裂的决心。同年2月24—25日，民社党在柏林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认了中央理事会关于更改党的名称的决定，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理事会，居西当选为党的主席，莫德罗为党的名誉主席。

(二) 党的发展与思想路线的形成

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党章对民社党的性质、奋斗目标、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及组织结构都作了新的规定。称民社党是德国土地上的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它向现代社会中所有为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而斗争的力量开放。该党主张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的终结，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在德国得以实现，而是一条道路，是一项持续不断的任务和挑战。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是个性、同情心、公正、自由、民主、人权、和平、保护自然生存基础等等。主张实行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关于党的指导思想，该党称将继承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传统，植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之中。要批判地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列宁和葛兰西、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反对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排外主义、反犹主义、斯大林主义等。主张党内思想多元化，党员不受某一特定的世界观约束，允许党内存在思想论坛和派别以及思想上的自由争论。

一大还号召全党积极投入民主德国历史上“第一次自由秘密选举”。在 1990 年 3 月民德人民议院选举和 5 月地方选举中，得到西德朝野主要政党支持的反社会主义右翼势力上台，民社党丧失了中央和地方政权，沦为在野党。此后，民社党作为民德议会中的主要反对党，为维护民德主权和劳动群众的正当权益进行了斗争。在两德统一过程中，民社党认为，1990 年 9 月 12 日签署的两德统一条约未充分照顾到两德公民特别是东德公民的利益，因而表示反对。在 1990 年 12 月 2 日的全德议会选举中，该党在东部选区获得 11% 以上的选票，按照原东西德分区选举的原则，该党进入联邦议会，拥有 17 个席

位。

1991年，民社党召开二大，重新讨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党的性质、任务和斗争策略以及制定新党纲问题。二大确定党的性质为“左翼社会主义政党”，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是通过和平途径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德国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大会拒绝了党内一些人提出的解散党的要求，决定继续为党的生存和发展而斗争，使民社党逐步成为全国性政党。由于党内对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建设等问题上分歧较深，二大未能通过新的党纲、党章。

1993年1月底，民社党召开三大，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同意居西辞去党的主席职务，只担任联邦议会中民社党—左翼名单议会小组主席，选举该党勃兰登堡州议会党团主席毕斯基为主席，补选两名副主席。大会通过了新党纲，对前民德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历史作了初步评价，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指出了苏联模式体制的弊端，决定把在德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再次强调在西部地区建立和发展组织，扩大党的影响，争取在1994年联邦大选中重新进入议会。

在1994年10月的联邦大选中，该党进入联邦议会，拥有30名议员。

1995年1月底，民社党召开了四大，再次确认党的性质是“左翼社会主义党”，明确“不反共产主义”、不放弃“民主的共产主义立场”；认为社会主义是“道路、手段、价值取向和目标”，它包含着“最大限度的自由和民主”，并意味着要“进行各种形式的社会化，要改变资本的统治地位，保护生态，实现民主、互助和社会公正，克服专制，实现自由和人权”；宣称坚决和“斯大林主义”以及“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决裂；确定多元主义为建党原则，认为多元的组织结构是党组

织发展的一个明显进步。

1996年1月底,民社党召开四大二次会议,制定了党至1998年联邦大选的工作计划,强调要加强地方工作。1997年1月中旬,民社党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1998年联邦大选中的战略方针,讨论和制定了党对德国社会存在的紧迫问题的政策主张,提出了该党关于反对大规模失业、反对削减社会福利、税收体制改革等一系列较系统的政策主张。大会还在参政问题上有所突破,提出将视时间和情况来决定“民社党是否在议会中扮演反对派角色,是否容忍一个(少数派)政府或进入联合政府”。此外,大会还对党章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多数通过废除双重党籍制。民社党五大表明,该党正在摆脱危机,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大会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主张,提高了该党参与德政治生活的行动能力,为党在联邦政治生活中进一步发挥作用奠定了基础。

(三) 民社党对形势的分析和主张

1. 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当前德国政治经济形势的看法。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民社党认为,在欧洲现实社会主义消亡之后,资本主义制度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表明,它既不能保证社会各个层次的福利生活水平,也不能保证其生态环境的改善。对于如何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资本主义也无从回答。如果听任资本主义社会为追求利润而无节制地浪费自然资源、无休止地扩充军备力量,那么,人类将面临无法继续生存的危险。同时,民社党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始终存在着资本和劳动这一根本性矛盾,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和激化。所以“现实资本主义由于其结构缺陷和体制的非完善性,无论在德国、欧洲甚或全

世界，它都不是未来社会的发展模式”。该党强调：“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特征是威胁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根源，是国际关系中军国主义特性的根源，是全球生态状况危机和南部国家痛苦灾难的根源。”因此“必须消除资本垄断”，“人类必须在历史的较短时间里寻找出一条摆脱毁灭性发展逻辑的出路。”同时，该党强调，“在寻求人类未来生存前景的过程中，不应放弃社会主义思想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传统，不应放弃对社会主义政策的革新。”

关于当前德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民社党认为，德国在本世纪工业国家中居领先地位的经济模式和增长模式业已衰竭，德国经济存在结构性危机。失业率达到历史最高记录。大规模失业构成对人、自然和文明的巨大威胁。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不公正，明显地向着有利于富人的方向倾斜，使贫富差距拉大。大力削减社会福利，从根本上损害了“福利国家”制度的基础。特别是两德统一给东部经济与社会造成重创，东部人作为二等公民忍受来自西部的歧视和政治迫害。东西德之间的分裂态势难以缓解。

总之，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欧洲一体化要求，联邦政府施行的新保守主义政策不断加剧了国内矛盾，加深了“社会分裂”和“社会危机”。

2. 对国内问题的政策主张。

民社党认为，目前德国存在的主要社会和经济问题集中表现在社会不公正和大规模失业。因此，民社党提出必须对联邦德国的社会制度进行民主的和符合福利与生态价值的改造。强调要抵制并反抗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德）基本法中规定的社会国家原则的破坏。

关于失业问题。民社党认为，在众多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中，最需迫切解决的是失业问题。指出“失业问题是社会问题的核心”，它加剧了国债的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削减，损害了社会的竞争能力，“大规模失业不仅越来越威胁着联邦德国社会的福利和经济基础，同时也越来越威胁着联邦德国社会的民主基础，并因此威胁着其未来的（行动）能力。”虽然由于经济不景气、经济全球化发展以及经济结构问题导致失业蔓延，但是，不改变德国的劳动制度，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大规模失业问题。因此，民社党提出要对德国的社会劳动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造，建立一种“不以盈利为目标而以社会需要为标准的新型充分就业形式”，进行这一改造的途径是：（1）重新分配社会劳动；（2）利用生产行业的剩余价值满足社会对福利、文化和生存的需求。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民社党要求制定一个以民主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与以盈利为目的的劳动体制做斗争，限制资本所有者对利益的支配权；给劳动者以自主决定工作和生活的权利；男女平等；支持旨在维护劳动者利益的工会工作；反对削减就业补贴，反对削减创造就业岗位的措施。该党还提出一些具体的手段，如：在不减少工资的前提下，缩短劳动时间20%；发展公共服务设施；创建促进公共就业部门；制定以就业为目标的经济和结构政策；创造培训岗位，改革职业教育以及制定一个全欧洲的就业政策。

实行公正的社会分配。民社党指出，税制中的不公正和不民主导致德社会的贫富差距加大和社会不公正现象日益突出。因此，民社党主张，要建立公正的社会税收体制，使之有助于发展社会福利和优化生态环境；实行自上而下的再分配；要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进行税制改革，地方财政改革以加强地方自治为目的；反对以普遍提高税率的方式增加税收，而要求只对高薪阶层提高征税，增加税法中的民主和公正性；主张在不

加重低收入阶层负担的前提下减少国家公共债务，减轻联邦、州及地方的利息负担；公共开支应以福利、生态和促进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决与偷漏税行为做斗争。为了达到这些要求，民社党提出了具体的税改建议：向较多财产所有者征收一次性财产税；免征年收入低于 1.7 马克者的所得税，将起始税率由 26% 降低到 20%；重新制定财产和遗产税；对证券交易商和其他投机商的收入课以高税；修正增值税；征收生态税；根本改善地方税制以及对国际资本融通进行征税和协调欧盟内部的税制条例等。

关于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民社党强调，为了维护社会公正，坚决反对削减社会福利。认为现代社会福利政策必须首先保证所有人的社会安全，实现普遍的社会公民权，加强个人的行动能力，促进妇女解放的发展。社会福利政策要具有社会凝聚力，制止贫困或暴富的产生和蔓延。鉴此，民社党提出要对社会福利政策进行彻底的改革，要制定一个新的社会福利公约，并使社会福利的发展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具体的改革措施包括：改革互助原则，使之覆盖整个社会；实现基本社会保险，人人享有就业和接受培训的权利；改革地方福利政策，加强地方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保护残疾人的合法利益，残疾人享有与正常人同等的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维护和发展互助的医疗保险事业；改革退休金制度，真正实现老有所养；发展国际和欧洲的社会福利秩序，支持建立欧洲社会联盟。

关于工会工作。民社党认为，工会在争取社会公正、保证社会进步和民主发展以及维护福利国家利益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有斗争能力的工会是市场资本主义的重要反对力量”。民社党认为自身同工会有着相同的历史根源和历史经验，面对同样的世纪挑战。民社党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同工会进行

合作创造一个新基础。特别是德国统一带来了新的社会分裂，民社党作为从原民德转变过程中衍生出的政党肩负着复杂的任务，即既要代表东部人的利益，又要通过争取社会平等完善国家的统一。在这一过程中，民社党视工会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因为它代表最广泛的利益群体，有能力克服东西部之间的差异，有能力组织劳动者共同行动，阻止削减社会福利的发展。民社党主张超越党派政治的工会工作，在面对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政策的斗争中，在反对市场极端主义和减少全球化趋势带来的弊端之过程中，民社党同工会具有共同的任务。因此，民社党支持工会的自主性，支持建立反对资方的联盟，支持反对统治者滥用立法权，支持立法禁止解雇罢工工人等一系列工会工作。

关于左翼联合问题。民社党认为：目前，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价值模式和战略设想正在进一步传播，甚至在社民党和绿党中也产生了影响。“保守的思想和政治垄断比以前更加稳定”。保守党政策在各个方面威胁着社会的基础，“但在联邦德国范围内还未形成一个足以与之抗衡的政治反对力量”。并且，与保守势力相抗衡的各派力量正面临着由于自身缺乏政治革新而相互封锁的危险。

民社党认为，在过去几年中该党的力量有所加强，但深感要在本党及其选民中消除保守主义的思想影响并非易事。因此，提出要利用社会上对民社党认可的增长来阻止民主的、左翼的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的滑坡。作为议会外力量，欢迎愿意同其一道进行议会外斗争的各种社会运动以及个人提出好的思想、进行参与乃至共同行动。认为没有社会运动，没有自下而上的运动，就没有持久的和彻底的转变。作为新欧洲左翼论坛的成员，民社党将积极地为国际社会主义和其他力量的合作做

出努力。

3. 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主张。

关于欧洲发展。民社党要求修改欧洲一体化机制，认为欧洲一体化应有利于建立欧洲社会和就业联盟及环境联盟，反对建立马约规定的拜金色彩严重的经济和货币联盟。民社党要求，欧盟的社会联盟必须先于经济和货币联盟而确定下来，它的目标应是充分就业和建立福利国家。要求欧盟维护各国的福利安全体制，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将其葬送。该党致力于欧洲联盟民主的、符合福利和生态意义的发展。民社党同其他 18 个欧洲左翼党一致要求“让各国人民自主决定欧洲的未来”。

关于和平。民社党认为，维护和平也是社会问题的核心之一，“没有和平就不能保障人类的生存”。民社党主张，不能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借口发展军国主义，反对以解决失业为由发展军备生产，反对联邦国防军参与解决国际上军事冲突。民社党强调不会放弃反对德国政治的军事化、反对联邦国防军参与战争和反对战争的立场。

（四）党的性质和组织

民社党一再重申自己是“社会主义政党”，强调“这一点不容任何人提出置疑”。表示要继续以自我批评的态度整理自身历史，但一如继往坚持反对斯大林主义。又强调：多元化是该党的组织特征，将继续保持这一特征，允许不同派别在党内存在，但指出“派别之间不应相互削弱、相互封锁”。同时提倡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关于党的政治作用，该党认为：“联邦德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它应有能力并愿意以其政治力量和思想文化联合其他政治力量和社会运动，争取战胜保守的统治者，建立一个民主与社会公正的共和国。”

民社党提出要成为一个全德国的党：“民社党源于德国东部地区，它仍将是一个特别要维护东部人利益的党。但是，民社党不希望通过东部的西化达到德国的统一。因此，要制定（党的）联邦政策，即在旧的联邦州同样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

民主社会主义党 1997 年 1 月召开的第五次党代会，选举出的领导人是：名誉主席汉斯·莫德罗，主席洛塔·毕斯基，副主席沃尔夫冈·格尔克、聚尔维亚-伊冯·考夫曼、加布里尔·齐默尔。

第14章

其他地区发达国家的左翼力量

北美洲、大洋洲是资产阶级右翼政党势力最强大的地区。对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它是“落后地区”。剧变前这两大洲共有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 10 余个，总计有党员两万多人。剧变中经过分化组合，目前尚存共产主义政党十来个，党员总计不足万人，比剧变前减少 2/3 以上。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也不如欧洲发达，但在大洋洲工党的力量较强。

日本共产党冷战后的人数一度下降，但不久即开始恢复，并有较大发展，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现有党员 37 万，在参众两院的议员已由 26 名增至 49 名，地方议员由 3927 名增至 4913 名。日共在新形势下对理论和政策进行了调整，并开始了新的探索。

日本社会党冷战后经历了兴衰和变化，理

论上已明确宣布“选择社会民主主义”，1996年又改党名为“日本社会民主党”。与此同时，党的力量削弱，影响下降。现日本社会民主党有党员不足5万人，在参议院占21席、众议院占15席，党在国内的地位已由1955年以来的第二大政党跌至第五位。

一、北美、大洋洲社会主义运动概述

在苏东剧变的冲击下，北美大洋洲的不少共产党已改名换性并发生分化改组，原本很落后的共运进一步走向衰退。从原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力量成立了一批新组织，如：从加拿大共产党分出非政治性团体“加塞西尔罗斯学会”，加共由原来的3000人减至600人；新西兰工人共产主义同盟已改名为“新西兰左翼潮流”，宣称不再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澳大利亚共产党已于1990年解散，其党员与其他左翼力量组建为“新左翼党”等。美国共产党主席葛斯·霍尔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持批判态度，党内追随戈氏思想的“民主派”，自1991年美共二十五大后分裂出去成立“美国通讯委员会”，加上其他人退党，使美共党员由剧变前自称的7000人，减至5000人，近年又恢复到7000人。尽管如此，目前美共仍属这两大洲最大的共产党，而其他党都是数百、数十人的小组织。

目前主要的共产主义政党和左翼组织有：美国共产党（0.5—0.7万）、美国通讯委员会（原美共党内的“民主派”，数百人）、加拿大共产党（原党已分裂，这是剧变后重建的，约600人）、加拿大塞西尔罗斯学会（从加共分裂出来的新左

翼，数百人)、魁北克共产党(从加共分裂出来，数百人)、加拿大共产党(马列)约(500人)、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约200人)、澳大利亚共产党(300人，原澳共已于1990年解散，现在的澳共是1996年由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改名而来的)、新西兰共产党(数十人)、新西兰社会主义统一党(数十人)、新西兰马克思主义团结组织(数十人)。

除了组织上的变动外，思想上的冲击更为严重，总的讲来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既改名又易帜，已经或欲加入社会党国际的“新社会党”。他们认为苏东剧变表明“共产主义已经死亡”，“柏林墙倒塌标志着传统上从1914年分裂为对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派重新统一的开端”，主张“重返1914”，走“回归社会党国际”的道路。这类党有原新西兰工人共产主义同盟改名的“新西兰左翼潮流”等。

另一种是已改名但未完全易帜，并且不把“回归社会党国际”作为目标的“新左翼党”。如由澳大利亚共产党改名的“新左翼党”。他们认为，苏东剧变表明“共产主义面临危机”，必须实行“根本性变革”。主张党改变名称但不完全易帜，使党的指导思想“多元化”、“现代化”、“开放化”，把“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意识形态之一，把马克思主义同人道主义、生态思想和女权运动思想结合在一起。政治目标是“消灭一切形式的剥削制度”，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社会”。

第三种情况是，目前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和组织。它们的情况也相当复杂，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些党还算共产党，主要是因为一坚持未改名，二重申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他们思想相当混乱，在重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同时，又赞同社会党或新左翼党的许多理论主张。在组织上这些党日趋老化，人数多为数百、数十人的小组织，一些党已名存实亡。

这两大洲的自称搞“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工党，力量相对强大些。美国有“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组织”，其中前者在美国民主党左翼中开展工作，同时也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组织。加拿大新民主党宣称由一切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人组成、通过选举执政和采取可行步骤逐渐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党。它成立于 1961 年，目前是加议会第四大党。在 1965 年以来的历次大选中，该党得票率都在 15%—20% 之间，一直在野。该党 1988 年在议会中占 43 席位，1993 年降至 8 席，1997 年升至 21 席。目前，该党仅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萨斯喀彻温省和育空地区执政。

新西兰工党宣布奉行“民主社会主义原则”基本纲领中提出的争取实现“生产资料、分配与交换社会化”的社会主义目标，其短期目标是将能胜任的人选进议会和地方政府。该党系社会党国际成员党，现有个人党员 10 万人，集体党员 20 万人。它是国内主要政治力量之一，曾于 1935—1949、1957—1960、1972—1975、1984—1990 年四度执政。1990 年大选中失利，1993 年大选中势力有所回升，获得 45 席，增加了 17 席，仅比执政党国家党少 5 席。在 1996 年大选中，工党获 37 席，得票率为 28.27%，仍为国内第二大党。由于与第三大党新西兰第一党谈判联合执政失败，工党现仍为议会第一大反对党。

澳大利亚工党是澳最大和最早的工联主义政党，成立于 1908 年。早期以工会运动为基础，积极主张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非正义和不平等行为的斗争。90 年代以来，该党自

称是“民主社会主义党”，主张通过进化原则而不是采取“突然革命”的手段对现行制度实行变革，逐步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目标。该党在二战前曾5次执政，战后经历几上几下。1983年大选中，工党领袖罗伯特·霍克提出争取国家经济复兴与重建和民族和睦的竞选纲领，又以绝对多数获胜，工党第八次上台执政。此后，工党分别在1984年、1987年、1990年、1993年4次大选中获胜蝉联执政，1996年大选失败，成为在野党。

二、美国共产党的分裂

美国共产党是有80年历史和光荣斗争传统的老党。苏东剧变使美共的组织力量和政治影响受到一些冲击，党的组织发生分裂，但它仍坚持马列主义、坚持共产主义传统思想，经过内部斗争，近年又加强群众工作和组织建设，现力量基本稳定。

（一）简要回顾

1919年美共成立时有党员1万人，大部分为产业工人，30年代美共积极领导工人、学生开展斗争，党的力量 and 影响有较大发展，达7.5万人。由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当局对它大规模迫害，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冲击使党分裂，党的力量急剧缩小，至50年代末只剩1万人。60年代中期后，美共注意开展工人和少数民族工作，扩大了影响，1975年二十一大宣布有成员1.4万人。1991年美共二十五大在围绕维护马列主义传统思想和坚持重新检验马列理论概念等问题上领导层分成两派，经过斗争，统一了思想，改组了领导，葛

斯·霍尔再次当选为全国主席，分裂出来的一派成立了“通讯委员会”。会后美共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促进各种左翼力量的团结，特别是 1996 年二十六次确定以加强产业工人和组织建设为工作重点后，近两年力量有所发展，估计约有 7000 人。

该党是目前美国最大的左翼党，从 1924 年起开始参加历届总统竞选（1948 年停止，1968 年又恢复）和各级地方选举。1943 年有 2 名党员当选为纽约市参议员。1984 年美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是葛斯·霍尔和安吉拉·黛维斯，在 22 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取得竞选资格，获 3.7 万张选票。1988 年美共鉴于不少州通过不利于小党候选人参加竞选的限制，决定不再推选本党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以示抗议。最高权力机构是每 4 年召开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委员会由 44 人组成，内设全国理事会为中央常设机构，葛斯·霍尔任全国主席。组织分为中央、地区和基层 3 级，出版机关报《人民世界》周报和理论刊物《政治月刊》。群众团体为美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约有几千人。

（二）苏东剧变后的认识和思考

长期以来美共与东欧共产党，尤其与苏共保持十分密切的关系，追随苏共路线，视苏共是世界革命运动的“活样板”、“带头人”。苏东的剧变促使美共总结反思，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痛斥苏共领导人 美共认为戈尔巴乔夫所实行的“公开性”不仅没有带来非共产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反而促成了反共产主义势力、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形成，实际上抹杀了共产党的先锋作用。叶利钦是向资本主义一块一块出卖俄罗斯的人，是镇压保卫俄罗斯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罪人。

苏东剧变是偏离社会主义原则的结果。美共认为苏东剧变不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本身的危机，而是：（1）这些国家都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制度；苏联的改革旨在以更多的直接物质刺激来弥补精神刺激的不足，从而为西方反共思想打开了闸门。（2）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来犯了一系列错误是难免的，但他们在总结历史教训时，往往把错误归罪于党，丑化社会主义，有的党甚至助长民族主义。（3）60年代末，苏共官僚特权制度形成，党群隔阂不断扩大，广大人民对现实不满的情绪日益滋长蔓延，最终导致群众性反共歇斯底里的发作；（4）70年代后苏联没有及早认识增加投资发展高技术的必要性，使自己在与西方的“和平竞赛”中逐渐落伍并陷入危机，最终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5）苏解体是西方诋毁、消亡马列主义努力的一部分，实质上是西方与戈、叶里应外合发动的一场成功的反共政变。

坚信共产主义必胜 美共认为，苏东剧变不会阻挡世界革命的进程，阶级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唯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资本主义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人类社会进步的未来。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的缺点和错误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行不通，共产党能纠正社会主义的任何失误。唯有共产党才能帮助工人阶级提高觉悟并最终完成其肩负的使命。

坚持马列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 1996年美共二十六次再次重申党要更加坚定地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在策略上更现实，并具有科学性，在战略上要更成熟。长期目标是根据本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和条件以及吸取已建立和正在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经验在美国建立社会主义。美国的社会主义将不同于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社会，它主要反映美国发展和特殊环境的显著特点，是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美国也许存

在通过投票表决等和平手段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在绝大多数美国人没有这一要求之前，美国不会建立社会主义。当前的工作重点和策略是：(1) 围绕失业、工资、社会福利、医疗照顾、公共教育等日常生活基本要求，组织人民群众开展争取生存权、工作权和平等权的斗争，促进工人、被压迫少数民族的团结；(2) 加强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的工作，与工会运动合作开展斗争；(3) 加强组织建设，积极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改进工作作风，扩大党刊党报发行量和文化宣传；(4) 继续发展与世界和平团体及组织的联系。在促进工人阶级团结，反对垄断和极右翼的阶级斗争中，美共必须在政治、思想、组织和策略上发挥特殊作用。

呼吁加强国际共运的团结 美共认为，在苏东剧变的形势下，“建立国际共运团结极端重要”，世界共运组织聚会交换意见和看法大有裨益，呼吁各国共产党更加珍惜兄弟关系。1994 年美共致函各国兄弟党呼吁加入其与加共联合创建的国际通讯网络，以便交换信息。1996 年美共又向各兄弟党建议成立一个由各兄弟党代表组成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济委员会，交换对世界经济新情况的看法。1998 年 5 月美共与加共、澳共联合呼吁各国共产党参加其发起的《联合起来制止“多边投资协议”》联合声明的联署，反对跨国公司为最大限度获取利润，把全球经济引入危险的反民主的方向。

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美共认为，社会主义世界现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私有化。一种是中国、古巴、越南和北朝鲜进行的私有化，即允许和鼓励资本主义大公司用高新技术向他们国家的工业投资，但社会主义政府严格控制。另一种是前苏联各共和国进行的私有化，即私人大公司收购国有工业，而国家放任不管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这类私有化包罗了资本主义所有最丑

恶的特征。

波兰、匈牙利、捷克加入北约后进一步将自己置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治和思想上非常软弱，被戈尔巴乔夫一伙引入背叛和腐败的资本主义道路。如要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需采取某种革命性的变革，否则不可能把腐败的资本主义政权推翻。

三、加拿大社会主义运动的削弱

苏东剧变时，加拿大共产党遭受严重冲击，党内思想出现混乱。在1990年召开的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该党出现了严重的内部分裂。因受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巨变的影响，包括当时任总书记的乔治·休伊森在内的该党部分领导人认为，苏东剧变表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已“走进了绝路”，共产党已无存在必要。他们主张将该党转变为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组织，并取消加共。1992年6月，加共党内对立的两派通过谈判划分资产后正式分裂，党的前总书记休伊森和大部分中央委员加入以原加共总部所在街道命名的“塞西尔罗斯学会”。该组织是一个从事科学教育的全国性非政治团体，其成员有数百人。同时，魁北克法语区重建了魁北克共产党（隶属而又相对独立于加共），其党员人数估计有数百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一派于1992年12月，召开加拿大共产党第三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以米格尔·菲格罗亚为党总书记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出版了刊物并更名为《人民之声报》。这样原来的加拿大共产党一分为二。加拿大共产党在剧变前约有3000名党员，一分为二之后，仍

沿用原名的重建党约有 600 人。此外加拿大共产党（马列）约有党员 500 人。

（一）重建的加拿大共产党

加拿大共产党成立于 1921 年 5 月，由“美国共产党”和“美国统一共产党”在加拿大的党组织举行联合代表会议后成立，当时处于非法状态，绝大部分党员是东欧移民。1922 年 2 月加共恢复合法地位，之后又多次被当局宣布为非法。二战后，该党参加了历届大选，但得票率均在 0.1% 以下。剧变后重建的加拿大共产党的情况怎样？

1992 年 12 月加拿大共产党三十大重申，加共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原理之上的加拿大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继续坚持“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原则，努力捍卫“民主”和“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加拿大”，“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取代加拿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彻底解决现行制度内部的所有矛盾和危机”。

该党认为，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现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其最明显的特点之一是科技革命扩大了生产力，加速了生产过程的国际化，使劳动性质和劳动条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这一革命却受到了帝国主义的操纵和垄断。另一个明显特点是，垄断资本以大型跨国公司和国际银行的形式更加“国际化”，加强了对国际市场和资源的争夺，因而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也进一步加剧。认为，外国资本越来越占据垄断地位给国家垄断制度带来了深刻的危机，成为商品、服务和资本全球流动的“桎梏”。无一例外，资本迫使主权国家政府放弃其长期一贯的项目和服务，将公有企业私有化并取消对其国内和国际活动的限制等。这样，对国内政策和预算有决定权的

不再是本国政府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不仅损害了弱小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也损害了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权。该党认为，尽管如此，这已无法改变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和任务，即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该党认为，目前帝国主义比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尽管其各种矛盾在不断加深。这种状况的形成有一些客观原因。其一，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在过去的20年内成功地利用和垄断了科技革命的成果；其二，不断加剧的资本积累过程加强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尤其是最大的跨国公司和银行的力量；其三，也是导致世界力量均衡发生变化并给人类带来严重后果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前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崩溃和解体。在此次解体期间及其之后，一些左翼和民主派别还出现了欢迎这次解体的倾向，认为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将把人民从独裁统治中“解放”出来，并向更仁慈、更温和的社会主义敞开了大门；另外一些人士认为，这次解体将引起一场“真正的”工人阶级革命并占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还有一些人认为，苏联的解体将结束“冷战”和军备竞赛，为实现集体安全与和平创造条件，将资源重新用于人民的需要和环境保护。该党认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完全低估了社会主义70年来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和全人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现在对这次危机的仓促、主观和未经研究的反应正在被对产生危机的主、客观原因进行更加冷静和科学的分析所代替。一般来说，在共产主义运动和左翼运动中，对引起社会主义危机的原因的辩论还将继续一段时间。加共应该对此有耐心，避免过早地做出最终判断，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几乎所有社会主义理论、战略和实践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正确具体的回答将决定社会主义的未来。

但同时，加共对此问题可以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这也是加共义不容辞的责任。加共认为必须采取客观平衡的方法分析问题。一些人片面地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基本上归咎于外在因素，这种方法是完全不科学和非辩证的；一些人认为危机的主要根源正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身，这种方法同样也是错误的。加共认为，这次危机是由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原因共同引起的。

该党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认为社会主义仍是工人阶级的选择，号召全党努力加强与工会、左派运动和民主力量的团结，形成强大的人民联盟，反对以跨国公司和国际银行为代表的垄断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加强与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所有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左派民主力量的团结与合作，发展群众运动，为争取一个社会主义的未来而奋斗。

1995年5月该党三十一次代表大会上选出了由17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12人）、由5人组成的中央执委会和由3人组成的审计委员会。米格尔·菲格罗亚再次当选为该党总书记。该党在各省设省委员会，在市设俱乐部。党报是《人民之声》。

（二）加拿大新民主党

该党主张通过民主道路逐渐实行社会主义，属于社会党思想体系的政党。它成立于1961年7月，其前身为“平民合作联盟”，目前是加议会第四大党。在1965年以来的历次大选中，该党得票率都在15%—20%之间，一直在野。该党1988年在议会中占43席位，1993年降至8席，麦克劳克林也辞去该党领袖职务，由阿·麦克多诺继任。1997年该党在议会的席

位升至 21 席。目前，该党仅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萨斯喀彻温省和育空地区执政。

该党自成立以来，宣称它不是工人阶级政党，而是由一切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人组成、通过选举执政和采取可行步骤逐渐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党。该党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没有人剥削人的无阶级的国际社会，使个人享有充分自由并得到经济和社会保障，在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平等、自由的基础上建立持久和平；批评资本主义“信奉阶级社会，不平等，一国或一群人为谋取利润而有权牺牲别国和别人的利益”；指责共产主义“拒绝社会主义的一切目标”，其后果比资本主义“更加暴虐和邪恶”。该党的理论基础是早期的北美平民主义、社会福音派、英国工党改良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的混合物，声称信仰平等、自由、社会所有制的民主社会主义，认为把公制作作为灵丹妙药的提法已经过时，主张通过实行社会计划，控制金融、货币和投资，以及扩大社会资本和扩大公共投资等“现代社会主义方法”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的问题。

该党主张通过民主议会道路渐进地实行社会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认为进步、保守党都代表大银行、大公司的利益，在西方政治潮流向右转的情况下，人民更需要该党在议会代表其利益。

在政治和社会改革方面，该党主张改革现行的委任制参议院为民选制。主张维护加的统一，反对分裂，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该党强调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和社会生活多样化等。支持妇女运动，主张提高妇女地位。支持“第一民族”的土地权利和民族权利。主张增加政府开支，扩大医疗和社会保险及文教事业等福利设施，改善工作条件。

在经济改革方面，该党的长远目标是使经济加拿大化，实现经济独立和发展本国高科技产业。主张政府采取经济手段扩大国有和私人企业在国内市场和出口贸易中的份额，大力发展民族制造业，反对大量出口国内资源。其更长远目标是：以社会计划调节经济发展、生产、商品、劳务和分配，实行工人的民主控制并对垄断公司进行国有化以保证社会计划经济的实施。主张降低利率，抑制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保护家庭农场和小企业，保护和发展现有社会福利和国有化经济部门。要求多国公司特别是在机器和交通工具制造业方面增加投资，扩大就业，否则就对其关闭市场。反对外资、特别是美国资本控制加经济，主张实行独立的、加拿大人管理的经济。主张补贴出口，并对低、中收入者减税以刺激需求，充分发挥生产能力以达到充分就业。主张对银行高利率征收暴利税，用以修建公共住房，创造就业。

在对外政策方面，该党宣称它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支持和平，反对军备竞赛和战争；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摆脱美国的控制；支持第三世界的发展。

该党最高权力机构是代表大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其常设机构为执行委员会。联邦以下设省、联邦选区、省选区 3 级地方组织。无全国报刊，各省出月报或不定期的简讯。现任领袖阿·麦克多诺（女）。

四、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运动的重组

苏东剧变对澳大利亚共产主义政党冲击很大，并加速了澳大利亚共产党的解散。澳大利亚共产党早在 70 年代就认为马

克思主义不是“圣经”，取消了以马列主义为党的思想基础的提法，随后就开始向左翼党转变。1989年苏东剧变使党内思想更加混乱。许多人认为传统的社会主义概念和组织形式“已经过时”，主张以“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吸收各种社会主义激进及进步的传统，致力于更新社会主义理论，从而把党改造成为更加广泛的社会主义政党。1989年12月，澳共三十大决定加快筹建新党，并逐渐停止党的活动。1990年7月，新左翼党成立，澳共于当年年底自动解散。原澳共有1200人，现在的“澳大利亚新左翼党”，约有数百人。老的澳大利亚共产党解散5年之后，1996年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它成立于1971年）接过了这个名称，将党改名为“澳大利亚共产党”，它现约有数百人。此外，1964年在“大论战”中成立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其创建时的主席爱德华·希尔已于1984年主动辞职，现任主席是布鲁斯·康沃尔，该党现约有数百人。

（一）老澳大利亚共产党演变成新左翼党并非偶然

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开展较早，受欧洲影响较深。1920年成立了澳大利亚共产党。1930—1934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期间，该党曾领导矿工和其他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1935—1939年间，组织领导了反对战争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群众斗争，发动群众反对向日本输出生铁，抵制日货，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39—1941年，澳共被宣布为非法，1942年底恢复合法地位。1945年十四大提出澳大利亚存在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随后，党内对“和平过渡”路线发生争论。1958年十八大修改了党纲、党章，强调通过和平手段过渡到社会主义，并认为通过斗争“可以使议会从为资本家服务的工具变成服从人民意志的工具”。1964年二十大再次

修改“澳大利亚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纲领，提出党的最终目标是“以和平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同时在党章中删去民主集中制条款。

1964年3月，中央书记兼维多利亚州委书记爱德华·希尔等因不同意澳共领导在国际共运论战中的观点，退出澳共，建立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1965年，劳·阿隆斯当选为澳共总书记，主张按照意共提出的“和平过渡”和“结构改革”的方式改造澳共，在国际共运中主张各国共产党之间奉行独立平等的原则。

1968年，在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党内分成两派，以全国执委帕·克兰西为首的一派指责澳共领导反苏，于1971年12月脱离澳共，另建支持苏共立场的“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

1970年澳共二十二大通过了《澳大利亚共产党的目标、方式和组织》的纲领性文件，取消了以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思想基础及党在争取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斗争中起主导作用的提法。1976年，澳共召开二十五大，劳·阿隆斯根据党章关于全国书记任期不得超过6年的规定宣布“引退”，大会选出集体领导的班子。1979年6月二十六次通过《澳大利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纲领，提出建设“民主自治的社会主义”的主张。1982年澳共召开二十七次，发动广大党员就澳大利亚的“社会主义前景”展开全党辩论。之后，以全国执委伯尼·塔夫特和执委会三人领导核心之一的马克·塔夫特父子为首的维多利亚州州委会23名委员于1984年4月宣布退党，并声明将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组织”。同年11月，澳共召开第二十八次特别代表大会，总结历史经验，统一思想，通过了《澳大利亚社会主义——一个更新的建议》，提出筹建“独立的

社会主义党”——“新左翼党”的设想。1987年二十九大明确提出要着手同一切感兴趣的个人和组织共同努力组建新党，并通过了《社会主义更新——现在向何处去》的主要决议。大会号召全党广泛宣传党的观点，听取其他左翼政党和组织对建立新党的意见，并将集体决定本党的前途。同年11月底，澳共同其他一些左翼政党代表及独立人士举行会议，并把该会议作为建党磋商第一阶段结束的标志。1989年12月，澳共召开第30次特别代表大会，决定澳共将逐渐停止其自身的政治活动，要求党员同其他左翼人士磋商，加快新左翼党的筹建工作。1990年7月，新左翼党宣告成立。澳共于当年年底自动解散。

（二）新澳大利亚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的情况

1. 前身为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的新澳大利亚共产党

前澳大利亚共产党于1990年解散后，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于1996年10月改名为澳大利亚共产党。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于1971年12月5日成立。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后，澳共党内形成对立的 two 派，并在党报上公开论战。以全国书记劳·阿隆斯为首的一派公开谴责苏联侵捷；以全国执委帕·克兰西为首的另一派则指责阿隆斯派反苏。在1970年召开的澳共二十大期间，支持苏共路线的原澳共党员在悉尼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社会主义党纲和党章，选举帕·克兰西为主席，彼得·西蒙为总书记，宣布成立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并于1971年12月正式脱离澳共。1975年6月社会主义党召开二大，通过了新的纲领，提出党的最终目标是在澳大利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主张澳大利亚革命分为两个阶段进行。1978年9月召开三大，提出争取和平是党的首要任务，并提出与工党结

成统一战线的主张。1981年10月四大上，党内在战略问题上发生争论，党主席克兰西提出党内出现了意识形态根本性的分歧，并批评党的领导人存在教条主义和极权主义倾向，损害了党内团结。而大会则指责克兰西进行分裂党的活动。1983年3月该党全国委员会解除了克兰西的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为此，克兰西及其在工会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支持者先后退党，并另行组织了名为“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论坛”的组织。这次分裂使社会主义党失去工会中的大部分阵地，党员也从近千人减为500人左右。1984年9月召开五大，选举杰克·麦克菲利普斯为主席，彼得·西蒙连任总书记。1992年10月七大号召党员“更多地参与到澳大利亚人民日益发展的斗争中去”，创立“由那些在许多方面持进步政策的政党和组织组成的左翼或进步的政治替代力量”，指出这些政党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具有更大的影响和号召力。报告重申该党坚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社会主义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最根本出路，指出在国际局势发展中应吸取的教训之一是“各国党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情况结合起来”。1996年10月6日，澳社会主义党举行会议，将党名改为澳大利亚共产党。

该党对外政策总方针是争取和平与缓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军备竞赛，要求澳政府奉行不结盟政策，主张废除美澳新条约。反对欧洲共产主义，认为它是“地缘政治学”。

该党在国内处于合法地位。现有党员数百人，组织机构分为中央、地区、支部3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每3年举行一次。总书记彼得·西蒙，主席汉纳·米尔顿。书记处负责党的日常工作。该党领导的群众组织有澳大利亚社会主义青年团，党报《卫报》，周报。党刊《澳大利亚马克思

主义评论》，季刊。

2.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1964年3月成立。1961年苏联共产党二十二大后，原澳共中央书记兼维多利亚州州委书记爱德华·希尔等，因不同意中央主要领导人追随苏共而被开除出党。1964年3月，希尔领导创建了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并当选为主席。该党成立初期，主要探讨建设一个新型的马列主义党和与修正主义决裂的问题。由于在建党问题上党内出现分歧，导致中央书记弗兰克·约翰逊及两名中央委员先后脱离或被排除出党。1969年，该党改变了过去不设基层组织的做法，在工厂等基层单位建立了党的支部，并注意开展群众运动。同年5月，该党发动反对遏制工人斗争的《仲裁法》的斗争，先后有100余万工人参加，具有全国性影响。此后几年中，该党在工运、学运、环境保护和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等方面开展斗争。1984年12月六大，希尔主动辞去党的领导职务，年轻的尼尔·麦克莱恩当选为新主席。1988年12月七大通过了新党章草案重新选举了中央领导班子。大会免去了麦克莱恩的主席职务，由布鲁斯·康沃尔接任。据康称，麦企图违背希尔制定的党的既定路线，并在党内“拉党结派”，遭全党反对。1992年12月，该党召开八大，总结了过去党的工作，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新党纲，并称自1984年以来党的领导年轻化的进程进入新的阶段。康沃尔继续当选为党的主席。

该党六大纲领重申，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一个具有高水平的生产和文化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社会。指出，在中间阶段，党的目标是团结所有劳动人民和爱国人士，实现一个独立民主的澳大利亚。该党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主义，坚持

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近年来还提倡摆脱教条主义和坚持党的集体领导。认为工人阶级不能忽视任何斗争手段，包括武装斗争。该党八大继续重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澳大利亚人民服务并与他们紧密联系、把马克思主义与澳大利亚实际相结合的路线，认为争取澳大利亚独立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任务。

该党对外主张和平、裁军、禁止和销毁一切核武器。表示支持争取南太无核区的斗争。支持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主张党与党之间平等、独立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反对在世界共运中有“领导党”和“指挥中心”。

该党现有党员数百名，主要力量在维多利亚州。党的领导机构是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在基层单位设支部。党主席布鲁斯·康沃尔。该党领导下的一些地区设有青年组织“争取澳大利亚独立学生会”。在墨尔本等城市经营有几家书店。党报《先锋报》，周报，1963年创刊；理论刊物《澳大利亚共产党人》，双月刊。

（三）澳大利亚工党的情况

该党于1908年成立，前身系1891年成立的“劳工政治联盟”，1908年改为现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工党曾3次执政。1914年，工党提出反对自由贸易，实施保护关税政策等主张，并再次获得大选胜利，组成第四届工党政府。1917年，工党内部因政府追随英国参战增加本国兵役和军费开支而发生严重分裂。以威廉·休斯为首的工党右翼脱离工党与反对党合并，组成国家党。1929年，工党在大选中获胜，组成第五届工党政府。1931年工党由于联邦议会党团再次发生严重分裂、在大选中

败北。此后的10年中，一直处于在野地位。工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直到30年代末平息下来，才得以在1941年大选中获胜并第六次上台执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工党政府积极主张反击法西斯的侵略，得到国内各阶层的拥护。

战后，工党政府积极领导澳大利亚的重建。但工党右翼领导人与垄断资本日益结合，公开打击进步和民主团体，镇压工人运动，并追随英美的对外侵略活动，积极组织东南亚反共联盟，工党政府影响下降，在1949年大选中失败下台。50年代，工党内部主要围绕着在共产党对工党和工会的影响问题上应否采取强硬的立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导致党内第三次严重分裂，并使工党陷于十分脆弱的状况，在随后几次大选中均遭失败。1972年，工党在野23年之后，在大选中提出反对越南战争和以社会改革为主的竞选纲领，从而击败了自由党—国家党联盟，上台执政。工党政府对外奉行较为独立的“多边”外交政策，宣布撤回澳派往越南的军事顾问，并很快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对内增加了教育和社会福利经费，积极支持土著人、妇女、移民等社会地位低下的组织的发展。由于工党对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危机采取的对策软弱无力，在1975年的大选中失败下台。1983年大选中，工党领袖罗伯特·霍克提出争取国家经济复兴与重建和民族和睦的竞选纲领，又以绝对多数获胜，工党第八次上台执政。此后，工党分别在1984年、1987年、1990年、1993年大选中获胜蝉联执政，1996年大选失败，成为在野党。

澳工党曾是澳最大和最早的工联主义政党，早期以工会运动为基础，积极主张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非正义和不平等行为的斗争。90年代以来，该党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党”，主张通过进化原则而不是采取“突然革命”的手段对现行制度

实行变革，逐步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目标。主张对现行法制进行民主改革以争取更广泛的社会平等；重新分配政治与经济权利，消灭以阶级、种族、性别、宗教、政治信仰、经济状况为由的歧视与剥削；承认公民有权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广泛原则下，实行进步的改革。主张对宪法、议会、选举制度、民权与法律机构进行改革，加强议会监督政策实施的能力，确保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使政府充分代表人民的利益。该党在经济政策上主张实行混合经济制度。该党宣称其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恢复全面就业，保证经济稳定迅速地增长，促进人民的福利事业。

该党外交政策总原则是维护世界和平。在外交事务中采取独立的立场，承认各国的自决权与独立；主张通过联合国解决国际争端；主张加强同亚太地区各国的关系；把促进与南太平洋岛国的平等关系置于优先地位；高度重视同东盟的政治、战略关系。该党主张停止一切核试验，赞成签订全面核禁试条约，反对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并倡议建立南太平洋无核区和支持建立印度洋和平区。

工党是澳大利亚重要政党，历史上长期执政，党的领袖多系国内重要政治家。工党还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该党有党员 155 万，其中个人党员 5 万人，集体加入工党的工会会员 150 万人，党员成份主要是技术工人、高级和普通公务员、职员和自由职业者，该党内部分左翼、右翼和中左翼。党的最高机关是工党全国会议。中央领导机构是全国执行委员会，由 28 人组成。中央下设两级地方组织。工党的中级组织包括党在 6 个州的支部。工党的基层组织是州以下的党的地方支部和下属工会。现任领袖是金·比兹利。工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由各州支部定期通过全国书记处向执委会交付的党费。此外，各

州支部必须向执委会交付所规定的国际联络活动费用。主要群众团体有：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澳大利亚青年劳工组织、全国劳动妇女组织。无中央机关刊物。

五、新西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变化

新西兰的共产主义政党本来力量就很弱，苏东剧变后进一步削弱。现有的新西兰共产党（1921年成立）党员总数不过数十人，机关报《人民之声》，已改名为《工人之声》，两周出版一次，发行量约1000份。新西兰社会主义统一党（1965年成立）在苏联、东欧演变后，仍表示信仰社会主义，但1990年7月，中央委员、前主席比尔·安德森1990年7月宣布退党，并拉走一批党员另立新党。现社会主义统一党只有党员数十人。前身为新共（马列）筹委会的马克思主义团结组织成员很少。工人共产党同盟（成立于1979年）受苏联、东欧剧变的影响，已于1990年2月改名为“左翼潮流”，并宣布该组织不再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不再主张阶级斗争。

目前新西兰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较强，它有几股力量：

（一）新西兰工党

新西兰工党成立于1916年，系社会党国际成员党。现有个人党员10万人，集体党员20万人。

新西兰工党是国内主要政治力量之一，曾于1935—1949、1957—1960、1972—1975、1984—1990年四度执政。1990年大选中，因此前执政6年政绩平平，内部纷争及无力解决失业问题等原因，以较大悬殊败给以博尔格为首的国家党，在97

个议席中仅获 28 席（9 名部长落选），除 1 席由 1989 年自工党分裂出来的“新工党”领袖安德顿获得外，其余 68 席全归了国家党。但在 1993 年大选中势力有所回升，获得 45 席，增加了 17 席，仅比执政党国家党少 5 席。而在这次大选前举行的多次民意测验中，工党一直领先于国家党，当时领袖穆尔的支持率也远远超过现任总理博尔格。这次大选结果是自 1928 年以来议会两党所获得席位最为接近的一次。工党在议席落后较多的情况下，通过一次大选达到比国家党仅差 5 席的水平实属不易，领袖穆尔对工党取得的成绩表示满意，工党也为之振奋，认为工党在大选中获得“胜利”，为工党争取下次大选获得胜利打下了基础。

在 1996 年大选中，采取的是新的“混合比例代表制”，从而取消了已历时 140 年的“简单多数制”。议席增至 120 个，其中一半按简单多数原则由选区直选产生，另一半将由各个政党按在全国范围内所获的选票比例分配。大选揭晓，工党获 37 席，得票率为 28.27%，仍为国内第二大党。由于与第三大党新西兰第一党谈判联合执政失败，工党现仍为议会第一大反对党。

新西兰工党建党初期宣布奉行“民主社会主义原则”基本纲领中提出的争取实现“生产资料、分配与交换社会化”的社会主义目标，其短期目标是将能胜任的人选进议会和地方政府。

该党对内奉行“和解、复苏、改革”，提倡协商、团结，号召劳资和解；主张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法律上人人平等，生产与分配要保证有利于人民的公正分配，促进和保护公民的自由与福利。

在经济政策上，该党变动较大，从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

国家干预、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增加就业的传统政策，变为认识到过去高福利、高税收和高消费政策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从而进行改革，实行开放市场，减少国家干预的政策。

具体的政策转变过程是这样的：新西兰工党 1984 年上台，其后在经合组织的帮助下，财政部长罗杰·道格拉斯开始实行新的经济改革，主要措施有：（1）放开物价，建立市场机制；（2）简化税种，降低税率，增加财政收入；（3）实现金融自由化，自 1985 年 3 月，新政府决定实行浮动汇率制；（4）设立中央银行，抑制通货膨胀，1989 年制定新的《储备银行法》，改变了以储备银行一直负责改善社会福利和促进经济两项任务的作法，而以立法形式把反通货膨胀确定为储行的唯一目标，并限制政府对货币政策的干预；（5）通过《财政法》，以法律形式规定实行平衡预算，保持储蓄与投资、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实现财政盈余，逐年减少外债；（6）在外贸方面，逐步开放国内市场，降低关税，废除进出口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取消出口补贴；（7）1988 年，制定了《国家部门法》，对政府部门进行改革，把一批从事商业和经济活动的部门组建成国有企业；在政府各个部门设立首席行政官，参照企业的管理方法管理政府机构，设立国家公务员委员会，管理国家公职人员；（8）开放劳务市场，削减不合理的社会福利。改革前新西兰就业有保证，失业有优厚的待遇，以致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宁可不工作，靠领失业救济金到国外生活或在国内到处游荡。1988 年制定了《就业合同法》，完全放弃了对劳工市场的限制，取消了过去工人必须加入工会的规定，削弱了工会的影响力，同时废除了对劳工就业的稳定性的保护，并允许私人 and 政府部门的雇主和雇员以谈判的方式确定工资形式和工资水平，有效地控制了工资的增长，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也使罢工很

少发生，减少了由于罢工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时，取消失业救济金，福利金和学生津贴。无正当理由而辞去工作，6个月内不能领取任何津贴，并把领取退休金的年龄由60岁提高到65岁。此外，家庭津贴也做了削减。取消未满18岁的未婚母亲的救济金。这不仅为政府节省了大笔开支，同时政府也希望该政策能催人奋发进取。

尽管新西兰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不是一帆风顺，因改革措施过急，波及面过大，损害了一些中下层人民的利益，执政后期失业严重，经济停滞不前，领导层出现严重分裂。1988年底，主张加快改革的党内右翼、财长罗杰·道格拉斯与担心工党失去传统支持者而主张放慢改革速度的总理朗伊发生严重争执，导致政府分裂，道格拉斯被朗伊解除财长职务。1989年4月，反对改革的党内左翼、前工党主席安德顿脱离工党，在一批主张维护工党建党宗旨的党员支持下组建了“新工党”。1989年8月，朗伊因歧见辞去党的领袖职务，由副总理杰旨里·帕尔默继任工党领袖并任内阁总理。9月，议会党团挑战他的领袖地位，帕尔默提出辞职，由外交部长迈克尔·穆尔接任。在同年10月大选中，工党以悬殊议席比例惨败于国家党。

工党在1990年大选中遭到惨败后进行了反思与调整。除了继续坚持免费医疗和义务教育、退休金保障和反核政策外，在经济上允诺将采取更加“自由”的经济政策。竞选纲领中提出，工党一旦执政，将大力发展经济，力争使年增长率达到4%。在大选中提出“就业、增长和卫生”的口号，紧紧抓住失业、经济发展计划和卫生改革等问题。承诺将废除现政府医疗体制商业化的作法，取消将公民划成等级的“病卡”制度，实行完全免费医疗。提出压缩开支，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废

弃现政府的“工业关系法案”和“就业合同条例”，改善劳资关系。这些主张顺应了选民要求提高生活水平、增加就业机会的愿望，在中下层选民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1993年11月的大选中，工党议席大量增加，但以微弱劣势再次败北。12月，议会党团进行投票，海伦·克拉克女士接替穆尔当选为工党领袖，前财政部长凯格尔当选为副领袖。克拉克宣布将改变工党1990年后主张的既非完全的市场经济，又非政府干预的“中间道路”，要在对工党政策进行全面审查之后提出一个“明确的民主社会主义”纲领，推行中左政策，以吸引更多的选民。

在1996年大选中，工党推出的调整后的经济主张主要有：低通胀，稳定物价，合理管理国有企业，对工业实行补贴；废除《就业合同法》，开放劳工市场。货币财政政策方面，主张不改变《储备银行法》，但扩大控制通胀率的范围；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减少财政盈余，放慢还债速度。

新西兰工党对外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主张通过公开的、建设性的对话解决国际问题；主张维护世界和平，特别是南太平洋地区的和平，认为新西兰的政治、经济前途取决于太平洋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合作、和平与稳定。主张反核与裁军，1987年执政期间，通过《新西兰无核、裁军及军备控制法案》。

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年会。中央领导机构是工党议会党团和工党理事会。议会党团的正副领袖在执政期间出任政府总理和副总理。中央以下设4级组织机构：工党地区理事会、地方市政选举委员会、工党选区委员会和基层支部。工党的机关刊物有《工党通讯》和《新民族报》。其现任领袖是海伦·克拉克女士（1993年12月当选）主席是玛丽安·斯特里特女士

(1993 年 4 月当选), 总书记罗布阿兰 (1995 年 3 月当选)。

(二) 新西兰联盟党

该党 1993 年底成立, 由新工党, 自由党、民主党、绿党和毛利人党 5 党组成, 自称有党员 1.5—1.6 万人。其领袖为新工党领袖吉姆·安德顿。他是工党前主席, 为当时党内反对改革的左翼, 1989 年 4 月挑战当时的领袖朗伊地位失败后退出工党, 成立了中间偏左的“新工党”, 主张维护工党建党宗旨。1992 年组建联盟党并成为联盟党领袖, 在联盟党内一直扮演核心角色。自由党于 1991 年 8 月从国家党内分裂出来; 民主党成立于 1953 年, 原名为社会信用政治同盟, 1985 年 5 月改为现名; 绿党成立于 1990 年 3 月; 毛利人党成立于 1980 年, 系从工党内分裂出来。联盟党在 1996 年大选中获 13 席, 得票率 10.12%。

该党主张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 政府应对中下阶层尽责任, 实行充分就业, 确保所有公民的收入真正平等。联盟党在经济方面, 主张修改《储备银行法》, 将货币政策范围扩大到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 财政方面, 增加社会福利开支, 增加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等级, 不排除出现财政赤字; 在微观经济和工业政策上, 主张废除《就业合同法》, 对工业实行补贴, 强化环境法, 加强政府调节。

在联盟党中, 民主党要求限制政府权力, 实行企业自由, 维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绿党强调保护自然环境资源。毛利人党提出毛利人的权益应受到保护, 增加在政府和议会中毛利人的比重。

六、日本共产党的探索与发展

冷战后日本共产党的人数一度下降，由50万人下降到36万人。近年来党员人数已回升到37万多人，党的基层支部已发展到2.6万个。与此同时，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现日共在参众两院的议员已由26名增至49名。地方议员由3927名增至4913名，超过了自民党，已成为日本政坛一支不可忽视的左翼力量。

冷战后，日共已逐步完成了在新形势下的理论和政策调整，并开始了新的探索。1997年日共二十一大提出“争取在21世纪早期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重点放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民主改革”，而不是立即“把日本推向社会主义”。

（一）二战后日本共产党探索革命道路的几个阶段

日本共产党自1922年7月15日成立至今，大体经历了战前在共产国际指导下进行斗争的时期，战后的冷战时期和冷战后调整时期。在近76年的党史中，充满了流血牺牲，艰难曲折，也有局部胜利的喜悦，但至今尚未取得任何革命阶段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讲，日共的斗争史和发展史，也是一部不断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理论、纲领路线等重大问题进行探索和实践的历史。早在1970年，日共十一大的报告就对这个问

题进行了概括的阐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在地球上还没有真正获得成功，因此，这的确是一个新的、人类进行伟大探索和实践的领域。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有新的复杂性，也有新的可能。我党根据人民解放和工人阶级解放的科学，尊重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意愿，同时，将竭尽全力，敢于和善于探索用尽可能少的牺牲来进行社会变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是为人民、为真理应尽的重要义务。”

二战后，重建的日本共产党对日本革命道路的探索可分为 3 个阶段。1. 以 1961 年日共八大独立自主地制定《日本共产党纲领》为标志，确定了党的基本纲领路线。认为日本“虽然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在实际上却是一个被美帝国主义半占领的附属国”，“从根本上统治着日本的是美帝国主义和在屈从它的情况下同它结盟的日本垄断资本集团”。根据这一对战后日本国家性质和统治结构变化的分析，认为“日本是介于西欧和亚洲之间的国家”，存在“两个敌人”，日本革命兼有双重任务。根据这一判断，确立了“两个阶段不断革命”的理论，即：当前的革命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统治这两个敌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这一革命又是“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阶段”，两个阶段之间具有“不断革命”的必然联系。这两个阶段革命的基本途径都是走“和平和民主的道路”，即走“选举和议会斗争的革命道路”，日共把这种革命方式称为“人民议会主义”或“多数人的革命”。2. 七八十年代，日共根据日本的国情并总结国际共运中的经验教训，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作了调整。这一调整的核心问题是围绕“日本社会主义的设想”进行的，日共在制定日本社会主义蓝图时考虑最多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自由与民主问题，为此，1976 年日共十三大通过并发表了《自由与民主宣言》。日共认为以

对斯大林的批判为重要转折，“多党制的议会模式”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共产党的共同模式，日共将按照这一模式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这一模式为核心提出的“欧洲共产主义”，应该叫“欧洲·日本共产主义”。3. 冷战后，日共已逐步完成新形势下的调整并开始新的探索。1997年日共二十一大决定，在不更名易帜，不放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大方向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前提下，日共的政权目标只能是“争取在21世纪早期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只能把政策和斗争的重点放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民主改革”方面，而不能把日本推向社会主义。

（二）探索的历史背景：吸取教训，走向独立自主

日本共产党从1922年成立到1961年完全独立自主地制定《日本共产党纲领》，在这近40年的斗争过程中，经历了很多艰难曲折，有许多痛苦的教训。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逐步走向独立自主的过程，也是一个理论上、政治上逐步成熟的过程。

1. 战前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的斗争及纲领争论。

日共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秘密成立的，整个战前均处于非法状态。成立当年即被接纳为共产国际日本支部，在国际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前仆后继的斗争。战前日共是日本所有政党中始终坚持反对专制主义天皇制和反对侵略战争的唯一政党，也是真正为争取工农群众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生活权利和民主、自由而斗争的政党，但是，在斗争过程中决不是一帆风顺的。日共成立初期，当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应用于日本来领导人民斗争时，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方面，都远未达到成熟的程度，那时党内还残存着工团主义和改

良主义等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在组织方面，对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设统一的革命政党的意义缺乏认识，仍保留着建党前共产主义者小组联合组织的那种宗派主义的特征。作为党的基层组织的工厂、企业、事业部门的党支部，在根据《二七年纲领》重新建党以前一个也没有建立起来。另外，日共一成立就遭到日本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和迫害，1923年6月第一次大逮捕后，面临白色恐怖，党的活动非常艰巨，党内党的战略策略及党的建设方面出现分歧并产生了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出现了以山川均和赤松克磨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日本不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主张解散党，进行合法斗争，并于1924年作出了解散党的决议，致使日本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斗争在极为重要的时期，大约有3年的时间丧失了革命运动的司令部，直到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于1926年12月日共召开三大，才批判了山川均的错误，决定重新建党。但此后又产生了以福本和夫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福本企图使党变为脱离广大工农群众的少数激进知识分子的党，并把这一建党原则搬到群众团体中去，引起了群众团体的分裂，同时他还认为日本资本主义处于“急剧没落”阶段，从而作出革命已迫在眉睫的主观主义判断，使党陷入孤立。直至1927年日共才批判了福本的错误，组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接着，天皇制政府为了准备侵华战争巩固后方，1928、1929、1932年，接连对日共进行了几次全国性大规模镇压和不断的小规模镇压，党的组织和群众团体遭到严重破坏，直至1935年最后一个中央委员被捕和《赤旗报》被迫停刊。这样，从1935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约10年期间，日共中央再未能建立起来，党的全国性统一活动也处于中断状态。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有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人惨

遭杀害或被严刑拷打致死，也有一批人发表叛党声明，放弃革命信念，但活着的日本共产主义者，无论在国外的，在狱中的，还是残留在社会上的共产党员和小组，都在极其困难的处境下，坚持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不间断地探索着日本革命的道路和实践。

战前，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日本共产主义者提供了一般的指导原理，但要探索日本的革命道路，科学地分析日本社会，规定日本革命的性质，从而制定出一个符合日本国情的革命纲领，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战前的日本虽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但与西欧各国不同，天皇制和寄生地主制等封建制度仍以复杂的形式盘根错节，而且由于黑暗的专制统治，既没有结社自由，也没有研究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共产党和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仍以极大的牺牲精神，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为把一般原理运用于日本实际作了大量探讨和实践。其中，既取得了不少成果，也有不少的历史教训，不仅劳农派摔了跟头，而且在共产国际和日共的内部也产生了混乱，从《二七年纲领》向《三二年纲领》过渡中，就曾发表过《三一年纲领草案》这一错误方针。

1927年，共产国际邀请日共领导人去莫斯科讨论通过了《关于日本问题的提纲》，即《二七年纲领》。这是日共建党以来第一个正式纲领，宏观对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作了全面分析，强调日本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废除天皇制和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纲领针对当时形势还强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紧迫性，并在批判以山川均为代表的右派机会主义和以福本和夫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群众性的先锋队的建党方针。

进入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加紧准备侵华战争，对

内进一步迫害民主进步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革命运动需要重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制定新的方针政策。为适应新形势，1931年4月，日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未定的意见提出了一个《政治纲领草案》。这个草案改变了《二七年纲领》关于日本革命性质和任务的规定，认为日本的国家政权性质为“金融资本专政”，提出日本革命是反对金融资本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否定了《二七年纲领》关于反对天皇制和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规定。草案发表后，在党内引起了混乱。鉴此，1932年5月，共产国际在日共代表参加下，在莫斯科讨论通过了《关于日本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纲领》，即《三二年纲领》。这个纲领纠正了《政治纲领草案》的错误，进一步发展了《二七年纲领》，指出统治制度的特征是：专制主义天皇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垄断资本相结合，天皇制政权为其利益总代表，特别指出天皇制是“国内反动政治和一切封建残余势力的主要支柱”，打倒专制主义天皇制是日本革命的“首要任务”；关于日本革命性质，认为“具有必须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倾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它提出的政治任务来看，例如推翻天皇制，消灭寄生的土地所有制，实现7小时劳动制，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妇女完全平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解放朝鲜、满洲、台湾等等，都是基本符合日本实际的，并预见战后日本应走的道路。但是，这个纲领也包含着主观地夸大日本革命形势，认为日本“革命决战”已迫在眉睫，以及把一切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改良主义工会领导人，尤其是把劳农大众党及其他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都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等错误和缺点。这些问题反映了当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革命形势的分析及“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论断。

2. 战后初期日本统治关系的巨变和战略争论。

战后美国对日本军事占领初期，出于维护本国利益和削弱战前竞争对手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目的，同时由于日本国内外民主力量的强大压力以及由于波茨坦公告有关对日政策规定的约束，推行了“非军国主义化”、“民主化”一系列改革政策，如解散军队、审判战犯、土地改革、制定新宪法、改专制天皇制为象征天皇制、劳动民主化立法、废除《治安维持法》、释放一切政治犯、给妇女以参政权等。战后这种民主化改革，虽然有其不彻底性，但基本上废除了战前专制主义天皇制和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从而使战后日本社会阶级发生了重大变化，垄断资本成为战后日本社会的统治力量。另外，由于战后日本人民斗争不断高涨和有利的国际形势，日共力量也取得了较大发展，在1949年日本战后第二届大选中取得较大胜利，获选票从上届的约100万张增至约300万张，得票率达9.8%，议席从上届的4席增至35席。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日共不得不进行新的探索和新的战略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统治关系这一问题，它在日本革命战略理论上所占的地位，恰恰类似战前天皇制问题所占的那种地位，不仅在日共内部，而且在日共与日本社会党之间，都成为战略争论的核心。就日共本身而言，从1945年底重建到50年代初就有了不少经验教训，经历了多次挫折和实践中的错误，才对“旧金山体制”所造成的新的国家从属体制达到一定的认识。

在日本刚刚失败后的一段时期内，日共就曾片面地把占领军看成“解放军”，而没能正确地认识到根据《波茨坦公告》由反法西斯盟军占领这一表面现象的背后，存在着由美国单独占领的危险性。这样，便产生了叫作“被占领下的和平革命”理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认为“美国占领军不是敌人”，而

是“日本民主革命的朋友”；美占领军当局在日本推行“非军国主义化”、“民主化”改革是对天皇制和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改革，是“拉开了日本民主革命的序幕”；还认为由于战败，日本垄断资本已大大削弱，民主力量强大了，因此，认为在美军占领下，也能采取与《三二年纲领》不同的策略，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来实现民主革命并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1946年日共五大的文件和当时日共总书记德田球一的报告都表现了这种理论内容，但由于野坂参三对这一理论作了较系统的阐述，因此也被称为“野坂理论”。基于这一理论和策略，战后初期日共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本国统治集团，而回避了同美帝国主义及其占领政策的斗争，在行动纲领中不提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军事占领的任务。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革命的胜利，美帝国主义出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需要，把统治亚洲的据点从中国转移到日本，变削弱日本的政策为扶植日本的政策。于1951年把苏联和中国排除在外，强行同日本单独媾和并签定《日美安全条约》，建立了以《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为中心的“旧金山体制”。从此，美国改变了对日本的统治形态并继续下来。在形势演变过程中，由于日共受到来自苏、美两方面的重压和党内家长式统治的影响，又产生了被称为“五〇年问题”的痛苦教训。1950年1月，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无视共产国际解散后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准则，突然在其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上发表评论员文章：《关于日本的形势》，从外部对日共“被占领下的和平革命”理论进行了粗暴指责和批评。这种作法引起了日共内部的严重矛盾和对立，使日共中央分裂为以德田球一和野坂参三为主的一派和以宫本显治等为主的一派。同年6月，正当日共

党内由于情报局的批评陷入混乱和对立之际，美国为了发动侵朝战争巩固后方基地，美占领军当局又下令“整肃”日共并勒令《赤旗报》停刊。在这种形势下，日共中央以德田为首的一派排除以宫本为首的一派，匆忙决定转入地下并另立中央，使日共的分裂成为定局。分裂后，德田、野坂一方，于1951年去莫斯科在斯大林主持下制定了《五一年纲领》和《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方针》，使党的路线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陷入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1951年末至1952年7月，根据这条路线，把日本与亚、非等地视为附属国，特别是与革命前的中国等同看待，并且不顾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对法、意等战时占领的不同，把中国式的游击战和建立农村根据地的经验，把欧洲式的城市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经验，直接搬到时代和国情都完全不同的日本，采取了以武装斗争为中心任务的错误作法。这一错误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党的组织遭到破坏，许多人被镇压而牺牲，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极大损失。1952年日共党员从两年前的10万多人激减至3万人左右，党领导的群众团体人数也大量下降，同年进行的大选中，日共失去了全部上届取得的35个席位。

3. 独立自主地制定《日本共产党纲领》。

1955年日共基本恢复党的统一后，吸取战前和战后初期十分痛苦的经验教训，为克服不幸的分裂，纠正错误路线，摆脱党内的事大主义（依靠大党、大国的思想）和外国党的干涉，以使用自己的头脑和力量独立自主地制定出一个正确纲领，倾注了全党的力量。这一时期纲领争论的内容波及到许多方面，但主要是以下两种观点的对立：一种观点主张两个阶段的战略，即重视《旧金山和约》签定后日本从属于美国的问题，主张先进行以从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

出来为内容的反帝、反垄断的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再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另一种观点则主张一个阶段的战略，即认为《旧金山和约》签定后的日本已基本上独立，主张进行打倒日本垄断资本并同时肃清对美从属残余的反垄断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接近于社会党左派的观点。从1958年日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前开始，前后用了约5年的时间，在纲领问题上开展了全党讨论，认真地、自主地、创造性地分析并正确地解决了战后日本国内统治关系的变化、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占领和半占领、日本从属于美国等等许多复杂问题，终于能够在1961年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日本共产党纲领》。这个纲领有以下特点：

第一，根据对战后日本国家性质和统治结构的分析，认为“日本是介于西欧和亚洲之间的国家”，存在“两个敌人”，因此纲领作了如下论断：“现在，从根本上统治着日本的是美帝国主义以及在屈从它的情况下同它结盟的日本垄断资本集团。我国虽然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又是国土和军事等方面受美帝国主义掌握的事实上的附属国。”

第二，根据上述论断，认为日本革命要分两步走，从而确立了“两个阶段不断革命”的理论，纲领规定：“当前的革命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两个敌人的新的民主主义革命、人民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是以“争取独立和民主为中心任务”的，但又是“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阶段”，两个阶段之间具有“不断革命”的必然联系，而社会主义革命却是“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一切剥削”为主要任务的。

第三，纲领规定，革命的基本力量在于“组成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统治的人民的强有力的广泛统一战线，即组成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第四，关于革命的方法问题，纲领指出，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力量积极地取得国会议席，并同国会外的群众斗争结合起来，如果能在国会中拥有稳定的过半数，就能把国会从反动统治的机关变成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合法地建立统一战线政府，并进而建立起使国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民民主国家制度。此后，日共不断对这个问题作了阐述，明确提出两个阶段革命的基本途径都是走“和平和民主的道路”，即走“选举和议会斗争的道路”，并把这种革命方式称为“人民议会主义”或“多数和人的革命”。

第五，纲领认为，扩大并巩固党，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建设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在各阶层广大人民中间深深扎根的强大的群众性的先锋党，是保证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取得发展和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1962年7月，日共八届三中全会把党纲的总路线明确概括为“四面旗帜”，即反帝反垄断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旗帜；保障祖国的真正独立和人民胜利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旗帜；建设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巩固而强大的日本共产党的旗帜；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与和平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旗帜。

日共认为，这个纲领的制定，标志着日共已摆脱党内的事大主义和外国党的干涉，在国际共运中开始确立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立场，同时也标志着日共在理论和政治上已逐步成熟起来。

（三）冷战时期对日本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

新的纲领路线确立后，日共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议会和选举斗争以及争取群众和重视自身力量发展的工作，其党员人

数、国会议员及地方议员人数和革新自治体、群众组织等都取得很大发展。但是，随着冷战的加剧、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国家中问题的暴露，日本国内外又出现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潮流，致使日共力量发展停滞不前。在这种形势下，日共必须向日本国民回答日共将在日本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作出调整。

1. 日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模式将是“多党制的议会模式”。

日共在制定日本社会主义蓝图时考虑得最多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自由与民主问题。日共认为它所探讨的多数人的革命和平过渡这一新的革命道路以及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设想，将不同于所谓“一党制的苏联模式”，而是一个新的“多党制的议会模式”，这是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共产党的共同模式，应该叫作“欧洲·日本共产主义”。

关于这一模式的具体设想，1970年日共十一大已初具眉目，又经过几年探讨，于1976年日共第十三次临时代表大会上通过并发表了号称“日本式社会主义”政治宣言的《自由与民主宣言》。该宣言提出了“三个自由”，即：“生存自由——保障健康而富裕的国民生活”；“市民政治自由——全面发展国民的主权和自由”；“民族自由——日本的自主发展和对等、平等的国际关系的基础”，从经济、政治、对外关系3个方面阐述了日共关于“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针对垄断资本和自民党侵犯自由的情况，从“三个自由”方面完整地阐述了自由的课题。

第二，指出了“三个自由”所面临的危机，揭露了自民党

是自由的压迫者以及它从属于美国和为大资本服务的本质。

第三，指出了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消灭剥削和压迫，使人类真正得到解放的道路，并阐明了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全面实现自由与民主的理论和运动。

第四，用事实说明只有日本共产党才继承和发展了自明治以来百年的自由和民主的传统。

第五，提出日本共产党要不断地维护和发展“三个自由”，不管在独立、民主的日本，还是在社会主义日本，都要做到：实行经济民主，保障健康而富裕的国民生活，保障劳动者的私有财产，发展高度的生产力，丰富优质多样的商品，不实行划一的统制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谋求灵活而有效益的经济运营，为人的文化、精神繁荣和自由发展打下物质基础；发展政治民主，实行多党制，保障一切政党的活动自由，实行通过选举更迭政权的制度，维护宪法五项原则，继承发展三权分立原则；保障国民的自由和人权，保障言论、出版和包括批评政府在内的报道自由，排除检查，情报公开，全面保障集会、游行示威、结社、罢工、团体交涉及其他团体行动权，反对国家权力介入国民的精神生活，不把任何世界观作为“官办哲学”，保障思想、哲学的自由，无条件保障包括传教、布道在内的宗教信仰自由，反对强加支持特定政党的义务，保障支持政党自由，不许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强制；各民族有自主选择本国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自由，有在外交、军事、经济问题上行使主权的自由，坚持维护本民族的自由和尊重其他民族的自由的方针，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也不准以社会主义“共同利益”为借口来侵犯民族主权和民族自决权。

2. 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

1973年日共十二大把“无产阶级专政”改为“无产阶级

执政”的提法，统称为“工人阶级政权”。其主要观点是：

第一，认为“专政”这一术语是拉丁语“dictatura”的译语，在马克思学说中的真正含义是掌握全部权力，即掌握国家政权，并且是以多数人的民主和多数人的支持为基础的政权。而在日语中则将其译为“独裁”，而赋予人民政权以“独裁”的概念，这不仅不确切，而且易于产生误解。

第二，原日共纲领中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表达方式是“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一词，除“工人阶级的政权”或“政治统治”外，没有别的意思。为使纲领无误解的余地，决定一律使用“工人阶级政权”。

第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原本是体现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的，但在马、恩以后的国际共运中却把这一概念同建立政权的“特定道路”、“国家形态”、“暴力革命必然性”等联系在一起，并把这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特征，这些观点和命题在像今天的日本这样的国家里是不适用和不能采用的，因为这些国家正在探索用和平、民主的手段进行革命的可能性，作为将来的目标要建立的人民政权的国家形态，是议会制民主国家。

3. 改变“马列主义”的提法。

1976年日共第十三次临时代表大会，根据长期理论研究和实践的情况，正式决定在党的纲领、章程等基本文献中不再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代之以“科学社会主义”。其主要理由是：

第一，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马、恩本人给自己的思想体系、学说以及为根据这一学说进行的运动所规定的名称。

第二，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特点在于继承

发展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知识，并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进步和发展。当前有些问题“已不可能停留在马、恩、列所阐明的范围内”，在马列之后又“增添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第三，认为“马列主义”的提法同斯大林所下的“列宁主义定义”分不开。而这一定义，虽充分反映了列宁的理论发展，但又把俄国革命的经验视为世界革命运动的普遍规律，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带上了概念化的倾向，成了限制探讨革命运动新方向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的重要源泉”。

第四，强调日共的这种作法是为了“正确地继承”，为了“把自主地、创造性地发展这一学说和运动作为基本方向，把提高解决日本革命各种问题的能力作为重点”，克服理论和实践上的“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态度。

4. 日共的“社会主义成长期理论”。

当反动势力利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问题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进行反共、排共时，为了反击反共攻击和维护自身的形象，1977年日共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成长期理论”。这一理论的总的论点是：从世界历史的长河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还处在初生时期，还存在许多历史局限性，因此不能只用社会主义国家所达到的现有水平，或只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问题，去衡量人类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那是非科学的态度。只有三大革命力量汇合后，特别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才能逐步达到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道义上都得到全面发挥的新时代。

日共认为造成社会主义国家现状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现有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不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由于文明的成熟而走向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普遍的历史顺序”前

进的，而是按照相反的顺序前进的。由于世界大战所产生的革命形势的影响，它们都是首先从取得政权开始，再来创造文明的基本，即它们都是从经济、文化落后而政治民主不发达的专制国家走向社会主义，这些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局限，使这些国家人民的事业必然是困难的事业，他们一方面要忍受低下的生产力和文化水平以及可怕的官僚主义这些像梦魇一样的遗产加在他们头上的痛苦，同时又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创造其所必须的文明前提。第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包围和封锁等严酷的国际形势造成的。第三，是某些领导人的错误政策造成的。头两个原因是不可避免的客观条件，今天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问题，许多都是与这种客观条件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共产党人和人民的努力和斗争是可以克服的。也有不少问题是第三个原因，即主观条件造成的，这是可以避免的。

“成长期理论”主张日本式的社会主义，既不模仿苏联，也不模仿中国，而是要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普遍历史顺序”前进，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取得的一切经济和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不仅在物质生产和生活、民主和自由、文化和个性的发展等方面都超过资本主义，而且要避免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局限性和消极因素，使日本出现一个“民主而富裕的社会主义”。

1985年日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社会主义成长期理论”等写进党纲，并把克服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霸权主义偏向”作为日共的国际主义任务。认为当今社会主义国家是从社会、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状况开始起步的，尽管如此，还是取得了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伟大成就，并在其可能的范围内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主客观原因，也存在许多

错误和工作失误，特别是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对别国党、别国革命进行干涉，甚至对别国进行军事入侵，这种“霸权主义偏向”，是造成国际紧张局势的因素之一，并损害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形象，给争取民族独立、和平和社会进步的斗争带来了困难和障碍，对世界进步起了反作用。同时，又认为这种“霸权主义偏向”有别于垄断资本主义本质决定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它“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只是偏离社会主义轨道的产物，是可以克服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具有“复原能力”。日共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要“使人民在大局上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标榜日本式的社会主义，回击资产阶级“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进行反共、排共”；维护独立自主形象，希望犯有错误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改正错误，在原则基础上同日共“恢复新的团结”。

5. 重新估价革命形势和资本主义制度。

1985年日共十七大，在肯定其八大以来的基本纲领路线的前提下，又重新估价了革命形势和资本主义制度，对一些战略、策略问题作了调整。

第一，大会重新估计了形势，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的矛盾还“不会自动引起革命危机”，在国内出现了战后“第二次反动攻势”，形势的变化和敌我力量对比使日本的革命运动处于“非直线发展”的局面，甚至产生了某些“后退”。

第二，大会决定从党纲中删除资本主义制度处于“总危机”和“处于极端衰落和腐朽之中”等传统提法，强调“各国革命在于那个国家的内部矛盾和革命的主体力量”的发展。大会认为，在策略上不能仅仅把列宁以全局观点对时代的认识来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不会自动崩溃，帝国主义者不仅不会自己退出历史舞台，而且将用一切手段延长其生

命，还“具有必要的活力”。认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总危机”理论带有片面性，在内容上包含着许多不明确之处。说“总危机”理论片面强调资本主义危机，助长那种经济危机会自动转化为革命危机的片面看法，而轻视统治阶级摆脱危机的对策和应变能力，过分依靠形势，忽视主观的努力，因而不能正确地认识形势和进行实践，容易产生左倾冒险主义或失败主义等错误。“总危机”理论片面强调社会主义体系决定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促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和瓦解，使革命党人产生依靠社会主义国家而轻视主观力量的倾向。大会要求全党认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实事求是地把握形势”，克服曲折发展带来的“失败主义”情绪，既不要寄希望于“资本主义自动崩溃”，也不要企图“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而要“把着眼点放在主观力量的发展上”。

第三，大会决定把“防止核战争、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和“维护民族自决权”作为国际两大重要课题写进党纲，并以“反帝国际统一战线”不能概括这两大课题的复杂内容和不同性质的问题为理由，决定从党纲中删除“反帝国际统一战线”的规定，同时，以大会的名义呼吁建立超越政治、思想、信仰等一切差异的广泛“反核国际统一战线”。与维护民族自决权相关联，还决定在党纲中加进了“解散一切军事集团，争取建立真正的集体安全保障体制”，“反对新殖民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争取确立一切国家的经济主权和以平等、公正为其他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等内容。关于日共在纲领中对国际政策作这种调整的目的，大会认为在于“适应复杂的形势”，以便“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得到各国人民的同情”。

第四，大会在国内政治方面，提出了“结成以反核和平五项目标为内容的反核阵线，成立无核政府”的主张。五项目标

是：以防止核战争和废除核武器为紧迫任务；严守无核三原则；反对把日本引上核战场化的一切措施；由国家补贴原子弹受害者；在发扬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保持国际团结。日共提出这一主张的原因，是由于日本国民赞成取消日美军事同盟的人“还是少数”，但主张反核的却在70%以上，参加1985年日共倡导的反核和平签名运动签名的人，已达1625万人。大会主张：以“反核阵线”和“无核政府”为旗帜，集结国民的大多数，“形成对统治阶级反动攻势的包围网”；以“不与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直接挂钩”的反核和平五项目标为条件，向赞同这一立场的一切势力“敞开合作的大门”，以便形成“超越思想、信仰差异的广泛阵线”，迂回地向“革新统一战线”接近；把“反核阵线”作为反核国际统一战线“强有力的一翼”，以扩大日本共产党在世界的影响。

（四）冷战后日共对国际共运问题的反思

日本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国际共运中采取独立自主的立场，对原苏共和苏联的错误进行了斗争，对许多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的反思。下面仅就苏联东欧剧变后日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简述如下：

1. 苏东剧变是“苏联模式”的破产。

日共在1990年十九大、1994年二十大文件中均阐述了对苏联东欧剧变的看法，择其概要，有以下几重意思：

东欧的事态，以激烈的、爆发式的形式表现了统治阶层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矛盾的焦点是，苏联把斯大林、勃烈日涅夫式的政治、经济体制用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手段强加给东欧，而该国统治阶层又接受了这种强加，这就脱离了科学社会主义所要求的人民的愿望和群众的民族及社会要求。事态的

本质表现了苏联政治、经济模式和大国主义统治及霸权主义强权的破产。东欧剧变是在极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以极复杂的形式展开的，既有从苏联大国主义统治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体制下摆脱出来的一面，但其中也有否定和放弃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积极方面和向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政治战略投降的倾向，还出现了共产党改名易帜、搞资本主义复辟、向北约过渡、向社会民主主义转变等情况。由于东欧各国原执政的党所犯的错误是严重而长期的，这些国家将不会随着剧变而立即走上健全、自主的社会主义轨道，能否开辟出真正的社会主义前途，还有赖于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立场的真正有觉悟的势力如何发展，并全身心地为同人民结合起来作出巨大努力。

关于苏联和苏共的解体，日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于1991年9月1日发表了一个声明，题为《欢迎犯下巨大历史罪恶的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党寿终正寝》。该声明全面反思了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苏共对国际共运和平民主运动所犯下“历史性罪恶”，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

(1) 认为苏共始终没有对对外搞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内搞官僚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反省，而在这种脱离科学社会主义的体制维持不下去的情况下，走上了一条极端的、完全抛弃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和期望资本主义的道路，采取了自我否定、自掘坟墓、自我毁灭的“变节者”的态度。

(2) 日共认为，苏共和苏联的解体，是那些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和逆历史而动者必然的、合乎规律的结局。并认为，苏共解体后出现的各种政治潮流，仍具有共同的问题，这就是都没有反省大国主义并期望资本主义，呈现出倒行逆施的复杂状态，因此，那种把苏联剧变看成是“继十月革命后的第二次革

命”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3) 日共说，对苏共这样的党的解体持“举双手欢迎”的态度，因为解体本身将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事件，它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立场继续前进的力量“消除了障碍”，无论对世界的和平和进步力量来说，还是对日本共产党的斗争来说，都会带来极为有利的因素，同时，就大局而言，这将使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从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及追随它的错误中解放出来，为世界共运的前途开辟出新的自主发展的条件和可能性。

2.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

1976年日共第十三次临时代表大会就正式决定在党纲、党章等党的基本文献中不再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而代之以“科学社会主义”。后来，随着苏联东欧事态的发展，反共舆论利用苏联东欧剧变掀起了一个世界性的反共攻势，在日本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否定日共的科学社会主义立场和日共的存在价值。在此形势下，日共不得不联系国际共运和日共的实践，从学说、运动、体制诸方面反复阐述了“何为科学社会主义”，并反思了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1990年日共十九大决议对此作了论述：

(1) 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日共认为，它是作为人类取得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发展的理论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之集大成而诞生的，并在其后一个半世纪里不断吸收人类知识的成果而发展起来的科学世界观。它没有停留在马、恩、列在各自的历史时期所阐明的范围内，而是随着形势和人类知识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生动学说。这一学说并未落后于时代，在分析当今世界和日本的社会发展方面，正发挥着无法推翻的、新鲜的和科学的生命力，它关于只有人民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及阐明了资本主义剥

削本质的剩余价值学说，仍然是从本质上理解当今世界不可缺少的科学指南。认为苏联和苏共的解体并不表明科学社会主义已经过时，而恰恰是长期脱离科学社会主义轨道的必然结果。日共还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就在于批判资本主义，但不是把技术上衰退、经济发展下降到警戒线以下等问题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局限性，而是马克思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就在于：使生产力发展到极限，一方面创造出新社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不能驾驭这种生产力，使阶级矛盾以新的形式不断扩大。因此，认为那种只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科学技术革命”、“信息化革命”等技术发展的一面，而看不到现代资本主义所充斥的各种矛盾的阶级实质的观点，是根本上错误的。在分析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矛盾和原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化的恶果后，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有效的，并越来越放射出光辉，而资产阶级舆论散布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崩溃”和“资本主义万岁”的观点，只不过是无视世界资本主义的现实，利用原苏联东欧事态制造出的反共谬论。日共称，他们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态度是，一方面要坚决维护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另一方面又不采取把先辈们的每一个命题都加以绝对化的教条主义态度，而是坚持自主地、创造性地探求适应当今历史形势的发展方向的立场。

(2)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运动，日共认为，这一运动决不是把头脑中描绘的理想蓝图强加于社会，而是在科学社会主义指引下，阐明社会的现实矛盾，并沿着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道路，经过必要的阶段，去推动社会变革，这一运动只有成为符合各国国情的自主运动，才能取得进展。并称，日本共产党虽然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但根据日本社会的现状，不是立即去实现社会主义，而是把实现资本主义范围内的真正的

独立和民主作为当前的任务，根据多数国民的利益，指出解决日本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方向，历史的步伐证明了这一立场的正确性。认为原苏联和苏共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把自己的错误的路线和模式强加给人民和国际共运。

(3) 关于社会主义的体制问题。日共认为，虽然 20 世纪堪称是一个民主主义对专制主义、民族独立对民族压迫、劳动人民对抗垄断资本要求提高生活和权利方面都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和空前进步的世纪，但是，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地球上还尚未实现。最先踏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就其革命的出发点而言，还是以争取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但是，由于其领导人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结果，作为社会形态，在尚未达到社会主义之时就迎来了“解体”。日共认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体制论的核心问题，应把苏联也划分为两个时期，从根本上把列宁领导的时期与斯大林及其之后的时期加以区别。列宁对社会主义体制进行的探索，从整体而言，都表现了社会主义的先驱作用和制度的优越性，给整个世界政治、特别是民族解放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斗争均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巨大的激励。但是，在列宁死后，他根据科学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探索和铺设的过渡时期的轨道，遭到了斯大林等人的歪曲，使苏联的体制逐渐转换为对外以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内以官僚主义和专制主义为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导致了社会体制的全面变质，到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引导下，走上自我毁灭和资本主义化的道路。因此，日共得出结论说，“已经崩溃的原苏联社会，既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争取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社会，而是以对人民进行压迫和剥削为基础的社会。”日共称，日本社会进步的前景，将不会以这个那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为模式，而

是要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引下，争取在全面继承和发展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实现日本式的社会主义。日共还认为，作为一种社会体制要取得真正的发展，那还是今后的课题，还有赖于日本共产党这种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活动的党发挥作用。日共十九大为此确认了当前社会主义的四项基本准则，这就是：不仅要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而且要保障个人的积极性，进行灵活有效的经济运营；发扬比资本主义民主制更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切实尊重其他民族的民族自决权；积极追求世界和平，把废除核武器作为紧急课题。

(4) 关于当前的国际共运问题。日共二十大认为，苏联和苏共的解体为国际共运的前途创造了自主发展的新的条件和可能性。并认为，当今世界的特点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正在加深；“南北差距”不断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也在加深；原苏联、东欧所走的迅速资本主义化的道路给劳动人民带来了灾难，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和反思。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解体后世界上流行的“资本主义万岁论”已黯然失色，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新的运动和自主探索社会进步道路的萌芽，国际共运和共产主义者强烈要求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为推动世界和历史的发展而发挥更大的作用。基于这种情况，日共二十大提出，日共作为一个一直同苏联的错误作斗争的独立自主的政党，首先要在日本这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自主地探索和追求社会发展的道路并使之得以前进，为打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开辟光明的前景，为实现国际团结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当前也愿意同在各自国家自主探寻社会发展道路的力量进行对话和团结，并在对话和团结时，希望遵循以下国际共运健全发展不可缺少的标准：(1) 从根本上清算国际共运中的霸权主义及追随主义路线；(2) 同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崩溃论”作坚决斗争；(3)以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指南，推动社会合乎规律地向前发展。

(五) 日共的近况及其新的探索和实践

以1997年9月日共召开的二十一大为标志，可以说日共在冷战后的新形势下，又走上了一条对日本革命进行新的探索和实践之路。

1. 日共已逐步完成冷战后新形势下的调整，整体力量和政治影响呈上升趋势。主要表现在：

(1) 经过逐步过渡，领导体制已基本完成新老交替。在这次大会上取消了主席职位，统率日共近40年的老一代领导人宫本显治退居二线，确立了以战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领导人不破哲三和第三代领导人志位和夫为核心的集体领导体制，使领导集体既有继承性，又具有活力。另外，为适应新形势，还不断调整了干部队伍结构，大胆启用更具有现代意识的年轻干部，这次二十一大举措尤为突出，本届中委近30%更新换代，候补中委全部为新人，政治局和书记处也作了大量调整，志位和夫自35岁担任书记处总书记以来，在党内外影响大增，这次大会又以最高票数当选，现年仅42岁。

(2) 党的组织发展已开始走出低谷，出现了稳步发展势头。冷战后，受国内外反共思潮的冲击，日共党员人数一度从近50万人下降到约36万人。经过整顿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到二十一大前夕，党员人数已回升到37万多人，党的各级委员会趋于健全，党支部发展到2.6万多个，基本形成了覆盖日本全国的组织网，党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影响，特别是在基层的作用明显加强。二十一大又以执政为目标提出了数量和质量并举的建党方针，虽然要取得大发展并非易事，但今后如政策

得当、工作有力，党的力量影响继续有所发展不是不可能的。

(3) 日共在困境中重视联系群众的工作，冷战后，日共所属工、青、妇、和等群众团体及众多行业性外围群众组织，不仅保存下来，而且得到了巩固。这些群众团体和组织是日共的基础支持力量，也是日共联系和发动各阶层群众的桥梁，已成为当今日本为数不多的能够发动较大规模群众斗争的组织。例如，1997年10月21日就由废除《日美安保条约》中央实行委员会发动了反对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全国统一行动”，在全国进行了集会、游行示威、宣传和学习等各种活动，仅东京会场就有8000多人参加。

(4) 从1994年日共二十大到1998年参议院选举，日共的支持率和议员人数明显增加。众参两院议员由26名增至49名；各级地方议员由3927名增至4913名，超过了自民党；单独执政的革新自治体由43个增至77个。日共在议会斗争中取得进展的主要原因是：在日本政局持续动荡的形势下，日共一改过去僵硬的斗争策略和手法，加大了对日本国民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的灵活参与和工作力度，各级议员及广大基层党员注重为当地居民谋福利，大大增强了政策主张的现实性和感召力；在近年来日本政界分化改组加快，政党政策趋同，中、左翼政党势力减弱，总体倾向右摆，国民对政治产生厌倦情绪的背景下，日共始终主张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其基本方针政策独树一帜，同时又是唯一拒收由国家财政即国民税金支付的“政党助成金”的政党，树立了廉洁公正的形象，赢得了不少无党派选民的支持和信任。

2. 在不放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方向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前提下，日共采取了更加符合日本国情的方针政策，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将把政策和斗争的重点放在

“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民主改革”方面，坚持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日本国民的切身利益。

日共二十一大重申了革命的阶段性理论，认为日本社会的进步需要通过和平和民主的方法，分阶段地、一步一步地向既定的目标接近，在今后很长的时期内仍属民主革命阶段，而且每一步怎么走，走到何种程度，都要由多数国民通过选举来作出选择。日共认为，虽然日本政治已进入“共产党与自民党对决”的时代，但目前这种对决只是表现在政策上，就力量对比而言还相差甚远。日共二十一大认为，在现阶段日共的政权目标只能是通过集结包括保守层无党派在内的革新、民主力量，争取在21世纪早期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在现阶段日本向何处去的问题上，日共只能以“国民作主人”为政治信条，争取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民主改革，而不能立即把日本推向社会主义。基于此种认识，日共二十一大提出了民主改革的三项目标，即废除《日美安保条约》，同美国和亚洲各国都建立真正的友好关系，使日本成为一个为世界和平作贡献的独立的无核、不结盟和中立的国家；改变“无秩序的资本主义”，让大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使日本成为一个采取优先国民生活的经济发展方针的国家；阻止改宪和军国主义全面复活，使日本成为一个在所有领域都能实行民主和人的尊严都受到尊重的国家。

3. 日共的世界战略，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侵略战争，追求世界和平和民族自决权，并为实现日本国民的夙愿——废除核武器而努力。

日共二十一大认为，今后在世界政治方面，美国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将成为威胁世界和平和稳定的最大障碍。亚太地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今后都将占据更

加重要的世界地位。这一地区虽然是美国霸权主义战略的特别重点，但另一方面，这一地区也是对抗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军事同盟政策的不结盟运动具有巨大力量的地区。因此，日共今后将会特别重视亚洲外交，并把斗争重点放在反对美国的经济霸权主义和军事霸权主义及扩大军事同盟的政策方面。

4.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日共认为在 20 世纪世界上还没有出现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成功范例。

日共二十一大报告分析这一情况的原因时指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属于发达资本主义的那些主要国家没有开始争取社会主义的变革。像旧俄国那样从落后的状态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特别困难的。在这种困难的基础上再加之斯大林犯下严重错误，使这一事业发生了决定性的变质，把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轨道转换成了霸权主义、专制主义的轨道，使苏联及从属它的各国堕落为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社会体制。

日共二十一大对 21 世纪的共运形势作了总体展望，认为，21 世纪新的特征之一，是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处于矛盾和困难不断加深的过程中，新的世纪将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各种条件走向成熟的世纪，至少将成为在世界规模上潜在成熟的世纪。基于这种认识，日共将在下个世纪进行新的挑战，在日本这个既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又是美帝国主义从属性同盟者的国家里，不断地进行探索，并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事业一步一步地推向前进。

5. 日共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事业，既是各国人民的自主事业又是世界人民的共同事业，因此，日共二十一大强调，将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与各国自主探索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力量、真诚追求世界和平和社会进步的力量进行对话和团结，尽

力开展多种多样的国际活动，以增进相互理解和在共同的课题上进行合作，这对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上的新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在这种政策背景下，日共与中共于1998年6月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七、日本社会党的更名与调整

日本社会党，1945年成立，长期是国内第二大政党。它过去坚持实行有别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种“社会主义”，但冷战后明确宣布已“选择社会民主主义”，将为开辟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而奋斗，并将此写进了党章的前言。1996年又改党名为“日本社会民主党”。日本社会党的这些变化，绝非偶然，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党内长期斗争有密切关系。

冷战后由于日本自民党的分裂，社会党有机会得以重登政坛，1993年与其他几个党联合执政，1994年又与自民党联合组阁，党的委员长村山富市担任了日本首相。但尽管如此，日本社会党的力量还是削弱了，影响下降了。现日本社会民主党有党员3.5万人，在众议院占15席、参议院占12席，在国内的地位已由1955年以来的第二大政党跌至第六位。

日本社会党于1945年11月2日由战前的几个合法的社会

民主党，即右翼的社会民众党、中派系统的日本劳农党以及左翼的日本无产党联合组成。成立大会通过的章程规定，该党实行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国际政策上的和平主义。

1947年4月，在日本新宪法颁布后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社会党在众议院获得43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在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该党同民主党、国民协同党联合组阁，该党书记长片山哲出任首相，另有6名社会党人出任内阁大臣。片山首相上任后没有坚持该党的政策主张，放弃了竞选诺言，逐步失去了劳动群众的信任，也加剧了党内矛盾。在内外夹击下，片山内阁执政不到8个月被迫下台。以后社会党进入了长达45年的在野时期。

（一）“战斗的”日本社会党

日本社会党与欧洲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不同，它在50—60年代的群众运动和反战和平运动中总是站在斗争的前列，具有很强的战斗性，曾被誉为“战斗的社会党”。

日本社会党在40年代末右翼掌权时期，选票下降。1949年1月举行大选，社会党的得票率从前一次大选的26.2%跌到13.5%，众议院席位从143席锐减到48席，党的主要领导人片山哲、西尾末广、加藤勘十、野沟胜等均落选。

1949年4月，社会党召开四大，铃木茂三郎出任书记长，扭转了过去右派独揽大权的局面。1951年1月，社会党召开七大，铃木茂三郎当选为委员长，左派在组织上掌握了领导权。朝鲜战争爆发后，社会党提出“和平四原则”（全面媾和、坚持中立、反对军事基地、反对重新武装），掀起反战和平运动。铃木委员长当时提出“青年们不要拿枪，妇女们不要送丈夫上战场”的口号，得到广大日本人民的拥护。

50年代后半期是群众运动高涨时期，社会党进一步走上“战斗化”的道路。在国会内，他们反掉了自民党提出的“小选举区方案”，阻止通过“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修正案”；在国会外，他们在反对扩建军事基地、支持矿工大罢工、阻止签订新《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中，站在群众运动第一线，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国际斗争中，他们公开反对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该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在率领社会党代表团第二次访华时，发表了“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演说，得到中日两国人民的支持，但遭到自民党右翼势力的攻击，并于翌年被右翼分子刺杀。这时期，社会党在议会内外的斗争中代表了广大群众的意愿，得到了他们的支持。1958年5月举行大选，社会党在众议院获得166席，这是该党建党以来取得的最好成绩。社会党的“战斗化”引起党内极右势力的不满，西尾指责党的领导“反美容共”，而党内最激进的社会主义协会派则要求社会党进一步“战斗化”，党内矛盾再度激化。1959年9月，以西尾、河上派为代表的右翼议员退党，西尾等人于1960年1月另建民主社会主义党。

（二）带“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社会党

日本社会党50—60年代的纲领也与欧洲社会党不同，由于当时党内的左翼力量占优势，其纲领主张被认为或多或少地带有一定“马克思主义色彩”。

40年代末以来，党内左右两翼围绕党的纲领主张争论十分激烈。1949年4月，在该党四大讨论“运动方针草案”时，左派提出了由稻村顺三起草的方案，方案集中反映了“劳农派”马克思主义观点，如把当时的革命性质规定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次革命”论，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革

命”论，把党的性质规定为“工人阶级政党”。右派提出了由森户辰男起草的另一方案，方案中提出通过经济民主主义“自然地通往社会主义”，党的性质是“国民政党”。

1955年通过的《日本社会党纲领》（又称《统一纲领》）是左翼和右翼方案的折衷产物。该纲领虽然是折衷方案，但仍把党的性质规定为“阶级群众政党”，党的纲领目标是“消灭剥削”、实行“重要生产资料社会化”和“计划经济”，以便实现“自由、平等等基本人权和人性完全得到解放的社会”。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日本社会党的这份纲领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政权从一个阶级手中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中的“政治革命”，但要通过“民主道路”来实现，而“不用暴力或武力”。同时也肯定议会外群众运动的重大作用，主张把议会斗争与群众斗争结合起来。当然同其他社会党一样，日本社会党也提出要“克服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蹂躏了民主主义，否定人的个性、自由和尊严”。

1966年日本社会党二十七次通过的《日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以下简称《道路》）进一步向左转。它主张通过和平、民主、议会的方式在日本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它还强调，“只有通过革命实现社会主义，才能突破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局限性”，并批评“民主社会主义者”期望“通过改革和进步的积累”，使“资本主义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是“一种空想”。

该文件基本反映左派“社会主义协会派”的观点，是党内向坂派的“科学社会主义”战胜江田派的“结构改革路线”的产物。60年代日本的群众运动逐步转入低潮。社会党在总结三池煤矿工人罢工斗争和反安保斗争的经验教训时，江田三郎书记长提出“结构改革”新路线。他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的

“结构改革”的核心观点是：“通过不断改良的积累，资本主义即将自然地成长为社会主义”。1962年江田提出的“江田构想”，所确定的社会主义目标是：“美国的高度生活水平，苏联的彻底的社会保障，英国的议会民主制，日本的和平宪法”。党内左翼认为，江田的思想不是社会主义思想，而是“右翼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于是社会党左派，特别是“社会主义协会派”，开展了对江田的批判。同年11月，社会党召开二十二大，大会否决了江田“结构改革”论的主张，江田被迫辞去书记长职务，成田知己继任书记长。

后来，党内“社会主义理论委员会”起草了《道路》这篇纲领性文件，在1966年1月召开的党的二十七大会上获得通过。《道路》是《左派社会党纲领》的进一步发展，较全面地反映了“劳农派”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除坚持“一次革命论”、“和平革命论”以及“阶级群众政党”的提法外，还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自称拥护“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指出，“现代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第二，主张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必须实行某种形式的阶级统治”。《道路》指出，十月革命以来，全世界已有13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日益显示出其优越性”。宣称日本将来不采取中苏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但又说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初期，为了压制反革命势力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秩序，“必须实行某种形式的阶级统治”，这实际上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道路》对《日本社会党纲领》（即1955年《统一纲领》）的某些观点作了较大修改，删去了“克服共产主义”

等反共词句。

总之，60年代初期和中期，社会党左派占据领导地位，思想上受社会主义协会派的影响很深。由于《道路》反映了“劳农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后来成为党内开展理论斗争的导火线。

（三）调整改革，逐步向西欧式社会党靠拢

日本社会党在70—80年代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党的措施，逐步向西欧式社会民主主义靠拢。从70年代中期起，社会党围绕《道路》这个激进文件展开了激烈争论。除“社会主义协会派”之外，其他各派都批判1966年的《道路》是教条主义理论，不符合日本的实际情况。社会党中央于1978年成立了“社会主义理论中心”，着手研究和起草新的方针和路线。经过几年的争论，1982年通过了《80年代国内外形势的展望和社会党的路线》（简称《路线》）和《创造新的社会——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设想》（简称《设想》）两个文件，对社会党的1955年的《统一纲领》和1966年的《道路》纲领作了不少修改。80年代的《路线》和《设想》强调，“实现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不断的社会变革过程，而不是通过革命可一举实现的理想王国”，社会党要“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联合劳动阶层的群众团体和各党派，形成议会多数”，“经过长期、逐渐的民主改革来实现社会主义”。

1983年9月，石桥政嗣在该党四十八上当选为委员长，他提出“新社会党”的口号，加快了调整党的路线的步伐。1986年1月社会党通过的新宣言指出，社会主义是以尊重人的“人道主义”为基本理念的，以“人的解放”为最终目标。这是社会党向社会党国际靠拢的重要标志。《新宣言》放弃了

原来自称的“科学社会主义”和“通过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等观点，主张通过参与和介入，通过议会道路建立政权。

1986年1月党的五十大上通过了《日本社会党新宣言》，标志着日本社会党在理论和路线上的重要转折。《新宣言》的基本内容及特点是：

首先，指出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是人道主义，而不再是“科学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以尊重人的“人道主义”为基本理念，以“人的解放为最终目标”。《新宣言》不再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来说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是用抽象的人道主义来说明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显然，该党的新理论已经放弃了《道路》中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不再自称“科学社会主义”了。

其次，把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看作是“社会改革的过程”。《新宣言》指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以现实为出发点的不断的运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社会改革的过程”。这就是说，随着改革的不断进行，社会主义因素会不断增加，而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增长，就可以使资本主义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新宣言》还指出，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容是“从参与、介入到自治的发展”。即首先是对现实提出“异议”，然后是向各种决策机关“参与和介入”，以实现劳动人民的要求，接着是通过议会道路建立政权，同时发展自治，创造新的社会。

第三，提出了建立联合政权的设想。《新宣言》指出，在“政治意识和价值观多样化”的情况下，社会党以“完全实施宪法为根本”，“以改革政策为前提”，“对任何政党的政权关系都作出积极反映”，并提出联合一切政党，甚至包括自民党在内的联合政权设想。

第四，把社会党的性质规定为“代表所有劳动人民并向所

有人开放的国民的党”，从而放弃了以往是“阶级群众政党”的提法。

总之，社会党摆脱了过去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状况，逐步跨入了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行列。

（四）冷战后修改“旗帜”并改变党的名称

冷战后，日本社会党在理论纲领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用“社会民主主义”取代原来的“社会主义”旗帜。1990年4月该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在党的定期大会上致辞时说，为了开辟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要努力团结广大的“社会民主主义势力”，这是社会党在党的定期大会上第一次提“社会民主主义”，而且大会还将“选择社会民主主义”写进了党章的前言。1993年5月发表《九三年宣言》，明确用“社会民主主义”代替“社会主义”，提出要团结社会民主主义势力，甚至要团结保守自由势力，取代自民党政权。

1996年1月19日，社会党为了向“开放的市民政党”过渡，改名为日本“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同时党的委员长改为“党首”，村山继续担任党首，党的书记长改名为“干事长”，干事长由佐藤观树担任。不同意改变党的名称的矢田部理等七八人另组新社会党。这是改为社民党后的第一次分裂。同年3月，社民党召开一大，通过了党的活动方针。9月一半左右的社民党议员参加新成立的民主党，使该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下降到30席，这是该党改称社民党后出现的第二次分裂。为了挽救党，村山辞去党首职务，请土井出马。在社民党处于危难之时，土井毅然回到社民党（当众议院议长时脱离社会党，不属于任何政党），并再次出任党首。但土井未能挽回党的颓势，在同年10月举行的大选中，社民党又失去一半席

位，只获得 15 席。在 1998 年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议席由 21 席减少到 12 席，从而由 1955 年至 1994 年的第二大党跌到第六位。但土井表示，要重建社民党，从零开始作出努力。

（五）内外政策上有调整，但仍保持了连续性

社会党在国内外政策上，出现了进一步向右的倾向。1994 年 6 月 29 日村山担任首相后，对社会党建党以来坚持的一些基本政策有所调整，形成了向自民党政策靠拢的趋势。社会党原来认为“自卫队违反宪法”，主张废除《日美安全条约》，解散自卫队，实行“非武装中立政策”。自 80 年代后半期以来，这一立场有所调整。1987 年山口鹤男书记长说，《日美安全条约》和自卫队虽与和平宪法“相矛盾”，但它是“现实存在”；“当前要把自卫队限制在专守防卫的范围内”，“防卫费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 1%”，到 21 世纪应缔结日美友好条约，以代替《日美安全条约》。1991 年社会党通过新的安全保障政策，说“随着冷战的结束，《日美安全条约》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日本“应尊重同美国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通过外交谈判，解除《日美安全条约》，缔结日美和平友好条约，认为自卫队虽“违宪”，但“合法”。1994 年 7 月村山首相在临时国会上说，非武装中立政策过去在保卫日本和平和推行轻武装政策上曾发挥过作用，但在“冷战结构崩溃的今天，它的政策作用已经完结；自卫队是自卫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实力组织，是宪法所允许的；《日美安全条约》是确保日本安全所需要的”，日本要继续“坚持《日美安全条约》”。同年 9 月 3 日，社会党举行临时党代会，与会代表以表决的形式通过了该党中央提出的《我党对当前政局的基本姿态》，追认村山首相在国会上的答辩内容，说明上述讲话内容已成为社会党的新政策。

但是总的说来，社民党与原来的社会党，在重大问题和对华政策上仍有连续性，例如：

仍主张维护日美同盟关系，但对日美强化军事合作，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持警惕态度，认为新指针的部分内容已超出原《日美安全条约》框架，实质上为“安保之外安保”，具有新条约的性质；认为不能把台湾列入日美安保范围，表示社民党将根据《日中联合声明》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坚决要求日本政府把台湾排除在日美安全保障范围之外。

对历史问题有正确的认识。主张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和谢罪，1995年8月15日村山前首相发表讲话，主张“日本必须反省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错误，向亚洲人民和中国人民谢罪”。社民党还主张用正确的历史观教育青年一代，对日本政界散布错误的历史观表示遗憾。1995年5月初，村山首相访华时，对过去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表示“深刻反省”，并作为现任首相首次参观了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

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上述观点在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时发表的《日中联合声明》和后来发表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已有表述。对日本一部分人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表示遗憾。

在钓鱼岛问题上，该党认为，邦交正常化和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政府已就搁置领土问题达成共识，而日本一部分右翼势力在领土问题上火上加油，导致日中关系恶化，表示该党要为抑制日本右翼势力的种种做法而斗争。

该党积极促进日中友好和发展两党关系。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社会党为促进日中友好、实现邦交正常化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1987年11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15周年之际，土井委员长率社会党第三次访华团访问我国，受到邓小平

同志接见。1997年3月，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土井委员长率社民党代表团访华。土井一行在华期间，江泽民总书记、乔石委员长分别会见。我党领导人乔石、宋平和吴学谦等同志亦应社会党邀请分别率中共代表团访日，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自两党建立关系以来，两党交流不断扩大，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总的说来，社民党在中日关系方面继承原社会党的正确立场，主张积极促进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六) 当前的组织状况和在国内的地位和影响

社民党现有党员约3.5万，有15名众议员、12名参议员。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社会民主党全国联合，最高决策机关是常任干事会。

附：

(1) 主要领导人土井多贺子简介 日本社民党党首，众议员。1928年11月30日出生。日本同志社大学毕业，专攻宪法，获博士学位。1969年首次当选众议员，至今已连续10次当选。曾任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长、众议院议长。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曾访华，至今已多次访问我国。

(2) 日本社民党与其他党派的席位比较

日本各党派在国会两院占有议席情况 (1998年7月)

众议院		参议院	
自民党	263	自民党	104
民主党	92	民主党	52
和平新党	47	公明党	24
自由党	40	共产党	23
共产党	26	自由党	13
社民党	15	新民党	12
先驱新党	2	先驱新党	3
无所属	15	无所属	19
合计	500	合计	252

第15章

东南亚各类社会主义的低落^①

上：非执政的共产党的削弱或溃灭

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大多曾开展过武装斗争，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已在苏东剧变之前先后削弱或消亡。据国外报刊报道：1987年泰共中央遭破坏，中央领导人陆续被捕，游击区丧失，武装力量全部下山缴械；1989年3月，缅共内部分裂，一些军事领导人先后脱离缅共另立组织，缅共东北根据地全部丧失，1990年缅共中央解散；1989年12月，马共与马、泰政府签署了停止武装活动的和平协议，解散了武装部队，销毁了武器；菲共武装力量已从鼎盛时期（1987

^① 这里所说的是除越南、老挝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之外的各类社会主义与政治力量的情况。

年)的2.5万人减少到只有几千人,自1992年拉莫斯上台任总统以来,菲政府与菲共开始和谈,至今已在国外进行过多次商谈。

一、泰共武装力量已溃灭

泰共成立于1942年,成立后参加共产国际,号召和组织群众,为驱逐日寇和争取国家独立自主而斗争。日本投降后,泰共认为革命已转到争取民主自由新阶段,决定支持各民主党派提出的争取真正独立、实现民主政治、严惩战犯、改善人民生活的共同纲领。1946年12月,泰国政府为加入联合国,被迫宣布废除其1933年颁布的《防共条例》,从而使泰共活动得以公开化,并在国会获一议席。1947年11月,美国支持銮披汶发动军事政变,泰共被迫转入半秘密状态。1952年11月,泰政府重新实施《防共条例》,泰共从此完全转入地下。1961年9月,泰共召开三大,确定了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路线。1964年泰共组织有明显发展,并积极筹备武装斗争。1965年8月正式在东北部发动武装斗争。1978年各种武装力量达1.4万人,在47个府的农村地区活动。

据国外报刊报道,自1978年底起,由于国内外局势特别是印支形势的变化,泰共的困难日益增大,武装斗争随之从高潮时期迅速向低谷跌落,根据地和活动区缩小。1979年泰共中央总书记密·沙玛南病故,其他中央领导人相继被当局逮捕。1979年后,泰共党内发生严重分裂,导致大多数上山的知识分子相继下山,脱离泰共领导的武装斗争队伍。1984年以来,

泰共中委和候补中委被捕人数达 35 名。特别是 1987 年 4 月 21 日和 22 日，泰当局又抓捕了出席泰共政治局扩大会议的 4 名政治局委员和 4 名中央委员等 18 名高级干部，泰共中央领导机构遭巨大破坏。随后泰共武装人员大多数以集体形式先后向政府投诚，接受政府集体安置的措施。泰共一些高级领导人如政治局委员乌隆等也向政府自首。1989 年，据泰国报刊报道，泰国警察厅公安局局长威腊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泰共武装斗争已基本被扑灭，已不构成对泰国安全的实际威胁。

二、缅共根据地丧失，党中央已解散

缅甸共产党从 1939 年成立到 1989 年瓦解的 50 年时间里，几经挫折，几度兴衰。1940—1941 年，由于党内的一些重要负责人如德钦索等被捕，缅共组织瓦解。1942 年日军占领缅甸后，德钦索出狱，重新恢复了党组织，并召开党的首次代表大会，积极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44 年 8 月，缅共联合缅甸抗日的各党派团体和爱国分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领导全国武装 2 万余人举行全国抗日总起义。日本投降后，缅共转为公开活动，党员发展到 2000 人。

1945 年 7 月，缅共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推选吴登佩敏为党中央政治局书记，并通过他提出的“和平发展”路线。1948 年 3 月 28 日，吴努政府宣布缅共为“非法组织”，派出大批军警搜捕缅共党员，缅共遂于是日凌晨转入地下，进行旨在推翻政府的武装斗争。

缅共武装斗争在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曾得到蓬勃发展，在

全国各地的游击队，占领过一些大中城市和一些农村地区。此后两年，缅共力量因执行土地归还地方的政策而削弱，加上吴努政府向缅共发动了3次围剿，缅共武装退出所有城镇。1955年底，缅共发表停止内战、恢复国内和平的声明，提出在开放民主、恢复缅共等进步党派合法地位的基础上，愿与政府和谈，吴努政府未予响应。1964年9月，缅共中央会议确定了“赢得战争，夺取政权”的路线。最盛时期，其武装力量达3万人，根据地面积3万平方公里，人口近60万。3年之后缅共中央在勃固山区进行了“党内革命”，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实行“撤职、开除、杀掉”政策，致使缅共力量大为削弱。

据国外报刊报道，1989年3月由于内部分裂，缅共东北根据地在短短两三个月时间里，全部土崩瓦解。3月11日，原缅共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彭家，率先在果敢起事，打出“果敢民主同盟军”的旗号，宣布脱离缅共。随后，原缅共候补中委、中部分局副参谋长鲍友祥于4月17日带领400余人的部队，突然包围和占领了在邦桑的缅共中央机关和东北军区总部机关，扣留了党的主席德钦巴登顶，宣布脱离缅共，成立“缅甸佤邦民族联合军”。4月19日，原815军区司令员林明贤又宣布该军区实行军管，脱离缅共领导，成立“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1989年底最后一块根据地——101军区宣布脱离缅共，成立“新民主军”。至此，缅共丧失了全部缅北根据地，缅共中央无立锥之地。缅共中央撤离101军区后，于1990年初解散。1990年12月7日，缅甸国家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秘书长钦纽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缅共武装力量已瓦解。”

三、马共与政府已达成和平协议

马共自 1930 年成立以来，经历了几个不同时期。1949 年 1 月，马共提出“驱逐英帝国主义，建立马来亚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纲领；同年 2 月 1 日，发表建军宣言，宣告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及其总部正式成立。1955 年 9 月，马共中央发表声明，主张立即通过同政府谈判，“求得合理的一致协议，以便早日实现全面停火，和平实现马来亚独立”。同年 12 月初，马共中央发表《为实现马来亚独立、民主、和平而斗争》的纲领宣言，12 月底，马共总书记陈平率代表团同政府总理赫曼等举行和平谈判。因政府坚持要马共投降而未达成协议，谈判破裂。从 1954 年开始，马共武装部队接连遭到极大损失和困难。到 1959 年，民族解放军大大减员，只剩下 400 人左右，全部被迫退出马来亚境内，转移到马泰边境泰国一侧。到 1961 年，进一步减员，只剩下 350 人。与此同时，在马境内的党和群众的地下组织也遭受严重破坏。马共处于“偃旗息鼓”时期。

1968 年 6 月 1 日，马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团结起来，加强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的号召。但不久党内发生分裂。7 月，发生了党的主席穆沙·阿默德反党事件，后穆沙被开除出党。1970 年初，马共一部分脱离中央领导，并于同年 9 月宣布成立马来亚共产党（革命派）。后来又有一部分人宣布成立马来亚共产党（马列）。1983 年，马共（革命派）和马共（马列）合并，取名马来西亚共产党。1978 年，马共中央为纪念抗英民族解放战争 30 周年发表声明，号召为发展武装斗争推动革命群众运动而斗争。当时马共武装力量已发展到 2000 多

人。

据国外报刊报道，经过多年的谈判，1989年12月2日，马共同马来亚政府和泰国政府在泰南宋卡府和艾签署了和平协议。马共总书记陈平在签署和平协议仪式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泰国政府、马来西亚政府和马来亚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了一系列和谈，并取得了圆满成功，两项和平协议签署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对和谈和成果感到高兴。刚刚签署的这些协议符合我们党争取实现和平的政策，符合当前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与民主的历史潮流，同时也符合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国人民的利益。

我们认为，通过和谈达成的结束41年武装活动的协议是一项光荣的和解，毫无疑问，这种对各方都公平合理的和解是基于互谅互让的精神达成的。

我们相信，这些协议的签署将在我国历史上写下新的篇章，为对马来西亚和泰、马边境地区的繁荣和稳定作出重大的贡献。

作为马来西亚公民，我们保证效忠最高元首陛下，效忠祖国。

作为协议的签署者之一，我们保证严格履行协议，我们将解散武装部队并销毁武器，以表示结束武装斗争的诚意。”

和平协议签署后，1990年马共解散了武装部队，销毁了武器，全部人员下山住在按和平协议建立起来的“和平村”。1993年，马共领导人表示马共将通过各种方式在宪法范围内开展合法活动。

四、菲共正与政府进行谈判

菲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 1930 年 11 月建立。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菲共发表十二点纲领，主张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武装人民抵抗日本侵略。1942 年 1 月日本占领菲律宾后，菲共中央第一线领导人伊凡赫利斯塔等遭逮捕。1946 年 2 月，菲共举行五大暨成立 15 周年纪念大会。大会通过了反菲奸、反美与反封建的政治决议。3 月，菲共同政府谈判，决定放下武器，开展议会斗争。1968 年 12 月，以西逊为首的一派在中吕宋举行党代表大会，宣布重建菲共，与原菲共领导决裂。菲共重建后于 1969 年 3 月在中吕宋建立了菲共武装——新人民军，并开始在该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到 1972 年上半年，菲共党员人数由重建时的十几名增加到 2000 人，新人民军从建军时的 35 人发展到 700 余人，活动地区由中吕宋扩大到东北吕宋和南吕宋。在马科斯实行军法统治之初，菲共力量在政府军队的反复“清剿”下遭到严重削弱。为此，菲共逐步调整其军事政策，提出进行持久的人民战争。到 1977 年，菲共党员人数达 6000 人，新人民军兵力 1600 人。1979 年，菲共利用菲经济不景气，人民对军法统治不满的形势，继续发动和组织群众，力量进一步发展。1980 年七八月间，菲共召开八中全会，改组了政治局和执委会，并号召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进行巩固工作。到 1980 年底，菲共党员人数达 1 万人，新人民军发展到 8000 人。菲共在全国建立了 27 条游击战线，在 43 个省中的约 400 个镇区活动，影响和控制了 4000 多个乡（全国有 4.2 万个乡）。

1981年马科斯取消军法统治后，菲共领导的城乡群众运动更趋活跃。1983年10月菲反对党人士贝尼格诺·阿基诺被害后，菲共发表《致菲律宾人民的紧急呼吁书》，要求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扩大武装力量，积极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并号召人们“推翻美国——马科斯法西斯独裁政权”，建立革命联合政府。菲共采取在全国创建游击战线的方针，同时开展城市游击武装活动，扩大在城市的力量和在城市、青年、劳工与宗教界的影响。1984年后，菲共力量发展较快，建立了17个大地区和分地区党组织，党员达3万多人；新人民军游击队扩展到3万多人，建立了59条游击战线，在62个省（当时全国73个省）的1万个村庄中活动。

1986年2月，菲举行总统选举。菲共中央决定采取抵制选举的立场。菲“二月革命”后，阿基诺夫人政府成立。菲共对阿基诺政府释放政治犯等措施予以肯定，并宣布愿同政府进行对话。6月，菲共和阿基诺政府分别任命了各自的谈判代表。经过3个多月的谈判，双方达成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但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后，由于双方在“政治解决”等重大问题上距离太大，和谈破裂。菲共中央重新审查斗争策略，表示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斗争。菲共开始公开抨击阿基诺政府。1987年底至1988年初，菲共中央遭到重大破坏，数名中委及中央执委，包括新人民军司令等遭逮捕。此后每年陆续有许多高、中级干部被捕，菲共力量日渐下降。到1991年底，据报道新人民军已减少到其鼎盛时期的60%左右，约1.5万人。1991年下半年到1992年初，菲共又有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被捕，一些领导人逃亡国外。

自1986年后，菲共党内斗争加剧。滞留荷兰的菲共主席西逊及其追随者坚持采取以农村为基地，进行持久人民战争的

策略；而由一批领导人联合组成的“造反派”，则更重视在城市开展合法的或其他形式的斗争。“造反派”还对西逊的领导作风不满，指责他是斯大林主义者，独断专行。

1992年5月菲大选后，拉莫斯上台。拉在7月首届国会上提出大赦和取消反颠覆法并使菲共合法化的建议。9月初菲国会两院通过该建议。9月底拉莫斯总统签署批准。至此，菲共从法律上正式合法。但菲政府与菲共的武装冲突并未停止。菲共对政府释放菲共一些领导人及菲共合法化方案虽予肯定，但拒绝接受合法，同时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和取消其他镇压性法律。菲共表示愿与政府进行对话。菲政府对菲共发动的和平攻势，使菲共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1993年下半年，菲共公开分裂为4派：西逊派、马尼拉—黎刹派、内格罗斯派和中棉兰老派。菲共各派系间斗争激烈，并导致多位高级领导人因此被捕。菲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人数剧降，新人民军力量锐减，据外报报道现有兵员约四五百人。

拉莫斯总统上台后不久，即派遣谈判小组赴荷兰与菲共和谈，菲共方面由以哈兰多尼为代表的“民族民主阵线”出面。据菲律宾《马尼拉公报》、《马尼拉时报》、《马尼拉标准报》和《商报》报道，至1997年4月，双方在荷兰共进行了6轮和谈，情况如下：

1. 第一轮会谈于1992年8月在海牙举行。双方签署《海牙联合宣言》，规定了3项原则：（1）举行正式和谈，以结束武装冲突，取得公正与持久和平；（2）确定连续磋商的程序，包括分别设立相互工作委员会，讨论有关和谈的重大问题；（3）和谈4点纲要：人权与人道主义法律、社会经济改革、政治与宪法改革、结束敌对状态与军队的处置。此次会谈确定了正式和谈的框架内容。

2. 第二轮会谈于1994年6月在布鲁克林举行。双方签署《布鲁克林联合声明》，确定了双方今后谈判的议题，并设法使相互工作委员会及时运作。双方一致同意，求同存异，按照《海牙联合宣言》精神，全力争取正式和谈。

3. 第三轮会谈于1994年10月在迪比尔特举行。双方在安全和豁免权保障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而陷入僵局。民族民主阵线提出，政府提供的安全护照即豁免保障不应只限于民阵谈判小组，也应包括政府谈判小组。政府认为，这样无异于承认民阵所要求的两个主权、两个国家、两种制度、两部法律和两个合法军队共存于非本土的局面。这是政府绝不能接受的。此次会谈表明了双方的根本分歧。

4. 第四轮会谈于1995年2月在乌得勒支举行。双方达成三个协议：《关于1995年6月1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正式和谈的协议》、《政府与民族民主阵线谈判小组关于安全与豁免保障的共同协议》和《政府与民族民主阵线谈判小组关于正式和谈的程序的共同协议》。

菲政府与民族民主阵线谈判小组的正式和谈延迟于1995年6月2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但结果只是进行了一场开幕式。27日，政府谈判小组根据拉莫斯总统的指示，宣布中止此次和谈，理由是民阵坚持要求释放被捕的非共米骨地区领导人、新人民军米骨地区总指挥索托罗·拉马斯，让其参加和谈，为谈判规定了先决条件。

5. 第五轮会谈于1996年9月在海牙举行。双方商讨了重开和谈具体事宜。政府谈判小组发表声明说，政府愿随时为西逊等人回国提供一切便利和全面保护，但绝不勉为其难。西逊发表讲话说，只有荷兰政府同意提供政治避难和菲律宾人权得到改善，他才愿回国。

6. 第六轮会谈第一阶段于1997年3月在乌得勒支举行。政府与民阵谈判小组在人权与人道主义法律方面的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并在有关谈判人员安全和支持民阵私营发展组织等两个方面达成一致。双方同意在4月恢复会谈时签署上述3个协议,然后开始社会经济改革方面的谈判,以便实现于6月达成一个最终协议的目标。

4月,政府与民阵谈判小组在海牙举行第六轮第二阶段谈判。因在人权协议执行方式问题上发生分歧,双方未能就人权和国际人权法律议题达成协议,并宣布休会。这样,双方未能在6月达成最终和平协议。但据信和谈还会继续下去。

下：“缅甸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放弃

缅甸独立后,不论是以吴努为首的议会民主政府,还是以奈温为首的军人政府,都曾提出以“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但是1988年奈温宣布辞去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主席的职务,新的军政府宣布放弃社会主义,并将国名“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重新改为“缅甸联邦”。在缅甸推行26年的缅甸式社会主义终告结束。

1962年3月2日,奈温将军以“挽救国家日益恶化的局势”为由发动政变,推翻了吴努政府,接管国家政权后不久,即提出要“在缅甸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1962年7月宣布成立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开始提

出“缅甸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一、产生的历史背景

1824年到1885年，英国先后发动3次战争，对缅甸进行殖民侵略。1886年，英国吞并整个缅甸后，把缅甸作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实行全面的殖民统治，而且全面控制和垄断了缅甸的经济，对缅甸进行残酷的殖民掠夺。缅甸人民为反抗殖民统治，争取人民权利和民族独立，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本世纪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传入缅甸。1931年，英文版的《资本论》、《国家与革命》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等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传入缅甸，很快在年轻一代的缅甸知识分子中找到了读者，德钦丹东、德钦梭等人都在图书馆中耽迷于马克思主义。到30年代后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其显著标志是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部分章节，已被译成缅文出版。由吴努、德钦丹东和德钦梭等人组成的“红龙书社”在翻译、出版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1930年5月，缅甸爱国青年知识分子成立了“我缅人协会”（即德钦党），1937年以后，该协会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激进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爱国主义组织。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协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昂山、吴努、德钦丹东、德钦梭等人陆续进入“协会”领导集团。他们后来在缅甸民族独立斗争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成为各党派的领导人，其中一些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1939年8月19日成立了缅甸共产党，德钦昂山当选为总书记。

另一方面，30年代时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也传入缅甸，并产生一定影响。英国工党党员约翰·斯特拉彻的《社会主义的原理和实践》曾被红龙书社译成缅文出版。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在缅甸也有一些信徒，吴努就曾参加过“费边联盟”。

这样，由于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社会主义”在30年代后期在缅甸已成为一面鼓舞人民大众反对殖民统治的旗帜。

1940年初，我缅人协会队伍不断壮大，成员已达10万人。协会在宣言中比较全面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号召人民争取缅甸独立，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同年4月，全缅工会用中、缅、印3种文字，印发了1万份《五·一宣言》，称“社会主义的幽灵游荡在缅甸”，号召工人为“自由、和平与面包”而斗争。由此可见缅甸共产党在我缅人协会中的影响。

1942年日本利用昂山等人急于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心理，以“帮助缅甸人独立”为借口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整个缅甸。日本侵占缅甸后，给缅甸人民带来了更为深重的灾难。日本帝国主义推行的法西斯主义政策，使缅甸人民群众很快看清了其凶残的面目，缅甸共产党人最先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后来昂山、吴巴瑞等当初主张联日反英的缅甸民族主义者也认识到他们联日是“引狼入室”。1944年初，缅甸人民的抗日斗争已经较为广泛地开展起来。同年8月，各派抗日力量决定成立“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由昂山担任最高领导人，德钦丹东任总书记，奈温等人为自由同盟的主要领导人。同年10月，以昂山为首的人民革命党与缅甸共产党共同签署行动纲领，再次提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纲领宣称，“只有走独立、民

主、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实现缅甸的真正的彻底解放”。

日本侵略者被驱逐出缅甸，英国军队作为盟军进入缅甸，英帝国主义企图恢复在缅甸的殖民统治。缅甸人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争取缅甸独立。在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中，“社会主义”仍然是鼓舞人心的旗帜。

缅甸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把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为奋斗目标。貌貌博士在《缅甸政治与奈温将军》一书中说，“社会主义道路是过去缅甸领袖们梦想过的，大家都曾说过左派联合起来，深入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缅甸国父昂山认为，在取得政治独立后，争取经济独立，建立不依靠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体系将是革命的第二阶段。昂山的思想对后来的“缅甸社会主义”有不小的影响。他是缅甸民族主义者的主要领导人，在缅甸人中威望很高。他对资本主义强烈不满，但又明确反对共产主义。昂山曾在1945年8月“东方—西方协会”召开的会议上说，“虽然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使我们十分感动，但我们还是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他主张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走中间道路。昂山推崇佛教，认为佛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并主张建立一党制，称“一党制是维护一个有力而又稳固的政府的最好形式，虽然不能说它永远是理想的形式”。昂山的这些思想对奈温后来推行的缅甸社会主义产生了一定影响。

1948年1月4日，缅甸独立后，以吴努为首的民族主义领导人选择了议会民主道路，试图以“议会民主路线”来建设“社会主义”，但没有成功。在政治上，执政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内部政见不一，陷入派系、权力纷争；缅甸共产党和少数民族武装力量转入地下，使缅甸出现了旷日持久的内战局面。在经济上，吴努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和“国家繁荣”计划

受挫。吴努政府在维持了十余年统治后，终于为奈温军人集团所取代。以奈温为首的十几位军官在接管政权后宣称，“独立后上台的政府在其执政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在缅甸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目标”，并称只有奈温军人集团的政策性文件《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才“体现了民族领袖昂山将军以及在争取独立的整个历史过程中的许多领导人所信仰的社会主义目标”。

奈温军人集团中，有许多骨干参加过反英和抗日斗争，他们读过一些进步的书籍，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在1962年成立的革命委员会17名成员中，有8人是过去的缅共党员和缅共的同情者。奈温本人就曾是缅共候补党员。这也是军人集团执政后提出建立缅甸式社会主义的历史原因之一。

二、主要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1962年4月30日，奈温领导的革命委员会发表了纲领性文件《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表示要坚定不移地向缅甸式社会主义的目标迈进。同年7月4日，革命委员会通过了《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建设时期的组织章程》，宣布成立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1963年1月17日，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颁布了党的思想哲学理论《人与环境相互关联的体系》、《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的特点》，1971年制定了《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党章》，1974年通过了新的宪法。上述文件详细阐述了缅甸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组织领导策略。在《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中确立了奋斗目标，即“缅甸联邦相信，只有消灭了人剥削人，只有建立起基于正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全国人民

才能从一切社会邪恶中解脱出来，才能泰然迈入繁荣富足的新社会。因此，革命委员会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决心同人民携手前进”。

奈温社会主义政治纲领的核心是废除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建立一党制。以奈温为首的革命委员会认为吴努政府实行的议会民主制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称众议院和民族院“并没有给缅甸联邦的各族劳动人民带来什么利益，它只能给外侨资本家、国内封建势力、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及其控制下的官僚投机政客等带来好处”。《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称，“缅甸的议会民主不仅没有促进社会主义发展，而且由于它本身的缺点、弱点、漏洞、弊端以及缺乏成熟的公正舆论，背离了社会主义的目标，以致于渐渐地越来越明显地走向反面”，“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试验的那种议会民主形式并未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目标”。

奈温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主要反映在《缅甸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纲领性文件中。文件称，“社会主义经济目标是为大家建立一个经济上安全，道德上美好，和平繁荣的新社会”，国家的生产资料必须为国家和合作社所有，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基础。国家允许不损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小型的私营企业存在，但不允许剥削他人劳动。纲领党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1）随着社会主义生产事业的发展，尽可能地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2）以计划的方式按比例发展整个国民经济，逐步发展生产力；（3）积累社会主义资金；（4）根据劳动者的体力、智力和耐力分配工作，按劳取酬；（5）不断扩大使用现代科学技术，逐步地和飞快地发展生产力。纲领党总书记山友将军在论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时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指人与人之间没有剥削，每个劳动者按自己所付

出的体力、智力和耐力得到报酬，而国家的经济、社会福利又能按比例增长的一种有计划的经济制度。”

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在阐述其哲学时说，物质不是认识的唯一来源，认识是物质和精神相互作用的结果，纲领党的世界观中，人和环境是相互依存的，所以不存在物质第一还是精神第一的争论和矛盾。纲领党将努力寻求和遵循在各事物中肯定存在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避免极端，既不走向左的极端，也不走向右的极端，但也不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路线。

纲领党在阐述该党的特点时说，纲领党“根本不同于自称为社会主义而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也根本不同于信奉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它强调纲领党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政党，并列出了它既不同于社会民主党，也不同于共产党的 9 条特点，其中主要有：

社会民主党往往片面否认马列主义著作，没有明确的基本思想。共产党只学习马列著作，绝对信仰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列主义。纲领党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理论，对缅甸有好处的和有利的，都取其精华，加以修改、运用，信仰物质和精神相互关联的理论。

社会民主党实际上依靠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各个阶级和阶层。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尤其是产业工人的政党。纲领党是除剥削者以外的全体劳动人民的政党。

社会民主党往往建立议会制的改良政府，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纲领党实行全体劳动人民的统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实现社会主义只作为达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纲领党只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

三、主要实践及其影响

奈温军人集团为了实践缅甸式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废除西方议会民主制和多党制，组建唯一的执政党社会主义纲领党，废除 1947 年宪法，颁布新宪法，确立纲领党的合法地位，实行一党制的中央集权体制；在经济上，实行了国有化政策，推行国家指令性计划，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在外交上实行独立自主政策。

1. 废除多党议会民主制，实行纲领党一党制。

奈温认为多党制不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复辟”。他说在多党制下的议会竞选中，各党派为了获胜，常常对人民空口许诺；竞选变成了权力和金钱的交易；多党制导致政府政策的不连续性。奈温基于上述思想，在接管政权的第二天便宣布议会民主制不适合缅甸国情，从而废除了宪法、议会和高级法院制度，建立了以奈温为首的 17 名高级军官组成的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作为国家最高行政和立法机构，并于 1962 年 3 月 9 日颁布第 20 号公告，宣布将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交给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个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是奈温基于要把缅甸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考虑以及其长期执政的需要而建立的。奈温执政伊始就意识到要想得到国内民众与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和支持，必须要改变军人执政的形象，因此要尽快建立政党以取代革命委员会。1962 年 7 月 4 日，革命委员会在《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建设时期章程》中指出，按照发展的革命理论纲领，相信只有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政党才能领导一项大革命。为

此，革命委员会成立了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当时正式党员只有20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军队领导人。

1964年3月28日，革命委员会颁布《维护民族团结法》，规定从即日起解散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以外的一切政党，实行一党制。其他政党有的宣告解散，有的转入地下。缅甸共产党和一些少数民族武装继续进行武装斗争。

1971年6月28日，纲领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员人数从建党初期的20名发展到7万多名，候补党员26万名，党友（指已递交申请书尚未批准的人）76万多名，标志着纲领党已从“干部党”过渡到“全民党”。当时军队党员占整个党员人数的56%；军人在中央委员中占73%；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占93%。对此，纲领党总书记山友将军曾在西北军区党代会上说，“军队是纲领党的支柱，军队决心建设党，这就是军队党员众多的理由。”奈温在纲领党一大开幕式上宣布，今后革命委员会不再领导纲领党，而是接受纲领党的领导。纲领党一大通过的新党章宣称，“纲领党将坚持不懈地朝着社会主义目标前进”。

纲领党共召开过5次全国代表大会。截止到1988年9月纲领党宣布解散时，共有党员289万人。

1974年1月3日，缅甸举行全国公民投票，通过了《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新宪法进一步确定了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作为国家唯一政党的领导地位。新宪法规定：缅甸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主权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并将国名“缅甸联邦”改为“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年3月2日，根据新宪法召开了第一届人民议会，组成了新政府，奈温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即总统）。革命委员会将权力正式移交给人民议会，结束了12年军人统治，实

现了“还政于民”。所有执政的军官名字前不再冠以“波”（意为军官）的称号，而改称“吴”（一般男子的尊称）。但实际上党政高级领导人绝大多数仍是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军人仍是缅甸政府的重要支柱。

纲领党的领导地位法律化之后，国内的大政方针和对外政策，均首先由纲领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然后通过人民议会和中央政府贯彻实施。在各项方针政策执行过程中，都要接受党的各级委员会，以及纲领党在工厂、农村、企业、学校和街道的基层组织的领导和监督。宪法还规定，人民议会的代表及各级政权机构的领导人选，均由纲领党提名后选举产生。

为了切实保证纲领党的领导及其方针政策的全面贯彻执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由纲领党直接领导下的缅甸工人协会、农民协会和纲领青年团以及退役军人协会、文化工作者协会等群众团体。工人协会截止到1985年12月共有会员185万人，几乎所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营和合作社企业的工人都加入了工人协会。农民协会截止到1984年9月共有会员754万人。纲领青年团是纲领党的后备力量，截止到1985年1月共有团员180万人。纲领党已将1/5的年满18岁的纲领青年团员吸收为纲领党党员。

2. 实行国有化，发展国营经济。

奈温政府在《缅甸社会主义道路》中称“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了实行社会主义计划，像农业和工业生产、商品分配、交通运输、对外贸易等方面的重要生产手段必须收归国有。”

1963年2月5日，奈温正式宣布实行国有化政策，他说，“私营部分的存在违背我们的目标，国有化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原则”，“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原则，迟早要把所有的生产资料国

有化”。同年10月，缅甸政府又颁布了企业国有化法令，规定政府有权接管任何私营企业。缅甸政府首先将31家外国和本国私人银行收归国有，接着便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国有化行动。从1963年到1965年，在短短的两年中，全缅就有1.5万家工厂、银行和商店被收归国有。国有化行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据不完全统计，收归国有的私营企业有：银行31家（其中外国银行16家），木材店711家（其中外侨经营的20家），航运公司24家（包括外国人和本国人开办的），碾米厂、轻工业工厂和锯木厂180家，仓库50家，外国人和缅甸人开办的私营商店以及所有与英资合营企业。另外，还有私营电影院124家、私立学校814家和私立医院7家被收归国有。这样，从财政金融、对外贸易、工业交通等重要经济命脉到学校、报社和影院等文化机构全部由奈温政府所控制。

缅甸的国有化措施虽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缅甸的残余经济势力，也曾一度激起了人民群众的爱国情绪，但同时带来消极影响。由于国有化的步骤过急，打击面过宽，从而打乱了原有的生产秩序和流通渠道，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在奈温政府执政的前10年中，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出口锐减，物资奇缺，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每况愈下，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1971年纲领党一大政治报告承认，“9年来国家经济状况仍不稳定”，“特别是过去4年来，困难一年比一年严重”。70年代中期，奈温政府被迫调整国有化政策，放宽对私人经济的控制，允许私营小工商业在政府的监督下进行经济活动。1977年9月颁布了《私营企业经营权法》，保证30年内不对私营企业实行国有化。但奈温政府并未放弃国有化的基本政策。1974年通过的新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必须对国内企业实行国有化”。政府称国营企业是经济的“第一支柱”。《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

的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确定了扩大国营经济成分的目标，提出到1993—1994年度，在国内的经济成分中，国营部分将上升为48%。

奈温政府执政初期的国营经济，除一部分是革命委员会从吴努政府手中接管过来的外，主要是通过推行大规模的国有化政策建立起来的。到1964—1965年度国营企业的比重大大增加，在交通业、金融业、电力工业中国营企业所占比重为100%，在商业中占75%，在建筑业、矿业和制造业中分别占71%、67%和62%。

70年代以后，奈温政府对国营企业用增加政府投资和依靠外援的办法加以发展。1969—1970年度政府对国营企业的投资额为7.78亿缅元，占全缅投资总额的67%，1979—1980年度政府投资额急剧上升到65亿缅元，占全缅投资总额的88%。

国营企业从60年代末的972个增加到80年代初期的1742个，其中100名以上工人的大型企业由310个增加到422个，占全缅434个大型企业的97%。这表明现代的骨干企业基本上为政府所掌握，这些企业在缅甸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由1961—1962年度的25%，上升到1986—1987年度的39%。缅甸的国营企业在工业中已占主导地位，政府完全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缅甸的私人企业由于在经营范围、资金、设备和技术等方面均受到种种限制，发展相当缓慢，绝大多数私营企业不过是10人以下的手工作坊和商店。80年代初，在全国434家100人以上的企业中，私营仅12家，所占比例不到3%。这表明国营经济在缅甸经济中形成了绝对垄断地位。

3. 实行土地国有化，推行农业合作化。

奈温执政后，为了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在农村实行以土地国有化为中心的土地改革。1963年3月颁布了《土地租赁法》，规定农民向地主租种土地缴纳地租的金额必须与土地税相当，最高不得超过土地税的3倍（过去则高达10倍以上），并将实物地租一律改为货币地租，禁止地主更换承佃人。同年6月，奈温政府又颁布了《农民权利保护法》，规定法院不准借口农民未付租金和债务而逮捕、监禁农民，没收耕地、土地和生产工具。另外，在农村成立了没有地主、富农参加的租佃委员会，作为出租土地的唯一权力机构，实际上剥夺了地主出租土地的控制权。继上述法令之后，奈温政府于1965年4月又采取了一项重大措施，颁布了《修改租佃法法令》，宣布废除全部地租，同时重申吴努时期颁布的《1953年土地国有化法令》继续有效，按这个法案的规定，任何农户占有稻田超过50英亩者，或上等田超过25英亩，灌溉田超过10英亩者，其超出部分为国家所有，由国家分配给佃农和少地的耕农，全国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个人只有耕种和使用权。

奈温政府的上述措施比吴努政府来得彻底和有力，从而使缅甸的大地主所有制受到很大削弱，自耕农户数有了很大增长，个体的私有制经济有所发展，农村土地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土地改革，外国地主主要是印度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被铲除。

60年代初期，奈温政府在实行土地国有化的同时，为解决那些无地和少地农民的生活问题，曾推行过农业合作化措施，把农民组织起来在一部分收归国有的土地上建立“农业合作社”，但这一试验未获得成功。1976年政府重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动农民特别是受过农业专业训练的技术人员和纲

领青年团员在垦荒的基础上组建初级、中级和高级 3 种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各自占有生产资料，互相帮助，农产品卖给合作社；中级社：各人生产资料作价租给合作社，实行集体耕种，按股和劳动量进行分配；高级社：生产资料合作社所有，社员作为合作社的工人参加集体耕种，按劳取酬。截止 1983 年底共成立合作社 929 个，其中初级社 631 个，中级社 243 个，高级社 55 个，奈温政府鼓励农民走合作化道路，试图为发展大农业奠定基础，但由于缅甸发展水平较低，尤其是工业生产相当落后，国家能为农业生产提供的农机、化肥和农药等都十分有限，再加上有些农业合作社经营不善，因而合作化道路没有改变缅甸的小农经济体制。

4. 出台经济发展计划，几度调整政策。

奈温接管政权后，首先集中力量推行经济缅甸化和国有化，尔后转向有计划地发展经济。1972 年 9 月，纲领党一届四中全会对革命委员会执政 10 年的经济政策作了重新评价，并通过了一个称为《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的长期和短期经济政策》的文件，进一步提出制订一项 20 年长期经济计划的设想。20 年长期经济计划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该计划从 1974—1975 年度开始实施，到 1993—1994 年度结束，分 5 个四年计划执行，即从第二个四年计划至第六个四年计划。

20 年长期计划的总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计划年均增长 5.9%，其中农业 4.8%，工业 9.4%；各项经济成分的比例将发生重大变化，国营经济成分由 34.8% 上升到 48%，合作社经济成分由 8.5% 上升为 26%，私营经济成分由 56.6% 下降为 26%；要求将缅甸经济从农业经济转变为以农业为基础的工业化经济，将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 36.1% 下降到 29.3%，而将工业产值由 15.3% 提高到 27.2%。

20 年长期经济计划实际共执行了不足 14 年时间，因为 1988 年缅甸政局激烈动荡，20 年长期计划无法继续实施。在这十几年中，缅甸经济经历了走出低谷、发展较快而后走下坡路的过程。

第二个四年计划（1974—1975 年度至 1977—1978 年度）执行情况较好，使缅甸经济走出了困境。第三个四年计划（1978—1979 年度至 1981—1982 年度）取得较好成绩，这是独立以来执行得最好的一个经济计划，各项经济指标大部分都按计划或超额完成。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6%，农业达到 8.6%。

“二四”计划和“三四”计划之所以取得成果，主要是因为奈温政府于 70 年代以后在经济政策上进行了若干调整。

首先改变过去重工轻农的做法，把发展农业摆在经济发展战略中的最优先地位，并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农业生产的具体措施。缅政府逐年增加对农业的投资。1962—1963 年度至 1973—1974 年度，农业投资额平均每年仅 0.55 亿缅元，但在“二四”计划期间年均增加到 1.032 亿缅元，在“三四”计划期间年均又猛增至 5.36 亿缅元。

政府还每年向农民发放多种形式的农业贷款，1977—1978 年度为 1.15 亿缅元，1981—1982 年度增至 10 亿缅元。此外，缅甸实行和推广稻谷特高产计划，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缅甸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帮助下，从 1975 年开始进行稻谷特高产计划试点，取得成功，使稻谷单位面积产量成倍增长。到 1985 年这一计划推广至 82 个镇区，其稻谷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稻谷耕种面积和产量的 78% 和 81.7%。这一计划的成功，使稻谷产量大幅度增长。缅甸政府还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自 1973 年起，缅甸政府多次调整稻谷收购价格，由每

百箩（缅甸计量单位，合 2086.16 公斤）的 358 缅元增加到 900 缅元，增加了 1.5 倍。

其次，改变过去严格限制私营企业发展的做法，逐步放宽搞活市场。由于奈温政府上台后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很严厉的措施，许多私营企业纷纷停产或倒闭，从而导致全缅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失业人数增加。1972 年 9 月，纲领党一届四中全会决议承认，过去对私营经济的政策存在着偏差。决议说，“由于不允许私营投资，所以全国的总投资额有所下降”，“私营工厂企业的生产多数处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和黑市活动有所增加”。决议要求“对私营企业，应该允许其存在的，就应该予以保留”。缅甸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通告和法令，对私营经济放宽了限制。1973 年 5 月，贸易部颁布取消对大米和小麦的统购统销的法令；6 月，农林部颁发缅甸人私营橡胶园在 30 年内不收归国有的法令；8 月，宣传部发布允许私人在制造业方面进行投资的通告；10 月，贸易部宣布私商可以直接向工厂购买和零售 81 种工业产品。1977 年 9 月，缅甸政府颁布了《私人企业权利法》，把私人可以在农业、工业、矿业、交通运输业和贸易等方面能够经营的企业作了具体规定，缅甸政府同时保证在 20 年内不实行国有化。政府这些措施，对调动私人企业的积极性起到一定作用，私商开始重新兴办一些投资少、见效快的中、小型企业。私营企业从 1971—1972 年度的 14283 个增加到 1981—1982 年度的 36301 个。

再次，缅甸政府改变原来严格限制接受外援的做法，采取较积极态度适当接受与吸引外援、外贷和外资。奈温政府在执政初期，严格控制接受外援和外贷。70 年代中期，缅甸恢复向世界银行贷款，参加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于 1976 年组织了“援缅国际财团”，有日本、西德、加拿大、美、英、法、

澳等7国参加。据不完全统计,从1975年至1979年缅甸接受外援总额达15.36亿美元,平均每年为3.07亿美元,1979—1980年度猛增至5.118亿美元,1981—1982年度上升到6.76亿美元。缅甸适当增加接受外援,对恢复和发展经济起到一定作用。

5. 对外奉行不结盟政策,经济上由强调自力更生到开始加强对外经济。

奈温执政期间,始终奉行一条独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奈温政府主张维护国家独立与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与控制。对大国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在处理与大国关系时,注意保持平衡,以免卷入大国纠纷。1965年12月,奈温强调缅甸的外交政策“应该是绝对中立的,既不右倾,也不左倾”,缅甸必须同其他国家友好相处,但这种友谊必须“只限于一定的程度”,“毫无保留地同任何一个集团或国家结盟是不明智的,它会危害我们的团结”。1973年4月,纲领党二大强调,“要根据‘增进友谊,消除怨恨’的原则,同邻国保持友好关系”,“维护和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事务中不参加任何集团,而一贯地站在正义方面”。

奈温政府认为,大量接受大国带有附加条件的经济援助,有被卷入国际紧张局势的危险,会加深对援助国的依赖,从而不利于经济独立和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培养人民自力更生的精神。因此,奈温政府采取了依靠本国资源和自身努力建设缅甸式社会主义的方针,严格控制接受外援和外贷,禁止引进外国私人资本。1962年3月政变后,福特和亚洲基金会的美国代表于4月中旬撤离缅甸,富布赖特基金会的活动连同英美合办的英语训练计划中断,联合国和平队的志愿人员也被迫撤离。从1962年至1972年的10年中,缅甸仅接受外援2.57亿美

元。奈温政府基本拒绝聘请外国专家和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使缅甸在获得技术援助方面几乎处于停顿状态。

进入70年代以后，缅甸政府接受外国和国际组织的援助和贷款，但拒绝接受私人投资。直到1985年，才尝试性地由缅甸国营企业同西方的私人企业搞合资。这一年缅甸重工业公司同德国的菲力茨、瓦纳公司签订了联合组建公司的合同。

四、八十年代末“缅甸社会主义”的摈弃

80年代中期以后，缅甸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国民生产总值出现负增长，外汇储备濒于枯竭，工业原料奇缺，工业严重开工不足，农业生产也完不成预定计划指标，物价飞涨，黑市猖獗，通货膨胀，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危机，已无法按原来的经济计划运转。

奈温政府面对这种情况，1987年开始改革，但未能奏效，反而引起经济混乱和形势恶化。1988年3月、6月缅甸首都仰光爆发了由学生、工人和市民参加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并蔓延到曼德勒等大城市，在冲突中有50多人被打死。

面对空前的反政府浪潮，1988年7月23—25日，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举行了特别代表大会，会上奈温出人意料地提出辞去纲领党主席职务并就实行多党制举行公民投票。纲领党副主席吴埃哥则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在缅甸实行经济改革的方案。大会同意奈温辞去纲领党主席职务。奈温辞职的举动并未平息政局的动荡，改革方案也无法付诸实践。反政府的示威活动席卷全国，接替奈温上台的盛伦实行军管等严厉措施，但未能平

定局势。盛伦执政不足一个月，纲领党于 8 月 19 日推出奈温集团的智囊人物、文官貌貌博士为党的主席，并同意就多党制问题举行公民投票。但此时的缅甸群众对貌貌政府的让步并不满足，要求政府立即下台，示威活动愈演愈烈。9 月 18 日，以国防部部长苏貌将军为首的高级军官发动政变，成立了“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实行军人统治。

先以苏貌将军、后以丹瑞将军为首的缅甸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执政后，随即宣布放弃执行了 26 年之久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推行市场经济改革。军政府在发展经济和对外交往方面都表现出较前很大的灵活性。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政治上主要为：

1. 放弃社会主义，更改国名。军政府执政后便宣布抛弃社会主义，将 1974 年宪法确定的国名“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重新改为吴努时期的国名“缅甸联邦”。

2. 废除一党制，实行多党制。军政府宣布取消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 1964 年颁布的一项禁止除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之外的所有政党活动的《维护民族团结法》，开放党禁，允许政党活动，并于 1990 年举行多党大选。军政府以必须先制宪后交权为理由，拒绝向在大选中获胜的全国民主联盟交权。根据先制宪后交权的原则，1993 年召开由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参加的缅甸国民大会，讨论制宪问题。

3. 军政府致力于民族和解，对少数民族武装改变过去一味武力清剿的做法，而是打谈结合，先后与十几支少数民族武装达成和解。

与此同时，军政府开始实行旨在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陆续出台改革措施，废除了一系列阻碍经济发展的法律和规定。1995 年底缅政府确定了经济发展 4 项目标：以农

业为基础，带动其他行业全面发展；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利用国内外先进技术和资金发展经济；整个国民经济要控制在国家和人民的手中。经济改革主要表现在：

1. 优先发展农业。军政府重视农业发展，改革从农业入手，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扩大农民种植、出售农产品的自主权；逐年加大农业投入，兴修水利工程；对农业物资实行进口免税政策，确保农机、化肥和农药的供应；以免税政策鼓励私人开荒建种植园，扩大耕种面积；用分期付款或实物支付方式推广农机具，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注重科学种田，推广良种和多季稻种植技术。上述措施使缅甸农业生产有所提高。

2. 鼓励私人企业发展。1988年10月，缅甸政府宣布私人可以参与除石油、珠宝、柚木和矿石以外物资的出口业务。1990年11月颁布了《私营工业企业法》。1992年政府将几十家长期亏损的国营工厂租赁或承包给私人经营。1994年3月制定了《缅甸公民投资法》。1995年初成立了“私有化委员会”，并公布了首批拟进行私有化的国营企业53家。由于政府从法律上保障、政策上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截止1995年3月私营企业已近1.5万个，私营企业产值已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80%，私人出口占总出口的50%，占总投资的52%。

3. 实行对外开放，引资招商。1988年11月缅甸政府颁布了《外国投资法》，成立了“外国投资委员会”，规定外国投资者可以汇出利润，外企可以享受3年免税政策等。截止1996年3月底外国在缅甸投资总额33亿美元，批准外资项目169个。外资主要投项是石油天然气产业和饭店旅游业。政府还允许外国银行在缅甸设立办事处，截止1995年底共有32家外国银行在缅甸设立了办事处。

在外交方面，缅甸政府大力推行对外开放政策，试图打破

西方制裁和长期以来形成的与世隔绝的状态。缅以东盟为突破口，与东盟主要成员国的高层领导人实现了互访，1997 年 7 月缅甸正式加入东盟，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有所缓解。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以人权、民主为由继续对缅施压，缅同西方关系一时难以改善。

第16章

南亚各类社会主义的发展与调整

南亚地区既有共产党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有民族主义政党推行的各种“民族社会主义”。

苏东剧变后，南亚的共产主义政党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一定发展。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近年来曾几度执掌全国政权。印度共产党一度成为参政党。斯里兰卡共产党现已成为参政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印度东部有着 6000 多万人口的大省西孟加拉邦，4 次选举获胜，连续 21 年一直领导着邦政府，在全国政局中也起着相当分量的作用。这种情况与其他地区共产党力量削弱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并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产党一起，使世界共运出现了“西方不亮东方亮；北方不亮南方亮”的局面。

南亚一些民族主义政党早在 50 年代就举

起了“社会主义”的旗号。当时尼赫鲁在印度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斯里兰卡以班达拉奈克为首的自由党主张实行“民主社会主义”；而统一国民党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也随之举起“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号，并在1977年大选获胜后修改宪法，干脆将国名改成“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几十年来这些民族社会主义的情况怎么样了？它们有什么变化？

上：共产主义政党的发展

苏东剧变使南亚地区共产党受到一定冲击，各党内部一度思想混乱。孟加拉国共产党领导层对世界共运重大问题争论激烈，最后导致分裂。但多数党的领导，在困难的形势下，认真观察和分析形势，总结苏东剧变和本国共运的经验教训，逐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各党在苏东剧变后陆续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宣布仍然坚持党的共产主义性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途、坚持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这些党认为，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最终导致苏共的解散和苏联的解体。但苏联东欧剧变不表明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只是苏联模式的失败。各党表示要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探索符合国情的

发展道路。它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将是长期复杂的过程，因而从各自国情出发，不同程度地调整了国内政策。目前主要采取和平斗争方式，在议会的席位有所增长，提高了在各国政坛上的地位。

一、历史回顾

南亚地区共产党，除斯里兰卡共产党外，都与印度共产党有着历史渊源。印度共产党在1920年10月成立于苏联的塔什干。1925年12月印度国内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开会，成立了印共中央委员会。1929年英国殖民政府以“密拉特谋叛案”对印度共产党进行镇压。1933年12月，印共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选出党的临时中央，并加入共产国际。1934年7月印共被宣布为非法。1936年印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大社会党和国大党，党的力量有所发展。1940年3月因与国大社会党发生分歧，印共党员被该党开除。1942年7月，印共接受英共“人民战争”的政策，宣布支持英国政府反法西斯战争而获得合法地位。1945年印共党员由1934年的150人发展到3万人。印共自成立后，在争取民族独立，发动工人、农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做了不少工作。但印度的独立却是在以甘地和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领导下取得的，印共领导人后来总结原因主要有：（1）印度是英帝国主义的独占殖民地。英殖民当局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二次大战后，英国政府将政权和平移交给资产阶级政党，以阻止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2）印共相对于印度资产阶级政党国大党力量弱小。

党的领导对印度资产阶级的反帝作用采取否定的态度，对甘地在20、30年代发动的“不合作运动”和40年代的要求英国“退出印度”运动采取反对立场，从而脱离了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主流，把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权丢失给印度国大党；（3）印度共产党受到苏共和宗主国英共的过多干预，路线方针常常脱离国情左右摇摆；未能独立自主地从本国国情出发，根据本国人民的要求作出决策；（4）印度国情复杂，宗教、民族、种姓的隔阂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较深，妨碍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

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独立。1948年2月印度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巴基斯坦地区的共产党人另组巴基斯坦共产党。50年代末，巴共在东巴和西巴分别建立党中央。东巴共组织在1971年孟加拉国成立后改名为孟加拉国共产党。斯里兰卡共产党原称锡兰共产党，成立于1943年7月，前身是锡兰统一社会党。尼泊尔共产党在1949年9月由尼籍印共党员返回尼泊尔成立。

南亚各国独立初期，各党内部在如何对待新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权、新形势下的革命性质和革命道路等问题上发生分歧。锡兰共产党1947年召开一大，认为“整个资产阶级都会反对帝国主义”，采取了支持统一国民党政府的政策。1948年二大指责一大的决定是右倾错误，提出锡兰“现阶段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没有任何一个阶层可以参加民族统一战线”。印度共产党在印度于1947年8月独立时，指责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是一个“阴谋”，但同时认为这个方案提供了“民族进步的新机会”，印共中央通过决议主张“一切进步力量——共产党人、国大党左翼分子和穆斯林联盟”组成“最广泛的联合战线”，确保争取真正独立、完全民主和印度统一斗争

的“最后胜利”。1947年底印共中央委员会和1948年2月的二大，指责原领导实行“机会主义”政策，认为印度大财团已变成“与反帝民族阵线相对立的反动势力”，主张通过暴力手段实现人民民主革命来建立工人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提出以城市为中心开展斗争并马上夺取全国政权的口号。1950年5月中央委员会又改组，批判二大的主张是“冒险主义”，主张开展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继续进行自1946年在特仑甘纳地区开始的农民武装斗争。印共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一直进行到1950年底，暂时取得一致，通过了新的《纲领草案》和《政策声明》。文件提出印度革命走的既不是俄国道路，也不是中国道路，“而是适用于印度情况的列宁主义的道路”。印度革命要“以一个新的人民民主政府来代替目前的反民主、反人民的政府”。文件提出要采用各种斗争形式，包括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来动员群众和把他们引向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中去。但同时认为，只有经过人民的武装革命才可能建立人民民主国家。这一文件通过后，印共停止特仑甘纳武装斗争，参加1952年大选。

50年代后，南亚各国共产党除巴基斯坦共产党屡遭镇压处于非法地位外，其他共产党陆续进入公开合法斗争时期。印共在1957年还在喀拉拉邦选举获胜，执政一年多。1958年党的五大提出力求用和平方式实现充分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尼共参加1959年第一次大选，获得4个席位。锡共也参加了议会选举，并与反对党结成人民联合阵线。但各党内部有关革命道路的争论并未停止，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更趋激烈。

1960年国际共运争论公开后，一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南亚各国共产党普遍发生分裂。以丹吉为首的印共、以魏克玛沁格为首的锡共、尼共（拉伊玛吉派）、孟共等党支持苏

共的路线，主张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走非资本主义的道路。反对这条路线的一派另立新党，1964年10月印共（马）成立。1967年5月印共（马）又发生分裂，党内以查鲁·马宗达为代表的一派开展纳萨尔巴里农民武装斗争，并于1969年4月成立印共（马列）。锡共以政治局委员N·桑穆加塔桑为首的一派成立同名新党，后又分裂成许多派别，以党的主席魏克玛沁格为首的一派于1972年8月将党的名称改为斯里兰卡共产党。尼泊尔国王在1960年底宣布禁止一切政党活动。尼泊尔共产党转入地下，党内因观点不同分为许多派别，70年代初尼共贾帕县一些党员开展武装斗争，后于1978年成立尼共（马列）。

70年代末至80年代，南亚共产主义运动进入新的阶段。各国共产党多数走上联合的道路。搞武装斗争的政党，由于受到政府镇压和内部意见分歧，一再发生分裂，武装活动逐渐停止，个别派别转为公开合法斗争。以丹吉为首的印共因在1977年支持英·甘地的国大党实行紧急状态，声誉大降并在大选中失利，引起党内不满。1978年4月以总书记拉奥为首的一派批判丹吉的政策，决定实行反对英·甘地国大党的政策，并与印共（马）等左翼政党合作。丹吉于1981年因另立“全印共产党”被印共开除出党。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南亚各国共产党普遍开始调整政策，对内政策趋近。印共宣布反对印度国大党（英）反人民政策的立场受到印共（马）欢迎，两党互相调整竞选席位，采取联合行动开展群众斗争。尼共（马）和尼共（马列）在1986年由原来抵制改变为参加评议会以摧毁评议会制度的立场。尼共（马列）停止开展武装斗争，除同左翼政党加强联合行动外，还同尼大会党就开展民主运动达成谅解。斯共、孟共也都参加了反对党反对政府的联合行动。

二、对苏东剧变的反应及各党现状

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及随后发生的东欧转向、苏联解体，在南亚共产党当中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但由于严酷的事实教育，多数党逐步澄清了认识，维护了思想上的统一，党的力量有了恢复和发展，党的政策作了调整，在各国政局变化的形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印共（马）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开始时表示欢迎，但同时对其实行的一些政策持保留态度，指出只有这些措施保持马列主义的指导作用，保证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才能加强社会主义社会。1988年5月和8月，印共（马）中央发表声明，对戈氏实行“改革”和“公开性”引发的否定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成就的反社会主义倾向表示严重关切。1990年1月，印共（马）政治局《关于东欧局势的声明》指出，东欧国家局势的变化是“世界社会主义的一次倒退”。东欧国家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歪曲和背离，而不能正确吸取教训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实行必要的改革，给反社会主义势力以可乘之机，使他们得以利用人民的不满，披着改革社会主义的外衣，喊着‘社会主义民主’的口号，企图在这些国家复辟资本主义”。1990年5月，印共（马）中央对苏共提交二十八大的纲领草案进行了详细评论，批驳“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指责戈的新思维大大低估了帝国主义的危险性。1991年10月印共（马）公布向党的十四大提交的《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决议》草案指出，苏共二十大以来实行的、戈尔巴乔夫强化了修正主义政策，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苏

联的解体。1992年1月召开的印共（马）十四大统一了全党的思想，重申党的基本路线。1993年5月，由印共（马）倡议，在印度的加尔各答举行了有21个党的代表参加的“当代世界形势和马克思主义有效性”的国际研讨会。印共（马）总书记H·S·苏吉特为会议总结出下列结论：（1）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具有创造性的科学，至今仍保持着初创时的有效性，仍然是我们行动的指南；（2）社会主义遇到挫折和曲折，是由于歪曲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不能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目标；（3）社会主义仍然是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奋斗目标；（4）建筑在人剥削人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不能提供解决当今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5）帝国主义仍然是人类的主要敌人，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力量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反击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进攻；（6）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决心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苦大众实现社会主义。这6点结论也可以看作是印共（马）对苏联东欧剧变后世界形势的分析和表明该党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印共（马）在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风浪面前，保证了全党的统一，党的力量有所发展。党员人数从1988年12月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时的46.5万，增加到1995年4月十五大的63万人。群众组织同期由2200万人增加到3000万人。在西孟加拉邦自1977年以来4次选举获胜，至今连续执政21年。1991年在喀拉拉邦因对邦内形势估计错误，提前举行邦选举遭挫，失去执政地位，但仍拥有雄厚力量，并于1996年邦议会选举中联合其他左翼力量重掌政权。1993年又在特里普拉邦选举中获胜，取得执政地位。在全国议会人民院中的席位由1989年的33席增到1991年的35席。由于国大党（英）在中央失去了一党垄断的地位，印共（马）联合左翼力量，对全国的政局起着牵制作用。

尼泊尔共产党人自 80 年代以后，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不断调整政策。1990 年 1 月，尼共 7 派代表组成左翼联合阵线，决定联合开展群众运动，把废除尼国王控制的无党派评议会制度作为斗争的最低纲领。同年 2 月，同资产阶级政党尼泊尔大会党共同发起人民和平运动，迫使国王解散评议会，实行君主立宪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度。1991 年 1 月尼共两个主要派别尼共（马）和尼共（马列）合并为尼共（联合马列）。该党在 1991 年大选中获得议会 205 席中的 69 席，成为第一大反对党。苏东剧变后，该党及时总结经验，1992 年 2 月尼共（联合马列）党中央发表《关于苏联解体的决议》，统一了全党思想。决议认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倒退并不说明马列主义的失败。如果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人不能密切联系群众，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在革命与建设中不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只能认为这个党是失败的。尼共（联合马列）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把马列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党要把马列主义最高真理同尼泊尔的历史和民族特点、尼泊尔人民的优良传统，以及本国具体情况结合起来，独立地制定自己的政策。1993 年 1 月该党召开五大，提出尊重宪法的权威性，党在当前的任务是建立人民的多党民主主义制度。1994 年 11 月中期选举中取得 88 席，以最多席位受国王之邀组成少数派政府。新政府实施“兴我家园”计划，成立土改委员会，为全国近 4000 个村庄发放了总额为 2400 万美元的乡村发展专款，并开始试行新的养老金制度。在外交上坚持维护民族利益的立场，重视发展与邻国的关系。由于是少数派政府，在 1995 年 9 月的议会不信任投票中失败而被迫下台。该党在新形势下确立“以议会斗争为主，街头政治为辅”的斗争方针，在 1997 年 1 月补缺选举中获 3 席，总席位增加到 90 席，

保住了第一大党的地位。3月联合民族民主党、工农党和亲善党再次组成新政府，推举民族民主党的昌德任首相，尼共（联）副书记高汤姆任副首相。

印度共产党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开始是采取支持的态度。认为苏联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改革的目的在于废除官僚命令主义的制度，使之变为民主和人道的制度。称赞戈的“新思维”使国际关系向好的方向发生了根本转变。1991年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解散苏共，叶利钦掀起反共歇斯底里，在印共党内引起重大反响。印共中央执委会在1991年9月和1992年2月先后分别提出了对局势看法不同的《关于苏联和东欧局势》的两份同名文件草案。在后一份草案中明确指出，戈尔巴乔夫要对苏联发生的动乱和无政府状态，对苏联的解体，对社会主义的丧失，对苏共的暂时瓦解负主要责任。戈任职期间推行的政策，为叶利钦为首的反共势力上台铺平了道路。1992年4月召开的印共十五大批准了这一评价。代表大会还否定了将党的性质由“工人阶级的政党”改为“劳动人民政党”及删去“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的意见。由于印共对苏联东欧剧变的看法与印共（马）趋于一致，两党关系进一步密切。在印共（马）支持下，印共在1991年大选中获13席。党员人数由1989年的46.7万，一度减少到1990年的44万，1991年召开十五大时又恢复到46.7万。印共支持1989年12月成立的新人民党政府，但不参加内阁。新人民党政府倒台后，印共仍保持两党较好关系。党的十五大重申“将继续同新人民党结成联盟”。1996年大选后，印共决定参加联合阵线政府，总书记古普塔和全国委员杰都兰分别担任内政部长和农业部长。

斯里兰卡共产党在苏联解体后面临困难时期。该党曾称赞

“苏共二十七大会必将成为苏共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又一里程碑”，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根据当前实际情况对马列主义的科学发展”。1991年3月召开十四大，由于党内分歧，大会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未作表态。但明确表示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重申党的工人阶级性质，坚信社会主义必定在全世界胜利。1991年苏联8·19事件后，该党发表声明，不支持采用政变方式，同时谴责正在兴起的、得到国外支持的反共歇斯底里。苏联东欧剧变后，该党基本上保持5000名党员的状况。

孟加拉国共产党党内对一些重大问题本来就存在着分歧，随着世界形势和世界共运的变化，双方更难达成一致。1991年10月召开五大，会议通过政治决议坚持“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摒弃一切教条主义）作为党的思想基础”，“党的最终目标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采取回避办法，暂时搁置起来。1993年6月两派在组织上分裂。原党的主席马尼克在分裂后表示：“实践证明，孟共过去追求的社会主义及其模式都是错误的。想在外界的支持和帮助下，实现孟加拉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是不现实的。”该党在召开五大时约有党员2万人，在1991年2月选举中获5个议席。分裂后的以党的主席马尼克为首的“改革派”参加资产阶级中间派人民论坛，以萨利姆为首的“强硬派”与左翼的5党联盟合作。议员有的参加执政党，有的参加反对党。

三、冷战后的思考与探索

1. 关于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

印共（马）认为，首先是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出现了偏差和错误，在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民主及实践、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高党和人民觉悟等方面存在着偏离马列主义的问题。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低估了世界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适应形势变化的能力。对资本主义总危机简单化地理解为资本主义有可能即将崩溃。低估了资本主义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进程的能力。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简单地、机械地说成是一条不会出现逆转的、没有曲折的笔直大道。这种错误的认识阻碍了清醒地认识工人阶级不断加强革命的思想斗争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过高估计了社会主义的力量，从而对社会主义国家为适应世界形势变化而进行必要的内部变革及发展国内生产力缺乏具体的、科学的分析。其次是苏共二十大开始执行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以及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没有在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框架内纠正偏差，相反奉行了一条取消主义路线。戈尔巴乔夫全面摧毁社会主义的进程，被帝国主义所积极支持的反革命势力所利用，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的瓦解。苏联东欧的剧变是戈尔巴乔夫主义的破产。

印度共产党十五次代表大会总结了苏联解体的原因是：（1）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深刻危机；（2）戈尔巴乔夫实行的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中所犯的严重错误；（3）没有使苏共复兴和发动群众的活力，从而没有发挥党应起的作用；（4）毫无限制

的“公开性”，使意识形态失去了方向。对诽谤、歪曲革命历史的反动理论没有给予反击；(5) 民族主义、分离主义特别是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的迅速发展；(6) 西方情报机构、帝国主义势力，以巧妙的两面手法颠覆苏联的目的获得成功。

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在建设初期就存在一些弱点。在如何科学地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如何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如何健全社会主义社会的选举制度，如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多种经济形式等众多问题上，苏共没有起到创造性的作用，从而加速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物质文化需要与供给之间的矛盾。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执行的政策加速了上述矛盾的激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教条主义和停滞政策及措施使社会主义制度变得更加脆弱，危机四起。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政治、经济结构到了崩溃的边缘。戈尔巴乔夫以改革和公开性为名进行的改革，实际上是破坏苏联社会，使苏联朝着复辟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2. 关于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的理解和认识。

南亚各国共产党在“剧变”后分别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都重申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印共（马）认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并不能否定社会主义的理想。资本主义不能提供解决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的办法。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不会也决不能摆脱危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不会持久，社会主义仍具有广阔和光明的前途。印共十五大文件指出，某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并不能否定马列主义的基本科学原理。尼共（联合马列）表示，苏联东欧的倒退只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解体，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斯共坚信社会主义必定在全世界胜利。

必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南亚各国共产

党从“剧变”中共同吸取的经验教训。印共认为，社会主义没有模式。印共将把马列主义与印度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以便找到一条印度“模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斯共从总结该党的教训提出，要反对照搬照抄外国的模式。尼共（联合马列）表示，马列主义只是个哲学问题，能否成功取决于如何与一个国家的实际相结合。

南亚各国共产党认为，实现社会主义要从本国的具体条件出发，不能犯超越发展阶段的“革命急躁病”。印共（马）表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搞社会主义过早了是错误的。但从相对落后的社会阶段向比资本主义更高阶段的转变过程，受到很大的限制。认清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是必要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不能一蹴而就，相反这是一个漫长的激烈斗争的过程。印共在修改后的党章序言中规定，印共仍然坚定地坚持建立公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通向这样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将由印度特定的历史条件及国家的特点，即历史、传统、文化、社会构成和发展水平来决定。印共认为，要吸取一些国家所犯的超越发展阶段错误的教训。这些国家无产阶级在社会上不占有战略地位，甚至在人口当中仅居微不足道的少数，也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的口号。印共提出，在印度建立劳动人民的政权，主要是指工人阶级领导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政权。但在社会主义得到更广泛支持的条件下，还应包括为社会主义而工作的其他阶层，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其他力量要通力为社会主义而合作。印度的社会主义社会要保障个人的权利和民主自由。要承认在遵守宪法的条件下建立反对党的权利。尼共（联合马列）表示不同意不顾实际情况急于走向社会主义的不适宜的作法。认为实现人民民主政权有3个基本发展阶段：第一阶段集中消灭旧制度的剥削压迫残余；

第二阶段是在新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社会各个领域在物质上和思想上的发展；第三阶段为过渡到社会主义作好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实现所有这一切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不能不顾新生的社会制度还很脆弱，还没有站稳脚跟就急于迈步。

南亚各国共产党认为，当前处于和平时期，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主要采用和平方式。印共（马）仍然坚持通过推翻大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地主政权的人民民主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当前在全国范围内，力求采用和平手段，建立左翼民主力量的替代政权，同时在邦一级争取通过获得立法机构多数建立左翼阵线政府。但印共（马）指出，不能成为资产阶级议会的牺牲品。要清醒地认识到，在邦一级赢得多数或建立政府，并不能解决摆脱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统治的问题，并不意味着获得实现社会经济根本变革的实际权力。因为印度的联邦制仅给予各邦很有限的权力，国家政权及其机构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印共（马）参加邦一级左翼阵线政府的目的是，利用宪法范围内的有限权力，最低限度地减轻人民的痛苦、捍卫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巧妙利用国家机器，限制对日益发展的劳动人民各阶层斗争的镇压；推动群众运动，加强党的群众基础，促进全国范围的反对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斗争。尼共（联合马列）的革命纲领规定，在共产党即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当前尼泊尔处在和平斗争时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没有达到要采取暴力的形式。和平斗争包括议会和议会外的非议会斗争。目前政治运动的主要内容是维护和加强民主权利、维护民族利益、实现民族团结、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政治斗争仍属议会斗争范围。同时要克服在和平斗争时忽视暴力，谈论暴力时反对和平斗争的思想。印共坚持必须推翻执政的资产阶级与其经济

上占统治地位相应的在国家的统治地位，由劳动人民的政权取代，开始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没有政权的变革，就不能完成社会的根本变革。同时印共认为，印度革命存在着和平道路和利用议会的可能性。斯共仍然坚持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当前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左翼政党和反对统一国民党的两个统一战线，争取民主、民族团结和社会正义。采取群众斗争、议会斗争相结合，以群众斗争为主的斗争方式。

3. 关于党的性质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

南亚各国共产党在“剧变”后仍然坚持党的马列主义和工人阶级性质，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原则。印共（马）认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今天仍然是有效的，那些以右的或左的形式出现的修正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都不能算做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印共（马）总书记苏吉特在党的十四大上说：“代表大会上没有一个代表提出要放弃马列主义。印共（马）一向把马列基本原理运用于印度的实际，所以我们不仅能顶住来自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反共宣传，而且还会继续向前发展。”印共党内在十五大召开前有人提出要把党的性质改为“劳动人民”的政党，把马列主义改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并主张删去“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的规定。代表大会通过的修改后的党章序言仍然规定“印共是印度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删去了“印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最高阶级组织形式”的提法，同时加上“印共是工人、农民、普通劳动人民、知识界和其他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的自愿者组织”。党章序言坚持“马列主义科学对于指引通向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是必不可少的”。代表大会批驳了认为民主集中制是专制主义根源的主张。修改后的党章序言规定，“印共以民主集中制和党内充

分民主为基础组织起来和进行工作。党也坚信，行动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党员都应遵守党的代表大会、全国委员会及党的各级委员会的决定。不允许在政治上、组织上和以任何机会主义的理由建立派别和集团。同时党应尊重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印共认为，民主与集中应当互相结合。必须采用保证党内民主的有效措施来纠正和防范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压制党内民主的弊病。但不能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发动群众参加革命行动需要行动的统一和纪律，因此需要集中。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对不同意见实行惩罚，保证更自由公开地讨论不同观点和对领导干部的批评，限制领导干部和官员的任期，禁止各种形式的个人崇拜，促进基层民主，以使民主集中制更有活力。印共十五大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时强调的是，工人阶级政权代表大多数的被剥削者对少数剥削者的统治，使用暴力是为了实行变革和对付反革命的反抗。他们使用“专政”一词并非指后来发生的那些无法无天、个人专断和残酷暴行等丑恶事实。印共在1958年的代表大会上已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因为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专政”这个词有了邪恶的意思。另外，社会主义本身获得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甚至中等阶级也团结在社会主义周围。这就要求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下一个新的定义。印共提出建立劳动人民政权的目标，同时主张允许遵守宪法的反对派的存在，也就是实行多党制。尼共（联合马列）革命纲领规定，该党是尼泊尔无产阶级、劳动阶级的政党，始终不渝地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而奋斗，以马列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原则。尼共（联合马列）根据尼泊尔的特点提出了人民多党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该党认为，专政就是统治，统治是一个阶级控制

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但是人民政权的任务不仅是控制和镇压，还要领导广大人民、为人民谋利益。因而，用“人民民主政权”要比用“人民民主专政”表达更为准确和恰当。根据尼泊尔国内外的形势及该党的经验，尼泊尔人民民主政权具有“多党性”的特点。在人民多党民主主义制度下，宪法至高无上。宪法维护人权和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根据宪法实现多党的开放社会，所有政党在宪法范围内有相互和平竞争的自由。在立法会议上获多数票的政党组建政府。人民多党民主主义制度为过渡到社会主义作好客观准备工作。

4. 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立场和态度。

印共（马）认为，苏联东欧剧变使国际舞台上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转向有利于帝国主义。但当代所有4个基本矛盾，即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国家、帝国主义之间、资本主义国家劳资之间的矛盾继续加剧。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时代的性质仍然是自1917年开始的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混乱及随之发生的对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上的新攻击是暂时的现象。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加剧，工人阶级必然重新组织起来，在斗争中恢活动力。前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进程并不是如想像那样容易和简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几年以混乱为特点的形势已变为重新组合和复兴。随着资本主义危机加深，4个基本矛盾激化，共产党人和左翼力量必然向前发展。但民族和社会解放的进程是复杂的，需要长时间才能完成。印共（马）表示，在马列主义革命原则及从倒退事件中正确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必须发展不同国家共产主义力量之间行动上的联合，为此需要坚持和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须同所有为反对当前帝国主义攻势而斗争的人们联合起来，只有这

样，才能对抗帝国主义扭转人类历史进程的挑战。所有共产党人、进步革命力量的团结是在当前形势下加强国际主义的基础。在印共（马）倡议下，1993年5月在印度加尔各答召开了纪念马克思诞辰175周年“当代世界形势和马克思主义有效性”的理论研讨会，有20个国家21个共产党出席。该党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一个统一的指导中心是不现实的”，印共过去一贯支持苏共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提法，认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命根子。该党支持苏共二十五大有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观点，称经互会各国的“相互合作”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辉榜样”。剧变后，印共十五大修改后的党章序言表示印共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时指出在独立、平等、互不干涉的原则上，同其他劳动人民的政党及争取进步和反帝的力量建立友好关系。印共支持共产党之间的双边和多边交流，参加了印共（马）倡议的国际研讨会。尼共（联合马列）认为，通过召开国际研讨会、地区性集会、政党之间建立正式联系及扩大人民间接接触方式，可以交换看法、传播思想、相互支持。

5. 当前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政策调整和动向。

“剧变”后南亚多数共产党经受住风浪冲击，适应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调整政策。这主要表现在：（1）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印共十五大指出，从付出昂贵代价的经历认识到，必须避免教条主义、不顾具体条件的主观主义和超越发展阶段的“革命急躁病”。党的历史发展中一个应吸取的教训是社会主义没有模式，不能把马列主义当作已经得到终极真理的教条，而要作为研究印度现实和发动一切可能的社会力量实行革命变革的工具。印共提出把马列主义与印度的具体条件相结合，以便找到一条印度“模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该党

十五大文件作了自我批评，指出对苏联模式存在的消极方面过去有些认识到了，但出于荒谬的忠于苏联和社会主义的考虑，为这些消极方面进行辩解，有时甚至论证其是正确的。这种倾向发展到教条主义，甚至将马克思主义弃之不用。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不科学和不符合真理的。尼共（联合马列）表示，“我们不必一定按马克思、列宁或者毛泽东的片言只语办事”，“马列主义能否在尼泊尔实现取决于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该党在分析了已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形式后，根据尼泊尔情况提出了建立人民多党民主主义政权的目標。该党认为，从尼泊尔当前多党民主制度仍然脆弱的形势出发，提出这一目标有利于打破资产阶级的垄断统治。利用这一政权消灭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在各个领域中的残余，着手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的经济制度，为过渡到社会主义作好物质准备工作。（2）政治经济政策趋向灵活。印共（马）继续反对印度中央政府经济自由化的政策，但在执政的西孟加拉邦于1994年9月向邦议会提交的工业政策声明，表示要吸引跨国公司和财团到该邦投资的措施。印共（马）中央同年12月就此发表声明解释说，西孟邦政府权力有限，不可能脱离中央政府的自由化政策，邦政府资金有限不能自主地发展工业。为打破中央政府的歧视政策，需要自筹资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工业，创造工作机会，缓和日益增加的失业压力。但在这同时强调，努力加强公营部门的作用，私营部门进入电力领域时不能造成资本外流和提高电费，引导私营部门进入基础设施和社会发展领域，维护工人利益和工会权利。尼共（联合马列）组成政府后采取灵活政策，政治上充分尊重王室尊严以及王室应享有的地位和作用。经济上推进国有和自由企业相结合的混合经济，鼓励私营经济发展，欢迎外国援助和投资。在农

村征收而不是没收外乡地主的土地。在对外关系上，一方面表示不接受任何有损于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的事情，另一方面谨慎处理与印度的关系，既不亲印也不全面反印，争取恢复尼、印间自古存在的兄弟友谊。(3) 加强共产主义各派的团结，妥善处理与资产阶级反对党的关系。“剧变”后，除孟加拉国共产党分裂外，印度和尼泊尔原来分裂的各派继续发展了联合行动的关系。印共重申争取同印共（马）实现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的重新统一。印共（马）肯定两党召开的代表大会在有关国家紧迫问题和策略的认识上实现了共识。两党近年开展了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同时表示，两党仍存在分歧，这要通过联合行动和加强两党在各级协调委员会的对话来推进统一的进程。尼共（联合马列）对尼大会党和其他民族民主党采取灵活政策，在反对评议会制度、争取多党制方面与大会党共同合作，宣布“支持大会党政府执行的每一项正确的政策，同时坚决反对错误的政策”。尼共（联合马列）表示愿同各政党合作，采取协商一致方针，与民族民主党还共同组成联合政府。

南亚各国共产党认识到，南亚各国宗教、民族、种姓的矛盾冲突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这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带来了困难。特别在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更具有难度，这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但南亚又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之一，贫富悬殊极为严重。在这些国家，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前南亚各国处在政治、经济关系调整的时期，政局动荡、资产阶级政党分化改组，南亚共产党人有着发展自己力量的好时机。南亚各国共产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出要坚持把马列主义同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前进道路上会有艰难和

曲折，但锲而不舍终会有收获。

剧变前后南亚各国共产党力量变化情况

	党员数		议席数		执政情况
	剧变前	剧变后	剧变前	剧变后	
印共(马)	46.5万 (1988年)	63万 (1995年)	33席 (1989年)	35席 (1991年)	在3个邦执政
印共	46.7万 (1989年)	46.7万 (1991年)	6席 (1989年)	13席 (1991年)	曾在中央参政 在3个邦参政
尼共 (联合马列)	3.7万 (1989年)	5万 (1995年)	69席 (1990年)	88席 (1994年11月)	曾在中央执政
斯共	5000	1万	1席 (1989年)	4席 (1994年)	在中央政府 参政
孟共	2万 (1989年)	2万 (1991年)	抵制议会 选举无议席	5席 (1991年)	1993年6月 分裂

中：印度国大党“社会主义”的调整

印度国大党的社会主义一般指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其在印度的实施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4年尼赫鲁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至1964年尼赫鲁逝世。第二阶段为1967年至1977年英·甘地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政策时期。第三阶段为1980年至今，英·甘地第二次执政、拉·甘地、拉奥等国大党

领导人不同程度上对“尼赫鲁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策上进行了调整。

印度国大党成立于1885年，是印度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政党。在印度独立后的50年中，该党除在1977—1979年、1989—1990年和1996年之后成为在野党外，一直是印度的执政党。在国大党累积执政的43年中，尼赫鲁家族是统治核心。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执政17年，其独生女儿英迪拉·甘地执政15年，英·甘地长子拉吉夫·甘地执政5年。1991年大选中，拉·甘地被炸身亡，尼赫鲁家族的一统天下遭受严重打击，但尼赫鲁提出的在印度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主张对印度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至今在印度社会仍有很大影响。

一、尼赫鲁的“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形成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是印度杰出的民族运动领导人和政治家。他为印度的民族独立和发展奋斗了半个世纪。他倡导的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构想，在印度独立后的几十年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尼赫鲁于1889年11月14日出生在印度北方邦阿拉哈巴德市婆罗门贵族家庭。1905年到英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哈罗公学、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自然科学，获学位后又进入伦敦内官法学院。1912年取得律师证书后回到印度，从事律师工作，并参加了国大党，开始了政治生涯。在争取印度独立运

动中曾 9 次被捕入狱，共达 10 年之久。1947 年 8 月 15 日印度独立后出任总理，直至 1964 年 5 月逝世。任期内，在政治上废除土邦王公的特权，确定议会民主制，建立统一的世俗民主共和国。经济上，废除柴明达（中间人）制度，实行土地改革；接管英国殖民政府主管的企业，实行计划经济和公私营并举的“混合经济”体制。在社会方面，主张废除不可接触种姓制度，提倡“机会均等”、“社会公正”等。外交上，奉行不结盟外交政策。1954 年 6 月，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共同提出作为处理国际关系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1. 尼赫鲁“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

尼赫鲁早在英国留学期间，不仅阅读了大量自然科学书籍，而且还涉猎许多历史、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书籍。同时，也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受到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其中包括拉斯克的自由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影响。1912 年从英国回到印度后，在圣雄甘地的影响下，他参加了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深入农村，看到农村极端贫困的现象，他深有感触。他认识到，只是民族主义还不能完全拯救印度，印度不仅需要独立，而且需要摆脱贫困。1927 年，尼赫鲁代表国大党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有机会接触世界上许多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同年 11 月，他应邀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 10 周年庆祝活动，对苏联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留下深刻印象。他说，“这次苏联之行使我从新的角度看待历史和现实”，“对印度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秩序”。返印后，他开始传播他的社会主义思想。1929 年 12 月在国大党拉合尔年会上，经甘地推荐，尼赫鲁当选为国大党

主席（兼全印工会大会主席），在主席致词中称他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共和分子”，“民族运动力量的大小，取决于农民和工人支持的程度。只有赞助他们的事业，才能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这次年会，通过了争取印度完全独立的决议。1936年勒克瑙国大党年会上，他重申相信社会主义，而且表示希望国大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组织。1944年，他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写道：“研究了马克思和列宁，对我思想有很大影响，帮助我用新方法观察历史和现在的事情。”他表示他已在考虑“如何使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结合”的问题。

2. 尼赫鲁“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形成过程。

1947年8月15日，印度获得独立，尼赫鲁当选为第一任总理。1949年11月印度通过第一部宪法，宣布印度为“主权的民主共和国”。1950年7月7日尼赫鲁在新德里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作为一个尊重公民权利的政府，我决定容许人民和平地随便怎样讨论或宣扬共产主义哲学。但是，如果共产主义——任何主义——使用暴力的话，那么任何国家都必须加以镇压”。1954年尼赫鲁访华后在人民院发表演说时提到要在印度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同年12月，人民院通过决议明确提出“我们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类型社会”。1955年1月，国大党阿瓦迪年会正式通过关于要在印度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决议。1956年1月，国大党政府对帝国银行和人寿保险业实行有偿国有化。4月开始实施以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社会”为目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7年国大党印多尔年会，通过关于以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建立“社会主义合作联邦”的决议。同年12月，国大党成立了“社会主义论坛”。1959年国大党那格浦尔年会通过了关于合作耕种的决议。1962年将“社会主义论坛”改为“社会主义行动论坛”。

1964年国大党布巴那斯瓦尔年会，通过了关于“以和平的、合乎宪法的手段，建立以议会民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决议。至此，尼赫鲁的“社会主义”思想正式为国大党所接受。

3. 尼赫鲁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不得人心，社会主义给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带来希望和信心。尤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设成就对印度产生直接影响。尼赫鲁说：“中国革命已经推翻了世界大国的均势，世界重心已从欧洲转移到亚洲。因为我们距这个中心较近，所以，影响我们的程度也较大。”印度独立后，人民生活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恶化。1946年特仑甘纳地区爆发的农民武装斗争虽然在该地区仅坚持到1951年，但已开始向其他地区蔓延，农民开展了反夺佃斗争。50年代初期，工人罢工斗争也在继续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尼赫鲁打起“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旗号来争取人民的支持。

二、基本的理论与主张

1. “中间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尼赫鲁倡导“中间社会主义”道路。他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说，“单纯政治上的民主所产生的一些弊端在美国是很显著的，而由于缺乏政治上的民主所产生的一些弊端在苏联也存在着。”他说，印度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从印度

思想中产生，而且必须适合印度条件的社会主义。1954年12月，他在人民院国大党议会党团会议上说，“整个搬用美国或共产党的观点和方法都是对印度有害的，只能采取中间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12月，尼赫鲁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一文中进一步宣称：“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一种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正统的实践之间的中间道路，通过这种社会主义，我们把人民引向繁荣的新天地”。尼赫鲁这种“中间道路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沿袭西方传统的社会民主党的“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第三条发展道路”。

尼赫鲁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在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尼赫鲁认为，社会主义目标只能通过甘地主张的非暴力的和平手段，用民主和宪政的方法来实现。他说，社会主义不但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也是一种“民主的方法”。“一切问题只要运用民主的方法都可以得到解决。相反，离开了民主的方法任何企图将会导致分裂。”“从理论上讲，用民主的方法是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的，当然，它要以获得民主进程为前提，社会主义不应抛弃民主。”尼赫鲁的这种社会主义在1964年1月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

2. 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尼赫鲁早年即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争取民族自由斗争中，他坚决主张完全独立，反对成立自治领。在他的倡议下，国大党在1927年和1929年年会上两次通过了他提出的完全独立的决议。1936年，尼赫鲁在给国大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贺电中指出：“继续坚持这两种观点（指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使之成为有机的整体，是印度社会党人的课题。”后来，他又说，“就印度来说，就印度目前所处的地位来说，我

确实喜欢民族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赞成独立，社会主义最终将作为政治外衣把民族主义推向前进。

三、实践的三个阶段与近年来的变化和调整

1. 尼赫鲁时期（1954—1964年）

(1) 实行“计划化”、“国有化”，建立国营经济，实行公私营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

1950年3月，印度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尼赫鲁亲自担任主席，该委员会此后一直由总理直接领导。印度自1951年起实施发展经济的五年计划，尼赫鲁经济计划的前提是建立包括国营和私营两部分经济的“混合经济”。在“混合经济”政策指导下，尼赫鲁政府大力发展国营经济，以便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同时，大力扶植私营经济的发展。1950—1956年度，印度政府先后将民用航空、帝国银行、人寿保险和科拉金矿等收归国有，并从英国人手里接管了铁路、邮电和军火工业；印度在“二五”计划期间由国家财政直接投资和利用外援，建立国营企业。印度“国营”经济主要领域在电力、运输、煤炭、石油勘探和炼制、钢铁、化工、机器制造、建筑等投资大、收益慢的重工业和基础工业部门。3个钢铁厂在西德、英国和苏联援助下建立。根据1956年工业政策决议，国营企业的投资约占投资总额的53%。

尼赫鲁执政时期，印度实行了3个五年计划。在此期间，印度的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部门都得到很大发展。在国营部门

建立了许多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实体，国营部门在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印度的工业结构发生了变化，改变了独立初期重工业落后的经济结构，为国民经济现代化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印度走上了经济独立发展的道路。

(2) 废除中间人制度、实行土地改革。

印度是个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80%。独立前，占农村人口 15% 以下的地主、富农拥有农村土地的 85%，而占农村人口 85% 以上的贫雇农、中农仅拥有农村土地的 15%。他们遭受严重的封建剥削，农业生产力长期低下，直接影响到工业的发展。在此情况下，尼赫鲁政府于 1949 年公布了土地改革委员会的报告，建议各邦实行土地改革。印度没有统一的土地改革法，土地立法和改革由各邦进行。土改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废除柴明达（中间人）制度，他们的土地由政府接管，佃农向国家直接纳税。当时，印度农村约有 43% 的耕地面积实行“柴明达”土地制度。这种制度早在英国殖民者入侵印度之前就存在。当时的“柴明达”地主是国王的包税人，亦称“中间人地主”，英国统治者承认了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因而成为法定地主。1955 年，土改的第一阶段基本完成，绝大多数省（邦）都废除了柴明达（中间人）制度。被废除的“中间人”共有 250 万（包括家属）。政府用赎金办法接管了 3.6 亿英亩土地，约占全国土地的 38%。简化了地权，减少了转租，2000 多万佃农与国家直接发生关系。由于政府允许“柴明达”保留大量“自耕地”，因而“柴明达”在农村的地位和影响并未完全受到削弱。政府接管的土地又出售给农村的富裕者，这些人成为农村中新的权贵，而农民的土地要求并未得到满足，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依然十分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改革进入第二阶段，即实行“规定土地持有最高限额法”。

1959年1月国大党那格浦尔会议通过了“土地限额法”，建议政府至迟到1959年底在全国立法规定现有土地的最高限额，这项法令应在3年内实施，凡超过规定限额的土地应归村评议会所有，并分配给无地农民使用。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国大党政府的土地限额法进行过多次修改，由于各级官员的庇护和地主采取种种转移土地的手段，使可供分配的土地寥寥无几，又由于各邦政府规定的土地最高持有有限额各异，有的规定的最高限额很高，使大地主家庭保留了大量土地，各邦只剩下少量土地可供再分配。1976—1977年度进行的第二次农业普查表明，印度全国共有农户8150万，其中拥有不到1公顷土地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54.6%，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0.7%，而占全国总农户3%的地主，却占有全国耕地面积的26.3%。1980年3月，国大党政府宣布，超过限额的土地有157.4万公顷，实际分给无地或少地农户的土地只有69.9万公顷。

国大党政府的土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势力和改变了农村的阶级结构。“柴明达”中间人被废除后，他们从政府那里获得50—60亿卢比的补偿金，又以“自营”名义保留了大量好地，成为真正的土地所有者。许多地主开始采取雇佣劳动经营农业的方法，开办现代化大型资本主义农场，富裕农民利用土改和国家的帮助，不断扩大自己的经济，成为新式富农，为印度农村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

(3) 实行农业合作化。

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就有过“土地的合作化或集体管理”的设想。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在考虑如何发展印度农业时，受苏联农业合作化和5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影响。1955年底和1956年7月，尼赫鲁两次派代表团到

中国考察农村合作化运动。1959年国大党那格浦尔年会通过关于合作耕种的决议指出，将个人超过最高限额的土地交给无地的农民组织合作社；认定合作社经营将是农业的基础，实行联合耕种将是合作社的组织形式；预定在以后数年内，在全国将布满合作社。会后，尼赫鲁说：“我们的目标是要在印度每一个村庄建立乡评议会、一个合作社和一个党校。……合作社负责购买肥料，良种和出售产品。”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印度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联合耕种社、佃农耕种社、信贷合作社等。到1964年，全国共建立了35万个合作社，覆盖83%的村庄和4.07亿人口。合作化运动将分散的土地联合起来，有利于使用农业机械和改良土壤，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地主和富农一般在这些合作社占主导地位，他们的土地入了社，但保留土地所有权。他们一般不参加劳动，而由入社的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或雇一部分雇工去耕种，产品收入主要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入股多少进行分配。

(4) 在社会方面，提出“消灭贫困”、“社会公正”等口号。

1955年担任国大党总书记的斯·纳拉扬对尼赫鲁的“社会主义类型社会”作过解释，他提出了七项基本原则，其中“充分就业和人民有工作权利”、“社会和经济正义”、“首先关心和满足最下层和最穷苦的人民的要求”三项原则都是属于社会公正的。1957年12月6日，尼赫鲁在议会民主讨论会上说：“我们从政治民主发展到经济民主的概念，首先意味着为全体人民谋求某种福利，称之为福利国家。”1959年1月，国大党那格浦尔年会通过竞选宣言称：“社会主义类型社会是一种全体人民都有自由、幸福和平等的、完满的社会。”尼赫鲁对社会主义的含义进一步解释说，社会主义指的“是一个机会均等

和每个人都能过上美好生活的社会”，“我们应当注意不要把国内生产的物质财富落到一小部分很富裕的人手里，而是在穷苦的群众中间分配。”

2. 英·甘地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时期（1967—1977年）

尼赫鲁去世后，夏斯特里继任总理，基本上实行尼赫鲁时期的政策，由于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耗费巨大，加上大旱，印度出现粮荒，夏斯特里不得不调整尼赫鲁重工轻农的政策，提出“绿色革命”这一新的农业发展战略，即在不改变现存土地关系的前提下，选择适合农业发展的地区采用高产品种、化肥、农药，增加灌溉设施，提高农产品产量。旁遮普、哈里亚纳和北方邦西部3个地区是第一批实施“绿色革命”的地区，很快取得了效果。

夏斯特里于1966年1月暴卒于苏联塔什干，尼赫鲁独生女儿英迪拉·甘地继任总理。1967年第四次大选，国大党虽然保持了在中央的执政地位，但议席减少并失去了在5个邦的执政地位。英·甘地为提高在党内的地位和争取民心，再次举起“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英·甘地指责国大党在选举中失利的原因是“国大党没有给公众留下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印象”。她为自己树立一个进行激进改革的形象，于1967年6月向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会议提出了《十点经济纲领》，主要内容是：对银行机构实行社会控制；普通保险业国有化；逐步由国家经营进出口贸易；通过国营粮食公司实行粮食公平分配制度；成立消费合作社；控制垄断企业和经济权力的集中；制定支持无地农民和农业雇工的农村计划；取消前土邦王公的年金等特权；规定最低工资；对城市中收入和财产规定限额。会议通过了这个纲领。为争取群众支持，应付国大党（辛迪加派）分裂国大党的形势，英·甘地推进国有化的进程。1969年7月宣布

对 14 家最大的商业银行（占银行存款总额的 56%，全国信贷总额的 52% 以上）实行国有化。1971 年 5 月将普通保险业的经营管理权交给政府。政府还接管了 214 家煤矿的管理权。1973 年 1 月整个煤矿工业实行国有化。1975 年 7 月底宣布《二十点经济纲领》许诺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实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为无地雇工提供宅基地；废除债奴；废除农村债务；扩大就业；城市土地社会化；向学生提供廉价课本等。1976 年 11 月通过《宪法（第 42 次）修正案》，在宪法前言中将建立“主权的民主共和国”改为“主权的、社会主义的、世俗的民主共和国”。

英·甘地的“民主社会主义”把“消除贫困”同“社会主义”联在一起，对普通群众很有吸引力，她不仅取得党内派别斗争的胜利，而且获得 1971 年 2 月大选的胜利。但“民主社会主义”的许多许诺没有真正兑现，1973 年的世界经济萧条使印度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各阶层的不满情绪增长，国大党（英）内部的腐败，特别是英·甘地的次子桑贾伊的胡作非为，给反对者以可乘之机，英·甘地受到选举舞弊的指责。面对全国性要求她下台的运动，英·甘地于 1975 年 6 月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但并未能避免在 1977 年大选中失利的厄运。

3.80 年代后各届政府的调整时期

国大党举起尼赫鲁社会主义的旗帜，扩大了在群众中的影响，但其很多诺言并未兑现。英·甘地曾经说过，“国大党党员投票赞成各项决议，但许多议员并不相信这些决议”，这就是很多决议“未能执行的原因，有关土改的方案也是如此。我们不断通过决议，但是看来无法加以贯彻”。尼赫鲁的“土改”和“合作社”政策培育起一批资本主义农场主，并没解决农村贫困的问题，这是印度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强调发展国

有经济和自力更生的进口替代经济，初步建立了门类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但片面发展重工业，实行僵硬的计划经济，多数企业经营不善，尼赫鲁的经济政策日益遭到非议。经济没搞好也是英·甘地下台的重要原因。1980年1月，英·甘地在大选中获胜，重新上台执政。她开始对过去的政策进行调整，主要是强调农业的发展和实行鼓励私人经济发展的“自由化”政策。1980年7月颁布《新工业政策决议》，在坚持发展国营企业的同时，进一步放宽对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的限制。1982年公布旨在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新的二十点纲领。她着重宣扬“消除贫困”，而不再突出“社会主义”。1984年10月英·甘地被刺身亡，其长子拉·甘地继任总理。他一方面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和计划工作”，1985年5月国大党（英）全国委员会决议重申该党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另一方面他提出“凡需改革的地方要进行改革”，指出“印度已经错过了工业革命，现在要赶上电子革命的列车”。他继续执行并发展英·甘地二次执政时实行的一些“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其主要内容有：（1）放宽对私营经济的限制，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修改“反垄断法”，放宽了私营公司资产的最高限额，扩大私营部门的生产领域，允许私营企业进入核心部门，除能源等少数几个部门外，私人公司都可以投资；（2）放宽工业许可证的申请，简化了发放许可证的手续，有些行业免发许可证；（3）调整税收政策，降低私营部门的进口关税；（4）整顿国营企业，引进竞争机制，提高管理水平；（5）调整计划管理的地位，增强市场调节的功能，使计划有了较大的灵活性。（6）扩大对外开放，放宽进口许可证的发放，扩大地方外贸经营权，鼓励公私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减免计算机软件等技术产品的进口关税，放宽利用外资的条件，增加对外贸易的优惠，放宽外资合作的

领域，等等。

拉·甘地的经济政策调整幅度大、影响深，执政5年间，工农业生产状况良好，超过“六五”计划指标。尤其是电子工业发展更加迅速，为日后印度软件打入国际市场打下良好基础。外贸迅速扩大，外资流入增加，多方面引进技术，科技进步明显加快，整个经济实力得到加强。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财政赤字剧增，内外债务剧升，通货膨胀抬头，失业人数增加等。

1991年大选中，拉·甘地被炸身亡，纳拉辛哈·拉奥当选，再次组成国大党政府。此时，印度面临着极其困难的局面。海湾战争后，印度遭受石油价格暴涨的沉重打击，国际收支出现空前危机，印度外汇储备只有11亿美元，仅够两周进口支付。冷战后国际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中国和东盟等国家经济的崛起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印度形成巨大的冲击。在这种形势下，拉奥政府上台后一个月便于1991年7月24日，颁布了《新工业政策声明》，大刀阔斧地实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政策，对印度经济进行改革，进一步突破尼赫鲁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措施有：

(1) 调整公私营经济比重，缩小公营企业的专营范围，增加私营企业在社会投资的比重。根据“八五”计划规定，公营部门投资在整个社会投资中的比重为一半以上，现降至45%。取消多年来一直束缚私营经济发展的工业许可证制度，规定除军工、原子能、铁路、矿产等涉及国家安全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少数工业由公营企业专营外，其他部门全部向私营部门开放。(2) 改变公营企业的产权结构。允许部分企业向金融机构、内部职工和社会公众出售股票，转移部分股权，允许公营部门通过市场筹措资金，用于企业改造和扩大再生产。(3) 改革公营

企业管理机制，政府减少对公营企业的干预，扩大自主经营权，利用财政、税收和金融等间接手段实施宏观调控，将企业推向市场。(4) 调整银行管理机构，设立金融监督局，鼓励新建和扩建私人银行。允许国有银行股票上市，允许成立私人保险公司。(5) 通过精简机构、减少行政开支、取消部分商品价格补贴、降低关税等手段来达到减少财政赤字的目的。(6) 调整外贸政策，改变“进口替代”政策，取消进出口许可证制度。放松进口限制并大幅度降低关税。印度的最高进口税率由 1991—1992 年度的 150% 减少到 1992—1993 年度的 110%，1993—1994 年度进一步削减到 85%，普通机器的进口税减至 35%。(7) 大力引进外资，放宽投资限制，扩大外资投资领域，鼓励创办合资企业，放宽外资持股限额，出口导向型企业外资持股可达 100%。允许外资进入银行业、保险业、股市等资本市场。专门设立外国投资局促进投资，直接负责对跨国公司投资的审批工作。(8) 卢比大幅度贬值，加快向完全可兑换货币过渡。1991 年 7 月卢比两次贬值，1992—1993 年度实行双重汇率（60% 自由汇兑，40% 按官方汇兑），1993—1994 年度实行单一汇率，卢比汇率按市场外汇需要自由浮动，在外贸结算时卢比是可兑换货币。1994 年 8 月 21 日起，卢比在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交易中成为可兑换货币。

拉奥大幅度改变了尼赫鲁的政策，1997 年 8 月国大党第八十届年会通过的政策决议对此作了解释：“国大党信仰的思想直至今日仍像对圣雄甘地和潘迪特·尼赫鲁当初提出时那样有效”，“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承诺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并没有停滞在过去的口号中。我们要建设的是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在那里，穷人和受剥削者的利益比教条的经济模式更受重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实行混合经济模式。”

国大党在 80、90 年代对尼赫鲁社会主义的政策作了调整，但其基本精神并未改变，这就是要发展混合经济，即在不消除农村封建势力和大垄断集团的基础上，建立国营企业。尼赫鲁标榜第三条道路，就是既要保障大垄断集团和农村封建势力的利益，又要实现公正、平等。这一道路实行的结果是印度资本主义的工业和农业经济得到了发展，印度中产阶级的队伍扩大，生活得到改善。但大垄断集团的资产不断膨胀，农村封建势力依然存在。贫困没有消除，仍然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原因。尼赫鲁社会主义对群众的吸引力越来越下降，国大党一党垄断政治的局面已经结束。印度目前处于多种政治力量、多种政治思潮在政治舞台上竞争的时期，政府不断更迭，政治动荡不已，这种状况还要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

下：斯里兰卡别具特色的 “民主社会主义”

斯里兰卡的国名就叫“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其自由党和统一国民党都主张奉行“民主社会主义”。但是，它们的“民主社会主义”与发达国家社会党人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尽相同，仍具有民族社会主义的特点。它们把“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口号结合起来，对外奉行和平中立政策，对内实行国有化，并采取一些福利措施等自认为社会主义的政策。然而近年来也进行了一些调整。

斯里兰卡的自由党和统一国民党都主张奉行“民主社会主义”，但二者具体政策和措施又不完全相同。

一、自由党的民主社会主义

1. 产生的历史背景及主要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自由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是由党的创始人 S·W·R·D·班达拉奈克提出的。班达拉奈克 1899 年生于名门望族，20 岁赴英国学习。1923 年回国。学习期间及回国从政初期，受到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甘地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多种思潮的影响。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班达拉奈克认为，“欧洲资产阶级民主制行将崩溃，并正为苏联社会主义和意、德等国的民族沙文主义所取代。”他指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采取社会主义的措施”，因为“社会主义可以解决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许多弊病”，“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公平分配财富、由国家代替个人控制生产资料、赋予工人至高无上的权利，来解决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的失业难题”。因此，他“对社会主义理想怀有同情与兴趣”。三四十年代，班达拉奈克积极参加了争取锡兰（斯里兰卡 1972 年前的旧称）自治的斗争，并提出用社会主义解决斯里兰卡的问题。锡兰独立后，参加了政府任部长。1951 年，因对独立以来执政的统一国民党的政策不满，班达拉奈克从该党退出并另组自由党。班达拉奈克宣称自由党奉行民主社会主义，其主要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有：

(1) 实现完全的民族独立。他说他从统一国民党政府中辞职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继续执行殖民时代的路线和政策，未赋

予人民真正自由、实现民族真正独立表示不满。出任总理后，他主张成立共和国，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主张提高本国语的地位，取代当时上层通用的英语为官方语言。起初，他主张给予两大民族语言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同等地位。后来，迫于僧伽罗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他接受了“僧伽罗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的立场。即使如此，他也曾为使泰米尔语能够适当使用做过努力。他主张保护和发扬民族文化，扶持佛教，对统一国民党政府未能大力扶持佛教表示不满。

(2) 崇尚议会民主制，主张在维持选举制度和多党制的原则下实行社会变革，反对激烈革命。他重视个人权利和自由，主张全体人民特别是下层群众更多地参与国家事务。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未必是民主的自由。民主社会主义必然对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自由，如自由企业和个人的绝对自由，实行一定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并不是极权式的。主张由国家控制生产资料及公共部门，建立平等、公正和没有经济剥削的社会。通过公平分配财富消灭愚昧和贫困，保留和完善社会福利制度。

(3) 外交上信奉中立、不结盟政策。他认为，50年代的斯里兰卡正从一个殖民社会向一个自由社会过渡，不能卷入任何权力集团。应该既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对斯有用、有益的东西，又利用东方的共产主义对斯有益的东西。

2. 主要实践及其对政经体制的影响。

自由党或以自由党为首的联合阵线曾于1956—1960年、1960—1965年、1970—1977年执政。班达拉奈克及其遗孀班达拉奈克夫人先后担任总理，按照班达拉奈克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

(1) 实现政治独立，1957年，收回了英国设在亨可马里

和卡图纳亚克的军事基地。1948 年独立后，一直沿用英国殖民时期的宪法，国家元首是代表英国女王的总督。1956 年班达拉奈克执政后提出了成立共和国的主张。1970 年 5 月，以自由党为首的联合阵线再次执政，上台伊始就将众议院（1972 年以前的议会的下院）改为制宪议会，着手新宪法的起草工作。1972 年 5 月 22 日，新宪法生效，斯里兰卡成为“自由、主权、独立的共和国”，从此结束了长达 24 年的自治领地位。

(2) 实行国有化政策，致力于民族经济的发展。政府先后对科伦坡港、公共汽车公司、保险公司、银行等进行国有化；接管外国石油公司、外国人经营的种植园、教会学校；制定措施限制进口，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将贸易等重大经济活动置于国家公司的控制之下；实行土地改革，规定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颁布《稻田法案》，保护佃农的利益。

(3) 扩大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根据 1972 年的共和国宪法，议会改行一院制，一切权力归议会。重新划分选区、增加选区，给年满 18 周岁的公民以选举权。

(4) 推行庞大的社会福利计划。继续实行英殖民统治时期及统一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政策；向月收入低于 500 卢比者每人每周供应一定数量的免费大米（平均为每人两公斤）；对其他生活必需品进行价格补贴。

(5) 提高本国语的地位，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扶持佛教。1956 年 7 月，议会通过了僧伽罗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的法案，还成立了佛教和文化事务机构，以复兴佛教和民族文化。

(6) 改变统一国民党政府亲西方的外交政策，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1957 年与中国、苏联建立外交关系。

自由党及其为首的联合阵线执政时期实行的一系列措施，

实现了斯里兰卡的政治独立，扩大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对消除外国资本和殖民势力的影响、发展民族经济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多数企业收归国有后，人浮于事，管理不善，连年亏损。执政后期经济陷入困境，商品严重匮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大，失业特别是青年人的失业严重，造成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为纠正殖民统治时期殖民主义者对僧伽罗族和泰米尔族两族分而治之，在就业、教育等方面优待泰米尔人的政策，自由党政府在语言、就业、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不少照顾僧伽罗人的政策，保护了广大僧伽罗人的利益，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斯社会稳定，但未能妥善处理与少数民族特别是泰米尔人的关系，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导致僧泰两族仇恨加深，以至于发生大规模的种族冲突。由于受僧伽罗民族主义者的制约，自由党政府未能及时地从根本上解决种族冲突，致使种族冲突演变为持续至今的内战。自由党政府等斯历届政府实行的社会福利计划，使斯的人均期望寿命达70岁，识字率约87%，为南亚诸国中最高的。向低收入者供应免费大米，对生活必需品实行价格补贴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但自由党为首的联阵政府70年代执政时，每年的福利开支约占财政总支出的1/4，巨额的福利支出使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影响了经济发展。

3. 近年来政策的调整。

自1977年丧失执政地位，到1994年以它为首的人民联盟获得议会选举胜利上台执政，自由党在野共17年。1980年，党的领导人班达拉奈克夫人被剥夺公民权7年，党内矛盾加剧，政策分歧扩大。1986年，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公民权提前恢复。2月，该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任议会反对党领袖的自由党领导人之一阿努拉·班达拉奈克在其主旨报告中表示自由党的政策中心和出发点仍是党的创始人班达拉奈克提出的民

主社会主义思想。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自由党开始逐步调整其政策。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发生后，该党认识到苏联模式不再为人民所接受，同时苏东的变化并未为那个地区带来稳定与繁荣，资本主义世界的固有矛盾也依然存在。基于以上认识，自由党总结了过去执政的经验教训，充分评估了1977年以来斯里兰卡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现实，着眼于即将于一两年后举行的议会选举，于1993年提出了新的政策声明，对过去的政策继续进行了调整。政治上，主张废除总统制，改行议会制（内阁制），修改选举制度，维护人权，反对腐败和滥用职权；经济上放弃70年代执政时奉行的国有化政策，实行“平衡经济”。主张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起主要作用，但反对全面私有化，认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公司和公共设施仍应为公共所有，但具体运作可以适当自由。鼓励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共同竞争，向人民提供服务。在不损害民族经济的前提下鼓励外资发展；强调农业和渔业的发展，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减少对穷人和中产阶级的征税，维护消费者权益。

自由党为首的人民联盟在1994年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获胜执政后，基本上执行了上述政策。政治上加紧修宪工作，推进民主化进程。在议会通过肃贪法案，成立议会反贪污腐败常设委员会，调查此类案件。经济上，实行“与市场友好”政策，把私营部门看作经济增长的动力，有选择、有计划地对国营企业进行私有化，已将十余家国营种植园交给私人公司管理，对科伦坡石油公司等实行了私有化。扩大市场的作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将仅限于市场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国家的投资将主要用于提高教育和科技水平，促进人民健康，保护环境，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帮助穷人脱贫致富等方面。政府

称它执行的是有“人情味”的市场经济，因此，强调公平分配经济发展成果，缩小贫富差距，实施了旨在扶贫的“繁荣运动”，向100—120万个低收入家庭提供优惠贷款和补贴。新政府为兑现其竞选诺言，曾一度降低面包、面粉、食油、煤油等生活用品的价格，使人民受益，但由于加重了本已紧张的财政负担，后又不得不进行调整。在民族问题上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解决相结合的办法，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目前，政府军正在继续清剿泰米尔猛虎组织，同时提出了旨在政治解决民族问题的权力下放方案。但无论是军事上消灭猛虎组织还是政治解决民族问题，政府还都面临不少困难。

二、统一国民党的民主社会主义

1. 产生的历史背景及主要的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

从18世纪末到1948年，斯里兰卡经历了长达150年的英国殖民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地区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在斯里兰卡人民的不断斗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开始考虑允许斯里兰卡自治的问题。1947年，英国将政权交给了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的统一国民党。1948年，斯里兰卡独立，成为英联邦的一个自治领。独立初期，统一国民党主张继续维护英国遗留下来的政治经济制度，谋求渐进的保守的社会改革，反对激烈的社会革命。1956年，自由党在议会选举中提出“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口号，颇得人民的支持，自由党因此获得选举的胜利。为了适应形势，1958年，统一国民党针对自由党的“社会主义”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此后多次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容进行阐述。其主要内容为主张实

现公正和自由的社会，矫正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当时的统一国民党主席贾亚瓦德纳称，民主社会主义“既不是西方剥削式的民主，也不是共产党国家和压迫式的社会主义”。统一国民党在1977年的大选及后来的政策声明中进一步提出了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

2. 主要实践及对斯政经体制的影响。

统一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至1956年执政时，基本沿袭了英国殖民政府的政策，未实行过重大的改革。在语言问题上，不急于用本国语代替英语为官方语言，不主张给佛教以特殊保护。经济上，维持殖民统治时期的种植园经济结构，继续维持社会福利计划。以统一国民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在1965—1970年执政期间曾努力调和民族矛盾，但收效甚微，经济上接受前政府的国有化现状，但不继续实行国有化，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重视农业发展，在实现粮食自给自足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贾亚瓦德纳任党的领导人后，提出“新党，新哲学，新思想”的主张。1977年，统一国民党在议会大选中获胜，上台执政。统一国民党政府在1977—1994年执政期间，对斯里兰卡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主要有：

(1) 1978年修改宪法，改国名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把民主社会主义确定为国家目标。政府体制由议会制（内阁制）改为总统制，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掌握行政大权。对选举制度进行改革，由简单多数制改行比例代表制。后来，还设立省理事会，将原属中央的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

(2) 经济上进行重大改革。改变过去闭关锁国、排斥外资的做法，实行对外开放，大力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1978年宪法中写入了保护外资的条款。为了吸引外资，

还成立了投资委员会，先后建立了4个自由贸易区，向外商投资者提供一系列优惠条件。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取消了对私营经济发展的许多限制，降低企业所得税，将部分被国有化的企业交还给私人经营。1989年开始对国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称之为“人民化”。允许卢比贬值，实行统一的汇率浮动制度，放松外汇管制，降低关税，基本取消了对进口的限制，鼓励出口，实行自由贸易。

(3) 改革社会福利计划，实行生产性扶贫。取消了免费大米供应，改向中低收入者发放“食品券”，凭券免费供应食品。逐步削减对食品、交通、邮电、石油的补贴。开展创建“模范村”运动，为农民建造廉价住房。提出并实施了扶贫计划，向贫困家庭提供贷款，帮助他们脱贫、就业。普雷马达萨任总统时提出过建造300家农村服装厂，为农民创造10万个就业机会的计划。

改行总统制，扩大了总统的权力，有利于政府及政局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但由于总统有权解散议会，作为执政党领袖的总统还有权任命或开除该党议员，总统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议会的作用。比例代表制有利于能够独立竞选的统一国民党，而不利于依靠联合竞选才能执政的自由党。统一国民党能够连续执政17年，与该选举制度不无关系。

统一国民党经济改革政策的实施，使斯经济得到较快发展。1978—1982年，经济年均增长率达8%，远远高于1970—1977年平均2.9%的速度。受种族冲突影响，1983—1989年增长趋缓。1990年以后，经济回升，1990—1994年平均增长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7年的不足200美元，增至1994年的580美元，使斯里兰卡成为南亚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外贸有较大增长，出口结构变化，工业制成品、服装

的出口超过茶叶等传统产品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私营经济获得较大发展，并带动了制造业的发展。就业形势有所改善，市场繁荣，商品供应充足，贫困人口有所减少。但由于国内冲突不断，国防开支不断增长，财政赤字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 10%，债务负担沉重，内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 1978 年的 79.7% 增至 1993 年的 97.4%，通货膨胀率仍高出 10%，生活费用指数上涨，中下层收入实际增长缓慢，两极分化趋势加强，青年就业问题仍未得到很好解决。

3. 近年来的政策调整和现状。

1994 年，统一国民党在选举中失利。该党把原因归结为党内的腐败分子，表示该党承认所犯错误，今后将不会重复这样的错误。但认为该党执政时期奉行的政治经济政策是行之有效的，执政 17 年，使斯里兰卡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后将继续实行以前的政策，并使之更加完善。政治上，该党认为总统制促进政治和社会稳定，加速了经济和社会发展，应继续维持。同时承认，由于该体制已经运作了 17 年，进行适当的修订是必要的。比例代表制比较公平地反映了各政党的实力，并有利于保证少数民族政党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因此，应该继续使用，但也承认目前实行的大选区制（一个选区有不止一位议员）未能明确议员与其选民的关系，不利于议员更好地为选民服务，因此应进行修改，主张实行小选区制和比例代表制相结合的混合选举制度，但反对增加议会席位。主张成立向议会负责的反贿赂腐败专员，负责查处贪污腐败行为。重视占人口 70% 的青年人的就业问题，主张在宪法中做出特殊规定，增加青年议员在议会中的比例。经济上，继续遵守前政府的经济原则，实行自由经济政策，继续致力于建立出口导向型经济。争取早日实现卢比的自由兑换，发展股票市场；实行公正、平等

的税收政策，最大限度地保护中下层人民；继续推进国营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力发展农业和渔业，推行扶贫计划，改善贫困阶层人民的生活。在扶持佛教的同时，支持和发展各种宗教与文化。支持旨在公正合理解决民族问题的努力。

第17章

西亚北非各类社会主义的调整

西亚北非地区主要有两大类社会主义，一类是共产主义政党所主张的科学社会主义；另一类是各种民族主义政党所推行的名目繁多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此外，以色列的“共产主义村社”基布兹，也是令世人关注的现象。

上：共产主义政党的反思与“解放”

苏东剧变对该地区共运造成的影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造成了思想混乱，另一方面苏共的解散也有利于这些党根据本国实际独立自主地制定纲领和路线，对这些党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剧变几年来，各党普遍进行了反思和总结，增强了自力更生的意识，重视从本国实际出发，这是它们近年来有所发展的重要原因。有的党甚至认为经过这一事件，从思想和实践上获得了一次“解放”。

马克思主义自 20 世纪初期从苏联和欧洲传入西亚北非地

区。1919年在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帮助下，首先在土耳其、伊朗、埃及，此后又在塞浦路斯、黎巴嫩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后来，在该地区其他国家都相继成立过共产党及共产党类型的政党，但其中的大部分党长期处于非法状态，力量发展不大。到80年代末期，该地区在不同条件下活动的共产党主要有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摩洛哥进步与社会主义党、黎巴嫩共产党、叙利亚共产党—巴格达什派、叙利亚共产党—费萨尔派、以色列共产党、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先锋党、约旦共产党、巴勒斯坦共产党和突尼斯共产党等。苏东剧变后，其中的3个已改变名称：巴勒斯坦共产党于1991年改名为“巴勒斯坦人民党”；突尼斯共产党于1993年改名为“革新运动”；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先锋党在1993年1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而以“挑战运动”名义开展活动，1998年4月30日召开代表大会正式建立“社会民主运动”。其他大多数共产党都坚持下来了，有的还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一、冷战结束前共运的重要情况

长期以来，西亚北非地区的共产党一直受苏共的影响，它们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视为效仿的成功模式，并把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作为依靠力量。因此，大多数党无论在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上，还是在发展经济的模式上，都盲目追随苏共，严重脱离本国实际，导致这些党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多次出现失误，因而它们在反帝和争取社会民主进步的斗争中，始终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其影响和地位无法同民族主义政党或伊斯兰宗教势力相匹敌。据外国报刊报道，这些党自己认为他们的

失误主要表现在：

1. 不承认阿拉伯民族的存在，严重脱离本国实际和广大群众。

一些阿拉伯共产党长期以来囿于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认为阿拉伯世界不存在统一的市场，阿拉伯人还没有形成一个民族。根据这种观点，它们否认阿拉伯民族解放斗争具有进步意义，只强调阶级斗争，而不强调国家和民族利益。这种错误主张使许多阿拉伯共产党一直受到本国人民的鄙视，也成为资产阶级用来攻击共产主义的把柄。1954年，阿尔及利亚爆发了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接受了苏共和法共反对武装斗争的思想，不仅拒绝参加这场斗争，甚至成立单独的武装组织，对民阵的斗争进行干扰。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后，阿尔及利亚共产党被当局宣布为非法。1919年建立的突尼斯共产党，长期片面坚持工人阶级无祖国的观点，反对争取突尼斯独立的斗争，认为这种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斗争，其目标不利于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团结。阿共和突共，由于在民族解放斗争这样重大问题上的决策失误，至今在国内政治舞台上仍然没有自己的地位。

2. 把追随苏联的外交政策视为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至在涉及全民族的问题上发生历史性错误。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1947年联合国通过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受到阿拉伯各国和全体人民的反对。广大阿拉伯群众把维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反对分治决议，作为衡量各个政党的尺度。正是在这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上，各阿拉伯共产党采取了长期以来不能被人民群众所接受的立场。正如有的共产党前领导人所说，“阿拉伯共产党人，1947年都反对联合国分治巴勒斯坦的决议。然而由于苏联支持分治决

议，它们根据国际主义原则和认为苏联最了解国际形势变化的需要等理由，转上了苏联的轨道。”“共产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衰退开始于巴勒斯坦问题。”有的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公开宣称：“对苏联采取什么态度不仅是衡量国际主义的主要标准，也是衡量爱国主义的一个最重要标准。”“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策略上也要同苏共保持一致，这就是国际主义。”可见，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曲解为无保留地支持苏联的外交政策，在西亚北非地区各国共产党中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

3. 在国际国内重大问题上没有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盲目追随苏共，损害了自身的形象，这是苏东剧变使这些党处境非常困难和被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地区国家的一些共产党在国内重大问题上不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而是盲目地听从苏共的意见，把自己置于本国执政的民族主义政党的对立面，认为它们是“反动的”政权，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和革命的对象，应当予以推翻。还有极个别的党甚至试图通过发动政变，来夺取政权，结果惨遭镇压，许多领导人被捕或者被杀，或被迫流亡国外。

在国际重大问题上全盘接受苏共路线和政策的教训也很深刻。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共产党，1956年以后逐步接受了苏共历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路线，紧跟苏联外交政策。它们在60年代的国际共运大论战中追随苏共。对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入侵阿富汗纷纷表示支持。对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也加以拥护。正如黎巴嫩共产党领导人纳西布·纳米尔所说，阿拉伯共产党已成为苏共的“附庸”，它们同苏共之间是“控制和从属”关系。巴勒斯坦共产党人穆尼尔·舍菲克也指出，“阿拉伯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停顿，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阿拉伯共

产党从一开始就同某个国际中心联系在一起，接受它的指导，对它承担了义务，从而使自己失去了客观的、创造性的独立思考能力。”

当然，该地区共运也存在另一积极的方面，这就是也确有少数共产党克服苏共干扰，不断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道路，从而使党争取到公开合法的活动条件，并使自己的力量得到不断发展。

1. 摩洛哥进步与社会主义党从本国实际出发，不断调整路线和政策，使党获得了发展。

1960年摩洛哥政府以“共产主义同伊斯兰教决不相容”为理由禁止摩共活动，并于1964年宣布摩共非法。为求得合法存在和发展，摩共1966年召开三大，决定“实行最大的灵活性”，于1968年将党名改为“解放与社会主义党”。在其建党宣言中不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以“阿拉伯理性主义”和“伊斯兰社会主义”作为党的“思想基础”，1974年又将党名改为“进步与社会主义党”，并对政治纲领进行了适当修改。1979年召开的二大确认摩处于“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宣布该党不主张使用强迫和暴力方式实现社会主义，而是通过民族民主革命的实验，自愿地实现社会主义。近20年来，摩共虽然改变了党的名称，但是仍然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并且得到了一定发展。

2. 黎巴嫩共产党摆脱苏共影响，使党获得发展。

黎共参加了抗以武装斗争，并已成为国内政治舞台上—支活跃力量。据黎共自己总结，黎共一直同阿拉伯统一的愿望处于对抗地位，对巴勒斯坦问题、宗教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立场，只是作为策略问题处理，这种状况已成为该党前进道路上的严重障碍。1968年黎共二大对过去一个时期的路线作了严厉批

判，根据新的形势提出黎处于“为民族解放、民主发展而斗争的民族民主革命阶段”，这是“以民族主义性质为主”的历史时期。大会确定“工人阶级及其先锋党、它的同盟军所肩负的革命任务是建立民族民主政权，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道路”。黎共这次代表大会强调了党的民族主义特点，是在探索如何根据本国实际制订方针路线的方向上迈出的一个重要步骤，因而二大成为该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后，黎共扩大和加强了同国内民族进步政治组织的联合与合作，日益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并于1970年成为合法政党。而苏共则对此十分不满，认为在黎共这一重要转变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的政治局委员乔治·哈维是不受欢迎的人物，说他接受阿拉伯统一、阿拉伯民族主义等口号动摇了“阿拉伯东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略”。乔治·哈维为使黎共摆脱苏共的影响和控制作了重要努力，他在1979年该党四大当选为总书记之后曾公开说：“各国共产党已经成熟，它们都应当享有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世界形势已不允许由一个中心对它们进行领导。”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共运条件下，他的主张受到了党内一些人和苏共的反对，未能取得成效。

3. 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从1988年以来采取独立自主立场，减少了苏东剧变对它的冲击。

塞劳进党成立于20年代，历来同苏共关系密切，党的活政策主张受苏共影响较深。但是从1988年赫里斯多菲亚斯担任总书记之后，对苏共采取了比较独立自主的态度，虽然原则上支持苏共提出的“新思维”和“改革”，但强调必须从塞国情出发，辩证地借鉴“新思维”精神，不能照搬苏共的做法，要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扩大民主，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事实证明，由于塞劳进党基本上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苏东剧变对

该党的冲击大大减少了。

二、苏东剧变的冲击与冷战后的新情况

苏东社会主义体制的急剧崩溃，使该地区的共产党无一例外地受到猛烈冲击。各党普遍感到震惊，并一度在思想上出现混乱，有些党甚至发生组织分裂。但是，大多数党积极从苏东剧变中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深刻反思，重新审查和修改党的政治思想纲领，开始或进一步走上根据本国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制定纲领和路线的道路。除 3 个党或改变党名和党的性质，或宣布解散另行组建新党外，该地区仍有 10 多个共产党坚持不改变党的名称和性质。

1. 苏东剧变的冲击和影响。

由于该地区的共产党过去受苏共的影响较深，苏联迅速瓦解和苏东社会主义体制急剧崩溃，使这些党受震动较大。但是这一变故也有利于它们独立自主、独立思考，为它们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它们认真地汲取教训，多数党不仅稳住了队伍，而且还有所发展。

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在苏东剧变时党内曾出现混乱，酿成严重分裂危机。但是 1990 年 1 月召开的中央全会，对政治局进行重大改组，并在党内开展了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和领导人错误、坚持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实事求是与自立更生精神的教育运动。由于这些措施，党不仅战胜了分裂活动，而且党的团结得到加强，党组织也有发展，党员达到 1.8 万。在 1991 年的议会选举中，该党获得议会 56 个议席中的 18 席，比上届选举时增加 3 席，在议会中由第三大党变为第

二大党。在1997年的议会选举中，该党议席又增至19席。

黎巴嫩共产党在苏东剧变的冲击下，党内在是否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等党的性质和前途等重大问题上曾产生分歧。黎共于1992年1月召开六大，重申坚持马列主义，但未能就是否改变党名问题取得一致意见。1993年6月该党召开特别七大，通过了不改变党名的决议，解决了六大的遗留问题。在此期间，党的领导机构发生重大变化，总书记乔治·哈维因党内分歧宣布辞职，将近44.5%的六大中央委员和近60%的政治局委员在特别七大时落选。但该党未发生组织分裂，目前仍拥有1万多名党员，是国内一支公开合法的政治力量，有自己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和公开发行的杂志。

叙利亚共产党—巴格达什派于1991年5月召开七大，对党的性质、奋斗目标、党内生活准则作出了明确规定。这次大会通过的新党章申明，该党是“叙工人阶级有觉悟、有组织的先锋队”，它的奋斗目标是“消灭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制度，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并使这个社会过渡到没有阶级、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叙利亚共产党—费萨尔派于1991年10月召开七大，宣布该党“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选择，建设社会主义是党的战略目标”。叙共—巴格达什派和叙共—费萨尔派继续实行同执政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合作的方针，基本支持复兴党的内外政策，因而在国内的地位比较稳定。叙共—巴格达什派和叙共—费萨尔派在复兴党领导的爱国进步阵线中各有1名代表，在政府中各有1名部长。在1994年8月选出的第六届人民议会中各有4个席位。

摩洛哥进步与社会主义党在苏东剧变时，党内曾发生思想混乱，但未造成重大震动，党的组织和党员人数都有增长。它

继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从本国情况出发，基本上支持国王的内外政策，主张推进民主进程，建立爱国进步政府，改革社会经济结构。该党政策得到群众的支持，在 1992 年全国市镇选举中获得 184 席，相当于 1983 年所获 17 席的 10 倍以上。在 1993 年的议会大选中，在议会的 333 席中获得 14 席，使该党继续保持了重要合法在野党的地位，1997 年 7 月该党一部分人因存在分歧而从该党分裂出去，成立了民主力量阵线。双方在同年 11 月举行的选举中分别获得 9 个议席。

以色列共产党于 1990 年 5 月召开二十一大，重申坚持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和民主集中制。1993 年 1 月该党召开二十二大，重申继续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走共产主义道路。该党在以色列虽非大党，党员仅 1.5 万，在议会只有 5 个席位，但由于工党同利库德集团在议会内势均力敌，该党对决定谁能够执政起一定程度的砝码作用。

约旦共产党结束了长期的非法状态（1990 年 1 月国王宣布废除已实行 37 年之久的反共法之后该党已公开合法），1993 年 4 月第一次公开召开代表大会，大会口号是：加强民主，保护劳动人民利益。有 193 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其中妇女代表占 16%，工人和劳动者代表占 35%，青年代表占 50% 以上。1995 年 9 月，约旦共代表第一次作为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7 年 7 月，该党召开了第二次公开代表大会。

在苏东剧变的冲击下，只有 3 个共产党改变党的名称和党的性质，它们是：巴勒斯坦共产党、突尼斯共产党和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先锋党。

巴勒斯坦共产党于 1991 年 10 月召开二大，通过了新党

纲、党章，作出了关于把党名改为“巴勒斯坦人民党”的决议。新党纲、党章宣布不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取消了民主集中制为党的组织原则，并宣布人民党不再是工人阶级政党，而是全民性的左派政党。

突尼斯共产党于1993年4月召开十大，正式宣布改名为“革新运动”。大会通过的《政治和组织文件》规定，革新运动是一个民族主义左翼政党，在其内部保持多元化的思想源流。该党表示，突共虽然放弃了共产主义，但不放弃社会主义信念，也不放弃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进步思想。

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先锋党于1993年1月举行代表大会，决定改变党的名称和宗旨，宣布自我解散，同时以“挑战运动”名义继续开展活动。1998年4月30日正式宣布成立“社会民主运动”，其奋斗目标是在阿建立现代、民主、共和与人道的社会。

2. 当前的总体态势。

苏东剧变给西亚北非地区的共运带来了新的困难，致使各国共产党骤然间失掉了国际依托和援助，并受到了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围攻。然而，社会主义体系发生的这种大变动，也打破了该地区共运长期停滞不前、严重依赖苏共、严重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不正常局面，为各国共产党走向新生提供了契机，有的党甚至认为从思想和实践上得到了“解放”。几年来的实际情况表明，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共产党并未因苏东剧变而崩溃。它们在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增强了自力更生的意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国外转移到国内，努力做到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此，这些党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并未因苏东剧变而削弱，它们基本上保持了自己的力量和思想与组织上的统一，力量甚至有所增强。这些

党中，绝大部分为合法政党，其中叙共—巴格达什派和叙共—费萨尔派、摩进社党为参政党，在政府中各有 1 个部长职位。塞劳进党、叙共—巴格达什派和叙共—费萨尔派两派已进入议会，约共和以共为反对党。塞劳进党还在近两次议会选举中保持第二大党的地位。从总体上看，这一地区共运的发展同过去相比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但发展并不平衡。许多党自身仍处在调整变化之中，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方面，它们还都处于探索阶段。

三、理论上的反思和政策上的调整

1. 对苏东剧变的看法。

在苏东剧变的冲击下，西亚北非地区的大多数共产党纷纷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剧变的原因及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探讨，甚至在党内展开了自上而下的广泛讨论。许多党召开党代会，以期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目的。通过反思，大多数党认为，苏东剧变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发生了错误，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基本的是这些国家的执政党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以共在二十一届十中全会和二十三大会上分别指出：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彻底失败，“不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而是缘于它们对共产主义思想存在不同看法甚至背叛的结果”。其失败既有内因，也有外因，“但更主要的是内部因素，特别是苏共内部及领导层内部的因素”。苏共“忽视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领导，没有正确地贯彻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并没有失败，错误与失误并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些错误

和失误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及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根据本国情况制定政策。”

黎共认为，“错误的经济观点使全民所有制成为社会所有制的唯一形式”、“缺乏民主”使“列宁所希望的作为群众先锋的党，变成了高高在上对人民实行专政的党”，这些失误导致了苏东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而失误的根源则在于“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不断发展的科学，并认为它可以代替其他科学”。

塞劳进党认为，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不能认为是马列主义不行，而恰恰相反，它们没有马列主义。苏联和东欧国家过分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这些国家没有搞好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致使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丧失了人民的信任，被人民所抛弃。

叙共—费萨尔派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出自统治集团内部，苏共领导集团犯了很多错误，造成经济困难，人民不满，被帝国主义利用，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东欧各国政权的更迭，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执政党过分依赖苏共和苏军，严重脱离群众，在新形势下彻底放弃了领导权，让右翼势力上台，甚至让反动分子掌权。

2. 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看法。

在总结苏东剧变教训的基础上，西亚北非地区的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及其前景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 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社会主义没有失败，人类的未来属于社会主义。

塞劳进党十七大重申，该党仍以马列主义作为行动指南，

党的长远目标是在塞建立一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认为社会主义有巨大的优越性，已经为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代表人类未来。大会强调，马列主义的原理没有过时，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不能认为是马列主义不行，而恰恰相反，它们没有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

以共党章规定，该党以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为指导，并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创造性地发展和实践这些思想，党的奋斗目标是在以色列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共指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不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而是它们对共产主义思想存在不同看法甚至背叛的结果。”“社会主义并没有失败，错误与失误并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共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和革新的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制度。

摩进社党认为，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社会主义阵营所发生的一切，正是对这种理论的偏离和歪曲，它是某种模式的失败，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破产。

叙共—费萨尔派认为，社会主义是民主、人道的制度，是资本主义的唯一替代，建设社会主义是党的战略目标。叙共将“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以马列主义思想，特别是它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成就为指南，同时也借鉴阿拉伯和人类遗产中一切积极内容”。

(2) 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复杂和艰难的历程，应根据本国实际确定自己的发展模式。

以共 1996 年二十三大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历史新阶段，是一个蓬勃发展、不断更新的社会体系，而不是一个完结的静止的社会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复杂和艰难的历程，不能照搬这样或那样的模式。以共将

继续汲取别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从而确定以色列未来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叙共—费萨尔派新党纲称，社会主义“将经过几个长期的过渡阶段，通过实现广泛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并摆脱落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黎共表示，该党长期以来一直在探讨符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它拒绝接受曾经作为社会主义典范的那种模式。黎共基于它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方法的“新认识”，提出了建设“具有黎巴嫩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殊观念，即在经济领域，主张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尊重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方式的多元化，主张把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结合起来，发挥国家在经济领域的指导、协调作用；在政治领域，主张政权应当是全体拥护社会主义变革力量的联盟，同时也具有民主性，要有广大群众的参与。

(3) 认为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同时，应当加强党内民主建设。

以共1990年二十一大强调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主张在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同时，允许党内意见多元化，但是也不能流为无政府主义。为保证党内的民主生活，以共决定实行新的“中央代表会议”制度。

黎共自党的七大开始进行组织更新，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在坚持集中制的同时，“特别强调发扬民主的重要性”，强调言论自由、党员直接自由选举党的领导机构以及维护党的团结和作用的必要性。

摩进社党主张“赋予民主集中制以新的内容”，强调“民主和透明度的重要性”，保证党员通过有组织和负责的方式充

分发表意见和提出建设性批评。

叙共—费萨尔派七大决定，该党“要努力成为一个民主的党，一个联系群众和向群众开放的党”，党内生活要明确体现进行讨论和参与决策的民主，尊重个人意见和他们发表意见的权利，但少数人也应遵守党的机关作出的决议。该党强调，各级党组织均应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

黎共强调，要把该党建设成“自由与民主”的政党，处理好党内的民主与集中问题，这是组织问题，也是党建工作的基本问题。黎共强调党内要能够容纳各种倾向和思潮，因为它们之间的对话和争论将使党的思想更加丰富。黎共还决定把党内宝塔式的组织形式改变为圆周形式，即使党位于群众之中，而不位于群众之上；党代会位于全党中心，而不是位于全党之上；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应当发挥根本性的领导作用。

约共决定，改变党内生活过份强调集中而忽视民主的现象，今后应当扩大民主，实行党内意见多样化，以便适应从地下转入公开活动的国内形势。

3. 内外政策的调整。

根据该地区共产党大多为非执政党、一些国家仍面临领土被占和本地区宗教色彩浓厚等特点，许多党放弃了以前追随苏联的僵硬做法，根据本地区和本国特点制定党的对内政策，从而巩固了党的队伍，扩大了群众基础，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黎共六大强调全面革新思想，在新党纲中指出，该党首先是为本国事业而斗争的党，其次才是为自由和民主，为社会主义和社会公正，为阿拉伯主义和阿拉伯统一，为建立和平、自由、平等的世界而斗争的党。该党确定了当前的四项基本任务：实现国内和平，消除长期内战造成的严重后果；捍卫国家

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收回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消除政治与教派隔阂，实现黎巴嫩人之间的完全和解；保证全体公民享有公共自由与基本的政治、民事权利，实现政治制度民主化，实现社会的进步、民主和公正，使三者相互促进。黎共还第一次阐明了对宗教问题的立场，明确宣布尊重宗教和宗教信徒，尊重信仰和崇拜宗教的自由。

叙共一费萨尔派调整了对执政的复兴党的政策，改变了过去只在对外政策上同复兴党合作的态度，强调在国内问题上也要加强同它的合作，决定支持政府加强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改革、引进侨资和外资的政策。

约共在当局允许其公开活动后，放弃了指责当局“反共、反人民”的口号，强调支持政府对内推行民主、发展经济和对外奉行中立不结盟的政策，支持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加强阿拉伯团结和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努力。该党宣布，党在目前的基本任务是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

以共在阿以冲突问题上一贯遵循和平解决的路线。1990年该党二十一大决定把“以色列、巴勒斯坦两个民族建立两个国家”的思想载入新党章，并根据这一思想提出了该党的“和平纲领”：以色列必须撤出1967年战争以来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和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尊重巴以两国的和平与发展权；将耶路撒冷的东、西两城分别作为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国的首都。

中：“阿拉伯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

阿拉伯社会主义，是战后在亚非拉国家中

蓬勃兴起的民族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所谓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既不同于德国历史上的“国家社会主义”(虽然在许多外国语文中是同一个词),也不同于共产党人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指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政党和民族主义国家领导人提倡和奉行的各种名目繁多的“社会主义”的总称。

阿拉伯社会主义也称伊斯兰社会主义,它是西亚北非地区一种以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传统为基础、以阿拉伯统一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流派。它起源于西亚,并在北非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中盛行一时。二战后,这一地区曾经有叙利亚、伊拉克、埃及、苏丹、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等7个国家,先后宣布信奉并实行阿拉伯社会主义,但各自又有不同特点。阿拉伯社会主义分为几种不同类型和派别,主要有阿拉伯复兴党的社会主义、埃及纳赛尔的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的社会主义、利比亚的社会主义等。冷战后有的国家已经放弃或不强调了,但目前仍有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等国没有放弃,然而在理论和政策上已进行了重要调整;埃及由纳赛尔开创的一种阿拉伯社会主义,经过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的继承和发展,已演变成“民主社会主义”,埃及民族民主党于1989年加入了社会党国际,成为其正式成员。

一、历史和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和战后时期，在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阿拉伯国家相继取得独立、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影响日益扩大，而当地的共产党人没能取得民族解放运动和独立国家的领导权的条件下，阿拉伯社会主义在西亚北非地区迅速兴起和发展起来。

（一）阿拉伯社会主义起源于西亚

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40 年代初在该地区出现的阿拉伯复兴运动。阿拉伯复兴运动的主要创始人，是叙利亚人米歇尔·阿弗拉克（1910-1989）和萨拉赫丁·比塔尔（1912-1980）。阿弗拉克出身于大马士革的一个基督教家庭，30 年代曾在巴黎大学学习，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想。回国后他积极从事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并一度成为叙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后因政见分歧，脱离了共产党。1941 年初，阿弗拉克和比塔尔开始以“阿拉伯复兴运动”的名义从事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活动。1943 年 7 月，阿弗拉克首次公开将他领导的“阿拉伯复兴运动”称作“党”，并提出党的口号是“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具有不朽的使命”。1944 年，阿弗拉克和比塔尔在他们合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一书里，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概念。他们认为，阿拉伯是一个整体，应该把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统一为阿拉伯联邦，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向外国统治者作斗争，才能取得民族独立，并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强

调，他们的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派生物，而是从阿拉伯民族主义中产生并从属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它植根于阿拉伯民族的历史遗产之中，是复兴阿拉伯民族的工具，其主要论点是：

1. 以伊斯兰教义为思想基础，笃信真主，认为真主的使命就是人类的使命，实现人的尊严和幸福。所以，阿拉伯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信仰宗教，相信哈里发。他们用伊斯兰教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来解释社会主义。

2. 以阿拉伯民族统一为主要对外目标，争取实现阿拉伯各国统一，强调统一高于社会主义。对外奉行不结盟政策，反帝、反殖、反对种族主义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

3. 在政权建设上，强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拒绝任何一个阶级专政，倡导以中产阶级为社会基础和领导力量，建立农民、工人、士兵、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的联盟，走全民民主道路。建立合作的社会主义社会，即政府和资本家合作，工人和资本家合作。

4. 在经济上，提倡以消灭剥削和贫困，实现平等、正义、社会均等和富裕为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同时主张建立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的经济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国民经济计划，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唯一方法。

5. 在意识形态上，强调其既区别于共产主义，又有别于资本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外来的、欧洲思想和现代环境的产物，同阿拉伯人的“传统理智”、“过去和现在生活”毫无相似之处。同时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重视人，后者重视物。阿拉伯社会主义认为，人具有最高的价值，且远远高于物。

总之，他们认为“统一高于社会主义”，没有阿拉伯的统

一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灵魂则是伊斯兰教”。他们还把复兴党称作阿拉伯的社会主义政党。

1947年4月7日，在阿弗拉克的主持下，阿拉伯复兴党在大马士革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该党成立，并提出党的口号是“统一、自由、社会主义”。其任务是消灭帝国主义及本民族的剥削阶级，建立一个“公正、理智的经济制度”，复兴阿拉伯民族，建立统一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祖国。1953年，阿拉伯复兴党与阿克拉姆·胡拉尼领导的叙利亚阿拉伯社会党（1950年成立）合并，组成“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随着该党势力在西亚各国的迅速扩展，阿拉伯社会主义也随之盛行起来，并向北非扩大影响。1952年7月，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埃及法鲁克封建王朝后，宣称奉行“阿拉伯社会主义”，并于1961年7月首先在阿拉伯国家中开展了社会主义试验。此后，北非的阿尔及利亚（1962年7月）、利比亚（1969年9月）、苏丹（1972年1月）也先后加入了奉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行列，从而形成了具有广泛影响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流派。北非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流派与西亚地区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虽同出一源，但各有特色。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叙利亚、伊拉克两国掌权后，奉行复兴党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而北非地区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则有新的发展和变化。埃及由纳赛尔开始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经过萨达特、穆巴拉克的继承和发展，已发展成“民主社会主义”，埃及民族民主党于1989年加入了社会党国际。利比亚卡扎菲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自称继承了纳赛尔的社会主义，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宣称奉行“世界第三理论”。

(二) 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阿拉伯社会主义在各国有不同的特点，从而在阿拉伯社会主义内部又形成了不同的流派，然而它们也存在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

1. 以伊斯兰教教义为主要理论基础。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来源于伊斯兰教，《古兰经》所倡导的反对剥削和“穆斯林皆兄弟”等主张就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正、平等原则，是“彻底的社会主义”。

2.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基础。他们的领导人大都是军人出身，因而特别强调军队在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3. 以大规模的国有化和工业化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建立国有企业，由国家控制社会财富和主要生产资料才能实现“人人平等”和“共同富裕”。因此这些国家普遍搞了国有化运动。

4. 以阿拉伯统一为对外政策的核心。阿拉伯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口号“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一直为后来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实践者所继承。他们把社会主义与阿拉伯民族统一直接联系在一起，并把社会主义视为实现阿拉伯统一的手段。

以上基本特征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又有所变化和差异，特别是在冷战后的新形势下已有不少调整和发展。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发展，各阿拉伯国家政权更迭和领导人更换，阿拉伯社会主义也随之演变。在政治体制上，有的国家从一党制改为多党制，出现转向“民主社会主义”的趋势。有的国家采用“一党为主（执政），多党共存”，建立容纳各个政党参加的全国阵线，并吸收一些小党入阁参政。经济上，在坚持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同时，主张实行开放政策，吸收外资，发展私营企

业，经济成分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二、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社会主义”

(一)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产生及发展

本世纪 30 年代末、40 年代初期，世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及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受这一运动的影响，阿拉伯叙利亚社会也出现各种各样的思潮，这其中就包括后来发展成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阿拉伯复兴运动。

复兴运动的创始人为叙利亚人米歇尔·阿弗拉克和萨拉丁·比塔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他们俩均曾在法国学习，同一些左翼党派和人士有过接触，接受了他们的社会主义政治观点。回到叙利亚后，他们在中学教书，开始了宣传其政治观点的活动。逐渐地，在他们周围集合了一批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同一时期，叙利亚共产党也非常活跃，它积极参与领导人民群众反对法国托管、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阿弗拉克在 1938 年曾与当时的叙共负责人哈立德·巴格达什有过接触，阿弗拉克领导的复兴运动开始了小组活动，他们参加了当时反对英、法帝国主义的斗争。1946 年《复兴周刊》（后来发展成为复兴党的机关报）开始出版。

随着形势的发展，阿弗拉克和比塔尔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政党组织，以适应开展活动的需要。1947 年 4 月 7 日，约 200 名复兴运动代表在大马士革召开会议，会议正式宣布了复兴党的成立，并通过了党纲和党章，这次会议也就成了复兴党第一次民族代表大会。

1952年11月，复兴党同主张相近的阿克拉姆·胡拉尼领导的叙利亚社会党（成立于1950年）合并，改称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简称复兴党。1954年6月，复兴党召开第二次民族代表大会，阿弗拉克当选为总书记。1958年叙、埃实现统一，复兴党领导人宣布解散党组织，参加联邦政府。这一措施使复兴党濒于瓦解，复兴党人不断受到政府迫害。1960年8月，该党召开第四次民族代表大会，谴责解散党的作法。1961年9月，叙、埃统一破裂，党的领导人比塔尔、胡拉尼因签署同意分裂的文件在党内受到谴责。1962年5月，召开党的第五次民族代表大会，决定继续为阿拉伯统一而斗争。以胡拉尼为首的社会党人被开除出党。1963年3月8日，复兴党发动政变成功，成为叙利亚的执政党。后由于政见和思想分歧，多次发生党内斗争，甚至分裂。总书记阿弗拉克也被迫出走，并在伊拉克另立新的民族领导机构。

（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社会主义”理论

复兴党是泛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政党，在阿拉伯国家的政党中，它是主张实行社会主义的先驱。早在复兴运动开始活动时就曾宣称，它从阿拉伯独立运动中汲取了民族主义和群众性；从世界文明中汲取了社会主义。该党党章规定“复兴党是社会主义政党，党相信社会主义是理想的社会，实现社会主义是党的主要目标”。复兴党的口号是“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为“统一是目的，自由是手段，社会主义是制度”。

复兴党的社会主义有着明显的民族主义特性，特别强调它的阿拉伯特性，它把追求阿拉伯的统一看得比社会主义更为重要。党纲中规定统一是复兴党的首要任务。阿弗拉克认为：

“统一问题是阿拉伯人的生存问题，阿拉伯统一在价值上比社会主义更崇高。社会主义是身体，而统一则是灵魂。”复兴党对社会主义的定义是：“社会主义首先是与资本主义相反的一条道路，它是新兴国家摆脱落后、进入先进国家行列的唯一道路。社会主义旨在把人从人剥削人中解放出来，动员一切物质与道义力量，为人民利益服务。其次，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实现阿拉伯人民的愿望的基础上的。这个愿望是从我们民族精神、阿拉伯主义、精神价值、信仰科学力量、知识价值，吸取他人的意见和经验而产生的。它既非从东方输入的，也非从西方输入的，而是真正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它吸取了别人在实现社会主义方面的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歪曲阿拉伯的人格，脱离阿拉伯的现实、历史、信仰与原则。”

复兴党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物质基础，是虚伪的资本主义民主的政治基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因此，它在党章中规定：在经济方面实行土地改革，对公用事业、自然资源、大型工业和运输业实行国有化，这是消灭剥削、建立“公正、理智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要措施。阿拉伯民族的一切经济资源都应归阿拉伯人自己所有，由国家控制生产资料，在人民中公平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

（三）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社会主义”实践

从1963年复兴党通过政变在叙利亚执政至今，复兴党在叙利亚的社会主义实践大致可以分成3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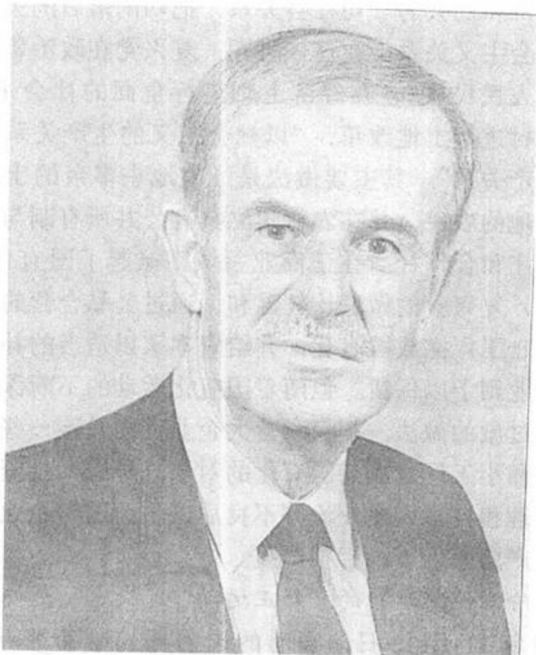
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改革

从1963年上台执政到1970年阿萨德发动“纠正运动”为止。复兴党党纲规定：党在执政时期的基本任务是革命地改变

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一切社会关系，把剥削落后的关系改变为进步的社会主义关系。在这一时期，复兴党在政治领域强调复兴党的“人民民主”；在经济上则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代替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其主要做法是征收地主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并在农村建立具有公共所有制与自治管理的集体农庄和合作社。在工商业领域则掀起了国有化的浪潮。刚开始时，复兴党的做法比较温和，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对大中型企业、工厂完成国有化，并给资本家以适当的补偿，对小型的工商业则予以保留。但随着国有化运动的不断深入，开始出现一些过激的做法，不仅私营大企业，而且连一些家庭经营的小作坊和小工厂也成为国有化的对象，导致大批资本家携资外逃，管理和技术人才外流等不良后果。而国营企业由于管理不善，生产效率低下，亏损严重。

第二阶段：阿萨德的“纠正运动”

1970年11月13日，当时的国防部长哈菲兹·阿萨德以“纠正运动”为名发动政变上台。复兴党的社会主义实践随之进入第二阶段。阿萨德认为在国家掌握一切重要经济部门的情况下，允许小私商的存在并不影响政权的性质。因此，他纠正了复兴党以往的一些激进做法，停止了没收小企业、小商贩的行动，并注意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民的不满，国家经济形势也一度好转。在政治上，则在加强复兴党领导的同时，注意团结大多数党派。为此阿萨德于1973年成立了全国进步阵线。全国的主要政党均参加了该阵线，并通过阵线实现参政目的，叙利亚的政局由此进入了一个稳定期。1973年1月，叙利亚颁布了《永久宪法》，规定叙的经济准则是：（1）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其目标是消除各种形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式的剥削；（2）经济计划要考虑实现阿拉伯经济一体化的需要。宪法还规定，叙有3种所有制：人民所有制，包括各种自然资源、公共设施、已国有化的或由国家建立的设施和机构；集体所有制，包括群众组织、行业组织、合作社及其他社会机构的固定资产；个人所有制，主要指个人的不动产，它可以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发挥为国民经济服务的社会职能，但应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并且不得违背人民利益。私人财产的继承权受到

法律保护。1980年8月，复兴党召开民族十三大^①，大会公报称：“要巩固人民民主建设，加强全国进步阵线的作用和提高其效能。”公报还指出，现阶段党要“加强在叙利亚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办法是扩大公有部门，消灭剥削关系，巩固进步的变革，以及加强和发展农业、工业、商业方面的进步变革”。1985年1月召开的复兴党叙利亚地区八大决议强调，应进一步加强国营经济的主导作用。由于国家对一切部门统得过死，到80年代，叙利亚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于是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叙利亚实行了一系列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措施。对内主张扩大私营和公私合营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让它们在国民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外则主张吸引外资，特别是侨资参加经济建设。叙利亚于1991年5月颁布了旨在鼓励外国投资的10号投资法。该法对来叙利亚投资的外国企业给予减免税收等一系列优惠措施，并允许外商将利润汇往国外。上述做法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叙利亚经济开始走出低谷。

第三阶段：冷战后坚持“社会主义”，继续进行改革和调整

1991年苏联解体后，叙利亚受到巨大震动。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成了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了复兴党面前。西方国家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叙利亚施加压力，要求叙实行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但复兴党在挺过最困难的时期后，最终仍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这一事件标志着叙利亚复兴党的社会主义实践进入了第三阶段。

^① 复兴社会党是一个泛阿拉伯民族的政党，“民族大会”是跨国家的，“地区大会”是在某一个国家召开的代表大会。

叙复兴党认为，前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只是一种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而不是社会主义原则的失败。社会主义作为实现社会公正的制度仍然是富有生命力的。复兴党领导人曾表示，在苏联解体后，“中国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希望”。阿萨德总统指示要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并在1994年会见来访的奥地利总统时申明，叙利亚将走中国式的改革之路。叙利亚复兴党总书记艾哈迈尔3次来华访问，了解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

同时，叙利亚复兴党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加大了自8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的力度。在政治上进一步放宽了民主和新闻自由，强调在叙利亚实行复兴党领导下的通过全国进步阵线完成的政治多元化；经济上在继续坚持前一阶段改革措施的同时，又出台了诸如取消政府补贴、逐步统一汇率、扩大私人投资范围等深化改革的措施。1997年6月18日，叙利亚总理祖阿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叙利亚经济改革的指导方针。他说：“叙利亚实行的经济改革计划，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模式是不同的。叙政府认为，由于各国对私有化的理解不同，因此各国应该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选择适合本国的私有化模式。私有化在叙利亚的主要表现形式应是鼓励和发展私营经济，使其在叙利亚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鼓励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建立各种合资项目。但不准备因实行鼓励私营经济发展计划而关闭国营企业或解雇国营企业的工人。同时反对把亏损的国营企业卖给私人。出卖国营企业，改变其所有制性质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将国营企业私有化不会对叙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促进作用。政府鼓励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开展竞争。”“在保证国家基本商品价格不发生剧烈波动的前提下，逐步推进商业改革。”“为缓解

国家财政负担，并避免增加人民的生活负担，政府将遵循循序渐进、稳步前进的方针，有计划地逐步减少对人民基本生活物资的补贴，目的是努力避免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草率行事，匆忙实行市场经济和私有化而引发的种种恶果在叙利亚重演。”

经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叙利亚实现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目标。1991年至1996年，叙利亚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6%—7%，农业生产更是形势喜人，不但满足了国内需要，而且还向国外出口农产品。现阶段叙利亚复兴党工作的主要目标是收复被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复兴党自1980年8月召开的民族领导十三大和1985年召开的地区领导八大后，就再也没有召开过党的代表大会。对在当前形势下如何搞社会主义仍在进行研究探索。

三、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社会主义”

60年代后期，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内部发生分裂，该党在阿拉伯世界已不再是一个统一组织了，所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根据各国不同的情况和特点，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萨达姆强调，伊拉克要走伊拉克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

（一）理论上的发展变化

1968年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重新执政后，仍遵循该党的“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目标，国家体制为阿拉伯社会

主义共和国，经济上，采取社会主义模式，强调要在科学和革命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但对复兴社会党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有新的解释。

首先，在意识形态上，该党强调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理论家艾勒亚斯·法拉赫博士在他的名著《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介绍和批评》一书中，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变革的指南，掌握马克思主义是被压迫人民斗争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强调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和研究，了解其思想实质，使其符合阿拉伯世界实际情况，成为振兴阿拉伯民族的有效工具。

其次，不再坚持“没有阿拉伯统一便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观点，提出“单独一个阿拉伯国家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论点。1975年，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地区领导总书记萨达姆·侯赛因发表了题为《论一个阿拉伯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讲话，阐述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与传统阿拉伯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并不矛盾。萨达姆指出，伊拉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绩越大，越有利于阿拉伯统一。但是伊复兴党同时也强调，阿拉伯民族振兴单靠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努力是不行的，必须靠全民族的努力。

第三，强调伊拉克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及其特点。1977年，萨达姆提出在伊拉克“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问题。指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只能由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一党领导，共产党不能肩负起这个任务。1979年萨达姆出任总统后，决心把伊拉克建设成为一个阿拉伯世界中的社会主义基地，使其成为“照耀阿拉伯地区乃至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样板和中心”。1982年伊拉克阿拉伯复

兴社会党地区九大提出，要在伊拉克建立一个“阿拉伯民族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除了具有一般社会主义及民族主义理论特征外，特别应具有它的特殊性、开放性和人道主义特点。“特殊性”就是，不机械地照抄马克思主义或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原则，不盲目照搬外国经验，独立自主地按照本国具体情况和本民族的特殊条件走自己的道路。为此，在文化、精神方面要继承起源于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精神和文化传统，要“信仰伊斯兰精神和宗教原则”。“开放性”就是，在对外拒绝结盟的前提下，要适应现实的变化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思潮”，研究并批判地吸收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引进本国需要的外国先进技术，以加速发展本国经济。“人道主义”特点就是，只有人民才是所有政权和领导的源泉，国家的价值来自对群众意志的反映。因此，复兴党人在提倡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性的同时，也承认个性，允许非剥削性的私有制存在，但强调要对它的活动进行限制，以保障社会公众利益。实现社会主义活动与私营活动在同一水平上的永久性融合。

第四，提出伊拉克社会主义的目标。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地区九大提出，伊拉克社会主义的目标是：（1）消灭剥削，努力使阿拉伯人民摆脱各种形式的、直接和间接的剥削。（2）走向富裕的道路，使生活水平与人的尊严相一致。（3）通过消除妨碍阿拉伯民族发挥力量和才能的一切经济和社会障碍，来实现阿拉伯民族范围内的文明与复兴。

（二）实践的情况及其调整

伊拉克萨达姆提出，在经济上要建立具有独立性的发达的国民经济，使伊成为阿拉伯革命的腾飞基地，为实现这一目标

制定以下经济政策：

1. 经济资源归全民所有，把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命脉完全控制在国家手中，在公正的基础上进行分配，禁止剥削；

2. 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伊拉克经济的现代化”，“保障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幸福繁荣”；

3. 自力更生，依靠和利用本国资源建立石油化学工业、钢铁和建材等战略性工业，使伊拉克经济高速发展；

4. 在各个经济领域里，扩大“社会主义的国营成份”，“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5. 在农村，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大批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大力发展农业，把农业视为“永不枯竭的石油”，扩大机械化，提倡科学种田，建成大批现代化水利设施；

6. 在工业领域，视“工业为实现经济发展和独立的基石”，加强国营企业的领导地位，发挥其主导作用，实现“由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向民主社会主义方式的过渡”，建立广泛发达的民族工业；

7. 确认私有制和私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法制以及国家和社会最高利益范畴内的合作性”，允许其存在，使其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大方向服务；同时限制其破坏国计民生的一面，并解决它的剥削问题。萨达姆指出，允许中小私人资本活动是伊拉克建设社会主义特殊道路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私人资本是民族财富的一部分，必须受到保护。

由于实行上述政策，伊拉克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情况是：1986—1990年，社会主义所有制在工业总投资中占90%以上；在农业方面，建立了79个国营农场、1991个合作社，集体耕

地面积达 70%；在由合作农场、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组成的“多种社会主义生产形式”中，集体农民占优势地位；外贸几乎全部归社会主义部门所有。

伊拉克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很重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萨达姆总统提出，坚决实现复兴党的“社会公正”和“人道主义”的哲学思想和革命原则。让人民享有“民主和生活的权利”。伊拉克由于石油收入丰厚，年人均收入已由 1968 年的 300 美元提高到 1990 年的 3500—3600 美元，增长了 12 倍。国内生产总值由 1968 年的 35 亿美元增加到 1990 年的 780 亿美元，增长了 22 倍。固定资本总额从 1970 年的 5.8 亿美元增加到 1990 年的 185 亿美元。1979 年萨达姆出任总统后，动用了巨额的石油收入，采取广泛的福利措施，提高人民的文化和生活水平。其主要措施有：(1) 普遍提高职工工资。决定增加工人最低工资标准；大幅度提高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工作人员的工资；增加退休人员的退休金。(2) 国家向建房的公民提供无偿土地和无息贷款。(3) 向低收入或无收入家庭提供基本生活保证。此外，伊政府还在中、小城镇、农村地区大力推行向小学生每日提供一餐优质饭菜的办法，以增加孩子们营养。仅 1980 年，国家从普通预算中拨出总额达 5.75 亿第纳尔（约合 1.797 亿美元）用于基本食品和日用品补贴，还实行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基本上消灭了失业现象。国家还颁布了社会福利法、社会保险法和残废人福利法。根据此法，那些无收入、无人赡养的老、弱、病、残者有了生活保障。

伊拉克从 1987 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政治中，扩大民主和言论自由；经济上，在国家操纵主要经济活动的前提下，鼓励商品化和私有化，以提高经济效益和生产水平，减少进口，促进非石油产品出口；取消大批国营企业，加

强政府部门对企业的领导，扩大企业经理的权限，使其对生产效益直接负责。

(三) 冷战后的调整与改革

苏联东欧的剧变在伊拉克引起很大震动，直接关系到对伊拉克的社会主义应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伊拉克复兴社会党首先突出自己的“社会主义”与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的不同。他们说，苏联东欧的理论，“歪曲了社会主义的正确概念”，共产党人“在正确的社会主义概念方面迷失了方向”。但是“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胜利”。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的情况更糟。他们认为，苏联东欧所发生的变化是把人从“桎梏中解放出来”，是“民主和民族主义的胜利”。苏联东欧的主要错误是：第一，从一开始就否认宗教和私有制的积极作用；第二，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实现人民希望与幸福的阶梯，而是将其变为僵死的说教，几十年来一直实行闭关自守和毫无变化的僵硬政策，使人们普遍对其感到厌倦；第三，在国际关系中，否认民族利益，要求别国牺牲民族利益来服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复兴党人同时强调复兴社会党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他们说，伊拉克所走的复兴党的社会主义道路比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缺点要少”，只有复兴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人类。为此，萨达姆总统强调：

(1) 走建设伊拉克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即复兴社会主义道路，强调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复兴社会主义者，指出要避免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因为它们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遭到批评或从内部不断摧毁自己。

(2) 伊拉克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从本民族和民族遗产中产生

出来的，其主要内容就是结束社会上的剥削。但它不是建立在像马克思所说的企业主占有剩余价值的基础之上的。复兴党人指出，私营部门及其活动是意识形态范畴里的一种概念，它不是以结束私营部门利于国营部门，也不是以结束国营部门利于私营部门，而是致力于国营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同时繁荣，使这两个部门实现真正的合作和相互影响。伊拉克的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种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

(3) 国营部门可以搞“合同制”。就是说，国营部门不要搞终身职员制，可以搞类似私营部门的契约形式。

(4) 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扩大民主基础。萨达姆总统说，他们不怀疑复兴党能够实现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但是单独一个党容易犯错误，而应该使具有同一目标的多个党进行合法竞争，这样复兴党才能朝气蓬勃，保持该党对群众在思想和行动上的领导地位。

1989 年以后，伊拉克在政治上推进“民主改革”，如制定新宪法、政党法和新闻自由法，扩大国民议会的权力等。经济领域，开始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政府强调，要逐步使经济摆脱对石油工业的严重依赖性，建立多样化的民族工业体系，优先发展重工业，进一步发挥私营经济的作用。鼓励私人购买国营企业；开放市场价格，缓解商品短缺的矛盾；制定奖励制度，把工资和生产效益挂钩，调动国营企业职工的积极性。

(四) 海湾战争后的形势

1991 年海湾战争使伊拉克国民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7 年的经济制裁更使伊拉克的经济濒于崩溃边缘，生产资料和商品极度匮乏，失业率大幅度上升，通货膨胀恶性发展，人民生



伊拉克总统萨达姆

活水平急剧下降，不满情绪增长。

为顶住制裁和封锁的压力，伊拉克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以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现在，伊实行战时经济政策，其主要措施是：1. 优先发展农业，实现粮食自给。萨达姆总统委派最高权力机构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易卜拉欣直接抓农业。近年来，伊农业发展很快，开凿了萨达姆运河、战斗之母运河和卡迪西亚 3 条主要运河。在西部沙漠地区开垦 100 万杜诺姆土地，建立 10 个农业区。2. 实行配给制度。1990 年 9 月，伊开始实行凭卡供应办法。米、面、糖、茶、食油、洗衣粉、肥皂等实行定量供应。3. 不断调整经济政策，活跃边界

贸易。伊从 1991 年 2 月逐步取消国家对贸易的控制，给私营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同时决定开放边界、市场和价格，调动商人的积极性。4. 强调自力更生，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材。海湾战争前，伊的科技力量薄弱，许多工程都是由外国专家设计和主持建设的，伊拉克人只会使用钥匙。萨达姆总统提出，要培养自己的科技队伍，挖掘本国的潜力。5. 以恢复石油工业作为打破经济制裁的突破口。伊一直炫耀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宣称愿以比欧佩克官价低 35% 的价格出售石油来引诱外国公司，让它们敦促本国政府推动解除对伊拉克的制裁。1996 年 12 月终于得到联合国的允许出口有限石油。1995 年 12 月，萨达姆总统还提出新经济政策。该政策强调要以“战略眼光”组织过渡阶段的经济生活，“自力更生”地完成过渡阶段。在萨达姆新经济政策指导下，1996 年通货膨胀有所控制，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是，如不全面解除制裁，伊的经济不可能根本好转。

但伊拉克是一个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石油是伊的经济支柱，其收入占外汇收入的 97%，目前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 1120 亿桶，占世界储量的 11%，仅次于沙特，居世界第二位。农业的潜力也很雄厚，可耕地面积约 1200 万公顷，水利充足。境内的底格里斯河及幼发拉底河流域被誉为“面包篮子”。椰枣在世界上闻名，年产量为 25 - 48 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 25%。所以，萨达姆总统自信地说，“即使再封锁 20 年，巴格达还会像往常一样的繁荣。”

海湾战争后伊拉克很困难，但仍没放弃其社会主义旗号，并准备进一步改革。1995 年伊拉克副总理塔立克·阿齐兹访问中国，谈到社会主义问题时说，伊拉克在经济方面曾照搬苏联一套，苏联垮台使伊拉克深受其害。而中国的实践是伟大的，

使伊拉克受到鼓舞。阿齐兹还说，从旧体制到新体制的转变会出现很多问题，需作出一定的牺牲，但中国取得了成功，说明社会主义事业方兴未艾，大有希望。伊拉克复兴党信仰的是社会主义价值观，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在复兴党领导下要进行谨慎的有控制的开放，自力更生，学习中国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验。1997年3月，萨达姆总统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仍强调，伊拉克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经济。他说，社会主义在保持力量均衡和公正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为使伊拉克社会主义制度富于生气和活力，应该吸取外来先驱者的思想，在形式上不断有所创新。

四、埃及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及其发展

纳赛尔是埃及现代史上的杰出的民族主义领导人，英勇的反帝反封建战士，阿拉伯世界的一位伟大人物。他也是第一个实施阿拉伯社会主义的人，从而成为阿拉伯社会主义的一位旗手。1970年纳赛尔病逝后，副总统萨达特继承其“社会主义”口号并进行了重大调整。1981年萨达特遇刺身亡，穆巴拉克继任总统。穆巴拉克强调要高举前两位领导人“正确行动的旗帜”，同时又要避免在这两个时期出现的“消极因素”，在“忠于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调整改革，完成了向“民主社会主义”的转变。埃及民族民主党1975年申请加入社会党国际，1989年6月在社会党国际十八大上被接收为正式成员。

（一）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

纳赛尔青少年时期，接受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具有强烈的反英情绪。在开罗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努力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并在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年轻军官中建立了秘密的“自由军官组织”。1952年7月23日，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法鲁克王朝，建立了新政权，从而结束了长达1500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开创了埃及历史的新纪元。夺取政权后，纳赛尔并不是一开始就主张搞社会主义的。在1957年12月，当时的埃及执政党“民族联盟”在纲领中提到“将致力于建设一个合作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阿拉伯社会”时，纳赛尔还举棋不定。直到1961年，纳赛尔才正式打出“社会主义”旗号，并以“社会主义者”自居。1962年，纳赛尔在其《独立后的翌日》一文中，分析了埃及独立后可能走的各种道路，最后得出社会主义是埃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的结论。纳赛尔是第一个实施阿拉伯社会主义的人。从1961年到1967年，是纳赛尔搞“社会主义”的全盛时期。1967年“六·五”战争后，埃及被以色列击败，纳从此就一蹶不振无多大作了。

1. 纳赛尔社会主义的理论。

纳赛尔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源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社会主义思想，其口号“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与复兴社会党的口号一样，只是排列次序不同而已。但纳赛尔认为，复兴社会党的社会主义有的是从列宁著作中抄袭来的，没有多少创造性的思想，因此他决心创造一种能“真正反映阿拉伯特色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后来被称之为“纳赛尔主义”。

1962年5、6月间，埃及成立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以

下简称社盟)，通过了纳赛尔亲自审定的《全国行动宪章》。该宪章把阿拉伯社会主义确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并系统地阐述了埃及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奋斗的目标、实现的途径和行动口号。在此前后的其他文件和文章中，纳赛尔也阐述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归纳起来其主要内容是：

(1) 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教义是社会主义的两大支柱。纳赛尔强调，埃及的社会主义植根于阿拉伯民族特性和宗教传统之中，而不是从任何人或任何地方抄袭来的，社会主义与伊斯兰教教义的原则是一致的。他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团结阿拉伯进步力量、推翻殖民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统治、争取民族自由的有力武器，伊斯兰教是一种进步的、“主持人间公正和平等、提供机会均等”的教义，伊斯兰的道德标准“有利于阿拉伯民族主义、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纳赛尔对伊斯兰教教义作出的“社会主义”解释，有利于获得广大穆斯林对他推行社会主义的支持。在实际政治生活里，纳赛尔主要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伊斯兰教是他用来推进社会主义的工具。

(2) 阿拉伯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富裕、平等、公正和合作的社会。埃及《全国行动宪章》宣称，埃及要实现的社会主义将是“一个富足和正义的社会，一个劳动和机会均等的社会，一个生产的和福利的社会”。“只有机会均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纳赛尔还主张，在阿拉伯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和企业家、私人经济和国营经济”要进行“合作”。要“建立合作的社会主义社会，政府和资本家合作，工人和资本家合作”。“把所有的阶级团结起来，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阶级搏斗，既不用暴力，也不用流血，……我们要阶级之间的和平共处。”因此，纳赛尔拒绝“任何一个阶级的专政”，主张走“全

民民主的道路”。

(3) 在经济上主张国有和私有并存，强调国有化，但同时允许私营部门存在，并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纳赛尔说过，国家资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他认为中央政府有必要、有能力“管理整体经济计划，并使部分私有制社会主义化，即国有化”。但同时指出，“并不是指生产资料都要实行国有化，取消私有制，也不是侵犯私有制”。纳赛尔把私有制划分为“剥削的”和“非剥削的”两种形式，并主张即使是对剥削的私有制，也要允许其存在，使它为发展总计划作出贡献。他还认为，国有化与保存私有制并无矛盾，无论是“公”还是“私”的一切财产，“均属整个社会的共同财富。”

(4) 主张以埃及为“中心”，实现阿拉伯世界的统一。纳赛尔本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认为阿拉伯统一是阿拉伯爱国主义的最崇高的强大力量。纳赛尔在《革命的哲学》一书中提出著名的“三个圈子”的思想，即把阿拉伯各国、非洲大陆和伊斯兰世界划分为三个圈子，埃及处于亚、非两洲咽喉要地，决定了埃及是阿拉伯、伊斯兰和非洲“三个同心圆的圆心”，而最重要和联系最密切的是阿拉伯圈子，“自然和历史的条件赋予埃及成为要求阿民族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的核心国家”。

(5) 敌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强调阿拉伯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纳赛尔强调共产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思想体系，是从外国输入并由外国势力所指挥的，是要摧毁伊斯兰教和中产阶级的”，因此“共产主义在阿拉伯世界没有立足之地”。1962年5月，他在埃及全国人民力量代表大会上明确宣布，纳赛尔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有5点区别，即“我们信仰宗教，而他们是完全无神论的；我们主张和

平过渡到全民民主，拒绝任何一个阶级的专政，而他们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反动派的专政；我们相信在合作范围内的土地私有制，他们规定土地国有化；我们相信非剥削的私有制，而他们要废除私有制；我们主张不流血地解决一切问题，而他们则主张用暴力革命消灭剥削阶级”。纳赛尔认为，谁主张共产主义，谁就是反对他们的祖国，反对民族独立和他们国家自由的异教徒。值得指出的是，纳赛尔主要是在国内战线上反对共产主义。对外，他采取的是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因为他认为，“共产主义的袭击不会来自边界外面，因为我们与苏联并不接壤。但它将来自内部。所以我们真正须得对付的共产主义是在国内战线上，而不是在国际上。”

2. 纳赛尔社会主义的实践。

纳赛尔在埃及当权的年代，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尽力贯彻实施其社会主义思想和主张，有的思想在实践中又有所变化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政治上实行一党制。1953年初，埃及宣布解散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复兴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内的一切政党，成立单一的政治组织“解放大会”。1957年5月29日，成立了执政的“民族联盟”，以取代“解放大会”。1962年12月，改建“民族联盟”为“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即社盟）。1964年，宪法规定社盟是埃“唯一的人民政治组织”（即执政党），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劳动人民力量联盟的政治组织”，是“深化民主和社会主义准则，监督全国行动并将其引向既定目标的工具”。1969年有关法令还规定议员必须是社盟成员，全国一切群众组织和职业团体必须在社盟领导下进行工作。社盟被宣传为“全国一切社会主义力量的大熔炉”，逐步扩大了它在埃及人民中的影

响，成为埃及唯一合法的政党。从而，在政治上建立了以实现阿拉伯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一党制的政治机构，以保证社会主义试验在埃及的推行。

(2) 实行计划经济，加快实现国家工业化。纳赛尔把发展民族经济作为其阿拉伯社会主义的重要环节。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经济的独立，政治独立是没有价值的，而经济独立了才能取得完全的政治独立”。1956 年埃及颁布的宪法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要由“计划来加以安排”。1957 年埃及设立计划部，并制定了第一个工业发展年计划。1960 年 7 月，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改变埃及历来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使埃及成为以工农为主体的国家。

(3) 实行企业国有化，发展人民所有制。1956 年 7 月 26 日，埃及从英、法帝国主义手里收回苏伊士运河，成为战后第一个将外国资本实行国有化的阿拉伯国家。1957 年 1 月，宣布埃及经济“埃及化”的决定，将外国企业收归国有，基本上完成了对英、法资本企业的国有化，为埃及国营经济奠定了初步基础。1961 年 7 月，埃及政府宣布把所有银行、保险公司及 42 家大的工业、运输业、商业企业和土地开垦公司收归国有。在 1960—1964 年间，又对埃及的大、中资产阶级的企业实行了国有化。从而，使埃及国家所有制企业在主要经济部门中取得了优势地位。

纳赛尔时期，埃及大、中型企业均实行了国有化，或以公私合营形式存在。国营企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 90% 左右。政府还垄断了外贸，国内的商业活动也在政府控制之下。在纳赛尔的领导下，埃及虽然建立起强大的国营经济，但没有鼓励和扶植私营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和困难。

(4) 实行土地改革，建立合作所有制。纳赛尔认为，要发

展农业，必须使广大农民获得自由和解放。埃及人多地少，少数贵族、大地主拥有大多数耕地，而绝大多数农民却无地或少地。纳赛尔先后于1952、1961、1969年颁布《土改法》，进行了3次土地改革。土改的原则是，不实行土地国有化，但规定了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超过部分由政府征购，并廉价出售给无地或少地农民。与此同时，在农村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建立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社，将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

土改和农业合作化，削弱了贵族和大地主的势力，缓解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求，促进了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仍允许大地主存在，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改变农村封建的生产关系。

(5) 致力于阿拉伯的统一。1956年埃及反对英、法、以(色列)3国侵略，取得保卫苏伊运河的胜利，使纳赛尔在国内外的威望大增，他不但成为埃及人民崇拜的偶像，而且也被看成是阿拉伯事业的捍卫者。纳赛尔从埃及是“三个圈子”的“中心”的思想出发，致力于实现阿拉伯的统一。1958年2月，埃及和叙利亚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纳赛尔认为这将为一个更广泛的阿拉伯统一奠定基础。1961年又积极推动埃、叙和伊拉克3国参加阿联的谈判，并发表“统一声明”，梦寐以求建立一个更大规模的联邦国家，但终未变为现实。阿拉伯统一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

纳赛尔社会主义经历了十几年的风雨历程，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二) 萨达特对纳赛尔社会主义的重大调整

1970年9月，纳赛尔病逝。10月，当时的副总统萨达特

继任总统。萨达特一方面宣布自己是纳赛尔主义的继承人，同时又认识到纳赛尔社会主义有许多方面是偏激的，甚至是失败的。鉴于纳赛尔在国内和阿拉伯世界的威望，他并没有公开地修改纳赛尔实施的方针政策。直到 1973 年 10 月战争后，萨达特本人威望大有提高，埃及和以色列也走上和谈道路，埃国内外出现相对稳定局面后，萨达特才开始对纳赛尔的方针政策进行调整，即用“和平与繁荣”代替“自由、统一和社会主义”的战略口号。1974 年 4 月，萨达特在《十月工作文件》中，正式宣布他的新政策，对原政策作了重大的改变，埃及社会主义方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变一党制为多党制。1970 年萨达特上台接任社盟主席后，主张实行多党制，政治上开放民主，放宽言论自由，并陆续释放了纳赛尔时期被监禁的政治犯。1974 年 8 月，萨达特颁布了《八月文件》，决心对社盟进行改革，将其扩大为一个“有全体劳动人民参加的联盟”，成为各阶层人民畅抒己见的论坛。1975 年，萨达特允许在社盟内建立多个“论坛”，使不同政见者进行“民主对话”。1976 年，在左、中、右 3 个论坛的基础上成立 3 个政党，即萨达特本人控制的埃及“阿拉伯社会主义党”（中间党），“自由社会主义者党”（右派党）和“民族进步统一集团党”（左派党），从而打破了纳赛尔时期的一党制。从此，原来受禁的一些政党如穆斯林兄弟会也公开活动了。1978 年 10 月 1 日，萨达特创建了由他担任主席的“民族民主党”，取消纳赛尔创立的社盟，成为执政党。埃及阿拉伯社会主义者党集体加入民族民主党。该党的口号是“民族、民主和社会主义”，主张实现“富裕而不是贫穷，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的社会主义”，该党在第二年埃及人民议会选举中，取

得了绝大多数的席位。

2. 推行经济“开放”政策。1970年萨达特执政后，逐步改变纳赛尔后期实行的有些僵化的经济体制和不断扩大国营企业的方针，鼓励私人投资，发展私营企业，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反对国家垄断，搞经济自由化。萨达特上台后，取消了纳赛尔时期对“反动”资本家企业实行“监管”的法令，放宽对本国私人民族资本的限制。逐步解除了纳赛尔时期对1668家大资本家的财产的冻结，使这部分财力雄厚的私人资本重新进入经济领域。这些资本家不仅与外国垄断资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与埃及政界的实力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1974年6月，埃及政府制订了《投资法》，规定对外资“不没收、不监管、不国有化”，以大力推动经济对外开放。埃及对外开放，主要是吸收西方的资本和引进技术。由于西方和阿拉伯的私人资本大量涌入埃及，打破了纳赛尔拒绝西方资本的政策。

但萨达特搞的消费性开放经济也带来了消极因素，如：消费部门迅速扩展，两极分化严重，萨的亲戚及其周围一些人成了富翁，引起国内群众的不满。

3. 修改纳赛尔的土改政策。1975年，萨达特对纳赛尔时期制订的《土改法》作了修订。一方面，取消了对原贵族和大地主产业的监管，将农改部掌握的土地转交给寺院不动产部，允许转让给私人；另一方面，允许提高地租和恢复剥削的分成制。法令还规定佃户如接连两个月不交地租，地主有权收回出租的土地，从而有利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使土地兼并合法化。萨达特时期不重视农业，开垦沙漠工作毫无进展，不少已开垦的土地因未使用而变为荒地。

4. 主张政、教分离，严厉镇压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国内反对派。萨达特总统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他上台后也利用穆斯

林兄弟会与他的反对派对抗。随着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输入、国内原教旨主义活动的加剧，埃及世俗政权和伊斯兰宗教组织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与尖锐，严重威胁着萨达特的统治。萨达特对伊斯兰极端分子和反对派提出严厉警告。1979年2月，萨达特发表讲话，强调“在埃及，伊斯兰教和政治之间是有区别的，要祷告就到清真寺去，要参与政治就应通过合法的机构”，同时对国内宗教人士和反对派采取严厉的镇压和打击。因此，他与埃国内宗教势力之间的矛盾加剧，与伊斯兰极端组织关系十分紧张，最终导致了惨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暗杀的悲剧。

5. 改变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纳赛尔时期执行了一条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使埃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在纳赛尔后期深受苏联控制与影响。萨达特执政后，为摆脱苏联的控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1971年5月15日，下令逮捕以社盟总书记萨布里为首的亲苏派；1972年7月，下令驱逐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宣布苏联在埃及领土上建立的一切设施和军事装备移交埃及管理使用；1976年，废除《埃苏友好合作条约》，禁止苏联军舰使用亚历山大港等；1977年，宣布停止向苏联出口棉花，停止偿还苏联的军火债务，关闭苏联在埃及的文化中心和亚历山大、塞得港、阿斯旺的领事馆；1978年，禁止3家苏联杂志在埃发行，并决定苏联不得租用埃及影院放映苏联电影。

与此同时，1974年埃及与美国恢复了外交关系，并逐步发展到“同美国建立非常特殊的关系”。1973年“十月战争”后，埃及开始着手与以色列谈和。1977年11月，萨达特采取“和平主动行动”，突然访问以色列特拉维夫，打开了埃以直接对话的渠道。1978年9月，在美撮合下，埃以在美国会谈，

签署戴维营协议。1979年双方签订埃以和约。1980年，两国互派大使，结束了长达30年之久的战争状态，埃及最终收回了西奈半岛和恢复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为埃及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益处。当然，埃以单独媾和引来了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谴责，它们纷纷同埃及断交。

总之，萨达特的民族民主党虽然还坚持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民族主义，但纳赛尔时期所实行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些变化已影响到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如国有化逐步让位于“开放”政策；伊斯兰教已失去原有的重要性；自由化与民主化的倾向发展；一党制让位于多党制。这表明西欧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已渗透到埃及，埃及已逐步放弃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政策和发展模式，经济上向日益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转轨。

（三）穆巴拉克时期完成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

1981年10月，萨达特遇刺身亡，穆巴拉克继任总统。他在总结了纳赛尔“社会主义”道路和萨达特“资本主义自由化”政策后，强调要高举纳赛尔和萨达特“两位领导人正确行动的旗帜”，同时避免在这两个时期出现的“消极因素”，宣称要在“忠于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继续执行开放政策，提出了“和平、发展、繁荣”的口号，体现了穆巴拉克“稳中求变，变中求稳”的战略。特别是1989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以来，穆巴拉克及其执政党（埃及民族民主党）从中冷静思考，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根据埃及的客观情况，进一步调整政策，纠正埃及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穆巴拉克对萨达特时期政策的调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加强执政的民族民主党的建设，同时遵循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原则，继续推行多党制。

(1) 把“民主社会主义”确定为民族民主党理论思想的 3 个基本组成部分之一。该党 1975 年申请加入社会党国际。1980 年 9 月，民族民主党一大强调遵循“民主社会主义”。1986 年 7 月四大重申党的思想的 3 个基本组成部分：宗教价值（伊斯兰法是立法的主要依据）、阿拉伯民族主义（埃及同阿拉伯民族休戚相关）和民主社会主义（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政治自由与社会自由之间的平衡）。

(2) 把贯彻“民主精神”作为政权建设 3 个基本支柱之一，主张开放民主，让人民参政和从事经济、社会活动。1981 年 9 月，该党二大的口号是“民族团结、民主和纪律”。1984 年 4 月，民族民主党议会竞选纲领明确提出要在埃“建立一个公正、团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1986 年 7 月，该党四大宣布要实现“施政民主化、政权廉洁化和社会法治化”，穆巴拉克的政治报告强调维护民主生活，巩固廉洁政权和尊重法律。在 1989 年 7 月五大上，穆巴拉克的讲话重申“发扬民主、加强团结、维护安定和增加生产”。

(3) 把保障言论自由和建立全国和解作为恢复民主化的一项政策，强调进行民主“对话”与“协商”，加强同埃及其他政党的合作。穆巴拉克提出“埃及第一”口号，认为埃及的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各政党应搁置分歧，实现民族团结。他上台后首先稳妥地处理了暗杀萨达特案件，释放了一批被萨达特关押的反对党领导人，并同反对党进行坦率的对话；同时，放宽了对反对党活动的限制，允许被取缔的反对党恢复活动，并允许成立新的政党，允许被封闭的反对党报刊重新出版。以此稳定国内政局，加速经济的发展。

2. 自力更生实行生产性的经济开放政策，吸收国内外投资。穆巴拉克重视经济建设，认为埃及成功的关键取决于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整顿经济的关键是发展生产。他一贯坚持经济对外开放政策，并把“消费性开放”变为“生产性开放”，提倡自力更生，有计划地发展经济，不采取激烈的经济措施，以保持政局的稳定。

(1) 强调国营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为鼓励国营企业本身的发展，埃及政府曾于1983年9月颁布新《国营企业法》，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的权力，使国营企业拥有自主权。1982—1983年度政府专门拨款15亿埃镑，用于改善国营企业的生产条件，加强企业在市场的竞争力。同时，对国营企业进行大力整顿：实行国营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改革不合理的工资福利制度；大力培训经营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放慢或停止兴办新的国营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营企业；关闭严重亏损的国营企业，或将它改为公私合营或私营企业等等。

(2) 鼓励和发展私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实行“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强调私营和国营部门两者间的平衡。萨达特被刺后，私人资本曾一度采取观望的态度，他们害怕“经济自由化”政策发生变化。穆巴拉克政府许诺继续给新开办的私营企业以免税等优惠，允许出口贸易所得外汇归私人企业所有。在“反腐化运动”中，也防止打击面过宽而影响民族资产阶级的信心，充分调动民族私人工商业的积极性。另外，鼓励和吸收本国私人、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投资。

(3) 实施经济改革，加快私有化进程，改善人民生活。1991年5月，埃及着手经济改革，其主要目标是统一埃镑汇率，开放银行利率，控制通货膨胀，削减预算赤字，逐步减少

对主要商品的物价补贴。1995年后，埃及政府继续稳步深化经济改革，并制定出开发西奈半岛和上埃及沙漠地区的宏伟的“跨世纪”计划，力争实现国民经济的腾飞，使埃及成为非洲的类似亚洲的“四小龙”。政府进一步推动加快私有化进程，扩大外贸自由化，改革财政金融体制，完善经济法规，改善投资环境等；同时，埃及政府坚持在经济改革中照顾低收入者的利益，力争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改善贫穷者的生活，普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3. 重视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穆巴拉克政府在农业方面的主要目标，是稳定农村秩序和保护农村小生产者的利益。埃及政府一方面尽力维护以中、小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土地关系，巩固农业合作社，防止农村两极分化的加剧；另一方面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埃及政府还以贷款资助的方式，鼓励农业合作社和农民购买农业机械和设备，采用先进技术。政府向私营农业公司和农民以提供免税和低息贷款的辅助方式，积极鼓励他们开垦荒地，以发展农业、缓和土地兼并。埃及政府重视扩大耕地面积，尤其鼓励大、中学毕业生务农，并给予许多优惠政策。

4. 反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谴责暴力行动。80年代以来，埃及国内出现了各种伊斯兰组织，它们认为埃国内存在的经济困难、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人民群众生活恶化等，都是因为没有按真主的意旨办事。它们反对西方化、世俗化，强调政教不应分离，返回到伊斯兰教的教义中去。于是，伊斯兰教与埃及世俗政权之间产生了矛盾和冲突，甚至发生暴力和流血事件。1981年10月，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策划和执行这次行动的是名为“赎罪与迁移”的原教旨主义组织。1990年，这一组织又参与了暗杀埃及议长马哈古卜的行动。之后，埃及

发生很多暴力事件都与原教旨主义组织有关。埃及领导人深知伊斯兰教是维护政治统治的支柱，十分重视伊斯兰教的作用。1986年7月，埃及民族民主党四大重申伊斯兰教为该党思想理论3个组成部分之一，强调伊斯兰法是立法的主要依据。穆巴拉克在处理暗杀萨达特案件中，虽然处理了一批人，但处理不过分，仍以安抚为主。但是，原教旨主义势力以各种形式与埃及世俗政权相抗衡，威胁着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并成为影响地区和国内局势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为此，埃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限制、严厉打击或镇压与疏导相结合的措施，加强社会治安。通过严打和法律手段削弱宗教极端势力，防止它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危害。同时，埃及还不断同国际和阿拉伯各国协调立场，共同对付地区和国际恐怖主义与原教旨主义势力，反对暴力和流血事件，维护地区与世界的安定与和平。

5. 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加强区域性经济合作。埃民族民主党奉行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强调“自由地、不接受压力地”同东、西方打交道。1989年5月，埃及恢复了阿拉伯联盟成员国的资格，1990年11月，阿拉伯联盟总部由突尼斯迁回开罗。埃及主动改善并加强了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积极推动并参与中东和平进程，主张中东地区成为无核区，积极推动建立阿拉伯共同市场；强调非洲属性，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友谊与合作；努力推动南方合作和南北对话，将南北间对抗转为对话与合作，同美国保持特殊关系，但不与其结盟；重视同西欧和日本等国家发展关系。埃及积极发展全方位外交，同更多的国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既向东方开放，也向西方开放，主要还是向西方开放，以吸引大量外资和技术，解决面临的经济困难和加快发展民族经济。

总之，80年代以来，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

“民主社会主义”在埃及的影响不断扩大。特别是 1989 年 6 月埃及民族民主党成为社会党国际正式成员党后，埃及在经济、政治和对外关系等领域的一系列政策具有“民主社会主义”的色彩。政治上实行多党制，允许反对党的合法存在，参加竞选和进入议会。认为多党制是体现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既能防止一党制下容易出现的政治腐败，又有利于分化、控制反对党和活跃民主空气。经济上实行“有限度制的自由经济”，不搞国有化，实行私营、合营和国营经济“共处共荣”，大量依靠外国特别是西方资金和技术，发展民族经济。对外关系方面倾向西方，特别强调加强与西方的合作关系。同时，更广泛地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类型的国家发展政治、经济、文

化关系。从本国现代化目标出发，谋求更有效的国际合作和多方援助。

五、利比亚卡扎菲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及其特点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伊斯兰社会主义，是在崇敬和学习纳赛尔思想行为的基础上，以“世界第三理论”的名称著称于世的。1969年利比亚青年军官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于9月1日领导了“九·一”革命，以军事政变上台。1970年纳赛尔逝世，卡扎菲自称是纳赛尔主义的继承人，并在多种场合宣称他的社会主义就是纳赛尔主义的继续。后来，卡扎菲通过他的《绿皮书》系统阐述了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说，他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以伊斯兰和阿拉伯为基础”，介于“剥削成性的资本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之间的“新型的社会主义”。他说，资本主义理论是“第一理论”，共产主义理论是“第二理论”，而他提出的是“世界第三理论”。这一理论具有世界性的指导意义，是解决当代世界所遇到的一切疑难问题的学说。

（一）卡扎菲其人及其“世界第三理论”的提出

卡扎菲1942年出生于利比亚锡尔特市以南30公里处沙漠中的一个称作卡达法的贝督因人部落里，该部落具有抗拒外来侵略的光荣斗争历史。卡扎菲的父母均为文盲，但参加过反抗意大利殖民统治的斗争，这使卡扎菲从小就受到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思想熏陶。卡扎菲在少年时代每周随从伊斯兰教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

经师学习《古兰经》，并在上小学时因付不起住宿费而借住清真寺，与阿訇们在一起生活。从这时起，伊斯兰教义和《古兰经》在卡扎菲的头脑中打下烙印，并在他以后的成长历程中成为行为准则和思想参照。在中学读书时，卡扎菲又成了埃及领导人纳赛尔的崇拜者。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对利比亚人颇具影响力的埃及报纸，找机会同在利比亚工作的埃及人攀谈，收听埃及广播“阿拉伯之声”。据记载，卡扎菲把纳赛尔的整段讲话铭记在心，并能逐字逐句背诵。这些讲话的内容主要是抨

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宣传民族主义和阿拉伯团结。卡扎菲积极宣传纳赛尔主义，并通过组织游行、示威加以实践。1963年10月，卡扎菲进入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并于1964年与志同道合的军官贾鲁德等人根据《革命哲学》的叙述，成立了“自由军官组织”。1965年8月卡扎菲从军事学院毕业，在信号兵团被授予少尉军衔，1966年被派往英国圣赫斯特装甲兵无线电通讯学校接受为期9个月的无线电通讯技术培训，回国后在利比亚军队中任职，1969年8月晋升为上尉，任利比亚信号兵团代理副官。1969年9月1日，以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正在土耳其度假的年迈国王伊德里斯，宣告利比亚封建王朝的结束，成立了革命指挥委员会，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卡扎菲自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

“九·一”革命当天，卡扎菲就宣布将“坚决地、百折不挠地追求建立一个革命的利比亚、社会主义的利比亚”。1973年5月1日在的黎波里阿拉伯—欧洲青年大会上，卡扎菲发表讲话，第一次公开提及他的“世界第三理论”。他说：“世界第三理论是一种呼吁人类返回天国的学说，是对资本主义的实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无神论的替代……当我们谈起世界第三理论时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它既非一种人为的制造品，也不是一种哲学，它是基于真理而产生的。在真理与理论学说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同：理论学说易于因废除或驳斥而发生改变，而真理是牢固不变的。”卡扎菲在这次演讲中说，“我们称之为世界第三理论是为了表明，对那些既拒绝实利主义的资本主义，也拒绝无神论共产主义的人来说还有一条新的道路。这条道路是给予世界上所有厌恶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人们的。”他还讲到，“沙文主义和自私自利是邪恶统治的特征。世界第三理论摒弃所有这

两种罪恶，呼吁全人类兄弟般相处。否则，人和国家也就不过是林中野兽。”

在卡扎菲的概念中，资本主义理论是“第一理论”，共产主义理论是“第二理论”，所以他提出了“第三理论”。卡扎菲认为，通过社会主义解决经济问题的可能性只有在伊斯兰教的背景下才能取得认可，因为伊斯兰教和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的。他还认为，财富和贫困“在任何社会里都不应被允许共同存在，国家的职责就是要强制实施铲富济贫的法律。伊斯兰教反对贫困，并且坚定不移地站在劳动阶级一边”。卡扎菲连续出版了 3 册《绿皮书》，集中阐述了他的“世界第三理论”。至此，卡扎菲的社会主义理论得以系统表达。

（二）卡扎菲伊斯兰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卡扎菲 1972 年 9 月 16 日正式提出了“世界第三理论”。经过不断充实和发展，从 1976 年 1 月到 1979 年 3 月，陆续出版了 3 册《绿皮书》。《绿皮书》综合了他前一阶段的言论，分别从民主、经济和社会 3 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世界第三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和主要内容是：

1. 以伊斯兰教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依据，认为只有伊斯兰教能引导人类“走向社会主义”。

按照卡扎菲的思想，只有宗教才能使人类得到真知和正义，宗教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基础。他认为，伊斯兰教不主张贫穷，不愿人们成为穷人，也不主张人们奢侈而成为剥削者。卡扎菲反复强调，他主张的社会主义与伊斯兰教义相关联，是伊斯兰教的社会主义。他曾说过：“我们有自己的宗教、历史和伟大的阿拉伯民族，不需要马列主义，不需要输入原则。”卡扎菲得出的结论是：伊斯兰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是阿拉伯国家

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动力。根据卡扎菲的观点，伊斯兰教理论比各种现代理论出现得更早，《古兰经》为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了现成的答案。他认为，《古兰经》规定的“施舍（天课）基本上是伊斯兰社会主义精神的核心。虽然不能把它说成是现代入所谓的社会主义，但多少还是要消除阶级矛盾的。因此，可以说伊斯兰精神和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在实质上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不像现代的社会主义那样明确罢了。施舍基本上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起步”。

卡扎菲把伊斯兰教义作为其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种子只能从伊斯兰教义中产生，只有伊斯兰教能引导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卡扎菲极力称赞伊斯兰教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所具有的作用。他认为，伊斯兰教虽然是一种宗教，但它却包含了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原则”，人们可以从《古兰经》中找到“最完善的规则”和“社会安定因素”，建立一个“繁荣和公正”的社会所必需的“道德责任感”，伊斯兰教能防止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堕落后为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并能把友谊、博爱传遍全世界。

2. 痛斥现代议会制度是“欺骗”、政党制度是“统治工具”，强调实行“直接民主”，主张建立一个既无政党，也不要议会的政权——“人民政权”。

《绿皮书》第一册题为《民主问题的解决办法——“人民政权”》，集中阐述了他关于民主和人民政权的主张。首先，卡扎菲对当代议会制度进行痛斥，称“议会制是解决民主问题的一种欺骗办法。议会本以代表人民而建，然而它的基础本身却是非民主的”。按照卡扎菲的观点，议会的存在本身就表明人民没有参政，因为民主的意思是人民直接掌权，而不是人民通过议会这个代表来掌权。卡扎菲认为，议会妨碍民众参与政

治，人民所享有的权利只是排着长队去往票箱里投票，这是虚假的民主，“议会已成为人民行使权利的合法障碍”。根据卡扎菲的看法，“民众与议员完全隔开，议员完全脱离民众。议员一旦获得民众选票，立即成为民众权力的垄断者，代表民众行事。由此可见，当今世界盛行的传统民主赋予议员以神圣的地位和豁免权，却不承认人民群众有这样的权利。这就标明，议会已堕落到攫取和垄断人民政权的工具”。卡扎菲还认为，在选举中获胜的某个或某几个政党组成的议会只是代表那个或那几个政党；而不是代表人民，所以“代议制是一种欺骗”。他强调，世界上所出现过的最残暴的政权，正是在议会制度下建立起来的。

其次，卡扎菲认为，政党是现代专制统治的工具。“政党是部分人统治所有的人，是迄今为止最后一个专制工具。”政党愈多，争权夺利的斗争就愈激烈，结果是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在卡扎菲眼里，政党充其量是现代社会中的部落或教派；一个在政党统治下的社会，就是一个处在部落或教派统治下的社会。

因此，卡扎菲主张建立一个既无政党，也不要议会的政权——人民政权。他说，最理想的民主方式是直接民主，即由人民直接决定政策。按照卡扎菲的理论，人民政权只有一种实现形式，就是通过建立“人民大会”和“人民委员会”，只有建立了这样的政权才算是实现了真正的人民民主。他说，人民大会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唯一途径，“任何违反人民大会这种形式的政体都是不民主的政体”。根据卡扎菲的《绿皮书》，人民应当组成若干基层人民大会，每个大会选举出一个秘书处，由若干秘书处组成总的人民大会。各基层人民大会的群众推选出各自的行政人民委员会，以取代政府的管理机构，行使政府职

能，人民委员会向人民大会负责。卡扎菲称之为“民主即人民自己监督自己”。根据卡扎菲的“世界第三理论”，各级人民大会和人民委员会所讨论的一切事项，均需汇集到全国人民大会做出最后决定。全国人民大会定期举行会议，把做出的决议下达给各级人民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由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实施。这样，“世界民主这一难题最终得到解决”。

3. 在社会经济制度上，主张废除工资制度和雇佣关系，实行满足社会成员基本需求的分配制度，使人与人皆为“伙伴”，不因个人需求受制于人，建立自由幸福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

《绿皮书》第二册题为《经济问题的解决办法——“社会主义”》。卡扎菲在这里集中说明了他所设计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他认为，如果人的需求受到别人控制，那么他的自由便是不完全的。产生剥削的原因是需求。无论是在公有制还是在私有制社会中，生产者为满足自己生活需求而受雇于企业或个人生产产品以换取工资，便都是雇佣劳动者。在卡扎菲看来，雇佣劳动者类似奴隶主雇佣的奴隶，只不过是临时的奴隶，只要雇佣劳动者为获取雇主的工钱而劳动，他们的被奴役地位就保持不变。他的结论是：“雇佣劳动者，不管工资多么优厚，他们还是一种奴隶。”卡扎菲想出的使生产者即雇佣劳动者摆脱剥削的最终解决办法就是“废除工资制”，而代之以确定社会各成员平等关系的自然法。卡扎菲在《绿皮书》中说：“自然法产生了建立在经济生产各要素平等基础上的自然社会主义，从而实现了人们在自然生产中享有大致相等的消费。”卡扎菲认为，按照自然法则，生产的三要素即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生产者本身应各占有生产成果的三分之一。在卡扎菲眼中，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根据这一自然法则建立起来的，这

个法则应支配一切生产活动。卡扎菲强调，“社会主义的宗旨是建立一个幸福社会。这是因为它是自由的。只有当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得到满足，并把这些需求从他人的控制和支配下解放出来时，社会主义才能实现。”

同时，卡扎菲又认为，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合法目的只能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任何人都无权为获取超过自身需求的财富而进行经济活动，因为获取超过自身需求的财富，就等于占有了社会其他成员的财富，就等于剥削。但是“那些从事公务的人”可以与他人有所差别。卡扎菲在《绿皮书》上说，不允许追求超过自身需求的财富一说并不是绝对的，“在社会主义新社会里，不允许有个人财富的差别，除非是那些从事公务的人，社会给予他们与其服务相等的一份报酬。个人报酬的多少则取决于其提供服务和产品的数量，否则个人之间是不应有差别的。”

卡扎菲把他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定为“实现人们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均有自由的幸福”，即一个人在满足自己需求方面不受他人的干预和控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卡扎菲认为有必要使社会成员间的雇佣关系转变为伙伴关系。按照卡扎菲的设想，废除了工资制度，雇佣工人随之消失，人人皆成为伙伴，人人根据自身的需要分得自己那一份财富，这就是他所要建立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根据“世界第三理论”，承认利润和货币的消失。但是，因为利润是经济活动的动力，只有社会主义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社会和个人物质需求时才能消除利润和货币，所以最终取消利润的办法是努力增加利润。

4. 在对外关系上，主张在“世界第三理论”指导下实现以利比亚为中心的阿拉伯统一。

卡扎菲自执政后，就一直努力寻求实现阿拉伯和伊斯兰世

界的统一。他曾经在接受埃及《金字塔报》记者采访时说：“统一存在于从阿拉伯湾到大西洋的阿拉伯祖国的群众心里，表现在语言、历史、理想和命运的一致上。统一是必须的，同时也是必然的。”卡扎菲在班加西的一次讲话中曾就阿拉伯统一的必要性作过说明，他强调“要想保护阿拉伯国的成就，就少不了统一。统一是阿拉伯国进行斗争的可靠规划和最终理想。统一是对付犹太复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挑战的历史性的、决定性的反击”。卡扎菲坚信“伊斯兰社会主义”原则是迈向统一的基石，实现统一的目的是“为了挫败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诡计而建立紧密的革命同盟”。卡扎菲在他的“世界第三理论”出台后，又对阿拉伯统一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1974年10月致信给《阿拉伯周刊》，提出关于阿拉伯统一的五点纲领：第一、以埃及和利比亚为核心，建立阿拉伯联邦；第二、解放巴勒斯坦；第三、统一阿拉伯的工业和核力量；第四、以阿拉伯联邦为核心建立伊斯兰联盟；第五、以伊斯兰联盟为核心统一全世界。

但是，卡扎菲认为只有通过人民革命，从而建立阿拉伯人民社会主义联邦，才能最终实现阿拉伯世界统一的目标。他对埃及《最后一点钟报》记者说：“阿拉伯统一是各国人民的统一，不是各国政府的统一。统一是土生土长的东西，既不需要人家点头，也不需要拿出证据。阿拉伯统一确实确实存在于阿拉伯国的各国人民之中。事实真相是，有些国家政府并没有真正如实表达人民的愿望。如果有矛盾的话，那就是这些政府和人民之间有矛盾。阿拉伯国的各国人民身为人民，互相之间并不存在矛盾。这样我们可以得出另一个论点：我们决不能说，两国政府缔结的一项协定实现了两国的统一，或者就有办法顶住这个地区的阴谋逆流。我们认为要实现真正的统一，应当准

备好相当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关于实现统一的途径，他强调：“革命是走向统一的必由之路，革命是解决阿拉伯社会问题的唯一办法。除了革命和武力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一切的尝试都失败了，执行投降与和平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三）卡扎菲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实践

利比亚“九·一”革命后，一切权力都集中在革命指挥委员会手中。革命指挥委员会禁止一切政党活动。1970年纳赛尔逝世，卡扎菲自称是纳赛尔主义的继承人，并在多种场合宣称他的社会主义就是纳赛尔主义的继续。1971年6月，卡扎菲参照纳赛尔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模式，宣布在利比亚成立唯一合法的政治组织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规定该联盟受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卡扎菲自任该组织主席。在这一时期，卡扎菲对政府机构的管理情况产生不满。1971年卡扎菲第一次向革命委员会提出辞职，“以抗议政府机构在执行社会、经济和工业计划中的缺点和毛病”。1972年7月，卡扎菲与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在组阁及与埃及统一等问题上发生争执，又引退了10天。随着经济的发展，利比亚民族资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大，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同时接连不断发生的劳资纠纷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另外，一部分官员贪赃枉法，以权谋私，在利比亚形成一个“特权阶层”。西方思想和文化影响着利比亚社会风气和生活习惯，与传统的阿拉伯伊斯兰道德观念发生尖锐冲突。所有这些都与卡扎菲理想的社会主义原则背道而驰。卡扎菲的“九·一”革命战友们与卡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和谐，政府官员包括革命指挥委员会成员和知识分子对卡扎菲感到有必要改变过去所继承的纳赛尔式的温和的革命方式，而实行更加积极更加活跃的革命。在此背景下，卡扎

菲决心发动“人民革命”，通过一系列激进的措施，来实现其“世界第三理论”。

1. 推行“人民革命”，建立无政党、无政府、实行“直接民主”的“人民政权”。

1973年4月15日，卡扎菲在的黎波里西部的港口城市祖瓦拉发表演说，宣布要在利比亚进行“人民革命”。革命的内容就是：全部废除现行法律，把武器发给人民，枪口对准敌人，进行一场彻底的“行政革命”，以打倒卡扎菲眼中的官僚主义，摧毁官僚机构，最后由人民直接掌权。随后，一场以夺权为中心的政治运动席卷利比亚全国。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人群冲上街头，袭击政府机构、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社及大学。卡扎菲要求每个村庄、大学、中小学和工厂必须组成人民委员会以贯彻他的“革命”计划。他威胁说，如果这一要求不能实现，他就辞职。5月7日全国各地建立起人民委员会，负责管理政府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村庄的一切事务。以后，卡扎菲又去班加西大学发表演讲，提出消灭阻碍利比亚进步的两个因素，即“资产阶级官僚”和提供“谬误学说”的供应商。6月2日，卡扎菲在电台发表广播演讲，命令人民夺的黎波里电台的权，号召人民进行“文化革命”，“撕毁一切不反映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教、社会主义和进步的进口书籍”。他说：“自由的公民们啊！接管电台，发挥你们自由人民电台的力量……让全世界都听到你们的声音吧！”卡扎菲在演讲结束时高呼：“一切权力归于人民！”于是，游行队伍冲塌电台夺了权，并将其更名为“人民革命电台”。“文化革命”的结果是大量被认为与利比亚革命、伊斯兰教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精神相抵触的图书遭焚毁，1800多个人民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的政府机构、石油公司和其他私人企业建立起来，甚至外国石油公司的

利比亚职工也成立了人民委员会。这些人民委员会对数千名官员进行了罢免、降职或调职处分。实际上，权力仍掌握在革命指挥委员会手中，人民委员会的任何决定在做出前必须报革命指挥委员会批准，而且人民委员会无权过问“与国家有重大关系”的领域，如石油工业政策等。人民委员会的权力大部分控制在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成员手中。同时，由于“文化革命”打乱了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引起整个社会的混乱，利比亚政局出现动荡，革命指挥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反对“文化革命”所带来的无政府状态，卡扎菲又一次提出辞呈以示抗议。卡扎菲出走国外 3 个星期后，在他的革命伙伴劝说下收回辞呈，回国继续担任利比亚领导人，“文化革命”则悄悄收场。

1974 年 4 月 3 日，利比亚革命指挥委员会颁布法令，宣布根据卡扎菲的“世界第三理论”重新改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使其更适合于利比亚社会主义发展需要。法令规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是一个全民政治组织，负责审查、监督和指导各级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卡扎菲仍担任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主席。同时，革命指挥委员会重申对其他一切政党的禁令。根据该禁令，如果有人试图在利比亚建立或加入其他政党，就会被认为是利比亚的革命的挑战，将被处以极刑。

1975 年起，卡扎菲又开始号召群众夺权，在利比亚全国按行政区域建立了 170 个基层人民大会的人民委员会，但这次权力结构的改造并未触及中央政府机构的职能，卡扎菲发动群众在全国范围内就政权分配问题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讲座。1976 年 11 月举行总人民大会第一次会议。总人民大会是利比亚最高权力机构，负责讨论和决定有关法令、预算、对外政策、缔结条约等。1977 年 3 月，卡扎菲在总人民大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人民大会总秘书处（该机构取代了革命指挥

委员会的职权)首任秘书长,并辞去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同时,利比亚发表《人民权力宣言》,宣布将国名由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更改为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1986年又改称大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民众国)。宣言规定《古兰经》为利比亚新的社会法典,人民直接行使权力是民众国政治制度的基础。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被撤销。根据《人民权力宣言》,总人民委员会行使中央政府的职能,对总人民大会负责。另外,利比亚建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负责对人民进行教育和政治指导。至此,卡扎菲完成了“人民政权”的建设。1979年3月,卡扎菲辞去总人民大会总秘书处秘书长之职,以“九·一”革命领导人名义保留利比亚领袖地位。此后,总人民大会不再设秘书处秘书长职务,而是代之以秘书处秘书之职。

2. 推行激进的国有化政策,建立清一色的国营企业。

卡扎菲执政后,开始采取措施摆脱外国资本对利比亚经济的控制,实行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利比亚政府首先把外国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收归国有。1970年,卡扎菲颁布法令,把革命以前建立的利比亚石油总公司更名为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此时的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的产量仅占利比亚石油总产量的0.33%。1971年6月,从美国一家小石油公司被收归国有开始,利比亚着手实施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即通过全部或部分购买股份的方式将外国石油公司国有化,这一过程于1976年3月完成。然后,利比亚又对外国资本经营的交通运输、外贸公司、旅游业等部门,甚至小型的作坊式企业实行了国有化政策。到1982年10月,利比亚的石油 $\frac{2}{3}$ 由本国独立开采, $\frac{1}{3}$ 由国家与外国公司合资开采。利比亚国家在炼油工业和石化工业企业的股份中所占比例为80%—87%。

通过国有化措施,利比亚奠定了国有经济的基础。在此基

基础上，利比亚实行了激进的国营化政策，国家不仅拥有企业的所有权，而且还直接进行经营。收归国有的银行、保险公司、外贸和石油工业企业，以及后来新建的企业都实行了国营化。1978 年利比亚实行“民众国”制度后，强调一切权力归人民，工人接管了企业。1981 年 3 月，卡扎菲宣布在一年之内取缔私营商店，由“人民经济委员会”接管后实行国营。在这一年，数以千计的小型商店被“人民市场”取代。最后，利比亚除农业部门尚有极少部分私人经营外，工商企业全部成为国营企业。

3. 实行计划经济，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通过实行国有化和石油提价政策，利比亚的财政收入迅速增加，石油收入由 1970 年的 13 亿美元猛增至 1981 年的 200 亿美元，利比亚利用这些巨额石油财富，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经济建设。利比亚的意图是利用石油美元奠定其工业基础，通过发展石油化工、能源、钢铁和其他工业减少国民经济对石油的信赖。最初，投资主要流向沿海农业和食品加工工业，但因缺乏发展规划和管理人才，只花掉其发展预算拨款的一半。1973 年开始，利比亚制定和实施了 1973—1975 年三年发展计划、1976—1980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1981—1985 年第二个五年计划、1986—1990 年第三个五年计划（由于国际油价下跌，资金困难，第三个五年计划一直未予实施）。卡扎菲实施上述发展计划的目的是：把石油开采限制在合理水平上，逐步改变单纯依赖石油的状况；推行经济多样化，大力发展农业和工业，建立稳定、平衡发展的经济；实现自给自足；重视内地和乡村的发展，缩小地区之间和居民之间的差距。

在上述几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利比亚更重视对非石油行业的投资，1970—1977 年的发展预算实际开支中，用于

非石油部门的开支达 94.2%。同时，这些计划也十分重视对农业的投入，1970—1979 年农业部门的投资达 73 亿美元，占发展总投资的 21.9%。对工业和能源交通业投资也占很大比重。

利比亚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主要是：改变了单纯依靠石油的状况，建成了食品、编织纺织、皮革、木材、造纸、化工、冶金、机械、电子等产业，初步实现经济多样化；工、农业和能源、交通业取得较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人均国民收入从 1969 年的 344 第纳尔增至 1980 年的 3000 多第纳尔（约 1.1 万美元）；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人民居住条件有了发展和改善。

4. 对外输出革命，致力于阿拉伯统一。

卡扎菲认为，阿拉伯统一是同阿拉伯民族命运攸关的大事。为了实现统一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目标，利比亚从 70 年代中后期开始先后同埃及、苏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叙利亚等国签订“统一”或“合并”协议。卡扎菲在 1980 年 1 月召开的利比亚总人民大会上宣称，利比亚下阶段革命的任务是使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剥削者完全失去作用”。他呼吁各国人民创建利比亚式的政权。此次大会在决议中提出“在财政和军事上继续支持阿拉伯人民”，输出革命被正式纳入利比亚外交政策。同年 9 月，卡扎菲在一次讲话中公然说：“我们要把我们的革命输出到所有地方，输出到反对我们的每一个国家。”利比亚成立了由卡扎菲亲自控制的“输出革命局”，负责物色对利比亚革命的同情者，制订革命输出的计划和措施。卡扎菲输出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北非和撒哈拉以南利比亚的邻国。该局甚至在一些阿拉伯国家收买亲利比亚的势力，出资培训，以便使这些人在他们各自的国家组成“人民委员

会”，发动政变夺权，最终实现与利比亚的统一和联合。利比亚还设立世界绿色学院和世界绿皮书研究中心，广揽门徒，宣传卡扎菲的“世界第三理论”。利比亚通过输出革命扩大影响的意图遭到有关国家的抵制。

（四）卡扎菲社会主义在新形势下的调整

80年代中期以来，利比亚的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困难日益加重，同时在国际上处境孤立。政治上，利比亚领导集团内部因政见分歧、部族矛盾和卡扎菲的专制而矛盾重重。经济上，由于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自8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下跌，利比亚石油收入大减少，经济发展受挫，人民生活受到消极影响。据统计，利比亚石油收入从1980年的220亿美元锐减至1987年的56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则由1980年的335亿美元降到1987年的247亿美元，人均收入随之由近万美元减少到6500美元。实行国有化、限制个体业者发展的过激政策，加上经济管理不善，限制了利比亚经济发展的活力，导致生产停滞、商品短缺、黑市猖獗、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困难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国内反对派加强反政府活动。外交上，由于卡扎菲对外输出革命、推行过激的“阿拉伯统一”政策，招致一些阿拉伯、非洲国家的不满，埃及、突尼斯、苏丹等国纷纷与之断交。美国等西方国家更是视卡扎菲为眼中钉，联合对利比亚实行经济制裁和封锁，并对其实施军事打击。特别是1986年利比亚遭美国空袭，又于1987年在乍得遭到军事上的惨败，这种形势迫使卡扎菲对其内外政策实行有限调整，以活跃经济、缓和矛盾、巩固政权。

1987年5月，卡扎菲开始在公开场合指责官僚主义和过激的国有化政策，承认“人民所有制没有带来成效”，并提到

要进行改革。同年9月，卡扎菲在讲话中称小型企业和一些商店可以进行有限的私有化，利比亚开始放松对私营企业的限制，同时放松对外贸的控制，对本国人和外国人放开投资领域。1988年3月，利比亚在举行第十四次总人民代表大会后，进入较大幅度的调整阶段。政治上实行有限度开放，宣布尊重和保护人权，释放政治犯，允许不同政见者回国。经济上把人民所有制改为集体所有制，允许发展私人企业，采取一定的生产激励措施。在社会管理方面，特别是在各级人民委员会中，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不断上升，军人数量则开始下降。外交上主动与地区国家修好，普遍改善同阿拉伯、非洲国家的关系，缓和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其偏激的“阿拉伯统一”政策也有所收敛。进入90年代，卡扎菲又宣布停止向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圣战组织提供财政支持。同时，卡扎菲还积极呼吁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对话，希望缓和双边关系，解除对利比亚的制裁。

从利比亚的实际情况看，卡扎菲在经济政策上调整幅度更大一些。除石化、钢铁、能源和军工产业仍由国家经营外，其他中、小型企业均改为集体所有制。利比亚还大力鼓励兴办合伙企业，关闭和整顿了一批无经济效益的工厂，允许私人经营服务业，把亏损的农场分给私人耕种，允许农民雇佣外籍劳工和产品自销，允许利比亚人自由选择职业，开放自由市场，扩大国营进出口公司的自主权。总的看来，调整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政治上创造了较为安定的社会气氛，卡扎菲的威信有所回升；经济开始复苏，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的程度上的保障；国际上利比亚的形象有所改善。

但是，卡扎菲的政策调整只是为摆脱困境而进行的局部调整，其“世界第三理论”的本质和核心如“人民政权”和“阿拉伯统一”仍是其在各种场合宣传的主要内容。如1988年9

月 1 日，卡扎菲在利比亚“九·一”革命纪念日庆祝活动的讲话中说，“革命委员会运动有责任激励所有地方的民众夺取政权、资源和武器，使世界向民众国制度转变。”1989 年 2 月，利比亚加入马格里布联盟后，卡扎菲提出建立包括马里、吉布提、也门、阿曼在内的“海岸联邦”，呼吁取消人为的边界，立即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利比亚还同苏丹签订一体化协定，主张利比亚、埃及、苏丹 3 国合并。同年 3 月，卡扎菲在总人民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的讲话中大谈“民众国制度”的优越性，鼓励世界各地人民都成立民众国。同年 6 月 30 日，卡扎菲对黎巴嫩《事件》周刊记者说，“人民委员会的尝试是一个崭新的世界的基石。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难于对人民的权力机构作出评价。这是全世界的一个试验的开端。这个试验就是怎样建立民众制度。”1990 年 3 月，卡扎菲在总人民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宣传当今世界朝着“民众国制度”转化，呼吁尽早实现阿拉伯统一。

90 年代以来，利比亚继续调整对外政策。1992 年 3 月，美国利用“洛克比空难”事件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对利比亚实施航空、军事、外交制裁的 748 号决议。1993 年 11 月，安理会又通过了加重制裁、冻结利比亚的海外资产、禁止向利比亚出口炼油设备的 883 号决议。在国际制裁下，利比亚石油收入逐年下降，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外汇储备下降，物价上涨，经济出现滑坡。为了稳定政局，利比亚一方面加强内部整顿，经济上进一步采取宽松政策，以减轻制裁带来的困难；另一方面在国际上积极寻求以和平谈判和对话方式解决危机。利比亚的举措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许多发展中国家及马格里布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非统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和不结盟运动均表示支持利比亚，西欧国家虽不同程度地响

应美国对利比亚制裁的呼吁，但从其自身的利益考虑，仍继续发展同利比亚的经贸关系，反对加重制裁。

下：“成功的乌托邦” ——以色列的“基布兹”

基布兹（Kibbutz）是以色列特有的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在希伯来语中意为“集体定居点”。基布兹产生于本世纪初，是由一些受到过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犹太移民根据民主、平等、公有等原则建立起来的。基布兹本质上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产物，并为犹太复国运动服务，但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采用了一些社会主义的主张和原则，被认为是一种早期的社会主义尝试，誉为“成功的乌托邦”，受到世人的注目。

一、“共产主义村社”基布兹的 创立与发展

历史上，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共同聚居地。公元前13世纪，犹太人的远祖古代闪族的支脉希伯来人开始从阿拉伯半岛移居巴勒斯坦，并曾建立过以色列王国（公元前922—722年）和犹太王国（公元前922—586年）。其后，犹太人先后受到过亚述、巴比伦和波斯的统治。公元前63年，

罗马帝国征服巴勒斯坦，先后 3 次残酷镇压犹太人的大规模反抗运动，屠杀犹太人 100 多万，侥幸生存下来的大部分犹太人则被逐出巴勒斯坦，流落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从此沦为没有自己国土的民族。公元 7 世纪，巴勒斯坦并入阿拉伯帝国版图，其后该地绝大多数居民为阿拉伯人。在 2000 多年的漫长历史中，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备受歧视、排挤和迫害。因此，返回先祖世居的土地，重建自己的国家，就成为犹太人世代代的梦想。

19 世纪末叶，欧洲犹太人开始兴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他们鼓吹犹太人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应该回到巴勒斯坦重建国家。1897 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举行代表大会，成立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英、美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支持和扶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17 年 11 月 2 日，英国政府在美国同意下发表著名的“贝尔福宣言”，公开宣称“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1918 年，巴勒斯坦被英国占领，不久沦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在此后的近 30 年中，在英国殖民当局的支持和鼓励下，大批犹太人从世界各地陆续移居巴勒斯坦。到 1948 年以色列建国，定居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已由原来的 5 万多人猛增至 70 多万，占巴勒斯坦地区总人口的 1/3。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本世纪初一批来自东欧的犹太青年怀着复国的理念返回他们认定的故土，在巴勒斯坦这片贫瘠荒凉的土地上创建了第一个被称为基布兹的集体定居点。这些基布兹的开拓者同其他犹太移民不同的是，他们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因此，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人人劳动、民主平等的理想社会。他们利用“犹太民族基金会”提供的资金，从当地阿拉伯

人手中购买一片片荒地，进行移民安置和开发，开始了基布兹创业的艰难历程。

最早的基布兹于1910年诞生在今天以色列北部的加利利湖畔。由于基布兹是一种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原则，融合了集体力量和智慧的新型社会组织，在凝聚犹太人社会力量和应付恶劣的人文自然条件方面比个体开发具有极大优势，因此，它一问世便显示出勃勃生机，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成为犹太移民效仿的榜样。从此，一个个基布兹相继建立起来，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已发展到150多个。目前，以色列全国共有270多个基布兹，每个基布兹平均有100户，拥有土地500公顷，全国基布兹成员约12万多人，占全国人口的3%。其农业总产量和农产品出口占全国的40%以上，其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基布兹在以色列立国前和建国初期，在移民、定居、防务和农业开发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以色列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建国后，又继续致力于以色列的农业发展、经济建设和国家自立，成为以色列生存与发展的强大支柱。直到70年代，以色列历届内阁成员中，有1/3是基布兹成员或曾是基布兹成员，甚至一些总统和总理也来自基布兹成员，如开国元勋本·古里安、女总理梅厄夫人、国防部长达扬等。梅厄夫人说过，如果没有基布兹，很难想象以色列会是什么样子。有人甚至断言，没有基布兹，就不会有今天的以色列，基布兹是民族复兴的基石。

二、基布兹的主要特点

基布兹集生产、生活和社会等事务于一身，既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社会经济结构，也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基布兹的创建者在建立和发展基布兹的过程中，基于共同的信念和根据当时所处的社会及自然环境，确立了一系列的指导和运作原则，形成了基布兹的鲜明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1. 高度的公有制。

基布兹创建时利用“犹太民族基金”购买的土地为公有土地，供犹太移民共同使用。以色列建国后，政府将这些土地收归国有，由基布兹以极低的租金向国家租赁使用，租期 49 年，期满续租。基布兹内的一切生产资料，以及文化、教育、医疗、娱乐等设施全部为公共所有。基布兹成员的住宅、家具、家用电器及其他生活资料也全部由集体供给，个人基本上没有私有财产。如成员要求退出基布兹，只能带走自己为数不多的私人用品，生产资料、服务设施、住宅、活动资金等公有财产一律不得携离，基布兹之间也不允许搞平调。

2. 统一的民主管理体制。

在基布兹里，凡集体事务均实行民主管理，一切政治、经济、社会事务都对成员公开。基布兹的最高权力和决策机构为成员大会，由该基布兹的全体成员参加，通常每星期举行一次。大会主要讨论和决定基布兹的发展规划、经营决策及其他社会活动；选举和罢免各级干部；审批预算和决算；吸收或开除成员，等等。大会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和一人一票制，一切议案均需获得 2/3 赞成票方能通过生效。成员大会下设管

理委员会，作为基布兹的核心领导和最高管理机构，负责主持基布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教、治安和民事等日常工作。管委会由全体成员选举产生，每年改选一次。除管委会外，还设有若干专业委员会，如生产委员会、计划委员会、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等，有的还设有住房、治安、青年、老年、保健等工作机构。这些专门委员会分别负责社区内的生产经营、产品销售、教育培训、文化娱乐、社会治安等具体事务。

3. 严格的平等原则。

在基布兹里，从管理人员到普通的勤杂工，所有成员权利一律平等。管委会及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均通过选举产生，并定期在成员中轮换。他们是全体成员的公仆，一旦选上，只有尽职服务的义务，而不享有任何个人的特权。他们担负的管理工作是一种无偿的业余服务，不领取任何额外的报酬，仅仅视之作为一种信任和荣誉。在基布兹里，劳动是人人自觉遵守的社会准则，凡具备劳动能力的成员均需参加劳动。劳动只有专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成员定期在农业、工业、商业、文教卫生、社区服务等领域进行轮换，即使各管理机构的委员也要另外承担一份岗位劳动。每个成员凭自觉，没有奖励和惩罚。一些基布兹还开办没有劳动时间和工作量限制的企业，退休老人可以自愿到这里工作，以满足其劳动要求和调剂生活。基布兹反对雇工剥削，一切工作均由基布兹成员承担，但近几年因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出现劳动力短缺，才开始允许雇工劳动。

4. 按需分配制度。

基布兹内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这是基布兹同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截然不同的一个显著特点。基布兹成员从生到死的一切需求，如教育、就业、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均由

其所在基布兹承担，衣、食、住、行等无偿供给。基布兹成员不分职务高低、工种差别和贡献大小，待遇全部一样。所有人都免费在公共食堂就餐，家用电器等按需要和可能作为公共财产按计划配给，衣着按规定的数量、质量、规格，由集体依照成员提出的款式和花色品种统一制作或购买，或由集体发钱，个人选购。基布兹内不实行工资制，每人定期发给少数零用钱，供个人自由支配。基布兹成员在基布兹以外的收益，如上学、做工等所得报酬要如数上交集体，个人不得截留。

5. 集体生活方式。

基布兹是由移民组合建立的，每一个基布兹实际上就是一个移民村。在基布兹的初创时期，由于以色列尚未立国，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处于阿拉伯人控制之下，加上当地自然条件恶劣，大多为荒漠和半荒漠地区，因此，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基布兹的创建者们选择了一种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方式。他们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和荒芜贫瘠的土地上屯垦戍边，实行集体劳动、集体生活、集体消费。虽然经过数十年的历史变迁，以色列已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但基布兹的这种生活方式一直沿袭至今。在现代的基布兹里，都分别建有生产区和生活区。生活区中心，通常有公共食堂和俱乐部两大建筑，四周是住宅、托儿所、幼儿园、青少年集体宿舍和教室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基布兹的住宅多为别墅式建筑，以家庭为单位居住，每户一个单元，约 50 平方米。子女住集体宿舍，结婚后单独分配住房。各家均在公共食堂就餐，晚上则到俱乐部开会、娱乐或聊天，文化生活十分丰富。在基布兹，孩子不属于私有财产，他们一生下来便送到育婴室，由专人照料教养，从小即过着集体生活。父母下工后可以去探望孩子，假日也可以把孩子接回家去。孩子从出生到高中毕业，全部抚养、教育费

都由基布兹承担。年满 18 岁后，都要服兵役，男 3 年，女 2 年。服完兵役，或继续读书，或回基布兹劳动。退休老人白天到敬老院，晚上由子女接回家，残疾和孤寡老人则可以长住敬老院，由那里的工作人员照料，以安度晚年。

三、基布兹的经济生活

基布兹最初以农业为主，大多数人从事垦荒种植和畜牧工作。由于基布兹组织严密，资金充足，人才济济，采取先进的耕作技术，所以很快就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把一片片昔日的荒漠变成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绿洲，为基布兹日后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随着社会和科技的飞速发展，基布兹早先实行的自给自足式的半自然经济形态和单一的农业经营模式受到冲击，特别是受到土地狭小和水资源匮乏的严重制约，仅靠农业已难以满足基布兹的发展需要。为确保基布兹的发展，提高基布兹成员的生活水平，各基布兹利用其雄厚的资金积累和统一组织管理的优势，大力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实行以工补农，以工养农，走上了多种经营的道路。

基布兹的工业企业主要为两大类，一类是农副产品深加工企业，另一类是高新技术产业，企业的现代化水平相当高。目前，工业已成为基布兹经济的最大支柱，远远超出农业，占其总产值的 80%。此外，基布兹近几年第三产业也发展迅速，兴办了一批饭店、宾馆、度假村、会议中心、培训中心等旅游服务设施。

基布兹的生产、经营和销售等由集体统一管理和安排。基

布兹作为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其生产经营主要按照计划执行。生产计划是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政府及各种专业协会的配额以及自身的生产能力来制订的。基布兹生产经营所需的各种要素,基本依靠社会服务组织和市场提供,其中农业方面的主要渠道是区域合作组织和专业组织。这些区域合作组织由多家基布兹和莫沙夫(合作社)为适应市场竞争而联合组建的。它们通过其下属各种独立核算的企业为农民提供农业加工、经济作物开发、良种培育或采购、数据处理、财政保障、管理手段等多项服务。基布兹的农产品除自给外,其余全部推向市场,国内销售部分由全国农产品内销组织负责收购、加工和批发销售,占农产品总量的 70%。外销部分则由农产品出口组织提供出口服务。

基布兹重视科研和高新技术的运用,将其作为基布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基布兹的企业除依靠自身力量进行必要的研究和技改外,还同国内有关大专院校及科研机构建立了全面的合作关系,通过它们获取各种信息、技术成果和经营管理方法。这在农业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基布兹作为全国农业劳动者联合组织的成员,通过该组织同以色列最重要的农业研究组织(ARO)和农业部下属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局,以及魏茨曼研究院、希伯莱大学农学院、本·古里安大学应用研究所等保持密切的联系和配合。农业劳动者联合组织每年向基布兹等会员单位征收产品收入的 0.6% 的会费,其中一部分划拨给有关研究组织作研究经费。技术推广服务局将最新研究试验成果,通过其下属的地方推广办公室进行传授推广,并指派专门技术人员同基布兹等基层生产单位分包联系,进行技术传授、指导和咨询。

经过数十年的不断探索、改革和发展,基布兹打破了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实现了产业化的转变,由原来封闭式的独立

经营发展为社会化的生产经营，使之成为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化和科技密集型的高效农业，对基布兹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基布兹面临的困难与前景

以色列今天的基布兹，是3代犹太人智慧和奋斗的结晶。从第一个基布兹呱呱坠地到今天，基布兹已走过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在这漫长的历史旅途中，基布兹不断发展壮大，展示出独特的风采和魅力，闪现了璀璨夺目的光辉。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特别是商品经济和信息社会的飞速发展，基布兹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露出了一副“垂垂老矣”的龙钟之态。目前，基布兹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是：

1. 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基布兹的创业者虽然在建立基布兹的过程中采用了一些社会主义因素，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基布兹运动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运动。由于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这就决定了基布兹的先天不足，它只是一种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乌托邦”。实际上，基布兹主要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产物，其目标是实现和弘扬犹太人世代为之奋斗的复国理想。因此可以说，基布兹是犹太复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相融合的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它是以色列所特有的，它只能在以色列的独特环境下获取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以色列建国前，每一个基布兹就是一个独立的社会，没有国家这一因素的制约，这是基布兹发展的黄金时期。但以色列建国后，基布兹被置于国家的统一管治下，基布兹所奉行的理念和原则与以色列不断完善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

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显露。这是造成基布兹在以色列建国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2. 公有化程度太高。由于基布兹的一切几乎都属集体所有，其成员不仅没有生产资料，而且连生活资料也是由集体统一配给，人们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这种体制在基布兹创立初期对增强凝聚力，应付当时严酷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它对生产力的发展反而起了一种束缚的作用。同时，由此带来的管理费用太高、积累速度缓慢、人们生活比较呆板等问题也日益显露。当以个体经济为主的莫沙夫和私营农场迅速发展，纷纷成为富翁时，基布兹成员的失落感不断增大，特别是年青一代的私有化欲望急剧膨胀，基布兹体制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正在降低。

3. 管理体制滞后。基布兹实行较严格的计划生产和集中管理，各生产企业和成员没有自我决策权，只能听命于管委会的统一指挥。这种管理模式使基布兹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减低了基布兹的竞争力，也不利于各生产企业和成员发挥其创造性和主动性。

4. 分配和福利制度不合理。基布兹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劳动不计报酬，没有工资，没有奖惩，人人享受同样的待遇，个人在知识、技能、贡献等方面的差别不能体现在劳动报酬上。由于没有必要的激励机制，每个人只能靠觉悟、热情和责任感来工作。这种大锅饭式的体制难以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也不利于稳定基布兹的职工队伍。特别是一些年轻人物质享受欲望增大，希望能有更多的个人财富来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因而有些人将其额外收入不再上交，而是偷偷截留归己。基布兹坚持数十年的分配和福利制度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

5. 生活方式过于单调。基布兹成员聚居在一起，远离尘嚣，住一样的房子，吃一样的饭菜，周而复始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半军事化的封闭生活。虽然基布兹也有自己的娱乐设施，文化生活比较丰富，但同繁华发达、多姿多彩的大城市相比仍远为逊色。因此，一些经不起大城市诱惑的年轻人开始厌恶基布兹兵营式的生活方式，纷纷离开基布兹另谋出路。由于越来越多的青年出走，基布兹后续劳动力资源不足的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来。

总的看来，基布兹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壮大，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显示了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随着内外条件的变化，基布兹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如何革故鼎新，兴利除弊，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保持其旺盛的发展活力，避免因僵化而导致衰落，这是基布兹急待解决的课题。特别是如何教育在繁荣富裕环境中出生和成长的年轻一代，发扬光大老一代创业者的信念和传统，更是决定基布兹前途和命运的关键。

第18章

多党制冲击后的黑非洲社会主义

黑非洲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薄弱的地区之一。曾参加过1960年莫斯科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黑非洲地区政党只有4个，即南非共产党、留尼汪共产党、莱索托共产党和尼日利亚社会主义工农党。冷战期间，除留尼汪共产党外，大多处于非法状态，活动条件极为困难。由于种种原因，尼日利亚社会主义工农党等后来已不复存在。但是黑非洲各类名目的“社会主义”却非常活跃。50—60年代风起云涌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加速了殖民体系的崩溃。在此基础上新独立的国家，一般拒绝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纷纷选择了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在非洲，自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在60年代有13个，70年代增至20个，占非洲国家总数（50个）的1/3以上。在60年代末，特别是70年代，还出现了6个自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之后，非洲这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究竟怎样了？

上：共产主义政党的新情况

苏东剧变后，黑非洲共产主义运动虽然也遭受严重冲击，但总的说来，还有一些发展。原有的共产党在新的条件下，获得了合法地位，力量和影响扩大。南非共的党员人数已由1990年的2000多人发展到1995年的75603人，目前已接近8万人；南非共1994年大选中，有50多名党员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政府中多位部长、副部长和数位省长也来自南非共。留尼汪共产党有党员近万，是留尼汪最大的参政党，影响较前略有扩大。莱索托共产党获得合法地位并成为本国有一定影响的反对党。塞内加尔劳动党和贝宁共产党已成为合法政党，但影响不大。此外，还新出现了莫桑比克共产党、安哥拉共产党和科特迪瓦共产党等，但均为人数极少的小组织。

马克思主义20世纪初才传入非洲。1921年7月工人阶级比较集中的南非成立了撒哈拉以南非洲（以下简称黑非洲）第一个共产党——南非的共产党（1953年改称南非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及其影响的扩大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黑非洲又相继出现了一些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但是在冷战时期，这些政党和组织总的说来数量不多、人数很少，而且大多处于非法状态。

冷战结束给黑非洲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影响既有消极方面，也有积极的方面。消极方面是，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遇到严重挫折，使本来就弱小的黑非洲共产主义运动面临更为不利的国际环境。积极的方面是，大环境的变化使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于 1990 年解除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共产党禁令，使其成为合法政党。就整个黑非洲看，冷战结束后西方乘机以“援助”同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挂钩等为手段，在非洲推行多党制，一方面使原本就困难重重的黑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受到严重冲击；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如此，又改善了某些国家共产党活动的条件。迄今，南非共产党同非国大和南非工会大会一起在非国大执政联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力量继续上升。留尼汪共产党一直保持着重要参政党地位，影响较前略有扩大。莱索托共产党获得合法地位并成为本国有一定影响的反对党。塞内加尔劳动党和贝宁共产党已成为合法政党，但影响不大。此外，还新出现了莫桑比克共产党、安哥拉共产党和科特迪瓦共产党等，但均为人数极少的小组织。就目前黑非洲共产党总的状况看，仍是数量少，力量弱，发展极不平衡，但追求进步和向往社会主义者不乏其人。黑非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必将是漫长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和充满希望的。

一、南非共产党的发展

(一) 历史概述

南非共和国位于非洲大陆最南端，经济发展水平在非洲首屈一指，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非的 1/3。

南非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30日，为非洲成立时间最早的共产党。南非共产党原名为“南非的共产党”，1953年改现名。它最初由国际社会主义者联盟（南非）、开普敦社会主义联合会、开普敦共产党、开普敦犹太人社会主义学会、约翰内斯堡犹太人社会主义学会、德班马克思主义俱乐部等组织合并而成，其宗旨为“在南非和全世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打倒资本家阶级、建立工人国家”。其党章称“接受共产国际的‘21点’条件”，成立后不久即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在南非的支部。

南非共成立后即以非暴力的、合法的形式开展争取工人权益和经济社会平等权利的斗争。1924年12月，南非共三大提出“要重视吸收土著工人（黑人），并在他们中间积极开展工人运动”。1927年，南非共开始同主要民族主义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合作，其影响和力量逐步扩大，至1928年，党员人数上升至1750人，其中黑人1600人。一些党员还担任了工商业工会联合会等工会组织的重要领导职务。

1928年底至1929年初，南非共召开代表会议，会上通过的纲领指出，党的工作重心是“动员广大黑人群众，推翻南非的资本主义制度，争取各种族间完全平等的地位”。30年代初，南非共在黑人中发起“烧毁通行证”运动，抗议白人当局颁布的《通行证法》等不平等法律，运动波及到南非许多省区，引起较大反响。

1930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信南非共，要求将南非共建设成为革命性的群众党，并称南非共领导层内有“改良主义”分子。同年12月，南非共召开会议，通过“建立列宁主义政党”的决议，称党的主要威胁来自“党内右翼分子”，提出按照列宁主义路线对党进行改组。1931年9月，南非共政

政局宣布将数十位各级领导人和大批党员开除出党，使党的力量大为削弱。数年后，南非共承认，“1931年的清洗是以极端武断和非民主的方式进行的，给党造成了巨大损失。”1936年，南非共一批党员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协助西班牙反击德、意干涉及反政府军。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南非共指示全党，加入南非军队，抗击意大利入侵非洲国家及纳粹德国的扩张。

40年代，南非共在黑人中开展大规模的工会运动，其中尤以1946年领导发动的矿工大罢工最为著名，党的力量和影响迅速扩大。

1950年，南非当局颁布《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宣布南非共为非法。南非共被迫转入地下，其领导人以个人身份担任非国大等民族主义政党和团体的领导职务。

1955年5月，南非共参与制定由非国大倡议的《自由宪章》。1960年3月，南非黑人举行反对《通行证法》的大规模示威游行，遭当局血腥镇压，酿成震惊世界的“沙佩维尔惨案”，南非共遂公开宣布党的存在，并号召以武装斗争推翻南非反动政权。1961年2月，南非共同非国大共同组织军事组织“民族之矛”。此后不久，南非共遭当局镇压，许多党员被捕入狱，主要领导人流亡国外，建立了南非共国外组织，继续领导国内斗争。

1990年2月，南非当局解除对民族解放政党和组织的禁令，南非共恢复合法地位，领导机构迁回国内，重新开始进行合法斗争。在随后的几年里，南非共与非国大等一道参加了同白人当局的多党制宪谈判，并同南非最大的工会组织南非工会大会结成政治联盟，成为南非最具影响的政治力量之一。1993年4月，南非共总书记哈尼被白人右翼分子杀害，制宪谈判一

度终止。同年11月，南非共全国主席斯洛沃起草的《谈判的战略目标》在非国大全国执委会会议上获得通过，该文件对谈判战略做了重大调整。

1994年4月27日，南非举行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南非共在非国大旗帜下参选，有50余名党员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其中3人后来被任命为内阁部长。

（二）对苏东剧变的反应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1. 对苏东剧变的反应。

80年代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南非共迅速做出反应。1990年1月，南非共总书记斯洛沃经党领导层授权发表了《社会主义失败了吗？》一文，详细阐述了南非共对东欧局势的看法。

该文认真分析了东欧剧变的原因，指出东欧剧变并非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的失败，东欧国家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后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并未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而是采取了“斯大林主义的”一党专制制度，在经济上无视市场规律，以简单的行政命令管理经济活动；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东欧的剧变证明了一点，即：在专制环境下不可能维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它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损失不容低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应从中汲取教训。

1991年苏联解体，南非共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自己迷失了方向，加入到诋毁列宁等革命家的大合唱中，苏共的解散、苏联的解体是历史的耻辱。俄罗斯人民已经开始感受到资本主义的残酷，有朝一日将“无法容忍追权逐利的官僚们随意践踏十月革命的成果和成就”。

南非共指出，苏东剧变象征着两极世界的结束，但并非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亦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和问题，斗争远未结束。

2.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南非共认为，社会主义是处于由资本主义和其他建立在阶级压迫和剥削基础上的制度向完全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过程中的一种社会制度。南非共对社会主义仍充满信心，因为她代表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合理、最公正和最民主的一种形式。人类只有在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人类的资源只有在实现公有制和民主管理后才能够真正为整个人类的利益服务；只有在一个以人为本而不是唯利是图的社会中，个人才能得以全面发展，每个人的聪明才智也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南非共认为，社会主义的三大核心特征是民主、平等和社会化。社会主义意味着将民主深入、彻底地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且不排除人民的基本权利，如一人一票、定期多党选举、司法独立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努力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收入、财富、权利和机会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同时也要有社会分工，增加可供大多数人选择的余地；社会主义也意味着经济主导部分的社会化，其重点不在于仅在所有制的法律形式上的简单集中，而是强调真正赋予工人阶级经济权利；法律上的所有制形式是实现社会化的要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要素，经济的社会化需包含各种不同的社会所有制形式，即占主导地位的多种形式的公有制部门、相当规模的合作制部门和主要由中小企业组成的私营部门；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与计划同样重要，市场在经济中发挥重要的调节和分配作用，但不应拥有最终决定权。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应全

部或大部分实行非商品化，其价格和供应情况不应只由市场力量来决定。

（三）现行理论和政策

南非共党章确认，该党以马列主义原则为指导。南非共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其基本原理及对历史进程的基本看法仍是强有力的理论武器，但并不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说过的每字每句都是真理，他们也并非一贯正确，其预言也不总是准确无误。例如列宁有关资本主义将在十月革命后在世界范围内瓦解的预言就是建立在不正确的前提上的，即在当时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体系处于不可逆转的危机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全面发展的障碍；又如，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论述过于简单化，且低估了工人阶级斗争在创建和捍卫资本主义国家各方面真正民主文化的过程中所取得的历史成就，这一文化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实际应继续弘扬，而不是寿终正寝。

南非共同时强调，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严重歪曲现象根源不在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科学的基本原则，应当从我们自身找出问题所在，而不是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们描绘出了社会主义的理想，指出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过渡性质及向社会发展新阶段过渡的历史必要性，对未来将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制度的结构只做了总体上的、根本原则方面的论述，但从未规定出新社会发展的具体形式和机制。

南非共党章称，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在南非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过渡阶段，党的近期目标是争取非洲人的

民族解放，摧毁种族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权力，进行以建立人民政权的统一国家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民主革命，为此要参与和加强以非国大为首的解放阵线；在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中间广泛宣传党的基本思想；与种族主义、部族主义、性别歧视、地方主义、沙文主义及各种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作斗争；发扬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促进南非及全世界人民的团结。在党的九大上，南非共提出“未来属于社会主义，建设自今日始！”的口号。

南非共在政治上主张多党民主，强调发挥党的先锋队作用；在经济上主张实行混合经济，但同时要充分保护工人阶级的合法权益，使其掌握社会、经济变革的主动权。

（四）组织状况和发展趋势

1. 实际力量和社会影响。

南非共近年来实现了由非法政党向合法政党、由在野党向重要参政党的两大飞跃，在南非非种族化、和平民主变革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党的队伍和影响不断扩大。1990年，南非共恢复合法地位时党员人数仅为2000余人，1991年八大时即增加到25000人，1995年九大时猛增至75603人。目前，南非共党员人数已近8万，在各省、地区、选区都建立健全了党的组织机构。

南非共是南非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在以非国大为首的“三方联盟”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批党员都担任了非国大或南非工会大会的重要领导职务，非国大领导层中有近1/3是南非共党员。政府多位部长、副部长和数位省长也来自南非共。

2. 组织机构。

南非共党章规定，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为党的代表大会，每3年召开一次。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和5位主要领导人（总书记、副书记、全国主席、全国副主席及全国司库），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由5位主要领导人、各省组织书记及由大会选举产生的另外25位委员组成，负责制定党的大政方针。政治局由5位主要领导人及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另外8位成员组成，是党的日常工作机构。南非共在各省、地区、选区设有委员会或执行委员会，支部为基层组织，有25—100名党员的地方即可成立支部。

3. 南非共的发展趋势。

南非共在长期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经验，为非国大等提供了理论支持，输送了大批领导干部，特别是在帮助非国大调整斗争方针和方式方面曾发挥过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她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组织问题上求质不求量。

1994年新南非诞生后，国内形势和工作重心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南非共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这就要求南非共适时对其工作方式、方法做出相应的调整，在党和工人阶级利益与国家发展实际需要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真正发挥在南非变革中的先锋队作用。同时，在三方联盟之间的关系上，仍需各方进行更好地协调和磋商，特别是在事关大政方针的原则问题上，如何做到既立场坚定又灵活务实，而不受外界舆论的影响，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在三方联盟的问题上，南非共和其他两组织领导层有较为一致的共识，即该联盟是历史形成的，短时间内无“分家”的必要。1997年12月非国大五十大上重申了这一点。南非共也一直坚持这一观点。另一方面，由于长远目标各异，南非共亦强调“独立性”的重要地位，指出“南非共

并不是寄生于其他组织，而是有其明确的目标和纲领，社会主义不是一项秘密的议程”。因此，南非共的前途实则取决于自身的发展和对形势的正确判断，而不会仅仅维系于三方联盟的存在与否。

南非共目前仍是非洲大陆上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政党，历史贡献不容否认，其力量仍处于上升阶段。在冷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南非共结合本国实际情况，以其较为先进的理论和积极务实的政策实践着自己的理想，并将继续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

附：总书记恩夸库拉简历

查尔斯·恩夸库拉，1942年生于南非开普省东部一贫苦家庭。高中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70年代末投身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多次被南非当局拘捕。1983年开始参与非国大和南非共地下工作。1984年流亡国外。1985年正式加入南非共，后赴苏联和东德接受军事培训。1988年潜回南非，负责组建非国大地下政治和军事机构。1990年起，历任南非共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全国组织委员会召集人、南非共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1991年南非共八大上当选为总书记。1993年4月在南非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当选为总书记。1995年南非共九大上再次当选。1997年12月非国大五十大上当选为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

二、留尼汪共产党的新情况

留尼汪共产党是诞生在法国海外省留尼汪岛上的一个共产党组织。成立于1959年5月18日。现有党员近万名，是留尼汪最大的参政党之一。

(一) 历史概述

留尼汪岛是印度洋西部马斯克林群岛中最大的火山岛。1643年被法属东印度公司占领，1810年又被英国占领，5年后又将其交还法国。法国政府于1946年3月将其划为“海外省”。

19世纪初，留尼汪居民就开始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岛上少数知识分子先后成立了“人民阵线”小组和“民主与社会共和行动委员会”，发动群众为争取民主和自由进行斗争。1936年岛上产业工人举行了首次大罢工，掀起留尼汪人民反对剥削压迫的新高潮。二战前后，以雷蒙·维尔吉斯为代表的岛上进步人士秘密加入法国共产党，并在留岛成立了法共支部。留岛成为法国海外省后，留尼汪共产党在法共支持下成立了留尼汪省委组织，取名“留尼汪共产主义联盟”，直接受法共中央殖民部领导。1959年5月17—18日，留尼汪省委组织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征得法共中央同意后，大会决定成立留尼汪共产党，并将此次会议作为留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制定了《党章》；通过了以“内部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提纲草案》作为党的行动纲领；成立了党的机构；选举保罗·维尔吉斯为党的总书记。

留共在成立后的近20年时间里坚持主张在留尼汪实行自治，号召留尼汪人民肩负起管理自身事务的巨大责任。这一主张遭到法国政府和岛上右翼组织的强烈反对。留共机关报《证言报》多次被查封，留共领导人也因煽动“分裂国家”罪名被判刑。70年代后期留尼汪经济十分困难，社会问题严重，群众对自治已失去了往日的热情，留共影响明显减弱。1980年7月，留共五大确立今后的任务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提高党的战斗力；在谋求岛上人民民主自治的同时，大力发展留尼汪的社会、经济和文化。1981年，法国社会党在本土执政后在海外省实施“分权”政策，留共遂调整政策，于同年8月发布《留尼汪发展纲领》。在此基础上留共在1988年5月举行的法国国民议会选举期间进一步明确指出：“自治”口号已不能团结大多数留尼汪人了，而“平等”与“发展”才是大多数岛民所关心的问题。至此，留共把争取留岛人民享有同法国本土相同的权利和大力发展留岛的社会经济作为党的任务来抓，摒弃了“自治”主张。

（二）对苏东剧变的反应和对社会主义前途的认识

留共认为，原苏联、东欧各国的剧变是因为这些国家领导人所制定的政策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保罗·维尔吉斯在1991年9月回答记者采访时说，斯大林的错误在于他搞一党制，其理论是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阶级，而其他政治组织是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为此斯大林夸大阶级斗争，大搞压制政策；他还错误地把党的机构同国家机构划为等同，导致党政机构均处于瘫痪状态。苏东共产党国家的目前领导人都都犯有类似的错误，他们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和行为说成是共产主义的，而事实上他们是违背共产主义、偏离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他们

要为此负历史责任。

留共认为，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分析问题的方法；留共将忠实于马克思的理论和思想。但不应把他的著作当作宗教书刊来读，更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每句话都当作是永恒的真理。保罗·维尔吉斯说：我们的目标是争取真正的平等与发展，几千年来人类一直渴望平等自由，共产主义正是体现了这一渴望。一个社会越是不公正、不平等，人们就越是向往具有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不论在留尼汪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所有人——尤其是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剥削的人们——都抱有这一愿望。留共认为，东欧共产党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的结束。世界上所有共产党人都应该从东欧国家发生的偏差中吸取教训，避免将来犯同样的错误。

（三）现行理论和政策主张

留共认为，冷战后在一些国家推行的民主运动将使人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考虑对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方式，人们曾以为最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作出选择，而这种选择掩盖了另外一个实质问题，即全球文明问题。今天世界上 20% 的人掌握着大部分社会财富，这一西方式的文明无法在其他地区推广，因为西方文明存在的条件就是全球的不平等。留共还认为，南方国家帮助了北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前者流入后者的资金和资源远远超过后者向前者提供的“援助”，而发展中国家却被越来越沉重的债务和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压得透不过气来。这种不合理现象应该纠正。关于人权问题，保罗·维尔吉斯说：每每听到西方就人权问题大放厥词时，人们就会想到希腊人的不朽诗篇，他们站在由奴隶抬起的讲台上高谈人生哲理，这本身就是一大悲剧。人权问

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但至今仍有 80% 的人被剥夺了这一基本权利。

留共认为，留尼汪共产党是一个革新和现代的政党，是留尼汪未来的一支建设性力量。留共的目标是维护个人自由、逐步消除社会上存在的不公正现象。留共明确指出：目前留岛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主要问题是平等与发展问题。所谓平等，就是争取留岛公民与法国本土居民在各方面均享有同等权利。其中包括以下 3 个主要方面：（1）取消一切具有种族歧视性的法律法规。（2）要求增加各种生活补贴，使之与法国本土公民持平。（3）要求提高各行业最低保障工资和最低附加收入，提高失业救济金额，修改保险法等。此外在住房、就业、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等各方面也要求平等待遇。留共强调，根本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最终还取决于留岛自身的发展。为此，留共制订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领域的发展纲领。其近期发展目标是着力解决就业和培训问题，降低岛上近 40% 的失业率；设法解决住房紧缺问题，提出每年解决万人住房问题的 10 年规划。

（四）组织状况和发展趋势

由于留共在 70 年代末就调整政策，把党的工作中心放在争取平等权益和社会发展上，从而赢得广大群众的普遍支持。近 10 年来，留共影响稳中有升，选民队伍不断扩大。在 1988 年 5 月举行的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中，留共获得全岛 37% 的选票，赢得 5 个席位中的 2 席；在 1992 年 3 月举行的地区议会选举中，留共取得 45 个议席中的 9 席，并与左翼政党组成多数派，同时，保罗·维尔吉斯当选为第一副议长；在同年举行的省议会选举中，留共获得 43 个席位中的 13 席，成为省议会

中第一大党派。在 1994 年省议会改选后留共与社会党联合组成多数派，形成左翼力量首次控制省议会的局面；在 1995 年举行的市镇选举中，留共在 24 个市镇中赢得 6 个。1996 年，保罗·维尔吉斯当选法国参议院议员。在 1997 年 5 月举行的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中，留共获得岛上 5 席中的 3 席，打破了以往右翼占优势的态势。在 1998 年 3 月举行的地区选举中，以留共为首的“争取经济发展联盟”获得 31.94% 的选票，夺得总计 45 个议席中的 19 席，留共主席保罗·维尔吉斯当选为议长，这是留共首次赢得该职位。

留共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决策机构，每 4 年举行一次。中央机构设有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基层组织有区委、总支和支部。群众团体有工会组织、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党的机关报《证言报》创刊于 1944 年，现发行量为 6000 份。

1980 年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留共至今未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一般多在岛上各种选举期间提出自己的主张，组织较松散。维尔吉斯主席曾在 1991 年表示，每个党都应根据各自国家的情况确立其组织形式，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我们应以一种批评、积极的姿态去探索留共的组织形式，并使之既能锻炼培养我们党员和干部，又能适合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环境。现任主席保罗·维尔吉斯，法国参议院议员、地区议会议长。总书记艾里·霍阿罗，法国国民议会议员，省议会副议长。

留共长期立足留岛，不脱离岛内斗争，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她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本岛实际情况相结合，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及时调整政策，提出符合民意的新主张，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因而在留尼汪各派政治势力中，始终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苏东剧变、国际共

运遭受严重挫折期间，共产党在法国本土及其他海外省的力量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和影响，而留共却在岛上保持原有的地位，既坚持了马列主义原则，保留党的名称，又使其影响有所扩大，力量稳中有升。仅此一点，可说明留共在岛上的地位不容低估。看来，留共今后将继续以“平等与发展”口号团结岛上广大群众，并利用这一主张争取其他政治团体和组织的支持，从而继续发挥自身作用。然而，留尼汪与法国本土的经济环境和条件差距甚远，其发展规模、速度仍取决于政府拨款数额及财政预算，且岛上右翼势力仍很强大，势必会运用种种手段遏制留共影响。因此，留共要完全实现其政治主张和目标尚需作长期艰苦的努力。



留尼汪共产党主席保罗·维尔吉斯在一次会议上讲话。

附：党的主席保罗·维尔吉斯简历

1925 年生于泰国乌汶府，其父为留共创始人，其母越南人。40 年代加入法共，1954 年任法共留尼汪省委书记，1959

年留共成立，当选为总书记直至1993年2月。1956年当选法国国民议会议员，1966年法政府以“危害领土完整罪”将其关进监狱，不久又宣判无罪释放。1971年当选港口市市长，1979年和1984年连续当选欧洲议会议员，1983年当选地区议会副议长，1992年当选地区议会第一副议长，1993年2月担任留共中央主席，同年3月再次当选法国国民议会议员，1996年当选法参议院议员。

下：“非洲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

苏东剧变后，“非洲社会主义”的3大流派（非洲村社社会主义、非洲科学社会主义、非洲民主社会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在50—6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高潮时期，不少国家选择了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道路，多数是前两大流派的社会主义，即各种名称的非洲村社社会主义，或自称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社会主义”。到70年代，非洲自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有20个，占非洲国家总数的1/3以上。冷战结束后，非洲村社社会主义只剩坦桑尼亚一个国家没有完全放弃，但也有很大调整和变化；“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流派已基本销声匿迹了；而“民主社会主义”获得了长足发展。参加“社会民主政党联盟”的成员党已达30个，其中执政或参政的政党近20个。

“非洲社会主义”曾是非洲十分流行的民族主义思潮。它是“民族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它有两种含义。狭义上的“非洲社会主义”系指以非洲传统村社制度及其价值观念为基础的非洲村社社会主义，广义上的“非洲社会主义”系指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民族主义国家领导人提倡和奉行的各种社会主义的统称和泛指，即非洲的民族社会主义。本书是在广义上使用“非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

一、历史概述

非洲社会主义的思想萌芽于19世纪上半叶，随着本世纪50—60年代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这一思潮在非洲大陆上广为流行，并成为非洲民族主义者争取民族独立主张的一部分。独立后，非洲社会主义思潮又被许多国家领导人所接受并用于实践，从而成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70年代，随着葡属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和美苏争夺加剧，国际主义思潮向非洲进一步扩展，非洲社会主义步入其兴盛时期，宣称奉行社会主义的非洲国家由60年代初的13个增至20个，约占当时非洲独立国家（50个）的1/3以上。8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由于受到西方私有化和多党民主这两股风潮的冲击，非洲社会主义逐渐走向低落。迄今只有一个流派即非洲民主社会主义仍保持着发展势头，另有极个别国家虽未公开宣布放弃社会主义，但也未再大张旗鼓地提倡和宣传。

非洲社会主义作为思想体系和发展模式都不是单一性质的，而是具有多种形式和不同流派。如按其基本特征，大致可分为3种类型：非洲村社社会主义、非洲民主社会主义和非洲

科学社会主义。现将这3种类型简述如下：

1. 村社社会主义：

即狭义或本来意义上的“非洲社会主义”，是一种以非洲传统村社价值标准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流派，曾在村社制残余大量存在的黑非洲地区广泛流行，其主要代表是坦桑尼亚的“乌贾马社会主义”和赞比亚的“人道社会主义”。这一流派的基本特征是：（1）以非洲传统村社制原则作为其思想理论基础；（2）实行“全民党”领导的一党制；（3）主张优先发展农业和大力推行农业集体化；（4）致力于泛非主义，促进非洲的团结和统一。

非洲的村社社会主义起源于非洲本土。本世纪初，这一流派的思想就已开始萌芽。当时西非一些早期的民族主义者认为，非洲的传统村社制度是一种非洲特有的“纯粹的社会主义”。20年代以后，日渐增多的非洲知识分子赴欧美留学。他们大多出生在非洲农村，深受传统部落村社及其价值观念的影响。留学期间，又受到西方各种思潮如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英国费边主义等影响。回国后，他们纷纷投入民族解放运动中。其间，一些领导人将本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一些思想相互糅合，形成各自的社会主义思想，并把这些思想运用在争取独立的斗争及独立后的治国纲领中。因此50—60年代，不少新兴独立国家如加纳、几内亚、马里、坦桑尼亚、赞比亚、肯尼亚和乌干达等竞相奉行“非洲社会主义”，主张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非洲传统村社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现代社会主义，由此形成了非洲的“村社社会主义”这一流派。60年代后期，加纳、马里、乌干达等国的社会主义试验因国内发生军事政变而流产，肯尼亚也悄然收起非洲社会主义旗号而改行资本主义。此时非洲国家领导人进行反思后决定

不再使用“非洲社会主义”这一笼统而又含糊不清的术语，而是使用更能反映自身特点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名称，如坦桑尼亚的“乌贾马社会主义”、马达加斯加的“福科诺洛纳社会主义”等。1977年塞舌尔宣布奉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加入了这一流派的行列。到80年代初，非洲约有5个国家属于该流派。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苏东剧变和多党民主风潮席卷非洲大陆，奉行村社社会主义的国家大多宣布放弃社会主义（坦桑尼亚除外），政治上改行多党制，经济上实行混合经济或市场经济。至此，这一流派从思潮到实践基本上步入沉寂。

2. 非洲民主社会主义：

是唯一具有泛非组织形式的非洲社会主义流派。它形成较晚，发展较快，现已成为非洲最有势力和影响的一个社会主义流派。其基本特征是：（1）师承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主张通过“民主”、“有节制”与“和平渐进”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2）实行多党制；（3）主张采取“有限制的自由经济”发展战略，即“既非西方或日本的自由化，也不是东方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4）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与友好关系”。

非洲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欧流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本世纪20—30年代，非洲英属和法属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留学欧洲，受到当时盛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有的（如塞内加尔的桑戈尔）还加入了主张该思潮的法国社会党。二战后因法国社会党不是积极支持而是损害非洲民族独立斗争，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致使桑戈尔等人脱离该党，提出了不同于“欧洲社会主义”的“非洲社会主义”口号和思想，并在独立后加以试验。60年代后期，由于非洲社会主义

实践不断受挫，“非洲社会主义”口号日益受到批评和抛弃。同时1951年成立的社会党国际积极向亚洲和非洲扩大影响，力图将新独立的国家引上“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在此背景下，毛里求斯工党和塞内加尔社会党先后于1966年和1976年加入社会党国际，并宣布实行“福利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1979年突尼斯也提出要建设“民主社会主义”，从而加入了同一行列。1981年塞、突两国总统发起成立非洲社会党国际（一译“非洲社会党联盟”，今称“非洲社会民主政党联盟”），参加者有10个非洲国家的执政党和参政党。从此，民主社会主义正式成为非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而出现在非洲大陆。90年代初在多党风潮的冲击下，一些曾奉行非洲社会主义其他流派的国家纷纷改制，有的则转而奉行民主社会主义。迄今为止，民主社会主义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影响和力量还有所上升，成为非洲社会主义中唯一保持发展势头的一个流派。

3. 非洲科学社会主义：

亦称“非洲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自称的“科学社会主义”。该流派正式形成于70年代，90年代初消失。先后有6个非洲国家加入这一行列，典型代表当推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该流派的基本特征是：（1）自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为其基本原理是普遍适用的；（2）实行一党制，认为这既符合非洲传统，又有助于弥合分歧；（3）主张建立一个“独立而先进的计划经济体制”，结束对帝国主义国家和国际垄断集团的那种“殖民地和新殖民地方式的依赖关系”；（4）同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友好合作关系。

非洲科学社会主义流派的形成与早期马克思主义在非洲的传播不无关系。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就开始传入非洲。在十

月革命的影响下，南非、埃及、摩洛哥等国成立了共产党或法国共产党支部。二战后，这些政党组织在国内进一步发展壮大，促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在非洲得到较广泛传播。60年代，一些新独立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已在其政党党纲或公开讲话中引

“非洲社会主义”变化情况一览表

流 派	变 化	
	90年代以前盛行的国家：	90年代以来的情况：
非洲村社社会主义 (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坦桑尼亚的“乌贾马社会主义”、赞比亚的“人道社会主义”、马达加斯加的“福科诺络纳社会主义”、塞舌尔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等) 现剩一国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加纳 2、马里 3、乌干达 4、赞比亚 5、几内亚 6、肯尼亚 7、坦桑尼亚 8、马达加斯加 	已放弃 已放弃 已放弃 已放弃 已放弃 已悄然收起 仍坚持，但有调整 已放弃
非洲科学社会主义 (亦称“非洲共产主义”，70—80年代初形成，现已基本消失)	先后有6个国家：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埃塞俄比亚 2、贝宁 3、莫桑比克 4、刚果 5、安哥拉 6、津巴布韦 	宣布放弃(1989年) 宣布放弃(1990年) 改行“民主社会主义” 改行“民主社会主义” 改行“民主社会主义” 未放弃，但有调整
非洲民主社会主义 (形成晚、发展快，现为主要流派)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毛里求斯工党的“福利社会主义”(1966年宣布) 2、塞内加尔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1976年宣布) 3、突尼斯“民主社会主义”(1979年宣布) 	90年代以来有很大发展，已有一批政党由其他流派转来，其中参加“非洲社会民主党联盟”的已有30个政党和组织，它们中有10个执政或参政

用一些马克思主义语句，但尚未公开宣称奉行科学社会主义。70年代，美苏在非洲的争夺加剧。一些独立或尚未独立的非洲国家因从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东欧和古巴获取援助和支持，从而深受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的影响。在这个背景下，刚果、贝宁、埃塞俄比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等国先后于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宣布奉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从而使该思潮成为非洲社会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流派。苏东剧变后，上述国家有的宣布放弃社会主义（贝、埃塞），有的宣布改行民主社会主义（安、莫、刚）。津巴布韦曾坚持社会主义，但其理论和政策也在实践中作了修改，并不再大张旗鼓地提倡和宣传。至此，非洲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流派在非洲逐渐走向沉寂。

二、“乌贾马社会主义”的新变化

坦桑尼亚是黑非洲最早提出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之一，其奉行的非洲社会主义称作“乌贾马社会主义”或“村社社会主义”，是非洲社会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在非洲及世界上都有着重要影响。冷战后，坦桑是非洲唯一仍坚持非洲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并在努力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1. 产生的背景和主要理论观点。

坦桑尼亚的社会主义源于当时任坦桑总统的尼雷尔的思想。尼雷尔出身于坦桑一个又穷又小的酋长家庭，信奉天主教。50年代初留学英国时接受“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回国后在从事民族独立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关于非洲“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为了区别于非洲“社会主义”的其

他各种流派，他把斯瓦希里语“乌贾马”一词（原意为非洲部族社会中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分享成果的家族关系）解释为“社会主义”，坦桑的“社会主义”由此而得名。

尼雷尔关于社会主义的主要论点是：

(1) 乌贾马是坦桑社会主义的基础。他认为，非洲社会既不是封建社会，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非洲的传统社会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部落社会，含有许多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如土地公有、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和相互帮助，因此应把它作为宝贵遗产发扬光大。他说，为了使坦桑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改正其“无知”、“贫穷”、“对妇女的不平等”等缺陷，加上为战胜贫穷所必须的“知识与工具”，使坦桑从一个逐渐采纳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刺激和伦理的个体农民的国家，有步骤地变成“乌贾马化”的国家，即“社会主义”国家。

(2) 人人平等、平均分配财富是乌贾马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仅是世界各种伟大宗教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社会主义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问题，最本质的是人类平等的原则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各种社会结构中的具体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人人平等”；“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区别，不在于财产的生产方式，而在于财富的分配方式，前者主张平均分配财富，后者则相反”；要达到“平等”和“均贫富”的目的，唯一的手段就是消灭产生它们的基础：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

(3) 不承认阶级和阶级对抗。尼认为，非洲社会主义“不是从阶级冲突中产生的”；非洲传统社会的所有制决定它很难产生出阶级，非洲人的语言中从来就没有阶级这个词；殖民时期，由于外国资本垄断了坦桑整个经济，因此没有为非洲资产

阶级的形成创造条件；独立后，由于政府采取了限制剥削和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坦桑没有出现资产阶级；坦桑社会只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4) 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依靠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尼认为，在帝国主义依旧存在的条件下，第三世界国家只有依靠自力更生，才有可能去建设社会主义，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要解决发展资金的问题，必须依靠自力更生的原则；自力更生包括四大基本要素：土地和农业；人民；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的政策；好的领导。

2. 初期的理论和实践。

1967年，坦桑尼亚执政党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简称坦盟，1977年与桑给巴尔非洲设拉子党合并为坦桑尼亚革命党）将尼雷尔的乌贾马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载入其政治纲领《阿鲁沙宣言》。根据该文件，坦党追求的目标和宗旨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消灭贫困、疾病、愚昧，实现人人平等、自由、尊严。在经济上主张国家掌握经济命脉；人人劳动，按劳取酬。对外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联合各国革命政府和政党，实现非洲统一。规定坦党是农民和工人的政党，党员必须信守党的信念，恪守党的原则；党的领导人不得从事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活动，不得在任何公司拥有股份，不得在私人企业中任经理，不得领取双份或多份酬金，不得拥有用于出租的房屋。

《阿鲁沙宣言》发表后，坦党和政府便根据其精神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以下社会经济措施：

(1) 大规模推行国有化。从1967年2月起，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全部的银行、保险公司、主要的工商企业、运输业和外国农场、出租房产等实行国有化，后来将中小企业和农村私人

商店也包括在内。

(2) 推广乌贾马村，在农村搞集体化运动。根据尼雷尔的设想，由于坦大部分农户居住分散，村落很少，乌贾马村运动可分为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将散居的农户迁移到新村集中居住，逐步实行集体生产和修建必需的公共设施，增强农民的集体观念；

第二阶段，提高集体经济的比重，使集体生产产值超过个体生产产值，并积极发展教育事业，使乌贾马村成为先进的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中心；

第三阶段，通过并村扩大乌贾马的规模，使之成为农工商联合体。

在推行乌贾马村后，到 1975 年 1 月，全国已建立乌贾马村 6944 个，人口达 900 万，占全国农村人口的 66.6%。但这些村庄基本上只达到第一阶段的要求。

(3) 限制特权和缩小城市人口收入差距。为了防止产生新的剥削阶级，除了限制民族资本和农场主的发展外，坦党还尽力限制党政官员的特权。《阿鲁沙宣言》中的《领导人守则》对此作了具体规定。此外，坦党还采取办法限制高工资和不断提高低工资，使城市人口工资收入的差距逐步缩小，从 1960 年的 1:70 降到 1974 年的 1:11。

在政治体制上实行一党制。1977 年坦盟与设拉子党合并为坦桑尼亚革命党。同年 4 月坦桑议会通过新宪法，规定革命党是全国唯一合法的政党，拥有最高权力，领导和监督政府的一切活动，所有议员和军官都必须是革命党党员。从此，坦桑开始实行真正意义上的一党制（此前也实行一党制，但由坦盟和设拉子党分别领导坦桑大陆的联合政府和桑岛的革命政府），并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及党在各个领域的领导作用。采取的具

体措施有：

(1) 重视党的建设。自上而下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配有党的专职干部；在吸收党员方面较为严格，规定入党有3个月的预备期；在中央设党务监督常务委员会，监督党的干部并加强中央与地方党组织的联系；健全基层组织活动，严格党小组的会议制度；中央和地方设有党校，分期分批培训干部。

(2) 在军、警中建立会议制度，开展党的活动，以加强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

(3) 成立革命党领导下的五大群众组织即工、青、妇、合作社联盟和双亲协会，以便协助党团结各族人民，使党的政策得以贯彻执行。

采取上述政经措施后，坦桑国内发生很大变化。执政党的力量有所增强，截止1978年，党员总数达150万人；党在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领导作用，地位和影响提高。在经济领域，国家基本控制了经济命脉，加速了工业化进程。但是，由于国有化和集体化搞得过激过快，结果严重打击了国内外私人资本，损害了中小企业和农民的利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加上国内自然灾害频繁和国际贸易条件恶化，进入70年代以来，工农业生产严重滑坡，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逆差激增，外汇奇缺，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面对这种形势，坦桑领导人进行了反思。1977年尼雷尔承认坦桑搞社会主义有失误，“国有化实行得太多”，“集体化也实行得太早”；坦桑社会主义的时间比他估计的30年要长得多。70年代中后期，坦桑政府对过激的政策进行“纠偏”，主要措施有：

(1) 以“村子化”代替乌贾马运动。1975年承认在乌贾马村运动中有强迫命令的过激行为，允许农民将乌贾马村改组

为初级合作社式的“村子”，村民对土地有使用权，但土地不得买卖。到1981年，这种村子达8200个，村民1300万，占农村人口的90%以上。

(2) 整顿国营经济。主要是改变国营企业过于集中的现象，对亏损严重的国企实行关停并转，发展小型企业等等。

(3) 放宽对私人经济的限制。包括鼓励私人资本经营工商业，允许私人建房出租等等。

但由于尼雷尔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没有改变，如坚持《阿鲁沙宣言》不能修改，必须保持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反对居民间收入差距扩大，决不向西方国家乞求等等，虽然“纠偏”措施纠正了一些过激现象，但由于执政党的指导方针没有改变，经济中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经济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3.80年代的经济调整。

进入80年代后，坦桑经济面临的内外困难依然存在，经济形势继续恶化，人民生活更为艰难。对此，坦桑领导人继续探索出路，努力使经济走出逆境。1982年1月，坦桑革命党召开特别代表大会，通过了《革命党指导方针》。大会承认国家经济困难与党的工作失误有关；决定要重视和发展农业，但同时主张在坦桑混合经济中扩大计划经济的成份。同年10月，坦党又召开二大，修改了党章，通过了1982—1985年“经济结构调整计划”。1985年思想比较务实的姆维尼接替尼雷尔任坦桑总统，促使坦桑经济调改计划加速。在坦党方针的指导下，坦桑政府在80年代实施了三个经济调整计划（即1982—1985年结构调整计划、1986—1989年经济恢复计划和1989—1992年经济复兴计划），对经济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主要措施有：

(1) 强调发展农业，增加了农业预算开支、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对进口的农用物资免税，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取消国营公司对农产品收购的垄断；

(2) 允许农民从乌贾马村搬回祖居地；

(3) 削减政府开支，减少财政赤字；

(4) 充分利用企业的现有设备，提高开工率，增加经济效益，对部分经营不善、亏损严重的国企实行私有化或租赁制；

(5) 发展交通运输和电讯事业；

(6) 贬值货币，实行贸易自由化；

(7) 颁布投资条例。

随着上述政策的实施，80年代中后期坦桑国民经济逐步走出低谷，工农业呈现增长，粮食实现自给，1987—198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分别达3.9%、4.0%和4.6%，1986年8月坦桑因实行经济结构调整还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2亿美元的贷款。

80年代中期以来，坦党在积极进行社会经济政策调整的同时，在思想理论上又对过去的工作进行认真总结。1987年10月坦党召开三大，通过了《1987—2000年革命党的纲要》。《纲要》是继《阿鲁沙宣言》发表后坦党的又一重大政治纲领。它在肯定过去20年建设成就并承认工作中有明显失误的基础上，为今后15年国家政经发展和党的建设等制定了目标。此外，它还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党对坦桑社会主义的看法，是坦党对坦桑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次比较完整的总结，表明坦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所深化。《纲要》提出的有关坦桑社会主义的新观点有以下几点：

(1) 确定坦桑处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纲要》指出，坦桑正处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即“从落后的、新殖民主

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过渡”的时期。这一概念的提出“基于这样一个真理，即一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体制不可能奇迹般地瞬间转变为一种新的形式。一个新兴的阶级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第一步，进而应运用这一权力建立新型的社会和经济体制以及人际关系”。

(2) 过渡时期的任务。在过渡时期这个“历史阶段里，执政党应采取坚定措施消灭资本主义和剥削，并在经济、社会服务事业方面建立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的基础，建立推动工农业发展的科学技术的基础，通过建立大型国营农场、农牧民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革命”。“打破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基础，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的社会基础”。“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是必须的，但又是暂时的”；“混合经济”不是坦桑发展的目标，“其最终目标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任务“需要多年才能完成”。

(3) 过渡时期分为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为1967—1987年，又称作民族民主革命时期。这个阶段对“银行、保险、外贸、批发商业等主要经济机构实行国有化”，“使国营经济成为国家经济的主体”；在“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建立了人民民主事业机构，人民的权力得以扩大和巩固，党内民主亦得到加强”；在教育、卫生、供水等方面也采取了有力的措施。

第二阶段为1987—2002年，目标是在政治上加强一党制的民主制度，在经济上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在农村分3个阶段发展生产合作社，在社会领域继续发展文教、卫生和社会服务等事业；对外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原则，反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歧视，同非统组织和联合国成员合作，捍卫世界和平与安全。

(4) 所有制问题。过渡时期坦桑经济含有4种所有制形

式：国家、资本主义、自食其力的个体劳动者和合作社。国营经济是发展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经济的钥匙，只要使其站稳脚跟，它将足以成为国家经济的支柱和主导。资本主义对国家经济尚有贡献和意义，但由于其两重性，国家应对其加以指导、管理和控制。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主要指农民）也有两重性，应促其加入生产合作社，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坦桑的合作社运动是一种混合形式，应采取切实措施使其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4. 冷战后的调整改革和变化。

198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苏东剧变和多党浪潮在非洲大陆的兴起，坦桑也受到政治多样化的冲击。1990年2月，坦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在国内实行何种政治体制。当时党内多数人认为实现经济恢复和发展以及保持国内团结，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因此坦桑应遵循本国国情，继续实行一党民主制。但由于国内外要求坦桑改制的压力很大，大会之后，坦党决定在党内外继续开展是否实行多党制的讨论，并在继续贯彻调改方针的同时着手政治改革，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1) 1991年2月坦党中央全会通过《桑给巴尔宣言》，修改了《阿鲁沙宣言》中有关党员干部准则的规定，允许党员在合营或私人企业拥有股份；允许出租一栋私房；允许受聘于私人公司并任经理；允许党员领取一份以上的薪金，但被任命有双重以上公职的领导人仍不能领取双份工资。同时号召党员站在经济建设的前列，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出榜样。

(2) 允许反对派公开活动，放宽对新闻媒介的限制。

(3) 精简机构。为了压缩政府开支，将省、县两级党政一把手合二为一。并号召各级党组织兴办企业，力争实现党的经

费自给。

(4) 下放权力。党从大包大揽政府事务中解脱出来，只管大政方针和群众工作；并给予党领导的五大群众组织自主权和自治权，同其关系趋于松散。

(5) 放弃领导人终身制。1990 年 8 月尼雷尔辞去党主席职务，由总统姆维尼接替，顺利实现了领导人的权力交接。

1992 年 2 月，坦党为顺应国内外形势，主动提出在坦桑实行多党制。但为了保证政改顺利进行和政局稳定，决定用两年半的时间进行以革命党为主导的政治过渡，到 1995 年 10 月再举行首次多党大选。同年 3 月，坦党修改党章，以适应多党制的需要。之后不久，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删除有关执政党拥有最高权力等方面的规定。同年 12 月，坦党召开四大，重申坚持《阿鲁沙宣言》和社会主义及自力更生原则；强调发展经济，政府只掌握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铁路、邮电、公用事业、住房等）。

宣布改制后，坦党加大了政治改革的力度，根据党章规定，对党的组织机构等进行了调整，主要有：

(1) 精简党的各级机构，削减出席各级党代会的代表人数和党内专职干部。截止 1992 年，已有 1.7 万多名党的干部办理退休。

(2) 撤销原在军、警、机关、学校及工矿企业的党支部，党员可在城市街道或农村参加支部活动。

(3) 省级以下党政职务分开，改变一人兼职的体制。

(4) 党员发展对象由原来的工人和农民改为工、农和有正当职业的人。

(5) 扩大党内民主，吸收群众组织代表参加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并允许群众组织自行选择其领导人。

采取上述措施后，革命党控制着政治主动权，国内局势稳定。1995年10月，坦桑举行了多党制以来的首次大选，共有十几个政党参加角逐。拥有350万党员的革命党获得坦桑国民议会232个当选议席中的186席和桑给巴尔岛代表会议50个当选议席中的26席，其候选人姆卡帕和阿穆尔分别以61.8%和50.2%的选票当选为坦桑和桑给巴尔总统，坦桑革命党继续执政。

新一届政府组成后，继续贯彻革命党的既定方针，经济上加快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步伐，不断放开政策；政治上强调勤政廉洁，力图改善执政党的形象，取信于民。成立以来主要抓了以下几件事：

(1) 狠抓反腐倡廉。成立反腐机构，制定反腐措施，实施领导人财产申报制度，查处贪污腐败和偷税漏税案件。

(2) 加大私有化力度。原计划从1992年起用5年时间对300多家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但到1995年底只完成91家。后政府放宽政策，如宣布私有化方式可以灵活多样、政府逐步从生产和商业活动中退出等，1996年实行私有化的企业又有47家。同时政府还宣布对铁路、邮电等涉及国计民生的部门实行私有化，使这项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3) 在1994年通过立法批准建立股票市场后，又不断推出鼓励私人投资的政策：取消私人企业的资本税和红利税，出台保护地方工业发展的税收制度，取消对商业银行向外贷款的数额限制，取消所有外汇管制规定。政府还将修改1990年的投资法，并将制定有利于投资者的新矿业法、土地法和劳工法等。

(4) 继1992年实施银行法后，继续深化金融改革，赋予中央银行独立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同时紧缩银根，促使通胀

回落和汇率保持稳定。

(5) 大力整顿财税秩序，努力开源节流。一方面严格税务检查，强化征管措施，减少税收流失，同时严格执行“现金预算制”，精简地方政府规模和逐步改革医疗、教育免费制度，以限制政府开支。

实施这些措施后，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有所增强，经济形势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通胀逐步回落，税收有大幅增加。这些都为坦桑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政局继续保持稳定。但由于坦桑经济中的脆弱因素依然存在，经济仍是低速增长，加上私有化、福利改革等带来不少负面影响，腐败之风尚未刹住，执政党仍面临巨大挑战。如何克服上述困难，仍是革命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非洲科学社会主义”的衰落

6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先后执政的刚果劳动党、贝宁人民革命党、埃塞俄比亚工人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劳动党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相继宣称要奉行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社会主义，成为黑非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冷战后，以上 6 国除津巴布韦外，都已放弃“科学社会主义”，或改行其他社会主义。

1. “非洲科学社会主义”的共同特点。

以上 6 国国情不一，津巴布韦是二元经济，既有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工矿业和现代化农场，又有大量分散和落后的小农经济；埃塞俄比亚是黑非洲最古老的封建帝国；刚果和贝宁经济十分落后，基本上是落后的个体劳动农业国；莫桑和安哥拉经

过武装斗争取得独立后陷入长期内战并受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武装侵扰，本来就十分落后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但这些国家都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密切，有的还得到苏联东欧国家和古巴的直接军事援助和支持。这些国家的政党领导人厌恶资本主义，向往社会主义，因此仿照社会主义国家尤其以苏联提出的“以社会主义为方向”和“非资本主义道路”等理论进行社会主义在黑非洲的移植和试验。从以上政党的纲领、章程和初期实践看，其理论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在党的指导思想上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上各党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普遍规律，不存在什么“非洲社会主义”，只有科学的社会主义。刚果劳动党章程规定：“指导刚果劳动党思想和行动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贝宁总统克雷库说，贝宁人民革命党“以马列主义普遍原则为指针”。安哥拉人运—劳动党章程指出，该党是“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马列主义原则适合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转变的新时代”。莫桑解阵党纲领规定，“指导党的行动和发展的思想理论基础是莫桑比克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津巴布韦民盟章程规定，津民盟“以马列主义原则为基础，但又切实根据本国历史、文化和社会情况，在津巴布韦建立并维护社会主义”；穆加贝则说，津民盟“选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包括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因素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

以上各党及其领导人均主张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而在分析独立后本国革命阶段时提法则有所不同，埃塞俄比亚和津巴布韦认为处于“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安哥拉和莫桑提“人民民主革命阶段”，贝宁和刚果则说“民族、民主、人民革命阶段”，但都认为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作准备，

莫桑解阵党甚至宣布过渡时期结束，开始社会主义建设。

(2) 在政党体制上，实行一党制，党领导一切。非洲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实行一党制，其党的章程明确规定党是“社会的领导力量”，“党规定国家的政策，指导并监督国家各项活动”，“国家的一切组织机构都要接受党的领导”，“党是国家全部生活的最高力量”，“是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些国家还大都把实行一党制写入宪法或根本法，并规定现政党是国家的唯一执政党。党领导一切，决定一切。非洲科学社会主义政党都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党”，“工农联盟的先锋党”，“劳动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的目的是“建设一个没有任何形式的人剥削人的社会，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的领袖一般兼任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这些党都主张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规定了革命的依靠和团结力量及革命的对象。

(3) 在经济上实行国有化政策和计划经济体制。非洲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国家在取得民族解放后，执政党在巩固政权的同时“首要目标是实现经济独立”。因此，国家要摆脱和结束对“帝国主义国家和国际垄断集团的依赖”，“同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决裂”，彻底根除帝国主义经济基础，把群众从封建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建立为人民服务的、真正独立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要保护和优先发展国营经济，使之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和决定作用；逐步并完全取消外国资本主义部门，限制民族资本的发展；广泛开展土地改革，没收（或赎买）大农场主及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鼓励发展合作经济。政府要加强对市场的干预和控制，用计划经济指导国家经济的发展。

非洲科学社会主义还认为，建设统一、独立和繁荣的国家，不只是建立一个新的经济体制，还包括培养具有真正价值的一代新人，使之成为有觉悟的历史的主人。因此，还要进行思想文化革命，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的影响。

(4) 在对外关系上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主张非洲科学社会主义的各政党无一例外地在其党纲、党章中规定，“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因为这些党把本国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由于这些党诞生于冷战时期，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持，苏联还同其中的某些国家签订了带有军事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所以他们特别强调不断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安哥拉总统内图说，安哥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选择“决定了我们同我们的天然盟友——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莫解阵党纲领称，“党发展和巩固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以及同我们的天然盟友——其他马列主义政党的关系。”但这些党又都主张对外奉行独立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不结盟原则基础上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发展同其他党的关系上也主张遵循“独立、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穆加贝总统在谈到对外关系时特别强调，“我们的力量和安全来自于我们一贯坚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一立场”，“只要坚定信念，坚持真理，我们就永远不会屈从他人或受人欺诈”。

2. “非洲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典型例证。

这里对非洲科学社会主义不一一剖析，仅以莫桑比克为例做些说明，使读者对非洲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个大致了解。

莫桑比克地处非洲东南部、面积 19.9 万平方公里，人口 1800 万（1996 年）。16 世纪初莫遭葡萄牙殖民主义入侵，

1700年沦为葡“保护国”，1951年成为葡“海外省”。莫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1962年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解阵）成立并领导莫人民进行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1974年葡萄牙形势发生重大变化，9月莫解阵与葡政府签署关于莫独立的《卢萨卡协定》。1975年6月25日莫桑比克正式宣告独立，莫解阵主席马歇尔·萨莫拉出任总统，莫解阵成为执政党。

莫桑比克的社会主义试验是在内忧外患和艰难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其全面展开是以1977年2月莫解阵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形成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主要表现和特点是：

（1）巩固新生政权，加强人民政权建设。莫解阵接管国家政权引起国内外敌人的强烈反对。在独立前后，白人右翼组织和反对武装以及莫解阵部分持不同政见的官兵多次在首都等地发动反政府叛乱和骚乱，莫解阵对这些叛乱和骚乱采取坚决措施予以镇压，以维护民族独立和巩固新生的政权。但武装反抗并未停止，1976年各种反政府势力在罗得西亚（现津巴布韦）白人政权和南非当局的支持下成立了“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称“抵运”），在莫各地开展破坏活动并导致莫长期内战。

莫解阵在开展民族解放斗争时期就在解放区着手“开始建设新社会”，政治上摧毁殖民政权之后，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莫桑比克独立后，莫解阵遂将这种“人民政权”推广到全国。1977年莫解阵三大提出，加深和扩大革命成果，彻底消灭殖民结构和在省、县与地方加速建立新的国家权力机构的任务，于是在同年组织莫独立后的全国第一次大选，先后选举产生了县、市、省人民议会和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议会。全国人民议会常务委员会由全国人民议会选举产生，受总统领导，从而确保了使国家机器“成为执行党的决议，实行

人民掌握政权的有效工具”。与此同时，为“建立一个保卫祖国的强大的防御体系”，莫解阵还加强了作为国家政权支柱的军队建设，通过整编扩充，建立了国家的正规部队人民解放军。

(2) 加强党的领导，开展党的建设。莫解阵三大决定将莫解阵改建成马列主义先锋党，称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简称莫解阵党）。为加强党的领导，莫解阵党三大后不久召开中央全会，决定在全国开展建党运动，大规模吸收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尤其在基础薄弱的南方地区建党。莫解阵党成立了以主席萨莫拉为首的全国建党委员会，向各地派遣工作队指导基层建党工作。莫解阵党作为“工农先锋党”吸收党员有严格的要求和必须履行的手续，并须报省委书记处批准方可成为正式（或预备）党员。莫解阵党中央 1980 年宣布建党任务基本完成，到 1983 年莫解阵党四大公布的数字，该党拥有 11 万多名党员，其中农民和工人占 72% 以上，在全国各省、市、县设立了 400 多个地方委员会和 4000 多个党支部，从而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在各地的执行。

(3) 经济上逐步实行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根据莫解阵党三大要彻底变革社会生产关系和发展经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的要求，莫积极推进企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莫桑比克经济命脉原为 20 多万葡萄牙移民所控制，莫独立前后大批白人移民出逃，莫政府首先将白人遗弃的企业和种植园接管，改为国营企业和国营农场；接着将铁路、港口、电力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逐步收归国有。此后，莫政府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将炼油、糖业等公司收归国有或直接控制了对国家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私人企业的活动。到 1978 年底，莫政府“逐步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

1983年，莫国营部门的产品已占商品总数的70%，按计划生产的产品已占国内商品总额的85%。

在农村，莫解阵在武装斗争时期就在解放区建立了公社村和合作社，按照集体形式加以组织和贯彻自给自足原则。独立后，莫解阵将这一经验在全国推广，并把它视为政府在农村的发展战略。1976年莫解阵中央作出了关于公社村的决议；1978年成立了全国公社村委员会，负责指导规划和协调公社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1980年，莫政府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社村会议，随后公布了公社村章程，规定公社村是政治、社会和经济三位一体的农村基层单位。到1983年，全国建了1300多个公社村，人口约180万。

莫政府同时还大力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到1981年，全国已建立350个合作社与准合作社，合作社人口7万人。消费合作社比生产合作社发展更快，到1983年消费合作社约有社员50万，其零售额约占全国零售总额的20%。

(4) 大力发展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独立后，莫桑比克政府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萨莫拉总统将培养一种新型的人和一种新的精神视为革命发展的关键。莫政府成立后即通过决议，将所有私人学校和教会学校国有化，并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不准干预学校教育。政府还对教学内容和教学制度等进行改革，实行教育民族化和学校教育与社会、生产相结合，小学实行义务免费教育，对初级教员进行培训等；政府还注意发展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并在全国大力开展扫盲运动，自上而下成立扫盲机构，从而促进了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独立后不到10年中，小学生人数增加了1倍，中学生人数增加5倍，文盲率降低了20个百分点。

莫政府还特别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独立后的六七

年中就培养了数千名初级医护人员，在全国尤其农村建立了大批卫生站、卫生中心和化验室，消灭了天花病，城市婴儿死亡率下降了一半。

(5) 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支持民族解放斗争。莫桑比克人民在坦桑等国及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下取得独立，莫解阵党为国家重建更加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的支持和援助，莫苏关系迅速发展。两国还于1977年签订了为期20年的友好合作条约，双边交往不断，萨莫拉总统先后7次去苏联。苏向莫提供了大量军事和其他援助。与此同时，莫同古巴、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亦相当密切。莫解阵党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及其他许多外国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和保持了友好合作关系。

莫解阵党遵循“恢复非洲大陆各国人民做人的尊严和争取政治、经济与社会进步而斗争”的原则，在独立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支持津巴布韦人民的斗争，制裁罗得西亚白人政权，于1976年毅然关闭了莫罗边界，每年因此损失货物过境和劳工的外汇收入上亿美元。莫解阵党还因支持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斗争使莫桑比克经常受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武装骚扰和破坏。

(6) 在实践中逐步调整政策。莫解阵党领导人经过几年的实践后，进入80年代开始总结经验教训，逐步认识到要从本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国内严峻局势的形成除内外敌对势力等因素外，同党的脱离实践的政策不无关系。于是莫解阵党在实际工作中逐步调整和放宽政策。对内强调整顿国营企业，使其不再成为国家机关的组成部分；鼓励和支持私人企业发展生产；下放权力和放开一些产品的价格等。对外，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同葡萄牙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先后加入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洛美协定》。津巴布韦独立后，莫逐步改善与南非关系，1984年两国总统签署《互不侵犯和睦邻条约》（亦称《恩科马蒂条约》），从而使莫的外部环境得到较大改善。1986年10月，萨莫拉总统遇难，希萨诺接任总统，不久提出要建设“莫桑比克式的社会主义”，继续推行改革开放政策。

3. 冷战后非洲“科学社会主义”的变化。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以及多党风潮兴起，主张科学社会主义的黑非洲国家和政党发生了重大变化。贝宁人民革命党于1989年宣布放弃“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1990年3月，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贝宁全国会议宣布废除宪法，取消一党制，改贝宁人民共和国为贝宁共和国；同年4月，贝宁人民革命党召开特别代表大会，宣布该党解散。埃塞俄比亚工人党于1990年宣布放弃“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1991年5月，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武装攻占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夺取政权，总统门格斯图出逃，埃塞俄比亚工人党遂被取缔。1990年，刚果劳动党放弃一党制，称仍忠于社会主义理想，但决定不再以马列主义作为党的理论基础；1992年刚果劳动党在全国大选中失利沦为反对党；1997年刚果劳动党主席萨苏在内战中击败对手——刚果泛非社会民主联盟主席利苏巴总统夺取政权。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分别于1989年和1990年放弃一党制，并将“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对党的政策做了重大调整。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在国家独立后吸取了其他政党的经验，注意从本国实际出发，推行“现实社会主义”，但在冷战后亦对其理论政策进行了调整。现有几个政党的调整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思想理论上放弃或修正科学社会主义。

1990年莫桑比克、刚果和安哥拉执政党分别召开中央全会或代表大会，对党的纲领和章程做了修改，放弃马列主义作为指导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将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党的理想和奋斗目标。莫解阵党1997年举行的七大明确规定，党主张“民主的社会主义”，认为自由、平等、社会公正、和平福利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建立法制的、民主的、社会公正的国家符合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愿望。1991年津巴布韦民盟主席穆加贝说，“无疑，我们不是要完全放弃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考虑对它进行修正。”民盟政治局常委会遂提出报告，建议以“社会民主主义”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穆加贝对这种改变进行解释后说：如果这种混合经济形式成为永久的选择，那么我们就再也不能谈什么纯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了，因而我们将选择做社会民主党人。

(2) 在政治上被迫宣布实行多党制。

1989年的东欧剧变使非洲实行一党制的国家受到政治多元化的强烈冲击，一时间多党风潮席卷非洲大陆。在内外强大压力下非洲一党制国家不得不宣布实行多党制，一些执政党还在动乱或选举中下台。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独立后不久爆发内战，经过长期较量对立双方谁都吃不掉谁，于是莫解阵和安人运在多党风潮中只得承认对方存在，并力主通过谈判结束内战，重建国家。津民盟在1990年大选获胜后，穆加贝等人欲继续把“事实上的一党制”变成真正的一党制，但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取缔反对党，穆加贝遂宣布不再制订取缔反对党的法律。1992年津民盟明确宣布实行多党制，并给人民以批评政府的自由，认为“多党制有好处，因为它允许选民在国家的各种治理方案中作出选择”。

在党的性质上这类政党均改“先锋党”为“全体人民的党”，并为扩大党的基础和赢得大选胜利而大量发展党员。如莫解阵党在1983年四大时只有党员11万人，到1997年七大已发展到119万。

(3) 在经济上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实行经济结构调整计划。

由于国内战乱和政策失误等原因，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等国经济陷入严重困难，这些国家从80年代初开始逐步放宽和调整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强调发展农业，放宽物价和对私有经济的限制，鼓励外资、紧缩财政开支，实行“混合经济”等。即使像津巴布韦独立后政局一直较稳定，但因政府实行集中计划体制，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外资流入很少，也造成经济低增长、高失业、赤字庞大等严重问题。因此，这类国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继接受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即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实行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采取优惠措施吸引外资等。莫桑比克至1997年私有化进程已基本完成，私营成分已占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

(4) 对外实行外交多元化，强调外交为发展服务。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南非形势的变化，莫、安、津等国均相继调整了对外政策。首先强调睦邻友好，发展地区合作。在继续保持同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关系的同时，积极改善和发展同西方国家尤其同美国和葡萄牙的关系，以争取更多的财政和经济援助与投资。再次是积极寻求同亚洲和拉美一些国家发展关系与合作。总之，其对外政策更加务实，外交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意识增强。

综上所述，非洲科学社会主义流派从兴盛到衰落有其历史

必然性。这类政党领导人受过马列主义以至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憎恶资本主义，向往社会主义，希望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平等社会，并在执政后在本国进行了社会主义试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其经验教训也是非洲发展史上的一种财富。他们的愿望所以没能实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非洲科学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们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大多是宗教信徒，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主义情感。他们虽然主张马列主义与本国实际结合，但实际上对两者均缺乏深入了解，更多地是教条主义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共产党理论和模式的抄袭。莫解阵党领导人就说，莫桑及大部分黑非洲国家至今仍是以小农为主的农业社会，很少有现代工业，因而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条件。原贝宁人民革命党一位领导成员最近访华时说，该党所犯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其政策脱离了贝宁现实，超越了阶段。其次，他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内涵主要是国有化和集体化，加之理论脱离实际，他们所推行的政策不是促进而是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上不去，老百姓生活得不到改善，从而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并造成局势的动荡和恶化。第三，由于内外矛盾交织和处置失当，尤其西方大国的插手，使部族矛盾激化，从而导致动乱以至长期内战，有的政权因此而垮台。第四，这类国家在两霸争夺期间，大多严重依赖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的军事、经济援助。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其失去支柱并被卷入西方鼓吹的多党浪潮的漩涡，有的被吞没，有的只得顺应潮流，改性易帜，随遇而安。

黑非洲科学社会主义流派销声匿迹了，但非洲国家和政党探索自己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努力将会继续下去。经过长期艰难曲折的求索，非洲国家终究会告别贫困，走上发达幸福之路。

四、“非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

“民主社会主义”在非洲大陆形成晚、发展快，现已是非洲大陆影响最大的一种社会主义流派。它的产生虽然深受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受法国社会党的主张和英国费边主义的影响，但是它具有非洲自己的特色，有别于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从总体上讲它仍属民族社会主义的范畴。在非洲民主社会主义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塞内加尔“民主社会主义”和毛里求斯工党前领导人西沃萨古尔·拉姆古兰总理推崇的“福利社会主义”。

1. 非洲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共同特点。

(1) 思想上，主张阶级和阶层之间的“溶合”。

认为非洲不存在明显的阶级或只有阶层而不存在阶级，目前尚未形成阶级对抗，不存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认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实现社会的平等和公正，合理分配社会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建设一个民主、繁荣的国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不适用于”非洲，非洲所需要的是“民主”而不是“革命”和“专政”，非洲应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指导下，通过和平的方式夺取政权，通过增加社会福利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

(2) 政治上，主张实行多党制的国家政治体制，把在这种体制下的自由和民主作为非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基础。

认为在一个国家里存在着多种思潮，代表各种思潮的政党应允许合法存在，这些政党合法竞选，由胜者掌握国家政权和管理国家事务。认为多党的存在是政治多元化的标志，是一个

国家是否有自由和民主的体现。在多党制下，各种思潮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活跃民主气氛，各种政党互相监督，可以防止专制和腐败。认为一党制扼杀自由和民主，必然导致专政和腐败，而多党制会带来自由和民主。

但是，实行非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对多党制的认识开始并不完全相同，有一个实践和统一的过程。如毛里求斯从国家独立至今，一直实行多党制，已有几个政党轮流上台执政。而塞内加尔经历了多党制——一党制——多党制的反复过程。

(3) 经济上，主张从“有限制的自由经济”发展到进一步扩大自由化的程度。

认为非洲国家取得民族独立后，面临的重要任务是采取措施，发展经济，使国家摆脱贫困和落后。为此，要探索一条符合非洲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认为西方的完全自由化的道路不可行，而东方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也不可取，主张实行有限制的自由经济发展战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实行混合经济，允许私营、合营和国有企业并存；适度鼓励私人发展企业的积极性，对私人企业不搞大规模的国有化，对农村不强制推行合作化；国家控制有关国计民生的要害部门。随着实践的发展，实行非洲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多数国有企业不景气，国家逐渐调整政策，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其中包括一些要害部门和仍盈利的企业，经济自由化的程度进一步发展。

(4) 对外关系方面，强调加强同西方国家发展关系的同时，开始实行外交多元化的政策。

认为非洲国家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众多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而西方国家拥有资金、技术和设备，非洲国家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西方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事实上，许多非洲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贸易等各方面同原宗

主国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受不同程度的制约。因为西方国家在提供经援时往往提出政治条件，为改变这种不利的国际环境，实行非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从80年代起，开始逐步实行外交多元化的政策，除西方外，也同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拓展关系。

2. 塞内加尔的“民主社会主义”。

在非洲民主社会主义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塞内加尔的民主社会主义。塞内加尔自1960年取得独立后，宣布实行非洲社会主义，后又公开宣布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前总统桑戈尔及其继承者现总统迪乌夫。

塞内加尔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认为：非洲只有阶级形成的倾向，有阶层而不存在阶级，所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不适用于非洲”；自由和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多党制是政治民主化的体现；非洲的村社组织形式贯彻自由、民主、人道和平等等原则，只有把黑人的传统精神与村社的社会结构相结合，才能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不赞成曾实行罪恶的殖民统治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又认为殖民统治在思想、科学、技术方面给非洲带来“积极成果”；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对立，主张团结，反对暴力，主张和平，使国家繁荣，在维护独立和主权的基础上，发展国际合作。

塞内加尔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0年独立到1980年，即桑戈尔统治时期，从实行非洲社会主义发展到实行民主社会主义，1976年执政党塞内加尔进步联盟加入社会党国际并改称为塞内加尔社会党。第二阶段，从1981年至1990年，迪乌夫总统继承和发展桑戈尔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第三阶段，从1991年至今，冷战结束后的塞内加尔民主社会主义的状况。

(1) 政治上，实行多党制。塞内加尔的民主社会主义把实行多党制作为其实现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独立初期，多党并存，互相争斗，执政党塞内加尔进步联盟为稳定政局，宣布实行一党制，将一些政党合并到进步联盟中，并宣布其他政党为非法。1967年，当政局基本稳定后，塞内加尔宣布实行“有限多党制”，允许两个反对党合法存在。但后来强调，每个政党必须代表一种思潮，到1979年，正式登记的已有4个政党：社会党（代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主党（代表自由民主思潮）、非洲独立党（代表马列主义思潮）以及共和党（代表保守主义思潮）。迪乌夫总统为显示其实行民主化，于1982年4月，宣布实行“完全多党制”，承认一切政党只要遵守宪法就可获得合法的地位和权利。1988年，迪乌夫总统邀请反对党共商国是，从而开创了执政党与反对党协商治国的局面。

(2) 经济上，从计划化逐步走向结构调整。独立后，塞内加尔虽没有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和消灭私人经济，但基本上还是实行计划经济，从1961年到1985年制定7个四年计划。当时的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从1965年的8.1亿美元提高到1989年的46.6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160美元上升到1989年的690美元。此外，由于国家干预经济过多，造成国营企业亏损严重。迪乌夫总统执政后，着手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对国有企业实行“计划合同制”，鼓励私营经济和本国人发展中小企业；从1985年起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计划；改革对农业生产的管理，实行权力下放，发挥地方积极性。但是在农村，土地国有化、村社化和合作化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实际上，大多数的村社和合作社被大家族或宗教首领所操纵，旧的生产关系并未

改变。

(3) 社会方面，为实现“正义”作了一些努力。强调干部的本地化，加速对本国干部的培养。为争取实现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用提高低工资的办法来逐步缩小工资差别。重视文化教育事业，桑戈尔执政时，文化教育的开支往往在政府每年的预算中占首位。迪乌夫执政后，决定在小学用本国通用的民族语言授课。但为集中力量发展生产，迪乌夫总统对文化教育方面的开支作了适当压缩。

(4) 对外关系方面，积极开展活动，扩大非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在塞内加尔和突尼斯的推动下，1981年2月，10个非洲政党成立了非洲社会党联盟。1983年，塞内加尔社会党举办了由非洲各社会党参加的“社会主义、民主与发展讨论会”。塞内加尔社会党强调国际合作，尤其是同社会党国际的合作，力图将非洲民主社会主义纳入社会党国际的轨道。

冷战后，塞内加尔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实行“一党为主、多党参政”的政治格局。冷战前，塞内加尔虽然已实行多党制，但反对党只有权参加临时议政并未参政，实际上还是社会党一党执政。对此，反对党并不满足，它们举起“民主”与“改革”的旗帜，争取群众，扩大影响。特别是90年代初，趁“多党浪潮”之机，反对党的力量有了较大发展。当时罢工、罢课时有发生，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增加。为了标榜民主和维护统治，迪乌夫总统决定于1991年4月吸收两个反对党入阁，组成“多党联合政府”。当时瓦德领导的影响最大的反对党——民主党在内阁27名部长中占有4名，瓦德本人还任国务部长。1995年3月，迪乌夫又吸收塞内加尔民主党、民主同盟——争取劳动党运动和塞内加尔革新民主党等3个反对党入阁。这样改变了社会党一党统治的局面。

但是，多党制和“多党联合政府”并未带来人们所期望的安定局面。现在塞内加尔共有 26 个合法政党，其中 19 个是反对党，各党派之间的斗争是错综复杂的。1993 年迪乌夫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反对党认为选举不公正，举行抗议游行，民主党主席瓦德还因涉嫌“暴力支持者”被监禁。后来双方妥协，于 1995 年 3 月成立了联合政府。在政府内斗争也十分复杂，反对党不时谴责执政的社会党的政策，而社会党指责反对党故意寻衅闹事。1995 年 9 月，新的反对派集团——抵抗力量集团成立。1996 年 5 月，9 个反对党成立了独立的全国选举委员会。1996 年 11 月，社会党在市政和农村选举中取胜，而反对党认为有舞弊行为，不承认选举结果。

塞内加尔面对经济困难，调整经济结构，进一步实行私有化，使经济发展出现一定的转机。90 年代初期，塞内加尔经济发展缓慢，到 1993 年陷入困境，经济年增长率 -2.1%。对此，塞内加尔开始调整政策。1994 年初实施“经济财政调整计划”，1995 年制订“全国农业研究战略计划”。1996 年初，迪乌夫总统指出，发展经济的三大战略目标是：私有化、开发人力和矿业资源、反对贫困。1996 年 3 月召开的塞内加尔社会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又重申继续实行私有化、严格管理预算和严格控制通膨的方针。

近年来，塞内加尔发展经济的一些具体措施是：

(1) 恢复同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争取外援。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塞内加尔同国际金融组织曾签定 10 多个“结构调整计划”，但经济未见好转。1994 年 1 月，塞内加尔又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了 1994—1997 年“结构调整计划”，获取 1250 亿非洲法郎贷款，推动经济向市场化方向发展。另外，在这期间，世界银行等外国出资者向塞内加尔提供 15 亿美元

贷款。

(2) 加速私有化进程, 扶持私有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塞内加尔在 1987 年制订了私有化计划。在 1988—1991 年实行私有化的第一阶段, 共有 22 个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 政府从中获取 200 亿非洲法郎的收入。1994 年 12 月, 议会通过的关于实行私有化第二阶段的法令指出, 计划到 1997 年, 除电力、通讯部门外, 其他所有公共企业将实行私有化。其中除外贸保险公司、航空公司等少数企业仍由国家参股外, 大多数企业将实行完全私有化。1995 年初, 政府设立了“私营部门发展基金”, 帮助私有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取低息优惠贷款。

(3) 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取消国家对一些部门的垄断。放开大部分商品价格, 减少公共企业对国家的依赖, 促进其参加市场竞争。进口方面, 用保护性关税措施取代以往用行政限制保护本国产品的做法, 这种关税额逐年降低, 计划到 1998 年完全取消。

(4) 促进传统出口产业的发展, 基本控制了非洲法郎贬值对经济造成的冲击。1994 年 1 月, 非洲法郎贬值 50%, 这给塞内加尔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 同时也提供了一定的机遇。借此机会, 塞内加尔政府大幅度提高花生和棉花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提高产量。为鼓励出口, 政府简化审批手续。其次, 在 1994 和 1995 两年内, 巴黎俱乐部和法国还分别免除塞内加尔 1300 亿非洲法郎 (约合 2.6 亿美元) 和 1700 亿非洲法郎 (约合 3.2 亿美元) 的债务。经过努力, 塞内加尔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1994 年至 1997 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2%、4.8%、5.2% 和 6% (估计数)。塞内加尔已制订 1995—2000 年的经济发展计划。根据此计划, 5 年内总投资为 12744 亿非洲法郎 (约合 25 亿美元), 年均经济增长率为

6%，通胀率为2%，到本世纪末将现有的贫困人口减少50%。

但是，塞内加尔要实现上述经济发展目标还面临着许多困难：

(1) 经济对外依赖性大，外债负担沉重。在塞内加尔的工业和贸易部门，法国资本仍占75%左右，在保险公司的资本中，法国资本占50%。塞内加尔大部分的工业和商业被法国私人资本所操纵。政府每年均依靠外援来填补财政赤字、发放工资和偿还内外债务。而1994年外债已高达37亿美元。今后几年投资总额的70%要依靠外援。外援能否到位将对塞内加尔的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

(2) 缺乏资金，发展生产困难重重。国内储蓄率低于10%，投资率只有14%。投资不足严重限制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产量不理想的主要原因是农民无力购买化肥和农机具老化。资源贫乏，出口能力有限，大部分原料、设备和日用消费品需进口，而外贸逆差逐年增加。1995年底，议会决定取消1976年在达喀尔成立的“自由工业区”，因为这个区近20年来仅批准32家企业，而只有十几家开工。

(3) 税收过低，国库空虚。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过低，且逐年下降。税收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税制不合理。虽然税率较高，但税额主要由向国家登记注册的企业承担，而那些没有登记注册的企业只负担很少的税额。而后者雇佣的职工总数却有40万，是前者的7倍，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第二，企业不景气，效益下滑，无力纳税。第三，走私严重，国家受损。1992年，走私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约260亿非洲法郎，约占税收的11.4%。

(4) 生产资料的成本费用高。塞内加尔的石油产品价格是其他非洲法郎区国家的2.5倍，电价是科特迪瓦的2倍，而企

业所承担的税额比其他非洲法郎区国家高。在塞内加尔，为创办企业应缴纳的税额和手续费也较高，这对中小企业尤为不利。

3. 非洲“社会民主政党联盟”的迅速扩大。

非洲“社会民主政党联盟”是非洲信奉和接近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些政党和组织，联合组成的地区性组织。它成立于 1981 年 2 月，当时称为“非洲社会党联盟”，于 1988 年 1 月改为现名。成立后，这个联盟的队伍不断壮大，特别是冷战后，已发展成为非洲大陆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非洲社会民主政党联盟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国际和地区背景：第一，受社会党国际宣传的影响。1955 年社会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对非洲和亚洲国家竭力宣传“民主社会主义是唯一的选择，它提供了在自由条件下解决这些国家迫切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办法”。第二，60 年代以来，一些国家试验非洲社会主义遇到不少挫折，有的改行民主社会主义。第三，像桑戈尔等老一代民族主义领导人，在西欧留学时深受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他们回国执政后，为推广民主社会主义并筹建地区性组织而长期奔波。

1966 年 5 月，毛里求斯工党被社会党国际第十次代表大会吸收为正式成员。1976 年 11 月，塞内加尔进步联盟被社会党国际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接纳为正式成员。1981 年 2 月 26—28 日，非洲社会党联盟在突尼斯召开了成立大会，由塞内加尔社会党和突尼斯社会主义宪政党等 10 个正式成员党以及科特迪瓦民主党和多哥人民联盟等 7 个观察员参加。会议通过了非洲社会党联盟宪章，发表了《突尼斯宣言》和《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协议》。1988 年 1 月，非洲社会党联盟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已有 20 个正式成员，21 个联系成员和观察员。这

次大会决定，把非洲社会党联盟改名为非洲社会民主政党联盟；为在组织上扩大队伍，改变以往仅同意实行多党制国家的政党参加的规定，允许“凡是主张社会主义和维护民主与人权的非洲政党”加入；确定联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就经济发展和安全等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和交流经验。

非洲社会民主政党联盟的基本主张是：在政治上，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均未反映非洲人民的愿望，而民主社会主义是非洲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主张实行多党制、政治民主、言论自由、三权分立、尊重人权、实行社会公正、建立法制国家、保持政局稳定。在经济上，认为发展生产的首要任务是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要合理组织劳动力，有效利用资源，建设大型的、相互配套的设施，发展农业、实现粮食自给。在社会领域，主张发扬非洲国家的传统，弘扬民族文化，保持非洲国家的特性。在非洲大陆，必须实现统一，实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一体化。在对外关系方面，奉行不结盟政策，反对一切形式的政治、文化霸权主义，开展国际合作，建立各国人民、各民族之间公正的持久的和平，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要求减免或取消非洲国家的债务，合理利用外援。

非洲社会民主政党联盟近年的活动有：

1991年8月，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强调指出，非洲大陆正在发生重大动荡，民主成为当今非洲不可避免和不可逆转的选择。“国民大会”是建立民主社会的途径，但不是唯一的方式。今后不能再以非洲特性为借口把个人或政党独裁强加给人民。民主能使各国人民自由地选择领导人和社会制度。大会呼吁非洲各国领导人、各朝野政党领导人为实现民主、和平和达成全国一致而努力，认为这是维护国家稳定的前提条件。

1992年7月在突尼斯举办了关于培训非洲青年政治干部讨论会，同年12月在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召开了在建设非洲新社会中妇女和青年作用的讨论会。

1994年5月在突尼斯组织了关于非洲农业前景的讨论会。

1995年1月14—15日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联盟主席、塞内加尔总统迪乌夫在讨论会上作了《非洲的安全、稳定和民主》的报告。大会总政治决议指出，联盟要为深化非洲的民主价值和发展要求服务。“民主是各国人民合理的不可抗拒的希望”，“当务之急是使非洲各国人民拥有真正的、具有透明度的强有力的政治民主，这种民主的基础是法制国家、社会正义、言论自由，各政党的言论自由和依据宪法在稳定的条件下组织夺权斗争”。决议指出，安全、稳定和民主是互相制约的，反对暴力、当局的镇压、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暴行。

现在，非洲社会民主政党联盟已拥有30个正式成员。该联盟保持其独立性，并未正式参加社会党国际，但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社会党国际的会议。非洲社会民主政党联盟积极开展对外活动，与欧洲国家社会党关系密切。1988年起，它与中国共产党有交往，1990年8月，该联盟总书记萨迪克·法亚拉曾应邀访华。

4. 冷战后非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原因。

冷战后，非洲民主社会主义已有了很大发展，已成为非洲大陆最重要的流派。冷战前，非洲只有近10个国家实行多党制，它们大多是奉行非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而在冷战后，非洲绝大多数国家改行多党制，许多政党都公开声明信奉非洲民主社会主义，在实行多党制的国家里，均有主张非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那些在冷战前主张非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

在冷战后的新环境下进一步实践自己的主张；过去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一些政党，也先后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如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等；非洲国家许多不同类型的民主党和泛非社会主义政党的主张均与非洲民主社会主义大同小异。所以，现在非洲国家许多政党都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信条。

非洲民主社会主义在冷战后发展较快有其深刻的原因。第一，冷战前主张非洲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相比较而言，政局较稳定，经济有所发展，被视为“民主的橱窗”和发展的“样板”，对其他非洲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二，西方国家竭力向非洲国家推行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尤其是社会党国际大力宣扬它的主张，并派其成员到非洲积极活动，宣传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是非洲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第三，苏联和东欧的剧变给非洲国家带来巨大的打击，使一些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寻找新的出路，改行民主社会主义，以求生存与发展。第四，在“多党浪潮”中应运而生的非洲国家的许多政党，把过去的一切社会弊端都归咎于一党制，认为非洲民主社会主义所主张的政治上的多党制和经济上的自由化是非洲国家的发展模式。第五，非洲国家的人民渴望变革，其中不少人对非洲民主社会主义寄予较大的希望。

第19章

多元化格局中的 拉美社会主义

拉丁美洲是多元化思潮与政治格局并存的大陆。现有 200 多个重要政党大体分属于 4 大体系，即：社会民主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拉美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 3 种思潮与政治势力在除古巴以外的其他拉美国家的政治舞台上起支配作用，而马克思主义力量还很小。

苏东剧变使拉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普遍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和组织上的分裂，力量进一步削弱。但近年来的事实表明，由苏东剧变所引发的“震荡期”已基本过去。拉美共产主义政党的力量虽有所削弱，但其基本队伍保存下来了，现拉美仍有共产主义政党 30 多个，党员人数约 40 万。一些共产党还获得

了较大的发展，甚至超过了苏东剧变前。

上个世纪下半叶，随着大批欧洲移民的进入，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拉丁美洲。欧洲移民既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也带来了欧洲其他各种政治与社会思潮。长期来，世界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在拉美几乎都有其一席之地。另一方面，随着拉美“民主化”浪潮的发展，三权分立的代议制民主政体的巩固和发展，各国逐渐形成了多党制、多元化的政治格局。因此拉美是多元化思潮与政治格局并存的大陆。大体说来，现在拉美有4大政治思潮和政治势力，它们是：社会民主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拉美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拉美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多元化思潮与政治格局的条件下，在与其他思潮和政治势力的竞争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

一、拉美多元化的思潮与政治格局

拉丁美洲总面积 2070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欧洲。人口 4.6 亿，占世界总人口的 8.1%。它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近 1 万亿美元，年人均 2250 美元，高于亚洲和非洲的平均水平。少数发展较快的国家如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已步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拉丁美洲自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起，逐步沦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后来又长期遭受美国的剥削和压迫。经过上世纪的独立战争和本世纪以来的民族解放斗争，拉丁美洲现有 33 个独立国家，已只剩 13 块小殖民地。

拉美政治是多元化的，因而党派林立，思潮众多。目前拉

美有各类重要政党数百个，各种思潮名目繁多。战后以来，拉美比较盛行的思潮有：拉美社会民主主义、拉美基督教民主主义、拉丁美洲主义、格瓦拉主义、新社会主义、马里亚特吉思想、桑地诺主义、智利社会主义、合作社会主义、阿普拉主义、瓦加斯主义、庇隆主义（正义主义）、革命民族主义等等。随着历史条件和客观形势的变化，有的思潮已逐渐完成其历史使命而趋于消失，有的则仍然角逐在今日的政治舞台上。如果将名目众多的思潮和政治势力归归类，当前拉美 200 多个重要政党，按其意识形态、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大体可分为 4 大体系和势力，即：社会民主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传统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

（一）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及其政治势力

它们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民主主义势力在拉美条件下的反映和发展。这股势力自 60 年代末以来在拉美影响逐渐扩大。现在社会党国际 142 个成员党中，拉美占了 32 个，其中包括正式成员党 21 个：阿根廷人民社会党、阿鲁巴人民选举运动、巴巴多斯工党、玻利维亚革命左派运动、巴西民主工党、智利社会民主激进党、哥斯达黎加民族解放党、荷属库索岛新安的列斯运动、多米尼加革命党、厄瓜多尔民主左翼党、危地马拉社会民主党、海地革命进步民族党、牙买加人民民族党、巴拉圭二月革命党、波多黎各独立党、委内瑞拉民主行动、智利民主党、智利社会党、海地全国民主运动大会党、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墨西哥民主革命党等；咨询成员党 9 个：哥伦比亚自由党、圭亚那劳动人民同盟、秘鲁阿普拉党、乌拉圭争取人民政权党、委内瑞拉人民选举运动、阿根廷公民激进联盟、多米尼加工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巴拿马民主革命党

等；观察员党 2 个：哥伦比亚“四·一九”民主联盟、海地政治组织等。此外，还有一些政党和组织虽然尚未加入社会党国际，但思想体系属于社会民主主义。总之，这一股势力在拉美发展很快，目前它们在不少国家执政或参政，是一股逐渐占优势的势力。

拉美社会民主主义势力的理论和主张，与欧洲社会党基本相同，但又有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特点。他们接受了社会党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并结合拉美国家的实际，加进了自己的一些解释。例如多米尼加革命党总书记戈麦斯说：“我们要走一条既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反动的资本主义的中间道路。”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领导人之一佩雷斯说：“人们坚信，无论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不是人类确定自己未来的最好公式”，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是最好的。他们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其含义同发达国家的社会党人的主张基本一样，即主张实行“多元政治”、“混合经济”和“社会正义”。但是他们在 70、80 年代较多地强调坚持“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佩雷斯在《委内瑞拉和世界》一书中说：“一种不可摧的意志已经把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在一起”，“第三世界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形成一支能够参与解决世界重大问题的决定性力量”。他们还提倡拉美民族主义，主张实现拉美一体化。80 年代拉美社会党一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拉美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获得完全的民族解放。尽管各国有差异，但却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因此要实现变革，就必须实现拉美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一体化。”近年来他们仍强调“国际正义”，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二）拉美基督教民主主义及其势力

基督教民主主义起源于欧洲，是在天主教关于社会问题的主张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19 世纪末，这股思潮开始在拉美传播，由于拉美 80% 以上居民信奉天主教，这股思潮和势力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1878 年乌拉圭建立了拉美第一个基督教民主主义组织——“基督教社会政治俱乐部”。初期这类组织带有较多的宗教团体性质，后来发展成社会政治组织。本世纪 30 年代前后，这类组织中的激进分子主张社会改革，他们成为基民运动的积极分子，陆续组建政党，其中包括智利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弗雷（1911—1982）和委内瑞拉基督教社会党领袖卡尔德拉等人。通过理论和组织准备，这类政党后来活跃于政治舞台。1964 年智利基督教民主党领袖弗雷以 56% 的选票当选为总统，成为拉美第一个上台执政的基民党领袖。此后委内瑞拉基督教社会党又于 1968 年和 1978 年两次在大选中获胜上台执政。其他国家的基民党也先后执政或参政，于是基民党、基社党崛起为拉美一大政治势力。

在国际上，两个地区性的基督教民主主义组织，即欧洲基督教民主主义组织与美洲基督教民主主义组织，于 1964 年联合成立国际性机构——世界基督教民主主义联盟，1982 年 11 月“联盟”决定改名为“基督教民主党国际”。目前该国际的 54 个成员党当中，有 25 个来自拉美，几乎占其总数的一半。

拉美基督教民主主义势力的理论和政策，与发达国家同类政党的基本相同，但也有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特点。例如拉美基民主义自称“第三势力”，宣传“第三条道路”。他们宣称“既唾弃自由资本主义的人剥削人，也唾弃极权国家剥夺人的自由”；主张实行“社会正义”以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实现自

由”以反对共产主义；强调“以天主教义为哲学观点及思想伦理准则”，“通过民主性质的政治行动来实现基督教的社会理想”。其基本政治主张是：建立有别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共产主义公有制的“共有制社会”。所谓“共有制社会”，其核心是主张限制而非消灭私有制，以消除阶级鸿沟；主张多种所有制并存，鼓励共有制部门的建立和发展；以此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的特点是“兄弟般的联合，真诚合作，真心实意互相同情和关怀，以寻求共同利益”。他们还主张实行“完全的民主”、“多元制民主”、“参与的民主”；主张通过政治斗争改造社会，反对诉诸暴力；主张国际正义，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三）传统的民族主义政治势力

拉美民族主义政党一般产生于重大历史事件或以某个杰出领袖人物为核心形成的，如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阿根廷的正义党、秘鲁的阿普拉党等。它们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各种政治思潮，结合本国实际，提出了自己的纲领主张。

这类传统的民族主义政党，有不少也主张走既非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维护国家独立、反对外来干涉的民族主义更为强烈，而“民主”的口号却不如上述两类政党提得那么高。例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长期强调“革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劳动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财富原本属于全民族，国家是民族最高利益的代表，主张建立民主、公正、自由、平等的新社会。其政治主张是：政治上的革命民族主义——调解阶级矛盾，实现民族团结和平等；经济上的革命民族主义——实行混合经济制度，加强国营和社会经济部门，发挥国家对经济的计

划指导作用；文化上的革命民族主义——保护墨西哥民族传统和习惯，提高公民的民族意识，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对外政策上的革命民族主义——反帝、反殖、反霸，捍卫民族独立和主权。阿根廷正义党则奉行阿根廷前总统庇隆的“第三立场”，即“正义主义”学说。这一理论认为，“无论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已经过时的制度。资本主义通过资本剥削人，而共产主义通过国家剥削人，两者通过不同的制度同样损害人”，“我们若选择其中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为我国人民带来应得的福利，因此我们决定创立一个第三立场，即正义主义”。而所谓正义主义，即主张“人道地使用资本”，要关心工人的福利，主张劳资合作。在对外关系上，主张经济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秘鲁的“阿普拉主义”是该党创始人阿亚·德拉托雷提出的一种有拉丁美洲色彩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该理论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作一番“适应”拉美情况的“改造”，提出既不要传统的资本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而要在拉美实现“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再搞“社会主义”。该理论主张建立“多阶级的反帝联盟”、建立“反帝国家”，其民族主义是相当明确和强烈的。这些党的上述传统理论，在新的形势和历史条件下，有所调整和发展。如在对外政策上，“反帝”的口号有调整变化，现在强调国际公正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主张吸收外资与发达国家合作等。在国内政策上，强调政治民主、混合经济、利用市场等。

尽管这些传统的民族主义政党也主张“中间道路”、“第三条道路”，许多主张与社会民主主义相似或相近，但是由于这类政党是依靠民众的支持上台，并借助群众的爱国反帝情绪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往往由一个党或一个领袖长期连续执政（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阿根廷的正义党），因

此过去长期被西方斥责为“民众主义”、“缺乏民主”，“独裁”（阿根廷庇隆）或仅仅是“半民主国家”（墨西哥）。社会党国际也长期不愿接纳它们作为成员，而他们中的一些党对社会党国际的兴趣也不大。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这些党理论和政策的调整，这类政党与社会党国际的关系已改善和密切起来。秘鲁阿普拉党在上届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被吸收作为咨询成员党（但至今还没有升格），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1996年召开的社会党国际二十大上被吸收为咨询成员党，然而阿根廷正义党仍居该国际之外。

（四）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势力

这股势力虽然在古巴取得了伟大胜利，但在拉美其他国家仍然很弱小。拉美国家独立后普遍仿效欧美模式制定了宪法，建立了三权分立的代议制民主政体。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拉美“民主化浪潮”的发展，原来几乎是清一色的军人政府，陆续兴起“军人还政于民”的民主化浪潮，1994年海地危机的解决，结束了拉美最后一个军人政权。在多元化政治格局下，拉美多数共产党已取得合法地位，不少共产党已在联邦或地方议会有了自己的议员。智利共产党1993年参加大选，得票率为4.5%，1996年大选中得票率上升到5.92%，并在全国341个市政府中获得两个市长位置。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在1995年的大选中有一名领导人当选为众议员。但是，该党在1990年的大选中却拥有1名参议员和5名众议员。委内瑞拉共产党在1993年12月大选中获得一个众议员席位。哥伦比亚共产党参加了1994年的大选，获得1个参议员席位，并和其他力量联合取得3个众议席、10个省议席、13名市长和165名市议员。厄瓜多尔马列主义共产党也在议会中获得2

个席位。此外，瓜德罗普、马提尼克等国的共产党也有议员在活动。

总之，拉美虽然有上述 4 股政治势力，但除古巴以外的其他拉美国家的政治舞台，基本上被前 3 种政治力量所左右。相对弱小的共产主义政党，在苏东剧变的冲击下，力量进一步削弱，一些意识形态和社会成分多元化的新左翼政党则发展迅速。在此形势下，拉美传统共产党也在调整路线和政策。总的说来，由苏东剧变引发的拉美共产党的动荡局面已基本结束，基本力量保存下来了，但其面临的形势仍很严峻，发展的道路将是漫长曲折的。

二、拉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概述

拉丁美洲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兴起较早的地区之一。19 世纪马克思主义就随欧洲移民的迁入而传入拉丁美洲。拉美共运的历史是跟 3 个国际的历史紧密相连的。据记载，1854 年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就可读到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巴黎公社失败后，有些人员如爱弥尔·托马斯跑到拉美避难，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后就成立了一些国际支部和革命活动小组。在阿根廷搞过 4 个第二国际的支部（1872—1876），还建立了社会党；在智利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中心”；在乌拉圭建立了“卡尔·马克思中心”；古巴工人在 1892 年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好些地方引用了拉美的事例，可见马、恩对拉美工作还是较关心的。

拉丁美洲也是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很活跃的地区之一。上个

世纪有无政府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本世纪以来托洛茨基跑到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在拉美也很有市场。上世纪末拉美就出现一些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其中阿根廷和乌拉圭的社会党加入过第二国际。本世纪初到十月革命胜利期间，拉美的社会党与第二国际的情况一样，处于急剧分化的过程，组织上是四分五裂的。左翼社会党人后来转向共产党，并加入了第三国际。1912年6月4日成立智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922年1月正式改名为智利共产党；1918年1月成立了阿根廷国际社会党，很快改名为共产党；1920年9月成立乌拉圭社会党，1921年正式更名为乌拉圭共产党。此外，在十月革命的推动下，又成立了一些新的共产党。至1930年以前的10年中出现了大约10个共产党（巴西、乌拉圭、巴拉圭、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古巴、巴拿马、洪都拉斯、萨尔瓦多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拉美的共产党已达19个，有10个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其中阿根廷共产党还是第三国际的创始成员。

在十月革命的推动下，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积极参加、领导了各种各样的群众斗争。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30年代智利共产党曾进行了通过和平道路取得政权的尝试，没有结果。而巴西共产党接受了武装夺取政权的任务，1935年11月中下旬，领导了巴西东部沿海数城市的武装起义。起义虽给政府造成一阵恐慌，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和缺乏正确战略策略，遭到了惨败。巴共主要领导人，包括武装起义最高领导人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纷纷遭到逮捕，有的遭到暗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拉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大都积极参加了工人、农民的斗争，有的党，如危地马拉共产党曾积极协助本国激进政府向本国封建势力和美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一般都处于地

下或半地下状态，随着战争的结束，拉美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获得合法地位，力量 and 影响迅速增加。比如巴西共产党，不仅党的组织得以合法化，而且党员由战前的几千人，迅速发展发展到 20 万人，在 1945 年的大选中党的总书记普列斯特斯当选为参议员，党的另外 15 位领导人当选为联邦众议员，一举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二次大战后获得合法地位的还有巴拿马人民党（即巴拿马共产党）、古巴共产党、厄瓜多尔共产党（因参加 1944 年 5 月 28 日人民起义成功而入阁）、委内瑞拉共产党、巴拉圭共产党、智利共产党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随着冷战时期的开始，拉丁美洲绝大多数共产党相继又被打入地下。这个时期，不少共产党领导工人、农民、学生也同政府当局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 50-60 年代有的政党还开展了武装斗争。危地马拉共产党（1952 年 12 月后改称劳动党）、哥伦比亚共产党、委内瑞拉共产党、巴拉圭共产党、巴西共产党等都先后单独或与其他激进的政党，组织或支持武装斗争。这些党的斗争有的坚持时间较长，有的转瞬即逝，但都给政府以巨大震动，在国内产生重大影响。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由于国际共运发生分裂，拉丁美洲绝大多数共产党也一分为二，或分化成更多的小党派。据统计，到 1970 年前后，拉美除原有的老党外，另外出现比较激进的共产党或组织约 20 个。到 1990 年，拉美非执政的共产党大大小小约有 40 多个，它们有党员约 50 万人。其中力量 and 影响较大的有：巴西的共产党（0.6 万人）、巴西共产党（9 万人）、智利共产党、乌拉圭共产党（5 万人）、阿根廷共产党、哥伦比亚共产党、玻利维亚共产党（0.5 万人）、秘鲁共产党（团结）、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等。

三、苏东剧变对拉美共产党的冲击和影响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对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都产生了巨大冲击，造成巨大混乱。

在东欧各国出现严重混乱和蜕变之际，巴西的共产党于1991年5月30日召开九大，党内分为3派，展开了激烈斗争。以里约热内卢大学原校长奥拉西奥·马塞多为首的“马列主义派”、以党主席萨洛芒·马利纳、党的副主席罗贝托·弗莱雷为首的“自由派”和以多明戈·托德罗为首的第三派展开激烈辩论，但最终达成妥协，除改选弗莱雷为党的主席外，无根本性变化。但1991年8月苏共解散之后，巴西的共产党即在1992年1月25日召开十大。大会决定放弃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从党的旗帜上取消镰刀斧头标志，并决定解散巴西的共产党，成立“民主左派党”，不久又更名为“社会主义人民党”。1993年3月23日，以马塞多为首的马列主义派重新召开巴西的共产党十大，宣布重新建设巴西的共产党。

巴西共产党也受到一定的震动，但没有受大的影响，力量反比过去有较大发展。正如该党主席若昂·阿马佐纳斯在该党1995年8月举行的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所说的：90年代初，苏联社会主义的最终垮台，震动了我们曾捍卫过的理想主义的、非辩证的信念。但是由于近年来巴西共产党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并且旗帜鲜明地捍卫马列主义理论，维护工人、无地农民和下层劳动者的利益，使该党在国内的影响与其他各左派组织不同，巴西共产党不仅在各级议会选举中的选票有不少增加，在联邦和州、市议会中的议员席位有增加，而且在劳动者

和学生中的吸引力也大大增加了；因此巴西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反而急剧扩大，党员队伍由冷战结束前的 9 万人猛增到目前的 20 万人，在联邦众议院中的席位由 80 年代的 5 名增至目前的 10 名。

乌拉圭共产党发生了分裂，力量已大为削弱。该党在 80 年代的发展势头本来很好。它当时是乌 3 大政治力量中广泛阵线内第一大党，到冷战结束前，党员曾由 0.5 万人增加到 5 万人，增长 10 倍。但是在苏东剧变之前党的主席阿里斯门迪逝世，剧变之时乌共总书记海梅·佩雷斯政治上发生动摇，在 1992 年 5 月举行的“特别代表大会”上，他主张“朝着民主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乌拉圭人的幸福之路，是和睦相处的新方式和民族复兴之路”。他的主张虽然遭到党内部分领导人和基层组织的反对，但他仍带领 20 多名中央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分裂出去，宣布建立“人民民主党”。在此情况下，以乌共原总书记罗德内·阿里斯门迪的女儿玛丽亚娜·阿里斯门迪等人为首的一些领导人，在党内部分党员要求下，于 1992 年 5 月的特别代表大会上，决定坚持原来的党名和纲领，使该党得以保存下来，目前它有党员约 0.7 万人。

玻利维亚共产党发生了分裂。1991 年 8 月以中央书记萨拉斯为首的一些领导人鼓吹社会民主主义，并拉出该党近一半党员，成立“民主社会主义抉择党”。但是以总书记马科斯·萨莫拉为首的“革新与改革派”，表示坚持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现玻共有党员约 0.25 万人，其党员比“民主社会主义抉择党”少，但在参、众议院均有席位。

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在苏东剧变后也发生严重分裂。该党中央分裂为“民主社会主义派”、“正统派”和“取消派”。1991 年 9 月，以奥斯卡·马德里加尔为首的“取消派”力量最

强，该派退党后，带走了大约 40% 的中央委员以上的领导人。以温贝尔托·巴尔加斯·卡沃尔内为首的“正统派”于 1991 年 10 月召开党的十七大，制定了新的纲领，并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委员会，目前已实现了党员队伍的稳定。

智利共产党过去长期将苏共当成“教科书”，后来从苏东剧变中吸取了教训，使党的力量反而有所增强。该党长期与苏共保持一致立场，对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表示赞成，并支持其“改革”。但在苏“8·19 事件”后，改变了态度，对戈氏思想及其改革进行批判，表示不再把苏共“当教科书”。1992 年 4 月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1994 年 8 月十六大对戈氏的改革进行批判，并总结了经验教训。该党 1990 年成为合法政党，有党员 5 万，在 1993 年全国大选中，得票率为 4.5%。1996 年大选中得票率上升到 5.92%，并在全国 341 个市政府中获得两个市长职位。

苏东剧变后，在阿根廷共产党、智利共产党、秘鲁共产党、哥伦比亚共产党等左派组织中，都程度不同地发生了分化。但经过一个时期的动荡之后，目前均已处于相对稳定阶段。

就整个拉丁美洲而言，苏东剧变的冲击波基本上已经过去。目前拉美非执政的共产党大约有 30 多个，共有党员约 40 万人。

四、拉美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看法

经过苏东剧变，拉美共产党普遍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它们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苏联和东欧剧变进行分析，重新

认识社会主义的前途。

（一）批判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其“改革”

巴西共产党 1992 年 2 月在其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认为：“苏联和东欧已全面崩溃，出现了一批资本主义类型的共和国。计划经济的解体 and 转变为市场经济，造成了消费品生产和分配的完全无组织状态。他们的人民每天都处在排队和食品配给的悲剧当中。在那里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具有法西斯性质的特点。”“苏联、东欧以及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的失败、一切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东西的被破坏，加剧了社会主义的危机。”“反动的资产阶级与反共运动相结合，使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对工人阶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更为变本加厉。”该党主席若昂·阿马佐纳斯在会上强调，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解散，是“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加强了对马列主义和工人阶级政党的进攻”的结果。他说，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正确理论怀疑正在蔓延开来”的时候，“一些已经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比如古巴、越南、北朝鲜和中国人民仍坚持推进自己的事业，各个马列主义政党和反修力量坚持不懈地为革命力量的团结而努力”，巴西共产党必须继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哥伦比亚共产党在 1991 年 8 月召开的十六大上认真批判了“修正主义”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的破坏，特别强调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把苏联引入“死胡同”。大会认为，由于戈尔巴乔夫对资本主义步步退让妥协，使他成为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的“掘墓人”。

智利共产党开始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苏共的“改革”表示支持。但是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并

导致苏联解体后，智共的立场发生根本性转变。它对戈氏思想及其改革进行批判，表示不再把苏共“当教科书”。1992年4月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1994年8月十六大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总结了经验教训。十六大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是：苏共领导“脱离人民”起了“致命的作用”；苏联长期把“党和国家混为一体”，造成了“经济停滞”；苏联“极其有限的政治民主和严重的官僚主义”、苏共领导的分裂、“没有意识到应进行科技革命”、“看不到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帝国主义的破坏等多种因素，造成了苏联的崩溃。

（二）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拉丁美洲大多数共产党认为，苏联东欧剧变只不过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但不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完结；社会主义仍是拉丁美洲各国的唯一选择，仍然坚持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

各党普遍强调“社会主义没有统一的模式”，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更不会一样。智利共产党1991年11月制定的纲领草案指出：苏联东欧剧变，使社会主义事业和革命运动“暂时处于低潮”，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模式的危机，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厄瓜多尔共产党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仍然有效，“社会主义本身并没有失败，失败的是那些不懂得怎样实行社会主义的人”。秘鲁共产党（团结）认为，如果各国共产党能改变策略，提出顺应民心的口号，仍有作出新的抉择的机遇。因此，拉美共产党强调“社会主义没有统一的模式”，各国的社会主义斗争道路不可能是一样。秘鲁共产党（团结）也强调要建设秘鲁式的社会主义。哥斯达黎加人民先

锋党认为，哥斯达黎加所要建设的是“民主的社会主义”，即是“根据哥斯达黎加的传统、历史和民族特色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其他社会主义的翻版”。马提尼克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巴西共产党主张在巴西建设有巴西特色的社会主义。

巴西共产党等少数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对社会主义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巴西共产党在 1993 年 9 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巴西共产党社会主义纲领（草案）》，该文件中说，尽管社会主义在原苏联和东欧受挫，但它“继续是受剥削者和受压迫者以及一切渴望自由与社会进步的人们的希望”，“社会主义是各国人民灿烂未来”。该党多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优越于没落的资本主义”。该党主席若昂·阿马佐纳斯在 1995 年 8 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题为《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90 年代初，苏联社会主义的最终垮台，震撼了我们曾捍卫过的理想主义的非辩证的信念。我们开始看到，建设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意志的表现和革命的动力，而且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向新社会迈出必要的步伐。如果没有或尚未创造出实现社会进步理想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就达不到崇高的目标。”阿马佐纳斯还说：“在过渡时期的问题上，从我们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经验教训分析来看，我们的初步的结论是：（1）过渡的唯一模式是不能接受的。过渡的方式应当符合每一个国家的客观实际、发展水平、民族和历史特性。（2）不同过渡阶段的时间不可能是短暂的。急进的共产主义是错误的。尽管社会主义意味着快速发展节奏，但也会违背辩证法，强行冒进，一意孤行。（3）过渡必须以现有的实际为

依托，寻找每一条使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链条都能运转起来的环节。(4) 过渡不能混同于和平道路、阶级调和。它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漫长时期，并表现出独特的特征。企图为革命和建设的步伐设置障碍的人或集团大有人在，同这股势力直接斗争是必要的。但是，阶级之间的争斗，从其历史意义来讲，也将广泛借助于各种方式和工具，限制以至消除资本主义发展，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前进和巩固。”在结合巴西具体实际时，阿马佐纳斯说：“在分析如何根据我国的特色来建设新社会的同时，我们认为，巴西可能会出现3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根本阶段：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级阶段；全面社会化的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阶段。”

其他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及其前途的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和看法。

秘鲁共产党（团结）强调，虽然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曾取得一些成就，但他们过去所搞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官僚主义、专制和人民很少或根本没有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并在经济方面犯了错误”。

巴西的共产党内部坚持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一派，不仅很快重组了“巴西的共产党”，而且一再宣布“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战无不胜的真理”，认为“世界的真正的出路就是共产主义”。该党主席法里娅在1995年10月召开的六大期间，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坚信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无所畏惧的马列主义者，只要阶级斗争尚存，就要生命不息，斗争不止，永远高举共产党的大旗。”

委内瑞拉共产党认为，苏东剧变只不过是人类在为建立一

个更公正的社会的斗争中“输掉的一场战役”。但是，社会主义已显示出其巨大的优越性。

(三) 认为世界共运处于低潮，但中国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希望

拉美多数共产党认为当前国际共运形势处于低潮，但社会主义仍是人类的未来。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原因，主要是苏共和东欧原来执政的共产党的解散或分裂、蜕变，同时拉美各国共产党许久以来存在于自身的缺点和错误，也是拉美共运遇到严重困难的重要原因。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说明社会主义并没有失败，这对世界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是巨大的鼓舞。

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总书记阿尔韦托·莫雷诺 1996 年 11 月畅谈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印象。他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使秘共（红色祖国）深受鼓舞。苏联解体后，西方舆论宣称社会主义从此消失了，世界将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然而中国的现实却表明，社会主义不仅依然存在，还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发展，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善于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敢于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中国已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的平衡力量。

巴西的共产党中央执委埃杜阿尔多·塞拉在 1995 年 2 月赞赏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他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财富。”

多米尼加劳动党主席阿塞·贡萨莱斯·埃斯皮诺萨 1995 年 5 月强调：“中国的成就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力量的

巨大鼓舞。”

阿根廷共产党总书记帕特里西奥·埃切加赖 1996 年 1 月在评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时说：“在当前仅有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的成功使其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感到鼓舞，也会使世界的革命者感到社会主义有了希望。” 1997 年 9 月，阿根廷共产党在给中共十五大贺电中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有利于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和社会公正的斗争。”

玻利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马科斯·多米奇在 1997 年中国国庆 48 周年之际致中共中央的贺电中说：“一切表明，中国经济将在 21 世纪之初成为世界之首。这使我们满怀欣喜，因为在社会生活这一决定性领域，社会主义将显示出比资本主义更大的优越性，同时表明科学社会主义是能够指引人类发展并使之全面达到更新更好境地的唯一正确学说。”

五、拉美共产党理论上的反思 与政策上的调整

拉美共产党在总结苏东剧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近年来根据国际形势和本国情况的发展和变化，结合本国和本地区的实际，对自己的纲领和政策都进行了情况不同的调整，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和看法。

（一）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但各党所强调的原则各有侧重。拉丁美洲的多数共产党表示遵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哥伦比亚共产党在 1991 年 8 月举行

的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申党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智利共产党在1992年4月的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断发展、变革的，基本思想依然有效，仍然是智利共产党的行动指南。”1994年8月该党举行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报告要求智利共产党人重新“读一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是很有必要的，它将有助于建设一条通向参与性的社会主义道路”。秘鲁共产党（团结）1991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大决定：“尽管苏东变色，但秘共决不更改党名，更不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此外，阿根廷共产党、厄瓜多尔共产党、巴拿马人民党、玻利维亚共产党、乌拉圭共产党、巴拉圭共产党、墨西哥社会主义人民党、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玻利维亚共产党（马列）、危地马拉劳动党均在自己的党的文件中表明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有些党在提法上有些调整或侧重，但大的原则没有变化。有些党，除强调遵循马列主义外，还强调本国本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如秘共（团结）1996年11月底在党的十一大上明确作出决议，规定“党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国内和国际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贡献，特别是马里亚特吉的思想贡献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二）强调社会主义没有“统一模式”、“固定模式”，必须摒弃教条主义和依赖思想，从本国实际出发，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许多党检讨了长期以来没有真正弄懂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犯了照抄苏联和其他一些模式的错误，脱离了本国实际。1990年3月，阿根廷、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多米尼加5个共产党发表《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革命和进步力量的公开信》，对过去照搬苏联经验和

模式作了自我批评，强调要采取“明确的独立立场”。1991年11月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2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开会，号召各国共产党“保持清醒头脑，寻求独立的发展道路”。1992年和1993年2月，拉美20多个共产党先后两次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召开建党经验讨论会，强调更新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以适应本地区社会主义事业的特点，不能再照搬别人的经验。哥伦比亚共产党强调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寻找出适合哥伦比亚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秘鲁共产党（团结）1995年11月举行的十一大强调：“搞社会主义，必须从自己的现实出发，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分析秘鲁的现实，建设真正秘鲁式的、可行的社会主义。这正是马里亚特吉看待秘鲁的方式。”

（三）强调克服宗派主义，调整与其他政党关系，建立左派的联盟或广泛阵线。1990年6月，由巴西劳工党牵头成立的“圣保罗论坛”这样的中左性质跨国的松散的组织中，拉美各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其每年年会，并积极利用该合法讲坛，陈述自己对本国、本大陆乃至对世界革命的看法。1992年基多会议指出，“党外的革命者可能比党内的还要多，应建立包括在一定时期有共同点的人士和力量的统一战线。”乌拉圭共产党、阿根廷共产党等都是本国“广泛阵线”的积极参加者，甚至是主导力量。在玻利维亚“左派团结阵线”、萨尔瓦多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秘鲁“左派联盟”、哥伦比亚“爱国联盟”等统一战线性质的重要阵线中，都有本国共产党或共产党组织的成员。

（四）调整斗争方式，普遍转向合法斗争。第二次世界大

战之后，拉美曾是武装斗争（游击斗争）的主要战场之一，60—70 年代，游击战在拉美大多数国家都红红火火展开过。但到 80 年代，尤其是 90 年代以来，除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重申斗争方式的“多样性”，包括了坚持武装斗争）、墨西哥等国的极少数组织之外，绝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和左派组织均已停止了武装斗争，先后走上合法斗争和议会斗争道路。巴西共产党目前不仅在全国议会中拥有 10 名众议员位置，而且在众多的州市议会中都有自己的位置。拉美其他部分国家的共产党或多或少在议会也都有自己的议员。但是，拉美仍有共产党认为武装斗争仍不失为迫使政府进行改革的一种手段，而且在同政府谈判中也不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

（五）有些党调整了一些纲领性主张的提法。如秘鲁共产党（团结）冷战后在理论纲领和政策策略上进行了一些重要调整，将“工人阶级政党”改为“劳动者政党”，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改为实现“人民民主”等。该党总书记拉弗在谈到秘共（团结）这些策略变化时说：我们决定把“工人阶级政党”改称为“劳动者政党”，是因为“劳动者当然包括工人阶级，但范围更广”。他在谈到把“无产阶级专政”更改为“人民民主”时说：“我们在重申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立场的同时，也要为争取真正的民主而斗争，这就是劳动者的民主。我们将这种民主称之为人民民主。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不仅仅是无产阶级，而且也是社会其他阶层的历史要求。在当前，民主对劳动者来说具有更高的价值，范围也更广。”他还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该认识新的现实。这一改变并不意味着劳动者放弃了捍卫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利。”

秘共（团结）虽然在策略方针上作了一些变动，但该党强调决不更改党的名称。拉弗说：“党的名称包含着一段斗争、牺牲和为国家的政治、社会发展做贡献的有意义的历程。在我们的经历中曾有过失误，有的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这不足以要改变党的名称。我们认为，党的名称是有价值的政治资本。”1996年11月底该党在首都利马举行党的十一大，明确作出决议：（1）确定将以马列主义、国内和国际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贡献，特别是马里亚特吉的思想贡献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2）将党的性质由现在的“工人阶级政党”改为“劳动者政党”；（3）以“人民民主”替代“无产阶级专政”；（4）会议讨论后决定不更改党的名称。

附：拉美主要共产党冷战前后变化情况一览表

党名	苏东剧变时的动荡和冷战结束后的情况
巴西的共产党	1991年5月30日召开九大，党内分成3派，斗争很激烈。苏共解散后，巴西的共产党在1992年1月25日召开的十大，决定放弃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取消镰刀斧子标志，改党名为“民主左派党”，不久又更名为“社会主义人民党”。1993年3月23日，以里约热内卢大学原校长奥拉西奥·马塞多为首的马列主义派重新召开巴西的共产党十大，宣布重新建设巴西的共产党。
巴西共产党	1992年2月八大重申坚持共产党立场，影响反而急剧扩大，党员人数由冷战结束前的9万猛增到目前的20万。在联邦

众议院中的席位由 80 年代的 5 名增至目前的 10 名。

乌拉圭共产党

冷战结束前曾是国内 3 大政治力量中广泛阵线内的第一大党，党员近 5 万。在 1992 年 5 月举行的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党的总书记海梅·佩雷斯主张接受“民主社会主义”，虽遭到党内部分领导人和基层组织的反对，但他仍带领 20 多名中委和中央执委分裂出去，宣布建立“人民民主党”。但以乌共原总书记罗德内·阿里斯门迪的女儿玛丽亚娜·阿里斯门迪等人为首的领导人，在党内部分党员要求下，决定仍坚持原来的党名和纲领，但该党的党员已只剩 0.7 万人。

玻利维亚共产党

1991 年 8 月发生分裂。以中央书记萨拉斯为首的一派，接受社会民主主义，分裂出去成立“民主社会主义抉择党”；以总书记马科斯·萨莫拉为首的“革新与改革派”，表示坚持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仍用玻共名称。前一派的党员多，但后一派在参、众议院均有席位。

玻利维亚共产党 (马列)

坚持共产党立场，90 年代以来一直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目前仍有参、众议员各 1 名，并有 1 名省长。

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

党内分裂为 3 派，除“民主社会主义派”之外，以奥斯卡·马德里加尔为首的“取消派”力量最强，他们于 1991 年 9 月退

党，带走了大约 40% 的中央委员以上领导人。以温贝尔托·巴尔加斯·卡沃尔内为首的“正统派”于同年 10 月召开党的十七大，制定了新的纲领并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委员会，目前已实现了党员队伍的稳定。

阿根廷共产党

合法政党，1995 年选举法庭登记有党员 8 万，参加组织生活党员 3 万。

阿根廷革命共产党

1992 年 5 月在其党报《今日报》上发表社论说：现在是“毛泽东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共产主义复兴的时候了”。认为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

智利共产党

1990 年成为合法政党，有党员 5 万。长期与苏共保持一致立场，对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表示赞成，并支持其“改革”，但在苏“8·19 事件”后，改变了态度，对戈氏思想及其改革进行批判，表示不再把苏共“当教科书”。1992 年 4 月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1994 年 8 月十六大对戈氏的改革进行批判，并总结了经验教训。在参加 1993 年全国大选中，得票率为 4.5%。1996 年大选中得票率上升到 5.92%，并在全国 341 个市政府中获得两个市长职位。

- 秘鲁共产党 (团结)** 坚持共产党立场, 对戈尔巴乔夫思想及其“改革”持批判态度。上届有 1 名议员, 抵制 1992 年议会选举, 现无议员。
- 哥伦比亚共产党** 1991 年 8 月十六大重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 1994 年大选中, 获得 1 个参议员席位, 并是“爱国联盟”重要成员, 该联盟取得 3 个众议席、10 个省议席、13 个市长职位和 165 个市议员席位。
- 秘鲁共产党 (红色祖国)** 1995 年大选中只有 1 名众议员, 而在 1990 年的大选中曾拥有 1 名参议员和 5 名众议员。
- 委内瑞拉共产党** 1993 年 12 月大选中获得 1 个众议员席位。
- 洪都拉斯马列主义共产党** 1988 年更名为“洪都拉斯改革党”, 并于 1995 年同其他 5 个左派党联合组成“民主统一党”, 改革党的总书记阿尔曼多·富内斯还当选为新党主席。
- 厄瓜多尔共产党 (马列)** 在议会中获得 3 个席位。
- 瓜德罗普共产党** 有 2 个议席。
- 马提尼克共产党** 有议席, 数目不详。
- 巴拉圭共产党** 90 年代初获得合法地位。

第 20 章

冷战后的社会党国际

社会党国际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重建于1951年6月30日。它的历史可追溯到第二国际。该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分裂后，1919年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成立；同年原第二国际右翼在瑞士的伯尔尼召开代表会议决定恢复第二国际，即“伯尔尼国际”；而原第二国际中派（考茨基派）的13个社会党和组织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另行成立了“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亦称“维也纳国际”。由于它自称站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的立场，所以又称为“第二半国际”。后来维也纳国际不再坚持自己原来的立场，于1923年5月与伯尔尼国际合并，在汉堡召开大会，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33年希特勒上台，中欧地区的社会党被取缔。1940年，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由于其

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也被迫停止了活动。1945年3月，由英国工党主持，在伦敦召开了大战以来各国社会党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决定为重建国际成立常设筹备小组。1951年重建的国际正式成立，称为社会党国际。

冷战结束后，社会党国际在组织上有很大发展，理论政策上也进行了调整。该组织1992年召开的十九大，明显回避使用“民主社会主义”一词，而大量使用“社会民主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正式称谓。1996年召开的二十大又新接纳了33个党和组织加入该国际，并将10个咨询成员党转为正式成员党，使该国际的各类成员党发展到142个，共有党员近3000万，有30余个党在各国执政或参政。

一、社会党国际发展概述

（一）历史沿革及其重建

社会党国际（这是习惯译法，按其英文原文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的意思也可译为“社会主义国际”）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以及其他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重建于1951年6月30日。该组织自称其历史始于1864年，即第一国际成立之时。但由于它是沿着第二国际伯

恩斯坦的思想路线演变而来的，一般都认为其历史始于 1889 年，即第二国际成立之时。

第二国际的早期，在恩格斯指导下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各党内部斗争激烈，国际遂分化为右、中、左 3 派，分别以爱德华·伯恩斯坦为首、以卡尔·考茨基为首和以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为代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大多数成员党站在“保卫祖国”的立场上，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从而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社会党的领导人感到需要恢复第二国际的组织以扩大其影响，于是在他们的倡议下，1919 年 2 月在瑞士的伯尔尼召开了战后首次社会党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包括原交战国在内的 26 个国家的 102 名代表。会议决定恢复第二国际，历史上一般称之为“伯尔尼国际”。

1919 年 2 月，原第二国际中派（考茨基派）的 13 个社会党和组织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另行成立了“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亦称“维也纳国际”。由于它自称站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的立场，所以又称为“第二半国际”。后来维也纳国际不再坚持自己原来的立场，于 1923 年 5 月与伯尔尼国际合并，在汉堡召开共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421 名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

1933 年希特勒上台，中欧地区的社会党被取缔。同年，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在巴黎召开特别会议，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反法西斯斗争，但不主张同共产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随着形势的发展，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东欧各国才先后建立了有共产党、社会党以及其他党派参加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战争爆发后，除英国、瑞士和瑞典 3

国的社会党仍合法存在外，欧洲的 33 个社会党大都遭到镇压，许多社会党的领导人流亡到英国和瑞典。1940 年，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由于其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也被迫停止了活动。当时在伦敦有一个委员会与部分成员保持着联系，在瑞典也有一个后来称为斯德哥尔摩小国际的组织在活动。但它们活动的范围有限，也没有足够的权威能代表国际社会党。因此，大战期间实际上不存在社会党的国际组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英国工党和斯德哥尔摩小国际都有意恢复社会党的国际组织。1944 年 12 月英国工党举行年会，邀请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士去伦敦就重建国际组织问题交换意见。1945 年 3 月，由英国工党主持，在伦敦召开了大战以来各国社会党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出席会议的共有 13 个党的代表。会上成立了一个常设筹备小组，以拟订重建国际的计划。1946 年各国社会党在英国的克拉克顿召开战后第一次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有 19 个党的 60 名代表参加。会议重新研究了重建社会党国际问题，但对于建成什么样的国际以及是否吸收原轴心国社会党为成员等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只决定以后每年举行一两次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和在伦敦设立一个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社会党通讯和联络局。1947 年，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召开战后第四次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决定建立新的常设机构“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委员会”，并通过了接纳多年来在重建社会党国际问题上一直被排除在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决定。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加剧，东西欧社会党于 1949 年彻底决裂。之后，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委员会开始集中力量筹备社会党国际的重建工作。在 1949 年 12 月举行的巴黎会议上决定成立秘书处，并任命了一个小组委员会，负责起草有关各国社会党共同的基本思想的原则声

明。以后经过多次磋商，确定了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1951年3月，在伦敦召开了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委员会会议，草拟了纲领和章程。同年6月，在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召开第八次（即最后一次）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一致通过重建社会党国际的决议，并将这次大会作为社会党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至此，社会党国际正式宣告成立。

参加此次会议的有代表34个成员党的106名代表，德国的舒马赫当选大会主席，德国的奥伦豪尔当选大会副主席。大会选举英国的菲利普斯为社会党国际主席，德国的奥伦豪尔和法国的莱维为副主席，奥地利的布劳恩塔尔为总书记。大会通过了《社会党国际章程》和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的原则宣言。章程规定：社会党国际的宗旨是加强成员党之间的联系并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协调成员党的政治态度。此时新的国际一共有34个成员党，4个联系组织，代表978万党员和4350万名选民。7月3日，代表大会闭幕。

（二）在西欧的巩固和发展

社会党国际重建后的初期，其34个成员党绝大部分是属于欧洲国家的党，其主要活动也主要涉及欧洲。只是到了70年代，社会党国际才明确地将自己的组织和活动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地区，使自己逐渐成为真正的世界性的组织。

1. 理论和政策上的建设。

从1951年国际建立时起，直到70年代中期国际开始走出欧洲，甚至直到80年代末，社会党国际在其一大上通过的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的纲领（即原则宣言）一直是有效的，始终没有什么修改。这种理论和政策上的稳定是后来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发展和巩固的重要基础。

该纲领的主要内容为：

——批判资本主义剥夺大多数公民的生产资料和权利，造成社会不安定、贫富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尖锐化和国家及民族之间的冲突更加剧烈。

——指出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是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其目的是把经济的权力交给全体人民，使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在社会中共同工作，而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公平合理、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

——说自己的指导思想是多元的，即包括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的方法、受宗教原则启示的方法和人道主义原则启示的方法。

——攻击共产主义建立了一种僵硬的学说，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不相符合的。指责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并使许多国家中的社会主义的实现推迟了几十年，是新帝国主义的工具，其基础是建立在军事官僚和警察恐怖之上的，只要共产党掌权，就破坏自由。还攻击说，共产党搞一党独裁，创立了一种新的阶级社会。声称自己的奋斗目标是民主的方法建立一个自由的新社会。还说，没有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完成，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道路只有一条，就是民主的道路。

——主张人民享有普遍平等秘密的选举权，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主张实行多党制。

——在经济方面，主张建立一种公私并存的混和经济社会，并通过实行社会主义计划来克服无政府主义状态和使生产为人民服务。在经济政策方面，争取立即实现的目标是：充分就业、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实行社会保险、收入和财产

的公平分配。

——在文化政策方面提出，社会主义的指导原则是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是，社会主义的意义不仅止于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而是在于要通过它们解放和发展人类个性的道德上的价值。

——声称民主社会主义是国际性的，因为它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孤立地解决它的所有经济的与社会的问题，民主政治必须依据保障国家自由与人权的国际法规，在一个国际的规模上建立起来。要求社会主义国家超越绝对主权论，尊重并遵守联合国宪章。指出，民主社会主义必须积极地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在世界上消灭极端贫困、文盲和疾病的痛苦，要反对各种形式的压迫和剥削。认为维护和平是当前世界的最高任务，要贯彻维护集体安全原则。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社会党国际追求的道路是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2. 组织上的发展和巩固。

社会党国际定期召开代表大会，至今已经召开了 20 次代表大会。每次代表大会都反映该国际的发展是稳定和巩固的。

社会党国际一大通过的章程明确规定社会党国际是一个谋求确立民主社会主义的各国政党的联合体。成员党分为正式成员党、咨询成员党和观察员党，每个正式成员党有 1 票表决权，咨询成员党和观察员党有发言权，但没有表决权。章程还规定，社会党国际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代表大会，下设理事会和执行局。大会分别就争取和平斗争中的世界性行动、欧洲联合、充分就业、自由贸易、佛朗哥西班牙、阿根廷局势、释放和遣返战俘等问题通过了决议。此后，社会党国际稳步扩大自己的组织，逐步拓宽活动范围。

1952年10月，社会党国际在意大利米兰召开了二大，37个成员党的117名代表出席大会。大会通过了《社会党人对不发达地区的政策》。社会党国际攻击共产党“企图利用民族主义狂热来分裂世界”。1953年7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三大，36个国家的128名代表出席，大会讨论与亚洲社会党协调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还规定今后每两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1957年7月在维也纳召开五大，39个成员党的130名代表出席大会，重点讨论了缓和与裁军，呼吁停止核试验，强调联合国的作用。1959年7月在德国汉堡召开六大，40个国家的145名代表出席大会，讨论了理论问题，提出必须争取工人阶级以外的其他阶层的支持，以在大选中获胜；支持欧洲共同体的建设。1961年10月在罗马召开七大，46个成员党的170名代表出席，指出各国应根据自身发展阶段确定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认为德国统一取决于国际形势的缓和。1963年9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八大，此时已有50个成员党，出席大会的有45个国家的147名代表，决定今后每3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实际上，为纪念第一国际成立100周年，1964年9月就在布鲁塞尔召开九大。1966年5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十大，51个成员党的181名代表出席大会，表示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讨论与共产党关系，结果多数代表反对与共产党统一行动。大会决定扩大副主席人数和执行局内成员党数量。1969年6月在英国伊斯特本召开十一大，此时已有52个成员党，40个国家的134名代表出席大会，强调向贫困宣战，还就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说，“共产主义阵营已经四分五裂”，“共产主义的共同思想现已不复存在”。1972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十二大，此时已有57个成员党，39个国家的193名代表出席大会。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指出世界正在从对峙过渡到

合作，主张在东西方关系上多谈共同利益，少谈意识形态，让对话代替独白。大会对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表示满意。

（三）走出西欧向全球发展

1. 社会党国际进入“勃兰特时代”。

1976年11月社会党国际在日内瓦召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十三大，66个成员党的200名代表出席，勃兰特首次当选社会党国际主席，长达16年的“勃兰特时代”的开始。勃积极主张国际走出欧洲中心主义进入国际舞台。大会认为只有通过两个超级大国的有效参与才能维持和平，还表示欢迎欧安会的成果。大会修改章程，即扩大执行局机构和权限，取消理事会和总书记职务，加强秘书处，设秘书长，增加副主席，以让亚非拉成员党领导人担任该职，冲破欧洲中心主义。

2. 社会党国际走向世界。

1978年11月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十四大。这是首次在欧洲之外召开的代表大会，69个成员党的代表出席大会。大会指出缓和与发展是分不开的，提出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说充分的人权是和平与发展的保证。1980年11月在马德里召开十五大，74个成员党的代表与会，讨论了裁军、南北关系、经济危机、人权等问题。1983年4月在葡萄牙阿尔布费拉召开十六大，77个成员党的代表与会，中国驻葡萄牙大使列席会议，巴解组织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出席。1986年6月在利马召开了十七大，是首次在拉美和发展中国家开会，82个成员党的代表与会，此时成员党已经大部分分布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共产党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利马宣言》宣称，要为和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而斗争，提出各国人们更加相互依存，人类条件更加国际化，南北的共同危机需要共同的解决

办法，应更多地承担国际主义义务。大会决定谋求与愿意合作的非成员党发展关系。

（四）苏东剧变前后的调整与发展

1. 社会党国际十八大确定对苏联东欧剧变的方针和态度。

社会党国际于1989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十八大，有68个党和组织的代表与会。当年是第二国际诞生100周年，社会党国际想以大会主题表示它才是第二国际的真正继承者。大会的主题是《争取和平与自由的百年——走向新世纪》，并通过了题为《社会党国际的原则声明》作为社会党国际1951年成立以来制订的第二个纲领。这次大会认为，社会党国际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极有影响的国际政治组织，其成员党数量已经发展到88个，有28个社会党在26个国家执政或参政，要利用当时苏东的形势采取“通过自由化和民主化来改革共产主义社会”的方针。十八大的《原则宣言》强调，社会党国际支持一切想要通过自由化和民主化来改革共产主义社会的势力，支持共产主义社会的专业化和民主化，也同样支持和发展非集中的市场机制，以及反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的斗争，特别是还要认识人权和政治公开性是有活力和进步的社会的重要因素。十八大的决议中关于“共产党世界的事态发展”一节里仅仅重申，社会党国际以勃兰特东方政策为基础，一直谋求同中东欧各国关系的新框架。认为，现在苏联发生了显著的变革，其后果是某些中东欧国家也发生了变革；只要这些变革带来政治与经济改造的前景，就应予以欢迎与支持。还说，要抓紧一切机会，对社会主义理想长期以来悲剧性地遭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歪曲的社会重新塑造其面貌做出特殊贡献。

2. 社会党国际十九大就苏东剧变后的形势采取对策。

1992年9月，社会党国际在柏林召开十九大，72个成员党和组织的代表及82个党和组织的观察员、特邀代表一共600多人出席大会。由于勃兰特病危，由秘书长阿拉亚做报告。社会党国际声称，这次选择在柏林开会是为了突出作为德国统一的象征的柏林，同时也是为了庆贺中东欧剧变成功。十九大决议序言声称，这次大会也是针对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挑战而召开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政治、社会和技术等方面的秩序发生革命变化的时代。柏林墙的拆毁标志着一个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和空前苦难的漫长时期的结束，它开始了历史上最大程度地扩大自由的时期。

在组织发展方面，十九大选举法国的莫鲁瓦为新的主席。这样，持续了16年的勃兰特时代结束了。有近70个党申请加入社会党国际。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大会修改了章程，在成员党类别中增设观察员党的档次。大会吸收了由意大利共产党社民党化后演变过来的意大利左翼民主党和由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社民党化后演变过来的匈牙利社会党等25个新成员党加入社会党国际。在一次代表大会上吸收如此多的新成员党，这在国际的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大会决定将东欧和非洲确定为今后工作的重点地区。决定将对东欧成员党给予援助和培训，加强其竞选和组织能力。作为落实十九大精神的措施，在1993年，建立了中东欧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争取中东欧民主与团结论坛和中东欧工作组。

这次大会通过的各种文件明显回避使用“民主社会主义”一词，而大量使用“社会民主主义”一词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正式称谓。这是因为在反共浪潮中社会舆论对共产主义的否定自然引申到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贬责否定。在十九大上当选为主席的莫鲁瓦说，在东欧，把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混

为一谈的现象是令人遗憾的。社会党国际为表明其同科学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而采取这一行动。

3. 社会党国际二十大确定世纪之交的任务。

社会党国际二十大于1996年9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58个成员党、21个联系党、6个观察党、3个兄弟组织和7个附属组织的520多名代表出席大会。另外有65个其他政党及组织的代表177人和特邀嘉宾13人应邀与会。会议期间批准29个党正式被接纳加入该国际，并将10个党发展成为成员党，使该国际的组织力量发展到140个成员党。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到会致词，社会党国际主席莫鲁瓦作了重要发言。大会主题是世界经济、人权、和平、内部建设等。大会分别通过了关于世界经济、建立新共同责任体系、和平、人权等问题的宣言。莫鲁瓦继续当选主席。莫鲁瓦强调，对于社会党国际来说，从现在起到2000年是决定性的一个阶段。他指出，该组织正经历一个变化过程，为此它必需同时追求“三大目标”：（1）就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重大问题开展辩论；（2）继续在全球各地扩大自己的组织规模；（3）改变和加强自身的组织结构。莫鲁瓦同时提出，会议的“三个主题”是：（1）市场必须为人类服务而不是人类为市场服务；（2）要实现和平并保持和平；（3）要制订21世纪人权日程。会后，社会党国际积极落实二十大精神和有关的各项决定。

二、对苏东剧变的方针及其对自身的影响

社会党国际向来宣称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共产主义，但在实践中其反共超过了反资本主义。不过，其反共态度在不同

时期也有所变化。在 50 年代至 70 年代初期，它的反共态度最为激烈，那时它坚决不同共产党合作，而在 70—80 年代，由于受勃兰特的“东方政策”的影响，转为愿意和共产党进行超越意识形态的合作。但在 1989 年苏东发生剧变时，社会党国际的这一态度又起了变化，即由原来的“超越意识形态”与共产党谋求合作的方针，改为突出意识形态并推行“改造共产党社会”的方针，积极干预和支持苏东剧变，对苏东共产党的垮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苏东共产党政权被冲垮之后，社会党本身也受牵连。由于西方舆论普遍向右倾斜，许多人将对共产主义的否定自然引伸为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贬责和摒弃，从而使社会党处于不利地位。

（一）对苏东剧变的政策和作用

社会党国际自 70 年代中期起推行“新东方政策”，80 年代初又提出“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谋求与共产党合作的方针。但是自 1989 年以后，这一方针已逐渐为“突出意识形态”、“改造共产党社会”的方针所取代。社会党国际在苏东剧变时，认为“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共产主义的时机已经到了”。1989 年 6 月，社会党国际十八大通过的《原则声明》宣称：“共产主义已失去了十月革命后和反法西斯斗争中它一度对一部分劳工运动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吸引力。”“社会党国际支持旨在通过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造共产党社会的一切努力。”

社会党国际十八大通过了题为《社会党国际的原则声明》这一作为社会党国际 1951 年成立以来制订的第二个纲领。这个纲领文件由 6 个部分组成，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部分讲“形势”，提出：全世界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世界）取得了非殖民化、福利国家、裁军等进步。

第二部分讲“原则”，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为实现自由、社会公正与团结一致的国际运动。个人权利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有根本性意义。

第三部分谈“和平”，提出：必须通过实现全球公正并建立新的和平解决世界各地冲突的制度来消除产生国际冲突的根本性经济与社会原因。一国之内部也同样需要和平。以暴力方式处理冲突，破坏了发展机会与人权。

第四部分讲“南北关系”，认为：相互依存已成为现实。在联合国之下，建立使南方更平等地发挥作用的多边机构比以往更为重要。解决环境问题最佳、最廉洁的方式是变动生产与消费的基本结构，首先使环境破坏无从发生。东西方裁军应与促进南北公正相联系。

第五部分展望“21世纪前景”，认为：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民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大的可行性。政治民主要求发扬和充实人权。经济民主没有一成不变的形式，各国有进行大胆试验的余地。

第六部分谈“国际的国际性”，提出（社会党国际）并非超国家的集中化组织，各成员党自己对在本国落实社会党国际决定的方式负责。

社会党国际面对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演变和剧变采取欢迎和支持的态度。十八大的《原则宣言》宣称，社会党国际“支持一切想要通过自由化和民主化来改革共产主义社会的势力”，支持共产主义社会的多元化和民主化，也同样支持和发展非集中的市场机制，以及反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的斗争，特别是还要认识人权和政治公开性是有活力和进步的社会的重要因素。十八大的决议中关于“共产党世界的事态发展”一节里重申，社会党国际以勃兰特东方政策为基础，一直谋求同中东欧各国关

系的新框架。认为，现在苏联发生了显著的变革，其后果是某些中东欧国家也发生了变革；只要这些变革带来政治与经济改造的前景，就应予以欢迎与支持。还说，要抓紧一切机会，对社会主义理想长期以来悲剧性地遭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歪曲的社会重新塑造其面貌做出特殊贡献。它当时认为，这些变革还是脆弱的，改革的难度较大。表示，将特别优先考虑去鼓励并促进同一切有关利益集团就政治、经济最广泛的问题进行对话，即同各国政府、执政党、反对党、学术界、有代表性的组织并同包括新人民阵线在内的新兴的政治势力进行对话。

社会党国际十八大也没有估计到苏联东欧的变革会发展得那么快。就在十八大刚刚过去几个月的1989年下半年，东欧各国发生了剧变。在极其复杂的形势中，已经社民党化的东欧各国共产党面临大量的困难。极右势力纷纷出笼向科学社会主义进攻，但也向民主社会主义施加压力。于是社会党国际迅速召开会议研究对剧变的方针和对策。当年11月，欧洲23个社会党的领导人在意大利米兰会晤，经过讨论决定“积极介入中东欧国家的局势”，以推动它们朝着民主社会主义方向转变。勃兰特在会上说，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热烈欢迎东欧发生的变化，对东欧新的民主力量执行开放政策，同他们进行有成效的合作。关于中东欧国家应该选择的演变方向，葡萄牙社会党领导人冈萨雷斯明确说，这应该是民主社会主义。意大利社会党副书记马尔泰利认为，东欧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动力是欧洲模式的政治吸引力，即福利国家的吸引力，而不是美国模式或日本模式的吸引力。他说，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沿着社会党的道路前进和实行社会党的主张。当年11月24日，社会党国际理事会在日内瓦开会，通过了题为《关于东欧的立场文件——问题与机会》的决议，呼吁西方国家用经济援助推动东欧各国

演变。它表示，要避免突然和充满暴力的变革威胁欧洲的稳定。关于组织问题，决议确定，社会党国际内的流亡的战前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将继续是国际的历史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社会党国际欢迎新成立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但它们必须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而且要防止社会民主主义阵营分裂，为此要尽可能做到每个国家只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不久后勃兰特指示说，真正改革的前共产党不应该被排斥在思想交流和实际合作之外，但在接受它们加入国际方面应该谨慎，信用比标签或口号更重要。就这样，社会党国际不仅密切注视中东欧各国社会党的发展情况，而且先后向东欧地区派出访问团组，传授建党与竞选经验。另外，还举行了有关的会议，在此基础上陆续接受了各国社会党加入组织。

总之，社会党国际对苏东剧变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其措施可归纳为：

一曰“传授经验”。社会党国际在1989年十八大到1992年十九大期间，为向东欧地区社会党人传授建党与竞选经验，先后派出了20多个访问团组。十九大后又于1993年建立了社会党国际中东欧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争取中东欧民主与团结论坛和中东欧工作组，加强了对“东进”工作的领导。在这期间仅据《社会党事务》报导，组织的有关会议就有7次，不断传授经验。

二曰“树样板”。把由意共改名的意左民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的匈社会党树为样板，吸收为社会党国际新成员党。还把意左民党领导人选为中东欧委员会两主席之一。

三曰“有选择地发展”。苏东剧变后，约有70个党申请加入社会党国际，其中不少是由原东欧国家共产党演变而来的新社会党。对此，社会党国际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先是恢复了

一些老牌社会党的正式成员党地位，如对波罗地海 3 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国的社会民主党。对一些新成立的或重建的社会党性质的政党，先派团考查，指导他们用“民主模式”建党，合格后，再给予咨询党的资格，如对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波兰等国的社会民主党。对由共产党改名而来的社会党的作法则相当谨慎，以匈社会党为例，在 1989 年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理事会会议上，该党的申请未获通过，直到 1992 年才被吸取为观察员党。现在东欧已加入社会党国际的有正式成员党 6 个、咨询党 3 个、观察员党 3 个、联系组织 1 个。目前尚未吸收的具有社会党色彩的政党和组织还有数十个。

苏东共产党政权被推翻之后，社会党国际主席莫鲁瓦兴奋地说：“共产主义的垮台使社会党人为其过去 70 年与之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所取得的胜利而骄傲。”

（二）上述政策的实际效果及其对自身的影响

社会党国际的战略究竟取得了什么结果？应如何估价？看来，社会党国际实行上述方针，其结果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被搞垮了，但直接的结果并没有“改造”成他们所宣传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当时接替共产党执政的大多数都是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极右翼。另一方面，苏东剧变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席卷欧洲，共产党受到冲击，社会党也受到牵连，其形象受到影响，各国社会党的影响及选票普遍下降。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党上述政策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首先是，苏东剧变使西方各国舆论普遍向右倾斜，从而使欧洲社会党处于不利地位。许多人将对共产主义的否定自然引伸为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贬责和摒弃。对此，不少社会党公开

承认，苏东剧变既是机遇，也使“民主社会主义”面临“丧失信誉”的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国际的《社会党事务》季刊1991年第3期发表了勃兰特的署名文章《在共产党垮台后的社会民主主义》一文。

该文主要目的是说明社会党与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区别，但实际上更突出强调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区别。文章说，东欧专制政权的垮台为世界上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和社会党国际提供了发出新政治倡议的机会；列宁主义的崩溃意味着试图把其独裁看法和做法作为社会主义兜售出去的许多政治组织的灭亡；由于人们背弃了独裁政府和指令经济，争取民主、自由、社会公正和相助的工作日程比任何时候更加有效和现实。勃兰特首先指出，在从前的苏维埃阵营里有人攻击社会主义已经完蛋，实际上是把民主和自由中的社会主义与失败的共产党独裁混为一谈，其目的在于损害社会民主主义。对此，勃兰特反驳说，首先，搞独裁的共产党是残暴而无能的，民主社会主义与它在几十年前已经分道扬镳，两者毫无共同点。第二，丧失了信用和被人们谴责的并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而是在莫斯科被虚伪地贴上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标签的那些政权。第三，尽管社会主义被歪曲了，但其内在科学内容并没有耗尽，社会民主主义只不过必须捍卫自己。勃兰特接着说，过去，在防止社会主义概念被歪曲的方面，社会党国际可能做得不够，因此要鼓励社会党自问是否需要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政治语言。他强调，必须更加努力地确定与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区别。因为，正如罗卡尔说的那样，不仅法西斯完蛋了，而且共产主义也完蛋了，因此，今后的斗争将在自由主义和自由中的社会主义之间展开。他说，目前在东方共产主义统治崩溃，社会民主主义重新诞生，或者首次诞生，新党或重建的老党要求加入社会民主主义

大家庭，然而，有的党只是在名义上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他检讨说，他曾过早地不分情况地谈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因为，不少人背上了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包袱，要把情况弄清楚还需要时间。由于大多数前共产党改名，情况更加复杂了。就有的党想加入社会党国际一事，勃兰特说，这至少不会立即实现，而某些党完全不能加入，但如果有关党的变化是可信的，而且该党很重要，就要考虑与该党交换看法并进行讨论。社会民主主义的多元化将从原来的共产党国家那儿获得新的内容，这是件好事，但希望我们不受关于“最终目标”的更新了的宗教理论的影响。在勃兰特这篇文章发表后，社会党国际开始更多地用“社会民主主义”一词代替“民主社会主义”一词。社会党国际十九大以来，不少社会党已采用“社会民主主义”取代“民主社会主义”，有的甚至考虑或已经更改了党名，以彻底甩掉“社会主义”这个“包袱”。

1992年9月，社会党国际在柏林召开十九大。这次大会通过的各种文件明显回避使用“民主社会主义”一词，而大量使用“社会民主主义”一词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正式称谓。大会声明提出，在前苏联和东欧，民主文化的建立同样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目前的情况是，政党数量激增，政治术语经常含混不清——前共产党人自称为民主党人或社会党人——人们对政治普遍持怀疑态度。也许最危险的威胁来自从前的权贵阶层，他们利用过程进程中的动荡，使用偏狭的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花言巧语重新获得独裁者地位。同时，十九大声明强调，其基本价值观仍然不变。

在其他具体各项工作和政策方面，社会党国际十九大继续强调一贯强调的自由、团结、民主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国际继续坚持以普选权为基础的政治多元主义制度，呼吁所有民主力

量积极地反对独裁统治。国际表示反对民族主义，对不断发展的民族主义倾向深表忧虑。认为，只有建立保证社会公正和环境保护的法律，东欧各国的新制度才能巩固。国际一方面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同时另一方面重申国家的重要作用。指出，政府可以起一种有限的决定性的作用。提出，工会、公民运动和权利集团是建立公正和平等的社会不可缺少的工具。它还提出，通过国际机构调控世界市场是迫切需要的。十九大主张，在全球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结束后，要在社会民主主义指导下，建立全球安全、责任分担、国际合作的世界新秩序。认为，为此首先必须加强联合国并使其民主化。大会高度重视欧洲共同体，强调，社会党人关于欧洲共同体的设想必须是把经济效益与合作和社会公正结合起来。但大会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认为它是新保守主义的具体体现。大会还反对美国和欧共体国家的新保护主义政策。

其次，在否定共产党的同时，社会党受牵连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社会党本来有两重性，它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同时，又在实际活动中为维护本国工人的近期利益而与右翼政党相抗争。因此，欧洲各国资产阶级一直视其为社会主义的传统势力和主要竞争对手，并为此于1983年在伦敦成立“国际民主联盟”（保守党国际），以同社会党国际相抗衡。在苏东社会主义政权被推翻之后，西欧各国的社会党也受牵连，普遍处于不利地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危机、思想理论危机、道德危机和领导危机。

法国社会党在1993年3月立法选举中惨败而被赶下台，仅得17.62%的选票和53个议席，比1988年立法选举丢失了近一半选票和200多个议席；长期参政的意大利社会党，主要领导人几乎都陷入丑闻，内部四分五裂，组织上处于瘫痪，在

一次选举中只得了 2% 的票；长期执政的西班牙工党因日益不得人心而不得不宣布提前于 1993 年 6 月举行大选；德国社民党主席易人；意社会党原总书记因丑闻被迫辞职后，上台仅几个月的总书记又因党内矛盾激化而辞职；法国社会党前总理贝雷戈瓦开枪自杀；等等，集中地反映了西欧各国社会党的困难处境。在日本，社会党发生分裂力量下降，1995 年 5 月发表的《九五宣言》强调要消除“陈旧的社会主义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式的政策手法”和“政党形象”，后又决定成立新党。在澳大利亚，执政长达 13 年的工党，在 1996 年 3 月举行的联邦大选中，在众议院 148 席中仅获得 48 席，惨遭失败而下台。

近年来，欧洲一些国家如法国、意大利的社会党，与共产党联合在选举中又出现了左翼力量上升的势头。法共在 1997 年 6 月举行的立法选举中得票率为 9.9%，在国民议会 577 席位中获 36 席，并参加了社会党政府，在政府中有 3 名成员。意重建共在 1996 年 4 月的议会选举中得票率为 8.6%，在众议院 630 个席位中获 35 席，在议会中支持以左民党为主体的中左政府，但未参政。如无法共和意重建共的支持，法国社会党和意大利左民党均不可能维持其执政的地位。现在欧盟 15 国中，社会党执政或参政的有 12 国。事实说明，社会党真把共产党都搞垮，就剩其与资产阶级右翼势力对峙，未必对其有利。这就是说，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虽有原则分歧，但实际上也有共同利益。

三、近年来的理论和政策调整

社会党国际 70 年代末以来，以其“中间立场”积极斡旋于东西方之间，在和平、裁军、地区热点、南北关系、环保等问题上提出一系列政策主张，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两极格局瓦解后，它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加紧调整理论和政策。

（一）突出意识形态，填补苏东剧变后的“政治真空”

苏东剧变之迅猛和随之而来的国际反共逆流及右翼的上台，使不少社会党受到冲击。这些完全出乎社会党国际的预料。为摆脱被动并填补苏东地区的左翼“政治真空”，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不遗余力地宣传民主社会主义关于民主、人权的基本价值观，宣称苏东剧变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时谴责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与共产党划清界线。

1. 更加突出强调民主的价值。

在 1992 年召开十九大后，社会党国际在其发表的正式文件中，越来越多地用“社会民主主义”一词而不是用“民主社会主义”一词来表述自己的意识形态。其意图是进一步与共产党科学社会主义划清界线，以进一步适应在新形势下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开展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社会民主主义的需要。在此阶段，为与“专制”的前苏联、东欧共产党区别，社会党人进一步从突出“社会民主主义”发展到了更加突出地强调民主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基本要素。社会党国际二十大

进一步强调指出，通过改良道路实现民主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

莫鲁瓦在该大会政治报告中说，争取民主是社会党国际的第一个斗争任务，它同时既是目标、又是发展的条件以及和平的保障。他说，虽然民主已经明显胜利了，但在意识形态水平上还必須捍卫它。因为某些保守分子认为，由于各国在发展和文化上存在差异，不能到处建立民主，而必须在某些国家里建立专制政权，以保障其发展的速度。在穷国依然有一些独裁者持有这种观点。我们应该表明，民主是发展的原因，而不是结果。他说，还有数亿男男女女蒙受独裁的压迫，以致除了必须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外，还必须进行政治斗争。社会党国际应该起的作用是施加国际上的压力，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打倒一切独裁政权。另外还有实际工作上的斗争，即最近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需要我们的帮助，特别是在加强积极的公民制度和组织选举的方面。他指出，要支持真正的民主，反对形式上的民主；要支持无产阶级民主，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要支持直接民主，反对代议制民主。这些都是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所坚持的共同信念。

2. 更突出强调人权与民主的关系。

社会党国际一向重视人权问题。十九大决议称，在 1989 年于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大会上，社会党国际制订了一套详细的人权宣言，宣言强调人权是不可分的；一旦人权受到违反，也就危及了民主本身。还强调，任何社会无论其发展水平如何，都必须尊重基本权利和自由。在二十大上，该国际比过去更加突出人权，而且表态更加坚决。二十大就这个问题发表了 24 个原则、29 项建议、14 项特别建议。二十大还发表题为《21 世纪人权议程宣言》的文件，宣称要致力于建立“新的人权秩

序”。还声称，“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能像 21 世纪那样与对人权的追求紧密相联。它将同时作为争取人权的世纪和利用最卑鄙的手段拒绝这些权利和自由的世纪凸现于世人之前”。宣言十分强调人权的普遍性、不可分割性与相互依存性；认为人权中有关南、北关系的部分至关重要，主张加强工业化国家与处在发展阶段的伙伴的团结，以及加强各国中最贫困的人们相互之间的团结。声称，发展的权利是普遍的，不可剥夺的。这篇宣言与以往同类文件的不同之处表现在用大量篇幅论述民主是进一步的发展与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要素，为“民主”概念作了更广泛的定义，强调民主是基本的人权，而推进人权本身又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

（二）反思“福利国家”理论，寻求新的经济发展战略

“福利国家”的建成是各国社会党，特别是西欧社民党的重要成就。进入 70 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经济滞胀，福利国家日益陷入困境。为此，各国社会党自 80 年代末以来，针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对福利国家理论和政策做了一些重大调整，其特点是缩小福利开支，重视市场作用。例如，1990 年 9 月，瑞典社民党三十一大指出，社会保障制度的费用增长得很快，因而需要采取新的劳动办法和组织形式，应当在公共部门的组织和工作方式中进行彻底的改革。1989 年 12 月，德国社民党的柏林代表大会则提出，福利政策要想继续存在，就必须对其进行改造。认为市场与竞争是必不可少的，经济民主需要企业家的主动性和贡献。1988 年 12 月，英国工党全国执委会通过的文件《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价值观》提出，我们现在不会、永远也不会去实施单一形式的公有制；不可能制定一条既严格又简单的规定来指导混合经济产量的分配方式；企

图通过中央指导或政府配给对消费品进行分配是要冒指导性经济那种浪费和效益差的风险的。社会党国际对其重要成员党的上述努力和表态是给以大力支持的。例如，十八大上否定了国有化，认为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才是创造性的源泉，在必须实行国有化的企业，也应加强民主管理和监督以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同时强调要在新保守主义的冲击下维护福利国家等劳工运动长期斗争所赢得的成果。该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原则声明还指出，经济民主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各国进行大胆试验的余地；经验表明，社会化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必要的，但它本身并不是医治社会弊病的特效药；无论私有制或国家所有制，其本身都不能保证经济效益，又不能保证社会公正。因此，各国不应简单地实行国家在形式上和法律上的控制。社会党国际十九大进一步否定公有制，强调市场的作用。该大会题为《关于世界经济的声明》的文件说，世界多数国家已经开始实行难度各异的经济改革和恢复计划，以更好地利用市场力量来达到国家的目标；各国需要引进自由化的贸易和劳务市场政策。社会党国际 1994 年举行的关于福利国家的圆桌会议则分析说，对福利国家冲击最大的是经济全球化，主要问题是福利国家竞争力削弱和本身运转费用不断增长。社会党国际领导人提出，各国要从“保障收入式福利国家制度”过渡到“通过培训创造就业式福利国家制度”。二十大则提出，民主国家必须围绕在不牺牲市场效率的前提下维护人民利益的原则来调整政策。还表示它大力支持搞新的社会契约（意即调整福利国家制度）。

从发展趋势看，社会党国际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的调整的主线是：转变重分配轻生产、重社会公正轻经济效益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寻求两者兼顾，力求平衡，重视国际协调的

新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公有制——从肯定到基本否定。

50年代主张公有制是经济政策的基础。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改变少数人占有和控制生产资料，扩大公有制，把经济权力交给全体人民。1989年十八大否定了国有化，提出经济民主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私有制或国家所有制本身并不能保证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号召各党大胆试验探索。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社会党现都不再提所有制的重要性，转而注意发挥混合经济模式产生的最佳效益。

2. 市场作用——从忽视到重视。

50年代强调，为实现经济发展和分配合理的目的，必须对生产进行计划，以便进行有效的民主监督，却只字不提市场的作用。1992年十九大指出，虽然政府在消除贫富差别等方面可起重要作用，但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直接的产品生产和提供服务方面更为有效，市场机制和竞争对经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政府的作用应限于纠正市场偏差、建立公正的税制、支持基础设施等方面。

3. 福利社会政策——内涵的变化。

多年来坚持福利社会的根本政策，认为这是社会公正的体现和保证。但现对福利社会政策的内容有了新的认识：要增加经济和社会的生产性投入而不是解决失业和确保福利的消极性开支，逐步实现从保障收入向通过培训创造就业的福利国家的转变。英国工党提出，左翼的新经济政策应注重对人的投资，以提高人的总体素质，建立高效益、高技术、高投资和高就业的新经济发展模式。

（三）调整“福利国家”理论和政策的主客观原因

社会党国际调整“福利国家”理论和政策是有深层次的主客观原因的。首先从客观条件看，社会党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已陷入了困境和危机，即西方报刊所说的“福利国家危机”。社会党的理论基础是奉行凯恩斯主义，推行“福利国家”政策，主张劳资调和，以实现社会安定。所谓“瑞典模式”其实质就是这样。各国做法、提法不同，但主要之点是：要害部门实行国有化，建立计划制度，加强对市场的监控，建立劳资协商制度，强化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实行“高税收、高工资、高福利”的“三高”政策，以缩小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差别；努力实行充分就业的政策，通过刺激消费发展生产。在战后至 70 年代中期的几十年间，科技经济迅猛发展，这套做法是可取可行的。福利国家的建立使西欧各国社会安定，劳动者积极性得到调动，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党的力量 and 影响也登峰造极。但“福利国家”是以经济高增长为条件的。据专家估计，只有经济增长率保持在 4.5% 左右，才能实现“充分就业”，并把社会“蛋糕”做得足够大，否则就难以维持下去。

70 年代发达国家经济“滞胀”，一要紧缩，二要调整结构，意味着必须大砍政府开支和社会福利，减少税收以刺激投资。但高税收是高福利的基础，减少税收，出现财政赤字，高福利难以为继。近年来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福利国家“运转费用很高”，造成国际竞争力削弱。以德国为例，企业支付雇员 100 马克的工资，就要为雇员再付 80 马克的福利费。显然高税收增加了劳动成本。以每人每小时劳动成本计算，德国为 43 马克，日本为 38 马克，而美国则只有 28 马克。高福利、

高工资、高补贴、长假期，这些以往颇令西欧人得意的优越条件，其实在削弱西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更严重的是，高福利还培养出一批坐享其成的懒汉。这些人心安理得地享受福利，丧失了进取心和积极性。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就像患了病一样萎靡不振。为了保持竞争力，发达国家必须削减一部分福利。

近年来，西方一些学者强调，“福利国家制度搞过头了”，必须进行调整。荷兰社会福利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 1/3 或国家预算支出的 43%；有的企业收入的一半以上要交给国家，不得不把企业转移到国外去。瑞典 1990 年生产下降 5%，失业率达 7%，而 40% 的工人受雇于国家，工人每年的假期 27 天，病假工资为正常工资的 90% 以上，请事假等扣钱也不多，造成缺勤率常达 25%。政府对收入最高阶层的征税率达到 84%，以致很多人抽走资本侨居国外。瑞典经济学教授林德贝克说：瑞典是一个“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无力继续负担社会福利的巨额费用。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的理论和政策不得不进行调整。其趋势是更加重视市场的作用，缩小福利开支。社会党国际领导人得出要从“保障收入的福利国家”过渡到“（通过培训）创造就业的福利国家”的结论。西欧各国已采取措施减少福利开支，英国开始对富有的病人征收医疗费；法国的办法是削减退休金和医疗补贴、缩短失业救济金享受期限；德国着手削减失业救济金、提高税收和社会福利附加费；瑞典继续压缩政府预算、减少假日、提高退休年龄、减少病假补贴；丹麦社会党也宣称不能对公民“从生管到死”。

社会党被迫对政策做上述调整，其结果是使其丧失了传统特色，与右翼政党日益趋同。现在多数社会党推行的是一种与右翼政党日益趋同的“紧缩政策”，原来社会党所强调的主张

革新、推动社会进步和社会公正等特性，逐渐模糊或消失。它们与右翼政党的差别缩小，从而脱离原来拥护它们、寄希望于它们的左翼群众，逐渐被相当一部分选民和劳动群众所抛弃。西欧在削减福利时引起民众不满，导致工潮迭起，造成社会动荡。社会党的理论不再像过去那么灵了，正在陷入危机。总的看来，社会党政策调整是必然的。福利还要搞，但不能搞那么多。向右靠拢不可避免，但完全与右翼趋同等于自掘坟墓。

（四）适应经济全球化，强调国际协调

社会党国际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西方就业机会外流和第三世界廉价商品大量进入西方市场，福利国家竞争力削弱，并难以支撑高昂的福利开支。为此，西方国家必须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加强欧洲联盟。但这与它多年来加强南北合作、增加对南方国家的发展援助和市场准入的一贯主张相左。为有效保护工人权益，还需本地区各国工会达成一致，实行统一的工资标准，这绝非易事。这些都已成为社会党国际经济政策调整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社会党国际在二十大发表的《关于世界经济的宣言》中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它有积极的一面，但也带来消极影响，例如金融混乱、发展不平衡、日益增长的不平等、高失业率及社会不稳定等。它认为，全球化促使经济利益支配社会利益，降低社会进步的价值。全球化还增强跨国公司、外汇市场的操纵者及国际组织的力量，削弱各国政府的作用，影响选民利益和民主进程。因此，需要建立一种共同责任新体系来抵消全球化的消极影响，将有效的决策权归还给民选政府。面对全球化，民主国家必须在不牺牲市场效率又维护人民利益前提下调整政策。二十大上通过的经济宣言提出，推进

共同责任新体系的战略框架应该是，通过扩大的西方七国集团或最终建立的联合国经济安全委员会协调，制定一个推进世界发展和向贫困作斗争的全球复兴纲领；在各国和全球范围内创造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加强南北、东西间的凝聚力；复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作用，承认不同经济制度下的不同问题需要通过多样化的观念、政策和机构上的更新来解决；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以减少汇率反复无常的波动。此外还要鼓励旨在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合作，保证国际金融市场有更好的透明度及责任感，加强多边贸易体系等。社会党国际主席莫鲁瓦指出，全球化问题的重要性和影响值得引起特别注意，应当在社会党国际内对此问题进行讨论，甚至开展意识形态辩论。

社会党国际经济政策、发展与环境委员会主席古铁雷斯在《全球化能否调节》一书中谈到，现代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正面临着经济和市场全球化带来的战略性问题，单个国家不再能够成为市场调节者。因此，他主张要在超国家层面上进行市场调节，为此应建立地区性组织和集团，并实行地区间合作。他认为，现在有两类地区间合作模式，一种是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榜样的自由贸易区，另一种是以欧盟为楷模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结构。但他认为这还不够。他提出，未来最好的模式是正在南美形成的南美共同体，因为它是政治、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地区。这种地区愿与欧洲地区有特殊的关系，同时是世界性一体化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网络成员开展对话并建立规则以扬全球化之长，减两极化、贫困及“降低”社会权利之害。他认为，欧盟应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有关国际关系的战略性构想方面，他认为，当前社会党人和社民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善于处理现代社会中竞争、就业和社会保障3方

面的关系。为此，他提出，首先要有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他认为，全球化的特点是技术高速发展，知识与科技已代替资本、资源成为决定国际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他还主张，要改变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作用，同时还要让私人企业也参与提供公共服务。他还主张改革福利国家，主张有限的资源要利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同时不破坏某些基本措施的普遍性。他总结说，全球化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政府的作用正在发生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够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

瑞典副外长施霍里在社会党国际刊物《社会党事务》上撰文谈全球化与民主的关系。他认为，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冷战的结束以及国际化与全球化混乱的结果，都要求世界建立一个民主环境。全球化的巨大发展带来了分配的不均衡，在一个国家内以及在国际上都出现穷人越来越多，而富人越来越富的现象。全球化也像 100 年前的工人运动一样，将平等和民主问题摆在了社民党人面前。1996 年的《社会党事务》第 2、3 期合刊的前言写道，在这个迅速的、经常是令人迷惑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变革的时代里，即在全球化的时代里，许多问题只能在国际范围内处理，否则别无它途。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已不再只是在国家水平上的追求。像社会党国际这样的组织能够帮助建立国际社会民主日程，使国际经济体系为人民而不是为资本服务，以便最广泛地受惠于新技术，并在所有国家里保障和平、民主权利以及社会福利。

四、组织状况与发展趋势

世界各国的社会党发展是不平衡的。可以说社会党的地

位，在西欧有升有降，在东欧地区正在抬头，从世界范围来说还保持着增长的势头。

在欧洲，1994年6月欧洲议会的选举中，社会党获得了全部567个议席的200个议席，欧洲社会党党团保持了在议会内最大党团的地位，在欧洲政治生活中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中英国工党是最大的赢家，它获得了英国全部87个议席的62席，占欧洲议会社会党党团总计200个议席的31%。其次是德国社民党获得32%的选票（40个议席），西工社党获30.5%的选票（22席）。

从世界范围较长的历史趋势看，社会党国际的力量和影响一直在持续增长。据统计：1976年社会党国际十三大时，共有成员党和组织66个，选民近8000万；1989年社会党国际十八大时，成员党发展到88个，选民1.5亿；1992年社会党国际十九大时，成员党发展到111个，选民突破2亿大关。自苏东剧变以来，共有70个政党申请加入社会党国际，但出于“保证质量”，十九大只批准吸收其中25个为新成员，可见其今后仍有很大发展余地。1996年社会党国际二十大，其成员党已增加至142个，有党员近3000万。

值得指出的是，凡是有发展的社会党，其理论纲领都在发生向右倾斜的变化。如本世纪初以来一直以“社会主义”和“工人党”自居的英国工党，已修改了党章第四条关于公有制的条款，使工党的社会主义旗帜变得模糊起来。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也曾公开声称，工党已是实业界的政党了。舆论认为英国工党正在同老板们联姻。这表明一些社会党在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和政策也已起了变化。

社会党国际在世界的发展态势是：立足西、北欧，进取东欧，觊觎亚太。近年来随着大批欧洲之外的政党和组织的加入，社

会党国际渐渐改变了“欧洲中心”的局面，但其领导权仍牢牢控制在西、北欧主要社会党手中，它的扩展也同样以此为大本营。

社会党国际自 1989 年起加大了向东欧扩展的力度。1993 年设立中东欧委员会等组织，加强对东欧工作的组织领导。对原苏东地区由共产党改组的新社会党加强甄别考察，恢复设立观察员党。同时不失时机地吸收意左民党和匈社会党为新成员，以此作为共产党向社会党演变的样板。东欧地区迄今已有 10 多个党和组织成为社会党国际的正式或非正式成员党，另有几十个党和组织与之建立各种形式的联系。社会党国际对在东欧的扩展前景很乐观，认为剧变之初上台的右翼政政策失当，导致经济社会状况恶化，将会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转向重视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党国际还注意向亚、非、拉等地发展，向亚太扩展的势头尤为注目。它认为亚太经济高速发展和民主化趋势，为社会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1993 年 2 月，它成立亚太委员会，协调该地区社会党的活动和制定共同纲领。该委员会 1993 年 12 月、1994 年 5 月和 1995 年 2 月分别在尼泊尔、日本和菲律宾召开会议，对亚太地区国家“民主进程”品头论足。1994 年 5 月，社会党国际首次在亚洲（东京）举行理事会，讨论亚太地区的民主和经济发展状况。社会党国际亚太战略的重点是：打击东亚发展模式，称之为只强调稳定与效率，牺牲工人政治经济利益的资本主义模式；高举人权旗帜，促进民主化进程，强调人权的普遍性和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不可分割性；推动建立欧安会式的亚洲安全体系。

附：社会党国际成员党名单（1996 年 9 月二十大通过）

1. 正式成员党 80 个，其中：

(1) 老的成员党 64 个，它们是：

阿根廷人民社会党、阿鲁巴人民选举运动、澳大利亚工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巴巴多斯工党、比利时法语社会党、比利时荷语社会党、玻利维亚革命左翼运动、巴西民主工党、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布基纳法索争取民主与进步党、加拿大新民主党、智利社会民主激进党、哥斯达黎加民族解放党、荷属库素岛新安的列斯运动、塞浦路斯社会党、捷克社会民主党、丹麦社会民主党、多米尼加革命党、厄瓜多尔民主左翼党、埃及民族民主党、爱沙尼亚社会民主党、芬兰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危地马拉社会民主党、海地革命进步民族党、冰岛社会民主党、爱尔兰工党、以色列工党、以色列统一工人党、意大利左翼民主党、意社会民主党、意社会党人党、牙买加人民民族党、日本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人党、黎巴嫩进步社会党、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卢森堡社会主义工人党、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马耳他工党、毛里求斯工党、摩洛哥人民社会联盟、荷兰工党、新西兰工党、北爱尔兰社会民主工党、挪威工党、巴拉圭二月革命党、葡萄牙社会党、波多黎各独立党、圣马力诺社会党、塞内加尔社会党、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瑞典社会民主党、瑞士社会民主党、突尼斯宪政联盟、土耳其人民共和党、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美国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委内瑞拉民主行动

(2) 咨询成员转为正式成员者 10 个，它们是：

阿尔巴尼亚社会民主党、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力量阵线、佛得角非洲独立党、智利民主党、智利社会党、海地全国民主运动大会党、匈牙利社会党、象牙海岸人民阵线、蒙古社会民主党、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3) 新吸收正式成员党 6 个, 它们是:

爱沙尼亚 MOODUKAD、斯洛文尼亚联合阵线、斯洛文尼亚民主左翼党、波兰社会民主党、波兰 UNIAPRACY、墨西哥民主革命党

2. 咨询成员党 29 个, 其中:

(1) 老咨询成员党 16 个, 它们是:

哥伦比亚自由党、斐济工党、格陵兰前进党、圭亚那劳动人民同盟、马达加斯加民族团结党、尼泊尔大会党、巴基斯坦人民党、秘鲁阿普拉党、菲律宾民主社会党、波兰社会党、圣基茨——尼维斯工党、圣卢西亚工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工党、突尼斯人民团结党、乌拉圭争取人民政权党、委内瑞拉人民选举运动

2. 新吸收咨询成员党 13 个, 它们是:

阿根廷公民激进联盟、喀麦隆社会民主阵线、多米尼加工党、赤道几内亚社会民主同盟、加蓬进步党、马里 ADEMA - PASJ、毛里求斯战斗运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莫桑比克 FRELIMO 党、尼日尔民主社会主义党、巴拿马民主革命党、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罗马尼亚民主党

3. 观察员党 20 个, 其中:

(1) 老观察员党 6 个, 它们是:

贝宁进步力量民主联盟、贝宁民主社会进步运动、中非爱国进步阵线、哥伦比亚“四·九”民主联盟、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

(2) 新吸收观察员党 14 个, 它们是: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亚美尼亚社会党、阿塞拜疆社会民主党、波黑社会民主党、博茨瓦纳民族阵线、圣萨尔瓦多民主党、乔治亚公民联盟、海地政治组织、印度 JANATADAL、

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FYROM MACEDONIA 社会民主联盟、摩尔多瓦社会民主党、蒙特内哥罗社会民主党、巴勒斯坦“法塔赫”

4. 兄弟组织 3 个，它们是：

国际雄鹰运动（社会党教育国际）、国际社会党青年联盟、社会党妇女国际

5. 联合组织 10 个，其中：

(1) 老的 9 个，它们是：

亚洲太平洋社会党组织、欧洲社会党人政党（欧洲社会主义者政党）、社会民主党新闻国际联盟、社会民主党教师国际联盟、犹太人工党联盟、工人运动国际、欧洲社会主义者·欧洲议会党团（欧洲社会党人及欧洲议会党团）、中欧东欧社会党联盟、世界工党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

(2) 新吸收联合组织成员 1 个：宗教社会党国际团

第 21 章

新形势下的交流与协调

——冷战后左翼力量的 国际会议和多边活动

苏东剧变后，世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没有消亡也决不会消亡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力量连续召开各种地区性国际会议，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教训，决心推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

这些会议的共同特点是，尽管与会者的政治倾向不尽相同，对问题的认识不尽一致，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只是社会主义一种僵化的具体模式的失败，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社会主义仍然代表着人类的未来。他们强调要加强国际联系，交流经验，协调行动，但普遍认为没有必

要成立过去那样的国际组织。社会主义没有“统一模式”，世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没有也不需要统一的“领导中心”、“指挥中心”。各党将更加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探索具有本国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当然，由于各自情况不同、处境不同，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还将长期存在，其发展道路将是艰难和曲折的。

一、朝鲜劳动党召开的“主体思想”研讨会与《平壤宣言》

苏联东欧剧变后，朝鲜劳动党认为，这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党缺乏符合时代和革命发展要求的指导思想，没有抓改造人的思想，没有坚持革命原则，犯了机会主义错误所造成的恶果。^①

朝鲜劳动党为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于1992年4月乘庆祝金日成80寿辰之机，邀请世界各国100多个党（实到92个）的代表团云集平壤，经过双边和多边接触，并同未去平壤参加庆典的其他政党进行联系，于4月20日发表了《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平壤宣言》。

据朝鲜《劳动新闻》报道，截止1995年4月22日，已有

① 详见金正日同志1992年2月和10月、1993年3月、1994年11月发表的4篇文章：《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教训和我们党的总路线》、《革命政党建设的根本问题》、《不容许诽谤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科学》。

221 个政党在《平壤宣言》上签了字。对《平壤宣言》，朝鲜《劳动新闻》的评论认为：它是“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和发展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文献”，对加强和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它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世界人民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世界各国政党的宝贵纲领”，“是国际共运团结的基础”，“是捍卫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第一个国际性的文献”；它是“当代伟大的共产党宣言”、“国际共运统一团结的旗帜”。

据朝鲜《劳动新闻》报道，朝鲜近年来，在世界各地积极推动和帮助举行地区性的各种讨论会，并派代表团参加。如：1992 年 1 月 31 日—2 月 1 日在丹麦召开了西欧地区各政党的建设经验讨论会，同年 2 月 26—28 日在津巴布韦举行了发展中国家政党关于党的建设经验第三次讨论会（前两次会议讨论了朝鲜劳动党党的建设思想理论和经验），同年 3 月 14—15 日在厄瓜多尔举行了拉美地区政党关于党的建设经验和前景的讨论会，同年 4 月 6 日在日本举行了现时代与主体思想国际讨论会；1993 年 2 月在厄瓜多尔举行了第二次拉美地区政党的建设经验讨论会，同年 4 月 8—9 日在贝宁举行了关于非洲地区目前形势和政党任务的国际讨论会，4 月 20—21 日在秘鲁举行了拉美地区关于建设自主的新社会的主体思想讨论会，5 月 2 日在比利时举行了拥护社会主义事业的西欧地区政党讨论会；1994 年 2 月 10—12 日在乌干达举行了关于世界人民自主发展和互助的主体思想国际讨论会，4 月 8—10 日在印度举行了关于自主、和平、友谊的主体思想国际讨论会。

附：《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平壤宣言》全文

为参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 80 周年庆祝活动来到平壤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等坚持社会主义的政党的领袖和

代表，在朝鲜访问期间进行了多边和双边接触。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等坚持社会主义的政党代表决定通过《平壤宣言》，以反映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意志，并为此同未到平壤的其他进步政党进行了联系。截止到1992年4月20日，包括48个党的领袖在内的世界70个党的代表在《平壤宣言》上签了字。《平壤宣言》全文如下：

为社会主义胜利而斗争的世界各国政党的代表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下发表本宣言。

当今时代是自主性的时代，社会主义事业是为实现人民群众的自主性的神圣事业。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把近年来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遭到挫折宣传得好像是社会主义已经宣告“灭亡”。这不过是美化资本主义，庇护旧秩序的诡辩而已。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遭到挫折，资本主义复辟，这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实现确是很大的损失，但决不能据此而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的反动性。社会主义是人类很久以来的理想，是代表人类未来的社会。社会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人民群众成为一切的主人，一切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真正的人民的社会。金钱决定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人剥削人、极少数剥削阶级作威作福的“富愈富”、“贫愈贫”的不公平的社会，必然伴随着没有政治权利、失业、贫穷、毒品、犯罪、人的尊严遭到践踏等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清除一切形式的支配、奴役和社会不平等，切实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真正的民主和人权。

人民群众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开展了长期艰苦的斗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因而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会没有困难和考验。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些国家没有成功，其原因之一是没有建立符合该国人民群众根本

要求的社会结构，没有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前进的保证在于使人民群众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这样的社会能够胜利前进，是已为理论和实践证明的真理和现实。坚持社会主义的党和进步人类确已汲取了宝贵的教训。

为了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每个党都必须坚定地坚持自主性，牢固地加强自己的力量。社会主义运动是自主的运动。社会主义以国家和民族国家为单位开拓和建设。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应由该国的党和人民负责进行。每个党应制定符合自己国家情况和本国人民要求的路线和政策，并依靠人民群众去贯彻。每个党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不应抛弃革命原则，而应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前进。

社会主义事业既是民族的事业，同时也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所有的党应在自主、平等的原则基础上加强同志式的团结、合作与声援的纽带。在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国际团结是必不可少的。在国际上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联合起来攻击社会主义和人民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党和坚持社会主义的党应在国际范围内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还应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支配、资本的奴役和新殖民主义，争取社会正义、民主、生存权和平的斗争中加强相互支持和声援。这样做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一切政党和进步力量面临的国际义务，同时也是为了自己本身的事业。

我们将同为捍卫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而斗争的世界一切进步政党、团体和人民紧密团结起来，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前进。让我们怀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心，为开拓人类的未来斗争到底吧！

最后胜利属于为社会主义团结斗争的人民。

社会主义事业是不可战胜的。

签字的党和组织：

孟加拉国工人党、孟加拉国民族社会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印度共产党、约旦共产党、朝鲜劳动党、在黎巴嫩的叙利亚民族社会党、蒙古人民革命党^① 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尼泊尔共产党（团结中心）、尼泊尔工农党、尼泊尔共产党（联合）、斯里兰卡共产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土耳其社会党、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比利时劳动党、英国的共产党、英国新共产党、丹麦共同事业工人党、丹麦共产主义论坛、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芬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德国的共产党、匈牙利社会劳动党、爱尔兰共产党、意大利和平和社会主义运动、罗马尼亚新社会党、马耳他共产党、挪威共产党、波兰共产主义者同盟（无产阶级）、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俄罗斯社会主义工人党、俄罗斯共产主义者同盟、西班牙人民共产党、瑞典共产主义者工人党、共产主义者联盟—维护南斯拉夫运动、阿根廷共产党、巴巴多斯工人党、委内瑞拉共产党、委内瑞拉争取新出路力量党、百慕大进步工党、玻利维亚共产党、巴西共产党、加勒比民族运动、智利共产党、智利社会党、哥伦比亚共产党、哥斯达黎加人民党、多米尼加共产党、多米尼加统一左翼运动、多米尼加劳动党、厄瓜多尔共产党、格林纳达莫里斯·毕晓普爱国运动、马提尼克共产党、墨西哥人民社会党、巴拉圭共产党、圣克斯尼维斯工党、苏里南民族民主党、特利尼达和多巴哥 2 月 18 日运动、美国共产党、美国社会劳动党、

^① 后撤回签字——译者注。

美国工人世界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南非共产党、突尼斯人民统一党

1992 年 4 月 20 日于平壤^①

二、印共（马）召开的“马克思主义有效性”国际研讨会

1993 年 5 月 5 - 7 日，由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倡议，为纪念马克思诞辰 175 周年，在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召开了“当代世界形势和马克思主义有效性”理论研讨会。印共（马）向 30 个党发出了邀请，古巴共产党、朝鲜劳动党、越南共产党、澳大利亚社会党、孟加拉国工人党、英国共产党、印度共产党、南非共产党、希腊共产党、巴西共产党、比利时工人党、法国共产党、尼泊尔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等 20 个国家的 21 个政党和组织派出了 42 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未参加会议的 3 个党提交了论文。中国共产党等 8 个党向会议发了贺电。

研讨会东道主印共（马）总书记苏吉特指出，会议是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垮台、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背景下召开的，目的是表达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反击帝国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进攻和捍卫社会主义的愿望。印共（马）为会议的召开作了准备。1991 年 1 月印共（马）十四大上发表了《关于意识形态的一些问题》的决议。1992 年 7 月印共（马）中央委员会决定在马克思诞辰 175 周年之际召开一次国

^① 译自朝鲜《劳动新闻》1992 年 4 月 22 日。

际研讨会。在此之前印共（马）总书记苏吉特曾到欧洲各国和古巴探讨召开国际讨论会的可能性，得到了各党的积极响应，但他们同时表示“没有必要对讨论会上的任何文件作出承诺”。

研讨会就苏联、东欧剧变后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印共（马）总书记苏吉特在总结中归纳了与会者取得一致的基本原则：（1）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具有创造性的科学，至今仍保持着初创时的有效性，仍然是我们行动的指南；（2）社会主义遇到挫折和曲折是由于歪曲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不能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目标；（3）社会主义仍然是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奋斗目标；（4）建筑在人剥削人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不能提供解决当今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5）帝国主义仍然是人类的主要敌人，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力量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反击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进攻；（6）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决心领导工人阶级和其他劳苦大众实现社会主义。

会议认为，“在坚持各个共产党独立的同时，保持国际主义也是重要的”，但“当今不能建立一个指导世界革命的中心”。召开研讨会交换看法是必要的，然而“从最近形势的发展吸取应有的教训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加强双边的联系，也要创造机会进行多边交流经验”。会议代表发言的主要内容归纳如下：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在目前形势下的作用

印度共产党（马）：

马克思主义是富于创造性的科学，是正确理解和评价当前形势的唯一基础。马列主义历来是唯物的、创造性的和辩证的，因而最反对教条主义。马列主义是理解和分析不断变化的

历史形势、各种现象的工具，是适应不断变化的历史形势，为人民的斗争和解放制定目标纲领的行动指南。马列主义作为一门创造性的科学，指明了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为广大群众参与这种发展并建立一个无剥削的社会创造了可能性。当今世界的发展特性证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方法论和行动指南，依然有效。

古巴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依然有效和有生命力，同时要根据新的形势不断发展和更新。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形势下，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使之在变革的、革命的实践中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有效指南。

朝鲜劳动党：

马克思在历史上首次向无产阶级提供了争取解放的思想和理论武器，指明了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和人类的理想，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仍然是真理，将指导人们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

越南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人类从一切形式的剥削和奴役中解放出来的理论仍然是人类的正确思想。马克思主义同其他科学理论一样，由于缺乏历史经验和对未来的准确预测，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完善和一定的局限性。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是人类思想精华的结晶。关于自然、社会和思想的辩证法则，人类物质财富生产方式是社会生活变化的基础的历史观点，解释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规律的剩余价值的理论，这些仍然被实际生活证明是正确的。

澳大利亚社会党：

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偏离倾向作斗争。马克思主义也在政治上与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作斗争。

孟加拉国工人党：

我党坚信，在某个历史时期，某些国家中社会主义遇到挫折，并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教条，也不应成为解决当今或未来社会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断发展的科学，是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的一种方法论。它永远不会过时。马克思从不像宗教先知们那样试图去预测未来世界事件，或对他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法。

英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关于国家与革命的著作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仍是我党的行动指南。

印度共产党：

印共坚持社会主义目标，坚持把发展马列主义作为研究印度现实的工具和动员所有可能的社会力量进行革命变革的指南。我们认为马列主义不是一种教条。

从我党的历史中汲取的教训是：不能忽视本国的情况。无论社会主义或民主都无一定模式，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印度的实际，与印度的文化传统、社会发展和争取自由的民族斗争的经验结合起来，以决定我们自己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变革的道路。

南非共产党：

马列主义从其内容上来说，是富于创造性的、不断发展的一门科学。

（二）关于苏东剧变及其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

印度共产党（马）：

印共（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探索了导致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失败的因素，认为在 3 个主要方面作出的错误判断导致了错误的政治和策略路线，从而没能加强国际共运，反而削弱了共运的坚强堡垒。这 3 个方面是：对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认识；对资本主义及其潜力的估计；背离马列主义关于革命的内容。

（1）过渡时期：将这一过渡时期简单地、机械地看作是笔直的，毫无曲折、毫无反复的。

（2）意识形态上的背离导致错误的估计和评价，从而引起国际共运的混乱。反革命势力一再利用这点，从而使国际共运失败。

错误的估计主要表现在 1957 年和 1960 年的国际会议对于资本主义的潜力和力量的估计。1960 年大会在指出世界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转变的同时，过分地认为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前途。这种简单化的认识严重低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继续发展和它适应这种发展的潜能。

资本主义在不断适应变化的现实，而对此的低估，加上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削弱了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抗击资本主义的反击力。70 年代和 80 年代中又继续了以前的错误，使资本主义占了上风。

另一个错误是过高估计了社会主义的力量。

社会主义在建设过程中，在 4 个领域犯了错误：（1）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式——无产阶级专政；（2）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3）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4）社会主义国家

中党和人民的思想觉悟。

苏共没能在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框架中纠正过去的错误和偏差，相反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执行了一条取消主义的路线，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

古巴共产党：

在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固有的客观矛盾和与社会主义性质相违背的因素相互交织。一些违背社会主义的偶然因素导致某个特定的政治、经济模式的诞生，这个模式开始与马克思、列宁设想的社会主义背道而驰。在这些国家中被埋葬的不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而只是一种逐渐丧失了其社会主义价值的特定模式。

最重要的直接原因是否定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所依赖的政治制度（一党制或多党制）必须与革命胜利时该国所处的历史和政治力量对比的状况相适应。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命力不是表现在一党制或多党制上，而是表现在它所实行的政治模式是否有效地与现实相符合。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被剥夺了领导作用，因此在没有群众真正参与的权力垄断的情况下，不可能促进真正的民主关系。

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掌权的统治集团放弃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在导致变化的主、客观原因中，存在着这样一个不能掩盖的事实：在大多数国家中，失败是由上而下地开始的。

越来越明显的是，这些社会要求深刻的变化。在对停滞的社会主义进行改革的旗帜下，在一些人的精心策划和另一些人的纵容下，前进的道路向资本主义转变了。

在导致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中，很明显地存在着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错误。机械地照搬苏联的经济—政治模式是错误的起始原因，党的马列主义性质受到损害，使人民与党疏远，

工人阶级的政权被篡夺，统治阶级腐败以致人民不能在社会中起领导作用。这一模式在过去 10 年也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停滞使得科技发展的成就不能广泛地被采用。主要问题是所采用的经济机制失去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真正实质。新生产关系中开始出现的种种不合规律的状况，不是来自发展的不成熟，而是由于逐渐背弃了社会主义的性质。这反映在经济机制上工人没有成为真正的所有者而继续与生产方式相隔离。

这些国家在某一时期所进行的装点门面的经济改革，目的只在于修补一下经济机制中的漏洞，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

上述形势反映在这些国家公民的社会觉悟上，开始产生的态度，后来发展为公开反社会主义和支持资本主义的立场。

我们不能忽视资本主义大国所起的破坏作用。帝国主义军事压力迫使社会主义发展强大的军事工业，远远超过其实际的经济能力，结果影响了其他的经济部门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此基础上，帝国主义发动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全面进攻。由于这些国家现存的结构已经腐坏，意识形态方面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的思想才能得以泛滥。苏联实行“公开性”怂恿、接受和促进了所有的反动的和机会主义的思想的发展。

越南共产党：

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东欧崩溃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是史无前例的。苏联瓦解的深层根源在于理论上的错误认识和确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形式、措施、步骤上的“左”倾教条主义。直接原因是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背叛社会主义的唯意志论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公开性”战略。仇视社会主义势力的敌对行动加速了瓦解的步伐。

社会主义长期存在的弊端和失误导致许多领域的停滞和危机。由于官僚体制，一些背叛共产主义理想的机会主义分子获得重要位置，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政府模式中生活的人被异化了。

官僚主义和逐渐偏离共产主义目标是从教条主义开始的。在新的形势下，面对反共势力的对抗，在一小撮当权派的压力下，官僚主义很快蜕变成机会主义，它们的背叛导致社会主义的灾难。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无意为未来社会提供一个具体的设想，他们的理论只是提供基本的指南和方法论，使后人可以按照将来的历史条件继续加以发展。但不幸的是这些重要教导被忽视了。马克思的许多观点，甚至一些不是用于出版的未完成的预测和个人笔记都被变成了教条和绝对真理。这一切使一个活生生的理论变得僵化了，把一种指导性理论变成了妨碍创造性探索的阻力。

十月革命胜利后建起的社会主义模式在理论上存在偏离，实际上有许多缺点。列宁早就发现了这些偏差和缺点，提出新经济政策以解决问题。不幸的是，列宁的接班人们不懂得如何保持并发展经济政策中的这些宝贵的思想。相反，在推行以社会主义政府为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他们没有实行马克思关于两种经济结构平行存在、向共产主义转变时期资产阶级权利作用的教导，以及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和恢复并发展商品经济的宝贵经验。对社会主义模式的错误理解，产生了一种主观、独断决策的制度和废除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政策，只实行两种所有制形式，即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所有这些使社会主义逐渐陷入停滞和日益严重的危机之中。

孟加拉国工人党：

我们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崩溃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修正主义的出现；（2）由领导人的修正主义政策产生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3）党内和社会上缺乏社会主义民主。苏联没有进一步发展在管理和决策进程中吸收所有劳动人民参与的社会主义民主，苏联政权后来又变为修正主义领导下的官僚主义国家；（4）缺乏在人民中间进行思想教育，相反领导人本身支持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的影响；（5）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6）没能在各个方面利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成就；（7）背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8）军事开支任意增加。

世界无产主义者应当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变化中吸取下列教训：

（1）党的领导性质是建设社会主义最决定性的因素；（2）无论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要保持马列主义思想的纯洁性。政治上的错误和经济计划的错误在前进过程中可以纠正，但思想上的偏离则会导致灾难，甚至使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毁灭；（3）不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要不断加强阶级斗争；（4）以无产阶级文化和思想打击资产阶级文化和思想，不断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人民；（5）不断实行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使劳动人民在管理和决策过程中有发挥积极作用的自由。劳动人民个人的自由应不受当权者滥用权力的影响；（6）党的领导应得到保证，不是通过宪法的声明，而是通过实际获得人民的信任来取得；（7）采取措施使人民有权监督官员和党的活动，并有权批评他们，以此防止官僚主义的出现；（8）党无论处于掌权还是不掌权的情况，都应严格遵循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9）社会主义要在科技领域保持优势，注意利用世界先进科技的成就。

希腊共产党：

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在于其领导人放弃了苏共的领导和先锋作用。苏共领导人容忍了对其思想基础的破坏。另一原因是长期以来苏共脱离了工人阶级这一社会的活跃力量，变得官僚化、专权。

印度共产党：

(苏联)过份集中的官僚制度，阻碍人民大众自觉的参与和创造性地应用科技成就。苏联的生产完全脱离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没有显示出更大的效益，没有提高生产力。

澳大利亚社会党：

放弃或削弱阶级斗争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导致放弃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帝国主义目前以现代跨国公司的形式对各国人民进行剥削和控制。如果用阶级合作和阶级调和取代阶级斗争，工人运动的力量就会被削弱，这样不仅牺牲了工人大众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而且巩固了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地位。在一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和前苏联、东欧共产党内，阶级和平概念日益增强。这种趋势与许多国家上升的阶级斗争的实际是相反的。

马克思主义必须持续进行反对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两种倾向的斗争。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在东欧和前苏联党内占了上风。右倾修正主义发展到取消了共产党。

(三) 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前途

印度共产党(马)：

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社会从阶级社会的最高形式——资本主义向无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的过渡。因此这一阶段不仅有

共处，还有反革命势力（要保留资本主义剥削秩序）和革命力量（解放全人类）之间的长期的、不断升级的斗争。这一斗争的胜败取决于：（1）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2）国际国内阶级力量的关系及对此的正确认识。

社会主义是个伟大的制度，初期经受了种种考验，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它有局限性：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发达国家，而是在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这就意味着虽然帝国主义市场在形式上有所减少，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其发展能力仍然没变。这使社会主义在从资本主义比较落后的阶段向比资本主义高级阶段更高的阶段作社会变革时比较困难。

总结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不能仅仅从修正主义的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错，这是一门创造性的科学，必须将它具体地应用到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中。因此在一个国家适用的模式不一定适用于另一国家。

古巴共产党：

社会主义不是十全十美的社会，作为仍处于发展中的社会，它因其所处的不同环境不可避免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存在缺点与不完善的地方。只要具有一种政治决心，经常地、完全地与人民站在一起，公开面对并纠正所犯的错误，这些缺点和矛盾是可以克服的。

近年来一个篡改马列主义的危险趋势是向社会灌输这样的观点：市场经济是最好的。这种理论单纯讲经济效益，而脱离意识形态内容。真正的社会主义目标逐渐被其他思想所替代，注入了西方消费主义的价值观。真正的社会主义理想原则被普遍向往西方社会的欲望所替代。

越南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人类从各

种形式的剥削和奴役中求解放的理论，它仍然是人类的正确思想。

尽管现在的社会主义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它仍为当今时代人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是社会主义把我们从二战的法西斯主义灾难中拯救出来，使我们免遭核战争，保卫了世界和平。……现代资本主义调整劳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政府在经济方面的调节作用，部分原因是由于“东方集团”和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抗衡作用的结果。

孟加拉国工人党：

苏东变化后说社会主义失败了是错误的，因为：（1）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等国家的消亡丝毫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的有效性。这些国家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其领导人不想坚持社会主义。（2）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其中包括中、越、朝、古巴。（3）甚至在一些资本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中，马克思主义运动仍然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

社会主义的成就巨大：（1）苏联搞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成就之一。（2）社会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保证了现代生活的基本物质需要，从而迫使一些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引进某些社会保障做法。（3）使苏联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国成为强大、发达的国家。（4）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失业和经济危机。（5）社会主义制度使苏联达到了文化、科技和知识发展的高水平。

巴西共产党：

回顾列宁的有关教导时，巴西共产党认为：对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除了有必要取得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搞国家资本主义和加强社会主义基础，新的集体主义等，还必须

考虑关于革命的进程、方法，特别是阶级等根本性的问题。

搞不懂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问题就会使革命面临很大的困难。在落后的国家中巩固和发展革命很不易。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存在的问题，认识客观实际，了解客观规律。……资本主义已发展了高度的物质生产能力，社会主义不能落后。

（社会主义的）发展的阶段要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相一致，不可以跳过某些阶段。

（四）关于当前的形势和政策

印度共产党（马）：

当今世界形势中有 4 个基本矛盾：（1）劳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衰退加剧了这一矛盾；（2）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人民的矛盾。帝国主义要转嫁危机，美国为建立其新的世界秩序的进攻又加剧了这一矛盾；（3）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经济领域）；（4）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如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北朝鲜的核问题，对越南的禁运等。

这些矛盾仍然存在，但解决的方法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目前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遥远。

资本主义不是不可战胜的，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很长，要经历挫折。有些已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看来已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也会因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而出现倒退。要坚定地正视客观现实，既不盲目乐观，也不陷入小资产阶级的绝望之中。

越南共产党：

与经典作家们创立理论时所处的时代相比，当今时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在内容和本质上已有很大的差别。解放无产者、

受苦大众和受压迫民族的斗争已有新的形式。马克思、列宁关于人民可采用不同的革命斗争方式，以及各国可选择不同途径通向共产主义目标等教诲，目前比任何时候对我们都更为宝贵。

越共在新形势下迅速认识到老式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力图找到办法逐渐克服它们。1988年越共六大确定全面革新的政策，1991年的七大正式通过党的政治纲领，指明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道路和目标。这一政治纲领体现了越共在理论认识上的新发展。

在革命的各个阶段，共产党人不应只注重最终目标，必须同时关注人民的重大利益并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按照胡志明的教导，建设社会主义应采取符合各国历史情况的政治和经济上的过渡政策。

比利时工人党：

随着社会主义的挫折，一场新的冷战又开始了，但这次是美国、以德国为中心的欧盟和日本之间的冷战。这3方在经济、政治上的冲突在世界五大洲都有反映。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也更突出了。

印度共产党：

世界形势变化多端，不幸的是我们的认识有时跟不上形势变化的步伐，这是导致一些惨痛错误的根源。

我们对当代世界的认识有时有主观主义的、教条的、简单化的毛病。我们忽视并掩盖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消极面。另一方面，我们大大地低估了资本主义调动、吸收科技成果以延长其生命力的潜在能力。当时人们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的普遍矛盾和特殊危机会立即导致资本主义的毁灭，社会主

义在不远的将来将取而代之。这就阻碍了我们对当今世界及各
国复杂情况作出严肃、科学和具体的研究。

澳大利亚社会党：

过去历史的一个主要教训是：工人阶级政权所进行的革命
斗争或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统一的模式或唯一的道路。我们的
总的原则是一致的，但实现目标的道路视情况而不同。

各党关系应建立在平等、独立、自主、互不干涉、互相帮
助和支持的基础上。各国共产党人要肩负他们的历史责任，把
自己的政策、要求和对世界的看法告诉各国人民。

法国共产党：

从 70 年代中期起，我们摒弃了“社会主义模式”的概念，
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开始实行一种符合法国需要和实际的战
略，即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

南非共产党：

对马列主义我们不搞实用主义。我们有两个主要指导方
针：（1）我们的看法和行动是否加强工人阶级及其盟友的力
量；（2）是否会使我们在向即定目标前进的道路上少走弯路。

（五）对中国的一些评论

孟加拉国工人党：

目前仍然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其中包括世界上按人口计算最大的国家——中国。

比利时工人党：

未来几十年内，国际形势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经过东欧和苏联的变化，今天
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旦 1989 年 6 月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取得
胜利，对全人类将是一场灾难。帝国主义通过支持“西藏独

立”和谴责中国向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出售武器”，在“人权”的名义下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干涉中国的事务。同时，帝国主义继续其经济渗透的政策，试图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搞垮共产党，以推翻社会主义。

印度共产党：

我们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中国发生的显著变化——它的经济高速增长，它的贸易迅速发展以及收支顺差，它在不损害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对外开放的政策，它把计划与社会主义市场相结合的做法，它的控制人口的方法，等等。正如中国同志所指出的，只有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国的“四化”才有保证。

尼泊尔共产党：

中国从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其结果是，中国的发展速度已超过了西方国家称之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更主要的是，中国的分配方式在世界各发展中国家中属最好的……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并未在全世界失败，失败的只是苏联模式。

三、在塞浦路斯举行的二十八党圆桌会议

据埃及《国民报》、黎巴嫩《呼声周刊》、以色列《团结报》和法新社记者自拉纳卡市的报道，1994年12月9-11日，来自中东、地中海及欧亚地区的28个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在塞浦路斯的拉纳卡市举行了一次地区性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是由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和希腊共产党联合倡议召开的。与会各党代表就当前国际形势、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

和前景，以及加强左翼进步力量协调与团结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时还就成立“宣传中心”以协调各党新闻宣传工作进行了具体磋商。会议发表了新闻公报。

出席这次会议的政党，除主办者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和希腊共产党外，还有法共、西共、葡共、南共联盟、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伊拉克共产党、叙利亚共产党、亚美尼亚共产党、巴勒斯坦人民党（前巴共）、约旦共产党、苏丹共产党、以色列共产党、埃及共产党、塞浦路斯社会民主革新运动、塞尔维亚社会党、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巴林解放阵线、埃及统一集团党、伊朗人民党和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等。

这次会议是在各国共产党和左翼力量经过近几年的整顿，已基本度过苏东剧变造成的巨大冲击，其力量有所恢复，但处境仍较困难，国际共运总体上仍处低潮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其主要目的是就各党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的任务和斗争策略交换意见，寻求和加强各党之间协调与合作的有效途径。为此，希共和塞劳进党曾于 1992 年在雅典召开过地中海与红海地区国家共产党国际会议，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这次拉纳卡会议正是雅典会议的继续和扩大。这次会议同 1992 年雅典会议相比，出席的政党由 13 个增加到 28 个，其地域范围也由地中海和中东地区扩大到欧亚地区。它们当中既有法共、希共、葡共等影响较大的欧洲合法共产党，也有为数众多的合法或非法小党，还有执政的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等民族主义政党以及少量的社会党；俄共等党也派代表与会。因此，这次会议具有相当规模和代表性。

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和主要观点是：

关于当前国际形势，会议新闻公报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的

基本特点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仍处于攻势，极力把它们主张的“国际新秩序”强加给世界人民，企图主宰世界。为此，它们不惜损害别国人民的利益，在“人权”等借口下干涉别国内政，煽动民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宗教狂热，在中东和波黑等地区引发武装流血冲突。它们宣扬的所谓国际新秩序实际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秩序，它不但没有带来安全、自由和繁荣，反而带来了更多的灾难，使世界更加动荡，贫富更加悬殊，现有矛盾更加复杂。会议表示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主权和人民权利的正义斗争，谴责各种形式的反共逆流。支持中东和平进程，要求取消对伊拉克的制裁，解除对利比亚、南斯拉夫和古巴的封锁，使中东和地中海地区成为无核区。主张召开巴尔干国际会议，尽快结束波黑战争。主张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合作，根据国际法准则、万隆会议和赫尔辛基会议原则，合理解决国家间的争端。

关于苏东剧变的原因和历史教训，会议强调，社会主义仍是人类的未来和希望。与会代表认为，从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已走过 70 多年的历程，为人类发展提供了正反两方面极为宝贵的经验。虽然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遭到失败，社会主义制度、左翼进步力量和人类正义事业蒙受了重大损失，但这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背离社会主义原则，在改革进程中犯了严重错误。因此决不能因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垮台而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抹杀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社会主义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特点，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没有、也不可能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它仍将是全世界劳动者为之奋斗的目标和全人类的希望。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不公正的剥削制度，它无法解决其自身固有的矛

盾，因此，人类的前途属于社会主义。希共代表还赞扬中国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共产党领导，实行经济改革，取得显著成就。会议指出，东欧一些国家的人民经过几年深刻反思，再次选举前共产党人执政，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在东欧国家仍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是资本主义无法代替的。

会议还探讨了在目前形势下加强左翼力量协调、合作与团结的必要性和途径问题。会议认为，苏东剧变后，各国共产党和左翼进步爱国力量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相当强大，一国的左翼党无法与之抗衡，因此，各国左翼力量应协调行动，互相支持，互相声援，以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同时，也强调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具体情况来选择自己的道路，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无意建立一个领导中心或协调机构，主张各党通过双边或多边对话等方式来交换意见和经验，协调相互间的立场和行动。在希共和塞劳进党的推动下，各党就成立一个“宣传中心”进行了具体磋商。

这次会议表明，该地区各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受苏东剧变冲击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仍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斗争。出席这次会议的大多数党为共产党，它们历史上同苏共关系密切，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有的还发生了严重的内部分裂，大批党员退党，党的力量遭到严重削弱，处境十分艰难。各党经过近几年的探索与整顿，特别是一些党坚持同党内外分裂势力开展斗争，内部趋于稳定，党的力量和影响也开始逐步恢复，有的党还有所发展壮大。这次会议的召开表明，这些党虽然尚未走出低谷，面临的形势仍相当严峻，但已基本止住了滑坡，正积极探索如何在新形势下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渡过苏东剧变后的险关，恢复在世界舞台上的应有作用。

此次会议还表明，本地区共产党和左翼力量内部积极探索协调与合作的趋势正在加强，但目前仍面临诸多困难。一些政党主张制定共同的战略并采取统一行动，寄希望于通过加强相互协调合作来改变目前各自为战的状态，以谋求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但由于这些政党大多数实力弱小，处境困难，同时各所在国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在当前形势下难以统一行动；一些欧洲共产党也不赞成这一主张，甚至也不同意成立“宣传中心”的提议。会议主办者塞劳进党领导人在会前曾表示，举办此次会议的目的是各党交换意见，不作决议，更不谋求建立任何新的国际共运中心。从会议结果看，各党在加强协调合作上达成一定共识，但在具体途径和做法上仍存在分歧。

四、拉美共产党的地区性会议与 “圣保罗论坛”的多次年会

苏东剧变以来，拉丁美洲的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在遭受巨大冲击的同时，频繁召开地区性会议，以交换观点、协调行动。从1990年以来，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共产党召开了多次地区性会议，二是共产党参加到其他左翼政党组织的“论坛”当中去，如“圣保罗论坛”，它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已形成了制度。

（一）拉美共产党的地区性会议

自1990年以来，拉美共产党已举行了多次地区性会议。从这些会议的发言看，其共同特点是：（1）继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他们强调，苏东剧变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终结”和“失

败”，社会主义仍然充满活力，仍然是人类的希望。(2) 强调独立自主地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他们强调社会主义没有“统一模式”，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本国的问题，根据拉美的历史、特点和需要去独立自主地寻求自己的发展模式。(3) 强调革命力量的“多元化”，加强与其他政治力量的联系。他们强调要克服过去的宗派主义倾向，扩大联合和团结的范围。他们说，革命者不都在共产党内，党外的革命者甚至比党内更多，联合的对象不能只限于共产党和革命者，也应包括那些在一定时期内有共同点的人和社会力量。(4) 强调加强党自身的建设，深入实际，做好群众工作。各党应吸取教训，加强党内民主，搞好自身的思想和组织建设，克服党内的信仰危机，克服纪律松弛、组织涣散的问题。(5) 强调要开展声援古巴的斗争。他们高度评价古巴刚毅不折的精神，斥责美国的干涉和颠覆行径。他们认为，古巴作为拉美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坚决的反帝力量，是拉美人民的希望所在，其存在和发展是对拉美人民的巨大鼓舞。声援古巴是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

下面概述几次会议的情况：

1. 1990年2月2-4日，南美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等国的共产党和巴拿马人民党在基多举行会议，强调“社会主义永远是人类的希望”，并对东欧的局势表示“担心”。会议发表的新闻公报谈到东欧的形势时说，“各种利用现在的形势以图恢复人剥削人制度的力量的存在，是一种令人担心的因素”，“各种改革和纠偏进程并不像世界上反动势力所说的那样意味着社会主义已经灭亡。社会主义现在是、而且继续是人类的希望，是所有渴求建立一个没有饥饿、没有贫困、没有剥削社会的人们的希望”，“代表们强调，国际主义和各国人民团结等原则现在

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有效”。据报道，古巴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以及朝鲜劳动党和萨尔瓦多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作为观察员列席了会议。

2.1990年11月26-30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18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墨西哥举行会议，研究讨论社会主义的现状与前景，会议发表了《墨西哥声明》。声明在分析苏联东欧地区的形势时认为，尽管在东欧一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已丧失了领导地位，苏联共产党也面临巨大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列主义已经过时、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代表们认为社会主义仍充满活力，马列主义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他们重申马列主义革命思想仍然是拉美革命政党和力量的行动指南，坚信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即使出现倒退和停滞，也是暂时的。因此，强调革命势力在当前形势下必须保持清醒头脑，采取联合行动来对付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宣传。出席会议的有属于18个政党的近百名代表，他们来自古巴共产党、阿根廷共产党、乌拉圭共产党、智利共产党、巴西共产党、洪都拉斯共产党、厄瓜多尔共产党、多米尼加共产党、秘鲁共产党、萨尔瓦多共产党、委内瑞拉共产党、自由玻利维亚运动、巴拿马人民党、危地马拉劳动党、墨西哥社会主义人民党、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哥伦比亚西蒙·玻利瓦尔游击队协调委员会和危地马拉革命联盟。

3.1992年3月17日，拉美19个共产党和组织在基多举行会议，重申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埃菲社的记者报道说：拉美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会议上认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是由于把“官僚和专制作法”强加给社会主义所致。他们批评“资本主义和国际反动派”把这种崩溃说成是“社会主义的结束，以使人民失去历史目标”。会议还对古巴革命和古巴

共产党表示支持，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和颠覆阴谋。

4.1994年3月10-12日美洲大陆15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墨西哥举行了国际讨论会。

美国《世界新闻报》1994年3月29日发表题为《共产党人的会议》的文章，报道了这次会议。派代表参加会议的政党有：加拿大共产党、魁北克共产党，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洪都拉斯共产党，墨西哥社会主义人民党，美国共产党，秘鲁共产党，智利共产党，多米尼加的卡玛诺革命团结、劳动党（共产党）、人民运动、人民解放和抵抗力量，哥伦比亚共产党，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危地马拉劳动党等。会上讨论通过了一项声明，摘译如下：

参加美洲大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代表团，就“当前的思想斗争”及“处于21世纪门槛的美洲人民”等题目进行了研讨，得出以下共识和见解：

科学社会主义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造的理论观点体系，列宁和本世纪革命伟人们的新贡献，仍然完全有效。它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对劳动群众和其他受资本压迫的各阶层人民争取解放进程的基本贡献。

本世纪末，我们面临着不寻常变革所带来的巨大挑战：科技革命的飞跃发展，信息领域的突飞猛进，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已无法忍受的对妇女的歧视，受剥削被遗弃的儿童悲剧，与第三时代有关题目的新要求，人类确实参与解决其重大问题的呼声等。这一切要求共产党进行巨大的革新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应表现出其本来的特质，即它是这样一种理论：活的、处于不断革新和丰富过程中的，向现实中新的因素以及为争取人类建立正义社会和幸福世界的思想和实

践敞开大门。

马克思主义从基本上讲是一种辩证的方法，这种方法完全以现实和事实为基础，不像一些人所错误地认为的是对一切历史条件和地域都产生同样结果的一堆一成不变的原则。

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其原因不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而在于对这一理论的曲解，对这一理论采取僵硬态度，以及没有执行其基本方面。在这些地区，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理想，而是在达到这一理想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缺陷、曲解和所犯的错误。独裁，官僚化，缺乏工人和人民的民主，生产资料、经济、政权社会化的发展不足是其失败的原因。受到帝国主义的经常的、强烈的、代价高昂的侵略也是一个原因。

这些向社会主义过渡模式的垮台，绝不能否定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在那些岁月中的发展进程，以及在经济、社会、科学、文化方面的巨大成果。这些国家在复辟资本主义过程中出现的灾难性的后果表明，这些成果已大部被损害，这对各国人民来说代价是何等的沉重啊！

此外，永远也不能否认那些试验，那些寻求正义和社会解放的经验，尤其不能否认其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在这些贡献中突出的有：打败法西斯、摧毁殖民体系、越南革命的胜利和古巴革命头 30 年的生存。

在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跨国资本主义用巨大的力量，包括财力物力来证明并使人类相信，社会主义已被摧毁，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

然而事实上恰恰相反，这种攻击的野蛮性和猛烈程度正好反映了，在一个日益受到饥饿、贫困、生态破坏、暴力及各种形式的侵略和歧视所折磨的世界上，革命思想所具有的威力、

有效性和潜力。一个死亡了的东西是不值得那么重视、那么疯狂地攻击的。

被持久的危机困扰，今天又力图推广其新自由主义秩序的资本主义，比马克思批评这种生产方式时更加浑身流着血污。

显然，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了 70 年以后所呈现出的挫折，并不能抹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扩张和发展给人类的绝大多数人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更不能抹杀继续为社会共享发展、正义、完全的自由和人类平等而进行的斗争。

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为依附性资本主义服务的所有模式、计划以及各种形式的政府全都失败了。

现在最时髦的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野蛮、最富掠夺性和种族灭绝性的表现之一。它造成更极端的贫困化，引起社会风气、道德、政风和文化的堕落；它加重了少数人民主的不合法性，引发出这些国家无法治理的强烈趋向。

这一过程不仅急剧地损害着所谓第三世界的国家，同时也表现为东欧社会的大倒退和恶化，反过来冲击着发达世界，出现了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的不断增长的移民潮；在西欧和美国表现为社会危机和贫困化过程，表现为帝国主义之间的激烈争斗和民族之间的战争和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重建革命变革的意识，重新组织民族解放、真正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是美洲和世界所有共产党、左派党和社会运动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这些进程正处于活跃状态，在东欧、西欧、美国和加拿大，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最近都出现了左派力量恢复和发展的迹象。

这样，我们已从由欧洲现实社会主义垮台和其他重大失败所引发的思想政治衰落和创伤的阶段，进入了一个思想革新和

革命、民主、反帝和社会主义行动的阶段。

现在仍然存在的严重困难，主要在于目前还存在的局限性和退步，在于一些使我们跟不上人民的不满和正在发展的人民反抗，特别是对需要新变革的认识不足。

在这个新自由主义时代，社会爆炸的倾向在增长。

1984年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起义；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骚乱和博利瓦尔运动军事起事；1989年厄瓜多尔印第安人起义；牙买加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社会爆炸；海地的尖锐的政治社会动乱；尼加拉瓜不断的社会抗议；在危地马拉，全国革命联盟不断的武装行动，人民斗争和民主浪潮，阻止了赛拉诺的自我政变，挫败了用军事出路解决冲突的企图；在巴西全国动员反对科洛尔；洛杉矶和美国其他城市的社会和种族骚乱；在加拿大印第安人的抗议；洪都拉斯马基拉厂的妇女的反抗；阿根廷反对阿方辛政府的社会爆炸和最近在圣地亚哥、德埃斯特罗的非武装起义；墨西哥恰帕斯的冲突；等等。这些事件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多年的压迫、不公正的新自由主义秩序和假民主。这一回顾表明，人民的抗议、罢工和动员遍及整个美洲，是对大陆英勇的武装运动的特殊贡献的确认。

这一现实，要求我们深入到人们的主观世界，以革新的方式对抗帝国主义发动的思想战。把群众的行动和意志的能力纳入解放思想的轨道，提出明确的出路和方案来武装他们，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发挥出其主角的作用，使之变成人民民主政权，变成男女劳动者的切实的权力，开辟把社会主义梦想变成可以实现的道路。

本次会议的参加者表示，承担起对这一改造的努力是我们不可推卸的义务。我们向世界上代表工人和人民运动的一切势力，向一切代表受资本压迫和抛弃的力量发出吁请，要求加强

其先锋队的行动，把它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完成恢复力量的过程，开始以更大的决心进行解放斗争的反攻。

我们号召以更大毅力捍卫劳动群众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的权利，维护被压迫者、被歧视者和被侮辱者的权利，反对酷刑，要求释放被无理监禁和镇压的男男女女。

我们号召结束新自由主义调整所推出的种族灭绝的经济，支持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工人的抗议，要求取消一切旨在使人民遭受贫困、重新把次大陆殖民地化和镇压其民主和革命力量的各种条约和协定。

我们诉诸美洲的民主良知，以更大精力反对各种形式的国家镇压，它企图摧毁本大陆的共产党、左派政党、反政府的社会运动以及其他进步势力。

我们呼吁其他民主力量实现多样性的团结，推动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形成，以便能够联合和推动人民反对毁灭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行动。

我们号召纪念两位杰出的革命战士和拉美的马克思主义者——墨西哥的隆巴多·托雷达诺和秘鲁的马里亚特吉——诞生 100 周年。

我们呼吁加强对社会主义古巴的支持，更加努力挫败美国对古巴的罪恶封锁。停止对伊拉克的侵略，要求美国军队撤出中东和巴拿马；反对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威胁和侵略计划，要求海地恢复民主，支持波多黎各独立的斗争，铲除美洲的一切殖民主义堡垒。

我们呼吁要求联合国实行民主化，实现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加强反对歧视妇女、印第安人、黑人、拉美和亚洲移民的斗争；保护生态。总之为真正的和平、民主，为伟大的博利瓦尔祖国，为公正和公平的世界秩序、人类尊严、集体的幸福欢

乐而斗争。

（二）“圣保罗论坛”及其各次年会

1990年以来，拉丁美洲各左派党和组织、部分社会党国际成员党，邀请拉美及亚、欧、非、北美一些国家的政党的观察员举行一年一度的集会，主要目的是与会各党就所在国家的形势、拉美地区形势、世界形势交换看法，就各党的斗争及活动交换经验和对前景提出看法，通称为“圣保罗论坛”。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苏联发生剧变，“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这严重影响了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争取社会主义的力量。与此同时，西方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长期把拉丁美洲当作自己“后院”的美国加紧了对拉丁美洲各国的控制和干涉。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国的左派政党和组织开始寻找团结合作的新形式，认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国的相同点多于差异；认为该地区的左派进步政党和组织开展交流、合作和共同行动有利于该地区各国人民的斗争。他们遵循“多样当中求一致”的原则，把分歧放在一边，大家走到一起来，各抒己见，协调行动，以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在此背景之下，首先由巴西劳工党倡导，1990年6月，在巴西圣保罗市举行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左派政党和运动的第一次会晤，即今天所说的“圣保罗论坛”第一次年会。在圣保罗市举行的这次大会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共有60多个左派党和组织的代表参加，是近年来少有的左派盛会。大会发言的重点是关于国际形势、拉美各国人民的处境，呼吁各国左派党和组织振作起来。经过数天的发言和会下交流，最后在关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形势和前景等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多数党表示在主要问题上要采取共同行动。

“圣保罗论坛”第二次年会是 1991 年 6 月在墨西哥城召开的。参加大会的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政党代表和第一次大会的代表人数不相上下。这次大会是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召开的。社会主义事业严重受挫已构成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左派党的挑战。大会经过发言和讨论，与会各党对东欧剧变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影响基本上有了一个共同看法，对各党斗争任务进行了调整，尤其是一致认识到要修改自己的国内路线，要重视对各自的党员及本国人民进行政治教育。

1992 年 7 月 16—19 日，在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召开了“圣保罗论坛”第三次年会。这次年会规模超过了以往两次，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69 个左派党和组织派出代表团参加，而且邀请了北美、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左翼进步组织派观察员出席，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首次派观察员与会。大会分析了拉美地区的严重形势、苏联解体对国际局势的影响以及拉丁美洲各左派党、民主力量和人民今后应走的道路。

“圣保罗论坛”第四次年会于 1993 年 7 月 21—24 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此次规模超过以往 3 届。参加第四次年会的有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 28 个国家的 112 个成员党的代表，还有 68 个来自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以及来自北美、亚洲、非洲和欧洲的政党和组织的观察员，总共约 400 人。在成员党中，有 30 个是新近吸收的加勒比地区的政党和组织。大会讨论的主题，主要是批判目前盛行于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批判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同时还就拉美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及前途，拉美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古巴所面临的经济困难，拉丁美洲人民斗争的状况、政策和策略等问

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大会最后发表了声明，对上述问题表明了看法和立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也派出了观察员与会。

“圣保罗论坛”第五次年会于1995年5月25—28日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举行，拉美28个国家和地区的112个政党的数百名代表与会；应邀作为观察员参加的组织还有拉美政党常设大会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以及来自亚、欧、非洲的政党和组织，其中包括越南共产党、朝鲜劳动党、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左派联盟及意大利、北爱尔兰、斯里兰卡和利比亚等国的代表约150人。会议就拉美地区的形势和一体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主题是批判拉美各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斥责美国封锁古巴、干涉别国内政，要求改革现有的地区一体化机构。最后发表了《蒙得维的亚声明》。

“圣保罗论坛”第六次年会于1996年7月21日在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瓦多举行，来自拉美各国左翼政党和组织的大约400名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批评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社会改革方案，认为社会主义是解决拉美失业、贫困等问题的抉择。前萨尔瓦多游击队总协调员桑切斯·塞龙对记者说：“拉美左派的一致观点是，我们把社会主义作为未来的抉择。”他说：80年代左派党经历了一个“社会主义修正时期”，从而得以重新构思和重新提出他们的某些观点，以适应当前的拉美形势。大部分左派党正在酝酿提出社会主义“新思想”，以解决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失业和贫困问题。乌拉圭广泛阵线代表何塞·努涅斯说：社会主义“仍然是拉美的一个选择”。他说应吸取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通过人民更多的参与和政治上的兼容并蓄来克服他们所犯的错误。危地马拉民族革命联盟领导人罗兰多·莫兰说：“左派应该是极富有创造力的，应该提出可能称之为社会主义或其他方式的一种新的选择”，但是，必须是切合地

区社会问题的现实。巴西劳工党领导人伊纳西奥·卢拉说：“左派不应羞于说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会议还谴责了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其他大陆的观察员。

“圣保罗论坛”出版《自由美洲》杂志，不定期发行。

五、西欧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力量 的地区性国际会议和多边活动

冷战结束以来，西欧各国共产党积极寻求加强国际联系的新途径，彼此间的交往明显加强，联合行动日益增多。

（一）召开各种国际会议，呼吁加强国际团结

近几年来，欧洲各国共产党为交流经验，加强合作，不时召开各种类型的国际会议。

1993年2月6日，西欧12个国家的左翼政党（芬兰左翼联盟、瑞典左翼党、挪威左翼社会党、丹麦人民社会党、荷兰绿色左翼、爱尔兰民主左翼、英国民主左翼、德国民主社会党、希腊左翼进步联盟、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振兴加泰罗尼亚运动、西班牙联合左翼）的34名代表（其中有9名欧洲议员、7名各自国家的议员）与欧洲议会左翼联盟议员团主席聚会马德里，商讨左翼政党之间的合作和协调行动。

1993年5月8—9日，丹麦共产主义论坛、芬兰共产主义工人党、挪威共产党、瑞典工人党（共产党人）及丹麦共产党举行联席会议，这是自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解体以来北欧共产党举行的首次聚会。在会上，与会各党相互通报了本国情况和各党自身状况，交流了近年来的经验，讨论了党报发行和交换问

题，尤其强调了今后在党的建设工作方面的合作。会议一致认为今后有必要定期举行这种会议，并提议召开欧洲共产党会议。

1994年3月4—5日，葡萄牙共产党利用其建党73周年举办的纪念活动，邀请德国民社党（前东德统一社会党）、西班牙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希腊共产党在里斯本举行会晤。与会各党认为，苏联东欧剧变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在欧洲的灭亡，因为欧洲各国共产党都在本国代表着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在本国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一支不可缺少的政治力量。各党希望在未来的欧洲议会中建立一支能代表欧洲人民和劳动者利益、反对资本主义的左翼进步力量，共同抵制马约的实施和反对超越国家的侵权行为。

1995年5月，比利时劳动党邀请世界各大洲15个共产党和左派组织，即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贝宁共产党、巴西共产党、南非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墨西哥民主独立运动、库尔德劳动党、哥伦比亚革命力量党、秘鲁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战争派”、希腊共产党、阿塞拜疆共产党、俄罗斯劳动党等，在布鲁塞尔举行国际研讨会。其中一些党通过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合的建议》。同年8月，比利时劳动党牵头召开了有11个党和组织参加的会议，讨论该建议的实施措施。该《建议》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推行反革命政策导致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国家建立野蛮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标志着国际形势的一个转折，意味着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胜利”，“忠于马列主义革命原则的党派、组织应从中吸取教训，团结起来进行反击”。“鉴于苏联的变质，必须重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反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该

《建议》呼吁加强共产党之间的国际联合、交流与合作，采取共同行动，但也强调应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协调行动和活动”，“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不可能建立一个像第三国际一样有一个领导机构和所有成员必须遵守的共同纪律的新的国际组织”。

1995年6月，西欧4个国家的18个共产党和左翼党以及欧洲议会联合左翼党团在马德里举行国际会议，专门讨论欧盟问题。会议认为，由于欧盟一体化的发展，劳动者的权益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因此，欧洲左翼必须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争取实现左翼代替的目标。会议表示，虽然西欧各国共产党不主张建立新的共产国际，但必须坚持国际主义，应以灵活的方式加强彼此的合作与团结，以便共同对付右派。为此，会议建议西欧各国共产党可考虑建立一个协调欧洲左翼行动的常设机构。1996年5月，欧洲和地中海沿岸各国共产党利用出席希腊共产党十五大的机会，在雅典举行了有14个党参加的“关于大国在地中海争夺问题的圆桌会议”。会议强烈谴责美国在冷战后到处称霸，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大力控制地中海地区这一战略要地和能源基地的企图，呼吁各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新侵略和新剥削计划。

（二）创建和发展“西欧左翼论坛”

1992年，在葡共的倡议下，意重建共、西共、葡共、法共、希腊左联和塞浦路斯人民进步党等6个党聚集在里斯本，举行了“西欧左翼论坛”首次会议。与会各党就苏联和东欧剧变的严重后果以及在新形势下西欧共产党应如何开展斗争交换了意见，一致表示必须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和目标。随后，“西欧左翼论坛”分别在米兰、马德里、雅典、赫尔辛基、柏林等地举行会议，现

已举行过 12 次会议。目前,该论坛已成为西欧各国共产党的一个非正式的国际组织,是它们之间协调立场、加强合作、共同决定采取联合行动的主要渠道。至 1997 年底,该论坛已拥有 16 个成员党,法共、希腊左联、西共、意重建共、德民社党等是这一组织的核心力量。1996 年 10 月“西欧左翼论坛”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会议,集中讨论了欧盟一体化和马约的修改问题,与会各党达成了如下共识:第一、欧盟除建立经货联盟和政治联盟外,还必须建立社会联盟,以促进劳动者的充分就业、维护社会保障体系和人民的基本权益;第二,彻底修改马约,建设一个有广泛民主和透明度的欧洲,必须对欧盟政府间会议修改后的马约进行全民公决;第三,反对欧盟军事化,反对把北约作为欧洲安全的核心,应当把欧安组织作为欧洲安全的基本框架;第四,欧盟应向所有欧洲国家敞开大门,应无条件地吸收中欧和东欧国家入盟。会议号召欧洲所有左翼和进步力量联合起来,迫使欧盟采纳左翼的建议。1997 年,“西欧左翼论坛”的会议集中讨论了欧盟一体化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左翼应如何加强团结和如何有效地维护劳动者的权益问题。该组织为更好地联系群众,于 1994 年建立了“青年网”,1995 年建立了“妇女网”。

(三) 积极开展联合行动

近年来,西欧各国共产党不仅在本国发动和参加群众运动,而且针对当前西欧严重的社会问题,积极在全欧范围内开展联合行动。1996 年 5 月,在欧洲议会联合左翼党团(由西欧各国共产党欧洲议员组成的党团)的倡议下,西欧 4 个共产党和左翼党云集巴黎,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失业的群众大会。法共、西共、意重建共等党的书记分别发表讲话,揭露现代资本主义对劳动者权益的新进攻,强烈要求西欧当权者采取

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失业问题。大会提出的“反对失业，争取充分就业！”、“给青年以工作岗位！”、“不许触动劳动者的权益！”等口号深得群众的拥护，来自西欧各国的上万名劳动者和共产党人参加了大会，显示了西欧共产党的影响和力量。为支持这次大会，法共青年组织还发动了青年失业者进军巴黎的示威游行。法国媒体宣称，这次大会是西欧各国共产党“为新的共产国际举行的奠基礼”。西欧各国共产党通过类似的联合行动扩大了政治影响，加强了相互间的了解与团结，增进了与广大群众的联系，显示了共产党依然是群众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对此，西欧资产阶级报刊惊呼：“西欧共产党在东山再起！”

六、欧亚地区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的国际会议

（一）索非亚成立“新共产国际”

据法新社 1995 年 11 月 6 日从索非亚报道，“新共产国际”在索非亚成立。保加利亚共产党主办的《言论报》说：“有 29 个共产党出席了 5 日在这里举行的集会，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弗拉基米尔·斯帕索夫当选为重新恢复起来的共产国际的总书记。”另据报道，斯帕索夫的这一主张曾在多次国际会议上提出，均遭到多数与会者的反对。他宣传：“在当今的条件下，只有坚定地站在斯大林的立场和观点上，才能证明是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或多国胜利的论点、和平共处的论点、非暴力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论点，统统是修正主义。近年来出席布鲁塞尔‘研讨会’的共产党、工人党都是‘修正主义党’。”他成立的“新共产国际”被认为是“左倾宗

派小组织”，公开说有 29 个党参加，实际上只有 3 个。德国共产党人认为，“按他的‘新共产国际’的路线行事，所有德国共产党员都得进监狱，都要受到联邦德国当局的审判。这简直是自投火坑。”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认为，共产国际是因为不符合当时历史条件才于 1943 年解散的，今天的历史条件大不一样，没有必要听任这种“国际”的指挥。

（二）基辅成立“欧亚社会主义大会”

据《哈萨克斯坦真理报》1995 年 9 月 14 日报道，“欧亚社会主义大会”在基辅成立。据报道，来自乌克兰、俄罗斯、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国的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出席了大会。法国和西班牙的社会党人以观察员身份与会。乌克兰议长莫罗兹（他当时是乌克兰社会党主席）当选为大会全体会议主席，哈萨克斯坦社会党书记叶尔特斯巴耶夫当选为副主席。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四件大事，即：基本发生在上半叶的两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发生在下半叶的两件——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挫折”和以中国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局面”。前两件大事，使社会主义由涓涓的细流发展成波涛汹涌的洪流，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后两件大事中，一件（社会主义的“大挫折”）使人们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产生某种忧虑，另一件（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却使人们看到社会主义在“绝境”中出现了“柳暗花明”的新希望。

为什么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地区崩溃了，而在中国等一些国家中却出现了新局面？为什么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毁灭，而中国等一些国家的改革却使社会主义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不好，还是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即具体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存在问题？读者从本书第二编所介绍的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的情况中对此已有所了解，在本编中将会进一步得到一些解答。

第 22 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及其意义

中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欣欣向荣，是因为近 20 年来中国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实行改革开放，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巨大魅力，总起来说，又是因为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

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

什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简而言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时代特征和本国实际，解决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二十世纪社会主义 “历史难题”的破解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总结我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只有把它放到这个历史的脉络中，才能更加广泛而深刻地理解它的涵义和意义。

20 世纪社会主义主要面对着两方面的重大课题：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探索，二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怎样领导广大群众夺取政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探索。

对于第一个课题，在本世纪上半期，发达国家的一些共产党人曾效仿俄国，试图用“暴力攻打冬宫”的方式夺取政权，

但最终都遭到挫败。十月革命胜利后，芬兰的无产阶级于1917年11月在赫尔辛基、维堡等大城市举行起义，只坚持3个多月就失败了。德国工人在1918至1921年间发动多次起义，革命浪潮曾席卷全国，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都失败了。匈牙利工人1919年的起义，夺取了政权，成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但只存在133天就被镇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人，普遍放弃了暴力革命道路，试图通过和平民主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意大利共产党人曾先后提出各种方案，如五六十年代的“结构改革论”，70年代的“历史性妥协”，80年代的“民主替代”、“建立欧洲左翼联盟”，以及“欧洲共产主义”提出的各种探索方案等。苏东剧变后，法国共产党又提出“新共产主义”理论，主张“通过人民运动和民主力量，沿着人道的、公民的和互助的现代的革命道路”，“超越”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在总结反思基础上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迄今为止，没有取得任何重大成果和进展。看来，这个课题在20世纪解决不了，要留给下世纪的后人去继续探索了。

对于第二个课题，其上篇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怎样领导广大群众夺取政权的问题，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如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等；但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他国家既不能照搬俄国革命、也不能照搬中国革命的做法，究竟怎么搞法，仍然需要继续探索。至于其下篇，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长期来没能解决好，还没有很成功的经验。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面临的历史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破了这个难题，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史上具有伟大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

尽人皆知，本世纪上半叶，东方一些不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人，遵循马克思的“东方理论”，以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一国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为指针，先后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了胜利，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被突破了，这个问题部分地得到了解决。实践说明，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第一种设想（在几个先进国家同时胜利），而是按照他们的第二种设想发展，即首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几乎都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或前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并不是财富无法容纳，而是因为民穷财尽，起来造反。社会主义革命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虽然是由经济动因引起的，但并非纯粹的经济过程、由单纯的经济因素所决定，而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础上，经济、政治、文化、阶级力量对比、国际条件等多种因素错综复杂地相互作用的结果。“取得政权”这个上篇有了成功的经验，但其下篇，即这些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探索，虽然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但是从总体上并未做出回答，因而社会主义事业长期处在困惑和困难的境地。这说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绝非易事。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多次指出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相反，是“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①。

社会主义发展顺序上的这一颠倒，使社会主义遇到了历史难题。社会主义的发展，本来可以做这样的设想：第一，假如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43页。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东方落后的国家同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那么社会主义事业将会全面向前推进；第二，假如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最初的设想，即英、美、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会比较顺利。但是，客观历史的发展，出现了第三种情况：“西方不亮，东方亮”。不发达国家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于是他们在破坏旧世界之后建设新世界的道路上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先于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难在何处？其困难来自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客观上的困难因素是：（1）这些国家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后，面临双重历史任务，其中既有社会主义自身任务，还有发展商品经济、实现民主化和反对封建主义思想余毒的民主主义任务。（2）这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虽然在社会制度上高于资本主义，但是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上仍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这个主要方面很难在短时期内体现出令人信服的优越性。（3）在“一个世界，两种制度”并存和对立这个大格局中，资本主义的实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占优势，并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包围。资本主义国家从其阶级本能出发，凭靠其经济、科技和军事优势，必然要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扼杀”战略、“遏制”战略、“和平演变”战略和“超越遏制”战略（即更大规模的“和平演变”），企图结束东西两大对立体系的这场“历史性较量”，重建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主观上的困难因素是：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是个长期探索过程。过去几十年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表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

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当代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致使工作上频频失误。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①

邓小平同志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核心问题，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解决了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面对的历史难题，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由于有了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出现了“柳暗花明”的新局面。因此可以说，是邓小平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危难中挽救了社会主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一切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适应当今时代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形成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1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3 卷，第 544 页。

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体地说，这个理论形成的条件是：

1. 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开端。但是这一时代是一个长久的历史过程。由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和变化，由于国际范围内各种矛盾的发展和变化，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变化等因素，人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总进程将呈现出阶段性。从本世纪初到本世纪中叶是社会主义大发展时期，革命和战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在这半个世纪中，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激化了各国的社会矛盾，在一些国家出现了革命形势，社会主义在战争引起革命的形势下得到了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社会主义在俄国首先获得了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社会主义力量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得到了发展，战后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6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时代的主题发生了转移，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低潮。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资本主义生产力有了大的增长，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构成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压力。80年代以来，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政治思想混乱，出现不同程度的困难。社会主义如何发展？出路何在？这一问题严峻地摆在共产

党人面前，促使人们去探索新的前进道路。

2.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实践基础。伟大的理论来自伟大的实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子，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 年来，中国在建设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开放使整个国家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华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变化。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一系列理论原则、战略思想和根本指导方针，正确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3. 我国社会主义胜利、挫折的历史经验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依据。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有过顺利发展的时期，也有过严重的曲折。从 1956 年到 1966 年，我国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同时，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失误，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条是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本国实践相结合的指导原则。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存在教条式的理解，把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当作绝对原则，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付诸实施，把将来才能做到的事情当作现实目标。另一方面，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判断失误，没有准确地把握本国的基本国情。脱离本国实际，不加分析地照搬别国的做法和模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固守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结论，超

越现实，把苏联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当作“共同规律”、“共同原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正是总结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酝酿阶段，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性转折。它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在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①随后，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化的根本前提。”^①这时，“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为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决议还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 10 条主要之点，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框架。

第二阶段：提出到形成阶段，从 1982 年 9 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 1987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首次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②。十二大政治报告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包括现代化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建设；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确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十二大还确定分两步走，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随后又提出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

十二大以后，改革全面展开。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波澜壮阔地向前推进。为了适应改革全面展开的需要，党的十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64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 页。

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个决定突破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相排斥的观念，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从而为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出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在这次全会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再一次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这次大会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对中国的基本国情作出了科学的判断；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了全面阐述。这次大会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认识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作出了概括，提出了12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

第三阶段：发展和完善阶段，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

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总结了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共识，提出了12条有深远指导意义的原则，把十三大提出的12个理论观点和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具体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指导原则作出明确规定。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以新的论述和新的论断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同年，党的十四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主要内容作了新的概括，从9个方面作了论述，使这个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成为严谨的思想体系。

1997年10月，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为主题，在理论上又有许多新的突破：一是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第一次明确提出并科学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党的十五大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深刻论述了什么是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第一次科学地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二是深刻论述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次明确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等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针对长期来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甚

至扭曲的认识，在所有制问题上仍然存在的种种疑惑，党的十五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所有制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例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有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总体质量；公有制经济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等等。这些新的思想和观点，是对传统所有制观念的重大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必将带来全党思想的再一次大解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再一次大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内容和科学体系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系统地（而不是零星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不是个别问题），提出了观察、分析和解决这些基本问题的一系列基本观点，从而构成了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科学体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92年党的十四大将其概括为“九条”。1995年中央决定印发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又将其扩展为“十六条”。但“十六条”是以“九条”为基础和根据的，是源于“九条”又展开“九条”。这里仍以党的十四大对这一理论所作出的概括，来介绍其主要内容。它们是：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

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个方面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思想基础，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在上述9个方面展开，形成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构成了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十分重视搞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重视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

他指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①他还指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②这是他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本思路。这是主线，其他一切问题都是由此而派生和展开。如前所述，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展开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贯穿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基本组成部分，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等一系列新的理论突破，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实际工作的各个领域，归根到底，又都是围绕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当代社会主义的首要基本问题而展开、而贯通、而涵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理论形成了完整的理论科学体系。

为什么又说这个理论是新的理论科学体系？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就是“新”。“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既明确指的是中国，又不同于中国，还包括对其他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有借鉴意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义。这是一个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历史性课题。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俄国这个东方国家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俄国有可能跨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思路。但是，这是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是，20 世纪的特殊形势，使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先于西方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既是 20 世纪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又是本世纪社会主义历史性难题。这些国家一方面面对经济文化落后的困扰，建设社会主义异常艰难。这些国家经过几十年的探索，虽然取得一些有益的经验，但都没有闯出一条成功之路。邓小平理论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和前人相比，第一系统，第二正确，从而填补了这项空白。“初步”，就是说邓小平理论还要在实践中继续充实、丰富完善，向前发展。这是后继者的使命。^①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性新贡献

在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遭受大挫折的形势下，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仅没受大冲击，反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原因和奥秘究竟何在？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

^① 本章以上各部分，主编在统稿时征得本书顾问赵曜教授同意，参考吸收了他和张式谷、秦德芬教授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新论》，以及他在苏星、龚育之、杨春贵教授主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程》中编写的有关章节中的一些研究成果，特此说明致谢。

在2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中国进行了“第二次革命”，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第一次革命的基本成果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改变仍然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认识到，这场新的革命和指导这场革命的新的理论是正确的，是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当前时代的要求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如此灵验，是因为它以一系列新的观点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次新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问题上。“社会主义”是个很好、很有吸引力的词，但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长期以来连共产党人自己也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人们的认识需要经历反复实践、由浅入深的过程。长期以来，共产党人在传统的认识中，始终把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本质特征，并把这3条当成评判社会主义天经地义的标准，以此来裁决一切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导致社会主义体制僵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3条的影响下，多年来，人们总是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成“资本主义复辟”来加以反对。因此，邓小平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

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他不满足于对社会主义一般特征的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概念。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这句话包括了 3 个方面：生产力方面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方面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根本目的方面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这一理论概括，是从更宏观、更集中、更深层的角度来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重要概念。这样，就从最高层次上解决了长期没有搞清楚的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为突破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下了一块大基石。

第二，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的问题上。《共产党宣言》早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要“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也有一句名言：“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②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的实践中，对社会主义最主要的任务究竟是什么，是发展生产力，还是完善生产关系，还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同西方国家进行军备竞赛，还是追求所谓的社会“平等”，长期来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致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集中力量，把发展生产力、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摆在首位。苏东地区社会主义政权的垮台，与此有密切关系。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3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4 卷，第 16 页。

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①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提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高度，他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仅是“发展”，而且要“解放”），并且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第三，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属性和经济体制的问题上。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社会主义是无商品也无货币的。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虽然认识到恢复“商品交换”、“市场经济形式”的必要性，但他过早地去世了。斯大林从1929年开始结束了新经济政策，最终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斯大林50年代出版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仍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排斥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的，以致使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的传统观念长期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因此，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在经济活动中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从而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近20年来，中国通过实践，认识不断深化。先是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不可逾越的。后来进一步认识到：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互相排斥的矛盾。在探索中，中国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又一重大贡献。

第四，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制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4页。

度建立以后，怎样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长期没有解决的历史性课题。苏联受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影响，把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看成是尽善尽美的，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完全适应”、“没有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就在于“全体劳动人民道义上政治上的一致”。他们后来承认有矛盾，但认为是“基本适应”的，所以社会发展的动力主要靠“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并提出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思想，但是他没有真正找到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和方法，而主张通过“抓阶级斗争”和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来解决。邓小平同志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矛盾，并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正确途径。他指出当前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必须通过改革才能实现，即要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其他各项具体制度。1978年他大声疾呼：“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①不仅经济体制如此，其他方面的体制也是这样：“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②邓小平同志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任务，而且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性质。他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不是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是要从根本上触动经济体制和其他各项具体制度；改革实质上是一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革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总之，邓小平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恩格斯曾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①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大贡献。

第五，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上。过去总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只看到相互对立、斗争的一面，而看不到二者又有相互联系、协作的一面。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由于复杂的主客观原因，许多国家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过分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对立、斗争的一面，而忽略了借鉴、学习、交流、协作的一面。斯大林提出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使社会主义国家离开了世界科技经济发展的潮流，封闭起来搞建设，影响了引进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东西。资本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它在社会化生产、科学技术、现代化管理等方面取得的成果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财富。社会主义要发展，就要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列宁就曾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② 邓小平同志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条件下，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要实行对外开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7卷，第443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70—171、252页。

“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① 同时在国际斗争中，在处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上，邓小平既强调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又主张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差异不应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为正确处理和发展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提出了重要的战略策略思想。这一切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第六，在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的问题上。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正确估计，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但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共产党人长期以来的认识和估计是脱离实际的，从而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急于求成的理论观点和发展战略，其教训是很深刻的。

首先是苏共长期来对苏联社会主义所处阶段的认识和估计是脱离实际的，总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欲速则不达。斯大林在 1936 年《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39 年他在联共（布）十八大的报告中就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我们还要前进，向共产主义前进”，要在经济上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一过程中断了。战后的 1952 年召开的苏共十九大又恢复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口号，提出苏联已“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最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苏联在赫鲁晓夫时期（1953—1964 年），继续坚持向共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4、78、373 页。

产主义过渡的口号。1959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新时期。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提出要用20年时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到1970年实现在按人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到1980年结束时将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接近于实现按需分配的原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年），修改了赫鲁晓夫的苏联“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估计，采用了“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认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是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合乎规律的阶段”。在安德罗波夫时期仍肯定苏联处在“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但在成熟程度的估计上较之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接近实际一些，认为苏联正处在发达社会主义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而且这个阶段有自己发展的各个时期和阶段。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在1986年使用了“发展中社会主义”的提法，但这一估计并没有成为苏共制定纲领路线的依据。不久以后，戈尔巴乔夫提出以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的纲领和目标。

其次，中国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也有一个曲折的过程，这是长期犯“左”的错误的根源。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后，党的八大宣告：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但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后，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抛弃了原来的认识，错误地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口号。当时确定的目标是，在经济上用15年时间赶超英国；在所有制方面用3—5年时间完成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在社会发展方面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从此，“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60年代，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但这主要

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并且是把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置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大过渡时期”之中，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这样，既混淆了社会主义社会同前一个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界限，又混淆了它同后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界限，为继续推行“左”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依据。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估计也有失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普遍存在着脱离本国实际，脱离现实的生产力水平，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原则，推行不切实际的方针、政策的做法。

经过实践，中国共产党已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的长久历史过程，将经历若干发展阶段，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至少要经历 100 年。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这一正确的判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为克服长期“左”的错误，正确制定和实行党的基本路线提供了依据。

第七，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上。长期来对《共产党宣言》提出的“消灭私有制”有片面的理解。《宣言》所指的是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不是一般的私有制；此外《宣言》说这是“一步一步地”的实现过程，不是一步到位的现实目标。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已认识到非公有制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需要一个过程。可惜斯大林没有遵循这个思想，过早地在苏联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造成了严重后果。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实际上逐步排除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追求生产关系上的“一大二公三高四纯”，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党认为：在一个很长时期内，社会主义社会

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而不是单一的公有制社会。党的十五大又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等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纠正了长期来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甚至是扭曲了的认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八，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问题上。分配制度是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密切联系的，追求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分配制度上当然追求单一的按劳分配。长期来，出于抽象的“公平”原则和对社会主义脱离实际的理想化的理解，连按劳分配也被作为“资产阶级权利”加以批判，结果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实际上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在公平的名义下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公平，使社会主义缺乏激励机制。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应当是公平和效益的统一，应当引进激励机制，有利于奖勤罚懒，鼓励多劳多得，允许收入上的合理差距，又要防止分配的不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按劳分配以外的其他分配形式存在。所以中国现在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是对社会主义旧体制的突破，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新贡献。

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解决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过程中，以新的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通过改革，对长期沿用的苏联模式进行了根本性变革。这一变革的最主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定，它表明中国正在完成从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理论，就是以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和传统模式的突破，从而开拓了新的理论认识和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确立了它的历史地位。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第 23 章

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 开放及其成就

为什么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导致社会主义的崩溃，而中国的改革使社会主义出现了新局面？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集中体现为“四项基本原则”）与其采取的具体制度和运行机制（通常称为“体制”）区别开来，对前者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后者全面彻底地进行改革。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经过 20 年来的改革，中国已突破了源于传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旧模式，闯出了一条富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逐步形成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新模式（体制）。中国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局面，来自于改革的实践，来自于邓小平理

论，来自于这种社会主义新体制的形成、完善和发展。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适应时代的需要，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它又反过来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2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和成就，充分证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成功的。当然，人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这一理论将更趋完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也将更加辉煌。

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特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开始起步。从此，中华大地发生了巨变，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尽管中国在前进中还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但世界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最成功的。

中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不是局部改革。中国的改革又是有重点的，即在全面改革中始终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而经济体制的改革又采取了渐进改革的策略。从1978年末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改革开始起步。从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个客观事实出发，改革首先从农村着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连年增产，基本上解决了粮食

问题，以世界 7% 的耕地养活了世界 22% 的人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吸纳了 1.1 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促进农村发展，促进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农村改革取得成功，1984 年发展到以城市为重点、以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大发展，市场繁荣，商品丰富，基本上满足了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从 1992 年十四大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又进入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广大群众从改革中得到实惠，从内心拥护改革，成为改革的积极支持者。这是中国改革不可逆转的根本原因。

（一）为什么苏联东欧的改革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而中国的改革却使社会主义焕发了生机和活力？中国改革的主要特点和基本经验是什么？

1. 在全面改革中始终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中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不是局部改革。邓小平同志说：“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① 改革必须配合建设，全面改革是和全面建设相配合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党的基本路线规定的奋斗目标是一个全面的奋斗目标。“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 3 个方面的要求，它既是三位一体的现代化目标，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 3 个重要方面。全面改革是为全面建设服务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37 页。

中国的改革既是全面的，又是有重点的，就是说，有所侧重，不是平均使用力量。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的确立，是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所决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地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在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使国家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这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中国只有这一个中心，不能搞多中心。其他各项工作，包括改革，都要围绕、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偏离、干扰和冲击这个中心。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主要不在于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在于在全面改革中始终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相反，某些国家的改革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取得明显成效的情况下，匆忙将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领域，引起政治动荡，冲淡和放松了经济体制改革。结果经济政治形势急剧恶化，社会动荡不安，思想理论混乱，人民生活每况愈下，最终断送了社会主义前途。

2. 经济体制的改革采取渐进改革的策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的确立，是邓小平同志的一大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他的一系列论断和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我们不再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和社会主义的异己物。市场和市场经济不带有社会制度的属性。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经济都是方法，“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它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

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①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不是前者排斥市场，后者排斥计划，而在于对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计划还是市场。中国经过多年的实践和经验总结，确定经济体制改革是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因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中国从传统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是一个根本变革。实现这个变革，是按照积极而又稳步前进的原则，采取了渐进的改革策略，分3步向前推进。第一步，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1982年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第二步，从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到1987年十三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第三步，从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到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就全国范围说的，东南沿海地区搞市场经济的起步更早一些。我国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到本世纪末止，前后需用大约20多年时间，这同一些国家的“休克疗法”截然不同。实践证明，我们采取的渐进改革是成功的，没有出现激进改革带来的生产下滑、物价失控、失业骤增、生活下降和社会震荡等严重问题。

3. 实行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373页。

中国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改革是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改革和开放相结合，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鲜明特色，也是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是顺乎历史潮流，在“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个大背景下提出来的大政策和基本国策。在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不能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经济。闭关自守，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只能导致停滞和落后，这早已为国际国内的无数经验教训所证明。只有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自觉置身于国际市场的竞争，一国的民族经济才能更快地发展。现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科学技术交流越来越频繁，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再在封闭的状态下求得发展，实现现代化。

列宁说：“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 + 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 + 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 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 + + = 总和 = 社会主义。”^① 这句话的实质就是说，社会主义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它在几百年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远远超过了以往世代的总和。中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这就更加需要实行对外开放，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加以运用和发展，这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超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社会制度的历史要求。因此，我

^① 《列宁文稿》，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 卷，第 94 页。

国在改革开放中,不仅要改造旧体制和建立新体制,而且要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并且把二者结合、融合起来。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①这样做,不是引进资本主义,而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当然,对西方的糟粕则应剔除,绝对不能学。

4. 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巩固,也难以进一步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人们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邓小平同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有许多重要论述,并提出了指导原则,一是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更艰难,因为它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因此,“需要审慎从事”,否则会一着不慎,全盘皆输;二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根本改革”,没有大破大立问题;三是政治体制改革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两院制”、“三权分立”制度,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而要发挥中国自己的优势。中国实行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这是中国人民在实践中的伟大创造,既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又能解决人民实际上不可能直接决定一切国家大事而带来的种种困难,有利于实现民主和效率的双重目标,最符合中国国情。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社会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的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相继出台的措施有：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政企分开，权力下放，精简党政机构，转变政府职能，改革人事制度，实施公务员制度。中国这样做，可以使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相配合，但还达不到相配套。西方国家搞了几百年，至今也没做到相配套。现在国际上有一种舆论：中国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邓小平同志反驳他们说：这不对。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从未间断，只是没有按照西方的政治模式搞“改革”，如果那样做，就上了他们的圈套，改革的将不是体制而是基本制度。

5. 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贯穿改革长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改革是动力，它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是改革问题。发展是目的，是“硬道理”，“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靠经济的发展”，只有发展，中国才能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状态，才能进入世界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发展反过来又会促进改革，同时它又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稳定是前提，是发展经济和顺利进行改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动乱会使改革夭折。中国任何时候都要注意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稳定的程度，使三者之间保持平衡。

社会政治稳定对改革极为重要。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要失掉；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不能乱，中国的最高利益是稳定。中国能不能实现

稳定，这不只关系中国，也不只关系亚太地区，而是关系整个世界能不能稳定的大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时间是稳定的，但也有不稳定的时候。经过1986年底的学潮和1989年春夏之交的风波，人们更加认识到稳定对中国的重要。当前中国社会稳定、政治稳定，这种局面保证了中国改革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更快。对比某些国家改革后出现的政治动荡，更觉中国社会稳定的可贵。

上述5条，就是中国改革的基本实践、主要特点和成功秘诀。如果对中国的改革进行哲学思考，成功的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条是中国的改革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而不去照搬其他国家的改革经验，不是今天听你的，明天学他的；中国的改革方案来自于集中了全党全国人民智慧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而不是来自于某个外国的某个研究所。这叫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另一条是坚持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多做实事，切忌空谈，在干中学，在干中积累经验，在干中增长才干，到一定时候进行总结，对了的就坚持下去，错了的就改正过来。意大利《共和国报》指出：“迄今为止，谁都没有像中国那样能在如此短时间里干出那么多的事。”这就是实践论。

（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国内实行改革的同时，对外实行开放。近20年来中国已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格局。

中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就内容来说，不仅包括经济，而且包括政治、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就范围来说，不仅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而且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开放，是3个方面的全面开放。经过近

2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这样4个层次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

第一个层次是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加速经济的发展而划出来的特定区域，在这些区域内实行优惠政策，以吸取外来的资金和技术。目前，中国已设置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省5个经济特区。我国经济特区主要突出一个“特”字：一是在对外经济活动中享有较大的自主权；二是对外商投资在税收上给予特殊的优惠；三是特区经济坚持几个“为主”，即建设资金以吸收和利用外资为主，经济成分以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为主，产品以出口外销为主。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基地。邓小平指出：要把经济特区办成“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第二个层次是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1984年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这些城市，在扩大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方面给予较大的审批权；对外商投资给予税收和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有条件的城市，经国务院批准可设置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某些特殊的经济政策。

第三个层次是沿海经济开发区。1985—1988年，国务院先后确定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为沿海经济开发区。这样通过5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几个沿海经济开发区，使沿海从南到北形成了3个不同层次的开放地带，成为整个国家对外开放的桥头堡，起到了跳板作用。

第四个层次是内地。上述3个层次开放地带的成功经验，逐步从东到西向内地横广推进，不断推动内地的开放和经济的振兴。进入90年代以后，已从沿海开放发展为沿江、沿边、内陆开放。近几年，内地引进外资、建立中外合资企业有很可观的发展。

在中国这么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处理好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的关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从一定意义上说，对外开放和争取外援也是为了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中国要引进先进技术，但必须把引进和开发、创新结合起来；要利用国外资金，但同时更要重视自己的积累。这样才能争取时间，加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绝不是要回到过去那种闭关锁国、关起门来搞建设的老路上去，而是要把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水平。^①

二、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0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 经济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提前实现了翻两番 深刻的变革，全方位的开放，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① 本章的这一节，主编在统稿时征得本书顾问赵曜教授同意，引用了他和张式谷、秦德芬教授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新论》的有关章节的成果，特此说明致谢。

展。1979 年以来的 19 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由 3624 亿元猛增到 74772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 9.8%，比改革开放前的 1953—1978 年平均每年增长 6.1% 的速度提高近 3.7 个百分点，于 1995 年提前 5 年实现了 GNP 比 1980 年翻两番的计划目标。到 1997 年，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 7 位。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 379 元提高到 6079 元，剔除价格因素，平均每年实际增长 8.4%。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商品短缺问题已经基本结束。对 20 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世界银行专家评论道：“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生产总值及指数情况^①

年份	绝对值 (亿元)	人均 (元/人)	总指数(以 1978 年为 100)	人均指数
1978	3624.1	379	100	100
1985	8989.1	853	193.5	175.5
1990	18598.4	1634	283.0	237.3
1991	21662.5	1879	308.8	255.6
1992	26651.9	2287	352.2	288.4
1993	34560.5	2939	398.4	323.6
1994	46670.0	3923	448.7	360.4
1995	57494.9	4854	489.1	394.0
1996	66850.5	5576	536.8	427.1
1997	73452.5	6079		459.6

^①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成就辉煌的 20 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1、352—355 页。

(二) 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在国际上排次提前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首先，经济总量居世界第7位，增长速度居世界首位。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624.1亿元人民币，至1997年达74772.4亿元，比1978年扩大近20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4.9倍。若按当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计算，199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9020亿美元，位于美国（78193亿美元）、日本（42234亿美元）、德国（21154亿美元）、法国（13938亿美元）、英国（12784亿美元）和意大利（11462亿美元）之后，居世界第7位。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近20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8%，是新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在世界经济中也独领风骚。比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高6.5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高7.3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高4.8个百分点，比同期经济增长速度较高的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省、马来西亚和印尼高出1.9—3.5个百分点。

其次，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1位。近20年间，中国煤炭和布匹产量始终保持世界首位；谷物、棉花、油菜籽、猪牛羊肉、钢、布、水泥和电视机等8种工农业产品分别由第2至16位上升至世界第1位；发电量和化肥产量则分别由第7位和第4位升至第2位，原油产量由第8位上升到第5位。当然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水平仍然较低。

中国主要工农业产品居世界的位次^①

品种	单位	工农业产品产量		居世界位次	
		1978 年	1997 年	1978 年	1997 年
谷 物	万吨	26546	44349	2	1
棉 花	万吨	216.7	460.3	3	1
油菜籽	万吨	186.8	957.8	2	1
猪牛羊肉	万吨	856	4121	3	1
钢	万吨	3178	10894	5	1
煤	亿吨	6.18	13.73	1	1
原 油	万吨	10405	16074	8	5
发电量	亿度	2566	11356	7	2
布	亿米	110.3	248.7	1	1
水 泥	万吨	6524	51174	4	1
化 肥	万吨	869.3	2821.0	4	2
电视机	万台	51.73	3637.24	16	1

第三，对外贸易由世界第 27 位上升到第 10 位。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仅有 206.4 亿美元，位居世界第 27 位；到 1997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 3251 亿美元，比 1978 年增加了 14.8 倍，年均增长 5.6%，位居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中国香港和荷兰之后，居世界

①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成就辉煌的 20 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8 年 8 月第 1 版，第 335 页。

第 10 位。

第四，外汇储备居世界第 2 位。1978 年中国外汇储备仅有 1.67 亿美元，微乎其微。到 1996 年底中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 1000 亿大关，达 1050 亿美元，居世界第 2 位（仅次于日本的 2166.5 亿美元）。1997 年中国外汇储备继续增加，年底达 1399 亿美元，稳居世界第 2 位。1997 年世界外汇储备的排次是：日本（2208 亿美元）、中国（1399 亿美元）中国香港（928 亿美元）、中国台湾（835 亿美元）、德国（776 亿美元）、新加坡（744 亿美元）、西班牙（684 亿美元）、美国（589 亿美元）。

第五，吸收外资总额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中国已成为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一块“投资绿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总额达 3483.5 亿美元，其中 1997 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 644.1 亿美元。自 1990 年以来，中国吸引外国长期资本总额一直居发展中国家前列，1993 年后，中国吸收外国资本总额已连续 5 年保持发展中国家首位和全球第 2 位（仅次于美国）。

第六，中国国际旅游业收入居世界第 8 位。1978 年海外来华旅游人数 180.9 万人数，旅游业收入仅 2.6 亿美元，1997 年来华旅游人数达 5758.8 万人次，比 1978 年增加 31 倍，外汇收入达 121 亿美元，比 1978 年增加 45 倍，年均增长 22.4%，位居美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奥地利之后的世界第 8 位。

（三）市场繁荣，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转折性变化

改革开放前，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受“短缺经济”困扰，居民购物凭票证、排队，现在市场繁荣，商品供应充足，“卖方市场”已转变为“买方市场”。1997 年粮食产

量达到 49250 万吨，比 5 年前增加 5000 万吨，粮食生产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现在，我国已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粮食储备体系。肉、禽、蛋、奶、水产品、水果和蔬菜等农产品产量都有大幅度增加。城乡市场副食品供应充足，花色品种齐全，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乡镇企业保持了较快增长的态势，不断为农村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力量。目前中国市场上绝大多数商品处于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的状态。据对 613 种主要商品的调查表明，1997 年下半年供不应求的商品只有 10 种，占 1.6%，供求基本平衡商品占 66.6%，供大于求商品占 31.8%。长期困扰我国的商品短缺现象已有明显改观，市场供应充裕，消费者的选择余地明显扩大，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买方市场的格局，宏观经济环境趋于宽松。买方市场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经济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市场经济已基本代替了计划经济，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明显增强。

前几年中国经济的“高通膨”已实现了“软着陆”，现在中国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膨”的良好态势。1992 年经济增长 14.2%，1993 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超过 15%。伴随着高增长，出现了“四高两乱”：高投资、高货币投放、高物价、高进口，金融市场混乱、生产资料市场秩序混乱。但是 1993 年下半年及时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 16 条措施，整顿金融秩序，加强房地产、证券、价格等管理，加强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加强投资项目管理，消除经济过热的因素。1994 年以来中央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方针，坚持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灵活运用利率、税率、价格和法律手段调控宏观经济，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保持和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1996 年初步实现了

“软着陆”，避免了大起大落，经济增长率回落到 9.6%，保持在 8%—10% 之间的适度增长区间；同时价格涨幅继续回落，零售物价涨幅降到 6.1%。1997 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8.8%，市场零售物价上涨 0.8%，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2.8%，形成了“高增长、低通膨”的良好格局。

与此同时，由于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新增发电机组容量 7314 万千瓦，新建铁路主线交付营运里程 6410 公里，新建高速公路 4548 公里。电力、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长期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明显缓解。近年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建成投产，京九、南昆铁路全线投入运营，长江三峡和黄河小浪底水利水电枢纽工程顺利截流；一批重大项目正在建设；新探明了一批矿产资源。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能源、原材料、交通、邮电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得到明显缓解，增强了持续发展的后劲。

（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基本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改革开放的 20 年，是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 20 年。据测算，目前我国居民已走过了 4/5 的小康生活之路，整体生活水平已接近小康生活目标，其中城市居民整体生活水平小康综合评价得分已达 90 分；农村居民整体生活水平小康综合评价得分达 81.5 分。绝大多数人已摆脱了贫困局面。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居民收入成倍增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 1978 年的 133.6 元提高到 1997 年的 2090 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343.5 元增加到 5160 元，扣除价格上涨升因素，年均增长 8.1% 和 6.2%，分别比改革开

放前 26 年高 5.6 和 5.1 个百分点。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存款余额在 1995 年达 29662.3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 39.8 倍，1997 年又进一步增至 46280 亿元。

居民收入的增长带来了消费水平的增长。全国居民消费水平按人口平均的居民消费额从 1978 年的 184 元增加到 1995 年的 2311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 7.4%。其中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为 5044 元，平均每年增长 6.7%；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 1479 元，平均每年增长 7.1%。1996 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达到 4377 元，比上年实际增长 3.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926 元，实际增长 9%，是近几年增幅最高的一年。

消费水平的增长首先带来了消费量的增加。城乡居民平均消费量也有较大增长。1995 年，全国人均肉类消费量 39.3 公斤，是 1978 年的 2.9 倍；蛋类消费量 12.6 公斤，是 1978 年的 6.3 倍；水产品的人均消费量从 1978 年的 3.5 公斤增加到 20 公斤。1995 年城镇居民每百户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为电视机 118 台、录放像机 18 台、电冰箱 66 台、收录机 73 台、照相机 31 台，部分富裕家庭则拥有摄像机、小汽车、组合音响、空调机、钢琴、现代化厨房设备等；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电视机 81 台、收录机 28 台、电冰箱 5 台、洗衣机 17 台，拥有录像机、摩托车乃至小汽车的富裕农民也不在少数。

与此同时，居民的消费结构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城乡居民消费质量明显提高。居民消费结构已由过去的生存需要开始转向发展需要，呈现出消费档次明显提高、消费心理趋于成熟，购物更加理智的特点。1995 年城乡居民人均粮食、肉类、蛋类等消费量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拥有的家用电器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家庭电视机的普及率达到 85% 以上。在居

民消费结构中，满足基本生存的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下降，1992—1997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6.4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1.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城乡居民衣着消费进一步成衣化、高档化；空调器、冰箱、组合音响、摩托车等消费支出平均增长25%—168%；小汽车、摄像机、电脑等开始进入居民家庭。

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情况

项 目	城镇居民消费 (%)		农村居民消费 (%)	
	1978 年	1995 年	1978 年	1995 年
生活费总支出	100	100	100	100
食品类	57.5	49.9	67.7	58.6
衣着类	13.6	13.5	12.7	6.9
居住	1.9	7.1	3.2	13.9
用品及其他	27.0	29.5	16.4	20.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居住条件有较大改善。1979—1995年全国共新建城镇住宅25.5亿平方米，并建成了5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小区5000多个。1995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8.1万平方米，比1978年的3.6万平方米增长了1.25倍。现在许多城市新房成片，高楼林立；住宅小区在规划、设计、施工和内部装修方面都有创新，设施配套，布局合理，环境优雅，深受居民欢迎。

农村住宅建设更是蓬勃发展。1979—1995年全国共新建农村住宅113.3亿平方米，有1.2亿户农民迁入新居，人均住房面积由1978年的8.1平方米提高到1995年的21平方米。现在，农村普遍以整洁敞亮的砖瓦房代替了昔日的茅草屋，许多农户还盖起了楼房。与此同时，农村小城镇建设也得到了很

大发展。目前全国 5 万多个小城镇、370 多万个村庄绝大部分编制了建设规划。

全国初步建立起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失业保险逐步扩大，372 个城市建立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取得很大成绩，5 年中有 3000 万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

（五）机遇与挑战同在，前进中仍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

如上所述，改革开放 20 年来中国已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也必须看到在前进中出现和积累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面对世纪之交竞争激烈、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既存在机遇也面临挑战。今后能否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将关系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

首先是老问题解决后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旧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被打破之后，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被呼唤和调动起来，整个社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变化和成就。但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一是收入差距悬殊、地区差距拉大的问题在发展。因劳动态度、数量和质量的差异而形成的差距是合理的、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在政策范围内许可的合法收入，对经济的发展和前进也是有益的。但是现在出现的等量劳动投入的收益差距显著，不同地区行业、职业的收入差别大，特别是各种非法收入造成一部分人暴富以及贪污腐败蔓延、走私活动猖獗，既破坏正常经济秩序，又影响人们积极性的发挥和社会的稳定，是需要重视解决的。二是体制转换过程中出现的职工下岗待业、失业就业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等深层次问题。在西方失业是社会的毒瘤，各国政府都非常害怕其发展。中国在体制转轨过程中，

这个问题也日益突出起来，而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远不如西方健全，使问题变得更为尖锐。一个社会要健康地发展，既要有“动力机制”，还需要有“平衡机制”。市场机制鼓励竞争、激励进取，解决了社会前进的动力机制问题。但是在市场机制下必然会有弱者、失败者，对他们没有必要的社会保障措施和制度来保障其基本生活，即社会缺少平衡机制，这个社会就难以稳定。如果只重视运用市场机制，而容许社会保障机制长期滞后，真正健康的市场机制也建立不起来。因此，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健全已成我国的当务之急。三是道德问题、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流动人口问题、教育问题、犯罪问题等等，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亟待解决。

其次是，还存在不少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的问题。一是国有企业投入产出的效益问题、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现在我国国有企业亏损问题尖锐，资产流失的数量惊人，是不容掉以轻心的。二是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之后，所有被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已积累成今日无法避免的社会矛盾。这涉及千家万户、方方面面，增加了改革的难度。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

再次是，中国原有的问题如资源、人口、粮食、环境问题，随着经济现代化变得更突出了。中国论人均资源占有量而言是贫乏的，节水、节能、节约各种资源是一件大事。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取得了重大成绩，但也随着出现了独生子女带来的家庭和社会问题，还有如何渡过人口老龄化这一关的问题。对中国来说，粮食生产始终是事关全局的大事，而农业基础仍然薄弱，粮食未摆脱“靠天吃饭”的传统格局，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抗灾能力下降，农业发展的资源约束进一步强化，使我们更需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多灾害国家，因

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每年达 1000 亿元左右，这表明中国环境质量较低、稳定性较差。经济发展、人为破坏自然生态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如果仍按目前的污染程度、资源消费的速度走下去，不必说后代子孙，就是我们这一两代人都难以生存下去。今年的洪灾已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决不能忽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了。

从国际看，经济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各国经济联系和合作越来越紧密。这既为我国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使我们面临着更大的国际市场竞争的压力。世界科技革命突飞猛进，正在改变着传统产业和传统生产方式。这既为我们发挥后起优势、尽可能采用先进技术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存在着我国科学技术与国际水平差距拉大的可能。国际金融进一步活跃，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明显，同时金融风险对各国经济的冲击也随之增大。

总之，从国际国内形势看，中国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但总的说来机遇大于挑战，有利因素大于不利因素。尽管前进中还会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但 21 世纪必将是中国更加繁荣昌盛的世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彩夺目的世纪！

第 24 章

外国人眼里的今日中国 ——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评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吸引着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他们尽管政治立场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但几乎一致地赞扬邓小平及其理论的伟大功绩，惊叹中国人民的巨大创造力。一些媒体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造就了 20 世纪最壮观的经济奇迹之一”，“扭转了本世纪后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趋势”，“拯救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威望”，挽救了“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对 20 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大的贡献”。

当今世界，已出现了一股“中国热”。世界各大报刊和通

讯社几乎每天都在谈论中国。改革开放 20 年来，各种不同职业和身份的人士，从总统、总理到企业家、银行家，从教授、学者、科学家到新闻记者、宗教界人士，抱着不同目的兴致勃勃地到中国来，参观、访问、考察、办实业，有的发表谈话，有的撰写论文、著作、调查报告或新闻报道。在他们眼里，中国是个什么样子？

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评论

国外舆论，特别是一些左翼人士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造就了 20 世纪最壮观的经济奇迹之一”，它“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扭转了本世纪后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趋势”，“拯救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威望”，挽救了“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对 20 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大的贡献”。

埃菲社在 1992 年 12 月 17 日发表的一篇年终专稿中，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评论时写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邓小平为挽救已经解体的苏联的官僚集权主义所面临的几乎不可避免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而向马克思主义者作出的回答”，它“造就了 20 世纪最壮观的经济奇迹之一”。

俄罗斯学者阿·雅科夫列夫说：“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在目前世界条件下体现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他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发展，不仅扭转了本世纪后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趋势，而且必将对下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哈萨克斯坦社会党主席叶尔蒂斯巴耶夫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解决了 12 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拯救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威望”。

前保加利亚社会党主席亚·利洛夫强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说：“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实行社会主义的经验是很有意义的，应该加以深刻总结。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独特方式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兴趣，许多人都在研究中国的经验。中国建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和引进先进技术的作法，是各国应该效法的榜样。”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显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坦桑尼亚前总统姆维尼多次访问中国，他最近一次访问后感触颇深地说：“中国的惊人成就表明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已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变成了具体的、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那种死抱教条、空喊口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分配贫困，而是分配财富。中国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伟大变化，毫无疑问地证明：中国政府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正在创造奇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强调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中国的改革有了可靠的政治保证和稳定的社会环境，这受到了国外一些左翼人士的赞扬。

哈萨克斯坦社会党主席叶尔蒂斯巴耶夫说：中国的改革完全不同于苏联，是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进行的真正的改革。“四项基本原则 + 改革开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对 20 世纪的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最重大的贡献。

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卡斯特罗强调中国的改革与苏联的不同，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捍卫了社会主义思想”。1993年12月24日他在古巴记者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说：“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和前苏联的政策不同”，“毛泽东犯过严重错误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国领导人虽然严肃批评和纠正了他的错误，但是，他们还是维护了他的形象和思想”，“中国领导人捍卫了社会主义思想，维护了党的形象和发挥了党的作用，而前苏联领导人却是相反”。

俄罗斯学者 A·普拉托夫斯基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竞赛中的胜利者。”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正当我们这个辽阔的国家呈现寒冷、饥饿和昏暗的景象时，邻邦中国的亿万人民却在兴奋地享受经济改革的成果。他们在比较快地取得了温饱之后，正在朝着下一个目标小康的方向奔跑。”他还说，那些关于韩国、智利、日本、瑞典和其他模式的议论只会引起消极的后果，而“休克疗法”的试验却是一种消极的做法，于事无补。就在俄无所适从时，邻邦却能在 10 年内使 10 亿以上的人民群众有饭吃、有衣穿和感到温暖。谁能说这不是奇迹呢？

《苏维埃俄罗斯报》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强调：“只有瞎子才会认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幽灵，才会认为共产主义已被送进了棺材。”中国没有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改革改的只是经济体制，而不是社会经济制度。邓小平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的理论已作为中共长时期的思想和理论支柱固定下来。该报还热情歌颂我国的国际地位提高，说：“在 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东方、亚洲、中国的作用显著上升。中国在世人心目中正在变成全球力量的中心，变成一个地缘政治平衡的因素。一切珍惜

和平与社会主义的人都满怀希望地注视着中国不断壮大、胜利前进。”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明确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国外舆论对此反应热烈，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的正确选择”，是“唯一可以挽救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是“唯一正确的充满希望的成功之路”。

保加利亚科学院院士、著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家、索非亚大学前校长尼·波波夫教授认为，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道路，这是“唯一可以挽救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是唯一正确的充满希望的成功之路”。他说：“今天的中国是我的向往，明天的中国必定是我的归宿。因为我的理论观点在中国得到了实现和验证。1957年我出版了最初的有关主张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的论著。从此，我便一以贯之，为在保加利亚实践我的理论而奋斗。我高兴地看到，我的观点已在中国变成了现实。”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初提倡者和研究者，波波夫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可行的。市场就是市场，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但要使之具有社会主义的面貌，要对市场进行指导，不能放任自流。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指国家对各类经济关系提出要求，实行对经济生活的指导和领导，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要把某种固定的关系加给经营主体。”他还说，中国选择了正确的发展策略，重视发展轻工业、电子工业，使产品打入了国际市场，吸引了外资，刺激了其他产业的发展。照这样发展下去，到21世纪初，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力量之一。

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刊登埃·皮沃瓦洛娃的文章，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实践的探索，提出了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代替以前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这是理论上的一个“新的突破”，是市场经济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香港《星岛日报》1992年10月12日发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塞缪尔森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评论。他说：“中国过去长期实行的是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它造成了普遍的效率低下并使大批国营企业亏损。但是，如果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也是非常大的错误。我认为应该保持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角色。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提法中的‘市场’一词，应在政府离开问题百出的旧体制的时候得到合理的平衡。”他还认为：“中国现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1976年以来事态变化的概括。他们企图把市场活力以及承认道义和分配方面的考虑、承认干预市场对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他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寄予了很大希望。他说：“我相信，中国只要照目前这条道路前进，就可望在2020年成为全世界第二或第三大的经济强国。但达到那种程度时中国得要记住：混合经济如何运用税收和分配来缓解私人财产市场体系带来的贫困和不平等。我不认为转向纯粹的资本主义是正确答案，但我真诚地祝愿中国顺利。”

国外舆论在赞扬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进程中所取得的重要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远没有成熟，还存在许多缺陷。日本《外交论坛》1994年7月号上发表一个日本学者的文章，指出“中国实现市场化的最大问题，恐怕在于，尽管无论从怎样的角度说市场经济制度尚未健全，而人们的意识却已经转向了市场经济。实际上，中国人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极为迅速的，令人感到什么事都可以搞成金钱交易”，“拜金主义

已到处蔓延”。欧盟委员会 1995 年 7 月向理事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如基础设施落后和环境恶化，有可能破坏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

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评论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根本内容都可概括为改革开放。开放也是改革。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最鲜明的特点。国外人士和舆论对中国改革的实践给予高度评价。

英国《中国季刊》1993 年冬季号刊登卢西登·派依的文章，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从未有过这样一个社会，像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成为最高领导以来的中国那样，在没有战争、暴力革命或经济崩溃的条件下，进行如此重大而全面的改革。邓小平通过一种特殊的道路，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逐步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最终使中国稳固地走上进步之路。”

首先，国外舆论赞扬中国的改革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突破常规路线，而又不听信西方“私有化”、“休克疗法”之类的方案，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因而使改革取得了成功。他们赞扬“中国人无疑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实验者”。

英国《中国季刊》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的改革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决策的”，是自觉自愿的行动，不是外来的强迫改革；“中国的改革未遵循常规路线”，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改革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方法上是渐进、灵活的，

“摸着石头过河”；二是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发展，但不搞私有化。因此“改革成了一个充满各级政府、各类企业、广大职工和消费者间交互影响的过程”。

日本外务省官员松木盛雄评论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采取了先试行后普及的“渐进方式”。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必须在稳定中改革其体制。渐进的改革易于普通人接受。

法国学者迈赫达·瓦哈比认为，前苏联和东欧在社会主义垮台后，主张激进的改革，实行“休克式疗法”；而中国与此相反，主张渐进式改革；先在基层进行试验，然后经政府肯定后逐步推广。中国通过一系列实践和挫折，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改革道路。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强调中共的领导作用，政治改革十分谨慎。相反，在前苏联，戈尔巴乔夫首先倡导民主政治改革，实行政治民主化和公开化，而经济改革却没有相应的进展。戈氏改革的最后结果是苏联解体和经济状况恶化。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是与对外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使中国越来越不是单一的“中国”了。美国学者格里特·宫在《华盛顿季刊》上撰文指出：“中国所出现的一系列变化，根源于它与世界通行模式靠拢，是由于中国越来越按照现代世界上进行竞争所必需的那种信息活动、政治与经商决策、资源分配和分散权力的模式行事。”他还认为，中国的最大变化表现在对外开放上。中国的开放是全面的，但程度不一样。“不同的部分以不同的程度向外部世界的不同地方开放。中国的沿海地区向全球开放，尤其是向香港、台湾、日本和中国内地开放；新疆和西北地区则向中亚地区开放；云南和西南地区则向东南亚包括泰国、缅甸开放。总的说来，中国没有什么地区是完全封闭的。”

中国的改革与苏联东欧的改革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引起了国外学者和舆论的广泛关注，他们发表了大量评论。国外学者和舆论对中国改革的看法分歧很大，但一致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

国外学者认为，从逻辑上看，前苏联、东欧和中国改革的任务大体相同，要同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问题作斗争。改革带来的问题大多相同，如通货膨胀、失业，以及由于生活水平下降而造成的社会不满。但中国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同苏联、东欧不同，中国是采用渐进的灵活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中国在放开价格、把国营企业作破产处理和进行私有化等方面都非常慎重。但是俄罗斯领导人却让自己被以英美顾问为主的一帮人所蒙骗。这帮人主张摧毁现存的经济和权力基础，实行“休克疗法”，他们希望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能创造出某种更好的东西。结果造成严重灾难。

德国前驻华大使维克特强调说，中国领导人根据自身的特点，不使用所谓“转轨的理论”，而是有自己独特的做法。其他国家的转轨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则加强社会主义制度；其他国家经济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夺共产党的权，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则是为了巩固共产党人政权。中国还吸收了东亚一些国家的经验，即先使经济现代化，在经济发展之后再逐步进行政治改革，但要避免发生政权更迭。

剑桥大学的学者彼得·诺兰认为，在从共产主义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中国干得要比俄罗斯好得多。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里，你走不了多远就能找到一家货架上摆着中国商品的商店，但若想寻找俄罗斯制造的商品，那就困难得多了。然而从其他方面看，中国人在开始进行市场改革时，在文化、财政和

组织方面并不比俄罗斯人占有任何特殊优势。前苏联和中国“都具有赶超上来的巨大可能性”。实际上，俄罗斯人的科学和工业技能优于中国人，因此俄罗斯的潜在适应能力要比中国强。

布热津斯基曾经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作过评论，他说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民主化混乱”。他实行的民主化、公开性，使“各种各样的组织纷纷应运而生，随着苏维埃权威的不断缩小，沙文主义增多，而容忍性会下降，这将会带来动乱和越来越无法调和的要求”。西德前总理施密特则指出：“假如邓小平不仅在经济上搞改革，而且在政治上也尝试实行公开性，那么，中国目前也许正深陷混乱之中。”

美国学者安·瓦尔德说，中国的经济转轨与前苏东各国在道路、策略和成效上形成巨大反差，仅此就说明中国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中国和前苏东各国的改革任务及所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但是在起点和具体条件上是不同的。他在分析了这些不同之后，又指出二者“经济改革的政治目标不同”。苏东各国的“休克疗法”和私有化部分是为了摧毁共产主义制度，剥夺共产党的权力，中国的渐进性改革则旨在把共产党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工具保存下去。他说，回头来看，中国突出强调搞经济改革“看来是明智的”，“因为这样中国只要面对一个大转变，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前苏东国家则要面临‘双重转变’，即在实现对经济的历史性改造的同时，还要在独裁制度崩溃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民主制度：脆弱的议会联盟使得改革规划难以推行从短期看来会造成失业、收入减少的政策”。

俄罗斯学者齐普科 1996 年 3 月在《莫斯科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对中国和俄罗斯改革进行比较，充分肯定中国改革开

放的经验。他说：中国的经验有力地证明，在政治制度稳定的情况下，进行慎重而深思熟虑的改革，可以带来比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优秀顾问进行的自由的市场试验更显著的经济效果。中国的经济实践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反驳了我们这里某些相当普遍的理论。

俄罗斯有些学者认为，俄罗斯实行的休克疗法的改革方式是不成功的，改革政策缺乏连贯性。中国的改革是渐进性的，有计划，有领导，因此取得成功。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现在的前苏联加盟国、中东欧各国以及中国所代表的东亚国家的经济成果，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中国的改革经验是值得认真学习的。

俄罗斯经济分析研究所所长安德列·伊拉里奥诺夫不久前在《消息报》上撰文指出：“俄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在20世纪末，很难找到比中国经济改革经验更有说服力的答案来回答这一问题。”

《匈牙利民族报》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的榜样是不能效法的吗？》的文章，认为中国逐步改革经济的做法值得仿效。它说那种认为由于政治和经济紧密相连，市场经济是与国家所有制不相容的，改革就必须摧毁共产主义制度，国民经济必须进行广泛的私有化，逐步的改革会给保守力量提供抵制改革的机会的流行观点已被中国改革的实践驳得体无完肤了。

三、对中国建设成就的评论

外国人士和国际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发生的巨大变化称赞不已。法国《世界报》说“改革使中国经济实现了真正的

起飞”。德国《经济周刊》赞扬中国“经济繁荣，巨人苏醒”，“正在朝着民主和法治国家的方向前进”。美联社说统计数字表明“中国正迅速向世界经济大国迈进”。美国《洛杉矶时报》说“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一个庞然大物”，“对世界各个角落产生着影响”。……世界各大报刊和通讯社几乎每天都有类似的关于中国的报道。

德国《前进》月刊强调中国对世界政治发展有特殊意义。它说：“这个国家幅员之广、人口之多，它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它发展的方式，它的市场的重要性，以及它在一个已失去几十年里起了决定作用的两极结构的世界上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它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突出地位——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依据，也是我们欧洲对它如何扮演这种角色感兴趣的依据。任何看到中国的全球意义及地区意义的人，都不会主张或希望中国国家制度崩溃。”

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里亚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盛赞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他认为，“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快速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走上了蓬勃发展之路，而且还使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观念焕然一新。”他表示相信，中国的发展不可逆转，中国正在阔步迈向工业化国家之列，21世纪中国将发生更惊人的变化。

墨西哥议会联盟副主席、参议员卡瓦哈尔赞叹改革开放已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所有领域都出现了腾飞。他说：1973年他对中国进行第一次访问时，中国给他留下的印象是高楼零落，汽车稀少，着装统一，色彩单调，人们的神情严肃。而今日中国呈现在外国旅游者眼前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

景象：宽阔的马路，川流不息的汽车，鳞次栉比的高楼，多姿多彩的服装；人们喜气洋洋，热情大方，真是彻底改变了。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驻北京和上海事务所所长片寄浩纪根据自己近两年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发表文章说：近20年后重返北京，北京乃至全中国的发展变化着实令人吃惊。由于实行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北京的生活水平开始接近日本了。最明显的变化是人们“可以选择了”，就是说，从衣食住行开始，中国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同日本一样，具有了选择的余地。以前中国是“分配”社会，人们一律穿中山装，骑自行车，吃中国菜，住公家的房子。即使想与别人有所不同，即使手头宽裕，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外国人在中国旅游，食宿、交通和旅游日程，都必须委托接待单位办理，而现在可以自由安排了。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选择范围非常广。如服装，从老式的中山装和布鞋，到最新潮的时装和高跟鞋，品种繁多，五花八门。出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选择骑自行车、小公共、地铁、出租车或私家车。在北京，广东菜、四川菜等中国四大菜系自不必说，人们甚至还能品尝到正宗的日本料理等世界各地的风味。住宅除了公房以外，商品房包括公寓楼、别墅也日益增加。在就业方面，人们可以选择国家机关、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个体经营等多种形式，从原工作单位“跳槽”的人也很多。中国人自主择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在北京，除了语言不通之外，一点也没有不适应的感觉。

德国《世界报》1997年9月1日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龙来了》的文章，认为中国在15年时间内从一个沉睡的、内向的巨人变成了一支对世界经济具有极大潜在意义的生机勃勃的力量。自1979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行改革以来，生产每

年几乎都增长 10%，出口的年增长率甚至达到 17%。中国以其占世界人口 1/5 的 12 亿人民，生产着占全球产量 1/10 的产品。中国龙今天已使东南亚“虎”相形见绌。

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说，“15 年来，中国大陆进步之神速为历史上所少见”，“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增长超过当年日本的经济奇迹，人口却比日本多出 10 亿有余”。他说，从广州到深圳 160 公里的公路两旁，“尽是一座座施工中的中小型工厂、仓库或住宅”，这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建设计划”。日本的一位观察家则说：“倘若把中国比做一个大型飞机的话，那么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经济圈以及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下游经济圈和以大连、青岛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则是它的三个引擎。”美国《新闻周刊》发表一篇题为《中国经济充满生机》的文章说，中国的经济是世界上最生机勃勃的经济，从最富的广东省向周围各地扩展，向西已扩展到新疆，外国投资者已去那里寻找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从江苏扩展到武汉和重庆，港台企业已投资数十亿美元在那里建厂，东北地区的经济也得到蓬勃发展。

外国人士对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人权状况大为改善给予很高评价。1996 年 9 月在北京举行的各国议会联盟第九十六届大会，一些国家的议员代表盛赞中国在改善人权、保障人民生存权、使人民过上温饱生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称其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孟加拉国议员阿布·卡西姆对记者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其政治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使 12 亿中国人过上了温饱生活，这是人类生存权的巨大成就，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光辉典范”，“中国的成功与强大是对亚洲各国人民的极大鼓舞，将使中国更有能力为亚洲国家提供更多的支持与援助”。俄罗斯上议院副议长科洛列夫·奥列克认

为，最基本的人权就是人民吃饱饭的权利，这是其他一切人权的基础。中国政府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粮食实现自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相信中国政府一定能够克服前进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困难。马来西亚国会议员叶柄汉说：“在世界很多人还在挨饿的时候，中国已在帮助人民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保障人民的基本人权方面获得很大的成功。有人就人权问题指责中国是不妥当的。”世界银行欧洲办事处主任阿卜杜拉·马鲁菲说：“保障人民有充足的食物是人权，而且是基本的人权。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相信中国将会继续获得成功。世界银行将为此继续为中国提供必要的支持。中国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贝宁议会团团长阿乌昂吉努·雷蒙认为，人权中的生存权是优于其他一切的最基本权利。他为中国“如此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感到惊讶”。他说：“中国快速而和谐的发展，给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广大非洲国家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楷模。”新加坡国会议员杨敦清说：“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已为其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莫大的好处，这些已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方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次各国议会人士聚会北京，亲眼看看中国的进步，对改变不符合实际的印象十分有益。”

邓小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受到了国外舆论的普遍赞誉。美国总统克林顿说：邓小平“推动并实行了中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改革计划，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生活水平，并使这个国家的很多方面实现了现代化。中国今天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邓小平先生决定使他的国家对外部世界开放。”澳大利亚政府官员说：“我们十分感谢邓小平，因为经济改革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

定为党的旗帜和指导思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决心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国外舆论对此反映尤为热烈。他们一致赞扬“十五大确定的方向令人鼓舞”，“中国将沿着邓小平所开辟的改革道路继续前进，将以更大胆的经济改革进入 21 世纪”。

外国学者在肯定中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与光辉前景时，也指出中国未来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F·沃格尔撰文指出，中国在 21 世纪初可能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但在科技、国际贸易和投资方面很可能会落后于日本和美国。中国国内问题严重，主要原因在于生活水平低、人口众多和缺乏正常适合的现代体制结构。这些国内问题要到 21 世纪的头几十年后才能基本得到解决。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明翰在《21 世纪的中国经济——中国面临的挑战》一文中写道，中国自实行经济改革以来，经济的增长速度惊人。其长远发展潜力依然看好。然而，中国到 21 世纪能否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取决于中国能否有效地解决一系列重大的经济难题和体制障碍。譬如，彻底完成经济改革和革新体制结构。如果不继续进行改革，中国也可能“历经挫折渡过难关”，但中国如此庞大，其经济成功与否，都会给亚太地区带来巨大影响。中国自身的问题，特别是在粮食、能源和污染等领域的困难很容易变成全世界的难题。

本世纪末下世纪初，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两个转变进展如何，关系到中国第三步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也关系到 21 世纪中国在亚洲及世界的地位。国外各界人士和舆论对此极为关注，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一致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实现现代化，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对世界都是个积极力量，都会给国际社会带来益处。中国在 21 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国的发展前景无比美好。

后 记

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 150 周年，又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在纪念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庄严时刻，呈献在读者眼前的这本《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扫描》，是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李淑铮、戴秉国部长为首的两届部领导的关心、鼓励和支持下，部内外 60 多位同志多年奋斗的集体成果。同时，没有中共中央党校、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的有关领导和多位教授的支持协助，特别是没有本书顾问李淑铮、龚育之、高放、赵曜教授的宝贵指导，没有当代世界出版社吴锡山社长与全社同志的通力合作，本书是不可能以如此厚重的分量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20 周年纪念之际奉献给广大读者的。可以说，本书的出版，凝聚了上述方方面面诸多同志对《共产党宣言》、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深厚感情，是我们献给这两个永远值得纪念的伟大事件的一份特殊礼物。

正因为本书有多个单位、60 多人参与合作，整个工程的总体策划、构思、组织和统稿就是一项不轻松的任务。作为该课题的负责人和全书的主编，多年来我深感责任重大，力不从心。我虽然在中联部工作了 30 多年，论完成这一课题的客观条件还是不错的，但就主观方面来说仍感到很吃力。因为长期来我侧重研究的是拉丁美洲和世界经济问题，80 年代所著的《开放的世界》、《西方发展学与拉美发展理论》以及主编的《当代拉美政治思潮》都是有关这方面的，而对整个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却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10 年前，我被调到中联部研

究室并参与室的领导工作后,才开始从全球范围思考研究这类问题。在部内外众多老专家、老前辈面前我是晚辈、新兵,只得不断向他们请教。不久就发生了苏东剧变,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成了人们关心和议论的焦点。同时西方出版界又接连抛出《大失败》、《历史的终结》、《1999年:不战而胜》等著作,宣传“20世纪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消亡的世纪”,“21世纪将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社会主义不会有一席之地”。我当然不相信这类断言,但因缺乏全面深入研究,不免有些困惑。形势和任务逼迫我下决心从研究世界经济问题和其他问题转向集中研究世界社会主义问题,于是申请牵头承担国家社科规划相关的项目。在完成了1993年的年度项目之后,又申请承担了这个国家社科“九·五”规划的重点项目。这个项目涉及面广、问题复杂、难度很大,幸好有部领导支持、课题组同志合作以及部外单位的协助,才得以完成任务。

抚摸这一大堆溶入课题组集体劳动与智慧即将付印的书稿,我既有喜悦,又并不觉得轻松。作为课题组负责人和本书主编,我虽然作出了种种努力,但限于个人能力和水平,难免有不应有的错误、缺点和疏漏。敬请诸位多加批评指正,容再版时——当然如果还有这种机会的话——改正。

最后,还要感谢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李兴耕、李其庆同志为本书提供了重要图片,使本书增色不少。感谢袁智兵同志协助主编所做的协调组织工作,感谢责任编辑康帅同志认真细致地审校全部书稿,感谢张京梅同志为稿件的录入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肖枫

1998年9月28日

于北京木樨地

作者索引

序 戴秉国

总论 高放 肖枫

第一编 经历“政治地震”的各国

第1章 肖枫 胡延新

第2章 肖枫 田永祥

第3章 熊应梦 田永祥

第4章 熊应梦 张小恩

第5章 王雨滨 巢蓉芬 张淑娟 王岐山 李明 郭增麟

王志明 侯媛洁 龚远

第6章 朱安琪

附 柯官碧

第二编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国

第7章 沈志远

第8章 蔡国英 李一凤

第9章 郑国才 李英

第10章 肖枫 康学同

第三编 发达国家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

第11章 王金圣 夏方林

第12章

一:曹松豪 二:郝庆祝 三:游长江 四:孙丽慧

五:郭素琴 六:施辉业 赵整社 刘凯阳

第 13 章

一:解健真 二:刘 萍 三:于元俊 四:解健真
五:施辉业 刘凯阳 六:施辉业 赵整社 刘凯阳
七:俞小董

第 14 章

一、二、三、四、五:施辉业 徐月娟 狄会深
六:陈殿栋 七:刘映春

第四编 发展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民族社会主义”

第 15 章

上:袁智兵 蒙文彪 王宗颖 黄东兵 张旭羿
下:运随东

第 16 章

上:姜述贤 苏印环 季 平 马 辉
中:姜述贤 苏印环
下:马 辉

第 17 章

上:洪栖涛 朱水飞 周云霞
中:蒋春馥 焦志鑫 俞星昌 姜建华
下:邝生炎

第 18 章

上:史国辉 王赫明
下:朱俊发 周光泰 李力清

第 19 章 肖 枫 郭元增

第五编 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

第 20 章 肖 枫 施辉业 李勤真 彭 斌

第 21 章 肖 枫 沈志远 沈蓓莉 杨 斌 夏方林

第六编 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中国

第 22 章 汪锡奎 范建中 王庆五 布成良

第 23 章 汪锡奎 范建中 王庆五 布成良

第 24 章 柴尚金